

《参谋长战争回忆丛书》

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

——鲜为人知的真情实况

杨迪著



解放军出版社



THE DAYS IN THE GENERAL HEADQUARTER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VOLUNTEERS

《参谋长战争回忆丛书》

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

——一位作战参谋的历史回眸

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

——解放海南岛战役决策指挥的真实记叙

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

——鲜为人知的真情实况

ISBN 978-7-5065-5692-7



9 787506 556927 >

《参谋长战争回忆丛书》

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

——鲜为人知的真情实况

杨 迪 著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杨迪著. —3 版.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8

ISBN 978 - 7 - 5065 - 5692 - 7

I. 在… II. 杨… III. 中国人民志愿军—史料
IV. E2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1697 号

书 名: 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

著 者: 杨 迪

出版发行: 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国防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85 千字

印 张: 14.375 印张 插页 22

印 数: 18001—23000

版 次: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3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65 - 5692 - 7

定 价: 34.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出版说明

沈阳军区原参谋长杨迪同志撰写的有关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三部战争回忆录《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自1998年由我社相继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得到当年参加战争和战役的老首长、老战友的高度评价，引起国内外有关学术研究机构的重视关注，国内的许多主要报刊进行了刊登报道，主要电视媒体对杨迪同志进行了多次采访。《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曾二次再版，《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也早已脱销。

之所以如此，第一是作者的身份，杨迪同志曾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总参谋部一局的作战参谋；解放战争时期海南岛战役时第四野战军15兵团作战科科长；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虽然职务不高，但却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我军的战略、战役高级指挥部核心工作。作者作为直接见证和参加了各次战争战役高层决策过程的亲历者，了解掌握了许多战争年代我军高级指挥机关作战指挥活动的真情实况。第二是作者撰写战争回忆录的依据，是根据自己当年的作战日记，来往电报和报告批件等许多第一手资料与本人的亲身经历，内容真实可信，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我军各次战争战役高层作战决策指挥的史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军队司令部工作的发展历程，为了解研究我军战史提供了较高价值的文献资料。第三是作者通过书中的回忆，再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陈毅、叶剑英、陈赓、李克农、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赖传珠、任修权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我军高级将领的雄才大略和高超指挥艺术，歌颂了我军指战员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杨迪老人是以75岁的高龄，不顾年老多病，自己亲自动笔，从1997年开始撰写第一部战争回忆录，用6年时间完成了三部100多万字的战争回忆录。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在撰写第二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时，杨老患了口腔癌，前后经过两次大手术。但病情一有好转，他就以坚强的毅力，用颤抖的手坚持完成了后两部战争回忆录的写作。为了保证回忆的史实、地点准确，杨老不顾病痛，先后回到当年战斗的海南岛、延安实地调查核对，表明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忠诚、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

此次将杨迪同志的三部战争回忆录以《参谋长战争回忆丛书》的形式再版，是根据杨迪同志夫人提供的他在2006年病逝前对三本书稿出版后逐字逐句进行阅读后的修改遗墨，重新排版的修订稿，以此纪念杨迪和无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先烈们。相信广大读者能从凝结杨迪老人无数心血的《参谋长战争回忆丛书》中了解历史，获得启迪和教益。

编者
2008年9月

再 版 前 言

真是光阴似箭，弹指一挥间，今年（200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协定已经50周年了。

在20世纪50年代，所发生的朝鲜战争，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为一方，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一方，在朝鲜战场上，经过三年多时间的较量，双方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10时，在朝鲜“三八线”，开城分界线上的板门店，签署了朝鲜战争停战协定。而且是双方首席谈判代表都被授权双方在停战协定文本上签字后即生效。协定规定双方均应于签字后12个小时内，即7月27日22时停止地面、空中、海上的一切作战行动。同时将双方首席谈判代表签字的停战协定文本（朝文、中文、英文），各自送呈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正式签署。

双方采用这种以不战不和的样式停止战争，并由双方首席谈判代表签字后的停战协定即生效，然后送呈战争双方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式签署的方式。从国际法上讲，50年来朝鲜战争并没有结束，仍是处于停战状态。这是世界战争史上没有先例的结束战争的样式。

我是从始至终参加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回想起50年前停战协定生效的那个时刻，那种极为兴奋与高兴的情景，真是心潮澎湃，热血沸腾。1953年7月27日22时，停战协定即将生效的前15分钟，在两军对垒的美方阵地上突然枪声巨响，一串串的曳光弹飞向天空，这大概是曾经骄横不可一世的美军官兵在这场侵略朝鲜的战争中。在没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盼望停止战争早点离开失败之地的一

种羞耻发泄。我军在第一线的部队看到这种情景，随即也将手中的武器指向天空，子弹像放鞭炮似地射击不停，用枪声抒发着经过2年零9个月抗美援朝的艰苦战争，终于战胜敌人，迫使敌人停战的胜利“礼炮声”，我军的枪炮震响在200余公里的防御阵地的天空。当时时针指到22时正，敌人发泄失败的枪声与我军抒发胜利的枪声，都戛然而止。朝鲜战争停战了。

在我军阵地上，指战员跑出了坑道、跳上了塹壕，齐声高呼：“朝鲜战争停战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欢呼与雀跃，通宵达旦。对面的美军士兵则站在阵地上，没精打采地，观看着我军的欢乐情景……这个场面、这种情景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感受到那种无法形容的兴奋、激动的情绪。至今只要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解放军出版社为了纪念抗美援朝战争签署停战协定50周年，计划再版我所写的《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一书。并要我尽可能多地补充一些“鲜为人知的真情实况”。我增补了6万多字。首先，补写了当时我们不知道朝鲜要爆发战争的情况；充实了入朝前后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定下与改变决心的情况；讲述了志愿军入朝后，在与敌人遭遇战中打响第一枪的情况；讲述了我军与美军首战云山的辉煌胜利；补充了如何实现彭总诱敌深入的作战意图；加写了组建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的情况；我年轻的志愿军空军入朝参战的情况；国民党第60军在长春起义，改编为解放军第50军入朝作战情况；新增加了我前方后方粉碎敌人空中“绞杀战”的战略作用与意义作为第十章。还补充了邓华司令员回国途中，在朝鲜罗津市与苏联顾问谈到了苏联对我志愿军的援助问题。最后，我将第一版第十六章改为第十七章：“朝鲜战场上敌、我两军统帅”；将“回忆与思考”作为增写的第十八章的标题。我还增加了几幅地图、照片和几页我的作战日记（原件）。在第一版本其他各章、各节中，都有些增补或稍有小的改动，就不赘述了，请读者谅解。

增补写完后，我手拿着笔，心在沉思。深深地哀思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为了朝鲜人民，为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生存与独立，

为了保卫新中国的安全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流血牺牲的39万名志愿军烈士们和负伤致残的指战员们。向我们真正国际主义的亲密的战友，致以诚挚的悼念与最崇高的敬礼！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丰功伟绩，我们要永远铭记与敬仰；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对强敌，英勇无畏，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舍己为人的崇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将永远留传在中华民族后代人的心中，并继承发扬光大。

2003年5月30日

作者写于沈阳

前 言

翻开战争的历史画卷，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45年了，历历在目的战场烟云，始终在我的脑海里翻腾，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的情景，使我终生难忘。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高瞻远瞩、英明决策，彭德怀司令员和志愿军其他首长的雄才大略、聪睿指挥艺术，使我永远铭刻在心。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经过2年9个多月的奋战，打败了当时最现代化的、自称世界上第一流的、不可战胜的美国军队和以美国为首的16个国家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出了我国的军威与国威，具有重大的国际主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可以说，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才真正为全世界所公认、所接受。也可以说，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国才真正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在对外关系上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侮辱与侵略的历史，使全世界真正不敢再小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使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伟大的胜利。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签字，到今年（1998年）已经是45周年了。当时，我们高声欢呼：“朝鲜战争停战了！抗美援朝战争我们胜利了！”我这个幸存的志愿军老战士，仍然能够迎来胜利45周年的纪念。回想几十年前在朝鲜战场上的情景，真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这种特别激动的心情，驱使我这个已经75岁的老人，拿起笔来，回忆这场伟大的、胜利的战斗，以纪念抗美援朝

战争胜利45周年。

我是抗美援朝战争从始至终的参加者，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了解志愿军首长和司令部以及各兵团、各军在当时的作战实际情况比较多。我想把没有写在战史上的、鲜为人知的、我亲身经历的，关于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首长和司令部的一部分史实，按当时的实际情况，如实地写出来，以纪念为这场伟大战争的胜利而献出自己鲜血和智慧的志愿军指战员。遗憾的是我没有文学天资，无法用文学家的艺术语言，来描写这场伟大的、非常壮丽而又十分惨烈的现代化战争史。我是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来写的，但考虑到了现代人们很注重可读性，我是努力想使读者能有兴趣地看看这幕雄伟壮丽的历史活剧。

为了保持书稿的历史真实性，我没有请人代笔，而是将自己的思维，倒回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历史战场，像放电影似地，在脑海里回忆着、放映着，凭着自己的记忆，一字一句地坚持写出来的。而且是连续作业，一气呵成的。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论著中曾写道：“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各位副司令员及其司令部，面对装备精良，并占有海、空军绝对优势的敌人，虽然我军装备比国内解放战争时期要好得多，但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相比较，仍然是敌优我劣特别悬殊，再加上朝鲜半岛三面环海这个特定狭窄的地形条件下，凭着这个舞台，在朝鲜战场上，导演出了“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抗美援朝战争的活剧。

在这场战争中，由于我是在志愿军司令部作战部门工作，经常随志愿军首长到战役的第一线去，与首长们接触比较多一些，因此，我着重回忆指挥这场战争的“智勇双全的将军”和“勇敢而明智的英雄”（毛泽东语）的指挥艺术，回忆这些我深深敬佩的将帅们与他们的参谋人员，回忆我军战时司令部，是如何组织指挥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第一场现代化战争的情景。由于时间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了，很

多情况已不可能都回忆起来，以及我的局限性，也不可能写出战争的全貌。

我是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地、真实地来回忆这场伟大的雄壮的抗美援朝战争。因此，我不请人题字、写序，也不写自序，我想请读者自己去评价，让历史去评说。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他的第一助手邓华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还有已经辞世的志愿军首长和我的同事战友们，以及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指战员们，我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敬意与深深的怀念。

今年（1998年）10月24日，是彭德怀元帅诞辰100周年纪念，我很想写出悼念和纪念彭总的心情。我拜读了湖南省政协原第一副主席、党组书记杨第甫同志悼念彭总所写的一首词和一首诗，情感很真挚，这是因为他是彭总冤假错案中，在湖南省受株连、受迫害最重的一位老同志，一直到1980年才彻底平反。杨老的词与诗，表达了对彭总的深厚感情，是与我的心相通的。杨老是引导我参加革命的长者（现87岁高龄），我征求得杨老的同意，将他纪念彭总的词与诗，借用来表达我悼念和对彭总百岁寿诞纪念之情。

满江红·悼彭德怀元帅：

断简残篇，犹记载丰功伟绩。慨当年、井冈山烽火，延河鸣镝。抗美援朝掌帅印，雪山草地护尧日。有横枪立马大将军，全无敌。

天下事，兴亡责。乌尧语，明君择，故披肝沥胆，此身何惜。一片丹心千古颂，毕生亢节几人及。恨区区“四害”毁长城，军民泣。

今年在彭总故居立铜像。诗曰：

百岁元戎寿像铜，生为人杰死为雄。

五洲动荡风云起，怀念援朝不世功。

目 录

再版前言	(1)
前言	(1)
第一章 朝鲜内战突然爆发后，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第4野战军所属第13兵团奉命开赴东北鸭绿江边	(1)
一、朝鲜内战爆发，对我们来说，真是太突然了。没有想到要北返东北，准备进行新的战争	(1)
二、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邓华没有料想到被任命为第13兵团司令员。他建议中央军委将第15兵团部与第13兵团部对调	(5)
三、邓华司令员令我制定兵团部向东北开进计划	(10)
四、广东省、市党政领导和群众热烈欢送兵团北上	(13)
五、邓华司令员与我们在北上的列车上	(14)
六、邓华司令员要我随他乘飞机到北京，直接接受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邓司令员和我研究朝鲜战局	(18)
七、邓华给洪学智来个“突然袭击”，洪学智刚到北京，就被邓华“拉”到沈阳	(22)
第二章 第13兵团司令部入朝前的准备工作，很繁忙、很紧张	(26)
一、第13兵团在沈阳召开第1次军事会议，各军反映了不少问题	(26)
二、解方调到第13兵团任参谋长，带领我们研究制定入朝开进计划，并提出作战建议	(29)
三、起草邓、洪、解三位首长8月31日给中央军委的	

建议电报	(31)
四、参与制定了第 13 兵团突然、秘密地入朝开进计划， 创造了 25 万大军行动未被敌人发觉的奇迹	(33)
第三章 彭德怀临危受命，统帅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制定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方案	(40)
一、彭德怀紧急赴京受命，即飞沈阳与第 13 兵团和各军主要领导干部见面	(41)
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根据我军入朝前的情况，定下志愿军入朝参战第一步的作战方针与部署	(43)
三、兵团正抓紧跨过鸭绿江的出动准备工作，突然接到毛泽东电报，令兵团原地训练，不要出动	(47)
四、彭总到安东第 13 兵团部，召开师以上干部会，宣布出兵援朝	(48)
第四章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彭总要亲临前线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组成，志司召开第一次作战会议	(50)
一、1950 年 10 月 19 日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	(50)
二、朝鲜战场情况突变，毛泽东和彭德怀改变决心的电报不谋而合	(52)
三、10 月 25 日，抗美援朝战争以遭遇战方式，在朝鲜西线与东线同时打响	(54)
四、10 月 25 日，抗美援朝战争以遭遇战的方式打响后，彭总立即要到前线去指挥	(56)
五、彭总正式宣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58)
六、在云山，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次直接与美国侵略军交战，我第 39 军取得首战美军骑兵第 1 师的辉煌胜利	(59)
七、战局瞬息万变，志司作战处紧紧围绕彭总的意图、决心，夜以继日地工作。作战处与各兵团、各军建	

立了密切与信任的关系	(62)
八、第 1 次战役后, 志司召开第 1 次作战会议, 彭总严厉批评了第 38 军	(64)
第五章 彭总写道: “此役确定了抗美战争的胜利基础, 恢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	(69)
一、麦克阿瑟狂妄地叫嚣, “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彭总以反常规的高招, 实行诱敌深入的计谋	(69)
二、彭总“诱敌深入”的第一步战役意图胜利完成后, 立即实施战役计划的第二步。彭总以一着妙棋, 使敌全线败退	(73)
三、彭总又要亲自到第一线指挥, 志司采取开设前方指挥所的方式, 代表彭总到前线指挥	(74)
四、第 38 军突破敌人阵地后, 第 113 师迅速插到三所里、龙源里, 断敌退路	(76)
五、第 2 次战役胜利, 彭总在嘉奖令写上“三十八军万岁!”	(79)
六、邓华代表彭总到第 38 军军部, 召开西线各军作战会议。一路行车连遭敌机狂轰滥炸, 真险	(80)
七、在胜利的欢乐气氛中, 西线作战会议开的轻松愉快	(84)
八、中朝军队联合作战, 以毛泽东主席的手表为准统一作战时间。朝鲜人民军向志司派来军事联络组	(86)
九、我送电报给彭总审批, 彭总与我谈家常	(88)
第六章 第 3 次战役中的“韩指”。打过汉江后, 是适可而止? 还是继续进攻? 中朝两国军队召开联合作战经验总结会议。第 50 军入朝作战情况	(92)
一、韩先楚副司令率前指代表彭总到第一线指挥	(92)
二、韩先楚副司令与我研究如何贯彻执行彭总确定的“稳进”的战役作战方针	(93)
三、1950 年除夕之夜, 我军发起了突破“三八线”的	

第 3 次战役	(95)
四、“韩指”向前开进，越过“三八线”时，电台车触地雷被炸	(96)
五、“韩指”进到南朝鲜东豆川北山开设指挥所，指挥各军作战。美军迅速撤出汉城	(97)
六、彭总下令结束第 3 次战役。韩先楚副司令员与我研究第 3 次战役后的敌我态势	(100)
七、第 3 次战役胜利后，是适可而止，还是乘胜继续进攻？彭总与苏联驻朝大使产生了不同的意见	(103)
八、我回沈阳，向邓华副司令员作汇报。师以上干部集训班还没有开学，即全部召回前线	(106)
九、中朝两国军队，召开仅有的一次联合作战经验总结会议	(107)
十、第 50 军是原国民党军在长春起义的第 60 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后，原军长曾泽生（中将）仍任军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得很好，受到彭总的表扬	(109)
第七章 第 4 次战役中的“邓指”。横城反击战胜利。攻击砥平里受挫的原因	(114)
一、邓华副司令员率指挥所代表彭总到第一线指挥东集团反击作战	(114)
二、邓华副司令员召开东集团作战会议。横城反击战取得胜利	(116)
三、攻击砥平里受挫的原因	(119)
四、我到横城前线打扫战场，缴获了 2 辆美军新吉普车	(122)
五、邓华副司令员发出打砥平里受挫的检讨电报	(123)
六、“邓指”撤离南朝鲜，我开“三个车轮”的吉普车返回志司	(126)
七、重炮兵团遭受损失，很痛心	(128)

第八章	第 5 次战役“打得急了一些”的原因。战役为什么分两个阶段	(132)
一、	我军以极疲劳之师，在正面宽 200 公里，纵深只有 70 公里的防区内，抗击敌人进攻，使敌平均每天只能前进 1 公里，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132)
二、	第 5 次战役“打得急了一些”的主要原因	(135)
三、	第 5 次战役“打得急了一些”的另一个原因	(138)
四、	志司作战处为实施第 5 次战役，紧张而有序地工作	(142)
五、	新入朝兵团仓促投入战斗，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情况	(143)
六、	第 5 次战役为什么还要打战役的第二阶段	(144)
第九章	第 5 次战役第二阶段后期，没有意料到的悲剧和惊喜剧。美国急于要谈判停战。有关计划打第 6 次战役的内情	(147)
一、	敌人向我军反扑进攻行动异常迅速，这是我们没有意料到的	(147)
二、	失利的悲剧发生了。第 180 师被美军隔断于敌后，全师仅少数人生还	(148)
三、	胜利的惊喜剧之一。第 12 军第 31 师第 91 团进攻到北纬 37 度线附近，接到后撤命令时，已处于孤悬敌后极为险恶的境地，指挥员紧紧掌握部队胜利返回	(152)
四、	胜利的惊喜剧之二。第 27 军进攻至北纬 37 度线以北，指挥员机动灵活，胜利返回	(154)
五、	在志司召开的作战总结会上，彭总的自我检讨与对第 60 军的严厉批评	(157)
六、	在我军连续强大的打击下，美国急于要求谈判停战	(161)
七、	关于第 6 次战役怎样打，为什么又不打了的真实内 ..	

情	(163)
第十章 组建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中国年轻的空军入朝参战。粉碎了敌人空中“绞杀战”	(170)
一、为适应战争情况的新发展，彭总决心组建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使我军的后方勤务保障工作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170)
二、年轻的中国空军于1951年1月，即开始试探性地飞向朝鲜上空，与美国空军在清川江以北上空作战。到1951年9月后，逐渐夺取了清川江以北白昼的制控权	(175)
三、粉碎敌人空中“绞杀战”，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与美军进行的一场具有战略意义的较量	(178)
第十一章 敌我双方都采取战略防御，一方面坐着谈判，同时在战场上较量，时间达二年之久，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新纪录	(190)
一、敌我双方都转入战略防御，都采取阵地防御的方式，又都同意进行停战谈判	(190)
二、1951年7月10日，朝、中方代表与美方代表在开城开始停战谈判	(195)
三、停战谈判开始后，美军发动大规模的空中攻势，企图从空中炸服我军	(196)
四、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工事体系的形成，是我军对阵地防御作战创造性的新发展	(205)
五、从“零敲牛皮糖”的小打，发展到中打和“万炮齐轰”的大打	(209)
六、上甘岭2个小高地的争夺战斗，“发展成为战役规模”的作战	(210)
七、金城反击战役的胜利，我军从持久的战略防御作战中，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彭总还想打几次反击战役再停战	(214)

八、志愿军不需要“顾问”，苏联还是要派军事顾问团到志司	(218)
第十二章 紧锣密鼓地组织准备朝鲜西海岸的抗登陆作战	(221)
一、美国新当选总统艾森豪威尔，企图从朝鲜东西海岸登陆，一举结束朝鲜战争	(221)
二、我大军重点防御西海岸。邓华奉命兼任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23)
三、紧张而又愉快的战役勘察	(229)
四、严肃认真的作战会议与轻松快乐的跳舞晚会	(243)
五、梁兴初副司令员在西海指	(253)
六、艾森豪威尔妄图从朝鲜侧后实施登陆进攻的美梦破灭了	(258)
第十三章 邓华代司令员先命我到西线代职取经，后又令我到东线参观学习	(261)
一、邓华代司令员电话，令我到西线第46军136师代职取经。途中我与敌飞行员玩游戏	(261)
二、在136师，我参加组织指挥一次对敌阵地小规模的反击作战	(266)
三、我到第40军120师阵地参观学习，眼睁睁地看着敌机炸弹向我投来	(271)
四、到开城去看望李克农同志。我忘不了在北平国、共两党军事调处执行部时，他对我的教诲	(276)
五、金城反击战役即将开始，邓华代司令员令我立即赶到东线去参观学习	(289)
六、邓华代司令员令我迅速返回志司，我在途中遭敌机的轰炸扫射，经受了2次死亡的体验	(293)
七、金城反击战役的胜利，我军夺回战争的主动权，迫使敌人急于要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300)
八、我很荣幸地在北京参加志愿军国庆节观礼代表团	(302)

- 第十四章 志愿军司令部 6 次变更指挥位置，9 次遭敌机轰炸，彭总有 2 次险些遇险。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真实情况。志司及时向总参谋部报告情况** …… (306)
- 一、志司第 1 次指挥位置在大榆洞。在大榆洞第 1 次遭敌机轰炸 …… (306)
 - 二、志司在大榆洞第 2 次遭敌机轰炸。彭总第 1 次险些遇险。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真实情况 …… (308)
 - 三、志司第 2 次前进到新成川以西铁路隧道中。在此第 3 次遭敌机轰炸 …… (314)
 - 四、志司第 3 次转移，前进至君子里 …… (316)
 - 五、志司第 4 次转移，前进到金化以北的下甘岭，在此遭敌机 2 次轰炸（第 4、5 次） …… (320)
 - 六、志司第 5 次向空寺洞转移途中，进至寺洞，第 6 次遭敌机轰炸。彭总第 2 次险些遇险 …… (321)
 - 七、志司第 6 次转移，进驻桧仓。在桧仓 3 次（第 7、8、9 次）遭敌机轰炸 …… (326)
 - 八、志愿军司令部按规定，及时向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报告抗美援朝作战情况或请示要解决的问题 …… (331)
- 第十五章 邓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独特式地凯旋回国** …… (334)
- 一、邓华代司令员令我随他回国 …… (334)
 - 二、邓华代司令员乘坐轻油车，走朝鲜东北部看地形 …… (336)
 - 三、车到咸兴市，邓华代司令员受到当地朝鲜党、政、军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与欢送。看了地形，参观了工厂 …… (339)
 - 四、轻油车行驶在高山峻岭中，一条建筑特殊的铁路通向鸭绿江边的惠山镇 …… (344)
 - 五、从清津到罗津，要走一个大马蹄形。我们对“祖国啊！母亲”的体会更深 …… (346)
 - 六、邓华司令员在罗津与苏联顾问的一席谈话。苏联顾问讲到苏联的援助，邓司令员只好讲出援助的真情

.....	(349)
七、朝鲜咸镜北道的领导赶到罗津，为邓华代司令员举行最后的欢送。我们告别朝鲜，回到祖国的图们.....	(353)
八、邓华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功勋卓著，名垂千古，建立的卓越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355)
第十六章 彭总两次指示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	(360)
一、陈赓副司令员第1次领导我们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	(360)
1. 彭总指示：要及时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并指定由陈赓副司令员负责.....	(360)
2. 陈赓副司令员让我组织人员具体负责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的工作.....	(361)
3. 陈赓副司令员对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方针、原则与要求.....	(363)
4. 我们在“炸药库”里聚精会神地写总结，5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征求意见稿.....	(370)
5. 新年除夕，陈赓副司令员亲自给我们组织舞会，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太幸运了.....	(375)
6. 陈赓副司令员与我们共度春节，我请陈副司令讲他的传奇故事.....	(378)
二、邓华司令员在沈阳领导我们再次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	(384)
1. 彭总指示：由邓华同志负责，全面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还指示：“不准写我彭德怀”.....	(384)
2. 邓华司令员与我研究如何组成写作班子，以及写作班子的组成.....	(387)
3. 邓华司令员对如何全面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作了明确的指示.....	(391)
4. 用什么方式总结，与南京军事学院派来指导写总结的教员产生了争论.....	(393)

5. 在两种不同指导思想、不同写作方法的矛盾中 写成的总结	(396)
第十七章 朝鲜战场上敌、我两军的统帅	(400)
一、彭德怀与麦克阿瑟之比较	(401)
二、交锋在朝鲜战场上的两军统帅与两国最高统帅的关 系	(404)
三、彭总从被动中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迫使麦克阿瑟 由主动转为被动	(407)
四、彭总趋利避害，以己之长，击敌之短，使麦克阿瑟 的优势对我军无可奈何	(412)
五、彭总抓住麦克阿瑟在战役指挥上的错误，给予他以 致命一击	(414)
第十八章 回忆后的思考	(418)
一、抗美援朝战争是在特殊情况下，进行的一场特殊的 战争。在这场力量很不对称的战争中，我方用胜利 迫使敌人以签订停战协定的特殊样式结束战争	(418)
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426)
后记	(429)
再版的后记	(430)

第一章

朝鲜内战突然爆发后，中央军委 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第4 野战军所属第13兵团奉命开赴东 北鸭绿江边

一、朝鲜内战爆发，对我们来说，真是太突然了。
没有想到要北返东北，准备进行新的战争

1950年5月1日，海南岛渡海登陆战役胜利结束。6月6日，我随直接指挥解放海南岛战役的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单车简从（邓华要我和他同乘一辆吉普车，只带一名警卫员、一名司机），悄悄地回到广州第15兵团司令部。正当我按照兵团首长指示，忙于组织渡海参战部队撤离海南岛，研究总结渡海登陆战役经验；同时掌握正在进行的解放珠江口外，万山群岛逐岛进攻的最后阶段的战斗发展情况；以及组织肃清广东、广西和江西南部地区（注：粤、桂两省及江西省南部的军事作战，属15兵团负责）国民党军残余部队和土匪等工作之际。从广播中听到，朝鲜内战于当月（6月）25日爆发。

我们听了这条广播消息后，都大为吃惊。怎么在朝鲜爆发了战争呢？紧接着又从广播中听到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命令驻远东的美国海军、空军参战，入侵朝鲜。6月27日杜鲁门总统公开命令美军第7舰队侵入我国台湾海峡。6月30日，杜鲁门继

续下令，将美国驻日本的地面部队投入侵略朝鲜战争。

紧接着美国政府驻联合国代表，要求召开紧急的安理会，讨论“朝鲜战争”问题。召开紧急安理会时，我们又听到当时苏联驻联合国的首席代表马立克不知为什么没有去参加这么非常重要的安理会，也没有派副代表去参加会议。这样，就使在安理会中有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苏联缺席的情况下（当时拥有否决权的我国还没有参加联合国）于7月7日通过了美国的非法提案，非法授权组成以美国为首的16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明目张胆地入侵朝鲜。这样就使朝鲜内战的性质改变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侵略朝鲜的战争。

面对在很短时间内所发生的这些新的非常重大情况，使我很自然地在脑海里回想起我们胜利解放海南岛战役后，中央军委、毛主席和中南军区（即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发给我们第15兵团的电报和文件，都是提示准备解放台湾和西藏，从来没有一份电报或文件提示过朝鲜会发生战争，连暗示的字句也没有。这是国际大战略问题呀！我想，可能有极绝密的电报、文件通报了兵团以上的首长。现在战争在朝鲜已经打起来了，美国已经公开宣布出兵入侵朝鲜战争，并侵入我国台湾海峡，美国已迫使安理会以“联合国军”名义出兵侵略朝鲜，已经不是秘密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自己怎么分析研究也解答不了，我想我必须搞清楚，弄明白这个问题，这是我的工作职责范围内的事，作为兵团司令部的作战科长必须了解上级的战略、战役意图，才能正确地进行工作。那么，我去向谁问清楚呢？我想，只有找邓华司令员才能问得清楚。在邓华司令员面前，我可以毫无顾忌地什么都可以向他说。

我找到邓华司令员，劈头就说：“司令，6月25日，朝鲜战争突然打起来了，两三天内，美国、联合国连续发生这么大、这么多地情况，把我搞糊涂了，脑子已经失去判断情况的能力了。我想都没有想过朝鲜会突然发生战争，也没有想到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有这么强烈的、迅速的反映，并强迫安理会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侵略朝鲜。”

没有等邓司令回答，我又紧接着说道：“司令，事前中央军委和

四野首长是不是以绝密方式将朝鲜要打仗的情报通报给您们了？现在战争已打起来了，请您告诉我，使我们好根据上级意图工作。”

邓华司令和我分析情况时，总是先要我将意见说出来后，他才说。这次他看着我那幅着急相，他装着似乎悠闲，首先点着一支烟，吸了一口，对我说：“杨迪，你连珠炮地问我，那你先把你的意见和想法说出来，给我听听。”

我听他这么一问，就知道他的意图了，我激动的情绪也就稳定下来了。

我就将我心中的想法都讲出来。我说：司令，我想到几个事例。第一个事例是：我们兵团解放海南岛战役以后，1950年5月5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嘉奖令中，最后写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应当利用海南岛战役的经验，积极准备，为解放台湾、西藏，彻底消灭全部残匪而奋斗！”

第二个事例是：1950年5月17日，兵团前指在海口时，司令要我第43军127师有3只小帆船，在海南岛战役渡海作战中，同敌军舰作战的英勇事迹，电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阅后，于5月19日批示：“这是中国人民海军的首次英勇战绩，应予学习和表扬。”并批示将电报转发第三野战军和海军司令部。毛主席对这份电报这样处理，我认为是给三野和海军准备解放台湾时的参考，也是鼓励渡海作战的信心。”

第三个事例是：我们回到广州后，三野作战处石一宸处长带了一个组的同志，到广州来向我们兵团了解学习组织指挥渡海作战的经验。”

第四个事例是：第40军参加打完海南岛战役后，四野将该军与第38军、第39军编入第13兵团作为战役战略机动兵团，进驻河南地区，该军1950年5月15日即开始渡海北返，没有直接开赴信阳地区休整，而是在广东休整，直至7月8日四野才命令该军从广州乘火车北上，还是准备进至河南整训。”

从这四件事例中，我进行了反复的分析研究，怎么也得出朝鲜会发生战争的征兆与预感。”

邓华司令员吸着烟，一边听我讲意见，一边在沉思。

邓华司令员听完我的意见后，说：“杨迪，从你讲的这些事例来看，的确看不出，也分析不出朝鲜会发生战争。我告诉你，我并没有得到特别绝密的情况通报。我同你一样也不知道朝鲜会爆发战争。”

我听邓华司令说他也不知道情况，我就大胆地说：“司令，据我分析上级也不了解朝鲜会爆发战争。”

邓华瞪着眼睛对我说：“你凭什么来妄猜上级的战略问题？作为下级，在没有接到上级的指示前，不要胡思乱猜。”

我说：“司令，这又不是开会，我脑子里有胡思乱想，单独向司令汇报思想，不可以吗？”

邓华笑了，说：“你既然已有胡思乱想，就向我讲出来吧。让我听听你胡思乱想些什么。”

我就大着胆子说：“我是根据我上面讲的那四件具体事例，进行分析的。我想，如果上级事前就知道在朝鲜会爆发战争，中央军委就不可能这样肯定地对我各野战军下达“积极准备，为解放台湾、西藏消灭全部残匪而奋斗！”的任务了。司令，这只是我的猜想，没有对任何人讲过，今天向您说出来，想得到您的指教。”

邓华司令员以谈心的口吻说：“当我听到广播，6月25日朝鲜爆发了战争，使我很吃惊。事前四野没有通报，我也在进行分析思考。你分析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邓华略停一下说：“既然战争在我们家门口打起来了，而且美国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出兵侵略朝鲜，杜鲁门还命令美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看来我们打台湾就不好打了。现在天下又不太平了，我们是野战军，我们兵团要做好准备战争的工作，随时准备奉命执行新的作战任务。”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大胆地说出来了。我说：“司令，朝鲜是6月25日爆发战争的，美国政府立即作出了反映，6月26日杜鲁门总统即命令驻远东的美国海、空军参战；27日，杜鲁门总统公开宣布令海军第7舰队侵入我国的台湾海峡。6月30日杜鲁门又命令美国陆军入侵朝鲜作战。同时，立即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开会讨论朝鲜战争

问题，迫使安理会非法通过打着‘联合国军’旗号侵略朝鲜。我国党和政府是在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出兵入侵朝鲜和我国台湾海峡的严重声明与严重抗议，周恩来总理代表我国政府发表声明：‘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由此，我判断友方在战前并没有将情况通报我方，似乎也没有对我方提出援助的要求。”

我接着说：“6月25日战争爆发后，朝鲜人民军进展发展较快，他们认为胜利在握，就没有想到美国政府会出兵入侵，也没有想到美军入侵后，将会对战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和变化。”

邓华司令说：“你不要只看到朝鲜战局现在发展顺利，必须充分考虑到美国军队参战，而且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这就可以看出美国已下定决心不会轻易丢掉南朝鲜，因为他们已经将这么大的一个中国丢掉了，再丢掉了南朝鲜，这对美国与苏联在远东的对抗是更为不利了。美国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来侵略朝鲜，并同时入侵我国台湾海峡，这是有很深远的战略企图与战略目的的，是企图占领整个朝鲜，直逼我国鸭绿江、图们江，甚至可能像日本帝国主义一样，侵占我国东北。美国还趁机以海军入侵我台湾海峡，就是要阻止我军解放台湾，我们必须从战略上来认识和提高警惕。”

邓华司令这一席深入地从战略上的分析，使我“茅塞顿开”。

二、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邓华没有料想到被任命为第13兵团司令员。他建议中央军委将第15兵团部与第13兵团部对调

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后，开始战局发展对朝鲜人民军很有利。但是7月1日美国陆军第2师、第24师进入朝鲜参战后，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地分析了朝鲜战争形势，认为由于美军陆、海、空的直接参入作战，已使朝鲜战争复杂化。朝鲜方面原想进行速决战，企图在很短时间内解放朝鲜全境，现在看来已是不可能了。美

帝国主义企图趁机扩大战争的可能性已日益增大。因此，虽然朝鲜人民军仍在向南发展进攻，但我国政府和军队必须要做好准备。美帝国主义可能将战火烧到鸭绿江、图们江边来。

据此，中央军委为了保卫我国东北地区的安全和在必要时刻支援朝鲜人民军的反侵略战争，及时迅速地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变措施。1950年7月初，在朝鲜人民军仍在向南发展进攻之时，毛泽东主席即指示中央军委向东北调遣军队，加强东北边防。

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于7月7日至10日，由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保卫国防问题。正式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发出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命令。命令第4野战军第13兵团所属的第38、第39、第40军（是中央军委的战略机动兵团）和第42军及3个炮兵师（炮兵第1、第2、第8师）以及高射炮兵、工兵、汽车团等各一部，在接到命令后务必于一个星期内，即7月15日乘火车出发，于8月中旬进至我国东北辽宁、吉林两省南部地区完成集结。9月上旬，又决定将在东北的第50军编入第13兵团序列。总兵力共达25万余人。

中央军委暂未任命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中央军委任命肖劲光为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员，任命肖华为副政治委员。

中央军委又命令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为第13兵团司令员，将原第13兵团司令员调任第15兵团司令员。

面对在很短时间内所发生的这些新的重大情况，我作为在统帅部和高级领导同志身边工作过多年的老参谋人员，机敏地预感到一场新的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很可能要打起来了，而且可能是到国外，到朝鲜去同美帝国主义侵略军打，这就是要打现代化的大仗了。

于是，我毅然去找邓华司令员，恳切地请求跟他赴东北。邓华望着站在面前与自己朝夕相处、完全可以信赖的作战科长，深情地说：“我没有料到会调我到第13兵团去任职。我会带你去，一定带你去。”接着又说道：“我经过深思熟虑后，已经请示4野总部和中央军委请求批准把第15兵团机关都带去。眼下形势相当严峻，说不定很快就要同美国侵略军交手。对第13兵团3个军和第42军的主要领

导同志和部队情况我很熟悉，可是对第13兵团机关就不了解了。况且，我现在所要考虑的，是在没有海空军支援，特别是没有制空权的条件下，以我军的劣势装备，又是主要靠两条腿走路，如何同装备精良的现代化、机械化的美国军队打仗等问题，我没有时间去了解和熟悉新的指挥机构。向上级首长提出这样的请求，的确也是出于无奈。”

我理解了邓司令员的心情和意图，立即说道：“司令，我认为您的理由很充分，4野首长和军委领导会批准的。”

7月15日，4野总部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批准了第13兵团与第15兵团番号与机关的对调，将第38、第39、第40军和第42军及3个炮兵师划归新的第13兵团建制指挥，令邓华率原第15兵团部（即新改番号的第13兵团部）7月18日由广州乘火车北上，开赴东北。

第13兵团的司令员是黄永胜，为什么调邓华到第13兵团任司令员呢？这是我没有料想到的。

我心中对这个疑团，想来想去总是解不开。邓华与黄永胜都是兵团司令，为什么要对调呢？这个疑团我不能去问别人，这既是军事秘密，也是人事调动的秘密。但我很想解开这个疑团。我想只有去找兵团政委赖传珠，我在赖政委领导下工作几年了，他很了解我，有些事也愿意和我说，我在他面前说话可以无所顾忌。我到他的住处直接问他，我说：“政委，我有一件事搞不明白，想问您，又怕您批评我。”

赖政委说：“什么事？到我这儿有什么不可以说的。”

我说：“为什么要将邓司令调到第13兵团，而将第13兵团司令黄永胜调到第15兵团来呢？”

赖政委说：“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说：“政委，您刚才说在您这儿什么都可说，我才说的。第13兵团开赴东北是要出国打仗的，为什么不要黄司令去，而要邓司令去？”

赖政委笑着对我说：“这两位司令你都熟悉，你还猜不着，真傻。”

我说：“猜是猜了，因不知对不对。所以我就来问政委。”

赖政委说：“你说说看。”

我说：“一是黄司令最近带了几个干部到香港去玩，挨了四野总部的批评，二是邓司令指挥打海南岛打了大胜仗。”

赖政委说：“你猜的有点边。你猜的只是现在的事，对人事的安排还要从历史上、从各方面全面来考虑。我告诉你吧，4野首长和军委首长研究组建东北边防军时，决定将战略机动兵团——第13兵团调东北。上级首长们认为黄永胜打仗不如邓华，黄还爱玩，从各方面比较，邓比黄要强。而且第13兵团所属3个军都是四野的主力军，必须要有一名更强的兵团司令去才好指挥。因此，就决定邓与黄对调。这次调动出乎我们意料。在周恩来副主席主持的国防会议上，讨论调第13兵团开赴东北时，认为黄永胜难以胜任，决定以邓华替换黄永胜任第13兵团司令员。周恩来、聂荣臻报告毛泽东主席，当即被批准。邓华接到命令后，他向四野首长和中央军委提出，不能只要他一个人去，要将第15兵团机关全部带去，以便于指挥，因此，他建议将两个兵团部也对调一下。四野总部和军委首长考虑到打仗要紧，邓提的意见也合理，就同意两个兵团部对调，而且将两个兵团的番号也对调。这些情况本来不想告诉你，你这次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也相信你，对你也不必隐瞒。”他停了一下又说：“我要提醒你注意，这件事只有你知道就行了，不准再去告诉别的人，听懂了吗？”

我说：“呵！原来如此。我听懂了，我一定严守秘密。政委还不放心我吗？”对邓、黄两人对调的事，我一直在心里埋藏了40多年，现在才说出来。

我又问：“政委是不是同时走？”

赖政委说：“你们先走吧，我在地方上还有些事情要交代，叶（剑英）参座要我晚些走。”他又笑着对我说：“你看我这么胖，能走得动吗？我身体不好，还想检查一下身体，我会到安东（即现在的丹东）去的。”

我都明白了，就不多问多说了。

在这里要注明说一下，当时对叶剑英同志为什么称“参座”。这是在抗战时期，叶剑英同志随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当时蒋介石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高级将领尊称蒋介石为“委座”。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有位领导同志对叶剑英同志说，国民党称蒋介石“委座”，你是八路军参谋长，我们就称你为“参座”。从此对叶剑英同志就称呼“参座”了。

朝鲜内战爆发后，我们从党中央、我国政府公开发表的声明中也可以看出，我党中央政治局是密切注视着朝鲜战局的发展。我只举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几次发表声明为证。例如：1950年6月26日、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连续发命令派遣美军侵略朝鲜，并入侵我国台湾海峡。我国即迅速作出了反映，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政府派遣军队入侵朝鲜和入侵我国台湾海峡。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8次会议上即发表讲话。表明了我国的严正立场。指出：中国人民“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并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日（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代表我国政府发表了声明，指出：“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的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此后，周恩来总理根据朝鲜战争形势的发展与美国政府的多次声明与战争行动，都多次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声明与抗议。

我还要特别提到当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1950年10月1日越过朝鲜“三八线”后，我党中央于1950年10月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支援朝鲜作战的问题，在会议进行中，苏联斯大林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去苏联与斯大林商讨出兵问题，毛泽东主席派周恩来同志率代表团去了。我认为这次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代表团与苏联共产党、斯大林的会谈是很重要的一次会议。而这次党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真实情况，周恩来同志与斯大林同志会谈的真实情况，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与猜想。对真实内情我略有所知，但我没有掌握第一手资料，我不能随便写出来。因为我写这本书的宗旨在“前言”中已经说了，我必须严格遵守自己的诺言。

三、邓华司令员令我制定兵团部向东北开进计划

当时，遵照第4野战军总部的指示，兵团副司令员洪学智和参谋长李作鹏要留在广州，协助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广州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工作；兵团政治委员赖传珠需要交待好他负责管理的广东省、广州市的地方工作，晚些时候才能动身。这样一来，邓华司令员没有副手帮助他进行北上的组织准备工作。邓华司令员就将组织兵团机关开进的工作，全盘交由我负责。首长的信任和重托，使我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自1949年5月部队渡过长江，进驻南昌，正式成立第15兵团，我被调到兵团司令部任作战科长以来，一年多的时间，不知有多少个昼夜与司令员在一起分析和研究作战情况；遇有紧急任务，首长又总是信赖地交给我去完成，我从中受到教益，得到了锻炼，现仅举三个事例：

例一：1949年10月14日解放广州市后，为了显示解放大军的军威，叶剑英同志要求第15兵团组织一次威武雄壮的解放军进入广州的入城式。兵团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首长指定第43军第127师执行入城式的任务。并将组织入城式的任务交给我，要求我只准搞好，不准出差错。洪学智副司令还将他乘坐的好吉普车借给我用。我在白云飞机场协助第43军和第127师领导同志和机关同志组织该师部队进行队列训练。要知道当时的解放军指战员很会行军作战，但对正规的队列训练不怎么注意，经过近10天的严格训练，在进行最后一次预演时，我请洪学智副司令来验收，洪副司令校阅后，感到满意，经叶剑英同志和邓华司令员批准。1949年11月13日，正式举行解放军入城式。入城式搞的威武庄严，广州市人民倾城出动，沿街热烈欢迎，都伸大拇指说，大军真是大军（当时广东人民称解放军为大军），比国民党军还正规。叶剑英及华南分局的同志，兵团首长检阅后也都很满意。

例二：1949年11月第4野战军主力及2野的陈赓兵团（第4兵团）进军广西，4野前委决心围歼国民党军白崇禧集团于广西境内。

4野前委电令在广州的第15兵团，要求派极得力干部率一个营带船队，溯西江而上，务必准时到达广西梧州，及时接运由桂林南下的第40军迅速渡过浔江，实施大迂回大包围白崇禧集团。上级严格要求不准耽误第40军渡江追击的时间。兵团邓、赖、洪首长接到电令后，研究确定派我去完成难度极大又极为重要的这一任务。当时在广州只给我一条小火轮、一个营。要我沿西江而上的过程中，自己去解决船只。并要求我一定要准时完成任务，这是围歼白崇禧集团关键的一着，如果第40军不能及时迅速渡江追击，将影响我军围歼白崇禧集团的大局。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并准时完成了任务，还一直到广西中部蒙江、桂平接运了第41军部队及时渡江。

这个任务非常重要，但是也非常困难和艰巨。主要困难：一是从广东的三水县到广西，西江两岸没有解放军，是无人管的地区，敌情、匪情、民情都不知道。过了肇庆都是崇山峻岭，“两岸猿声啼不住”，倒不可怕，最为难的是船只在江中航行，如遇岸上的敌匪袭击，铁皮木船容易打透停驶，我只带1个营兵力，怎么办？我想尽办法，克服自然条件的困难，还打了两仗，消灭敌人2个营。二是从广州只带一条船，要迅速运送1个军过江，肯定是很不够用的。但沿西江船只都躲藏在河岔、芦苇中去了，找不到船只，怎么办？我想尽一切办法，采取断然措施，沿途搞到8条轮船带拖船，这才使我有了解决任务的基本条件。三是从广州到梧州，水路要绕着珠江三角洲航行，约500公里，时间不好掌握。各条船的航速不同，有快有慢。我与参谋们计算着每小时、每天的行程，在第40军到达梧州之前，我准确地率船队提前数小时到达梧州。

例三：1949年12月，第15兵团奉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及4野前委的命令，指挥第43军和第12兵团之第40军，准备实施渡海登陆海南岛战役。1950年3月，邓华司令员即指定我组织渡海战役兵团前进指挥所，并将兵团前指的工作全部交给我负责，邓华说：“指挥所人员要少而精，你负责了解、掌握研究敌我各方面情况，以及气象海上潮汐情况，及时向我汇报，提供我思考和下决心。”兵团前指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邓华司令员很满意前指的工作。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兵团首长对我十分信任，我们有了融洽和默契的工作关系。

从我接受负责组织兵团部北上开赴东北的任务，到兵团部应于7月18日出发，只剩不到3天时间，不仅时间很仓促，而且要做的事情很多，问题和困难确实不少。比如：情况来的很突然，弯子转的很急，变化也很大，干部、战士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当时干部，战士的思想主要是“打败老蒋好回家”。现在蒋介石已被打到台湾去了，海南岛我军已经解放了，解放台湾是兄弟野战军的事，我们没有仗打了，该回家享受土改成果和结婚成家，即“老婆孩子热炕头”，这种和平享受的思想很浓。

要从和平转到战争，这在思想上要来一个急转变、大转弯，思想工作的难度是很大的；各种物资、器材车辆等的准备问题就更多。然而，我非常清楚，这些问题和情况邓华司令员又何尝不知道呢？我决不能为此而去打扰首长。因为他正要集中精力考虑全兵团和整个战局的大事。

我稍做思考和准备后，即召集机关各科领导同志开会，传达首长指示，提出贯彻执行意见，共同协商和研究了拟制铁路输送计划、搞好思想急转弯、大转弯教育和各种物资器材准备等工作的分工，留守人员的确定，以及抓好落实的具体办法。好在部队战争年代各部门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司令部以作战部门为核心，只要作战部门传达首长指令和提出要办的事情，其他部门都是毫不含糊地去认真执行。

正当兵团机关昼夜不停地抓紧准备工作时，接到4野总部电示，因长江涨水火车轮渡有困难，（注：当时武汉市还没有修建长江大桥）为避免与3个军和3个炮兵师的输送列车发生拥挤，兵团部的开进时间推迟到7月25日。这样，我们兵团部的各种工作的准备时间就从容多了。我也把制定车运计划的时间，向后推迟了2天，以便使计划考虑得更周密一些。

7月20日，兵团机关北上的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已制定出来，各项准备工作完全就绪。我向邓华司令员作了详细汇报，并已派人去

落实沿途供水、供饭及组织武昌轮渡等事宜。邓华司令员听后感到很满意，要我利用还有的5天时间，进一步研究计划使之更加周密，并突出强调了进一步做好干部、战士的思想转弯工作，检查群众纪律和搞好军政军民关系等问题。

四、广东省、市党政领导和群众热烈欢送兵团北上

叶剑英同志和广东省委、省政府和广州市党政领导同志知道邓华同志要率第15兵团离开广州，北上东北执行新的作战任务后，都准备热烈欢送，感谢第15兵团解放了广东全省（包括海南岛）。开始，邓华司令员因为时间太紧迫就婉言谢绝了。

以后，由于长江涨水，将兵团部开进计划的时间向后推迟了一个星期。叶剑英同志再向邓华同志提出来，还是让广东省和广州市的同志们欢送欢送，这是全省人民的心意，邓华就不好再辞谢了，表示听从叶剑英同志的安排，但请不要开欢送大会，建议开一个团以上干部会就可以了，以求尽可能保守行动秘密和简朴。叶剑英同意了邓华的意见，在华南分局礼堂召开了非常热烈的欢送会。

欢送会后，省市领导同志对邓华司令员说：“你们刚刚解放了广东省和海南岛，我们还没有给兵团开庆祝会，你们也没有休息，特别是邓司令员戎马倥偬，刚从海南岛胜利归来，疲劳还没有恢复，又要率部开赴东北，保卫东北边防，也可能会要出国援助朝鲜，执行国际主义任务，又要过战争的艰苦生活，我们广东人民感谢解放军，请你们吃一顿广东风味的送行饭，北上后，请不要忘了广东人民的心意呵！”

邓华司令员说：“我很感谢各位领导同志的盛情，我心领了。欢送会已经开了，就不要宴请了。”

省、市领导同志说：“欢送会是欢送会，这顿欢送饭我们是请定了，不叫宴会，就按我们的习惯叫会餐吧！”他们还笑着说：“你们到了东北，就吃不到粤菜了，只有广东才是正宗的粤菜哩！请不要再推辞了。”

邓华就笑着说：“恭敬不如从命，盛情难却，就最后吃顿粤菜吧！”

饭后，省市领导还请我们看了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主演的粤剧，气氛非常热烈，我们虽然听不懂用广东方言演唱的粤剧，但深深感到地方党政领导对部队的关心，体现了广东人民对解放军热情爱护。第二天广东省党政领导还给我们送了纪念品，其中象牙筷子和象牙印章都刻了名字，赠给我的纪念品上刻着：

“杨迪同志留念

广东人民感谢你们”

这些纪念品我到现在还珍藏着，作为永久的纪念。

我们将乘火车离开广州时，华南分局和省市领导同志一定要到车站送行，邓华司令坚决谢辞了。临走的前一天上午，邓司令要我随他到叶剑英同志和省市主要领导处辞行，并再三请他们不要到火车站去。回兵团部后还要我向分局、省、市办公厅领导再辞谢，并不告诉他们开车时间。

他们说：“我们可以到车站问出来。”

我说：“铁路还是军管时期，军车的开动只有军代表知道，站长也不知道。我已通知军代表开车时间对任何人都保密。”

我还告诉他们说：“海南岛战役胜利后，邓司令也是只带我一人乘一辆吉普车，悄悄离开海南岛的，冯伯驹等同志知道后，赶到海口秀英码头来送行，我们的船已离岸了，邓华司令员招手让他们回去。邓司令最不喜欢迎送场面。”

我这样一说，他们也就没有办法了，感到非常抱歉，对邓华司令这种优良的品德非常敬佩。

五、邓华司令员与我们在北上的列车上

7月25日黄昏后，15兵团部成为新改番号的第13兵团部北上的第1列火车（共编组4列），准时从广州市南站开出。邓华司令员对自己要求很严，只让挂了一节老式软卧车厢，没有单独包厢，并要我

将司令部的科长都找来同乘坐在软卧车厢里。

为了便于与上级的联络，我与通信科长罗长波同志商量，在列车上架设了电台。

深夜，列车开进韶关车站，这是开设的第1个供水点。我怕影响首长休息，带一名参谋悄悄下车检查开水供应情况。当我看到站长、工作人员、军代表和战士们，将每个车厢的水壶集中起来，灌好水后，很有秩序地往一节一节车厢送，大热天车站上的同志不仅能保证同志们喝上水，而且在开水里放了凉茶，我心中感到十分高兴和踏实，向他们表示了深深的谢意。

回到车上后，我突然听到邓华司令员轻声地说：“杨迪，水壶能灌上开水吗？”

我望着坐在铺位上抽烟，正等待听取检查结果汇报的首长，很受感动，急忙说：“司令，怎么还没有睡觉？是不是我们下车吵醒了您？”

邓司令说：“我怎么能睡觉呀！大热天，车厢内很热，很需要开水，我很担心车站上能不能烧很多开水。”

我说：“车站上烧了很多开水，水壶都灌上了，地方同志和供应站的同志想得挺周到，水里还放了降暑凉茶。”

邓华司令员很满意地点了点头，说：“这就好，我可以睡着觉了。你也很累了，我们睡吧！”

我心中感慨万分。司令员为使部队能够喝上开水，还这样操心，睡不着觉。我只有把各方面的工作想的更周到些，做的更细微些，尽量使司令放心，少操心。

邓华司令员是湖南省郴县人，按计划列车于26日晨到达郴州车站，并在此吃早饭。我主动问邓司令员要不要通知县里领导来介绍一下家乡的情况。邓华说：“现在军务在身，顾不上了，不要去惊动他们了。”

吃完饭按时开车。当时我们司令部的几个科长都是20几岁的小伙子，几天来，紧张工作一阵，晚上又睡足了觉，白天行车想轻松地热闹热闹，但是同司令员在一个车厢里就不敢了。我说：“司令员这

几天比我们还更紧张疲劳，他也该轻松轻松。”大家就推我去向司令说，想玩一玩。

我走到邓华司令员的铺位前说：“司令，大家都知道您爱下象棋，我们几个科长下棋可是有两下子，想和您比试比试。”

邓司令员笑了，说：“来来来，我们比试比试。”

我们就在铺上把棋摆开，我知道邓司令棋下得好，科长们轮流“作战”，都下不过他，他连赢了两三盘，很高兴。我就趁大家都凑上来看热闹他没有注意时，偷了他一个棋子，使他输了一盘。

邓司令瞪着眼睛望着我，怀疑我捣“鬼”，大声说：“杨迪，你搞什么名堂了？”

我一边笑一边否认，越这样他就越怀疑。

他也故意说：“再和你们下两盘，谁输了要受罚。”

我又去偷他的棋子，一下被他抓住了，他说：“好呀！这下可被我抓住了，要受罚。”

我说：“我愿受罚，但我不会唱也不会跳，我找个拉胡琴的参谋来给拉一段二黄好不好？”因为我知道邓司令员最爱京剧（当时叫平剧），而且还爱哼唱几句，想引起他来唱几段热闹热闹。

邓华司令员笑着说：“要罚你，你却准备好了替罚的，那就请那位参谋来拉段胡琴听听。”

叫来初华参谋坐下拉了一段胡琴后，邓华司令员说：“小初胡琴拉的还好听，有两下子。”

我就趁机说：“司令，唱两段吧，大家都想听您唱京剧哩！”

邓司令真的高兴起来了，他哼着要初华跟他定了调，唱“空城计”中的诸葛亮。这样上下级无拘无束地、热热闹闹地玩着笑着，这位赫赫有名的将军的心，与自己部属的心贴得更紧了。

热闹一阵过后，邓华司令员说：“前一段的准备工作你们干的很出色，发扬了我们兵团那种执行命令坚决，团结协作，雷厉风行，要干就干好的作风。从现在起，你们就要认真想想，如何指挥好调归我们兵团的3个军和3个炮兵师，甚至更多的部队。这几个军都是4野的主力，很能打仗，但都有傲气，各军各有特点，你们要去了解他们

的特点，一定要与他们搞好团结。我相信你们会以自己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效率，使他们信服兵团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到达安东（今丹东）还要坐好几天火车，我看由杨迪负责，你们好好研究研究，迅速进入情况，准备实施组织指挥。”这一席诚挚的话语，使大家倍感亲切、深受鼓舞。

接着，我谈了自己的想法和意见，说：“我和几位科长商量了，制定车运计划时，就安排在汉口停留一天，分别去4野总部各有关部门请示工作，了解情况、收集资料和汇报需要解决的问题。”邓司令当即表示同意，并要求尽力把事情办好。

中午，火车到长沙，要停车2个小时。

邓司令问我：“杨迪，你在长沙还有亲人吗？”

我说：“我哥哥、嫂嫂在长沙工作。”

邓司令说：“呵，他们都是老革命吧，你可以下车去看望看望他们。”

我听后非常激动，他自己路过家门不下车，可对部属则很关怀，要我去探亲。

我就说：“司令，您路过家门不让我通知县领导，我也不能为私事离开职守呀。”

邓华司令员笑着说：“我目标大，你目标小，停车两个小时，看望亲人是人之常情，你有摩托车，可以快去快回，不要耽误开车时间。但你要为我保密，不准说我在火车上，以免省、市领导来，耽误开车时间。”

邓华司令员就是这样对自己要求很严，而对部属则尽可能地关怀。

7月27日拂晓，列车进至武昌，在轮渡指挥所的组织下，顺利摆渡过江到达汉口车站。4野总部首长派车接走了邓华司令员，总部各部门也来车接走了各位科长。我向指定的列车负责人和车站领导交待了有关事项后，即到4野总部作战处，了解一些朝鲜战场敌友双方的情况，搜集有关资料，但只要到1份1:100万的朝鲜地图和一些资料。仅仅这些，我就感到很满足了，就可以在列车运行途中抓紧时

间，熟悉地图，研究分析资料，以争取尽快地进入情况。

六、邓华司令员要我随他乘飞机到北京，直接接受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邓司令员和我研究朝鲜战局

晚饭后，我在汉口火车站正焦急地等待邓华司令员返回，好按时开车。就在这时，邓司令的警卫员坐车来通知我，让我带上洗漱用具和几件换洗衣服，立即到首长那里去。我问他干什么去。警卫员说，不知道，只听首长说不坐火车了。我心想不坐火车坐什么，那是干什么去呢？我也顾不上多想，将日用品装在挂包里就上车，汽车开到4野总部招待所后，邓司令员对我说：“罗荣桓政委要我乘飞机赶到北京，目前朝鲜战局变化很快，情况也很复杂混乱，军委决定要我先去朝鲜了解第一手情况。我准备带你去，明早你跟我坐飞机去北京。”

我马上返回车站作必要的布置。给汉口车站军代表留下一封信，请他转交兵团部后续各列车负责人，要求按原定计划开进，到达安东后，根据先遣设营人员的安排，进驻分配的驻地，并迅速展开工作。关于邓司令员抵达安东的时间，待到北京后再告。

当时的民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香港的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简称“两航”）的飞行人员和地勤人员宣布起义，驾机飞向祖国内地，由中央人民政府改编组成的中国人民航空公司，共有10多架美式C-46或C-47式运输机，在大陆几个大城市开始了民航飞行。

7月28日，邓华司令员带我乘民航飞机先到天津（因当时北京城市上空实行空中军事管制，机场不接民航飞机），然后赶至天津西北杨村车站坐火车。当时买的硬席票，没有座位（当时不对号入座），谁也不知道也不会相信赫赫有名的兵团司令员也站在旅客之中，因为邓司令和我们着装上是一样的，也很随便，不摆架子，也没有带大批随从人员，只有我和一名警卫员，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引不

起人们的注意。我也没有办法去说明邓司令员的身份，请人让座，邓司令也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就一直站到北京。总参谋部管理局接待处有人在火车站等我们，将我们接到东四牌楼总参招待所。

第二天早饭后，总参派车来将邓华司令员接走，中央军委首长接见他。一直到晚饭后才回到招待所。

邓华司令员回来就对我说：“现在朝鲜战场局势情况相当混乱，军委要我率各军军长先入朝了解情况。我考虑我走后，兵团没有领导同志负责人朝前的准备工作，就向军委提出调洪学智同志来兵团任副司令员，军委首长同意了。我打电话给赖传珠政委，他也赞同我的意见，并告诉我说，洪麻子（邓、洪关系很好，他们之间开玩笑时，邓爱叫洪麻子。以后彭总对洪也是这么叫）近日就来北京汇报工作。”

我听了很高兴地说：“洪副司令来兵团工作是最理想的了。可是他现在是叶（剑英）参座军事上的得力助手，叶参座能放他走吗？”

邓华说：“正因为这样，我没有给他打电话，暂不告诉他，只好等他来北京后当面说清楚了。我看，洪麻子这个人只要有仗打，一定会动心的。你现在就请总参接待处给订火车票，待军委首长与他谈话后，咱们就拉着他去沈阳。”

在北京的几天里，邓司令经常去军委开会，我即在招待所，抓紧时间熟悉情况，把近一个月来凡是涉及朝鲜战争的报纸都找来，仔细翻看，剪辑有用的资料，注意收听当日的广播，并对照地图认真地分析研究。

当邓司令问到我这几天在干什么？是不是逛大街，看热闹去了？我说，我哪里也没有去。就把自己所做的事情进行了汇报，并向邓司令简略地谈了朝鲜战场的动态。

我向邓司令汇报说：“7月21日，朝鲜人民军发起了洛东江战役，其主力已全部逼近这一地区，判断可能是企图夺取釜山，将敌人歼灭或赶出朝鲜。7月29日，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已到朝鲜尚州美军第25师师部，扬言：‘要就地死守，……为争取时间而斗争……不能再有敦刻尔克的出现，（注：第2次世界大战时英军自

法国撤退的地点)也不能有巴丹的再版(注:指第2次世界大战时,太平洋战争初期,麦克阿瑟率部撤出菲律宾的地点)。”这就表明美军要依托洛东江固守待援。另外,台湾蒋介石向美国表示愿意出兵3个师参加朝鲜战争,而麦克阿瑟想让蒋介石趁机进攻大陆,以牵制我军入朝作战。”

邓华司令员听得很感兴趣,进一步问我对战局发展有什么看法。我在军委一局工作时,经常聆听叶剑英总参谋长的教诲,当一名好的作战参谋,必须做到能参善谋,不仅要具备准确迅速、一丝不苟的作风,还要善于思考,成为有问必答、答而无误的“活字典”,从而养成了分析研究情况和提出自己意见的习惯。同时,因为邓司令员对我很了解,很信任,因此,虽然我们之间上下级悬差很大,但我们之间可以畅所欲言,我对他很敬佩,很愿意将我的看法讲出来,得到他的指教,从而提高我的分析能力和认识水平。邓司令让我谈谈看法,我就很直率地讲了自己的意见。

我对当时朝鲜战场情况的看法是:一是美国既然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入侵朝鲜,就不会轻易地放弃这场战争而退出,必然会派更多的部队来,企图打赢这场战争,他们以世界第一流军队自居,自认为必定能打赢这场小规模战争;二是现在朝鲜人民军已逼近洛东江,而败退之敌正依托洛东江进行筑城防御,若要在敌人阵地前实施渡江进攻,那可同我军的渡(长)江战役大不一样,也同我们渡海登陆海南岛战役大不一样。因为朝鲜人民军要进攻的敌人是美军,美军可不是败退的南朝鲜军,也不是败退的国民党军;三是朝鲜人民军想速战、速决、速胜,把战略预备队都用上去了,后方十分空虚,朝鲜是一个半岛,三面都是海,麦克阿瑟很有可能利用其海空军优势,将新调来的部队在朝鲜后方实施登陆作战,截断朝鲜人民军的后路,这比直接输送到釜山从正面增援有利得多,况且现在釜山港已拥挤不堪。这是我从打海南岛后,研究美军在太平洋对日本岛屿登陆作战经验而联想的,麦克阿瑟对登陆作战是很有经验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后果就非常严重了;四是如果朝鲜战局急转直下,那我军就肯定会入朝参战。我们兵团的部队,都是4野的主力,打败侵朝美军

现在在朝鲜战场上的2个师，或再来2个师不成问题，估计有3个月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邓司令听到这里即打断了我的话，严肃地对我说：“你对情况的分析还比较客观，有些看法也有道理。可是，你那轻敌速胜的思想是不对的，也是很危险的。这种轻敌速胜的想法，不只你一个人有，在很多干部和战士中都有。别以为打败了国民党800万军队，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我们就了不得了。胜利之师最忌讳的就是轻敌骄傲。美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参加打败德、意、日法西斯军队的胜利之师，美国又是头号帝国主义，他们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纠集16个国家出兵朝鲜，这是来者不善。况且，他们在海空军方面占有绝对优势，陆军装备和火力也比蒋介石‘五大王牌军’强得多。要时刻记住，我们的对手变了，要准备同自称天下第一的敌人较量，绝对不能有轻敌速胜的错误思想，要像抗战打日本侵略军一样，准备持久作战。”

邓华司令的一席话，切中了我思想认识的要害。当时我思想中存在盲目乐观情绪，这种情绪并没有因邓司令的指出而得到克服纠正，思想深处仍然存在。这表现在到达安东后，准备自己的日用品上，仍只准备3个月的，一直到入朝作战经过3次战役，特别是第4次战役后，战争的实际教训了我，才彻底克服了轻敌速胜的错误思想。

邓司令看我的表情，知道我还没有真正认识轻敌速胜的错误思想。就说：“看来你现在还不能认识，我不勉强你，等入朝参战后，让战争的残酷实际来教训你吧！”

稍作停顿，他说：“我现在每天到军委去，同军委首长研究朝鲜战局、我军开到东北后的任务、各军干部调整配备和人员武器装备的补充、率各军军长先入朝了解情况、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入朝作战等问题。我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怎么办？我现在要你仔细研究一下美军和我军编制装备的对比，进一步熟悉朝鲜地形，多掌握些朝鲜战场敌友双方的情况。”邓华司令员这些深思熟虑、具有战略远见的指示，对拓宽我的视野，了解指挥员的意图，更好地发挥参谋助手作用，获益匪浅。

8月5日，邓华司令员回来对我说：“8月4日，中央政治局开

会，研究了朝鲜战争情况，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分析指出，朝鲜人民军集中全力发动洛东江战役，企图一举攻占釜山，收复全朝鲜，而美军则死守洛东江，并已从美国向朝鲜增兵。当7月21日朝鲜人民军将全部力量投入发动洛东江战役时，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就预料到如果朝鲜人民军打不过洛东江，美军增援部队运来了，很可能在朝鲜后方登陆。现在朝鲜人民军已在洛东江打了近半个月了，还没有突破洛东江美军的防御，而美国增援的部队已到了日本，看来麦克阿瑟很可能会用他善于登陆进攻的拿手戏，从朝鲜后方实行登陆作战。这样，一方面可以将朝鲜人民军主力截断，从其后面进攻。同时乘虚向汉城、平壤进犯。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那么朝鲜战局将会急转直下。朝鲜人民军将处于极不利的态势。

邓司令停了一下又对我说：“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朝鲜战局的分析，认为朝鲜战场及朝鲜战争情况变化很快、也很大，中央军委决定，要我暂不率各军军长先入朝去了解情况了。”

接着，我向邓司令员汇报了兵团所属各军已基本上到达东北地区的指定位置。我想既然司令员已不先入朝了，就建议邓司令到东北后，立即召开各军长、政委和炮司领导同志会议，以便兵团对各军正式实施指挥。会议不要到安东兵团部开，最好在沈阳开，因为东北局、东北军区在沈阳，很多问题还要靠他们帮助解决。

邓司令说：“我也有这个想法和打算，现在就这样定下了。你即给东北军区司令部打个电话，兵团决定于8月11日在沈阳召开会议，请东北军区司令部帮助准备开会的场所和住处，并请他们转告兵团所属各军军长、政委及炮司领导，于8月10日到沈阳报到开会。还请东北军区司令部报告东北局、东北军区首长，和东北边防军首长，请他们参加兵团召开的会议并请作指示。”

七、邓华给洪学智来个“突然袭击”，洪学智刚到北京，就被邓华“拉”到沈阳

1950年8月9日早饭后，邓华司令员对我说：“洪麻子乘火车今

日上午到北京，我去火车站接他，直接到林副主席（注：当时林彪已调任军委副主席）那儿去，你即去准备今日下午的火车票，下午我就拉着他一起去沈阳。我已等了他两三天了，各军到东北后很多事情要我去处理，急死我了。”因我已提早给总参谋部接待处打了电话，请他们预定近两天的火车票，并都要他们订软卧，供首长们能在火车上睡一觉，下火车有精力投入紧张的工作。邓司令向我交待后，我即通知接待处，请他们购买8月9日下午去沈阳的火车票。

洪学智上午到达北京火车站时，没有料想到邓华仍在北京并去火车站接他。洪学智刚下火车，看到邓华在站台上接他，使他吃了一惊。

洪学智一边下车一边问邓华：“老兄，你怎么还没有去安东，还在北京干什么？”

邓华笑嘻嘻地说：“我在北京晚走了两三天，就是专门等你呀！”

洪学智很吃惊地说：“你等我干什么？”

邓华神秘地说：“我不告诉你，你也不要问。走，我们上车。”

洪学智说：“上车你拉我到哪儿去？”

邓华还是神秘地说：“不告诉你，到了那儿你就知道了。”

洪学智有些莫名其妙地随着邓华上了车，他们直去林彪住处。

林彪向洪学智讲了中央军委决定调他到第13兵团任副司令。

因时间紧迫，他们在林彪家吃完午饭后，邓华陪洪学智到他准备的住处，洪学智向随他来的同志交待后，即和邓华直接到火车站。我已经按邓华司令员事先交待，已在火车站内等他们。

洪副司令见到我就说：“杨迪，你怎么也在北京呀？为什么没有带兵团机关坐火车走？”

我说：“副司令，我是在汉口随司令来北京的。”

洪副司令说：“我就猜到是这么回事。你知道我要调到兵团来，为什么不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

我笑着说：“司令特别嘱咐我，不让我给您打电话，怕叶参座知道了，就不会让你来北京了。”

洪副司令也笑着说：“你还知道吗？我是你的直接领导，有什么

事情应该向我报告。邓司令不让你打电话，你可以偷偷地打嘛，给我通个风报个信也好呀！”

我笑着说：“洪副司令，一是我不敢违令，二是我真欢迎老首长来兵团再直接领导我们。”

邓司令与洪副司令并肩走着，听着我们说话，他只是微笑。我们边走边说，就上火车了。

洪学智因事先不知道这次的调动，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在火车上不停地对邓华说：“伙计，没有想到你对我搞突然袭击，事先连个电话也不打，也不准杨迪通风报信，使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什么日常用品都没有带。”他解开上衣光膀子说：“你们看，我满身热得长了大泡呢。”

邓华笑着说：“我不搞突然袭击，如果事先通知你，叶参座就不会让你来了。身上长的大泡疮，到东北天气凉爽很快就会好的。日常用品和换洗衣服到沈阳我给你买和做新的。”

洪学智说：“是叶参座派我到北京来汇报工作的，我不辞而别，怎么也不好向他交待呀。”

邓华说：“你上车前不是已经给叶参座打了电话，作了报告了吗！叶参座已经默认了。你还给叶参座写了信，叶参座会谅解你也会支持你来参加领导指挥打仗的。”

洪学智还是有些不自在，嘟嘟囔囔的。

邓华说：“大个子，老实告诉你吧，是我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建议调你来兵团的。我来北京时，军委首长是要我带各军军长先入朝去了解情况，可是兵团和各军入朝前的各项准备、军事训练等工作，我交给谁管？只有请你来最合适。你很熟悉兵团和各军的情况，你来了，我就放心了。”

洪学智说：“原来如此。到朝鲜去打仗，我当然很愿意去，就是对叶参座不辞而别，有些说不过去，也很不礼貌。”

邓华说：“老洪，你不要想得太多了，你到沈阳后，再给叶参座发份电报，或者打个电话，再次汇报情况，并向叶参座表示歉意。”

邓华点着一支烟后，说：“老洪，你现在已经来了，就不要再想

广东的事了，我们来共同研究兵团的事吧。现在我向你谈谈中央军委首长的意图、兵团的情况、朝鲜战场的情况吧！”

洪学智说：“老兄，就照你说的办，我正想了解中央军委意图和朝鲜战争情况呢。我洗耳恭听。”

他们两人不停地谈论着，我很困，躺在卧铺上睡着了。

第二章

第13兵团司令部入朝前的准备工作，很繁忙、很紧张

一、第13兵团在沈阳召开第1次军事会议，各军反映了不少问题

1950年7月13日，中央军委命令成立东北边防军，第13兵团到东北后，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肖劲光任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员，肖华任副政委，但没有任命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加之，朝鲜战局发展变化很快，东北边防军有名而无实际的领率机构，所以，第13兵团实际上是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兵团可以独立召开会议。兵团的请示电报都是直接发给中央军委和4野总部及东北军区。

1950年8月11日，第13兵团第1次军事会议在沈阳（现在的辽宁宾馆）召开。兵团司令员邓华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副司令员洪学智，第38军军长梁兴初、政委刘西元，第39军军长吴信泉、政委徐斌洲，第40军军长温玉成、政委袁升平，第42军军长吴瑞林、政委周彪，炮司副司令员匡裕民、政委邱创成。还有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贺晋年，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员肖劲光、副政委肖华也参加了会议。由于兵团部到安东后，就组织干部下到各军去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所以司令部只有我参加了这次会议。

首先由邓司令员讲话，他说：“这是第13兵团与第15兵团番号

及机关对调后，我们第一次见面，大家在东北战场、平津战役、进军中南，协同作战几年，都是老熟人，就不必介绍了，也不必讲客套话。”

邓华司令员讲完这些话后，用眼睛扫了一下会场，看到各军的同志都在望着坐在台上的洪学智同志。邓司令明白了，洪学智任兵团副司令员的命令还没有正式宣布，他就说道：“你们眼睛望着洪学智同志，大概是在问洪学智同志在广东，怎么还到东北来参加兵团开会呢？现在我正式宣布，洪学智已被中央军委任命为第13兵团副司令员。”洪学智站起来向大家敬了一个礼，大家热烈鼓掌欢迎。

邓华司令员接着说“会议准备用两天时间听取汇报，13日、14日两天正式开会。”接着说：“我在北京时，军委首长指出朝鲜战场形势变化很快，要求我们兵团于8月份将战前工作必须准备完毕，9月份待命，随时准备出动。现在准备的时间很短，要做的准备工作很多，问题和困难也不少。这就要求我们上上下下都要迅速行动起来，认真地进行筹划，严密地组织，抓紧时间进行准备，请你们摆出问题和困难，也要拿出解决的办法。东北局和东北军区的领导跟我讲了，他们要全力以赴支持我们，只要能办到的事情就立即办，暂时办不到的也要想方设法去办。”

这次汇报和研究的问题：一是部队干部、战士的思想情绪；二是部队现有人员武器装备和干部调配情况；三是物资的补充和运输能力的情况；四是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和军事训练情况等。

各军的汇报都很详细，要解决的问题和要克服的困难也是一大堆。第38军、第39军进驻河南省后，分布在300公里范围内搞生产和营建，一部分干部、战士都要求回家结婚去享受土改成果，从东北入关南下时部队唱的歌就有“打败老蒋好回家”，蒋介石被打到台湾去了，战争胜利了，有人认为该喘口气回家“老婆孩子热炕头”享受享受，因此复员了一部分干部、战士，有些战时需要的工作部门取消了，真有点像“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准备过和平生活了。

各军是7月13日接到中央军委和4野的命令，开赴东北进驻辽宁、吉林南部鸭绿江边地区，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要求在一个星期

的时限内，部队边集中边上火车，当时只是执行命令开赴东北，干什么去还没有来得及向干部战士讲清楚。第40军则是打完海南岛战役后，步行到广州乘火车，原计划进驻河南，在行进中接到开赴东北的命令，火车路过河南没有下车就直开东北。下级干部和战士以为是调回东北老家去。

各军要从和平思想转变到准备打仗，而且是准备出国到朝鲜同美帝国主义军队打仗，这个思想弯子转的太大太急。思想工作是在火车上做的。动员口号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占领我国台湾岛，要打到我们的国门和家门鸭绿江边来了，为了保卫国防、保卫边防，保卫家门，中央军委决定组成东北边防军，防止美帝侵略我国，保证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东北人民、全国人民过和平生活。因为干部、战士绝大部分是东北人，听说美帝要打到自家门来了，为了保国保家，这股情绪很快就转过来了，但是，当时还没有明确提出过鸭绿江支援朝鲜作战，怕干部战士一下子接受不了。

部队7月底、8月初先后进驻辽宁、吉林两省鸭绿江边后，才向部队提出决不让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来，决不让美国侵略军踏上我神圣的国土，我们要准备入朝支持朝鲜人民军作战。教育部队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胜利之师，是正义之师，正义之师是必胜的。美国侵略朝鲜是非正义的，我们只有和美国侵略军较量较量，把它不可一世的威风打下去，把它打败，我们才能有真正的和平，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和我们的家乡才能真正有安全的保障。从国内战火中刚刚过来的干部、战士，又重新激发了高昂的战斗激情，发出了要打败美国野心狼的怒吼。

各军军长和政委们说，8月10日前思想动员教育工作已做的差不多了。同时干部调配也已经基本做完，准备8月10日后进行两个星期的军事训练。至于装备，物资、器材、车辆、马匹、生活保障等，就提出了一大堆要解决的问题。比如：现有的火炮拉不走，且大多数火炮要大修，营、连武器缺额也很多，武器、弹药、车辆、马匹及通信器材都缺的很多，指战员穿的、吃的、用的都缺的很多，各军本身无力解决，要靠上级才能解决。

由于，部队刚到东北，缺少的东西确实无能为力去解决。听了各军的汇报后，我即向邓司令、洪副司令建议请东北军区后勤部长李聚奎同志召集各军后勤部长来沈阳开会，共同研究如何具体落实解决这一大堆必须迅速解决的困难。

邓、洪首长考虑后，认为仅仅由东北军区后勤部来召集开会，有些问题还是不好解决。他们即向高岗提出，请东北局和东北军区主持召开各军后勤部长会议，争取在9月5日前，把需要解决的物资装备落实到部队。因为中央军委要求各部队必须于8月份装备完毕，9月份待命出动。高岗答应由东北局、东北军区负责召开会议，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听了各军的汇报后，更证实了朝鲜内战爆发前，我方并没有得到友方的通报。我党中央并不知道朝鲜会爆发战争。

二、解方调到第13兵团任参谋长，带领我们研究制定入朝开进计划，并提出作战建议

8月14日夜，我随邓华、洪学智首长到达安东兵团司令部。洪学智副司令要我召集机关各科，传达沈阳会议精神，要求兵团机关迅速地贯彻执行，并随时检查督促和了解各军贯彻执行的情况。

不久，第12兵团参谋长解沛然（即解方）调到兵团任参谋长，4野政治部组织部长杜平调到兵团任政治部主任。

我与解方参谋长是1949年11月在广西梧州相识的，当时，解方是第40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对我（当时我是第15兵团司令部作战科长）带部队和船只准时赶到梧州，接应第40军渡过浔江，一小时也没有耽误该军追歼敌人的作战任务，他们非常满意，对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进行海南岛登陆战役时，第40军归第15兵团指挥，我在兵团前指，相互间的工作联系，又使我们进一步熟悉了。我对解方很敬重，深知他学识渊博、经验丰富、为人正直谦虚。我衷心欢迎解方参谋长到兵团来任职，很高兴在这样的首长领导下工作。

8月中旬，解参谋长到职后，就要我汇报兵团司令部的情况和入

朝前的准备工作。

我汇报说：“现在朝鲜战局变化很快，情况也很复杂，需要召集有关人员进行仔细深入的研究，以便从混乱的情况中理出个头绪。”我还把在北京邓华司令员向我讲的中央军委对朝鲜战局的分析判断，以及我向邓司令汇报对朝鲜战局的分析，和邓司令的意图与指示向他汇报了一遍。同时，建议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和兵团首长的意图，迅速着手拟制入朝作战的几种方案，以及部队入朝开进计划。我对原定先以2个军入朝，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我国与朝鲜只有鸭绿江一江之隔，而这条江只有辑安（今集安）、长甸河口和安东三个地方有桥，如果敌发现我军渡江，必然要轰炸江桥，这就给部队过江增加了难度。既然要入朝作战，就要保证部队行动的突然性，最好还是将兵团的4个军（含第42军）和3个炮兵师，一次即跨过江去。理由：一是只要敌人发现我军过江，肯定会轰炸江桥，等敌人将江桥炸断，我兵团已都过江了；二是一次跨过江去，我兵团的力量集中，对应付可能发生的意想不到的情况就主动多了。我还汇报了鸭绿江拉古哨水坝下面的水位较浅（已派作战、工兵参谋进行了勘察），利用工兵舟桥团现有器材很快可以架一座浮桥。辑安方向江水较浅，江面也窄，可以在两岸架水底面桥，中间水深处架浮桥可节省舟桥，并将三座铁路桥上钉上枕木，使人马车辆都可以通过。这样就有五座桥，如果组织得好，2到3个夜晚兵团所属部队都可以全部通过。”

解参谋长指出：“你的建议很好，但还不完整，如果我们兵团都过江，那鸭绿江边的后方就没有部队了，一旦出现情况怎么办？”

我说：“那就建议再从4野调1个军到安东、辑安一带保障后方，就可以放心了。”解参谋长表示可以向兵团首长提出建议来。

我们俩人对着地图，分析研究了近一个通宵。接着解参谋长又找来作战、侦察、通信科的同志，逐个问题商定，形成了向兵团首长汇报的意见，并标绘出开进计划图。

在兵团首长会议上，邓司令和洪副司令都认为：应将兵团所属4个军和3个炮兵师一次全部过江入朝，并再调1个军到鸭绿江边，在这个基础上，研究定下了第一个入朝开进计划和作战部署的初步决心

与方案。邓华司令员指示我，将这个计划和部署即发电报给各军征求意见，尔后再研究一次，定下来后，上报军委。

邓华司令员还指示我，兵团建议增调1个军来东北，即可向中央军委和4野总部发电报请示。9月6日，兵团接到中央军委电令，从中南军区（即4野）抽调第50军赴东北，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

三、起草邓、洪、解三位首长8月31日给中央军委的建议电报

邓华司令员从7月下旬到北京，直接接受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授予的准备入朝作战的任务后，以及洪学智副司令、解沛然（解方）参谋长前后到达兵团后，他们一方面狠抓部队的各项准备工作的落实和部队训练，一方面即反复研究朝鲜战局发展的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首长们研究时，都找我去参加。他们讨论很热烈时，我也可以发表一些看法。我说的有道理时，他们点点头，就问我几个为什么，怎么办？有的问题我答得出来，有的问题我答得不对或答不出来，他们就说应如何看，应怎么办。这样直接与首长们交谈，对我的教育很大，从实际中提高了我分析、判断问题的能力。

邓华司令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善于思考、分析研究问题，非常具有战略性的远见，这使我联想到，一位高级指挥员必须要有一定的文化素养，邓华司令员1927年参加革命前是受过中学教育的。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在实战中就容易和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并使经验教训上升到理论，再去指导实践，这样不仅提高得快，而且接受新鲜事物也快。邓华司令员就是属于有文化知识再加上有丰富实战经验的高级将领，是文武兼备的将军。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篇名著中，所指出的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邓华司令员就是善于学习，善于思考的“智勇双全的将军”、“勇敢而明智的英雄”。

邓华司令员经过一个来月的反复研究和思考并充分听取了同志们的意见后，对朝鲜战局形成了较成熟的认识。他将我找去，对我说：

“杨迪，你知道，我自从来到北京受领任务后，就一直在思考兵团入朝作战各方面的问题，到了安东后，我又与洪学智、解方同志反复研究商量作战问题，每次都找你参加了。现在我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意见。我准备将对朝鲜战局的看法和意见，向中央军委和4野首长发个电报，你都知道我的意图与意见。我现在再给你系统地讲一讲，你去写出来，你要认真地仔细地想好，将我的意图与建议要写得明确无误。你写好后，找位参谋抄写清楚，就送给我看。”

接着邓华司令员把他对朝鲜战局和兵团入朝作战的看法和意见系统讲了一遍，并问我听明白了没有。我说：“司令，我都听明白了，我马上就去写，今天就可以送给司令审阅。”

我回到作战室，迅速起草这份电文。按往常习惯，我写好就送上去，这次因邓司令交待的很郑重，我就反复修改，感到确把邓司令的意图和意见全部反映出来后，就找初华参谋抄写清楚（因为他的字写得好）。当天我即送给邓华司令员审阅。我站在一旁，准备听他的询问。邓华司令员很仔细地审阅，有时间问我几句，并进行了认真修改，一直到认为可以了为止，改完后就将电报稿交给我，对我说：“你去送给洪学智、解方同志看，征求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有了新的意见，就以我们3个人的名义发出去。”

我把电报稿给洪学智副司令和解方参谋长看。他们问我邓司令看了没有？我说：是司令交待我起草的，他已看了，并作了修改后，要我送给你们看，征求意见后，以邓、洪、解的名义发出。这即是1950年8月31日以邓（华）、洪（学智）、解（方）给中央军委和4野、东北军区发出的关于对朝鲜战局及作战等问题的报告与建议。因我手头没有保存原稿，只记得电报分六个部分，即：关于对朝鲜敌我力量对比问题；关于朝鲜地形；关于对敌军企图的判断；关于我军入朝后的作战方针；关于我军入朝后的供应问题；关于部队的装备和训练问题等。

邓、洪、解的这份有分析、有预见的电报，受到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及彭德怀司令员（注：彭总是10月份受命以后看到的）的重视，并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四、参与制定了第13兵团突然、秘密地入朝开进计划，创造了25万大军行动未被敌人发觉的奇迹

当时13兵团司令部是比较精干的，每个科只有4至6名参谋，既有明确的分工，又有相互协同配合。这部“机器”可以说节奏快、效率高，有条不紊地、昼夜不停地进行着战前各项准备工作，并对各种问题随时研究并提出建议，还不断地对部队进行检查、督促和落实。各部队每天的工作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均由我汇总，口头向解参谋长及兵团首长汇报，并将首长们的指示和要求，再转告有关参谋，分头向各军传达。如需向上级反映的情况和请示要解决的问题，首长们当即研究，由我起草电文上报。现将当时我根据首长意图起草的一份电报原文附后：

军委、东司（注：东北军区司令部）、野司（注：4野总部）：

出动前请求上级立即解决的问题请示如下：

（一）请将预定战场早示，以便研究开进路线及集结位置。

（二）现对行动地区兵要地理进军路线均不熟习（悉），为使大兵团顺利开进，拟由兵团及各军组织先遣队（带电台）先出发调查路线，布置宿营并接洽将来（注：与朝鲜人民军）协同作战联络问题。

（三）请早确定出国部队使用番号，颁发（或规定样式自刻）关防（注：即印章），以便在部队进行教育。同时，现在棉衣棉帽还不能穿，是否可穿现在单衣，将帽上军徽、胸章取下。

（四）部队进入友区后，使用何种货币，如须用友币请

早筹划下发。另外，大兵团行动友区粮草极为困难，行动后此事如何解决，建议在行进路上及战场附近早有布置。

(五) 部队中医院主要靠日本医生实行手术，但日本人又不能随军行动，请求军委速从后方医院调换一批手术高明的医生到部队，以接替日人工作，否则战救工作将极困难。

(六) 各军汽车（带一个弹药基数及两天粮食共 480 辆，炮司未计在内）还未发下，请速发并随车配足司机。

(七) 准备即将特司四个骡马炮团分属各军指挥，随各军行动，以便及时配合作战。

(八) 以上问题对此次行动极关重要，请予八日前解决发到各军，以便按时行动。

邓、赖、洪、解

二日十二时（注：九月）

此时，兵团政委赖传珠同志已到安东。所以电报有赖政委。

为了保障入朝后的指挥，通信顺畅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对这方面的准备工作，我与通信科长罗长波进行了周密细致地研究。我们认为，入朝后不能利用朝鲜的有线线路。这主要考虑到，一是不了解他们的线路架设和通信方法；二是防止泄露军事秘密；三是部队流动性大，不可能在一地久驻，加之兵团与各军、师距离较远，每天又是在运动中，架设有线电话确有困难。为此，我们商定主要靠无线电通信来沟通兵团与各军、师联系，即兵团对各军及其所属师开设电台和无线电话，实行 24 小时不间断地收听。作战科与通信科合作，共同编制了密语通话表，供电台和无线电话使用。

为了防止密语表丢失，都编了备用的，兵团与军、师共用一种，由兵团编发；军与师、团共用一种，由军编发，并报送兵团，以便兵团直接收听。例如，在第 2 次战役，第 38 军 113 师到达三所里时，就是采用这种方法用无线电话发出密语报告，志愿军司令部用专向台（注：即专对 113 师的电台）及时收到，使彭总及志愿军其他首长能

迅速了解情况，及时定下决心，令正面几个军迅速出击，抓住当面之敌，以防其逃跑。并令第38军迅速向军隅里急进，支援113师截歼逃敌，这就充分发挥了通信联络保障及时指挥的作用，对此，彭总和其他首长都大加赞赏。

了解和掌握敌情，是司令部向首长提供定下决心的依据，也是司令部一项很重要和很困难的事情。我与侦察科长崔醒农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按照当时的条件，对美军的无线电信号是可以截获的，但没有破译机，截获了信号也破译不出来。只能通过收听广播，从美、英等国通讯社发表的消息中，得到一些在某某地方采访了某某将军，某某将军指挥某某部队攻占了某某地方或向某某方向大举进攻等情况，来判断敌人的行动和部队番号。而美军在战场上的团以下联络，多使用无线电明语通话。美军以为我军没有美式通信器材，难以收到通话内容，即使能收到一些，不懂英语也是没有用。

我们分析研究后，建议兵团首长，请求4野和中央军委将国内兄弟部队缴获的国民党军的美式无线电话机收上来，发给兵团和各军、师，并调一部分英语翻译分配给兵团和军（最好能到师）来监听敌人的无线电话。至于南朝鲜军的通信密码，与国民党军的相似，有很多可以破译出来。只要加强对其通信监听，就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美军的动向。此外，还要求各级侦察部门组织英文、朝文翻译，以便审问俘虏来了解情况。洪学智副司令、解方参谋长对我和崔醒农所汇报的收集敌情的想法和意见，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要求我们在实战中不断总结经验，再想出些新的办法。

入朝作战是出国作战，人生地不熟，特别是由于语言不通，如何找带路的向导，如何去做群众工作，如何与朝鲜党政军联系等等问题，都会给部队行动带来很大困难。我请示解参谋长和邓、洪首长同意后，给东北军区打电话、发电报，请他们迅速从东北挑选一批政治可靠汉语水平较好的朝鲜族高中学生或干部来当翻译。东北军区很快就送来了一批朝鲜族的同志，除司令部留下3人（作战、侦察、管理科各1人），其余都分给了部队。我挑选了一名最好的，就是赵南起同志，因他表现很好，入朝不久就当了参谋。1951年，成立志愿

军后勤司令部时洪学智兼任后勤司令员，即要我从事作战处选2名能力强的参谋给他带到志后去工作。我即挑选了赵南起、刘洪洲两位参谋，洪学智副司令很满意。

入朝作战，我军没有制空权，为了避免遭受敌机轰炸，减少损失，兵团首长和机关的同志就要在夜间乘车行动。因此，司机的技术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行车的安全。我因在国内解放战争中，知道这方面的教训不少，对这件事看得很重，就找管理科科长张仲三同志商量，我们一致认为，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关键是抓住两条：一是选择思想好，胆大心细，不怕飞机轰炸、驾驶技术好的司机，尤其是给兵团首长开车的司机一定要选好；再就是抓紧战前的时间，对司机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小汽车前的挡风玻璃镜通通放倒，大汽车的挡风玻璃则撑起来，以避免霜冻，妨碍司机的视野，并将车篷放倒，以便能听到飞机的声音，能够迅速闭灯或躲避，还要熟悉山路行车和闭大灯、开小灯驾驶的技能，以及遇到敌机丢照明弹或轰炸、扫射等紧急情况，如何采取果断的行进方法的处置，还有如何将车辆伪装好等等，都要反复地演练和研究。管理科的同志一再表示，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好，保证做到万无一失。

在战前准备的那些日子里，兵团机关很忙，而作战科的同志们就更忙。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是在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着。现将我当时的作战记事本中所记载的1950年10月5日作战科一天里要做的工作，在此点点题目，就可以看出当时的负荷量和工作效率，是相当惊人的。

1. 指挥所的组织分工；
2. 参谋业务学习的总结；
3. 部队装备的调整；
4. 研究熟悉情况，熟悉地图；
5. 战局介绍、兵要地理介绍；
6. 研究的几个问题：
 美军编制（高、于、辛参谋负责准备），
 我军编制装备（我自己负责准备），

朝鲜兵要地理（王、何、侯参谋负责准备），
朝鲜战局情况（初、侯参谋负责准备），
部队开进方案（我自己负责拟制）。

当时鸭绿江上通往朝鲜只有辑安、长甸河口和安东三处有铁路桥，兵团首长要求力争在2至3个夜晚将25万余人，渡过鸭绿江，不要让敌人发现。这是一个需要很周密计划的大兵团秘密开进计划。

接受任务后，我即与侦察科长崔醒农同志研究，如何保证这一计划的准确实施。我们商量由崔醒农科长带着2个工兵团的干部，去鸭绿江各渡口了解情况，我则亲自到长甸河口了解可否架设浮桥的情况。

我们从各渡口了解情况回来后，即向解参谋长汇报并提出具体建议：在三处铁路桥上铺枕木，人马、车辆都可以通过。同时，集中2个工兵团的器材在长甸河口架设一座浮桥，要求工兵团应在每日黄昏时2至3个小时内能架好桥，每日拂晓前1至2个小时能撤掉浮桥，将器材隐蔽起来，一是防止敌空军发现将桥炸坏；二是避免暴露我军过江的企图。2个工兵团还有些器材，可在辑安也架设一座水面桥与浮桥相结合的桥，辑安江面窄、水浅，两岸可打木桩架设水面桥（即桥面与水面一样高，以免被敌机发现），水深处即用少数舟桥连接起来。并要求工兵团进行夜间架桥演练，以达到迅速、准确、按时于黄昏时架好桥，拂晓即撤卸浮桥，并隐蔽伪装好。

解参谋长同意我们的意见，我立即要求2个工兵团迅速组织演练，达到了两个小时即可架通浮桥，一个小时即可撤收浮桥，做到黄昏前即架好桥，保证部队夜间通过，拂晓即可迅速撤卸浮桥，将器材隐蔽起来。

我们还反复研究、计算各军的开进计划，要求一个团根据铁路桥及浮桥的宽度，规定几路纵队通过，跨过鸭绿江后，各部如何避免拥挤，迅速分路前进，一定要利用朝鲜境内松树林子多的有利条件，进入松树林内隐蔽宿营休息。

由于计划的周密准确，在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下达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命令之后，25万大军按照彭总及兵团首长的要求秘密而迅

速地于2个夜晚即基本上都渡过了鸭绿江。后续部队第3个晚上也过了江。具有现代化侦察工具和器材的美国侵略军，竟没有发现中国人民志愿军25万人突然跨过了鸭绿江。敌人仍在疯狂冒进，仍然在狂妄叫嚣：没有发现中国军队过江，中国人不敢过江与美军对抗较量等等。

这次25万大军突然、迅速地跨过鸭绿江，竟没有被敌人发现，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入朝前，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3兵团后，干部、战士穿着什么军服问题，曾请示了中央军委，得到的答复是：将人民解放军的红五星帽徽和胸章摘下来，穿着不带中国人民解放军任何标记的原有服装。将要入朝前几天，上级发来了一批给团以上干部穿着的朝鲜人民军的军服。兵团首长规定师以上干部发给将军服装，团级干部发校官服装，都不带军衔。

师团以上干部们领着这一套从来没有穿过的较粗的呢料服装，既感到新鲜，又感到别扭，都不习惯，不想穿，还是愿意穿解放军的斜纹布衣服。兵团首长理解干部的心理，对着装就没有做硬性规定，穿哪套衣服都可以。入朝以后，当时是朝鲜初冬季节，我看到彭总穿着朝鲜人民军的将军服，但他将帽子上的大黄穗和裤子两边的宽红色呢子条纹都拆掉了，看来彭总是在穿棉衣前，用这套衣服御寒。

部队入朝后，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兵团部入朝后，夜间继续向前开进时，途中就遇到了向后撤退的朝鲜人民军，他们不给我们让路。有理说不清，我们又不能暴露是志愿军，这怎么办？

我想试一试人民军的将军服的作用。兵团司令部只有通信科长罗长波因是红军，资历最老，就给他发了一套将军服。我找到罗长波同志，对他说：“老罗，这下可以试试你的带大黄穗的将军帽，显不显灵了，请你的车开到前面去，举起帽子摇晃着，让人民军军官知道将军来了，看他们让不让路。”

老罗说：“好，我去试试看灵不灵。”当老罗站在车上，把将军帽举起，示意要人民军让路，这一招可真灵，人民军的军官看了这位

将军，马上向老罗敬礼，立即将他带的部队让开。

我笑着对老罗说：“罗子，这顶帽子还真灵，我看以后你的车子就在前面开路吧！”说完，我们都哈哈大笑。

10月25日，我军与敌人打响后，朝鲜人民军知道中国军队入朝支援他们了，也就不存在让不让路的问题了。

第三章

彭德怀临危受命，统帅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制定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方案

1950年10月1日，美军与南朝鲜军队越过朝鲜“三八线”，向朝鲜北部进犯。我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出兵援朝的问题。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过程中，苏联斯大林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朝鲜问题。毛泽东主席派周恩来同志率代表团去苏联，如实地将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告知斯大林。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意见，真实情况并不是像有些已出版的书所写的那样。还有有关中、苏、朝三方领导人在战争开始阶段前后，以及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各次协商讨论的情况等等的真实内情，我从兵团首长那儿听到了一些。这些都不属于我工作职责范围内的事，我不想写上层领导开会，特别是三国领导人商谈的情况。我认为只有真正了解和真正掌握党中央政治局开会的真实内情，以及中、苏、朝三国党和领导人会晤、协商讨论或电报来往的第一手资料的党史专家与历史学家（或者仍有健在的直接参加的有关工作人员），才能写出当时历史的真实情况，才可能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平、正确的评述。（我看到了当时随同周恩来同志去苏联会谈的俄文翻译，师哲同志写了这段历史的回忆录。他是亲自参加的翻译，我想应该是可信的。读者朋友如果感

兴趣，可以去找着阅读)

我还是写我亲自知道的彭德怀同志奉命紧急飞到北京的情况吧。

一、彭德怀紧急赴京受命，即飞沈阳与第13兵团和各军主要领导干部见面

1950年10月4日，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彭德怀，正在西安开会的会场，接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紧急命令，一分钟也没停留，即直接奔赴机场，乘派来的专机飞抵北京。

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命令：

“一、……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13兵团及所属38军、39军、40军、42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1师、2师、8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四、五、六略）

第13兵团首长和机关的同志们看到这个命令，由彭总来统帅入朝作战，都非常兴奋。我更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认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用人用得太好了，美军统帅麦克阿瑟是五星上将，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太平洋战区大出风头，被美、英、法等国军界称为“天才的、杰出的军事家”，并号称“麦克大帝”。而彭德怀是我军的副总司令、军委副主席，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几次临危受命，是享有盛名的常胜将军，被毛泽东主席赞誉为“彭大将军”。因此，麦克阿瑟肯定不是彭德怀的对手。因为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客观诸因素，而且还取决于双方主观指导上的能力，也就是毛泽东主席所说的：

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的智勇双全的将军。可以自豪地说，在双方统帅智慧与才能的较量上，我军就胜了美军一筹。

彭总受命的当天就乘飞机来到沈阳，并确定10月9日同兵团和各军的主要领导同志在沈阳见面。兵团首长和各军领导同志连夜赶到沈阳。兵团司令部只有我随首长到沈阳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前，我看到各军军长、政委对彭总来统帅指挥，个个都很高兴，胜利的信心更足了。但这两天不怕地不怕的战将，知道彭总很威严，都有些害怕彭总。

会议开始后，彭总见到大家很高兴，非常和气谦虚地说“同志们，你们这几个军都是4野的主力，解放战争时期我没有直接指挥过你们，这次入朝作战不一定能指挥得好。”到会的同志听到彭总这么讲，紧张的气氛顿时消失了，会场也变得活跃起来，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彭总，我们这些部队，都是您带出来的，我们个人也是在您培养教育指挥下成长起来的，现在由您来指挥，我们就更有信心了，一定能打胜美帝国主义侵略军，我们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彭总笑了，同志们也都笑了，这是上下级之间发自内心的相互信赖的笑。

晚饭后，我到邓司令房间，去请示有什么事要办，看到他与洪学智、解方在商量问题，解参谋长对我说：“毛主席要彭总明天就返回北京，我们正在商量将在安东研究的认为中央军委原定只过2个军太少了，建议兵团4个军3个炮兵师一次跨过鸭绿江去，直接当面向彭总建议。”我对这几位首长说话是没有什么顾忌的，脱口就说：“这是个好机会。”邓、洪首长去向彭总汇报后，回到房间很高兴地告诉我们，彭总同意兵团的意见，答应回北京向毛主席报告。

第二天送走彭总，邓司令要求各军领导同志返回各自驻地后，迅速向部队传达彭总的指示精神，认真地抓好贯彻落实，务必于10月15日前完成最后的准备工作，随时准备出动。

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根据我军入朝前的情况，定下志愿军入朝参战第一步的作战方针与部署

“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根据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可以越过朝鲜“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的指令，于1950年10月1日，命令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10月7日，美军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部进犯。美国为了欺骗世界舆论，防止我国出兵参战，特意宣称：“联合国军”只推进到距朝中边境40英里处，建立所谓“麦克阿瑟线”，作为缓冲地带。

1950年10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在沈阳召开第13兵团所属各军和炮兵指挥部的主要领导同志开会，宣布毛泽东主席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准备入朝参战的命令。同时，也是彭总与第13兵团各军主要领导同志第一次的见面会。下午，正当会议仍在进行时，毛泽东主席即来电，请彭德怀同志于10日即乘飞机返回北京，共商入朝作战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主席考虑到我军参战后的战争形势可能发生的变化，提出了必须作两种准备的战略思考。指出：既然出兵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与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并指出：“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的是歼灭其第8集团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注：以上均引自战士出

版社 1981 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同时，党中央、毛泽东还预料到，经过我军的有力作战，也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的可能性。

美国和韩国军队 10 月 1 日越过朝鲜“三八线”以后，当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对敌情的判断：认为美韩军越过“三八线”后，可能会要调整部署休整一段时间，然后再发动向平壤、元山及以北朝鲜的进攻。

根据以上的判断，因此，提出了志愿军第 13 兵团入朝作战初期的指导方针与任务是：积极援助朝鲜人民反抗侵略者，保持一块革命根据地，作为相机消灭敌人的基地。同时还指出，在敌人技术装备优势和朝鲜地幅狭小的条件下，我军过去在国内战争中所采取的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的方针已不一定适合于朝鲜战场，因而我军在朝鲜战场，要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配合的方针”。“敌人来攻，我们要把它顶住，不使前进；发现敌人有弱点，即以迅速出击，插入敌后，坚决消灭之。保守土地是我们的任务，但更主要的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指出：“我们的战术应是灵活的，不是死守某一阵地，不是单纯防御，最好是既能消灭敌人，又能守住阵地。”（注：引自《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

中央军委决定：首先着东北边防军第 13 兵团 4 个军 12 个师和 3 个炮兵师出动，入朝参战；随后抽调第 9 兵团 3 个军 9 个师作为第二批兵力入朝参战；再准备抽调第 3 兵团、第 19 兵团作为第三批兵力，进入朝鲜作战。

中央军委在作战的具体指导上，决定我第 13 兵团 4 个军、3 个炮兵师入朝后，先在“元山、平壤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注：引自 1981 年战士出版社《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并于平壤、元山线以北（即朝鲜半岛最仄狭部位，我们称蜂腰部），德川、宁远公路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线。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待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另外，党

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国内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都作了部署。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3兵团领导同志遵照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关于入朝作战初期的作战方针与任务后。定下的决心与部署是：兵团各军和3个炮兵师入朝后，采取“以积极防御，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以反击、袭击、伏击来歼灭与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的作战方针，先在龟城、泰川、球场、德川、宁远、五老里（咸兴以北）一线，利用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组织防御，制止敌人的进攻，稳定战局，以争取时间，掩护朝鲜人民军北撤整顿，为尔后作战创造条件。

第13兵团入朝后具体部署是：以第38军、第42军从吉林省集安地区的江桥跨过鸭绿江，第38军并指挥第42军一个师沿满浦，江界至熙川的铁路前进，尔后转向东至德川、宁远地区前进，第42军主力（欠一个师）沿黄草岭、长津湖向五老里、咸兴方向前进。第40军从辽宁省长甸河口、安东（现丹东市）江桥跨过鸭绿江向球场方向前进，第39军从安东江桥跨过鸭绿江向价川方向前进。预定以39军、40军占领平壤以北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展开防御作战；以38军及42军1个师占领德川、宁远有利阵地，构筑工事，展开防御作战；第42军主力（2个师）向咸兴以西、元山以北占领有利地形，构筑防御工事，进行防御，以掩护第38军左翼。3个炮兵师随40军、39军后开进，待各军进至展开地区后，根据敌情的变化，再将炮兵具体配属给主要方向的军支援作战。

10月19日，兵团部跨过鸭绿江的当晚，兵团邓华司令员来到作战室，对我问道：“敌人越过‘三八线’后，有什么新的情况？”

我指着地图汇报说：“敌人越过‘三八线’后，看来朝鲜人民军似乎已没有力量组织抵抗，仍向后撤退。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根本没有想到中国军队会出兵援朝，他认为中国军队也不敢与美军作战，因此，敌人越过‘三八线’后，并没有停止进攻，正在分兵向北冒进。”

邓华司令又很习惯地问道：“你根据这些新的情况，进行分析研

究了没有？”

我回答说：“我们作战室的同志进行了研究，正准备去向司令汇报呢。”

邓华司令说：“你派参谋去请洪副司令员和解参谋长来作战室，我们一起听取你的汇报，研究处置措施。”

洪学智和解方很快来到了作战室。

邓华说：“我们共同来听听杨迪的新情况汇报。”

我将刚才向邓司令汇报的新情况重复了一遍，然后将我们作战室研究的意见汇报说：“敌人是机械化，乘着汽车分路向北冒进。因此，我军入朝后，很可能是敌人先我到达我预定防御作战地区，甚至会超越我预定防御作战区。因为我军正在分路跨过鸭绿江，刚进入朝鲜，距离预定战场，最近的有120公里，最远的有270公里，敌人乘四个轮子的汽车比我军两条腿走得快多了。因此，我们认为我军在向前开进中，就很有可能与疯狂冒进之敌发生遭遇战。而且这种可能很大。我们建议：电令各军、师在向前开进中，作好与北犯之敌进行遭遇作战的准备。”

邓华司令员一边听我汇报，一边吸着烟，沉思着。当我汇报完后，他即说道：“敌人不停地向北冒进，是敌人仍没有发现我军入朝，才敢于放胆分路进犯。杨迪在地图上所指我军到达预定战区的距离，我认为我军已不可能进到预定地区组织防御了。很大可能而且可能会很快在行进中与敌人遭遇，以遭遇战的样式，打响抗美援朝战争。”

邓华停了一下说：“在没有得到彭总与中央军委命令以前，我兵团各军仍按原定计划向朝鲜开进，但要即电令各军在行动中做好与敌遭遇战的准备，各级指挥员要靠前指挥，师指挥所随先头团、军指挥所随先头师行进，以便能迅速处置各种可能的突发情况。老洪、老解如你们同意，即迅速起草电报发给各军、师。”

洪学智、解方同志同意邓华司令的意见。我即迅速起草电令，将敌情新的变化和兵团新的处置措施电令各军、师。

三、兵团正抓紧跨过鸭绿江的出动准备工作，突然接到毛泽东电报，令兵团原地训练，不要出动

兵团邓、洪、解首长回到安东后，立即传达了彭总的指示，要求司令部抓紧这5天时间，一方面督促检查各军、师的最后准备情况，一方面检查兵团机关和直属队的各项准备工作是否完全落实。

为了便于部队迅速过江，我向兵团首长提出了各军应向鸭绿江边秘密靠近的建议。即39军应从沈（阳）大（连）线向安东、长甸河口附近集结；40军主力从宽甸移至长甸河口和永甸一带，其另一个师进至安东郊区集结；38军应从通化向辑安地区集结；42军向通化以南地区集结；各炮兵师亦应尾随各军南移。各军应提前派出先遣队过江，按兵团指定的地区选择隐蔽集结地域。为避免敌机发现与遭轰炸，规定部队均于夜间过江，拂晓前进入朝鲜境内松树林内隐蔽宿营。兵团首长接受了这个意见，发出了部队秘密向鸭绿江附近集结的命令，并上报了中央军委。

兵团正在进行最后的紧张的过江准备工作之际，突然收到毛泽东主席10月12日20时电令：“十月九日命令暂不执行，十三兵团各部仍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毛主席的这一决定，在当时不仅使我迷惑不解，就连兵团首长也搞不清原因。10月15日，彭总来到安东，向兵团领导说明了原因，主要是苏联斯大林原来答应我军入朝后派空军支援，可是当毛主席决定真要出兵抗美援朝时，斯大林又不相信我们能打胜，怕出动空军会引起美苏直接对抗，从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不愿出动空军支援了。对此，毛泽东主席在命令部队原地训练的同时立即召集中央政治局开会，慎重地作了分析和研究，中央政治局决定，不管苏联空军是否支援，我们都要入朝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

四、彭总到安东第13兵团部，召开师以上干部会，宣布出兵援朝

10月16日，彭总在安东召开了兵团师以上干部会议，分析了当前国际形势和朝鲜战场的情况，传达了党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主席决心出兵支援朝鲜作战，以及整个作战方针和原则，并明确指示我军10月18日或19日一定要出动。

10月18日，彭总又奉命乘专机返回北京，临行前向兵团领导同志再三嘱咐，不要动摇犹豫，坚决按计划准备过江。

10月18日21时，毛泽东主席下达了第13兵团于10月19日晚开始跨过鸭绿江的命令。（后来彭总秘书告诉我，这个命令是彭总代毛主席起草的）

10月19日上午，彭总乘专机回到安东，正好朝鲜人民军次帅朴一禹（注：朝鲜人民军只有金日成是元帅，下有三位次帅，朴是其中之一）急急忙忙地过江来要求见彭总。他说，朝鲜战场的情况已很危急，金日成首相请求中国军队赶快过江支援他们。当彭总坚定地告诉他，今晚就出兵时，朴一禹感动得流下了热泪，连声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紧接着他把这几天的战争情况向彭总和第13兵团首长们作了介绍，现在敌人进攻的势头很凶，平壤很快就要陷落，麦克阿瑟还狂妄叫嚣要在美国的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整个朝鲜。朴一禹还转达了金日成首相邀请彭总迅速入朝相见，以共商作战大计。彭总当即决定10月19日午饭后要朴一禹同志立即陪他过江，去会见金日成首相。彭总临行前，指示邓华组织好兵团部队，按规定的时间迅速过江，向朝鲜开进，支援朝鲜人民和人民军抵抗美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

1950年10月19日午饭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在朝鲜人民军次帅朴一禹的陪同下，乘汽车从安东跨过鸭绿江桥，进入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外相（即外交部长）朴宪永在鸭绿江边迎接彭总。陪同彭总从新义州向东北朔州方

向飞驰，在大洞（北镇西北）与金日成首相进行首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见。

1950年10月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3兵团及所属部队，分东、中、西三路，从辑安、长甸河口、安东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开始了伟大、光荣的抗美援朝战争。

第四章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彭总要亲临前线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组成，志司召开第一次作战会议

一、1950年10月19日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

在制定部队开进计划时，我即向邓、洪、解首长建议，这是出国作战，建议兵团部应不同于在国内的行动，而是在开始过江时即进入朝鲜境内，这表明我们兵团指挥机关已随第一梯队师进入朝鲜指挥作战，这是很有意义的。首长们很同意我的意见。我就把兵团部开进计划列在中路，即在长甸河口随第40军118师前卫团后行动。

10月18日21时接到毛泽东主席的电令：第13兵团于19日晚开始入朝作战的行动命令后，第13兵团首长即向各军、师下达于当日（19日）黄昏，开始按既定开进计划，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的具体行动命令。第13兵团部也即开始行动。洪学智副司令指示解方参谋长率兵团部乘汽车，经宽甸从长甸河口过江。邓华司令员和洪学智副司令他们则在部队开进前，乘汽车从安东过江，然后从义州向东北到水丰、朔州之间兵团预定进驻地与我们会合，刚到兵团的韩先楚副司令员，则到第40军随该军行动。

解参谋长对我说：“在我国境内行军，已进行过演练，兵团部向长甸河口开进就交给你负责实施。”他和政治部杜平主任乘汽车先到长甸河口去等我们。

我接受任务后，即按预定开进计划，将兵团部分成3个梯队开进，第一梯队于19日15时出发，第2、3梯队随后，各梯队间隔30分钟出发，以尽量缩小部队开进的目标。我检查了各梯队乘车情况，他们都按计划要求落实工作做得很好。我即交待司令部管理科协理员和政治部民运部的同志，待各梯队行动后，逐个检查兵团各部门是否有遗留的文件或物品，驻地是否打扫干净了，看看留守人员的安置情况，然后赶上收容车，归队后向我汇报。

1950年10月19日黄昏后，第13兵团部从长甸河口随第40军118师前卫团后跨过鸭绿江，在距离江岸约10公里的松树林里设营，以便让第40军部队向前开进。兵团司令部立即架起电台，发电报告中央军委，兵团部已跨过鸭绿江，于10月19日20时，进至朝鲜境内朔州西北地区松树林设营，并报告了各军的开进情况。同时，密切地注意接收各军、师可能发来的密语信号，以便及时掌握和处置情况。为确保我军过江作战的突然性，严防泄漏行动秘密，规定部队在开进中一律实行无线电静默，但必须在大休息及宿营时架设电台，注意收听兵团发出的信号。如部队与敌人遭遇，即可使用电台或无线电话迅速向上级报告情况。

设营后不久，通信科罗长波同志急急忙忙地来告诉我，他说：“不知什么原因，彭总所带电台叫不出来，电报发不出去，怎么办？”我听着急了，说：“这怎么办？老罗，这就只有靠你们了，请密切注意收听。我去报告首长。”老罗走后，我即将与彭总所带电台联络不上的情况报告了邓、洪、解首长，他们都很着急，但又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耐心地等待了。

进入朝鲜境内后，我们发现沿公路的所有洞、里（朝鲜称村、屯为洞、里），都被敌人轰炸成了废墟，我军宿营无法进驻洞、里，幸好朝鲜境内松树林很多，每个山丘都有成片的松树林子，很有利于我军的隐蔽，成为我军入朝后的宿营处，部队白天都进入松树林里宿

营，并挖灶埋锅烧水做饭。

二、朝鲜战场情况突变，毛泽东和彭德怀改变决心的电报不谋而合

就在我军跨过鸭绿江的当天，即1950年10月19日，侵朝美军攻占了平壤。20日晨，我收听到这一消息后，即向邓、洪、解首长汇报并提出意见，认为原计划我军进至宁边、球场、德川、宁远、五老里（咸兴西北）一线组织防御的方案已无法实现，很可能出现与北犯之敌遭遇的局面。兵团首长指示我，先将敌情通报给各军、师，要求各级指挥员要提前随先头团行动，以临战姿态前进。随即，邓、洪、解首长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形成了从运动中歼敌的新的作战决心与方案，但要改变原定决心和进行运动中歼敌的部署调整，必须要请示彭总决定。可是兵团的电台与彭总的电台一直联系不上。

就在这紧要关头，兵团收到毛泽东主席21日电令，命令兵团放弃原定作战计划，改为从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方针，并令邓、洪迅速与彭总会合，以便于指挥。

毛泽东主席根据敌人疯狂冒进的新情况，审时度势，当机立断，10月21日电令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放弃原定作战计划，改为从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方针，指出：“现在是争取战机的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还特别指出：此时是歼灭南朝鲜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仗胜利，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并令邓（华）、洪（学智）迅速与彭总汇合，以便于指挥。（这时，彭总正在朝鲜境内大榆洞以南大洞山沟里，与朝鲜金日成同志商谈朝鲜形势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等大计、方针问题。）

兵团首长对与彭总所带电台仍然联系不上很是焦急，我立即跑到电台问电台队长这是怎么回事，电台队长告诉我，就是收听不到信号。我很着急，就请通信科长罗长波亲自上台收听。直到当日（即21日）黄昏，才与彭总的电台沟通，收到彭总给邓、洪、韩（先

楚)、解并报毛泽东主席的电报,其大意是:因敌情剧变,疯狂向北进犯,因此决心改变原定进至朝鲜蜂腰部组织防御的计划,而采取以运动战方式歼灭敌人。

具体作战部署是:命令第38军并率第42军1个师沿满浦至平壤铁路,公路迅速南下,直插至军隅里,沿途如遇前进之敌,不要被敌缠住恋战,务必迅速插至军隅里,截断美军第8集团军的后路,形成包围清川江以北美韩军的态势;第40军向球场以北方向进攻,前进中即采取迂回包围歼灭冒进之敌;第39军向宁边、云山进攻,在前进中如遇冒进之敌,即迅速展开包围歼灭冒进之敌;第66军以临战姿态迅速向泰州方向前进,遇敌人即迅速展开包围歼灭冒进之敌;第50军主力迅速沿新义州至平壤铁路前进,迂到冒进之敌,即迅速展开,能包围即包围歼灭,不能包围即展开坚决阻击敌人向新义州方向冒进。炮兵配属第38军、第39军、第40军各1个师。彭总的电令中并明确指出,只要我第38军能不顾疲劳,勇猛迅速地插到军隅里,截断敌人的后路,就是最大的胜利。就会使冒进之敌,全线动摇,给我各军创造在清川江以北,各个包围歼灭敌人的大好的条件与机会。

彭总在电报的最后,令邓(华)、洪(学智)、韩(先楚)立即去与他汇合。共同商定改变作战计划与各军作战行动的部署。

兵团首长看到彭总的电报与毛主席的电报是一致的,最高统帅与战区统帅的决心不谋而合,都非常高兴。即要我先将毛主席和彭总改变决心的电令迅速转发各军,并令各军充分做好行进中与敌遭遇作战的准备,各级前进指挥所即随先头部(分)队行进,以便及时处置发生的情况。兵团新的作战命令,待请示彭总后下达。

我还建议说:“现在彭总在大洞(北镇西北)与金日成首相会晤,那么我们兵团部是不是可暂进至大洞以西的大榆洞开展工作。那里是个金矿区,有矿洞便于防空。”兵团首长们看了看地图,与大洞只一山之隔,即表示同意,要解参谋长带兵团部进驻大榆洞。邓华、洪学智即驱车去彭总处。韩先楚因当时随40军行动而没有去。

10月22日拂晓,兵团部进至大榆洞后,便迅速展开了工作。23日拂晓,彭总在邓华、洪学智陪同下来到大榆洞。我即找彭总带来的

通信处长崔伦同志，询问 21 日白天联系不上的原因，崔伦同志告之他们乘大卡车夜间行驶，速度跟不上彭总乘的小汽车，因而失去联系。崔伦同志说：过鸭绿江后，与迎接彭总的朝鲜外务省外务相（外交部长）朴宪永相遇后，朴宪永外相与朴一禹次帅请彭总乘坐他们的小轿车去会见金日成首相，他们的车子开的更快了，因此，掉队一昼夜，直到 21 日黄昏才找到彭总。

我听后很受启发，大卡车不适于和小吉普车同行。即与管理科长商量，设法准备一、两台中吉普车，以便首长出发时带电台报务员和译电员用。

三、10 月 25 日，抗美援朝战争以遭遇战方式，在朝鲜西线与东线同时打响

南朝鲜军与美军于 10 月 1 日开始，越过“三八线”后，没有遇到朝鲜人民军的有力抵抗。东路进犯之敌于 10 月 10 日占领元山，17 日占领咸兴；西路进犯之敌于 10 月 19 日占领平壤和阳德、成川。朝鲜党和政府和军队向中朝边境的江界（拟迁都江界）、新义州方向实施战略退却。

在这种情况下，敌人的气焰极为嚣张，认为平壤的陷落，“象征着北朝鲜的彻底失败”（引自《麦克阿瑟回忆录》），还错误地认为中国不敢出兵参战，而且出兵的有利时机已经过去。于是，麦克阿瑟狂妄地叫嚣要在美国“感恩节”（11 月 23 日）前结束朝鲜战争。为此，迅速改变了建立缓冲区的计划，命令西、东两线军队迅速向北进犯，一直可以进犯到中朝边境的鸭绿江与图们江边。

我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13 兵团，正是在敌人占领平壤的 10 月 19 日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的。在敌人疯狂北犯情况下，已不可能按预定作战方针与作战计划，在朝鲜蜂腰部建立防御地带阻止敌人进犯了。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根据敌情的剧急变化，迅速适时变更我军的作战计划。决心放弃阵地防御战，改为在遭遇战、运动战中歼灭冒进之敌。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3兵团所属各军在朝鲜战场上西线第40军、东线第42军与进犯之敌同时遭遇，从而西、东两线同时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

在朝鲜战场西线，敌军以师或团为单位，继续冒进，其先头部队南朝鲜军第6师第7团已进犯至我鸭绿江边以南朝鲜境内的楚山地区。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命令第13兵团第40军第118师采取同敌人预期遭遇的战斗姿态，进占北镇至温井公路以北高地，准备阻击向前冒进之敌，令120师1个团（第360团）占领云山以北一线阵地，准备阻击由云山北进之敌。10月25日7时许，南朝鲜军第1师先头部队在云山至温井公路上，遭我40军120师360团迎头痛击。10时许，南朝鲜军第6师第2团一个营及一个炮兵中队乘车进至下半洞至两水洞之间，遭我40军第118师突然猛烈的攻击，将敌全部歼灭。

在朝鲜战场东线，敌南朝鲜军首都师（这是南朝鲜“总统”李承晚的近卫师）美军第10军与从元山、咸兴登陆后，正沿五老里、长津湖向黄草岭进犯，企图从东侧直插中朝边界的江界，破坏朝鲜在江界组成临时首都。南朝鲜军首都师第一梯队，正向黄草岭方向进犯。10月下旬这一带天气已很寒冷，高原已被白雪铺满山林，气温已是摄氏零下10℃。敌人一方面被寒冷冻得受不了，一方面也万万没有想到中国人民志愿军会在这个方向出现。因此，他们懒懒散散地向前进。

我第42军率2个师则是奉命直奔黄草岭，阻击东线敌人的进犯。为了与敌人抢时间，第42军第124师副师长肖剑飞同志与向后撤退的朝鲜人民军指挥员（该指挥员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当过连长）说明情况，请他借给卡车，将我军运输一个营去迅速抢占黄草岭，掩护人民军后撤。撤退的朝鲜人民军看到中国军队增援来了，他们既非常惊讶，又非常高兴，这是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的。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后，他们感到有救了。该指挥官告诉肖剑飞同志，敌人在后面追进，可能于25日晨进占黄草岭，并立即同意抽调18辆卡车，运送中国军队前去。肖剑飞副师长即令第124师370团2营轻装乘汽车高速

行驶，必须于10月24日夜晩，于敌人进犯到黄草岭之前，到达黄草岭并迅速展开占领有利阵地，阻击敌人。

第42军第124师在东线黄草岭与南朝鲜首都师也于10月25日晨展开了遭遇战。遭遇战的时间是与西线第40军与南朝鲜第1师、第6师遭遇同时展开的。因此，应该明确于10月25日，是西线、东线同时首先打响抗美援朝第一枪的。由于当时第13兵团司令部在西线，又距温井很近，首先接到第40军与南朝鲜军交战的电报后，彭总极为高兴，就要亲自到温井第40军前线去指挥，而后才收到第42军已于10月25日晨在黄草岭与南朝鲜军首都师遭遇打响的电报。彭总看完第42军的电报后，即将电报交给邓华等副司令员传阅，他非常高兴地说：吴瑞林（第42军军长）干的很好，他们在初冬寒冷的高山峻岭能迅速地赶到黄草岭阻住了敌人，保障了由崔庸健同志（朝鲜人民军次帅、朝鲜人民议会委员长，朝鲜劳动党的第2号人物）率领的朝鲜党政领导机关同志们撤退至江界的安全。这就使我对东线放心了。彭总即亲自迅速地起草了一份嘉奖第42军的电报。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到底是谁打响第一枪的问题，我曾在2000年纪念抗美援朝战争50周年时，专门与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的权威专家孟照辉同志通了电话。他说：应该公平地说是第40军、第42军首先于10月25日同时在朝鲜西线与东线打响第一枪。现在战争已经过去50年了，不宜再争论哪个军、哪个师、哪个团打响第一枪，而应该说是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批部队，即第13兵团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枪，这样说是公平的，也是符合于历史事实的。我很同意孟照辉同志的意见。

四、10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以遭遇战的方式打响后，彭总立即要到前线去指挥

1950年10月25日7时许，兵团司令部接到40军120师的报告，该师360团在行进中与由云山向北进犯的南朝鲜军第1师先头部队遭

遇，歼其一个营大部。10 时许，又接到 40 军 118 师报告，在两水洞（北镇东南）与南朝鲜军第 6 师第 2 团先头营遭遇，迅速全歼该敌。

我把收到的这些密语电报情况，翻译出来后，立即报告彭总和兵团首长。彭总即要到 118 师指挥所去。兵团领导知道彭总指挥作战的特点，只要战斗打响，他就要到第一线去亲自观察战场情况和指挥作战。如果对彭总说为了他的安全，请他不要前去，那他就会发脾气说：打仗还怕死吗？他就更会坚持要到前线去。

于是，邓华、洪学智对彭总说：“彭总，部队是在行进中遭遇作战，指挥位置随时都会变动，我们现在了解的 118 师指挥所，您到后，又不知道该师指挥所转移到哪儿去了呢，况且战争已经打响，其他各军也会迅速与敌人打响的。整个战场情况将要发生很大变化，正需要您根据各军战况发展情况，下达新的指示或定下新的决心。现在正是紧要关头，不能离位呀！”经邓华、洪学智劝说，才劝阻了彭总。

彭总随后即要和这两个师的指挥员通电话。我不了解彭总的特点和习惯，想说明兵团与第 118 师、120 师距离较远，架设有线电话困难时，洪学智副司令员及时制止了我说话，对我说：“杨迪，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赶快派通信分队去迅速架通电话。”

我出来后，感到很为难，但一想到这是彭总给兵团司令部的第一个指令，困难再大也得坚决完成，否则，是无法交代的。于是，我找罗长波科长商量，把带来的被覆线都用上，先架通 118 师的电话。为加快架线速度，我与老罗还想出了一个我军从未用过的新方法，即用吉普车装上电线，通信兵坐在车上放线，用三轮摩托车带通信兵跟随整理线路；同时通知 118 师通信分队往兵团部方向架线，2 个小时内必须架通。

当 2 个小时内将电话架通了，我向洪副司令员报告后，洪学智副司令笑着对我说：“你刚才要向彭总说什么我知道，如果说出来，一定会挨彭总一顿骂。彭老总指挥作战特点之一，就是只要战斗一打响，就要亲自到第一线指挥所去，就要亲自同前线指挥员通电话，直接了解情况和下达命令。”我听后感到应尽快找彭总的秘书杨风安同

志了解首长的特点，否则就当不好彭总的参谋。

洪学智副司令将架通了 118 师的电话情况报告彭总时，彭总高兴地笑了。即要洪学智去与该师长通话，并作了许多指示。

五、彭总正式宣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就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这一天，1950 年 10 月 25 日，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大榆洞正式宣布了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命令：任命邓华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任第二副司令员，韩先楚任第三副司令员，解沛然（即解方）任参谋长，杜平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宣布，经与金日成首相商定，为了便于中朝两军的协同与相互通报情况，朝鲜人民军次帅朴一禹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并决定将彭总所带人员与第 13 兵团司令部合并，组成志愿军司令部。

朝鲜人民军次帅朴一禹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在中国华北太行山区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中的一位中层领导干部。他中国话讲得很好，八路军的传统作风很熟悉，抗日战争胜利后，才返回他的祖国。

为便于彭总指挥，兵团党委决定，凡是彭总带来的干部都任志愿军司令部各处的正职，13 兵团的干部任副职。

解参谋长随即召集 13 兵团司令部干部开会，说：“兵团党委开会决定，彭总带来的干部到各处任正职，我们兵团的原正职干部改任副职。”

解参谋长说：“兵团党委这一决定是很正确的，我们司令部的同志们不仅组织上要服从，而且思想上一定要想得通，虚心向彭总带来的领导干部学习，真心诚意地接受他们的领导，主动搞好团结，虽然是副职，但搞不好团结或者工作上有大的失误，主要责任要由我们来负，因为各处绝大部分同志都是原第 13 兵团的人员。现在战争已经打响了，不容许我们有个人的私心杂念，要全心全意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一切为了当好彭总的参谋，使志愿军司令部迅速、有效地运转

起来，使彭总的指挥能得心应手。”

解参谋长还说：“彭总原想以他从北京带来的小型班子为基础组建志司。但在他入朝前后的短时间内，对第13兵团司令部的战前组织准备，拟制作战行动计划和组织指挥部队开进等工作，是比较满意的，认为兵团组织指挥能力不错，而且战争已打响，来不及组建新的指挥机构了，于是就决定以兵团司令部为基础组建志司。这是彭总对我们兵团最大的信任，我们一定要珍惜彭总对我们的信任和对我们的期望。”

我们这些兵团司令部的科长们听了解参谋长语重心长的讲话，心情都很激动，一致表示：请参谋长放心，我们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一定尊重正职的领导，主动搞好团结，迅速地、协调地把志愿军司令部很好地运转起来，尽最大的努力当好彭总的参谋，使彭总能得心应手地运用司令部和通过司令部指挥各军打胜仗。

随后，解参谋长请彭总带来的干部与我们一起开了会，相互介绍认识，会议时间很短，但气氛很好、很融洽。

这样，志司作战处处长由丁甘如同志担任，我任作战处副处长。并将总参作战部来的一名参谋成普同志编在作战处任副处长，仍留在彭总身边工作。

六、在云山，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次直接与美国侵略军交战，我第39军取得首战美军骑兵第1师的辉煌胜利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部队，已在西线与东线同时与南朝鲜军队从遭遇中打响。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错误地判断了情况。“总司令部进行种种猜想：中国人在虚张声势，保住脸面，或仅仅是试图保护鸭绿江上的许多水电站而已。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从情报来源得到他们（注：

指中国)的部队已进入北朝鲜的任何确凿的证据。”(引自美国小克莱·布莱尔著《麦克阿瑟》一书)因此,麦克阿瑟命令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仍按照原定的迅速占领全朝鲜的计划,一面调整部署,一面向朝中边境进犯。美军第8集团军虽然调整了部署,但其兵力仍处于分散状态,且对我军情况尚不明了,仍然盲目地向北冒进。

当时,我志愿军司令部则对敌军兵力和部署已基本掌握,而且我入朝参战部队已经全部进入朝鲜境内展开(注:除原有第13兵团4个军外,西线又增加第66军、第50军)。敌我在清川江以北的兵力对比是:美军有2个师1个旅(美军第24师、骑兵第1师、英军第27旅)共有兵力5万余人,还有南朝鲜军1个军团。我军可集中10至12个师(第38军、第39军、第40军及第66军、第50军两军主力),兵力共达12万人至15万人参加作战,我军地面兵力占优势,但火力上敌人有大量的炮兵与坦克,还有空中支援,我军没有制空权,这些方面敌人占优势,我军处于劣势。

根据对敌我情况的分析研究,彭总与志愿军其他几位首长确定,决定采取以我之长击敌之短。决心:采取从侧后向敌迂回,结合正面突击的战术,集中兵力,各个歼灭云山、泰川、球场地区之敌,首先歼灭南朝鲜军第8师、第7师、第1师,然后视情况再歼灭美、英军一部。彭总将这一决心电报了毛泽东主席,经毛主席批准同意,毛主席并指出:此战只要我第38军全部及第42军1个师,能确实切断敌人清川江后路,其他各军、师能穿插至各部敌人的侧后,实行分割而各个歼灭之,则必能取得胜利。

彭总和志愿军其他首长,于11月1日9时向各军下达了具体的作战电令,我在这里就不详细记述了。各军遵照彭总的命令于11月1日黄昏开始,先后向敌发起进攻。

第39军原定于11月1日19时30分向云山之敌发起进攻。但在15时30分第116师发现云山敌军有撤退迹象(实际上是美军骑兵第1师第8团向前开进,接替南朝鲜军第1师12团的防务)。我第39军第116师师长汪洋、政委石瑛,了解这个情况后,立即向第39军

首长建议，提前向敌发起进攻。该军首长接受了这个正确的建议，即决心全军3个师展开，在炮兵火力支援下提前2个半小时，于11月1日17时发起进攻。激战至2日凌晨攻占云山，发现敌人是美军，该军116师毫不畏惧，愈战愈勇，将撤退之美军骑兵第1师第8团直属队与第3营包围于云山以西之诸仁桥地区，展开白昼的激战，敌人在飞机、坦克的支援下，拼命突围，均未得逞，至3日夜，我将被包围之美军全部歼灭。与此同时，美军骑兵第1师派第5团来增援第8团，我担任阻击任务的第115师第343团浴血奋战，将敌击溃，有力地保障了云山歼灭美军战斗的胜利。

云山战斗，是我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次以劣势装备，在没有空中飞机与坦克、大量炮火的支援下，歼灭了具有空中优势的现代化装备的美军骑兵第1师第8团大部（美军说：第1营、第2营“损失惨重”，第3营“成为中国人的牺牲品”）和南朝鲜军第1师第12团一部，共计打死打伤和俘敌2000余人（其中美军1800余人），缴获飞机4架、击落飞机3架，击毁与缴获坦克28辆，汽车170余辆，各种火炮119门。给美国开国战争中的“王牌军”美骑兵第1师以沉重打击，大灭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这是我军主力师（116师）对美军主力师（骑兵第1师）第一次面对面的大较量，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第二任总司令李奇微上将在他的回忆录中描写云山战斗中写道：“战斗持续了一整夜，不时发生近战，其激烈程度是以往战争中所没有的。”“中国人对云山西面第8骑兵团第3营的进攻，也许达到了最令人震惊的突然性。”

彭总收到第39军电报在云山歼灭美军骑兵第1师第8团大部及南朝鲜军第1师12团一部的报告后，极为高兴与兴奋，立即给第39军发出了嘉奖电令，指出我志愿军入朝参战打响后，这是第一次与美军直接交战，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并特别嘉奖了第116师。我们志司的同志们都为之振奋，我们第13兵团的同志都知道第116师在第四野战军几个主力师中，是敢于打硬仗、打恶仗的师之一。而且每逢遇到这样的战斗，总是能够战胜敌人，取得胜利。

七、战局瞬息万变，志司作战处紧紧围绕彭总的意图、决心，夜以继日地工作。作战处与各兵团、各军建立了密切与信任的关系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进行的第一次战役，从10月25日开始，到彭总11月4日下令结束战役行动。在这10多天的时间里，随着战场情况的不断变化，彭总的决心和部署，每天都有新的局部的或对某个军的行动都有调整，较大变动就有5次之多。这样，志司作战处始终处于高度紧张之中，日以继夜地进行工作。当时的志司作战处，除彭总带来的2位正副处长，基本上是原13兵团作战科的人员。我深深感到，战争情况瞬息万变，作战处要给首长当好参谋，围绕彭总意图做好工作，就得调动大家的积极因素，同心协力地发挥整体作用。丁甘如处长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就是我的领导，我对他很尊重，主动协助他开展工作，要求全处同志服从丁处长的领导。丁甘如则主动提出，他多往彭总那儿跑一些，处里的工作要我多管一些。

尽管工作量很大，同志们也都很紧张、很辛苦、很疲劳，但由于组织得好，各项工作做的井然有序，任务完成的相当出色。我们及时了解判断敌情，掌握部队行动情况，为彭总下定决心和调整部署，提供准确的依据。遵照志愿军首长的意图，不断拟制和修正新的作战计划，并向各军、师下达指示和命令。

在分析研究敌我双方情况的过程中，作战处的同志深感我方兵力不足，适时地提出了增加兵力的建议。当时知道第3野战军第9兵团正准备入朝参战，但该兵团在山东省南部集结，距离较远。现在增兵要来的迅速，才能赶上参战，我们知道华北的第66军在天津，是最近的一个军，就建议志司首长向军委请示，速调天津的第66军入朝，以弥补新义州、龟城、定州方向我军兵力不足。战斗打响后，第66军增援上来了，仍感兵力不足，又建议令第50军迅速过江参战。东

线美军第10军向黄草岭、长津湖方向进犯，我42军只有2个师防御，力量很单薄，又建议请求军委急调第9兵团从辑安过江进入朝鲜，投入东线作战，等等。

从第13兵团指挥4个军和3个炮兵师，发展到志司指挥9个军和炮兵、工兵，以及后方兵站等，人员和建制单位都有很大增加，这对志司作战处组织协调和计划工作的能力是个考验，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便于指挥，对那些新入朝参战部队指挥员的特点和司令部的指挥方式、方法，志司作战处就应尽快地了解 and 熟悉，做到心中有数。为此，我就主动和丁甘如同志研究，采取派人去或请他们来的办法，沟通相互间的联系，深入地了解有关情况。我还要求处里的同志们，要尊重各兵团、各军、各师首长，处理好与各兵团和各军作战处（科）之间的关系。这样，我与后来入朝的各兵团作战处及兵团、军的首长们都相处得很融洽。各兵团司令、政委，以及各军的领导同志和司令部对志司作战处下发的电报、通报和其他文书，都认为客观公正、符合事实，进而产生了相互间的信任，从未发生过下面领导同志向志愿军首长反映作战处有什么问题。以后，我与这些司令、政委和军长、政委见面越来越多，他们对我更进一步的熟悉了解，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几十年后还都记得我。1983年，志愿军老副司令洪学智、韩先楚、杨得志和老参谋长解方要组织编写《抗美援朝战争史》，都第一个想到了我。解方参谋长亲自打电话给我，要我到北京去具体组织编写工作。到北京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立即接见了我，（韩、解还是在医院接见的）并立即授予任务。原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后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的宋时轮得知后，还派车把我接到家里。原19兵团司令员后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的杨得志，经常向有关领导同志询问我的情况。原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1991年9月来沈阳军区，见到我不等介绍就直呼我的名字，关心地询问我的情况。他还开玩笑说：“我们都姓杨，你是小杨，我是老杨。”我也笑着说：“老司令，我在你面前，永远是小杨。”

八、第1次战役后，志司召开第1次作战会议，彭总严厉批评了第38军

1950年11月13日，志司在大榆洞召开第一次党委会。各军军长来参加会议。主要议题是总结第1次战役和部署第2次战役。实际上是一次作战会议。

因为第1次战役旗开得胜，将敌人打退到清川江以南去了，来参加会议的各军军长都很高兴。

第38军军长梁兴初见到我即笑嘻嘻地问我：“杨迪，你准备了狗肉没有？我很想吃朝鲜的狗肉。”

我说：“梁军长，朝鲜的洞、里（即是中国的村）都被美军飞机炸毁了，我到哪儿去找狗呀。根据现在很困难的条件，我尽所能只准备了猪肉、牛肉罐头。”

梁兴初军长说：“弄不到狗肉，那猪肉、牛肉也行，是不是还可以炒盘鸡蛋？”

我说：“梁军长，你尽出难题，我要管理处尽量想办法让你们几位军长大人吃好一些。”

其他几位军长在一旁对梁兴初说：“老梁，你看这荒无人烟的矿洞，你要杨迪到哪儿去给找狗肉吃，不要难为他了，这不是在国内，是在国外呀！”大家都哈哈大笑。

邓华、洪学智副司令员走来，对各位军长说：“你们不要太高兴了，给你们打个招呼，这几天彭总情绪不太好，我们大家都要小心点，要有准备挨批评的思想准备。”各位军长听后伸了一下舌头，都不说话了，跟随邓华进入彭总的办公室。看到彭总表情很严肃，大家的心情也就变得沉静了。

会议开始时，彭总说：“今天开志愿军第1次党委会，主要是研讨作战问题，先请邓华同志发言，总结第1次战役的经验教训，然后将我们研究的第2次战役的决心与部署，向大家讲讲，大家讨论讨论下次战役这样打，行不行。”

首先，邓华发言总结第1次战役的经验教训，当讲到第38军向熙川进攻时，因误听信后退的朝鲜人民军个别同志说熙川有一个美军黑人团而犹豫了，没有按原计划发起进攻。这时彭总打断了邓华的讲话。

彭总很生气地说：“梁兴初！”梁军长一听是叫他，一下站起来答：“到！”

彭总对梁兴初说：“你坐下，我问你，你是怎么指挥的？打熙川时，我们通报你们熙川只有敌伪军一个营，你们却来电报说熙川有一个美军黑人团，推迟了攻击时间，使敌人跑掉了。由于你们对敌情判断的错误，致使延误了时间，又由于你们行动迟缓，使球场的伪军2个团跑掉了。更重要的是没有能够迅速及时地插到价川、军隅里，完成战役迂回、截断敌人后路的任务。”

这时彭总越说越生气，站了起来，来回走着，声音也大了，指着梁兴初说：“你们38军还是主力军，被一个美军黑人团吓住了，使这次战役关键的一着，没有起到关键的作用，你们是什么主力军？”

梁兴初军长在东北野战军（即第四野战军）历来听到的都是表扬，从来没有挨过上级首长的批评，更没有当着这么多军长的面挨过批评，而且是毫不留情地非常严厉的批评。若依梁兴初的脾气，早就跳起来顶嘴了，甚至退出会场。但是，这是彭总的批评，是解放军副总司令，他早就知道彭总的威严，他既不敢跳起来顶嘴，更不敢退出会场。我看他坐在那儿脸红脖子粗，将头低得没法再低了。

彭总为什么会这样毫不留情地批评38军呢？我的看法是：一方面是由于38军没有完成他很以为38军能够完成的战役迂回的关键任务而生气；另一方面由于他太了解38军了，该军112师334团的前身原是彭总领导指挥平江起义的一部分，到井冈山后又是彭总指挥的红3军团的一部分，对这支他亲自带出来的英雄部队有很深的感情，他对梁兴初同志也太熟悉了，是看着他从一个战士成长到军长的。

梁兴初军长虽然没有跳起来、跑走，但他很窝火，这是他有生以

来为了打仗而受到的第一次严厉的批评。散会后，邓华、洪学智副司令去安慰劝解梁兴初同志。

洪学智副司令拍着梁兴初的肩膀说：“老梁，你要冷静下来，正确理解彭总的批评，不要窝火，下次打好仗，打个大胜仗向彭总报喜。”

梁兴初说：“彭总不完全了解情况，38军不是孬种，我梁兴初也从来没有在战场上被敌人吓住过。”

邓华副司令诚恳地说：“老梁，可不要有这么大的火气，你一定要冷静冷静，彭老总的脾气大家都知道，38军是彭总带起来的嘛，他很了解38军，也很了解你的，因此对你们要求也就特别严一些，批评也就重一些，你应该理解。彭总批评是批评，但对38军仍是很信任、很器重的，现在诱敌深入的正面阻击战，还是由你们来担任，下次战役（即第2次战役）从敌人翼侧迂回到敌人后方去，截断敌退路的主要任务，又是关键的任务，还是交给你们38军去执行去完成嘛。”

在邓华、洪学智两位首长的劝说下，梁兴初同志逐渐冷静下来了。

梁兴初说：“邓副司令、洪副司令，我梁兴初的脾气你们都了解，我从来没有为打仗挨过这样严厉的批评，的确是很难受、很窝火。但请你们放心，现在彭总令我诱敌深入，我一定要把美军诱进来，下次战役我们一定打出38军的威风来，给彭总看看他亲自带起来的38军是不是主力，我梁兴初是不是胆小鬼。”

在会议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当邓华副司令讲到第2次战役的部署与各军任务区分时，他示意要我去指地图。当时我是第一次看到彭总发大脾气严厉批评梁兴初军长这样一位高级指挥员，使我很害怕、很紧张。我去指地图时，彭总就站在我旁边看着我拿棍指的地名，一次我将一个地名略为指偏了2公分，与邓华副司令讲的地名没有对上，我还没有发现，却被彭总发现了，彭总就冲着我大声说：“你指到哪里去了，地图都指不准啦?!”我一看怎么指偏了一点，赶快纠正过来红着脸就不知所措。邓华副司令看到我很紧张，就示意我

退到后面座位上去。

我心想，梁兴初军长第一次挨大批，我也跟着第一次挨小批。我也感到很窝火，因为第2次战役对各军部署任务的区分与部署，我已地图上研究的很熟悉了，怎么在这种场合砸锅了。当着这么多军长的面，挨批心里可真不是滋味。他们也都看出来了我的紧张心情，各位军长也都处在紧张气氛中，他们也是连大气都不敢出。但我总认为自己太不应该了，这次对我教训很大，对自己的工作要求只有更严格、更准确，一定要善于处理紧张情况下的心理状态，做任何事情越紧张就越要善于控制自己能处于冷静状态，不能稍有疏忽大意，更不要出差错。

会议中也发生了我想不到、也不可能想到的奇异插曲（可能也出乎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意料之外），就是正当彭总向梁兴初军长生气、批评梁后，与会的领导同志都处在沉静严肃的气氛中时，随彭总来的那位年轻俄文翻译（我看和我的年龄差不多，二十七八岁）却毫不胆怯地站起来，指着挂在墙上的地图说起来了。彭总坐着一句话也不说，既不制止他讲话，也不批评他，志司几位副司令也不制止他，各军军长低着头也不吭声。那位年轻的翻译，并不懂军事，我没有听明白他在讲什么，他说了一二分钟后，看没有人理会他，也就不说了。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怎么一个年轻翻译会在志司党委召开的作战会议上，而且是在彭总生气的严肃气氛中，敢于随便说话呢？还没有人制止他、批评他？真怪！

会议开完后，我对丁甘如处长说：“这个小翻译胆子真大，敢在彭总生气时，还在那儿说三道四。看来他还不懂党内和军内的规矩，这样重要的高级会议，哪有他讲话、发言的资格。他是谁？他是什么人？”

丁甘如同志说：“老杨，你就不要问，也不要打听了，我不会告诉你，其他的同志也不会告诉你的，以后时间长了，你慢慢就会知道的。”

我说“哪有这么神秘？不让知道，不让问，就拉倒。”

丁甘如说：“老杨，你不要说气话嘛，我不能告诉你，这是纪

律呀！”

我说：“我不过只是随便说说问问，我一定遵守党的纪律。”一直到敌人飞机轰炸志司后，经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在彭总指挥室内被炸牺牲的两名同志中，那一位俄文翻译就是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同志。当知道了他的名字后，对发生的一切就不觉得奇怪了。

第五章

彭总写道：“此役确定了抗美援朝的胜利基础，恢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

本章的标题写“彭总写道”，而不写“彭总说”，是因为引文是引自《彭德怀自述》一书中“抗美援朝”那章，第2次战役中的话。这是彭总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免职，独居在北京西郊吴家花园时，已经不准他公开说话了，他只有用《自述》的方式，将他革命的一生、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一生，用文字写出来。

一、麦克阿瑟狂妄地叫嚣，“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彭总以反常规的高招，实行诱敌深入的计谋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次打击后，西线美军第8集团军退到清川江以南调整部署，准备继续向朝中边境发动进攻。1950年11月9日，美国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从维护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出发，确定在没有判明中国军队出兵的意图之前继续坚持以军事进攻，迅速占领北朝鲜的原定战略方针，不改变“委托联合国军司令的任务，”并批准“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军事方面他可以相机行事”，可以轰炸中朝国际边界上，朝鲜一端

的鸭绿江桥。

第1次战役结束后，美军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仍坚持认为中国军队的主力没有过鸭绿江，他集中远东美军所有空军的飞机1000余架，发动空中战役，对朝鲜北部实施狂轰滥炸，所谓“地毯式”的轰炸，妄图从空中轰炸消灭我军。

敌人在发动空中战役的同时，在地面的东线与西线调整部署后，于11月10日开始了试探性的进攻。然后展开全面进攻，麦克阿瑟企图赶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

在西线，美军第8集团军集中主力沿通向江界的铁路线军隅里，球场方向实施进攻。

彭总抓住麦克阿瑟这个错误判断，采取了“故意示弱，纵敌、骄敌和诱敌深入”（引自《彭德怀自述》）的作战方针，利用敌人东、西线结合部的宽大空隙，决心将敌诱到北朝鲜中部的德川、宁远地区我预定歼敌战场，然后以重兵从敌侧翼发起进攻，迂回包围歼灭敌人。

彭总与邓华、洪学智、韩先楚副司令及解方参谋长定下作战方针后，即研究如何贯彻我军诱敌深入的目的。作战处丁甘如处长和我参加了这次志愿军首长作战会议。

彭总说“我们要实现示弱、纵敌、骄敌、诱敌深入的目的，那么在正面进行防御的部队，一定要经受住敌人猛烈炮火袭击，坦克冲击和空中飞机的轰炸、扫射，要打的很顽强，不让敌人迅速突破我军的防御。我防御的部队则采取节节地向后撤退，引诱敌人深入。只有这样打，才能使敌人相信我军是真正在防御敌军的进攻。

彭总在作战室来回走着思考着，说：“正面进攻这是美军的拿手好戏，他们的步兵和坦克、炮兵火力，加上飞机的支援，可以完全发挥敌人的长处，我军则只能靠占领有利地形，靠临时挖的野战工事，步兵只有少数炮兵的支援，这个防御战是很难打的。在解放战争中，我军和国民党军交战，是尽量避免打这种敌强我弱的阵地防御战的。这次美军的火力更强大，我军又非打这一仗不可。按常规我们是用次

要的部队在正面防御，掩护主力部队进攻。这次就要打破这个常规了，战斗力弱的部队是顶不住敌人的猛烈进攻的，也就很难达到我们诱敌深入的目的。请你们考虑，让哪个部队来执行这项艰巨的任务呢？”

邓华副司令对我说：“杨迪，你在地图上指出来，军隅里、球场地区我军的部队情况，让我们考虑以哪个部队执行彭总的决心。”

我即指着地图说：“在军隅里、球场正面的我军是第38军第112师，该师是四野主力师之一。该师的特点是既能善于进攻，又善于防御，战斗力是我们第13兵团中最强的师之一。”

邓华副司令接着问我：“你认为112师能完成彭总所指示的极为艰巨的防守任务，真正能够达到诱敌深入的目的吗？”

我回答说：“根据第112师的战斗作风和战斗力，使用112师来防御，才能打得很顽强，使敌人相信我军真是在防御，才能达到彭总要求的诱敌深入的目的。”

丁甘如处长接着说：“解放战争时期，我在38军工作，我很了解该军的情况，我认为112师这个主力师正是实现彭总诱敌深入决心的最理想的部队，而且该师就在军隅里、球场地域，不需要调动部队变更部署，就可以就地开展组织防御作战。建议志司给该师加强2个炮兵团，以增强该师防御作战的火力。”

邓华听后，对彭总说：“彭总，我建议就用112师来担任正面防御，诱敌深入，该师是完全可以很好地完成您的意图的。”

洪学智、韩先楚和解方也都表示同意邓华副司令员的意见。

彭总说：“对112师我也有所了解。既然你们都认为112师可以完成诱敌深入的任务，那么就命令该师在军隅里以北组织阵地防御，至少要组织两道阵地，每道阵地坚持一定时间，由我下达命令才能后撤。第39军、40军和66军、50军都要在清川江以北以一部展开，各军主力则集结待命，第38军主力和第42军迅速向朝鲜中部德川、宁远集结，东线由第9兵团全部负责对付美军第10军。”

彭总然后对解方说：“解方同志，请你根据我们的意图，起草作战命令，迅速电报下达给各军和第9兵团。”

解方参谋长领导我们起草电令后，即要我们作战处密切注意敌人的进攻情况，掌握我军 112 师防御战况，随时报告彭总。

向北进犯的美军与南朝鲜军，吸取了第一次分兵向北冒进的教训，行动比较谨慎。美军第 2 师向价川、军隅里以北进犯时，遭到我军在飞虎山强有力的防御，美第 8 集团军司令即调动第二梯队的美军第 25 师、英军第 29 旅、土耳其旅向前支援军隅里、球场方向的第 2 师继续进犯。

敌人第二梯队上来投入战斗后。我们作战处迅速报告彭总和志司其他首长，我们认为我军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我 112 师在第一线的防御阵地已遭到敌人炮火与飞机轰炸，如果继续坚守，势必遭到较大的伤亡，是否可以转移到第二线阵地，由第二梯队团继续防御。

彭总和志司其他首长研究后，决心命令第 112 师转移至第二线防御阵地继续抗击敌人的进攻。

向价川、军隅里、球场方向进攻的敌军，发觉我军是以主力展开阻滞美军前进，错误地判断我军进入朝鲜北部的兵力不大，正是敌人企图消灭我军的机会。美军第二梯队上来后，即加强了向我 112 师的攻击，我 112 师真不愧为主力师，抗击数倍于我的敌人，打的很英勇顽强，使进犯之敌进展很慢。

彭总和志司其他首长，为了进一步造成敌人的错觉，诱使敌人放胆向我预定歼敌战场前进，于 11 月 16 日电令我 112 师继续后撤，并令其他各军停止向进攻之敌进行反击。17 日，西线我正面抗击敌人的第 112 师向球场以北转移，其他各军都相继后撤，主力转移至云山、球场线以北和宁远东北地区。

向北进犯的敌人果然为我军不断向后撤退的行动所迷惑，错误地判断我军入朝参战兵力“最多也不过六七万人”，“不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并断定美军所实行的空中战役已很奏效，我军是“怯战退走”，并已使我军后续支援部队“不可能进入战场”。于是，敌人加快进攻速度。

第 38 军 112 师胜利地完成了彭总诱敌深入的战役意图。

二、彭总“诱敌深入”的第一步战役意图胜利完成后，立即实施战役计划的第二步。彭总以一着妙棋，使敌全线败退

彭总实施第二次战役的决心是：第一步，采取“故意示弱，纵敌、骄敌和诱敌深入”；第二步，集中第38军主力和第42军，从北朝鲜中部的德川、宁远地域，选择向北进犯的美军侧翼的南朝鲜第7、第8、第6师薄弱部，实施突击，突破敌人，打开缺口后，即不顾一切地向价川至平壤的公路、铁路线的中部顺川以北的三所里方向实行远距离奔袭、穿插，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切断敌人的运输线与退路，造成对敌大包围的态势，以震撼威慑向北进犯的美第8集团军，迫使敌人后撤，以便于我军从运动战中歼灭敌人。

志司作战处为实现彭总这一决心，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向，准确地掌握各方面情况。并对使用哪个部队，采取什么方式，在什么地域诱敌，需要争取多少时间，以及选择歼敌预定战场等问题，都作了周密的了解和研究。当时，彭总想将40军也调到德川地区，以38军、40军和42军等3个军的兵力，向敌侧翼突击。但作战处发现，北朝鲜妙香山以南是纵贯山脉，德川、宁远地区容纳不了3个军。40军领导也感到移至德川地区有困难，地域太狭窄，部队展不开。但军领导又不好向彭总直接反映，怕说他们叫困难，就向我说明了情况，要我向志司首长反映他们的情况。

我将40军的意见向邓、洪、韩、解首长作了反映，并说了我的意见，我认为这不是40军叫困难，而是的确难以做到。邓华副司令他们有同样的看法，即向彭总说明了铁路以东的德川、宁远地区，实在摆不开3个军，建议40军尽量东移，在38军右翼沿铁路及以东向球场、价川方向进攻，以配合38军和42军的迂回穿插，彭总采纳了这个意见。

第2次战役原确定：东、西线我军于11月25日黄昏同时向敌发

起反击，可是东线第9兵团报告说，25日发起反击他们来不及，建议将该兵团发起攻击时间推迟到27日。

作战处认真地研究了第9兵团的意见，认为他们25日发起进攻，时间确实仓促一些，是作战处事先考虑不周。东、西线相隔近百公里，采取不同时间进攻是可以的，说不定还会产生迷惑敌人，使敌人产生错觉的效果。由此我联想到打海南岛时就有过类似的情况，完全可以借鉴。海南岛渡海登陆战役第一、二批偷渡登陆，邓华司令员本来决心以第43军和第40军的偷渡部队（分队）同时启航，从海南岛东、西岸两端登陆，但因受气象和海潮影响，没有能够同一天起航，这样反而迷惑了敌人，使敌人产生了错觉。我向邓、洪、韩、解首长报告了第9兵团的意见和作战处研究后的看法，以及我的联想（因他们都是打海南岛的指挥员），邓华等首长认为有道理，报告彭总同意，将第9兵团发起反击的时间推迟两天，于27日黄昏发起进攻。

三、彭总又要亲自到第一线指挥，志司采取开设前方指挥所的方式，代表彭总到前线指挥

彭总的指挥特点之一，就是战斗打响后他总是要到前线亲自指挥，可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给志愿军党委下了命令，必须负责保证彭德怀同志的绝对安全。

第2次战役发起前，彭总召集志愿军几位主要领导同志商量，他说，他要去前线指挥向德川、宁远敌侧翼突破的2个军的作战行动。

邓华、洪学智、韩先楚和解方（沛然）等首长，都坚决表示反对，认为彭总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帅位，几位副司令员都要求代彭总去前线指挥。尽管彭总一再坚持要去，但是大家都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有电令要求志司党委保证彭总的绝对安全，我们必须执行党中央和军委的命令。彭总就只好再坚持了。

彭总说：“侧翼是主攻方向，有2个军，我们应该去一位同志统一指挥。”

邓华说他去，彭总不同意，说：“你是我的第一助手，协助我抓全面工作，不能走。”

洪学智说他去，彭总也不同意，说：“后勤供应那一大摊子事是你管，大军行动粮草先行，现在粮草虽然不能先行，但随后保障是大事，你不能去。”

韩先楚抢着说：“那就派我去指挥。”

彭总略为思考一下，说：“就派韩先楚去指挥 38 军和 42 军的作战。”

从此次开始，第 2、第 3、第 4 次战役都是采取派出前方指挥所方式，代表彭总到第一线指挥。实践证明，这种指挥方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第 2 次战役，东线由第 9 兵团指挥，西线担任翼侧攻击、迂回的 2 个军则由志司派出韩先楚副司令组成的前方指挥所指挥（简称：“韩指”）。第 3 次战役，因邓华第一副司令员回沈阳治伤，又派出韩先楚副司令组织前方指挥所，代表彭总指挥突破“三八线”作战。第 4 次战役，仍由韩先楚副司令指挥“西集团”，继续在汉江南岸实施机动防御作战；由邓华副司令员组成前方指挥所（简称“邓指”），指挥“东集团”实施战役反击作战。

第 2 次战役，彭总确定韩先楚副司令去指挥，担任从侧翼突破迂回的 2 个军的任务后，韩副司令即找到我，要我赶快组成一个班子，当夜就出发。我听说去前线，就主动向解参谋长请求，由自己随韩副司令员去。解参谋长当即表示不同意我去，解释道：“现在东、西线都要展开反击作战，作战处的工作量很大，而你对作战处和部队的情况又很熟悉，如果因为你走了作战处的工作出了纰漏，影响了彭总的指挥，那就不得了啊！”无奈，我只好从作战处选派了一位能力较强，韩先楚副司令又比较熟悉的参谋高景桂和司令部其他各处抽调的参谋组成一个作战组，跟韩先楚副司令去前方指挥所。

这次因时间紧迫，没有来得及配带电台，我向韩副司令员说明情况并表示歉意，请他带作战组到第 38 军军部，用该军通信工具与志司、第 42 军及各师联络。同时，为保障前指通讯联络，我即告诉通信处崔伦处长，请他们立即通知 38 军与第 42 军及各师开通通信联

络，我又告诉机要处陈长元副处长，通知启用互相通报密码，以便于韩先楚副司令实施指挥。

四、第38军突破敌人阵地后，第113师迅速插到三所里、龙源里，断敌退路

1950年11月24日，骄横狂妄的美军和“联合国军”统帅麦克阿瑟飞到清川江以南新安州第8集团军司令部，向全世界宣布“联合国军”向北朝鲜发动了总攻势，叫嚣“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他的士兵可以回国过圣诞节。

彭总已经很准确地了解麦克阿瑟的心理状态和美军的攻势部署，决心以牙还牙，于敌人发动攻击的第2天，即11月25日黄昏，发起了第2次战役。选择敌人翼侧薄弱部位的南朝鲜军队，实施战役反击。第38军迅速突破了敌南朝鲜军的阵地后，该军第113师即向敌人的纵深猛插。

当时，彭总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到113师的方向上，可是，该师为了急速前进，昼夜连续行军73公里没有休息，电台和无线电话也就停止了联络，这使得作战处和通信处的同志都很着急。我和通信处长崔伦、副处长罗长波都来到电台，告诉电台台长，启动我们的预备电台和无线电话电台，全部集中监听113师发来的信号。预备电台和无线电话电台启动后，还是收听不到该师的信号。

我们很着急，我就对罗长波说：“老罗，你是电台的老手，收听技术最好，请你亲自上机收听，好不好？”

罗长波毫不犹豫地说：“好，我上机收听。”他就要一位报务员让给他一台电台，带上耳机收听。

我和崔伦同志就在一旁等着，通宵没有离开机房。当时那种紧张、着急的心情真是没有词句能形容。

到了下半夜，解方参谋长着急得坐不住了，他也跑到电台来了。洪学智副司令员急得也多次跑到电台来问：“收听到113师的信号没有？”“收到113师发来的密语没有？”我回答说：“现在还没有，罗

长波同志已上机收听了，收到信号我立即报告。”

11月28日8时（注：江拥辉著《三十八军在朝鲜》书中，写113师是28日7时到达，我写的时间，是当时我们收听到无线信号的时间），电台队长杨雨田高兴地喊道：“听到113师电台发出的呼叫信号了！”但因师电台功率较小，距离又远，所以信号声音很微弱。尽管这样，大家都异常高兴。杨雨田立即给113师发了回答信号，随即收到113师第一封密语电报。我对照密语表，其意是“我部已到达三所里”（注：该师338团先头营只比敌人先到十几分钟，抢占了有利阵地），第2封密语是“敌人企图从三所里向南撤退，我军坚决阻击”，第3条是“请示我部任务”。

我翻译出第1条电报密语，立即交给解方参谋长，他高兴极了，拿着就跑向彭总的办公室，他将密语念完后，彭总和其他首长都松了一口气，高兴地笑了。彭总他们也是一个整夜没有睡觉呀！

我迅速将第2、第3条密语译出后，赶快跑步去追赶解参谋长，我跑得很快，进彭总办公室门时，解参谋长刚念完第1条，我立即将第2、第3条密语交到他手中，他接着念第2、第3条密语，彭总和其他首长都走向挂着的地图。

洪学智副司令对我说：“杨迪，你在地图上指一下三所里的具体位置。”我走近地图，指出三所里的位置。

彭总看着地图，沉思了一下，对洪学智、解方说：“你们快到电台去，直接与113师领导讲无线电话。对该师领导同志说：一是对113师表示嘉奖；二是令该师必须立即组织防御和坚守阵地，决不能让敌人跑掉。”洪学智和解方跑到电台，叫通113师的无线电话，将彭总对该师的嘉奖和对该师的作战指令与师领导同志通了无线电话。

彭总和邓华研究后，立即电令各军，通报113师已将敌逃路截断，敌很可能向清川江以南撤退，令正面各部队迅速出击，抓住当面之敌，力争多包围歼灭敌人。

我和有关参谋在对照地图，标明113师所到地域，敌我双方情况时，发现三所里以西龙源里还有一条铁路可通向顺川，我立即拿着工作地图（注：战时作战处，处长、参谋都有工作图，作战参谋随时

在地图上标明自己所管方向的敌友我情况，我的工作图则是整个战场的敌、友、我情况）跑到邓、洪、解首长那里，向他们汇报这个很重要的新情况。

听说我有新情况要报告，邓华副司令即说：“不要耽误时间，我们一起赶快到彭总办公室去，向彭总报告。”我即随他们跑到彭总办公室，向彭总和几位首长汇报。彭总听后，立即对我说：“杨迪，用密语令113师派1个团，迅速抢占龙源里，截断敌人这条退路，不要让敌人从龙源里跑了。”

解方参谋长对我说：“你就直接跑到电台去，这样快。我也去，以免你还要送给我们看，耽误时间。”

我们两人飞快地跑到电台，我要电台队长立即通知113师和38军电台注意收听，我迅速编译出：“令你师立即派1个团，于29日晨抢占龙源里，断敌逃路。”的密语电报，交解参谋长看后，要电台立即发给113师，同时要另一部电台发给38军。

第38军军部先收到志司发出的密语，该军立即给113师发出密语，将龙源里误写为龙泉里。该师领导同志在地图上找不到龙泉里，只在三所里以西找到龙源里，该地有铁路经过，该师领导就机动灵活地处置，留338团坚守三所里，即令337团向龙源里急进，先头连于29日晨4时先敌一步（只先到5分钟）到达龙源里。当敌先头分队乘汽车于29日晨到这时，即遇到我军迎头痛击。使敌人企图从顺川直接逃平壤的又一条路被我军截断，敌人被迫退回去，绕道新安州向平壤退逃。

这次战役证明，志司作战处与通信处制定的通信密语表，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回想到这里，我要对司令部参谋人员（其实对各部门，甚至各行各业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都可以从中吸取教益）说几句话。就是战役战斗（或工作）越紧张、越繁乱，我们的头脑越要清醒、冷静，工作越要细心、准确、迅速。粗枝大叶，马马虎虎写错一个字，传达错一句话，在关键的时刻就可能要出问题，出大错，要付出血的代价。比如：这次将“龙源里”误写成“龙泉里”，一字之差呵！好在第113师领导机动灵活地正确处置，按地图上的龙源里

奔袭，才迅速及时地截断了敌人另一条退逃顺川的路，如果仅只截断三所里，而不截断龙源里，或者如果113师领导在地图上找不到龙泉里，再向军里发电报请示查问，这样电报来回问答，就必然耽误时间，也就不可能在敌人到达之前抢占龙源里，那么第2次战役也就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胜利了。在战争中，时间就是胜利呵！

五、第2次战役胜利，彭总在嘉奖令写上“三十八军万岁！”

担任从侧翼主攻的第38军，在第2次战役开始后，首先与第42军并肩从德川、宁远突破南朝鲜军的进攻部署后，即以主力分别向三所里，军隅里方向进行远距离穿插迂回作战。该军第113师主力，途中不顾敌人可能的堵截，为避免被敌人空军发现，白天去掉防空的伪装，不顾疲劳和饥饿，坚持昼夜急行军14个小时，连续不断地行进73公里，于11月28日8时于敌先到达三所里地区，截断了美军向顺川的退路，第二天早晨4时又先敌进占龙源里（三所里以西），又将敌人一条退路截断。

113师的果敢行动，极大地震撼了敌人，动摇了麦克阿瑟和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进攻的决心，迫使敌人由进攻改变为大撤退。敌人为了摆脱被歼的厄运，被迫遗弃大批的轻重装备和各种车辆、物资，于12月1日8时，转向新安州突围，向平壤方向撤退。

彭总对38军在这次战役中英勇果敢的作战行动极为满意，非常高兴，还没有等战役结束，即于12月1日亲自起草嘉奖38军的电令，不仅作了很高的评价，而且在电报的最后还特别加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并将此电报通报志愿军各军、师。从此，入朝各部队领导同志都称38军为“万岁军”。

第1次战役38军没有打好，彭总严厉地批评了他们，第2次战役38军打得很好，彭总就高度评价并嘉奖了他们，写出了38军万岁，这在我军战争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由此可见，彭总赏罚是很严明的。

六、邓华代表彭总到第38军军部，召开西线各军作战会议。一路行车连遭敌机狂轰滥炸，真险

12月2日志愿军首长命令西线各军停止进攻，主力集结于安州、价川、风鸣里、新仑里、北仑里地区休整补充，各军以一部向南尾追敌人，紧跟撤退之敌。

12月3日敌人被迫开始向“三八线”实施总退却。彭总与志司其他首长们反复研究了下一步的作战行动，准备利用在西线各军暂短休整时间，召开一次作战会议，总结第2次战役西线作战经验和讨论部署西线下一步作战行动等问题。彭总说：“现在各军已进到清川江以南地区了，就不能再要军长们返回到大榆洞来开会。我到38军军部去，令各军军长到那里去，这样既节省了时间，我也亲自了解了前线情况。”

邓华、洪学智等几位首长坚决不让彭总去前线，因为要通过球场、价川（军隅里）交通枢纽部，敌人的飞机白天黑夜不停地轮番轰炸、扫射，企图一方面炸毁他们遗弃在战场上的大量物资、装备、车辆，破坏我军去打扫战场，清缴战场上的战利品；一方面用空中轰炸、扫射，企图阻止我军向南追击部队的前进。

邓华说：“彭总，中央军委已有电令，要我们保证您的绝对安全，我们几个同志已经商量好了，不论您怎么说、怎么坚持，也不能让您去。同志们都推举由我代表您去向各军军长传达您的意图和指示。”

彭总沉思了一会说：“我被你们捆得身不由己了，好吧！就由邓华同志去38军，召开西线各军的作战会议吧。”接着又说：“麦克阿瑟吹的牛皮，吹破了，正狂怒着令他的空军不分昼夜地轰炸扫射，来解他的恨，邓华同志你一路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呵！”

我因经常与志愿军首长们接触，时间长了，发现彭总对邓华总是称邓华同志（邓华以后还对我讲，彭总从来没有批评过他）。对其他副司令、副政委等同志都是直呼其名的。以后陈赓同志来了，也是称

陈赓同志（因陈的入党时间最早，是1922年；而且他俩曾在湖南省军阀部队中，还同是一个班的士兵）。对洪学智副司令，在正式场合直呼其名，但在非正式场合，特别是对弈象棋时，就叫他“洪麻子”。

邓华副司令受领彭总的任务后，即找我，要我随他去，并立即作一些必要的准备，要我通知38军做好准备，令各军军长5日拂晓前到达38军指挥所。

我根据邓副司令的意图，迅速布置应当立即执行的事项：一、立即发电报通知给各军，志司于12月5日在38军召开西线作战会议，要求西线各军军长12月5日拂晓前到达军隅里以东10公里处第38军军部，并要38军将开会的电报转告韩先楚副司令；二、要38军于4日晚到5日晨沿军隅里以东派出交通调整哨，以免各军长的车辆走错了路，还要他们准备一处较安全的地方开会。同时立即要参谋去准备好邓华副司令的车辆，准备当日（4日）晚乘车出发。

12月4日22时左右，彭总与志司首长们最后研究完下一步作战方针后，邓华副司令和我带领随行参谋和警卫人员，各乘一辆苏式吉普车从大榆洞出发。因是冬季又是夜间行车，虽天气寒冷，但为了防敌人飞机的轰炸扫射，汽车不能开灯行驶，因此，将汽车前面的挡风玻璃都放倒了，以免玻璃上霜冻看不见路，还将车篷也放倒，这样车都敞开，以便能及时听到飞机的声音在必要时跳车躲避。

当我们乘车行进到达球场时，已是半夜了，可是敌机仍不停地在空中飞行，不断地一批一批地丢下很多带降落伞的照明弹，一直到价川（军隅里）及其以南的三所里，照明弹照得夜空简直就同白昼一样。敌机发现我军后，不论是步兵行动，还是车辆行动全部轰炸扫射，单车或少数人员也不放过。

我很担心邓副司令员乘坐的汽车被炸，即停车向邓副司令说：“照明弹很亮时，就是敌机最易发现目标时，我们就停车靠路边有树处躲避一下，待第一批照明弹暗下来，第二批照明弹还未亮时，即迅速开车行进。”

邓副司令说：“好，我们就用这种办法，跳跃式地跑。”

到达军隅里时，这里已是敌人撤退遗弃车辆物资的主要地区了，敌人飞机的照明弹一批接一批地不间断地丢，照得该地区特别明亮，敌机在空中盘旋不断轰炸扫射，我们也就不能采取跳跃式的前进了。

我即停车，跑去向邓华副司令说：“敌人飞机轰炸扫射的太厉害，根本没有间隙可跳跃了，我想采取加速开车，迅速冲过军隅里最危险地区。”

邓华副司令员说：“好，我们不跳跃了，加快行车速度，迅速冲过去。”

于是我们就不管敌机的扫射轰炸，借着照明弹的光亮，要司机将车速尽可能加快，车进入军隅里，我们看到军隅里已被敌机轰炸得到处是残墙断壁和炸弹坑，未燃烧尽的火光仍在燃烧着，已经很难分清街道了，我们避开大街，穿小巷，左拐右拐，总算从火海中冲出了军隅里。

邓副司令的车安全通过了军隅里，我提起的心才算平静一些，手摸额头，才发现额头上冒出了汗水，这么冷的夜晚，怎么还出汗呢？我一想，呵！刚才太紧张了，这是冒了多大的危险呀！

车行过了军隅里不远，就遇到了38军派出的交通调整哨。我即停车问明他们执行的任务。他们说，就是为迎接首长而增设的哨位，每个岔路口都设有调整哨。我就放心了。

我跑到邓副司令车前说：“司令，现已有38军派出的调整哨了，请他们负责带路，由我带来的一名参谋陪您先走，我想再返回军隅里战场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各部队派来打扫战场的情况。”

邓华副司令说：“你真的只是想去了解战场情况吗？我看，你只说了一半，还有一半你没说出来，你刚才看到军隅里那么多胜利品，你也想打扫战场，对不对？”

我笑着说：“是的，司令，我可以去吗？”

邓华副司令说：“你去吧，敌人飞机轰炸扫射太厉害，你要注意安全，快去快回。”

我返回军隅里后，即将汽车停放在郊外，带着参谋和警卫员徒步到军隅里及以南走了一段。那情景真难以形容，既壮观又惨烈。到处是敌人遗弃的大、中、小汽车，大炮，牵引车，坦克，以及各种轻武

器装备和吃的罐头、用的行军床、鸭绒被，穿的衣服等遗弃在公路上及两侧的沟里。我军去打扫战场的干部、战士，因为司机很少，没有办法将汽车开动，就要俘虏的美国兵开出了一部分汽车，大炮和坦克开不动就不管了，主要挑轻武器、装备和弹药，以及能吃能用的东西，各种品种的罐头很多，因都是英文，打扫战场的同志搞不清是什么东西，很多都是先用刺刀挑开，尝尝好吃的就拿走。对鸭绒睡袋也不懂是干什么用的，挑的满地都是鸭毛，以后才弄明白是睡觉用的，还有军用大衣、毛毯等等。

我遇到2个军负责打扫战场的同志，他们对我说，东西太多了，有些还弄不明白是干什么用的，不知道搬拿什么好，加上敌人的飞机活动太猖狂了，两三天来白天夜晚没有间隙地轰炸扫射，使我们打扫战场很困难，白天我们躲到附近树林里，眼睁睁地看着敌机将我们的胜利品都炸毁了。

我在国内解放战争中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场面，也没有见过这么多东西，因此，毫无思想准备，事先也就没有想到，打扫战场需要很多有知识、懂英文的人员和司机，没有充分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就不好多说什么。我只是说：“你们能开动的就快开走，能拿动的就快装上汽车拿走，尽最大可能多搬出一些战利品，以后我们再总结打扫战场的经验。”看到这么多新武器、车辆、装备拉不出来，太可惜了。心里想要是有大批汽车司机和坦克驾驶员就好了。

我也不能久留，天亮以前赶到了38军军部。我了解邓副司令已休息了，各军军长都到了，他们和衣躺在行军床上休息。我要38军接待的同志，领我去看准备开会的地方，他们真有办法，找到一个小矿洞，可容下开会的人员，还找到一些小学生用的小桌子和小凳子，我也就躺在小桌子上打个盹。

开会的小矿洞也是吃饭的地方，12月5日早晨，38军梁兴初军长、刘西元政委、江拥辉副军长等陪着邓华、韩先楚副司令员和各军军长来吃早饭，梁兴初军长看到我还在躺着睡觉，就叫我起来，大声说：“杨迪，你没有随邓副司令员一起来，又跑到军隅里去了，我以为你被炸死了呢！”

我睁眼一看，大家都来了，我赶快一跃身就起来了，笑着说：“托你万岁军长的福气，美国飞机也不敢炸我呀！我返回军隅里，并到三所里方向去看一下，那儿天上地下真热闹呀！战利品太多了”。

梁军长笑着说：“你也去打扫战场，想发洋财呀！”

我说：“梁军长，你可发大洋财了，向你祝贺！在战场上我想开出一辆吉普车，但道路太挤太乱，没法开出来，只挑了两支新式卡宾枪及选了几盒罐头和一点军用品，带回去请翻译同志看看是些什么东西，好见识见识。”

吃饭除做了一盆大米稀饭外，其余都是缴获的各种各样的罐头、饼干等，有的军长向梁兴初开玩笑说：“老梁，我们向你祝贺荣获了万岁军军长，这次看你张着嘴直笑，梁大牙（梁兴初同志的门牙长的大，他的同级干部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梁大牙”）的牙更大了呀！38军不愧是4野的主力军，老大哥军。”

梁兴初军长嘻嘻地笑着说：“不敢当，不敢当，全凭彭总和几位副司令指挥的英明正确，全凭你们老大哥军的协同作战，才能取得胜利，这是我们大家协同作战的共同胜利。”

39军吴信泉军长笑着说：“上次在大榆洞开会，你‘梁大牙’被彭总批的，真批出劲来了，佩服佩服，真是老大哥的气魄，打出主力军的威风，我们真高兴。”

我也凑热闹向梁兴初军长开玩笑，我说：“梁军长，上次在大榆洞开会，你挨了彭总的大批，使我很紧张，很害怕，指偏了地名，我也沾光挨了小批。你这次得到了彭总称你们为万岁军的最高的奖励，祝贺祝贺。”

梁兴初军长笑着说：“你那不算挨批，是彭老总批我剩的一点气，让你分享了。”首长们在谈笑中很快吃完了早饭。

七、在胜利的欢乐气氛中，西线作战会议开的轻松愉快

这次作战会议，大家都浸融在胜利的喜悦中，开的轻松愉快。

邓华副司令在会上说：“彭总认为在这次战役中，西线各军作战都打得很积极、打得很好，彭总很高兴。特别是38军胜利地完成了迂回截断敌人后路的任务，击中了美军最害怕的要害，彭总亲自起草了嘉奖电令，你们都已经看到了。”

邓副司令接着说：“东线第9兵团，他们是南方人穿着南方防寒衣服，还戴着大盖帽在摄氏零下40度的严寒山区作战，他们打的很艰苦也很英勇顽强，正在胜利地发展进攻中。”

大家都说：9兵团在东线的确打的很苦，他们不像我们，我们在东北挨过冻，有防寒防冻的经验，他们没有在东北挨过冻，不知道怎样防严寒防冻，过鸭绿江后就投入极寒冷的山区作战，冻伤一定不会少。他们真不愧是华东3野的主力军。

接着邓华副司令说：“下一步我西线各军的任务，毛泽东主席有电报指示，各军休整几天后，准备打平壤，如果敌人南退，则向“三八线”进攻。彭总拟以39军、40军、42军各一个师分三路向南推进，威胁、佯攻平壤，而集中主力5个军首先在平壤以东，成川地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得手后，主力南进威胁汉城，调动平壤之敌南撤，然后，从运动中追歼撤退之敌。毛主席已同意了彭总的决心与部署。”

韩先楚副司令员也讲了话。

打了大胜仗，各军军长都很高兴，都表示拥护毛主席的指示和彭总的部署，乘胜追歼撤退之敌。

吃完晚饭后，各军军长返回。梁兴初军长给各位军长都赠送了一份战利品。

我向邓华、韩先楚副司令员汇报了我在军隅里战场上看到的情况。我说：“我们没有司机，眼睁睁看着那么多的各种型号的新汽车和大炮、坦克以及各种武器、装备、各种军用品和罐头等等被炸毁，真太可惜了。我想是不是可以从国内组织一批司机和坦克驾驶员，及其他有关人员，分配给各军，组成专门负责打扫战场的队伍，归后勤统一指挥。抢救缴获的汽车、大炮、坦克和各种武器、物资。在打扫战场上，看到各军还组织美军俘虏兵开汽车，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看以后仍可以这样做。”

邓、韩副司令听完汇报后，说：“这个意见很好，待回志司后与洪学智同志商量后再定。”以后各军及志司都组成了专门打扫战场的队伍。

我自己则很惋惜，没有能够开回一辆新的吉普车，心想下次战役我一定要再去战场，开辆新吉普车回来。

当晚，我们在返回志司时，邓华副司令他要走前面，要我走后面。在通过了球场，已是下半夜两三点钟，敌机已很少了，照明弹也丢的少了，汽车在开小灯行驶时，因路面很滑（雪已压成了冰），邓华副司令员乘坐的汽车，滑向路边撞到树上，将邓华副司令的头部撞伤，车差一点就翻到路边沟里。这可把我吓坏了，赶快下车跑去看看情况，还算不幸中万幸，汽车在路边右后轮有一半悬空了，还没有全悬空，邓副司令的头撞在座位前的挡风玻璃下部的横杠上。

我一方面组织随行人员赶快抬车，一方面问道：“司令，怎么样，碰的很厉害吗？”

邓副司令躺在座位上，小声说：“不太重，好像头上碰破了，头有点痛，还可以坚持，你赶快和司机检查一下，如果车没有撞坏，司机没有事，就赶快开车走，此处不是久留之地。”

我说：“好，我检查一下，就快走。”

我很后悔，为什么没有坚持带医生或者护士呢？（邓副司令出发从来就不让我带医生或护士）

回到大榆洞后，彭总即送邓华同志回沈阳检查、治疗。

八、中朝军队联合作战，以毛泽东主席的手表为准 统一作战时间。朝鲜人民军向志司派来军事联络组

第2次战役以后，朝鲜人民军已有3个军团可以投入作战（西面1个军团、东面2个军团），还新组建一个军团在防卫平壤地区，中

朝两国军队在一个战场上联合作战，就必须统一指挥，因此，中朝两党商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联合作战，组建中朝军队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对外不公开），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朝鲜人民军次帅朴一禹任副政治委员、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金光侠大将任副司令员（以后改为金雄大将任副司令员），邓华任副司令员。

中朝军队联合作战，有个时间差的问题必须解决。因为中国是以北京所位于的国际时区为全国统一的标准时间。朝鲜的时间以该国所位于的国际时区为准，即比北京时间快一个小时。中国北京时间12时，朝鲜时间即为13时。

我即向洪学智副司令和解方参谋长报告。我说：“我国北京时间比朝鲜时间慢1个小时，北京时间是零时，平壤时间则是1时。两国军队联合作战，以哪个时间为准呢？”

洪学智副司令说：“你想到的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是个小问题，可真又是一个大问题，这涉及到两国两军的事，这个问题只有毛泽东主席与金日成首相协商才能解决，我报告彭总后，赶快向中央军委报告。”

很快中央军委来电报通知志司，中朝两党已经协商，金日成首相说，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司令员是彭德怀同志，就以毛泽东同志的手表为准，作为两国军队指挥官统一的对表时间。

中朝军队联合司令部成立后，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即派来一个军事联络组到志司，由人民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王松云大校负责，他们直接归朴一禹次帅领导，吃住等生活问题，他们自己负责。王大校每天到我们作战室来了解情况，如在战役过程中，则每天经常来，我告诉作战处的同志对他们要热情接待，不论是我军与人民军协同作战的情况，或是我军单独作战情况，以及敌人的情况，都可以告诉他们。对朝鲜人民军的情况，他们告诉我们多少，我们只听只记，不要多问。如果要问，也只问作战的情况，不要作任何评论。我们作战处一定要与人民军联络组搞好关系，搞好团结。这是两国、两军的关系，不要搞个人关系，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因王松云同志原

就是我军第4野战军的基层干部，后回到朝鲜)。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们志司作战处与朝鲜人民军联络组的同志们相处很融洽，我们互相尊重，互相以诚相待，使他们能很好地完成与志愿军的联络任务。因此，这位王松云同志一直没有被调换，他的上级还给他授了勋章，停战后，送军校学习，以后还提为将军。

我在上面写的朝鲜人民军联络组组长王松云等同志都是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回到朝鲜去的。现在的读者一定会要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把当时的内情简要地说明一下。在我国解放战争时期，东北野战军（即第4野战军）有几个独立师中朝鲜族的干部、战士很多，占的比例很大。比如，我所在的第43军（第6纵队）入关（山海关）所辖的4个师中，第156师（独立师授予的正式番号）干部、战士大部分是朝鲜族。1949年5月，4野打过长江后，第15兵团进入江西省，奉命将第156师留在江西。不久又令该师中的朝鲜族干部、战士成建制地调返东北。当时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即去问刚成立不久的第15兵团政委赖传珠。他对我说：“朝鲜金日成首相向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提出来，因朝鲜人民军组建的时间短，请求中国将东北野战军中的朝鲜族部队都给他们作骨干。毛主席答应等全国解放后给他们。但是，金日成首相要得很急。因此我军打过长江后，中央军委立即命令4野，陆续将朝鲜族同志很多的师、团，成建制地（将汉族干部、战士调出来）调给朝鲜人民军。还听说，4野留在东北军区的朝鲜族部队也给朝鲜了。”我听后，说：“呵，原来如此，我明白了。”

九、我送电报给彭总审批，彭总与我谈家常

第2次战役后，1950年12月12日，志愿军司令部进驻君子里后，有一天晚饭后，我起草了一份电报，先送给解方参谋长审阅，他看后，稍有一点小的改动，不必要再重抄，他就要我送给洪学智、韩先楚副司令员审阅，最后送彭总审批。因为他们都住在矿洞的一条通道里紧挨着的一排小房间，我送电报也就很方便，给洪、韩副司令员

审阅后，没有几步远就是彭总的房间。当时彭总的秘书们可能到矿洞口外通风去了，不在房间里，我就直接将电报送给彭总去审批。我走到彭总房门口，见房门开着，我站在门口看见彭总正在吃晚饭，就没有敢进去。

彭总抬头发现了我，对我说：“站在门口干什么，有什么事吗？”

我说：“有一份要发给各军的电报，洪、韩、解首长们都看了，要我送给彭总审批。”

彭总说：“那你就进来嘛。”

我走到彭总面前，想把电报递上去，但看着彭总正在吃饭，我就犹豫了。

彭总说：“电报急不急？”

我回答说：“不太急。”

彭总说：“不太急，我快要吃完饭了，那你就等一等，我吃完饭再看吧。”

我回答说：“是”。

彭总仍继续吃饭，我看彭总吃的饭太简单了，主食是一小碗大米稀饭，一小碟烤的馒头片，菜只有一小碟炒白菜，一小碟豆豉炒豆腐干（湖南小菜）、一小块腐乳。

我看了心中不太好受，日理万机的彭总吃的这么简单，补充不了每日的消耗，我就脱口而出，说：“彭总，您怎么吃的这么简单，这么少，吃的都是素菜呀！营养不够，补充不了您每日的消耗呀！”

彭总说：“你不知道，我胃不好，烤馒头片好消化，我爱吃这些素菜，好下饭，胃也接受得了，吃别的东西胃就痛。”彭总若有所思地说：“唉，现在我能吃到这些饭菜就不错了，你是知道前线的部队吃不上、穿不上呀！他们的消耗比我大，营养的补充也很不够呀！”

我听了后，无言以对，心想彭总还是带病来朝鲜，坚持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的呀，他心中没有自己，总是想着、关心着几十万部队的温饱，我听了心中很不是滋味，更加敬重我们的统帅。

彭总看我站在一边不回话，他边吃饭边问我：“杨迪，你是哪里人？”

我回答说：“彭总，我和您是一个省、一个县的，湖南湘潭人。”

彭总说：“呵，我们还是老乡呀！你是哪个乡的？”

我说：“我是河口镇中湾村的，我外婆家是彭总一个乡的。”

彭总说：“我们还离得很近呀，你到过你外婆家吗？”

我说：“我很小时外公外婆都去世了，我就没有去过乌石乡，也没有见过外公外婆。”

彭总说：“乌石乡在河口镇以南不远，自然环境可好哩，我已经几十年没有回去了。”

彭总又问：“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

我回答说：“我今年27岁，1938年参加革命，到延安的。”

彭总说：“你还很年轻，我老了，我今年已经52岁了，差不多比你大一倍哩。”

我没有语言可以回答。我心想将来如有可能，我一定要到乌石乡去看看。我的愿望一直到30年后的1983年才实现。我与老伴刘刚和老革命的哥哥杨第甫、姐姐张正文一同回到老家，专程到乌石乡瞻仰彭总的故居，我在留言簿上写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统帅——彭总，我们永远敬仰您，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彭总很慈祥地对我说：“小老乡，希望你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不断进步呵！”

我知道彭总不愿意听客套话和空话，只回答说：“我一定努力，决不辜负彭总对我们年轻人的期望。”

彭总说：“不要说空话，要实干，要注意学习。好，我吃完饭了，把电报给我看。”

我把电报递给彭总，他戴上眼镜，看完电报签了字，即交给我。

我说：“彭总，您还有什么指示吗？”

彭总说：“开口就是什么指示、指示的。我也是个普通人，平时我们接触可以随便一些，好不好。没有事了，你可以走了。”

彭总说话就是这样直爽，也希望我们对他也能够直来直去的随便说话。

我向他敬礼后，即退了出来。

我边走边想，在1950年11月志司召开的第一次党委会上（即作战会议），我已领教了彭总的威严，因此，对彭总有点害怕，该我去见彭总的事，我总是推给丁甘如处长去，因为他到作战处时已经说了，他多往彭总那儿跑一些。这次送电报我是硬着头皮去的，没有想到彭总对待部下是这样的随和、慈祥，就像是与晚辈聊天似地，有说有笑，很随便。同时我亲眼看到彭总所吃的饭菜是那样的简单朴素，要求自己很严格，心里却时时关心下级和战士的温饱。彭总真正是一位无私无畏的、品德极为高尚的、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明统帅。

第 六 章

第 3 次战役中的“韩指”。打过汉江后，是适可而止？还是继续进攻？中朝两国军队召开联合作战经验总结会议。第 50 军入朝作战情况

一、韩先楚副司令率前指代表彭总到第一线指挥

1950年12月31日黄昏发起的第3次战役，是我军实施突破“三八线”敌人防御阵地的进攻战役，当时邓华副司令已回沈阳治伤，洪学智副司令分管后勤，后方供应对部队的连续作战太重要了，彭总不让他离开。因此，战役发起前，彭总仍指定韩先楚副司令员代表他，赴前线指挥主攻方向上的第38军、39军、40军和50军，及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其东侧42军、66军，由42军军长吴瑞林指挥，以牵制敌军增援，配合主攻方向作战。朝鲜人民军2个军团在东线，由人民军前方指挥所指挥，向东线之敌进攻。

韩先楚副司令接受任务后，即要我迅速组织指挥所，要我这次一定随他到前线去，负责指挥所的工作。

我听了很高兴。我说：“第2次战役解参谋长没有让我去，这次您要我去，我一定很好地完成任务。”

韩副司令说：“我信任你，你赶快去组织人员，争取快走。”

我很快地组成了前进指挥所（简称“韩指”）向韩副司令报告：“指挥所带两名参谋和两部电台，以及报务、机要及生活保障等人员组成。我建议‘韩指’在战役开始前，与40军军部在一起，该军位置居中，便于战役准备阶段沟通与各军的有线电话联络，有利于统一指挥和协调。”

韩副司令员听后，说：“同意你的安排意见，你去准备好，随时准备出发。”

我们所组建的“韩指”即分乘两辆小吉普车和一辆中吉普车于1950年12月23日黄昏向“三八线”第40军军部开进。

二、韩先楚副司令与我研究如何贯彻执行彭总确定的“稳进”的战役作战方针

我与韩先楚副司令员相识是在1949年11月下旬。当时韩先楚是第12兵团副司令兼第40军军长，奉第4野战军首长命令，率军从广西桂林经梧州渡浔江（即广东的西江），参加围歼国民党军白崇禧集团的作战。4野前委电令第15兵团派得力干部率船队去广西梧州接应40军渡江，兵团首长即令我率船队从广州出发，溯西江航行，务必及时赶到梧州接应第40军渡浔江。

韩先楚对我带船队准时赶到接应渡江，非常满意。后来渡海进攻海南岛时，我在邓华司令员的渡海指挥所工作时，又经常到第40军检查工作，他对渡海兵团前指为首长定下决心前所准备的资料和提出的建议，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当研究如何贯彻彭总“稳进”的战役方针和具体打法时，他征求了我的意见。我基于对敌情的了解和我军部队实际情况的掌握，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

我军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我军因连续胜利，士气很高，战斗力仍强，但部队入朝后已连续作战2个月，人员很疲劳，人员和武器、弹药、装备的消耗损失还没有得到补充，而且吃饭也成问题，只靠战士米袋子背的粮食，节省着吃，也只能够吃六七天，还只有一点咸菜。我军跨过鸭绿江后，战线拉的太长，又无制空权，被敌人飞机轰炸阻

拦破坏，使后勤补给跟不上来。这是我军为什么不能连续尾追敌人至“三八线”以南的原因，敌人已开始发现了我军这个最大的困难，这也是我军最大的弱点。

敌人在我军第2战役反击作战胜利后，向“三八线”以南大败退，敌军虽然士气很低落，对我军有恐惧情绪，但并不是溃逃，而是有计划的撤退，敌人企图迅速撤退到“三八线”，依托原有的防御工事抵抗我军的进攻，待其援军到达后，仍将继续发动向我进攻。敌人现已在“三八线”以南构成A、B两道防御线，并在北纬37度以北准备了C、D、E三道机动防线。

我军和敌军的情况大体上是这样的。

我说：自从12月13日毛主席给彭总来电中指出：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在“三八线”以北停止行动。为了打破敌人这一阴谋，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否则将给我政治上很大的不利。

毛泽东主席根据国际形势，要求志愿军必须打这一仗。这一星期以来。彭总和你们几位首长进行了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彭总经过深思熟虑后，12月19日向毛泽东主席发了电报，决心打第3次战役，突破“三八线”，粉碎敌人在政治上的阴谋，彭总根据我军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目前仍应采取稳进”的方针。毛泽东主席于12月21日复电同意彭总的意见。认为彭总对敌情估计是正确的，必须作长期打算，速胜观点是有害的。并同意我军越过“三八线”打一仗后，休整是必要的。

韩先楚副司令说：“彭总确定这次战役采取‘稳进’的方针，是与我们志司常委的同志，经过一个星期的反复研究商量才定下来的。我想听听你对怎么具体执行这个方针的意见。”

我说：“我军突破‘三八线’，并进入南朝鲜敌人占领区作战，远离后方，供应线拉长，会给部队带来更大的困难。这就要求我们速战速胜，适可而止。我认为可利用夜暗，突破敌正面防御后，迅速向敌人纵深穿插来割裂敌人，实施战术迂回包围，一小股一小股地歼灭敌人。也就是我军以1至2个师的兵力，包围敌军1个团或1、2个营，争取在拂晓前歼灭敌人。不然的话，敌人会利用白天，以飞机、

坦克和大炮，掩护被围敌人突围逃跑。为了防止我军向纵深穿插和迂回包围时发生混乱，各军、师指挥员要靠前指挥，建立电台、无线电话的横向联络，以求相互配合协同作战。”

韩副司令说：“你讲的这些意见，基本上符合我的意图。我理解彭总的战役意图是，我们这次进攻战役，要速战速胜，适可而止。口不要张大了，也不要打远了。西线打到汉城以北，对汉城要以逼近而不攻，我们现在还不具备攻打大城市的条件；对东线只越过北汉江，进至杨平、横城一线，不能再打远了。这就执行了毛泽东主席命令要越过‘三八线’，进到了‘三八线’以南地区，贯彻了彭总的‘稳进’方针，适可而止。至于突破‘三八线’后的具体打法，我已初步形成了作战方案，我们可以与各军军长们研究一下。”

我说：“建议于12月28日召集各军军长来开会，请他们汇报一下进攻前的准备工作情况，和各军的作战方案。并宣布您的战役决心、部署和打法。”

韩先楚副司令沉思了一下说：“可以通知各军军长来开会，进一步讨论和明确作战意图、作战方式及协同等问题。一定要打好、打胜这一仗。”

会议开完后，韩副司令要我去38军了解突击部队战前准备工作情况，他自己则到39军检查突破临津江的准备情况。

三、1950年除夕之夜，我军发起了突破“三八线”的第3次战役

12月30日晚，各军的准备工作均已就绪，“韩指”即向彭总和志司报告，认为可以按原定计划发起进攻。彭总迅速复电，同意我军于12月31日黄昏发起突破“三八线”的进攻战役。1950年12月31日17时，即1951年元旦节的前夜，敌人正在寻欢作乐之际，我军出其不意地向敌军发起攻击，迅速突破了敌人的临津江、汉滩川等一带的防御阵地，并于1951年1月1日拂晓前，突入敌防御纵深10至15公里，迫使美军与南朝鲜军全线败退。

四、“韩指”向前开进，越过“三八线”时，电台车触地雷被炸

韩先楚副司令作战中总是要尽量靠前亲自指挥。突破“三八线”后，“韩指”要前进，就不能与第40军军部一起行动了。越过“三八线”后，各军作战部队都在运动中，我们主要靠无线电指挥。我说：“副司令，你要指挥5个军的作战行动。需要选择一处较适中又靠前线近的地方开设指挥所，不能再随40军行动了。”

韩先楚副司令说：“你说的有道理，我们不随40军军部走了。你研究了没有？我们指挥所前进到哪儿比较合适呢？”

我即将地图摊开，指着地图说：“建议指挥所第一步进至东豆川以北，选择一处较隐蔽的山地，从地图上的标记看，这山上有座庙宇的标号，如真有座庙，我们指挥所就设在庙里，南朝鲜人很信佛教，一般不会要美军飞机轰炸他们境内的庙宇的。而且这个位置正在5个军作战行动的中部。”

韩先楚副司令仔细地看了地图后，对我说：“你还调查了解了南朝鲜的民情风俗呀！好，第一步就进到东豆川北山上那个庙里开设指挥所。”

我即要40军从该军警卫营派2个排给指挥所，担任警卫。他们说：你们单独行动警卫部队少了不行。

我说：“警卫部队太多，反而容易暴露目标，你们知道，韩副司令员不愿意把指挥所搞的很大的。少而精好，我们在你们军指挥所的后面，如有小情况，我们可对付，如出现较大情况，我们即请你们火速增援。”

1951年1月2日晚，第40军指挥所即要向前开进，“韩指”也要前进。我对韩先楚副司令员说：“我们指挥所随40军军部越过‘三八线’后，即分开行动，建议40军军部先走，我们下半夜走，以便于上半夜指挥各军在纵深的作战行动。”韩副司令表示同意。

1951年1月2日24时，“韩指”向前开进，将要通过“三八线”

时，40军侦察科长郑希凡跑来报告说：“敌人在‘三八线’南北两侧地带，埋了不少地雷，而且很不规律，现正调工兵部队开辟通道，建议‘韩指’待开辟通路后再走。”我当即表示不行。我说：“现在已是凌晨2点，要等排完地雷天就亮了，到那时不是吃地雷，也得吃敌机的炸弹，我们现在必须迅速通过。”

我立即下车仔细察看将要通过的道路情况，因是冬天地冻，敌人埋雷是会有痕迹的，判断敌人埋设地雷，主要是企图炸毁我沿道路所走的人员和汽车、马拉炮车，而路旁的斜坡人与车辆不易通行，敌人不一定会埋雷的。我再看看斜坡上全是干枯的黄草皮，没有发现埋雷的痕迹。我即指挥司机不走大路，车倾斜着沿着斜坡缓慢地往前开。

正当我和韩先楚副司令的吉普车通过雷区时，忽听到前边传来一声巨响，是40军的一辆汽车触雷被炸。我心想糟了，我们指挥所的中吉普车，也要沿道路开进，可不要压上地雷，我正交待在我车上的参谋赶快下车，去指挥中吉普车小心行驶，忽听得后面又是一声巨响，原来是我最担心的那辆“韩指”通讯车（中吉普）触雷了。

敌人的这种地雷是带照明弹的，瞬间天空闪出一片亮光。为防止敌机来轰炸，我请韩副司令员快走，并请40军让出一辆车来，我要一名参谋带领未被炸伤的报务、机要人员，携电台跟随韩副司令员迅速向预定的指挥位置东豆川北山前进。我又指定一名管理员留下，与40军的同志处理善后，我去看了被炸伤大腿胯部的那位女译电员同志，并简要地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即令人迅速将她的大腿负伤的上部用绷带捆绑紧，以止住流血，送野战急救所抢救。我率其他人员即去追赶韩副司令员。

五、“韩指”进到南朝鲜东豆川北山开设指挥所， 指挥各军作战。美军迅速撤出汉城

1月3日拂晓前，我赶到东豆川附近北山上那座寺庙。韩先楚副司令正在等着我，见我来了，就笑着对我说：“杨迪，这个庙真好，不太大，很隐蔽。”我即向他汇报了被炸后的处置情况。他满意地点

点头。

韩副司令员关切地对我说：“今晚大家都很累，很辛苦了，咱们就都挤在这铺炕（庙里惟一的一铺地火炕）上睡一会吧。”韩副司令对部属是很关心爱护的，本来是“三九”寒天走了一夜，听了首长这么关怀的几句话，心就暖和多了。

我说：“副司令，您先休息一下，我给志司和各军发个电报，报告和通知‘韩指’已进到的位置，同时收看各军报告的战斗进展情况后，即向你报告。”

韩先楚副司令说：“我在这儿休息等你，你去将上下联络搞通，有情况立即向我报告。”

我到另一处架设电台的房间里，要电台迅速叫通各军，然后到机要员的房间，并要参谋将我们的位置编个密语，迅速发往志司和各军，请各军用密语迅速报告进展情况。我接连不断地收到各军和先头师发来的密语或电报，各军在突破后前进中，发现敌人没有进行顽强的抵抗，而是一接触即后撤，被我军包围的几部分敌人，不是组织抵抗，而是只想夺路逃跑，也没有固守待援的架势。

对这些情况，我迅速地作了认真的分析判断，认为东线的南朝鲜军在我东线军队的进攻下，正向后败逃，使得西线美军侧翼完全暴露，美军最怕的就是侧后暴露。如果李奇微（新上任的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将10多万美军在汉江北岸组织防御来死守汉城，进行背水一战，那很可能会给我军造成从东线迂回到汉江以南的机会，就会重演第2次战役沃克（翻车死亡的原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的败局，甚至可能更惨。汉江在汉城只有一座桥梁，如果我军兵临汉城，美军被迫撤退，10多万机械化军队，只能从一座桥上通过，是很困难的。因此，敌人很可能连汉城也不守了，全线撤退到汉江南岸，依托汉江组织防御。

这几天韩副司令员非常疲劳，他的身体也不很好，我真不忍心叫醒他，可是这一动向必须立即汇报，须要韩副司令员下决心，也没有别的办法，更不能等待。

当我来到韩先楚副司令住的房间还没有开口，只听韩副司令说：

“杨迪，有什么情况赶快说，我一直没有睡，等着你呢。”我看他背靠着墙，坐在地炕上，下部盖着被子。我即在韩副司令面前展开了地图，拿着手电筒，向他汇报情况，并把自己对敌情的分析判断也作了汇报。

韩先楚副司令听后对我说。“你讲得有道理，李奇微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他不会不接受沃克的教训而吃亏的，敌人很可能迅速向汉江南岸撤退。”他要我起草电报令各军一方面迅速歼灭被包围之敌，一方面不顾一切地追击敌人，不要怕白天作战，要敢于在白天和敌人扭在一起，使得敌人的航空兵和炮兵发挥不了作用。越往前追，迫使敌人都涌向汉城，让敌人都拥挤在汉江桥上，造成敌人企图夺桥而逃的困难。也使敌人的航空兵发挥不了作用。

针对情况的变化，对部队作战行动又作了认真地研究，韩副司令又形成了新的决心与部署。他很信任地对我说：“有关上报下达的事，你就按照我所讲的决心与部署去办理吧，我太疲乏了，身体也不好，真想睡一会儿，恢复一下疲劳，以便处理新的情况。”

我说：“韩司令，您真该睡一会儿了，有紧急情况我随时报告。”他点了点头，我即退出来。

我将突破敌人后的情况和部队追击逃敌的作战行动，以及根据新的情况“韩指”的判断与决心、部署，迅速地向各军发出了指令，并电报彭总和志司。

1月3日晚，我拿着一份志司发来的特急电报，和39军与50军及人民军第1军团先头部队已进入汉城的密语和电报，立即向韩副司令报告，美军确于当日白天放弃汉城，全部向汉江南岸撤退。

遵照彭总“稳进”的方针，我向韩副司令建议：第一，38军、50军和人民军1军团各一部越过汉江追击敌人，进占仁川、金浦场、京安里一线，占领有利地形稳住阵脚，并派出小部队尾随撤退之敌，监视其行动。如果敌不停地向三七线以南撤退，我军则不宜追击过远；第二，汉城是朝鲜首都，其防务宜全部交给人民军第1军团，39军与50军进入汉城的部队，要迅速撤至郊区，这对朝鲜人民既是个很大的鼓舞，也尊重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是很有利于中朝军队和与

朝鲜人民的团结，也有利于我军随时准备机动作战；第三，令40军，并建议42军、66军继续向杨平、砥平里、横城方向追击溃逃的南朝鲜军，更有力地威胁美军的侧后，并争取能大量杀伤或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韩先楚副司令听取了 my 的意见后，他又经过深思熟虑，即对部队的行动作了进一步的明确，要我电令各军执行，并报彭总与志司。

1月4日白天，情况不太紧张，我看韩副司令太疲劳了，就建议他出去散散步，放松一下。他说：“好，到庙外去转转，参观参观。”我们在散步中发现选择的指挥所位置非常好，这座庙宇是在三面环山的密林之中，建筑相当雄伟，很像我国唐代的建筑，楹联匾额都是汉字。我和韩副司令上下之间无拘无束，边看边说着，没有一点隔阂。

散步后，我即向韩副司令提出，我想去汉城看看和实地了解情况。韩先楚说：“你总想往前跑，想去汉城看看的想法是好的。但是，现在敌我情况变化很快，你不能离开指挥所，以后再去吧。”我了解韩副司令的特点，向他提意见，他同意就会马上表示同意，他不同意再磨牙也没有用。因此，尽管与汉城近在咫尺，我却失去了去汉城看看的机会了。

六、彭总下令结束第3次战役。韩先楚副司令员与我研究第3次战役后的敌我态势

1月8日，接到彭总电令，要求各军停止追击，结束第3次战役。“韩指”遵照彭总指令，调整了部署，并对突破“三八线”战役的作战情况作了初步的小结。

在对这次战役进行商讨研究时，韩先楚副司令要我先谈谈看法。

我略加思索后说道：“我军突破了‘三八线’，收复了北朝鲜国土，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胜利地完成了任务。特别是把美军和南朝鲜伪政府赶出汉城，打出了军威，震惊了世界。但是也应看到：一、这次战役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是有计划地迅速撤退，使我军没有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美军与南朝鲜军还保存着相当

的实力；二、我军深入南朝鲜地区，原以为能就地取粮，可是结果未能如愿，连119师徐国夫师长也在电话里向我要炒面，我军粮食不能迅速运送上来，部队得不到补充，米袋子已空了；三、我军人员伤亡没有得到补充，武器弹药消耗很大，衣帽鞋袜破损得不像样子，也没有得到补充，干部、战士都很疲劳。不仅东线第9兵团打伤了元气，就连西线的6个军连续作战也都快伤元气了。建议中央军委令国内的第二批、第三批部队赶快入朝，接替第一批入朝的几个军，使这几个军能够得以休整，以利再战。

韩先楚副司令沉思片刻后说：“这次战役我军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的确打得勉强一些。李奇微很狡猾，他采取不与我打，甚至不顾南朝鲜伪总统李承晚的坚决反对，就果断迅速地撤出汉城。李奇微为什么一触即退呢？一是南朝鲜军队没有战斗力，在东线（美军的翼侧）很快被我军突破，李奇微看到了西线美军翼侧已经暴露，对他已构成了很大的危险，美军的士气又很低，他为了保存实力，避免被歼，就迅速后撤，收缩防线以利于迅速整顿军队。同时他也发现了我军战线愈延长，补给就愈困难，他即可充分发挥美军的海空优势，来打击破坏我军后方供应，断我粮弹，使我处于困境。”

韩先楚副司令停了停接着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选派李奇微来接替翻车死了的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就是想挽救朝鲜战局，将侵略战争继续打下去。因此，我们要从最困难方面着想，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情况。”

韩先楚副司令思考一下，对我说：“我们要给各军发个电报，特别是汉江南岸的部队，一定要占领要点，做好野战防御工事，天寒地冻不好进行土工作业的地方，就用雪堆起来，浇水冰冻，利用冰雪作野战工事，并令各军、师派出侦察分队与敌保持接触，密切注视敌人的动向。在汉江以北的部队，抓紧时间进行休整，严格要求部队，决不能因胜利而产生麻痹思想，要时刻保持对敌人可能向我发动反扑的警惕。”

我说：“韩司令，是不是给彭总和志司其他几位首长发份电报，

如实地反映我们所了解的前线部队的实际情况呢？”

韩先楚副司令想了想，说：“不仅要反映情况，还要提出我的看法和意见。我把想法讲给你听，你写出来。”

电报纸和笔是现成的，我说：“我已准备好了，您说，我写。”

这份电报的大意是：这次战役，敌人败退，并撤出汉城，是有计划地撤退，我军并没有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我军参战的都是初入朝的几个军的老骨干，部队极端疲劳，困难太多。“三八线”以南的南朝鲜群众都跑光了。敌人撤退时，将沿公路的房屋都烧光了，粮食也都搞走了。我们部队每到一地，从房屋的废墟中去挖粮食，找地窖去找粮食，都没有找到，菜窖里只剩下少许的酸辣白菜，这样使部队吃不上饭，只靠身上背的干粮和炒面。因为房屋烧了，不能在屋内睡地炕。只好露宿树林里，将雪刨掉，挖个小坑，填稻草睡，使体力极大地减弱。加之后勤供应不上，如果不增加新的力量，仅靠现有的几个军的兵力，再发动大的攻势，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写好后，即给韩副司令审阅。他说：你给我念吧。他在听的中间插话要我做了一些修改后，即要求快发出去，供彭总考虑下步如何行动作参考。

电报发出去后，我说：“韩司令，我们已将结束战役后的部署调整，各项具体措施都已指示各军了，我们是不是尽快返回志司，有些情况电报不能完全写清楚，还需您当面向彭总汇报，讲的清楚一些。”

韩先楚副司令说：“好，你通知各军并报志司，我们指挥所返回志司，各军即由志司直接指挥。”

“韩指”返回志司，韩先楚向彭总汇报后，即对我说：“彭总很了解我军的困难，对敌我情况分析的很透彻，并对我在汉江南岸的防御部署和措施表示同意。他指示要使部队尽可能争取一段休整时间，并令后勤想方设法将物资、弹药迅速前运，补充部队。彭总还说，西线的6个军要组织一部分师以上干部到沈阳集训一二个星期。我和洪副司令、解参谋长商量，决定派你去沈阳向邓副司令员（邓因撞车受伤回国治疗）汇报第3次战役情况，并参加集训班学习。”

七、第3次战役胜利后，是适可而止，还是乘胜继续进攻？彭总与苏联驻朝大使产生了不同的意见

1951年1月8日，彭总下令各军停止进攻，结束第3次战役，以争取时间，使很疲劳的部队得到休整和补充。这个决断是很适合当时的情况，是非常正确的。

可是，不同的意见发生了。

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此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军向日本关东军进攻时，进入朝鲜的苏军集团军司令员，上将军衔，苏军撤回国后，他即改任为苏联驻朝鲜大使，实际上是朝鲜人民军的总顾问）和友方领导同志，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连续取得了3次战役的伟大胜利，将敌人打退到“三八线”以南，收复了北朝鲜国土，还收复了“三八线”以南的开城及延安半岛和瓮津半岛地区时，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对敌人的实际情况，以及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没有清醒的认识、正确的判断。他们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军向德国法西斯军队由战略反攻到战略进攻的情况为依据，来对待朝鲜战场的情况，错误地认为敌人被打败了，向后败逃，我军反攻连续取得胜利，并认为已转入了进攻，就应该像苏联军队那样，向败逃的敌人连续不断地进攻。并说什么在苏军的战斗条令中，没有进攻胜利后停止进攻的。只能不断进攻，扩大战果，乘胜将敌人赶出朝鲜。不能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应该“一气呵成”，停止进攻是错误的。

在彭总与苏联驻朝鲜大使会晤交谈时，苏联大使以军事家和“太上皇”自居，指名道姓地指责彭德怀司令员：“哪有打了胜仗却不追击敌人的？哪有这样的司令员？”他坚持要我军不停顿地继续进攻，一直打到釜山，将敌人赶出朝鲜。此时，他们当然已忘记了不久前朝鲜人民军打到洛东江后败退的惨痛教训了。

彭总是有非常丰富实战经验的军事家、战略家，他的头脑非常清

醒，他很清楚我军虽然取得了3次战役的伟大胜利，但并没有大量歼灭美国军队的有生力量，美军的司令官也不是饭桶，他们也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出来的，是有战争经验的。我中国人民志愿军突然进入朝鲜，抗美援朝，是他们没有料到的，我军的战略反攻，粉碎了美军侵朝战争的整个战略和战役计划，迫使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不知所措，新到任的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需要调整和制定新的战略战役计划。同时，我们已得悉美国并没有因为败退而停止增兵朝鲜，现正从国内调2个师向日本运输中，这说明美国政府与军方不会因为战场上的败退，而甘心撤出朝鲜的。美国既然打着“联合国军”旗号侵略朝鲜则不会轻易地放弃朝鲜的。

对我军来说，虽然连续取得了3次战役的胜利，但我军连续作战，部队很疲劳，人员伤亡、弹药消耗和军需给养得不到补充，体力消耗很大。我军又没有制空权，白天不属于我军，我军只能利用黑夜，一天24小时，只有一半的时间属于我军，加之战线拉得很长，我运输线已长达550公里至700公里，后方供应不上，我军已无力再向前进攻。我军的战略反攻，还没有发展到战略进攻的阶段，绝对不能同第二次大战后期苏军由战略反攻发展到战略进攻相提并论。

苏联虽然当时是我们的“老大哥”，但彭总以战略家的气魄和胆识，断然拒绝了苏联大使的指责与要求。

彭总说：我军已很疲劳，又没有制空权，后方供应上不去。敌人是摩托化，我军是两条腿，这怎么能够追上敌人呢？而且如果再将敌人压缩到朝鲜半岛东南角，敌人集中了，又有洛东江阻隔，更不利于我军歼灭敌人。

苏联大使等人说：歼灭不了敌人，我们多占领一些地方也是好的。

彭总说：歼灭不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占领了地方也保不住，地方还会被敌人夺过去的。因为我军并不占优势，又是疲劳之师，后方空虚，供应也补给不上，增援部队还上不来。

他们说：只要我们继续进攻，敌人肯定会继续败退。敌人为了避免被歼灭，肯定会撤出朝鲜的。

彭总说：我们判断敌人是打着“联合国军”旗号来侵略朝鲜的，因此肯定不会撤出朝鲜。你们说，敌人肯定会退出朝鲜，那么就让人自动退出，这对美国来说，不是可以留一点面子吗？这比逼着敌人退出不是更好一些吗？何况我军现在的情况，也不可能逼迫敌人退出。

苏联大使等人仍坚持只要我军进攻，敌人肯定会退出朝鲜。

彭总最后坚定地说：你们认为，只要我们进攻，敌人肯定会退出朝鲜。我完全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我认为：即使我们继续进攻，敌人也肯定不会退出朝鲜的。麦克阿瑟就是妄图诱使我志愿军追到洛东江，敌人再来一次仁川登陆。我是绝对不会上麦克阿瑟的当的。我要对人民负责，如果错了，我负完全责任。

苏联大使的指责被彭总拒绝后，他们恼羞成怒，立即向苏联领导者斯大林发电报，告彭总的状。彭总将与苏联大使的分歧意见，如实地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泽东主席将彭总的报告转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回电说：彭德怀同志是当代的军事家，朝鲜战场的一切军事作战行动都应听从彭德怀同志的指挥。随即，斯大林将苏联驻朝鲜大使调回国，并撤了他的职。

我没有参加他们的会晤和这场争论，也没有看到电文资料（因为这是属于政治性的，作战处不能参加，电文也不复写，只一份，不送作战处），是当时我与邓华副司令员交谈中，他讲了上述情况。

敌人的行动，证明彭总的预见、判断和决心是非常正确的。1951年1月8日第3次战役结束，我军原打算争取2个月的休整时间，3月份再实施进攻作战。但是1月15日，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即向我在汉江南岸的军队发动了试探性的进攻，即所谓的“磁性战术”。我汉江南岸的第38军、50军和人民军第1军团仅争取了不到10天的休整时间，即进行艰苦的防御作战。1月25日，敌人由东到西发动了全面大举进攻，使汉江北岸的我军仅争取了不到20天的休整时间，而被迫投入作战。

敌人迅速发动反扑的事实，证明了苏联大使的论点是完全错误的。

八、我回沈阳，同邓华副司令员作汇报。师以上干部集训班还没有开学，即全部召回前线

第3次战役结束后，我随韩先楚副司令员返回志司。韩副司令员向彭总及志愿军党委汇报了前线情况后，彭总和他们分析研究，判断第3次战役后，敌人要收拢整顿部队，等待援军。可能需要2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军连续打了3次战役，打到“三八线”以南，部队很需要休整补充。我们要尽可能争取2个月的时间进行休整，然后再向敌人发动春季进攻。

东北军区来电说，苏联军事顾问建议利用休整时间，志愿军可抽出一部分师以上干部到沈阳去，办个短期（2个星期）集训班，由苏联顾问讲苏联卫国战争各大战役中的反攻和进攻经验，以及介绍现代战争的知识。彭总和志司党委接受了这个意见，决定从西线各军抽调一部分师以上干部去沈阳参加集训。洪学智、韩先楚和解方商量，派我回沈阳，一是向邓华副司令员汇报第3次战役的情况；二是参加集训班学习。韩副司令对我说：“学习班定于1月15日开学，你要尽可能早到沈阳，好向邓副司令汇报。”我在国外几个月了，连澡都没有洗过一次，能够回国休整2个星期，我很高兴。我说：“韩副司令，我今晚就走。”

我于1月13日回到沈阳，立即向邓华副司令员汇报了第3次战役的情况，他听了很高兴，对我说：“下午我要去参加东北局书记们开会，你跟我去，向东北局书记们汇报第3次战役胜利的情况。”可是，下午东北局书记们开会没有来得及听我的汇报，要我第二天再去讲。

当晚，我即接到解方参谋长的电话，说：“1月25日，以中朝联合司令部的名义开会，中朝两军军以上主要领导干部都参加，总结入朝后3次战役作战经验，你要迅速返回，参加会议的准备与组织工作。”

我说：“我才向邓副司令汇报了，邓副司令还要我向东北局书记

们汇报，我刚到集训班报到。”

解参谋长说：“你不要向东北局汇报了，也不要参加集训了，集训班也不办了，参加集训的干部都要返回部队，你赶快返回吧，彭总已要邓副司令迅速赶回来。”

我说：“好，明天就返回，白天到丹东，晚上过江（鸭绿江）回志司。”

在这儿我插一段我到沈阳后开车的故事。我这次回国，乘坐的吉普车是直开沈阳的（没有在安东换乘火车），为了赶路，我就与司机轮流开车，换着休息。到沈阳后，我对司机说，沈阳市我熟悉，我来开。可是，我不懂城市交通规则，不知道红灯是停，绿灯是通过的信号，我总是闯红灯，交通警察示意要我停车，我不仅不停，反而开的更快冲过去，志愿军的车辆又没有牌子，交通警察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车，这样横冲直撞，我还觉得挺有意思，向东北军区司令部的同志当笑话讲。他们对我说，这是严重违反交通规则，不仅要受罚，而且会出危险的，要我不再在城市里随便开车。我联想到：在南下解放广州时，缴获了一辆小轿车，我很好奇，就开着上街，因没有了解小轿车的技术性能，在大街上撞到商店的铺子里了。我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从此就不再在城市开车了。

九、中朝两国军队，召开仅有的一次联合作战经验总结会议

第3次战役，朝鲜人民军有3个军团（相等于我军的军）参加了作战。第1军团在西线，第2、第5军团在东线，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作战。

朝鲜人民军重新投入作战后，在中朝联合司令部彭德怀司令员的统一指挥下，取得了第3次战役的胜利，特别是第1军团与我军一起解放了汉城，朝鲜党、政、军和人民群众都极为高兴。彭总原来只准备召开志愿军各军军长、政委会议，总结3次战役的经验和布置下一步的作战与工作。彭总将情况通报了金日成同志。金日成同志向彭总

提出中朝两军共同来开这个会，朝鲜人民军军团长以上的将领来参加会议。彭总表示很欢迎，两军互相交流作战经验是很好的方法，同时请金日成首相参加共同领导会议。金日成首相答应，不仅他要参加，而且朝鲜党、政、军主要领导同志都要来参加，因为这次会议不仅是总结交流经验的会议，而且是一个祝捷的会议，热烈庆祝中朝军队联合作战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这样，对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就很复杂很繁重了。

1月25日，中朝联合司令部在志司驻地君子里，召开了有中朝两军的军和军团长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联合作战经验交流总结会议，彭总作了3次战役的总结与今后作战意图与任务的报告，志愿军各位常委也都发了言。朝鲜金日成首相等党、政、军领导同志都来了，金日成首相和朴宪永等人都讲了话。尽管矿洞的条件比较简陋，可是会议开得却很隆重。

彭总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对这次会议所作的重要指示。指示说：“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基础。……”

志愿军由第39军116师介绍了第1次战役在云山打美军的经验，第38军113师介绍第2次战役穿插三所里、龙源里截断美军退路的经验，人民军第5军团长方虎山上将也介绍了作战经验，并讲了学习志愿军作战经验的话。这三位同志都讲得很好，受到了与会的中朝将领们的好评。

会议开始进行前，敌人于1月15日开始在汉江南岸实施了所谓“磁性战术”的试探性进攻，到1月25日，会议开始时，敌人已由小规模进攻发展到较大规模的全线进攻。

1月27日，彭总与金日成首相商量后，即决定将这次经验交流总结会，改为准备进行第4次战役的动员大会。

仅有的一次中朝两军高级干部（将领）在一起召开的联合作战

经验总结会议，于1月29日就结束了。

会议结束后，我去送各军首长们走时，40军军长温玉成问我，说：“杨迪，这次战役志司还会组织指挥所吗？”

我说：“现在韩先楚副司令已提前走了，在指挥汉江南岸防御作战。如果彭总决心西线防御阻击敌人，让东线进犯之敌突出，实施反击，那就有可能再组织一个前指，去指挥你们在东线的几个军。”

温玉成说：“哪位副司令员去？是不是还到我们40军来？”

我说：“我现在还不知道，也就不好说了。”

温玉成说：“如果再设前指，你就向那位来的副司令员建议，还是把‘前指’设在我们40军。”（注：第3次战役准备阶段“韩指”在40军）

第42军军长吴瑞林走来了，问道：“老温，你与杨迪在说什么？”

温玉成说：“我是问这次志司哪位副司令员到前线来指挥我们几个军。”

吴瑞林说：“你们是主力军，志司‘前指’当然是在主攻方向，我们不是主力，担任不了主攻，也就当然不会到我们军来。”

温玉成说：“老吴，你可不能这么说。第3次战役，东线2个军，彭总就是指定由你吴军长指挥的。我还没有指挥过2个军呢。”

我赶快说：“我估计这次战役你们2个军是会要并肩作战的，可能都要演不同的主角。”

温、吴两位军长都笑了。我把他们送上汽车。

十、第50军是原国民党军在长春起义的第60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后，原军长曾泽生（中将）仍任军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得很好，受到彭总的表扬

我要专门写一节第50军入朝作战的情况，因为这个军与我军原

有各军相比较，很有特殊性，并且是很有特殊意义的。

解放战争中，1948年秋季，东北野战军围困长春时，国民党第60军军长曾泽生（中将）率全军起义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曾泽生仍任军长。我第13兵团率4个军入朝参战后，第50军负责守卫鸭绿江边，以保障我入朝部队后方的安全。第1次反击战役打响后，彭总及志司深感兵力不足，请求中央军委速调在天津的第66军迅速入朝参战。仍感兵力不足，又请示中央军委将鸭绿江边的第50军火速入朝参战。

1950年11月1日夜，第50军从安东过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第1次反击战役，志司命令该军准备阻击沿铁路向新义州进犯的英军第27旅。第2次反击战役，第50军与西线各军协同作战，向进至定州之美军攻击，守敌在我发起攻击前即撤退。志司又电令该军向博川以南进攻，围歼清川江以北退逃不及之敌。第50军迅速追击逃敌，于12月1日进至博川东南，逼近清川江。由于第38军第113师已于11月28日晨插到美军第8集团军后方三所里、龙源里，敌军全线动摇后撤。志司彭总于12月2日停止第1次反击战役。第50军即渡过清川江进至安州地区休整补充。

1950年12月31日晚，我军发动第3次反击战役，第50军编入进攻的右翼，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突破“三八线”后，该军在高阳以北击退美军第25师1个营的抵抗，乘胜追击，在高阳以南佛弥地区截击英军第29旅，并于1951年1月1日晚，全歼英军第29旅皇家奥斯特来复枪团第1营及第8骑兵（坦克）团直属中队，缴获和击毁敌坦克31辆。1月4日，该军与第39军第116师及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一部攻进汉城。彭总及志司作战处收到该军与兄弟部队同时攻占汉城的电报后，极为高兴，即电令该军以一部控制汉城内的汉江桥，该军主力与第38军112师及人民军第1军团一部，继续向汉江以南追击。第50军发扬了我军的怕苦、怕累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一直猛追逃敌，于1月8日攻占收复仁川港。

1951年1月8日，我军西线攻占仁川港，东线进攻至原州，已接近北纬37度线。中朝联军司令员彭德怀即果断地下令：停止追击

作战，结束第3次战役。

当时，我们志司作战处的同志们非常高兴，真没有想到第50军改编为解放军只有一年半的时间，在同一位军长曾泽生将军的指挥下，在进攻作战中，他们面对的都是美军、英军，毫无畏惧地，敢于进攻，敢于抄敌人的后路，打得非常好，一点也不亚于我老解放军。

解方参谋长来到作战室，看到我们高高兴兴地议论着，他即向我问道：“你们怎么这么高兴？”

我对他说：“参谋长，我们正议论第50军打的真漂亮呀。”我突然想起来了，即说：“围困长春，您是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参谋长，曾泽生军长率领第60军起义，您是主要策划者之一，对吗？”

解参谋长笑着说：“当时我与曾泽生将军谈话，谈得很诚恳、很融洽。国民党第60军是云南的部队。蒋介石一贯排除异己，他利用抗日，将60军调出云南后，曾泽生一直是军长，得不到提升，部队伤亡得不到补充，将该军各师随意调动。在围困长春的过程中，我们派员打入该军，经过一段时间做曾泽生及各师、团长的工作，终于使他们起义。曾泽生军长是滇军中一员战将，起义后，我党我军很信任他，仍委任他任军长，有指挥权。他一直表现很好，这次是他主动请缨要率部队参加抗美援朝作战的，他对志司的命令贯彻执行得很好，彭总很满意。因此，彭总就准备令第50军与第38军及人民军第1军团担任汉江南岸的防御作战，这是要与美军打硬仗的。”

下面我就很简要地说一说第50军在汉江南岸参加防御作战的精彩表现吧！

中朝联军司令员彭德怀于1951年1月8日电令：第50军、第38军第112师和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2个师，位于汉江南岸，负责警戒海防和控制汉江南岸的桥头阵地。1月15日，敌人开始向我军实行“试探性进攻”，发展到大规模进攻，我第50军即与第38军（主力军）、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2个师共同担任汉江南岸金浦、仁川、骊州以北地区组织阵地防御作战，坚决抗击敌人向汉城方向进攻，以争取时间，使我军调整部署。准备发动第4次反击战役。

第50军（配属炮兵第26团2个营）和兄弟部队在天寒地冻、粮

食弹药供应不上、修建防御工事的工程器材异常缺少的条件下，只能构筑一般的野战工事（用雪堆起来浇水冰冻作工事掩护体），进行坚守防御，战斗异常激烈艰苦，每一个要点都要同敌人进行反复争夺，我防守部队打得非常英勇顽强，使进攻的敌人付出重大伤亡代价。

我们志司作战处随时将第50军及其他各军防御作战情况，迅速报告彭总和其他志司首长。彭德怀司令员很高兴，令志司作战处于1月31日以他和中朝联军司令部（注：即志司）的名义，分别通令表扬第38军、人民军第1军团，特别对第50军和所属第148师的全体指战员，并在嘉奖电令中指名第148师所属第443团、第444团、第149师第447团，3个团在敌人飞机，坦克和炮兵的猛烈轰击下，抗击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坚守住了阵地，并给予进攻的敌人以大量的杀伤。

我志司作战处根据首长的意图，将第50军每日电报报来的各师战斗情况，进行了研究，写出简要的经验总结电报，特别重点总结了第148师防御作战经验。解方参谋长审阅后，即送彭总审阅。彭总很高兴地对解方说：要作战处将总结出来的第50军第148师防御作战经验，改写为战术指示，以志司的名义迅速发给志愿军各军、师参考学习。

第50军与38军及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两个师在汉江南岸，依托野战工事，抗击美军的进攻，一直坚守防御达一个月的时间，直到1951年2月7日，第50军奉志司电令：除留一部兵力控制汉江南岸桥头阵地外，主力撤至汉江北岸组织防御。第38军和人民军第1军团2个师则仍留在汉江南岸坚守原阵地，以掩护我军主力向东线横城集结，进行第4次战役。我军在东线实施第4次战役过程中，西线美英军队仍继续向我坚守在汉江南岸阵地发动猛攻。第50军留在汉江南岸的部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积极配合第38军进行顽强的防御作战，有力地配合了我军在东线反击作战。第38军与第50军和人民军第1军团，受到了中朝联军司令部的通报表扬。第38军与第50军一部继续在汉江南岸坚持防御，直到2月16日至18日先后撤至汉江北岸。3月7日，美军第25师渡过汉江后，向我进攻，我第50军

与第38军并肩防御作战，阻止美军的进攻。

1951年3月9日，中朝联军司令部根据当时战场形势，决定第一梯队各军自3月10日起，按预定计划逐步向北转移，并由第二梯队军接替继续进行防御作战。志司电令：以志愿军第26军接替第50军，第50军回国整补。曾泽生军长请求志司该军不回国休整，留在朝鲜新义州以南地区休整，以便随时可再投入作战。彭总同意了。第50军即留在朝鲜新义州以南宣川地区休整，1952年秋，第50军又参加了朝鲜西海岸准备抗登陆作战。第50军与第38军并肩，担任对海防御第一梯队军（即第一防御地带）的重任。

第50军在西海岸抗登陆作战准备阶段，于1953年4月12日，在定州以东的军部遭到敌人飞机突然轰炸，副军长蔡正国的掩体被炸中牺牲。曾泽生军长的掩体就在附近，险遭轰炸，幸免遇难。我在“西海指”接到第50军司令部的电话报告后，使我大吃一惊。立即报告梁兴初副司令和志司作战处。邓华副司令员得悉后，立即给我来电话，询问第50军军部被炸情况。我详细汇报后，从电话中听到邓华司令员神情沉重地说：“蔡正国同志牺牲很不幸、很可惜。但曾泽生军长幸免于难，是不幸中的万幸。如果曾军长遇难，我怎么向彭总和中央军委交代，真是交代不了呀。曾泽生军长是第一位，也是惟一的一位亲自率领军队，入朝作战的起义将领，影响太大了。”邓华停了一下，说：“我即直接给曾泽生军长打电话，代表彭总和志司向他表示慰问。”

原是国民党的第60军与人民解放军打仗尽打败仗，曾泽生军长也是解放军手下的败将。可是1948年秋在长春起义后，改编成人民解放军第50军，军长仍是原来的曾泽生军长，在抗美援朝战场上，面对世界第一流的美、英军队，毫无畏惧，打得非常英勇顽强，非常威风。曾泽生军长也成为打胜仗的将军。请读者朋友们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呢？我想不需要我说，读者朋友们会得出正确的答案的。

第七章

第4次战役中的“邓指”。横城反击战胜利。攻击砥平里受挫的原因

一、邓华副司令员率指挥所代表彭总到第一线指挥东集团反击作战

面对敌人的大规模进攻，彭总认真分析了当前敌我双方情况，指出：美第8集团军在李奇微的指挥下，已逐步整顿就绪，而我军只争取了不到20天的休整时间，部队疲劳没有完全恢复，物资弹药没有得到较好地补充，尤其是战线拉得过长，与敌再战确实有很多困难，比第3次战役打的还要勉强。但是，这一仗还必须要打，而且非打好不可，否则，我们所取得的战争主动权，就有可能丢掉。对于如何组织和打好这次战役，彭总和志司其他几位首长反复深入地进行了研究，并电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

根据对敌我双方情况的分析，彭总和志司其他几位首长们研究，决定采取“力争停止敌人前进，稳步打开战局，并从各方面加紧准备，仍作长期艰苦打算的方针。”因此第4次战役决心：以一部兵力在西线进行防御，坚决顶住美军主要集团的进攻；在东线则让南朝鲜军深入，造成有利于我歼灭突出之敌的态势。集中我军主力实施反击，争取歼灭南朝鲜军一二个师，随即向敌纵深突击，从侧翼威胁西线美军主要进攻集团，动摇美军的进攻，迫使敌人停止进攻，争取制

止敌人于“三八线”以南，或“三八线”附近一线。

战役行动的部署是：决定组成东、西两个集团，西集团（“韩指”）由韩先楚副司令指挥 38 军、50 军和人民军 1 军团，在汉江南岸实施机动防御，以迟滞美军的进攻，并为东线部队集中与展开争取时间；东集团（“邓指”）由邓华副司令指挥 39 军、40 军、42 军、66 军及所属炮兵部队，实施战役反击，歼灭横城方向突出的南朝鲜军第 8 师和砥平里之敌，尔后向原州方向发展进攻；朝鲜人民军第 2、第 5 军团由金雄大将指挥（“人民军前指”又称“金集团”），在靠近东海岸地区向突出的南朝鲜军进攻。

邓华副司令要我负责组建东集团指挥所（简称“邓指”），并要我迅速出发，先去春川以南地区选择“邓指”的位置。我连夜出发，进到“三八线”以南的洪川西南花田里地区，发现这儿是梅花山、中元山之间的一片丘陵地带，树林较多，农户住屋较分散，没有遭到敌机的轰炸，房屋都是完好的，但老百姓都跑了。于是，我一改往常的做法，选择靠山离树林很近的一家大户（该户有个较大菜窖，可以用于防空）作为邓副司令住地，电台则设在附近的树林里，并要求人员和车辆务必隐蔽好。为了试探敌空军飞行员在这一带上空飞行时的反应，我挑选了一栋最显眼的房子，在白天生火做饭，尽管敌机往返飞行，却没有对此产生怀疑。我即规定所有人员白天进树林隐蔽，晚上不值班的都可进房屋里去睡觉。随后，我很快将指挥所布置好，并展开工作，迅速与“邓指”指挥的东集团各军、师的电台、无线电话沟通联系。

2 月 6 日拂晓前，邓华副司令员到达后，我把选择指挥所位置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并陪他现地视察了一遍，邓华副司令很欣赏这种不墨守成规，对敌采取虚虚实实的做法。

邓副司令看了他的住处后，对我说：“这个地窖比较大，你也住在这儿，我们两人住在一起，有事好商量研究，免得跑来跑去，耽误时间。”邓华司令员乍看很严肃，其实相处熟悉了，就会了解他是很和蔼、平易近人的，很关心体贴同志和下级生活的好首长。

二、邓华副司令员召开东集团作战会议。横城反击战取得胜利

邓华副司令员视察了整个指挥所的配置后，我说：“司令，您已经到了，是不是通知东集团各军长、师长来开个会，当面听取他们的汇报和意见，然后当面向他们宣布您的决心和下达作战命令。”

邓副司令说：“我正要向你讲开会的事，你立即发个电报通知各军长、师长今晚到指挥所来开会，听取他们对反击作战的准备情况和实施反击的具体行动意见，然后当面下达命令，一定要打好这次反击作战，更好地歼灭敌人。”我即迅速通知了各军、师长，请他们于2月6日22时前到达“邓指”开会。

为了防止被敌人发现，我在“邓指”住地的几条通道500米处，派出调整哨，请来开会的军长、师长在此下车，将车辆分散隐蔽好，然后步行到指挥所开会。

2月6日22时前，东集团各军、师长都按时到达“邓指”。22时开会。

邓华副司令员说：“今天开个短会，只开4到5个小时。先由杨迪介绍一下最新情况，然后研究我们反击作战先从哪儿打好。”

我即指着地图介绍情况：“西集团38军、50军及人民军1军团从1月15日开始，在汉江南岸抗击美军进攻，到现在已有20多天了，他们是在冰天雪地中进行防御作战，构筑工事相当困难，战斗打得非常艰苦、非常英勇，部队伤亡也比较大，现在已退到离汉江不远了，处于背水作战。如果我们东集团不能迅速实施反击，而西集团退到汉江北岸，那我们的反击就不好打了。东线，南朝鲜军为保障西线美军侧翼安全，敌第8师正向洪川方向进犯，并在横城以北地区形成了较大的突出部，有利于我军从两翼迂回包围将其歼灭。现有迹象表明，敌可能发现我军正在东线集结兵力，因此建议反击作战时间，最好在10日至12日之间。”

邓华副司令员在我介绍情况后，说：“我军是先打砥平里还是先

打横城之敌，请大家发表意见。”经过一番讨论后，一致认为先打横城有利，因为横城敌人比较突出，便于我军分割穿插和迂回包围；砥平里之敌不突出，恰在西线美军和东线南朝鲜军之间，可以得到两翼敌军的迅速增援，不利于我军迅速歼灭敌人。

邓华副司令的决心也是先歼灭横城突出之南朝鲜军第8师，现在大家意见一致，认识统一了，他非常高兴。虽然有个别师长提出感到时间紧一些，建议延长一天准备时间，邓副司令看那位师长是次要方向的师，就没有批评他，也没有理会他的意见。

邓副司令立即明确地宣布：我们必须迅速实施反击作战，粉碎敌人的进攻，毫不动摇地实现彭总规定的战役目的，歼灭敌人一二个师，为新入朝部队的开进和展开争取更多的时间。向横城地区南朝鲜军第8师发起进攻的时间定于2月11日17时，只有4天的准备时间，请你们回去后搞好战前动员，特别要将炮兵阵地选择好，尽可能靠前隐蔽，充分发挥炮火准备的威力。具体部署和任务区分是：40军突破横城敌阵地后，应迅速穿插分割包围，以全歼敌第8师；42军和66军和39军117师，向横城以南猛进，截断敌人的退路，并阻击原州之敌的增援；39军主力为预备队，战役发起后逼近砥平里，如敌南逃即应予以截歼。

邓华副司令宣布决心命令后，第119师徐国夫师长悄悄地对我说：“邓司令怎么不批评那个师长。”我说：“因为他不是原第13兵团的，互相还不太熟悉。如果是你这么说，一定会批评你。”他笑了，说：“我才不会说那样的话哩！”我也笑着说：“你是主力军的师长怎么也不会说这样的话。”

2月7日凌晨3时会议开完时，我让管理员抬来一桶热汤面，给大家充饥解寒，各军长、师长相当高兴。我风趣地说：“实在对不起，我们带的粮食不多，不能满足大家的需要，只能保证各位每人一碗。”大家听后哄堂大笑，都说：打了胜仗后，一定送美国罐头来，加倍地还你这热乎乎的面条。

各军军长、师长走后，邓华副司令要我将情况判断和决心部署写电报报告彭总和志司。

在发起进攻的前几天里，邓副司令要驱车到主攻方向上的师、团去了解情况和现地指导，要我留在指挥所掌握情况，进一步研究实施反击作战的具体事宜。我很担心他的安全，如果在我军发起反击前，主要指挥员万一发生不测事件，影响作战行动，这是我最大的失职，我是担当不起的。因此，我建议他不要跑多了，更不要太靠第一线。

我说：“副司令，帅不离位，您总是往第一线跑，太危险了，我可担当不起这个责任，这也不是您个人的安危问题，是关系到东集团的作战胜利。”

邓副司令说：“你不要说得那么严重，有些事我总要亲眼看看才放心呀！”

我说：“您可以授意给我，代表您去检查和传达您的指示，部队的各级指挥员我都熟悉，保证完成您交给的使命，如有特殊情况，我迅速回来向您报告请示。”因为邓副司令和我每天除了打盹的时间外（在这几天里没有正式睡个觉），都在一起研究战场情况，我对他的意图、想法、担心的问题和对哪个部队还要求什么都了解。因此，我就抢着先开车走了。邓副司令很信任我，也就默认了。

我每次从前线部队回来，邓副司令就一手夹着烟，一手拿着蜡烛看地图，听我的汇报，如有不当之处立即指出来，予以纠正，我马上记录下来。汇报完后，我立即写出电报或编出电报密语，发往有关军、师，这样既保证了邓副司令的安全，又使他的决心、部署能更具体地落实。

横城反击作战打得很好，从11日17时发起进攻，到13日晨结束战斗，歼灭南朝鲜军第8师3个团、美军第2师1个营、美军南朝鲜军4个炮兵营和南朝鲜军第3、第5师各一部，共1.2万余人。但在这次战役中，我军杀伤和俘虏的都是敌营以下官兵，而师、团指挥官见势不妙，都乘汽车逃跑了。他们虽然丢掉了部队和大量物资装备，但只要保住了脑袋和指挥机构，回去后即可补充兵员，重新补充武器和装备，保留原有番号，保留原职务，这也是南朝鲜军队在前几次战役中被我军歼灭后，摸索出来的“经验”。因为当时南朝鲜军经过训练的军官很缺少，有作战经验的军官更缺少。所以逃跑回去的军

官仍官复原职，继续带兵。

三、攻击砥平里受挫的原因

横城反击作战胜利后，“邓指”得到志司的情况通报和其他方面的情况报告，得知砥平里只有南朝鲜军不足4个营的兵力。为了扩大战果，邓华副司令员决心抽调集中39军、40军和42军的8个团兵力，于2月13日晚向砥平里发起进攻；以42军、66军主力及40军120师，向原州方向攻击前进，以阻敌西援砥平里。

2月13日晚我军向砥平里之敌发起攻击后，便遭到敌人坦克和炮火的猛烈还击，致使我军进攻受阻。

从抓到敌人的俘虏口供中得知，驻守砥平里的敌人不是南朝鲜军，而是法国军队的一个步兵营、1个炮兵营和1个坦克中队。我即对邓副司令员报告说：“真没想到，对敌情了解错了，不是南朝鲜军而是法军，敌人不逃跑而是固守。”接着，邓华副司令要我与他一起研究对敌人为什么固守砥平里，我军如何集中优势兵力歼敌等问题又进行了分析、判断。邓副司令决心集中兵力歼灭砥平里之敌，命令各军、师14日做好准备，并要我派参谋去重炮团（8匹骡马、牵引的美式105加榴炮），令其务于15日拂晓前赶到砥平里参加作战，归40军指挥。随即，邓副司令要我起草了重新进攻砥平里的命令，决心于15日黄昏，采取野战攻坚战的方式重新组织进攻，消灭这个法国营。

为了亲眼目睹砥平里战场的具体情况，以求能向首长准确地反映情况和提出意见，我对邓副司令说：“司令，我想到砥平里战场去看一看，当面听听军、师领导同志的意见，了解战场的实际情况，回来向您汇报，提供您下决心的第一手材料。”

邓华副司令说：“好，本来我想亲自去40军指挥所了解情况，现在你提出要去，那你就去战场看看部队的实际情况到底怎么样，直接与军、师领导同志交谈，征询他们对下一步怎么打的意见。要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我于2月14日黄昏后，乘车去砥平里了解情况。到达砥平里附近，只见敌机来回盘旋，不断地投下很多带小降落伞的照明弹，发现我军行动即狂轰滥炸和用机枪扫射，砥平里守敌也不断地炮击我向前运动的部队。我找到了39军117师指挥所，张竭诚师长一见面就说：“老杨，战场上的真实情况你都看到了，在砥平里这块很小的地域，集中的部队太多、建制也多，一个晚上要调整完部署并完成进攻准备，是很难做到的。这可不是叫苦叫困难，请你向邓副司令员反映一下，如果能再给一个晚上的准备时间就好了。”我说：“一定向邓副司令员汇报。”

我随后又找到了40军指挥所，温玉成军长见到我就喊：“杨迪，你来得正好，我们作战科刘印岐副科长去给重炮团选择阵地，就被敌发射的炮弹炸伤，新调来的重炮团，团营干部是到了，可火炮还没有到，120师正向这里急行军，一个晚上就要做好攻击前的准备，真是做不到。你赶快去向邓副司令员汇报，建议推迟到16日黄昏发起进攻。”

温玉成又说道：“歼灭南朝鲜第8师后，战场上各种武器、物资和汽车可多哩，我们还没有顾得上打扫战场。”

我于15日拂晓回到“邓指”，如实地将战场情况和温玉成军长、张竭诚师长的建议，向邓华副司令作了汇报。邓副司令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即把在返回路上所形成的看法作了汇报，我认为：从现场的实际情况看，推迟一天进攻是合理的，可是我们已经给了敌人3、4个白天了，要是再给敌人1个白天的时间，那就对我军进攻更为不利了。如果敌人要固守砥平里，可用飞机、坦克掩护部队增援；如果要放弃砥平里，可以利用15日白天在飞机掩护下使法国营撤走。美军是绝对不能让我们把法国营歼灭的，因为法国只派了一个营和一艘军舰来参战。若是法国营被我吃掉，那美国政府无法向法国政府交待。

我还判断：一、美军为了保证法国营的安全，很可能会派部队来增援；二、敌人为了保障西线美军侧翼安全，很大可能会固守砥平里，迅速调派部队来增援，我在现场看到敌人已经用坦克在砥平里外围展开，构成了一个环形圈，敌人以坦克作为防御工事，既有炮火又

有机枪和装甲，而我军没有反坦克炮，靠步兵送炸药包，只能将坦克链炸断，敌人仍可发挥火力与装甲的优势，砥平里外围较平坦，我送炸药包小组会遇到较大伤亡的。因此，我建议：现在应密切注视今天白天的敌情变化，如果得到新的情况，分析判断敌人确实要固守砥平里，那最好推迟进攻时间，或采用围点打援的方式；如果敌人要将法国营接出砥平里，因为敌人是机械化，又有空中掩蔽，我军宜采用沿途堵截的方式，争取歼灭其一部，如果用追击的方式，效果不会很大，我军两条腿是跑不过四个轮子的汽车。

邓华副司令员听了我的汇报和意见后，沉思一下说：“你把战场的实际情况和你的意见向我作了汇报，使我了解了真实的情况。我已在思考下一步如何行动，是打，还是不打的问题。现在我最担心的是今日白天美军将如何行动，是增援固守？还是撤退？现在暂不改变决心，等到下午二、三点钟，视情况再定。你通知各军、师，要部队隐蔽伪装好，阻援部队要随时准备战斗，堵截增援或退逃之敌，并派出小分队带报话机潜伏到公路附近，及时了解敌人的行动，迅速向指挥所报告。”我迅速将邓副司令的指示拟好电报发出后，即要电台和报话机，全部开机监听，防止可能出现疏漏下面报告的情况。

果然，收到报告，美骑兵第1师和英军第27旅在飞机的掩护下，从西线迅速向砥平里和原州两地增援，对我阻援部队展开猛烈攻击，并有20余辆坦克冲进砥平里。还获悉美第2师23团已于13日就已进入了砥平里。我将收到的敌情及时报告邓副司令员。

至当日（15日）14时30分，情况已很明朗，邓华副司令当机决断，要我迅速向各军、师发出停止进攻的密语，并迅速起草电报，发给东集团各军、师，说明敌情有很大变化，“邓指”决定停止向砥平里进攻，并令各部于当夜撤出战斗向北转移。同时，要我将情况的变化、“邓指”改变决心的意图报告彭总和志司。

2月15日17时30分，“邓指”收到彭总发来的电报，命令停止向砥平里进攻，迅速撤出战斗，部队向北转移。

接到彭总的电令后，我对邓华副司令说：“司令，你的决心和彭总的决心完全一致，这就更好处置了。”

邓华副司令说：“我下达停止进攻和向后撤退的命令后，心情是很复杂的，你可能也看得出来我当时的表情。我想，如果万一彭总有另外的处置，那怎么办？又要重新调整部署，就要给各军、师带来很多困难，现在好了，我的心也就放下来了。”

遵照彭总的电令，邓华副司令又要我再给各军发出奉彭总电令，停止进攻、撤出战斗的命令，并规定各军、师梯次向北转移的路线和占领阵地相互掩护，以防敌利用机械化的快速优势向我追击。

电报发出后，我考虑到正是敌我处于交错中，我军撤出战斗，绝对不能中断指挥，即向邓副司令员建议，指挥所待各部撤出战斗已与敌人脱离接触，部队向北转移后，再走，以便及时处置临时发生的意外情况。邓华副司令表示同意。

四、我到横城前线打扫战场，缴获了2辆美军新吉普车

在横城反击战胜利后，得知南朝鲜军第8师将新装备的美式重武器和车辆等等都丢弃在战场上，我就给志司管理处张仲三同志发了一份电报，请他派几名汽车司机来，准备到横城战场上去开回汽车，他很快就派来了。因部队紧接着打砥平里，没有顾得上。14日晚我到砥平里第40军指挥所，温玉成军长对我说了一句他们还没有顾得上去打横城战场。他这句话提醒了我，心想这次我一定要去打横城战场，开回一辆美军的新吉普车，不能像第2次战役后，在军隅里失去的机会。

2月15日下午彭总和邓副司令都决定停止攻击砥平里，在邓副司令指示下，我将指挥所应办的事做完后，部队都已报告先后撤离了砥平里战场。我即向邓副司令员提出，我想趁下半夜敌机活动减少的机会，去横城地区打扫战场，开回几辆缴获敌人的吉普车，邓副司令没有表示反对，只是嘱咐要注意安全。

我带着有关人员和司机来到歼敌现场，见到40军和42军都有一部分人在打扫战场，我与带队干部认识，因为40军、42军派来打扫

战场的干部、队伍不多，司机也很少，他们急着要撤走，就对我说：“杨处长，战场上的胜利品太多了，因为是南朝鲜军队丢下的，美国飞机还没有顾得上来轰炸，我们上半夜已搬走了不少东西，现在还有很多车辆和东西，汽车你们尽管开走，东西你们尽量装。”

我说：“你们倒挺大方的呀！”

他们无可奈何地说：“真舍不得这些东西呀！我们已没有什么办法都将它运走了，现在能运走多少就运多少，我们就要撤走了，天亮后，敌人即使到不了，可是敌人的飞机一定会来轰炸的，就都不是我们的了，你们快些干，离天亮时间不多了。”

我很快挑了两辆很新的美式小吉普车和2辆中吉普车，还有运输卡车，因带去的司机不够，我就自己开了辆小吉普车。我想要搞到的汽车不仅搞到了，而且还超过了计划，并在缴获的汽车上，装满了各种各样的罐头箱和军用品，于16日拂晓高高兴兴的回到指挥所。

五、邓华副司令员发出打砥平里受挫的检讨电报

当我高高兴兴、悄悄地走进菜窖时，看到邓副司令背靠菜窖墙坐着吸烟，像是思考问题。我有点发愣了，问道：“司令，你还没有休息？”

邓华副司令心情沉重地说：“砥平里没有打好，我能睡得着吗？我在思考失利的原因。你回来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看到邓副司令这种神情和这样的提问，使我打扫战场胜利而归的高兴心情一下子就没有了。

我没有立即回答邓副司令的提问，沉思了一会儿，非常坦诚地说道：“这次打砥平里的失利，一是我对敌情掌握和判断不准。在横城反击作战期间，只注重了当面之敌的动向，而忽略了对砥平里敌情的了解。战前原以为是南朝鲜军队，打响后知道是法国营，尤其是美2师23团于13日白天就到了砥平里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二是我有轻敌思想，对可能出现的情况估计不足。横城反击作战胜利后，想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地歼灭砥平里的敌人。13日夜我军攻击受阻后，

我在战场上发现敌人是利用坦克作环形防御，我想只要发挥我军连续爆破的长处，炸毁几辆坦克，打开几个缺口，仍能凭借我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和指战员的英勇善战，以近战打垮敌人。三是攻击部队建制太多，39军、40军、42军，三个军的部队都有参加的，这些部队又都是刚到达不久即投入作战，各部队之间的通信联络还没有沟通好，也就不可能做到很好的协同作战。四是敌人已形成据点式的防御，因兵力是法国营加一个美军23团，加上火力大大超过我军，我军参战的炮兵少，且弹药又不足，不能有效地支援步兵的进攻。调来的重炮团因行动迟缓，15日晨才到达，没有发挥作用。五是没有想到西线的美骑兵第1师和英军第27旅白天就上来了，对其增援部队来得这么迅速估计很不足。”

我停了一下，接着说：“好在您和彭总果断地命令停止进攻，撤出战斗，使我军主力避免了更大损失。尽管如此，我认为横城反击作战，歼灭敌第8师的胜利大于砥平里受挫。”

邓华副司令沉思了片刻，非常严肃地说：“我不能因指挥横城反击作战的胜利，就掩盖打砥平里指挥上的失误。你给我起草一个检讨报告，电报报彭总和志司，并发给各军。”

我为邓华副司令这种诚挚的态度、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和主动承担责任的高尚品德所感动，急忙说：“司令，是我没有当好参谋，对敌情了解和判断有错误，才影响了您的决心，这次失利我是有责任的。”

邓华副司令说：“你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这很好，但我怎么能怪你呢？我们所了解和掌握的敌情又不是你编出来的，这些天来你也是尽了力的。”听了首长这番话，我心里更觉得难受。

我说：“司令，您是不是回到志司后，当面向彭总汇报情况时再检讨一下。”

邓华副司令严肃地果断地说：“不，我的检讨不仅只给彭总知道，还要志司其他领导同志都知道，还要让各军领导同志也知道。因此，必须发电报，必须在我回志司前将电报发出。”然后口气转缓地说：“现在已是白天了，看来今天白天敌人的飞机主要是在寻找和侦

察我军的行动企图，大概不会来光顾我们这个小村子，我们不要猫在这阴暗的菜窖里，走，到上面房间里去，我说，你写。”

我们到地面房间后，邓副司令说：“你刚才讲的砥平里受挫原因有道理。但我的检讨要少讲客观原因，多从主观上来找原因。你准备好了纸和笔吗？”

我说：“已经准备好了，您说吧。”

邓副司令即向我讲了这份电报要从自我检讨的角度来写，并讲了要怎么写，问我领会了他的意思没有？我说：已经领会了。我没有多问，接着就写。邓华副司令抽着烟，沉思着在屋内走着，不时地向我交待几句应如何写。电报没有写的很长，把他要检讨的主要内容简明地写出来后，我即给他审阅。他心情很沉重地审阅着电报，并作了些修改，由他签字发出。（往常我起草的文电他是不签字的，看后即可发出）

电报发出后，我为了使邓副司令员轻松一些，就说：“我去横城打扫战场，开回来了崭新的中小吉普车各2辆。司令，你去看看吧。”

邓副司令就随我来到树林里。我指着一辆美式小吉普车说：“这是给您选的，只跑了200多公里。”接着又把打扫战场情况，作了有趣地汇报。并告诉他，已将带回来的各类美国罐头，除分给指挥所的同志们一部分外，其余的都要管理处装在缴获的卡车里拉回志司了。邓副司令看了这些战利品，情绪好多了，脸上出现了笑容。

2月17日拂晓，“邓指”回到志司。彭总的秘书杨风安同志见到我就说：“邓副司令员怎么还给彭总和各军发了个检讨电报呢？”我便把情况简要的作了说明，并问彭总有什么看法？杨风安同志告诉我，彭总没有说什么。后来志司召开总结会时，彭总对砥平里没有打好，只是说了邓华同志有个电报发给各军了，就没有再批评什么。参加打砥平里的各军军长见到我说，他们原来是有意见的，可是看到了邓副司令员的电报，认为司令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很受感动，意见也就没有了。并感到自己也有责任，需要认真地从中吸取教训。他们对邓华副司令员更加敬重了。

邓副司令员这份检讨电报，使我感受很深，受益也很大。一名高级指挥员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失误，并向上级、向同级、向下级公开承认和检讨自己的失误，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这种勇气是一个共产党员高尚道德情操和光明磊落品格的生动体现。

六、“邓指”撤离南朝鲜，我开“三个车轮”的吉普车返回志司

我在第3次战役随“韩指”越过“三八线”，进入南朝鲜东豆川，这次随“邓指”是第二次进入南朝鲜。我已经得悉当时美国政府有要求谈判停战的意愿。中朝两国政府也准备接受谈判停战。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也就是政治斗争的一种方式。敌我双方根据政治上和战略上的情况变化，需要改变或采取另一种斗争方式时，双方的政治家们就会适时地采取行动。根据当时敌我双方的情况，增加一种谈判的斗争方式，对双方都是必要的。但政治斗争（谈判）是要军事实力来支持的。敌我双方都增兵朝鲜，都是企图争取有利的地位来进行谈判。

我意识到这次返回“三八线”以北后，大概再也不会进入南朝鲜了。因此，在2月16日下午，我告诉管理员说：指挥所的同志们连续十几天不分昼夜地紧张工作，同志们都很疲劳，很辛苦，今晚全体人员改善伙食，会一次餐，将带来的少量的冻猪肉牛肉都做菜分给同志们吃了，并将缴获美军的肉类、饼干等各种各样的食品罐头分给各组，还有用罐头装的“马尿”酒（当时我们不知道叫啤酒，因那股味和颜色像马尿，我们就叫“马尿”酒），分发给同志们都尝尝。

吃晚饭的时候，我对邓副司令说：“司令，这几天您也没有好好吃顿饭，我已要炊事员把剩下的狗肉都炒了，多放点辣椒，再尝尝美国罐头，喝点酒解解乏吧。我已安排了指挥所的全体同志也都改善一下生活，我也馋了。”

邓华副司令望着我微微地笑了笑说：“我吃狗肉喝酒，你吃猪肉罐头和美国肉罐头解馋。”

我笑着说：“司令，我还馋你那半瓶二锅头好酒哩。”

邓华副司令说：“你原来是馋我的二锅头酒呀！好，今晚咱俩就慢慢把它消灭掉。”

我报告邓副司令说：“我计算我军部队16日黄昏后后撤，行军到半夜，完全可以与敌人脱离接触，拉开一段距离了，担任阻击任务的部队也占领了阵地，到16日日终（24时）我们就可以令各军、师直接接受志司的指挥，指挥所即返回志司，这样就不中断指挥，我们下半夜走，敌机活动也少些。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指挥所前进后，彭总与志司已进至金化以北下甘岭的一条山沟里，我们拂晓到，找志司新驻地也方便些。”

邓副司令说：“好，同意你的建议，指挥所今晚半夜走，回志司。你即给各军和志司发个电报，通知他们指挥所转移时间，并令各军于16日24时后，即直接归志司指挥。”我即遵照邓副司令的指示，迅速将电报发出，并通知指挥所各位负责同志，“邓指”于16日24时出发返回志司。

2月17日零时，“邓指”离开南朝鲜花田里。为避免敌机轰炸，我们采取分批开进，要参谋率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乘车先走，然后是由一名参谋带领少数警卫人员，跟随邓副司令乘车返回。

返回途中，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当时，我准备开着自己缴获的美式新吉普车走在邓副司令的后面。我对同志们说：“谁坐我开的车？”可是谁都不愿意乘坐我开的车，而去乘坐由我的司机开的那辆苏式吉普车。

大家说：“副处长，我们可不敢坐你驾驶的车，你开车的技术我们看到了，不怎么高明，路上行车，又是山路，有雪路滑，夜间行驶又不能开大灯，我们不敢同你玩命。”

我说：“好，我就带着警卫员，我们两个人来玩命，你们走我后面，如果我真玩出命来了，你们也好救我。”

果然在行进途中出事了，我开的车左后车轮胎被扎破跑气了。没有修理工具，我也不会换轮胎，即使请司机帮助换，要开大灯怕引来敌机，（我们夜间行车都是放倒挡风玻璃和车篷帆布罩，开小灯行

驶)我干脆就不换了,好在人少车轻,就用三个车轮跑,但车速就慢了,后面的车跟上来发现后,按喇叭叫我停车,我停车后,他们想帮我换轮胎,但没有小车的工具,我说:我的车载重很轻,车速又很慢,三个车轮一样可以跑。就这样,我用三个车轮开到了志司,我的这个故事,随即在司令部传开,成为同志们的笑柄。

丁甘如处长看到我这辆新吉普车,很喜欢,再三地转着看,又不好意思向我要。我知道他是喜欢这类东西的,就主动地说:“这辆车就送给你吧。”

丁处长说:“你好不容易从前线开回来,我不好意思要。”

我说:“我的目的是要亲自缴获美军吉普车,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很高兴。你喜欢就给你,咱们都高兴,下次我再去战场缴获新的。我也知道我这辆战利品,你不要我也保不住。”

丁甘如处长高兴地说:“那就不客气,我要了。”

七、重炮兵团遭受损失,很痛心

我于2月17日拂晓回到志司,将我所缴获的美式吉普车送给丁甘如同志后,即到作战值班室了解各军后撤的情况。作战值班参谋交给我一份电报,对我说:“杨处长,刚收到40军发来的一份电报,报告撤出砥平里时,配属该军指挥的重炮团,因行动迟缓,16日晚有一部分火炮没有能够撤出来,丢失了16门重炮。”

我一边听作战值班参谋说,一边看电报,当听到、看到丢失16门重炮时,我极为震惊,也很生气,心想这位团长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千方百计地将炮拉出来呢?困难再大、再多,也要想办法将炮拉出来呀!实在不能拉出来,也应该将炮炸毁,不能落入敌人之手呀!这是多么丢人呵!丢了步枪、机关枪,我们还可以向敌人去要,去缴获新的,丢了重炮,要缴获可就不容易了。几次战役敌人在战场上遗弃不少重炮,我们就是没有能力将重炮全部拉回来,这位团长,真不应该呀!

我想应将这个情况迅速报告邓华副司令。我拿着电报,跑到邓副

司令的住处，警卫员说，首长才睡不久，还没有起来，我没有理会就闯进去了。在战争年代因紧急情况，随时去叫醒首长，这是常有的事。邓华副司令也经常对我讲，有重要情况，他睡觉了或干别的事去了，一定要无所顾虑地叫醒他，或去找到他，报告他。

我闯进去后，即说：“司令，请你醒醒，有个不好的情况，我要向您报告。”

邓华副司令听到我的声音，立即睁开了眼，说：“什么事？快讲，我已经醒了。”

我简明地说：“刚才看到40军发来的电报，昨（16）日晚重炮团撤出砥平里时，丢了16门重炮。”

邓华副司令听后，忽地一下坐起来，很生气地说：“这个团长怎么当的，把炮都丢了，真可气，他不配当团长！”

停了一下，邓华副司令说：“我们4野在解放战争中，缴获国民党军这些美式重炮，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呀！他是一个老团长，怎么发生了这样可耻的事情呢？”

他又说：“你认识这个团长吗？”

我说：“我认识，而且还熟悉，在解放战争中，他就是炮兵团长，配合我们纵队作战，还配合得很好。”

邓副司令说：“过去很好，到了朝鲜被美国飞机轰炸吓的胆小了。这个人不能再当团长了。你去告诉炮兵司令部，要他们查明情况后，向我报告，如果是指挥错误，就撤职，送他回国。”

后来，这位团长就被免职，送回国了。

我从邓华副司令住处出来，回想起我在砥平里时，见到该团团长的情景：

2月15日拂晓前，我从砥平里返回“邓指”的途中，遇到正向砥平里前进的重炮团，这个团装备的是第4野战军缴获国民党军的美式105加榴炮装备起来的，每门炮是用8匹大骡马牵拉（当时没有美式10轮大卡车牵引）。我与该团团长很熟悉。

我即停车对该团团长说：“×团长，我刚从砥平里前线返回来，第40军温军长对我说，你们团先去选择阵地的团营干部到了该军，

但炮还没有到，他们很着急，你们团今（15）日拂晓前必须进入阵地，今晚黄昏，就要支援40军向砥平里攻击。现在离天亮只有三小时了，请你加快速度，一定要在15日拂晓前赶到砥平里进入阵地。多争取时间给大炮伪装，还有这么多骡马也要找地方隐蔽伪装呀！”

该团团长说：“杨处长，我是在尽快地向前赶呀！夜晚行军路很窄、又有冰雪，路面很滑，步兵部队又抢路，我不敢快走，一是怕拉炮的骡马跑着走，太累了，牲口也和人一样呵，给它们带的粮草一路行军已吃的所剩不多了，特别是黑豆快吃完了，得不到补充，黑豆是马的饭，草是菜，谷草还可以找一点补充，黑豆就是找不到，牲口饿了，拉不动炮呀！二是没有想到朝鲜道路太费马掌，经过几天行军，马掌磨损的很厉害，在冰雪的路上，马蹄打滑得很厉害；三是对道路不熟悉，夜间行军，万一一门炮滑掉到路旁沟里，要拉出来就很费时间了。”

我说：“老×，困难是有的，但你不早点赶到砥平里进入阵地，那困难就更多了，如果被敌人飞机发现了目标，你这个团一定会是敌机重点轰炸目标，那就不是困难了，而是不能支援15日晚上步兵向砥平里的敌人攻击，现在40军就是等着你的重炮支援他们的进攻。”

为了使我的话起到作用，我对炮团团长说：“我是奉邓副司令的命令，前来战场第一线了解情况和检查各部队攻击前的准备工作。请你不要顾虑太多，务必克服困难，加快速度前进，一定要在拂晓前到达砥平里进入阵地。”

我看他自己在徒步走，我又说：“老×，你率领的是骡马炮兵，驭手都骑在马上，战士都坐在炮车上，你怎么自己还徒步走呢？这样让骡马的速度也和你徒步的速度一样慢，这怎么行呢？你骑在马上，按骡马的正常速度走，也比按你徒步走要快得多。”

他苦笑着说：“我不敢让骡马走快了，怕出事呀！”

我看他这样顾虑重重，就用带一点命令的口吻说：“你不要顾虑困难太多了，时间已不多了，你抢到了时间就是胜利。即使有一二门炮掉到路边沟里，也可以暂不去拉它，留下该炮的人员慢慢拉，只要团主力到了就好。你现在就上马，快些走，放大胆子加快行军速度，

要赶路呀！”

我看着他上了马，说：“快走吧，祝你胜利。”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望了我一眼，用鞭子打了马，加快速度走了。我也上车走。我坐在车上想着，这位同志不像在解放战争时期配合步兵作战那股劲了，可能是刚入朝作战，被美军飞机的轰炸炸懵了，或者是出于对他的重炮和马匹的爱护？我不能明白。但他最后却因撤退丢炮被免职，真使人痛心。

第 八 章

第 5 次战役“打得急了一些”的原因。战役为什么分两个阶段

一、我军以极疲劳之师，在正面宽 200 公里，纵深只有 70 公里的防区内，抗击敌人进攻，使敌平均每天只能前进 1 公里，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1951 年 2 月 15 日横城地区反击作战结束后，美军及南朝鲜军在美国第 8 集团军司令李奇微的指挥下，利用其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的优势和制空权，于 2 月 17 日以小部队，采用“磁性战术”，尾随我后撤的部队，向我实施小规模的反扑，并不断扩大向我军的进犯。

根据敌情，彭总及志愿军其他首长，决心以运动防御的作战方针，迟滞敌人的进攻，争取 2 个月的时间。

为什么要争取 2 个月的时间呢？一是从国内向朝鲜前线开进的第 3、第 19 兵团，最快也需要在 4 月中旬才能到达“三八线”以北地区；二是几十万大军进入朝鲜作战，后勤供应量很大，需要争取足够的时间，使后方的物资、粮弹运到朝鲜前线战场，以保障部队有吃的、有打的、有穿的、有用的等等；三是在朝鲜东线的第 9 兵团主力（所属第 26 军已向三八线以北开进）还需要时间进行休整补充，才能全部投入“三八线”作战。

在当时，我军第一批入朝部队，经过连续 4 次战役的作战，已经

处于极度疲劳，人员伤亡和物资消耗很大，因战线拉得很长，从鸭绿江到“三八线”，前后方距离约 500 公里至 700 公里，供应线遭敌机狂轰滥炸，极大地影响了各种物资向前方的输送，部队不能得到及时的休整、补充。

在这种极端困难和非常严峻的形势下，志司作战处根据彭总的决心分析了敌我双方情况，研究了应敌措施，提出了对敌实施运动防御的初步方案。我将同志们的意见整理后，向解参谋长作了汇报。认为：我军要在汉江北岸、砥平里、横城，一直到朝鲜东部海岸的“三八线”以南地区，组织东西正面宽 200 余公里，南北纵深只有 60 到 70 公里的对敌运动防御作战，必须要争取 2 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每天最多只能让敌军前进 1 公里。战斗将是非常艰苦、非常困难的。但是，敌人的处境也很困难，美军第 8 集团军经过我军 4 次战役的打击，败退到南朝鲜，也没有得到休整，李奇微采取边整顿部队边投入作战的方法。东线美第 10 军从长津湖、咸兴败退撤到朝鲜南部后，也没有得到休整就投入正面作战，其后续部队正在海上输送途中。南朝鲜军各师大都是被我军歼灭后，重新组建的新师，没有什么战斗力，决不敢再贸然突进。

我们判断：敌人在重整败退的部队和缺乏后备力量的情况下，要在宽大正面上展开全面进攻，也是顾虑重重的。因此，建议采取类似第 3 次战役后，我军在朝鲜汉江南岸阻击战的运动防御方式，将我志愿军现有的 6 个军和朝鲜人民军 4 个军团，进行梯次配置，实施宽大正面的对敌防御。要构筑好野战工事，组织好各种火力，炸毁敌北进的所有道路、公路桥梁，依托纵贯山脉的地形，控制好各制高点，扼守住咽喉要道，在山与山之间的山沟通道两面，组织各种武器，充分发挥多层次、多种武器的交叉火力，封锁山口和道路，并在通过山口的公路上多埋设反坦克地雷，在道路两侧组织用炸药包或反坦克手雷打敌坦克的小组，对敌进攻展开层层拦阻。同时，充分利用夜间，派出小部队进行小规模反击和偷袭，不断歼灭小股敌人，积小胜为大胜。只要我们准确地掌握敌情，组织好前后两个梯队作战与休整的交替，争取 2 个月的时间，还是可以做到的。

解参谋长听取了 my 汇报后，又同我进行了仔细地研究，形成了提供给彭总和志司其他首长讨论研究实施运动防御作战方案的意见。

2月17日，彭总以中朝联合司令部的名义发布命令决心：我志愿军与人民军全线转入运动防御，争取2个月的时间，使新入朝参战的第3、第19兵团能迅速开进至“三八线”以北地区集结、展开，并争取第9兵团主力在咸兴地区多休整些时间，然后南下开进到“三八线”以北地区集结、展开。同时争取时间，抓紧改善后方交通运输，补充和储备作战物资。待进犯之敌，全部进至汉江以北，置敌于背水作战。

运动防御的作战方式是：重点设防，梯次配置，扼守要点，以点制面的部署；兵力部署采取前轻后重的配置，以减少伤亡；火炮部署则采取前重后轻，以充分发挥我现有炮兵的火力，争取多杀伤敌人；部队采取轮番交替作战，节节阻击进犯之敌；各军、各军团因地制宜，采取各种有效的作战方式，尽最大能力迟滞敌人的进攻速度，缓慢地诱敌再次越过“三八线”，进至我后续部队集结地区附近，尔后展开大规模反击，即发动第5次战役。

彭总下达命令后，要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邓华主持志司全面工作，指挥机动防御作战。彭总即于2月20日急速回国，当面向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汇报朝鲜战场的实际情况，并共商下一阶段作战方针和各种具体困难问题的解决办法，直至3月9日，彭总返回志司。

写到这里，说个故事。彭总连夜回国，到安东乘坐接他的专机，第2天（21日）中午到达北京，他急于向毛泽东汇报，先到中南海，又到玉泉山，毛泽东刚睡觉，他就闯了进去。可见彭总是多么紧急的心情呵！（这就是后来传说的，竟敢在毛泽东睡觉时闯进去的“事件”）

从2月17日至4月21日，在两个多月的运动防御作战中，志司作战处昼夜不停地工作着。为了及时掌握敌我双方情况，保证彭总和邓华副司令等志司首长的决心、命令、指示迅速而准确地下达和贯彻执行，我们调整了分工，以一个科负责新入朝部队开进、集结情况的

掌握；以一个科负责正面各军防御作战情况的掌握和研究；我则把主要精力放在正面作战上。我与作战处的同志仔细分析战场变化情况，及时提出处置建议，并及时总结和交换了部队在防御作战中创造出来的新鲜经验和动人的事迹，千方百计地使担任防御的各部队，必须达到彭总要求在200公里的宽正面，60至70公里的防御纵深，迟滞敌人的进攻，争取2个月时间的目的。

我军第一线防御的各部队，以机动灵活的战术，采取运动防御和阵地前反击相结合，顶住了敌人的疯狂进攻，为我新入朝参战部队开进、集结和展开，硬是赢得了极为宝贵的2个月还多几天的时间。各军、师很好地完成了彭总赋予的极为艰巨的任务。

我军在国内作战时，在敌优我劣的条件下，由于有广阔的空间，我军可以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以少数兵力在正面进行防御，牵制和迟滞敌人的进攻，而将主力绕到敌人的侧后去，从后面向敌人发起主要进攻。但在朝鲜作战，因为朝鲜是一个狭长的半岛，在这样特定的条件下，不能像在国内作战，特别是敌人占有绝对优势制空权和制海权的条件下，我军只能进行这种名为机动防御，实际上是阵地防御性质的作战，因为在有限的地域机动作战，既受狭小的地形限制，又受完成作战任务的时间限制，无法大机动，也不可能大机动。只能与敌人正面胶着，根本不能与敌人脱离接触，只能在战术范畴内的机动。

二、第5次战役“打得急了一些”的主要原因

当时我军从各方面得到情报，美国已从国内增兵朝鲜，并有2个师运到日本。南朝鲜军新组建的3个师正在日本组编训练。美军为了配合正面进攻，很可能要重演仁川登陆，截断进至洛东江的朝鲜人民军后路的故伎。美军可能企图首先从朝鲜东海岸元山一带登陆，从侧后向我东线部队进攻，然后从西海岸镇南浦一带登陆，东西对进，截断朝鲜蜂腰部（即安州到元山一线），企图与正面进攻之敌前后夹击我军。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对这些情报很重视，也

很着急。

根据以上对敌人情况的了解与分析判断，当时毛泽东主席的决心是：应力求避免长期相峙在“三八线”，待第3、第19兵团到达后，我军应准备趁敌人进入“三八线”南北地区，立足未稳时，对敌人实施战役反击，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军，力争成建制地歼灭敌军5个师（其中有美军3个师）数万人，然后向南推进。

彭总遵照毛泽东主席的电令，决定组织实施第5次战役，歼灭敌人几个师，迫敌败退到“三八线”以南去，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

解参谋长要求志司作战处迅速拿出实施这次战役的具体实施方案。

早在3月上旬，当我了解到彭总有意待新入朝兵团到达后，有向敌人发动更大规模战役反击的作战意图时，我就和作战处的有关同志着手研究拟制第5次战役的作战方案，并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设想了具体处理意见，以便适时地为彭总和志愿军其他首长提供研究和定下战役决心的参考。我们根据解参谋长的要求，以3月上旬所形成的初步方案为基础，结合新的变化情况，又进行了认真研究和修改，很快就形成了新的战役反击的实施方案。

我向解参谋长汇报了作战处研究形成的第5次战役反击的实施方案，着重讲了以下几点：①这次战役与第3次战役相同之处，都是首先从正面突破敌人的防御，然后再向纵深穿插迂回。这次我军的兵力要比第3次战役大得多，与敌军地面部队兵力对比为2:1，占有较大的优势。虽然我军兵力上占优势，但是要充分估计到我军担任主要进攻任务的第3、第19兵团，都是新入朝的部队，还没有取得对美军作战的经验，这样就可能要影响到我军兵力优势的发挥。同时，由于敌机械化程度高，炮兵和坦克比我军多，且占有海、空军的绝对优势，所以，我军仍应发挥夜战近战的特长，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和失误。实施正面突破的部队，要不失时机地迅速穿插和迂回包围敌人，力争拂晓前歼敌。根据第3次战役的经验，实施战役迂回包围的部队，要敢于白昼行军作战，与敌人靠的越近，就可使敌空中与地面炮

火的优势得不到发挥。②进攻的主要地段，选在金化、华川地区为宜，这便于我军的集结与展开。为了有利地造成战役上的迂回包围，是否也可考虑将进犯之敌放到金化、铁原地区，扩大其突出部，尔后以第3兵团从正面突破后，向东南攻击，第9兵团从正面突破后向西南攻击，对敌实施向心突击。第19兵团从第3兵团右翼突破临津江，向东豆川、议政府方向进攻；第39军、第40军则在第9兵团左翼突破敌防御，直插加平、春川，从而将东、西敌人割裂，以保障第3兵团、第9兵团和第19兵团更有效地迂回包围歼灭敌人；③战役发起时间，最好是在4月25日以后，以使我新入朝部队略有喘息休整时间，恢复长途行军疲劳，了解熟悉敌情和进攻方向的地形。但由于我们已得到敌人企图向我朝鲜东、西海岸实施登陆作战的情报，因此，我军第5次战役发起的时间，一定要争取在敌人实施登陆作战之前，以粉碎敌人企图在我后方登陆作战的计划。我们作战处和情报处一定密切协作，注意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

听完汇报后，解参谋长又找我和作战处的同志对拟制的战役实施计划进行了修改，以供志愿军首长召开会议进行研究。

我军得到的情报，敌人从东海岸登陆的企图越来越明显。彭总很担心这种不利于我军的情况出现。1951年4月6日，志愿军党委会，传达了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关于“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战略方针，及有关进行第5次战役的指示。为了粉碎敌人从我侧后登陆，配合从正面向我军进攻的企图，我军要争取在敌人登陆之前，即向正面之敌实施反击。我军实施第5次战役的主要目的是“消灭敌人几个师，粉碎敌人的计划，夺回主动权。”反击的重点在西线，主要是消灭美军（当时，西线的敌人有美军第3、第24、第25师、英军第29旅、土耳其旅，南朝鲜军第1、第6师）。

根据我们的计算，入朝的第3、第19兵团最快可于4月20日左右到达“三八线”以北地区。因此，彭总和志愿军其他首长决定：如果正面进攻之敌进展快，我则于4月20日左右实施战役反击，如果我军防御部队能继续顶住敌人的进攻，拖延时间，使敌进攻速度减慢，我军即予5月上旬实施战役反击。

我军正在紧张地进行战役准备的过程中，情况发生了变化。4月1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撤掉了美军远东总司令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由朝鲜战场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升任美国远东军总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范佛里特中将接替李奇微任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根据杜鲁门不再扩大朝鲜战争的旨意，采取稳步向朝鲜北部推进的方针，企图取得有利态势后，以实力为资本，与我进行停战谈判。随后，我军又获悉，美国国民警卫队第40、第45师已运到日本，南朝鲜新组建的3个师也在日本抓紧整训，并积极扩建金浦、釜山等空军基地。对此，我和作战处的同志进行了分析和判断，认为敌人可能使用这些部队从我东海岸元山一带实施登陆，从侧后向我军进攻，配合正面进攻之敌，以截断我正面防御部队的后路和供应线，形成有利的战略态势，妄图再次出现仁川登陆后的局面。

彭总很担心出现我军处于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特别是我军已按向敌正面进犯之敌发动战役反击进行了部署，若把几十万部队在短时间内重新调整部署，那是相当困难的。为此，彭总十分焦急，要求志司作战处再认真地分析一下敌我双方情况，提出发起进攻的时间是否可以提前几天的意见。作战处研究认为，4月21日前各兵团可以集结完毕，进至进攻出发位置，但各军、师第一梯队不能进至发起冲击的位置，炮兵亦难都进入阵地和完成射击准备。因此，对敌发起进攻的时间，建议以25日左右为好。我们将研究的情况和意见，向邓、洪、韩、解等首长汇报后，他们都表示同意，并向彭总作了报告。

三、第5次战役“打得急了一些”的另一个原因

彭总听取了志愿军司令部的意见后，还想直接听取各兵团领导同志的意见。遂召集第3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副政委杜义德（陈赓司令员兼政委因腿伤发作，正在国内医院治疗，还没有赶到），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副司令员陶勇等到志司开会。志愿军的副司令员、副政委和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及炮兵、工兵指挥所的领导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丁甘如处长

和我等有关处长列席了会议。

会议开始后，彭总讲了当前敌人的情况与企图，并着重讲了毛泽东主席和他很担心美军在东海岸登陆，如果敌人先我在东海岸登陆，将使我军处于腹背受敌，现在我军的战役部署态势，是准备向正面进攻之敌实施战役反击。因此，我军的战役反击作战，应力争在美军登陆前实施。这次召集各兵团领导同志来开会，主要就是讨论研究这个问题，征求同志们的意见。

各兵团司令员都汇报了各自兵团入朝后的开进情况，都说可以在4月20日前到达“三八线”以北的进攻出发地集结完毕。并说，先入朝的老大哥军都派来了顾问，已分别到达各军、师，介绍朝鲜情况和协助指挥。各兵团政治委员也都汇报了入朝后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从国内到朝鲜一路都进行了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现在指战员战斗情绪都很高涨，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认识提高得很快，对打败美国鬼子也很有信心，都想很快与美国军队交手较量较量。

新入朝参战的各兵团首长，因为没有与美军作战的经验，有轻敌思想。从这些新到的兵团首长的发言中，都表现很有信心、很乐观，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第3兵团王近山副司令员汇报兵团情况后，说：“彭总，我们1个兵团消灭敌人1个师不成问题，我保证还要捉5000个美军俘虏兵。”

当时参加会议的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洪学智、韩先楚等首长，听到新来的兵团领导同志都是乐观情绪和必胜的信心，就都不好说什么了。他们认为这些同志没有与美军较量的经验，光用打国民党全部美式装备的五大王牌军的经验来看待美军，这种乐观和信心不是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的。

邓华副司令员很婉转地说：“根据我们4次战役的作战经验，美军可不是有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王牌军，美军有绝对优势的空、海军的支援，坦克和炮火比国民党王牌军装备的质量与数量都强多了。前4次战役我军虽然胜利了，但我们西线6个军和东线第9兵团都打得很艰苦。”志愿军的副司令员们与新来的兵团司令们，他们在国内解放战争后期都是兵团司令或副司令，彼此都是在一个等级上，都是身经

百战的战将，在当时情况下，志司几位副司令员想要说服他们，是说服不了的，因此，也就不便多说什么，以免他们误认为是对他们的傲慢。第9兵团宋时轮司令员，经历了第2次战役的东线作战，已有了与美军作战较丰富的经验，该兵团各军、师已进入冲击出发阵地，他也就保持沉默不说什么了。

我听到这几位兵团首长的发言后，心想他们同我们刚入朝时的思想差不多一模一样，我们当时也是盲目的乐观与自信，经过与美军4次战役的较量后，才从实战中得出了正确的认识。我们先入朝的第13兵团6个军和第2次战役入朝的第9兵团3个军，连续打了4次战役，还没有成建制地消灭过敌人一个整师，只是歼灭了团（南朝鲜军的团称联队）以下单位，而且敌人的团部主要指挥官都乘汽车或坦克跑了。4次战役共俘虏美军和其他各国军人也只有5300多人。他们太轻敌了。据说，王近山副司令员历来在作战中勇敢不怕死，有股疯劲。

我悄悄地向解方参谋长说：“现在各兵团所辖的各军、师，4月20日还只能到达进攻出发地，距离冲击出发阵地还有二三十公里，炮兵还没有进入发射阵地，各军、师与炮兵的步炮协同的具体实施计划还没有拟制好，这怎么能发起进攻呢？”

解参谋长也悄悄地说：“你看会上的气氛，连邓副司令说的话，他们都没有听进去，洪、韩副司令都不便说话，我怎么说，等等看看情况再说。”

彭总在听取了各位兵团司令、政委的汇报和发言后，大概认为第一线指挥员的意见，是更接近实际的。因此，即决定于4月22日黄昏（17时）发起第5次战役，向正面进攻之敌，实施战役反击。

写到这里，我想说一说与这段历史有关的插曲。抗美援朝战争结束30几年后，即1986年我到大连去看望曾思玉老首长，曾思玉司令告诉我，他正在写抗美援朝战争的回忆录。他当时任第19兵团第64军军长。

曾思玉司令对我说：“我们军入朝参加第5次战役，我64军的第一梯队还没有进到冲锋（击）出发位置，就接到了要我军发起进

攻的命令，我当时即打电话给兵团杨得志司令员，报告他部队还没有进入冲锋出发位置，炮兵还只是正在进入阵地，都还没有准备好，怎么就要发起进攻冲击呢？是不是给我一天的准备时间？杨得志司令员回答说，你不要问了，按照命令执行吧。我一直到现在还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杨迪同志，你把你知道的情况对我谈谈好不好。”

我笑着说：“老首长，你以后没有再问杨得志司令员吗？”

曾思玉说：“不好问呀！还是你说说吧。”

我回答说：“现在事情已过去 30 多年了，我就说一下吧。”我把当时志司召开的兵团首长会议时，各位兵团司令在会上的汇报、发言并向彭总打保票，都很乐观很有信心打胜第 5 次战役，而且说部队都已经准备好了，只要彭总下令，就可以发起进攻的情况讲了。这些兵团司令乐观、轻敌，特别是第 3 兵团王近山副司令保证要捉 5000 个美军俘虏兵。在这种气氛下，邓华副司令员委婉地说了一下情况，他们没有听进去。洪学智、韩先楚副司令员都不好说话了。当时彭总很担心美军从东海岸我军侧后登陆，由于各位兵团司令员、政委的汇报、请战这些因素，使彭总定下决心，命令于 4 月 22 日黄昏发起第 5 次战役。

我说：“当时你给杨司令打电话，请求给你一天准备时间，他能向彭总报告吗？因为他们都已向彭总打了保票，拍了胸脯的。”

曾思玉同志听后，说：“呵！原来如此，当时杨得志司令在电话中拒绝我的意见后，就把电话挂了。我看杨得志司令不接受我的建议，就急了，立即乘车赶到担任突破任务的第一线师，对他们下了死命令，要求他们不惜一切地必须迅速跑步进入冲击出发位置。我们总算匆匆忙忙地按时发起了进攻，突破了临津江敌人的防御，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我说：“曾司令，你指挥的第 64 军和你们兵团是打得好的。可是，真苦了第 3 兵团的部队了，他们担任突破的部队在发起进攻后跑了一段路，才发起冲击的，炮兵的炮火准备时间已过去了，已在实施延伸射击了。”

四、志司作战处为实施第5次战役，紧张而有序地工作

4月上旬，为了贯彻志愿军党委召开的扩大会议的决定，根据志愿军首长意图，在解参谋长指导下，我和作战处的同志研究起草了以志司名义下发的《战役指导与战术思想的指示》的电报，进一步阐明了第5次战役的指导方针，规定了战役战术作战行动原则，提出了对各级首长和司令部的具体要求，这为尔后战役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4月中旬，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作战部队，已增至15个军和8个地面炮兵师，4个高射炮兵师、1个坦克师。此外，后方还有6个后勤分部和高射炮兵、工兵、铁道兵、公安师等部队。前后方增加了这么多的兵种，总数近80万人，这对志愿军司令部及其作战处，实施组织指挥和组织协调，的确是个很严峻的考验。

进行第5次战役的筹划与准备，志愿军司令部在解方参谋长的领导下，以作战处为中心，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极其艰苦的脑力与体力劳动。例如：组织部队开展战前练兵，侧重解决战术问题；从第一批入朝部队中选派干部去新入朝部队当顾问，介绍情况和协助指挥；指令各兵团与各军，严密组织战役、战术侦察；指令后勤兵站向前输送和囤积粮食、弹药，准备部队通过“三八线”150公里无人区时所需的干粮；指令铁道兵、工兵部队准备充足的修路修桥的器材，做到随炸随修，确保运输线畅通；指令卫生部门做好准备，及时收治和抢救伤员；拟制对空防御作战方案，明确注意事项，等等。为此，我和作战处的同志们经常进行研究，并乘车到部队或现场去检查落实情况，根据我们研究和了解的情况，对以上各项工作总是积极向志司首长提出建议，并将志愿军首长的指示迅速传达给各兵团、各军和各兵种贯彻落实。

为了工作协调通畅，我感到必须尽快熟悉新入朝部队首长的特点和司令部及其作战部门的工作习惯与方法。于是向解参谋长建议：

一、从各兵团调一名主力参谋到志司作战处工作，以便在使用部队上能向首长提出较为准确的意见。二、作战处的同志要到各兵团、各军去认识指挥员和部门领导同志与参谋人员，以利于工作的开展和协调。三、请各兵团作战处处长来志司作战处开个短会，相互认识，交流情况，直接听取意见，以利于沟通思想和工作配合。四、请志司通信处与各兵团通信处研究落实好上下级及友邻之间的通信联络。战役开始前，为确保行动秘密，志司与兵团、兵团与军、军与师之间，实行无线电静默，主要靠有线电话联络，但无线电要保持不间断地收听。战役发起后，志司与各兵团、各军、各师都要开通无线电和无线电话联络。先入朝部队仍采用密语表通信方法，新入朝部队可沿用本兵团过去行之有效的通信方式，但各兵团和各军对志司的通信联络要取得一致。

解参谋长听取了的这些想法和措施后，表示同意，并指示抓紧时间落实。

五、新入朝兵团仓促投入战斗，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情况

第5次战役开始后，由于我新入朝各兵团的第1梯队各军、师并没有完全按计划进到预定的冲击出发位置。因此，冲击开始后，发生了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比如：有的步兵因距离敌人还有一段距离，接敌运动要跑步几公里，炮兵实施炮火准备时，不能实施冲击。步兵冲击时，正需要炮火掩护，而炮兵已按预定协同计划，实施延伸射击了，因此，步兵没有得到炮兵掩护；有的部队虽然在炮火掩护下，实施冲击，突破了敌人的防御阵地，并包围了小股敌人；但天亮后敌人又在飞机、坦克和炮火的掩护下突围逃跑。

敌人已了解到我军所携带的粮弹只够一个星期使用（即所谓“礼拜攻势”），所以学得比以前乖巧了。当我军利用夜间向其发动进攻，他们既不硬顶也不退逃，每天夜晚向后只撤退30公里左右，如有部队被围，则以坦克作环形掩护就地坚守，等待到白天，在空中轰

炸扫射、炮兵用密集火力射击掩护下，以坦克开路突围。这样，就使我军连续几个夜间的攻击作战，都未能达到成建制歼敌1个师、1个团的目的，且部队已接近汉江平原，战场地形对我趋于不利。

针对这些情况，我和志司作战处进行了认真研究，即向解方参谋长汇报，认为：我军兵力虽占优势，但战场地域狭窄，我军已接近丘陵的汉江平原地区，地形对我军不利，正面平推所集中的兵力密度过大，易遭敌空中和地面炮火的袭击，这不仅不能大量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会加大我军的伤亡。这次战役不像第3次战役那样，敌人是决不会轻易放弃南朝鲜的首都汉城的，他们很可能将我军几个进攻兵团诱至汉江平原，尔后以其空中和地面坦克、火炮的优势妄图重创我军。基于此，我们建议：我一线进攻部队不宜攻得过远，主力也不宜逼近汉城。

解参谋长听取我的汇报后，又与我反复进行了研究，并将我们对情况的分析和部队行动的建议向志愿军首长作汇报。

4月29日，彭总命令各兵团停止进攻，各兵团以一部分兵力占领有利地形组织防御，以防敌军乘机反扑，主力则后撤休整和总结经验。

六、第5次战役为什么还要打战役的第二阶段

第5次战役没有达到毛泽东主席预期歼灭敌人几个师的目的。彭总认为集中几个兵团几十万人的兵力，没有达到预期的战役目的，就不可能改变战场的被动局面，也不可能达到阻止或破坏敌人企图从朝鲜东海岸我军侧后登陆的目的。因此，决心继续进攻，以求达到第5次战役的预期目的。这样就把4月22日至29日的战役反击，作为第5次战役的第一阶段。

第5次战役第一阶段，选择在西线，主要企图歼灭美军3个师另3个旅，没有达到目的。第二阶段就改在东线，主要企图歼灭南朝鲜军6个师和美军一部。

第一阶段进攻刚结束，彭总和志愿军其他首长即开始筹划发动第

2次进攻（即战役的第2阶段），决心集中第3、第9兵团和朝鲜人民军第2、第3、第5三个军团，打东线南朝鲜军，力争第一步歼灭其2至3个师，得手后，再歼灭其2至3个师。以第19兵团和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在西线，实施进攻，以迷惑敌人，牵制西线的美军。经过第2阶段的进攻，从而达到歼灭敌人，破坏和阻止敌人正面的进攻，彻底粉碎敌人的登陆计划。

遵照志愿军首长的意图，我和作战处的同志们研究拟制了第2阶段的战役反击作战计划。

当时敌人在东线的南朝鲜军有第3、第5、第9、第7师及首都师、第11师。我们计划：东线我第9兵团和朝鲜人民军前指3个军团，第一步包围歼灭南朝鲜军第3、第5、第9师，得手后，再歼灭第7师；第3兵团割裂美军与南朝鲜军的联系，积极牵制阻击美军第10军不得东援，并力求歼灭美军第2师一部。西线第19兵团和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为了迷惑敌人，提前于5月上旬即开始行动，进逼汉城附近。

经过半个多月的准备，中朝联军于5月16日18时对敌发起第5次战役第2阶段的反击作战。

战役开始，进展还较为顺利，第19兵团在西线的反击作战，开始时造成了美军的错觉，使美军注意力集中在西线，配合了东线我军的突破进攻。可是到5月20日，情况发生了急变，“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和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很快清醒过来了，一改过去消极防御节节后撤的方式，转而集中西线美军在汉城以北向我第19兵团发起进攻，并迅速命令美军第10军向洪川方向以东增援南朝鲜军，美第3师则由汉城东南向北增援。

战场情况的瞬息急变，出乎我们作战处的意料。

我和作战处的同志们迅速研究分析急变的情况后认为：美军一改前几次战役的作战方式（即我军发动战役反击后，敌人就迅速后撤的方式），而改为我进敌也进的作战方式。这是敌人不仅已经熟悉了我军进攻只能坚持一个星期的规律，而且也判断到我军这次战役进攻，不是主要对西线美军，而是企图歼灭东线的南朝鲜军。

敌人已经有了我军第2、第4次战役都是选择从保障美军翼侧的南朝鲜军突破后迂回到美军侧后的教训了，同时也研究总结了我军发动第4次战役，先选择在东线歼灭横城地区的南朝鲜军后，即向砥平里进攻，当时敌人迅速从汉城南岸抽调美军1个师、英军1个旅增援砥平里，就迫使我军只有停止进攻，迅速后撤。看来，美军总司令李奇微比麦克阿瑟善于总结经验教训。

因此，这次我军在东线发起进攻后，敌人充分发挥它机械化部队运动迅速的优势，以美第10军及第9军迅速向东线支援，以堵住被我军突破南朝鲜军的缺口，并以美第1军（3个师、3个旅）向我进至汉城以北的第19兵团和人民军第1军团发动反击进攻。美军第8集团军全部展开，向我实施全线反击，使我军东线深入敌纵深实施包围、迂回的部队受阻，西线我军亦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

我军从国内新入朝的部队，经过第一阶段作战后，没有得到休整恢复，而最先入朝的部队，始终没有很好的休整和补充。第5次战役第2阶段作战，从5月16日开始已连续作战4至5昼夜，携带的粮弹消耗很大，得不到补充。在美军全线猖狂反扑下，我军已不可能再继续前进，必须停止继续进攻，收拢部队，迅速转入防御并向后撤退，以防止敌人机械化部队沿公路突进，将我军各个截断。

还有就是朝鲜的雨季将到，已开始下雨。如果下大雨暴雨，引起山洪暴发，对我军的行动更为不利。

根据以上的研究分析，我们作战处向解参谋长建议：我军应立即停止进攻。西线第19兵团和人民军第1军团迅速转入防御；东线第3、第9兵团立即向后转移，占领有利阵地阻击敌人反扑进攻。在向后转移时，各兵团应组织好交替后撤，节节阻击敌人，掩护我军向后转移。东线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则可利用东部大山占领有利的制高点，阻击敌人的反扑。

解参谋长听取我们的意见后，又和我们进行了研究，即迅速向彭总和志司其他首长进行了汇报。

5月21日，彭总决心停止进攻，结束第5次战役第2阶段作战，命令各兵团于5月23日晚开始后撤。

第九章

第5次战役第二阶段后期，没有意料到的悲剧和惊喜。美国急于要谈判停战。有关计划打第6次战役的内情

一、敌人向我军反扑进攻行动异常迅速，这是我们没有意料到的

5月21日，彭总下达结束第5次战役第2阶段作战的命令后。我们从各方面得到的情报，向我反扑的美军及南朝鲜军，不仅没有停止进攻，敌人在完成全线展开后，即在东、西线加速了向我全面进攻，而且行动异常迅速，企图割裂我军。

我们作战处研究后，立即向解方参谋长建议：我后撤的各兵团、各军应提前于5月22日开始转移，否则很可能被敌人缠住或插乱，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损失。彭总和志愿军其他首长同意我们的意见，电令各兵团提前开始向后转移。

作战处遵照彭总提前转移的命令，迅速用电话催促各兵团、各军务必于5月22日晚与敌人脱离接触，迅速分梯次地掩护向后转移，注意采取各种方式，迟滞敌人沿公路插入我纵深。

正当我军各兵团、各军于5月22日晚提前撤出战斗向后转移时，因为我军没有制空权，只能在夜间行动，23日拂晓前我军刚转移至

新的阵地和准备休息做饭时，敌人于5月23日白昼，即开始向我全线大规模反扑。

敌军机械化装备运动很快，我军后撤可通行的道路又少，这对我军向后转移极为不利。我将作战处研究的意见，又向解方参谋长作了汇报：（1）各兵团的第二梯队应迅速占领有利阵地，扼守住交通要道，阻击敌人反扑，第一梯队应避免开大路，从小道迅速后撤；（2）各军、师、团首长要切实掌握部队，加强同上级的无线电联络，亲自带领部队向后转移；（3）志司预备队应迅速占领“三八线”附近阵地，作为最后死守防线，坚决顶住敌人的反扑，稳定战场局势，争取时间以利再战。

对敌情的迅速变化和作战处提出的意见，彭总和志愿军其他首长又进行了认真研究，形成了调整各兵团、各军具体行动方案，作战处迅速将首长们的决心、命令，下达给各兵团和有关各军。

当时，战场形势极为复杂，敌我双方情况变化很快，志司作战处的同志们昼夜不停地收集、研究情况，适时提出组织防御和实施局部反击的建议，督促、检查和掌握各兵团、各军贯彻执行志司命令的情况，以保障彭总和志愿军其他首长决心的贯彻执行，力求迅速扭转不利于我军的战局态势。

二、失利的悲剧发生了。第180师被美军隔断于敌后，全师仅少数人生还

关于第60军第180师被敌人隔断后所发生的悲剧，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几十年后，各种各样的报道和写法、说法很多，还有较长篇的纪实性报道。

军事科学院出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对第180师的悲剧，在第二章小结中写道：“而第180师在敌人包围的情况下，师长不是积极地组织力量坚决率领全师突围，而采取了错误的措施，以致遭受严重损失。”正史上不可能写得太多太细，这样点出来，用词已是很重的了。

对于我所了解的有关 180 师失利的情况，是不是按当时真实的情况写出来呢？我曾打电话询问《战史》的主编之一的孟照辉同志（他原是志司作战处的作战科长，现已在军事科学院离休）。他说：“我们写战史只能点到，现在各种各样的说法很多。当时的真实情况，你最了解，希望你能如实地写出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他又说：“我现在有当时的资料，如你需要，我可以告诉你。”我把我记得起的当时情况对他说了，他说：“你记得很准确，就是那么样的情况。”

根据当时我在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所了解和掌握的情况，180 师的失利的过程是这样的：

1951 年 5 月 21 日，彭总和中朝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因这次战役有朝鲜人民军 4 个军团参加，因此电报是用“联司”名义发出）果断地决定停止进攻，结束第 5 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令各兵团（人民军金指）、各军（人民军军团）于 23 日开始后撤。停止进攻的电令发出后，美军反扑的行动异常的迅速，“联司”迅即又电令各兵团、各军（军团）提前一天于 5 月 22 日晚向后撤退，并规定了各部队后撤的方式与步骤。

但 5 月 23 日拂晓后，美军利用其机械化、摩托化速度快的优势，集中 13 个师的兵力，在空军的支援下，沿各条公路及能够通行汽车、坦克的乡村小公路，向我军穿插，企图将我军后撤的道路截断。敌人的疯狂反扑，对我军后撤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5 月 24 日，北犯之敌迫使我第 65 军自议政府、清平川一线节节抗击敌人，至 25 日除一部分于七锋山、海度山阻敌外，该军主力于当日晚撤到汉滩川以北地区，这就使第 3 兵团与第 19 兵团之间结合部的间隙进一步扩大到 15 至 20 公里。第 3 兵团之第 60 军奉命掩护大批伤员后运，没有按时进至指定的防御地区，该军第 180 师仍在北汉江南岸汗谷、正屏山（春川以南）地区坚持阻敌作战，该师两翼完全暴露。此时敌人已将北汉江的渡口控制，该师向北撤退的路线受到威胁，但该师仍利用 24 日夜间偷渡过了北汉江，于 25 日晨全部到达春川西北之鸡冠山、驾德山、北培山地区。

志司得知上述情况后，彭总及志司其他首长们研究决定，为了迅速稳定战局，制止敌人的疯狂反扑，即令第60军迅速转移至华川西南之回望峰、史仑里一带，坚决阻击北犯之敌。

第180师本应于5月25日晚继续向北后撤，但该师主要领导在白昼看到山下西面加平至华川的公路上，东面的春川至华川的公路上，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向北进犯。在这种情况下，该师主要领导不能冷静地分析情况，不能正确地判断情况，而错误地认为该师被敌人包围了，产生了恐惧、犹豫、动摇。他们忘记了敌人的机械化在白昼好似很凶猛，可是到了夜晚敌人就怕我们了，必定会龟缩到洞、里（朝鲜的村、镇的称呼）防御我军夜间的偷袭。美军是少爷老爷兵，不能吃苦，夜晚他们还要睡觉休息。而我军的特点是擅长夜战，可以连续行军作战，白昼是敌人的，晚上就是我军的。如果180师主要领导能够冷静、正确地分析这些情况，利用25日夜间越过加平至华川公路，继续向北撤退，是完全可以撤出来的，即使出现最坏的情况，至少师主力是可以撤出来的。该师错过了5月25日夜晚，这是一个生与死、胜利与失败的最紧要、最关键的一个夜晚。

当时，我们志司作战处的同志收到第60军的报告后，即认为敌人白昼沿公路前进，只要我军隐蔽好，不被敌人发觉，夜晚是完全可以通过公路继续后撤的，因为当时敌人并不知道已经隔断了我军一个师。当时解参谋长和我们作战处的同志们都在一起工作，我们研究后，立即报告志司首长们，志司立即向第60军发电报，令180师利用25日夜间，越过加平至华川的公路向北继续后撤。

该师师长没有执行抓住25日夜间有利时机迅速后撤的命令。该师主要领导惊慌恐惧，犹豫动摇，对敌情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自认为已经被敌人分割包围了，该师师长郑其贵定下了置自己于死地的极为错误的决心与处置，命令各团集中排以上干部突围，竟然置近万名亲如兄弟的战士于不顾，并下令将电台砸了、电报密码烧了。这样就使上下联络中断了，该师与军、与兵团、与志司都中断了联络，使各团、营失去了统一的指挥，有的连、排干部各带少数战士到团去集中，有的连排干部仍带领部队作战，这样就使部队大乱。敌人很快就

发觉还有一大股志愿军被他们隔断了（但敌人一直不知道隔断我军1个师）。敌人即开始组织对180师部队实施围攻、堵截，有的团营干部带一部分部队打得很英勇，特别是5月27日与敌在鹰峰的战斗，打得很英勇，也很惨烈，但终因师主要领导的错误，使该师各自突围的小分队，各自为战，人自为战，也就不能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而冲出来。

彭总和志司其他首长令第60军领导迅速组织部队去接应180师，但因180师已砸了电台、烧了密码，自25日下午以后第60军与180师电台已联络不上了。

当时我们志司作战处和志司首长是同样的心情，对180师的情况极为着急与担心，正在这紧要关头，第3兵团司令部在转移中遇到敌机轰炸，志司与第3兵团与60军，第3兵团与60军的通信联络失了一天。彭总及志司其他首长们极为焦虑不安。

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我即向解参谋长请求派我去60军了解情况，并去找180师的下落。解参谋长当即表示不同意，他说：“60军都联络不到，你去就能找到吗？现在战场很混乱，搞得不好连你也得失去联系。”

我说：“1个师联系不上又找不到，这太严重了，我们当参谋的不能干看着首长着急上火，我们要迅速采取行动，那一带地区第4次战役我去过，地形我熟悉，遇有情况也会处置好，请首长让我去吧！”

解参谋长还是坚持不同意，他说：“第3兵团是新入朝的部队，我们对该兵团和军的干部只见过一次面，师以下干部还没有见过，彼此都不认识，你去找他们，他们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他们，这样去找也是找不到的，该地区部队已经很拥挤、很乱，搞不好会要发生误会的，因此你不能去。”

我了解参谋长这么一说，冷静下来，认真地想了想，解参谋长不让我去是对的。当时战场敌我交错，情况的确很乱，如果我去了，找第3兵团和第60军也得费时间，我与他们只是认识并不熟悉，不好提出请他们协助我。而且他们已自顾不暇，也无能力来帮助我。我

越过前线后，汽车不能开了，就要徒步走，这也需要时间的，我即使到达我事先了解的180师进至的地区，该师也可能离开了；我没有带电台（也不可能带）无法得到志司的新情况和新指示，而180师已经分散了、乱了，找也找不到师的主要领导了，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都会发生，我不仅不能完成找回180师的任务，也很可能回不来了，但绝对不会当俘虏，这是我事先就想好了准备好了的。事情过去了几十年了，可我每当想起当时的紧急情况，心情就难以平静，深深感到首长对自己的关怀和爱护；深为180师的指战员因师主要指挥员的错误决定和处置，而蒙受奇耻大辱而痛心。

一直到5月28日晨，180师师长郑其贵只带二十几名干部和战士很狼狈地突围出来。各团、营零星地突围跑回少数人员。当时知道180师损失将近8000人（其中有师政治部主任和团级干部9名），还有一部分由该师掩护向后撤退的伤员也没有撤出来。这是在朝鲜战场上我军遭到的最大的损失。180师的损失还为以后板门店停战谈判中，关于交换战俘问题增添了难度和时间。

三、胜利的惊喜之一。第12军第31师第91团进攻到北纬37度线附近，接到后撤命令时，已处于孤悬敌后极为险恶的境地，指挥员紧紧掌握部队胜利返回

就在60军180师陷入敌人包围的同时，孤军深入敌后的第12军第31师之第91团也令我们很担心。该团接到后撤的命令后，已处于危险困境中。但该团指挥员不惊慌，很冷静地、很坚定地紧紧掌握部队，英勇果敢、沉着机智地指挥部队从敌人阻截的缝隙中冲出来，全团胜利地返回。当时我们为此极为高兴，这与180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一直使我深深地记忆在脑海中。

1951年5月16日18时，第5次战役第2阶段反击作战开始后，配属第9兵团指挥的第12军，突破敌人的防御后，军主力于三巨里

歼灭南朝鲜军第5师一部，在继续发展向纵深的进攻中，前进至自隐里北侧，即与从西向东增援的美军第2师和法国营遭遇，展开激战，该军前进即受阻。但该军担任迂回任务的第31师91团从敌人的左翼绕道插入敌人的纵深，于5月18日拂晓攻占长北院。该团接到31师转来的彭总电令不分昼夜攻击前进，大胆迂回与分割敌人，以求合围全歼敌人的命令后，该团即继续前进，于5月20日前出到束沙里以南兄弟峰（下珍富里西南），已到达北纬37度线以北地区。

我们志司作战处接到第12军发来电报，报告第31师91团前进位置后，我们对照地图一看，啊呀一声，都很惊喜，该团所到的地点已快接近三十七度线了，直捣敌人纵深，很可能影响东线敌人全线后退。

可是，接着又连续不断地接到前线各军的报告，及收听到敌人的无线电话的对话，美军第3师已由汉城东南地区迅速向东增援，于5月19日、20日先后进至横城东北的丰岩里，并有一部向下珍富里（横城以东）前进，敌人的快速行动，即将我军刚到达的91团的后路截断了，使该团形成孤军深入。我们由非常高兴，一下子转变到非常担心了。

我们作战处立即将情况报告志司首长并提出了建议。遵照首长的指示，我们迅速给第12军、第9兵团下达电令，令该军一定要保持与第31师和第91团的电台联系，31师还要与91团保持无线电话联系，要第12军首长令31师和91团领导一定要保持镇定，沉着冷静，紧紧掌握部队，机动灵活地处置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立即停止前进，设法迅速摆脱敌人，向后撤回。

第91团指挥员非常坚强、沉着、镇静，又英勇善战，他们紧紧地掌握着部队，密切与上级的电台联络。在冷静地分析敌情和地形情况后，他们定下了非常正确的决心与措施，即不直接向北或向西返回，而是向东，从下珍富里以东翻越雪岳山，然后沿小道向北返回。这样他们就避开了敌人。该团领导同志随时将情况报到师或军。这样我们志司作战处也就随时掌握了该团的情况。

该团在回返途中，还曾发生了一次险情，即有一天出发前，发现

南朝鲜军有一支部队也在他们要行进的道路上通过，当时又没有第二条道路可选择。该团领导同志研究后，令部队将缴获的南朝鲜军的军帽钢盔带上，将志愿军的军帽胸章暂时收起来，选择在拂晓前出发，大白天停下来，下午天将黄昏再出发，全团人员不说话，由几名会讲朝鲜话的同志分到各营，由他们答话，这样与南朝鲜军并行了一天，竟没有被敌人发觉。我们真佩服91团指挥员和全团干部战士的沉着、机智和勇敢。

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奇迹呢？我们分析，除了该团主观上处置非常正确外，从敌人方面判断，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敌人是侧翼掩护部队，又是在东侧（敌人的右翼），他们没有想到会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到那个方向去；二是敌人是新组建的部队，官兵没有打过仗，也没有与我军交战过，因此不知道志愿军是个什么样子。

志司接到91团全团已于5月27日胜利返回，与31师主力会合的电报，我们看了电报后，简直激动不已。遵照志司首长的指示，立即以志司首长的名义起草了一份通令嘉奖第91团的电报交给解参谋长。彭总及志司其他首长们都很高兴，看了解参谋长送上的嘉奖电报后，略作修改，即令赶快发出去，并要发给志愿军师以上单位。

四、胜利的惊喜之二。第27军进攻至北纬37度线以北，指挥员机动灵活，胜利返回

1951年5月16日黄昏后，第9兵团之第27军突破敌人防御阵地后，于17日晨3时，即进至桃水阁，美也洞、院巨里（麟蹄西南）一线，该军担任迂回任务的第81师，不怕伤亡，不顾小股敌人的阻拦，组织3个团不停地相互交替攻击前进，于17日5时突入敌纵深达28公里，按时抢占了严达洞（县里以南偏西）横城至县里的公路两侧高地，切断了县里之敌向西南逃跑的退路，并会同第20军之60师歼灭南朝鲜军5个营。联司首长接到这个战况报告后，当即电令第9兵团和朝鲜人民军“金指”，令他们指挥所属各军（军团），乘敌人败退后混乱之时，我军应不分白昼或黑夜，要迅速攻击前进，大胆

迂回与分割敌人，以求合围全部歼灭敌人。

第27军第81师与第12军第31师并肩攻击前进，迅速抢占了苍村里和三巨里，与第31师共同构成对敌人的严密包围。第27军于5月20日晨进至纳言里、判官岱，苍里地区歼灭敌人一部，先头一个团前出到束沙里（下珍富里西南，长坪里向南至平昌的公路上）。

当我们志司作战处收到这份战况报告后，又是极为兴奋，对照地图一看，正在91团到达三巨里以南的公路上，又切断了敌人一条运兵的交通线。

与此同时，接到各方面报来的情况，美军第3师已由汉城东南地区，乘汽车迅速向东驰援，于5月19日至20日白天，分别到达半岩里（横城东北），下珍富里（横城以东），从后面切断了我第27军和第12军第91团的后路，敌人另一部则增援至我第27军和91团前面，堵住了我军的进攻。

鉴于敌人全线反扑进展迅速，联司首长遂于5月21日下令停止进攻，结束第5次战役第2阶段作战。

5月24日，第9兵团正面美军第2师从南面继续向北进犯，并以空降187团一部在九万里、麟蹄以西实施空降，企图堵截我军，与我后撤的第20军发生激战。南朝鲜军第5师已进至县里附近地区，将我向后撤退的第27军隔阻在富坪里、麟蹄西南以南，洪川至麟蹄公路以西之桃木洞、玉山洞，及公路以东之鹫峰以及县里西南地区，使我27军已不可能撤至昭阳江北岸执行阻敌任务。

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第27军军长彭德清，政委刘浩天（或已换为曾如清）等领导同志，认为志司原先命令执行的任务，已不可能执行了，他们即当机立断，改变计划，令第79师于富坪里、麟蹄以南地区阻击敌人的进攻，令第81师于县里地区阻击敌人的进攻。

我们志司作战处于24日20时以前，及时迅速地将各个方向的战况标在地图上，送志司首长。彭总和其他首长们根据整个战场的新情况，于24日22时电令各兵团各军必须克服困难，有计划地组织部队交替向后转移，并求得歼灭一部分敌人，以制止敌人的进攻，争取必要的时间，迅速向后转移伤员。

5月25日，北犯之敌全部展开，在空军掩护下，分多路向我阻击的部队进行疯狂的反扑。第27军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在杨口、麟蹄以南之富坪里、县里地区，英勇抗击敌人的进攻，将进犯之敌阻止于昭阳江南北地区，有力地掩护了我军伤员和兄弟军的部队向后转移。该军坚持阻击作战直到5月27日，才开始向华川、杨口方向转移。

该军虽然孤悬敌后，但由于该军主要领导同志坚毅沉着，紧紧掌握着部队，根据情况的变化，机动灵活地改变决心、部署，改变向后转移的路线。因此，第27军既完成了阻击敌人进攻的任务，有力地掩护了兄弟部队和伤员后撤，又避免了自己遭受过大的损失，最后终于摆脱了敌人，全军胜利地返回到指定的位置。

在第5次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中，第27军一直保持着与志司的电台联络，因此使我们能够及时收到该军的作战行动报告，使作战处及时将该军的电报情况和新的敌人进犯情况标示在地图上，送给志司首长，供首长们看电报对照地图，作出指挥决策，志司作战处能随时将该军方向上的敌人动态及友邻情况、志司首长的指令迅速地电告该军。

彭总和志司其他首长对第27军的表现，极为满意与称赞，很高兴，当接到该军已返回新的位置后，立即发电报通令予以嘉奖。

还应该写出来的是，第12军的第91团和第27军这两支部队都是从5月16日黄昏发起战役进攻，直到5月27日才返回来，他们深入敌人纵深整整有10个昼夜。可是他们所携带的干粮若是他们节省着吃，最多也只能够吃六七天。打到敌人纵深后，就快断粮了，南朝鲜老百姓都跑了，找不到粮食，只找到一些白菜。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克服难以想像的困难，一天只吃一顿饭，挖野菜充饥。

我们作战处，遵照首长的意图，以志司名义总是发电报询问他们还有多少粮食，我得到吃的没有，他们回电从不叫苦，总是说，的确很困难，我们能够想办法克服困难。当时我们真是没有一点办法去帮助他们。我当时很天真地想，要是有机可以飞到三八线以南这两支部队后撤的沿途路上，给他们空投一点吃的那有多好呀！但这只是

空想。

这两支部队，克服各种难以想像的困难，忍饥挨饿，极度疲劳，又得不到休息，坚持行军作战。这种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各级指挥员沉着、冷静、坚毅地指挥部队，使全体指战员上下一心，紧密团结，毫不气馁，勇气百倍地前进，这种坚忍不拔、大无畏的精神，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最高的发扬，是极为感人的，即使是没有经受过这种事的人们，我想也会为之动容的。

五、在志司召开的作战总结会上，彭总的自我检讨与对第60军的严厉批评

第5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结束后，彭总派邓华副司令员回国，当面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汇报作战情况，及请示今后的作战方针。6月上旬，毛泽东主席向邓华讲述了中共中央决定的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指导方针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以及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6月25日到27日，志愿军党委在空寺洞（伊川西北）志司驻地，召开了各兵团司令、政委和各军长、政委和兵种领导同志参加的作战会议。

会议开始，首先由邓华副司令员传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关于战争的指导方针与战略方针。陈赓副司令员传达了与解方参谋长向毛主席汇报后，毛主席指示在阵地防御作战初期，采取“零敲牛皮糖”的作战方针。

彭总作了关于如何贯彻持久作战方针的报告。

会议以两天时间，对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进行了认真的学习与深入的讨论，领会精神，及研究如何贯彻执行。最后，彭总作了总结性的发言。

会议第3天，对第5次战役进行总结。这一天，来开会的兵团和军首长们，都没有像会议开始前两天那样高兴的情绪了，一个个都是严肃沉静，没有欢言笑语。

第3天的会议，彭总要邓华作第5次战役的总结发言。邓华同志考虑到因第5次战役主要是由新参战的第3、第19兵团和从东线作战前来的第9兵团打的，原先入朝的第13兵团只有第39军、第40军两个军参加了第一阶段作战，第二阶段只有39军2个师参战。邓华副司令员考虑到战前的各兵团领导同志开会的情形，因此，他对这次战役的总结就不便多说、深讲，只作了一个简要的总结，就请彭总讲话。

彭总在讲了这次战役的概要情况，以及战役中出现的问题后，首先非常诚恳坦率地作了自我批评，认为第5次战役一是打得急了一些，二是口张得大了一些，三是打得远了一些。对彭总的检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上已经写了，我再写就多余了。我只写一句，彭总承担了责任，但每次战役的决心、部署，彭总都是请示报告了毛泽东主席，经过批准同意的，或是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命令执行的。

然后，彭总讲评了各兵团、各军的作战情况。高度赞扬了第3兵团第12军第31师第91团打得最远，前进到北纬37度线以北的三巨里（下珍富里北），在向后撤退，处在最困难的情况下，该团指挥员坚毅沉着、机动灵活地掌握着全团，胜利地从敌后全团撤回。还表扬了第9兵团第27军指挥员机动灵活，当机立断，英勇阻敌，并从敌后胜利撤回来的机智勇敢行动。

当讲到第60军时，彭总的表情严肃了，当场喊道：“韦杰、袁子钦来了没有？”第60军军长韦杰、政委袁子钦从后排站了起来，答道：“我们来了。”彭总当即对着他们说：“你们军长政委是怎么指挥的？把1个师都丢了，造成我军建军以来极少有的一个师遭到惨重损失……”

彭总越说越生气，忽地站了起来，继续说：“郑其贵这个人怎么当师长的？作为一师之长，应该临危不惧，冷静镇定坚决地指挥部队，杀出一条路，突围出来。最初的情况，敌人并没有发现我军一个师被截断，是完全可以突围出来的。郑其贵这个怕死的胆小鬼，竟惊慌失措，耽误25日一个夜晚的宝贵时间，竟然采取砸电台、烧密码，

放弃指挥，令各团集中排以上干部突围，把一个师近万名的战士都不要了，一个人跑回来了。这样的人不仅不配当师长，不只是撤职，而且一定要查办，要按军法从事。我还要报告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撤销180师的番号。”

当彭总说出这些话时，会场的空气都凝聚了，谁也不敢吭气，都低下了头。第3兵团王近山副司令员也“疯”不起来了，沉重地低下了头。

会议是在吃完午饭后开始的，一直开到黄昏，中间也没有休息。因彭总仍在气头上，邓华等几位副司令很想设法缓和一下气氛，但又不好直说。我看见邓华副司令望着坐在门口的陈赓副司令，靠近过去，扯了一下陈赓同志，悄悄地说了几句话（因为大家都知道彭总与陈赓同志有几十年的深厚友谊了，别人不敢与彭总开玩笑，只有陈赓可以和彭总开玩笑）。

陈赓副司令站起来，对彭总笑嘻嘻地说：“老总，开了大半天会了，大家动都不敢动一下。我看他们脸都憋红了，想出去小便都不敢，现在肚子里又提意见了，饿得不行了。你发这么大的脾气，一定也累了，我建议是不是休息一下？让大家小便、吃饭，吃饱后再开会，你再接着批评，好不好？”

彭总扭过头去，眼睛瞪着陈赓，陈副司令还是笑着看彭总。一个瞪眼，一个笑着，彭总明白陈赓同志的心意了，气也消了很多，说：“你陈赓肚子饿了，那就吃饭吧！”站起来就走了。

彭总离开会议室后，大家才松了一口气，都对陈赓同志说：“陈司令，你可救了我們了，我们真是憋着尿也不敢出去。”

陈赓同志笑着说：“你们赶快去尿尿，不要一松气，就尿裤子了。”大家都知道陈赓副司令员爱开玩笑，凝重的气氛消失了，你一言我一语地热闹起来。

我赶快出去叫管理处的同志们，迅速将饭菜从山下抬上来。就在会议室开饭，各位首长也真饿了，端起饭菜就大口地吃起来了。

我原先为他们准备了酒，这种气氛下，不敢拿上来了。那几位爱喝酒的兵团司令员向我要酒，对我喊道：“杨迪，你怎么不拿酒来给

我们喝呀？”

我说：“酒，我是已经准备好了，但能拿吗？我可不敢拿上来，你们喝了酒，一屋子酒味，等会彭总进来，闻到这股酒味，你们倒没事，就该我承认错误，挨克，我才不干哩，留着下次再请首长们喝个够。”大家听后都笑。

宋时轮司令（注：宋已任命为志愿军副司令，尚未到职）对着我说：“杨迪，你这小家伙，还不蠢，想到怕挨克，这次就不喝了，记你一笔账，下次要给好酒喝。”

我笑着说：“我知道宋司令员没有酒是吃不下饭的，这次就对不起了，下次一定还账。”

大家吃着饭，我看到只有60军军长韦杰和政委袁子钦，仍坐在原处不动，也不吃饭。我走去请他们吃饭，他们不动也不说话。这时陈赓、邓华副司令已陪彭总吃饭去了。我就去告诉洪学智副司令员，洪副司令走到韦杰、袁子钦的旁边坐下，叫管理员给他们上饭上菜，他陪着一边劝说，一边要他们吃饭，其他首长们端着饭碗也走过来劝解，这样韦杰和袁子钦两位同志总算端起碗吃饭了。

大家吃完饭后，我要管理员赶快带着战士收拾碗筷和打扫屋子，准备继续开会。

这时，陈赓副司令员走进来了，进门就对大家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会议不开了，你们就可以走了，现在请邓华副司令员向你们传达彭老总的指示。”邓华推让着说：“还是请你传达吧，不要客气了。”

陈赓说：“好，你要我说，我就说。”他说：“刚才我和邓华同志陪彭老总吃饭时，我们向老总建议，暂时休会，老总要讲的基本上都讲了，各兵团、各军的同志现在也不好发言了，也不敢讲了。要各兵团、各军回去开会，自己好好深刻总结经验教训，这样你们也好放开讲话。然后要你们报告志司，彭老总同意了我们的意见。”

大家听后，都笑了说：“陈司令、邓司令真理解我们的心情，真感谢你们救了我们了。请你们报告彭总，我们回去后一定认真总结，并写出书面报告呈彭总。”

陈赓说：“你们不要谢我们，以后都要打好仗，不要使彭总生气就好了。”

杨得志和宋时轮两位兵团司令说：“陈司令，请你放心，我们有了这次教训，以后一定要打好仗，向彭总报喜，那时请你和邓司令向彭总给我们请赏呀。”

陈赓笑着说：“你们就想拍马屁了，我不买账，如果下次还开这样的会，我就先吃饱肚子，让你们挨饿，不帮你们解围了。”

大家都大笑起来，随即都向陈赓副司令和邓华副司令敬礼告别。

陈赓即喊道：“王近山、杜义德你们等一下，我随你们到兵团去，军长、政委都跟着去。”（因为陈赓同志是第5次战役后期，刚赶到朝鲜前线的，彭总没有让他去第3兵团就职，而留在志司任第一副司令员）

彭总批评起来很严厉，可是后来组织处理时，他还是很从宽的。他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主要只检查自己，承担责任。对180师师长郑其贵只是撤职，并没有送交军法处置，而是将郑送回国内，还分配到东北吉林省军区白城子军分区任副职。也没有撤销180师的番号，而是重新组建新的180师，仍属第60军建制。

六、在我军连续强大的打击下，美国急于要求谈判停战

在我军连续向敌人发动5次战役反击作战后，美国及其同盟国认识到在中国军队的参与下，他们已不可能用武力来解决朝鲜问题。当时，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仍在欧洲，主要对手是当时的苏联，美国政府不可能也不敢削弱欧洲的力量，向远东增派大量援军，从而冒使苏联在欧洲占有优势的危險。英、法等欧洲盟国也由于惧怕苏联的威胁，以及本国人民的反对，也不愿再增兵到朝鲜来。在朝鲜的美军第8集团军面对着已拥有雄厚力量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他们已无力继续向北发动进攻了。

敌我双方经过连续5次战役的较量，力量对比已是势均力敌。美

军虽然兵力略少于我军；但是炮兵、坦克比我军多，火力比我军强，还有绝对的制空、制海权的优势；我军虽然兵力多于美军，但在装备上则比美军相差悬殊，我军的空军只能活动在清川江以北，我第一线作战部队得不到空中的掩护与支援，步兵与炮兵的威力都不能充分发挥，后方供应运输线过了清川江，由于没有我空军的掩护，遇到敌空军的狂轰滥炸，损失很大。敌人后方供应要从美国本土运来，虽然没有空中海上的顾虑，但是运输线很长，供应量又很大，也是很困难。因此，双方在“三八线”地区处于相持局面。

在上述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急于想与我谈判来停止这场他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战争。

1951年6月中旬，美国通过中立国向我国提出进行停战谈判的要求。我国政府接受了美国政府的提议，准备与美军进行谈判。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给志愿军党委的指示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

由于敌我双方准备开始停战谈判，因此，双方都采取了战略防御的方针，都在“三八线”附近各自占领地区，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实施阵地防御。

经过双方的外交活动，朝鲜战争停战谈判于1951年7月10日在“三八线”以北的中、朝军队控制区内的开城开始进行谈判。以后美军代表要求移到双方分界线上的板门店继续谈判。

在板门店，双方建设的谈判室在军事分界线上，谈判桌的中线即为军事分界线，双方谈判代表从各自的门进出，坐在各自的一方椅子上而不越分界线。这是世界战争史上可能没有先例的很特殊的一种谈判方式。

此后，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或者边打边谈，边谈边打，或者中止谈判，战场上打，打了以后，又恢复进行谈判。朝鲜战争的停战谈判，就是这样进行了2年零17天，这样的谈判，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

直至1953年7月13日，我军发动强大的金城反击战役，狠狠地打击了敌人，将战争的主动权又夺回我军之手，才迫使美国政府不顾

南朝鲜“总统”李承晚的反对，急忙在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在这2年多的阵地防御阶段中，志司作战处遇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我们在实践中积极地探索与研究，并适时提出建议，为保证志愿军首长决心和指示贯彻落实，做了大量的工作。

七、关于第6次战役怎样打，为什么又不打了的真实内情

1951年6月10日，第5次战役结束后，据我所知，当时美国政府已通知中立国和当时的苏联，向我国提出在朝鲜谈判停战的要求。彭总在7月1日给毛泽东主席的电报中说：“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战争结束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我能掌握和平旗帜，对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均有利。坚持以三八线为界，双方均过得去，如美国坚持现在占领区，我即准备八月反击。”彭总还设想：如敌北犯甚急，第3、第19兵团准备不及，即以担任一线防御的部队加二梯队4个军于8月中旬“进行中等性的战役”。

彭总根据他上述构想，即指示志司作战处拟制准备第6次战役的作战计划，预定先以第一梯队10个军发起战役反击，集中兵力歼灭美军第3师和土耳其旅。第二步，伺机歼灭美25师（两个团）和南朝鲜军第2师。另以5个师作为战役第二梯队，视情况继续发展战果。

志司作战处遵照彭总的意图和指示，即拟制了第6次战役预定方案，准备待朝鲜雨季过后，于8月中旬实施。

1959年，彭总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时，也涉及到抗美援朝战争。有人说，第6次战役计划是彭德怀擅自制定的，违背了毛主席确定的打小歼灭战的方针，脱离了当时我军的实际，“搞左倾军事冒险”，并以此定为彭总“与中央对立”的罪状之一。时至今日，彭总的冤案已得到平反，但第6次战役计划，仍然是被否定的。

对这个问题，我反复回忆了当时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彭总指

示我们志司作战处制定第6次战役计划，是依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制定的，怎么能说是彭总擅自制定的呢？为了把这个情况写清楚，写准确，我与在军事科学院的当时志司作战处作战科长孟照辉同志通了电话。我们两人用电话进行了几次较长时间的对话，一直到交谈清楚。

孟照辉同志说：对第6次战役计划的一些说法，多是同打小歼灭战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有必要先说说毛主席关于打小歼灭战的指示和彭总对这一指示的态度。毛主席总结了志愿军入朝作战后的历次战役经验，于1951年5月26日第5次战役即将结束时，指示说：“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施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则其士气非降低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那时就可以作一次歼一个整师或两三个师的计划了。过去我们打蒋介石的新一军、新六军、五军、十八军和桂系的第七军就是经过这种小歼灭到大歼灭的过程的。我军入朝以来，五次战役，已经完成了这种小歼灭战的一段路程，但是还不够，还须经过几次战役才能完成小歼灭战阶段，进到大歼灭战的阶段。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带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元山就行了。”在打小歼灭战的方法样式和规模上，毛泽东主席指出：“一次使用三、四个军（也可多一点），其它部队整补待机，有机会就打。如此轮番作战，在夏秋冬三季将敌削弱，明春（注：1952年），则可进行大规模的攻势。”

孟照辉说：5月27日，彭总致电毛主席，非常明确的表示说：“军事方针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当按照执行。”紧接着彭总便根据毛主席指示，草拟了一封信，报送毛主席审批后，于6月2日，即将此信转发给志愿军各军。这就可以看出彭总是完全拥护和执行毛主席打小歼灭战的指示的，根本没有同毛主席“与中央对立”。

我说：老孟，我听了你说的情况后，我认为这是有人妄图将毛主席在战役上的打小歼灭战与毛主席后来的阵地防御作战时指示的‘零敲牛皮糖’在战斗上的小歼灭战，有意地混淆起来，诬陷彭总，

对不对？

老孟说：你说的完全对，就是这么回事。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小歼灭战方针，是要继续削弱敌人，向打大歼灭战过渡。它不同于实行阵地防御作战以后，我军进行的以敌人连排单位为歼击目标的那种零打碎敲的小歼灭战，因此，不能以后者来衡量当时的作战计划。

孟照辉说：“抗美援朝战争连续进行了5次战役以后，战争双方已成势均力敌，都在谋求新的战略。1951年5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决定，准备同中朝进行停战谈判，谋求所谓‘光荣的停战’。5月31日，美国直接向苏联作出了表示。6月4日，毛泽东同金日成在北京会谈作战方针问题和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征询了斯大林的意见。”这就是说，此时，敌我双方正在酝酿进行停战谈判，第6次战役计划是在这一形势背景下制定的。评说第6次战役计划不能脱离这一基础。

1951年6月11日，毛泽东主席致电彭总，告知关于作战问题与金日成首相会谈的结果。毛泽东说：“已和金日成谈好，目前两个月不进行大的反攻战役，准备八月进行一次有把握的稳打稳扎的反攻。”我认为，这一设想很明显是在双方酝酿进行停战谈判的情况下提出的，因而不可否认已考虑到了可能进行谈判的因素，也就超出了原来打小歼灭战的设想。7月1日中朝发表声明，同意举行停战谈判。7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与金日成，提出我军要“极力提高警惕。……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举行大举反攻，将其打败。”毛泽东主席已非常明确地将作战目的着眼于配合停战谈判了。这是制定第6次战役的内部背景情况。

对于第6战役推迟的内情是怎么回事？孟照辉说：有材料证实。1951年7月24日，彭总向毛主席报告了他对停战谈判的看法和我军作战准备。彭总说：“美帝国主义处于矛盾状态中，我再有几次战役胜利，……坚持有理有节，经过复杂斗争，和平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继而彭总提出：“我（军）于八月中争取完成战役反击准备。如敌不进攻，则至九月举行。”7月26日毛主席复电同意彭总意见，毛泽东主席说：“在停战协定没有签订、战争没有真正停止以前，我

军积极准备九月攻势是完全必要的。”停战谈判进入确定军事分界线建立非军事区的讨论时。美方反对以‘三八线’为界，借口要凭其海空优势，企图不战而夺取我方1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以军事进攻相威胁。为打击敌人疯狂气焰，8月8日彭总将战役反击的决心部署上报毛主席。彭总在报告中说：“准备连续激战二十天至一个月，我第一梯队九个军疲劳伤亡不能再战时，将第二梯队……共九个军适时投入作战，再持续一个月的攻势。……打破以往六、七天短时攻击。每月消耗敌四万左右，美帝似有可能屈服求和。”

我对孟照辉说：“对对对，我想起来了，1951年8月17日，彭总指示志司作战处，以联司名义向部队下达作战预令，即《第六次战役预定方案》。预定先以第一梯队10个军发起战役。首先集中兵力歼灭美军第3师和土耳其旅。第二步伺机歼灭美军第25师（两个团）和南韩军第2师。另预定以5个军组成战役第二梯队，视情况继续发展战果。”

我又说：“邓华副司令员在开城参加停战谈判，他收到联司8月17日电报后，即于8月18日发电报给彭总。我记得邓华副司令在电报中对彭总建议的大意是：如果目前不立即进行战役反击，也当尽可能作战术反击，收复一些地方，将我与敌人的接触线向前推进，以便于我更好地了解敌人阵地情况及其坚固程度。彭总在答复邓华的电报中，表示同意邓华的意见。并向邓华特意说明8月17日的预备命令，是要把全军动员起来，积极准备作战，而不是具体部署。”

孟照辉说：你刚才说的情况，与原始材料基本上是相符合的。1951年8月19日，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代总长，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对彭总以联司名义8月17日的预令进行研究以后，以中央军委名义下达指示，确定9月战役计划，“改为加紧准备而不发动”。军委分析了当时谈判形势和敌我双方情况，指出：“在作战上，我们也应与谈判的要求相配合，相适应。现在我们握有重兵在手，空军、炮兵逐步加强，敌人在谈判中对此不能不有顾虑，现在以不发动战役能掌握主动。”

8月21日和22日彭总两次致电军委，同意军委对情况的分析和

提出的方针。决定：“九月战役改为积极备战，防敌进攻，准备适当时机反击。如敌暂不进攻，待十月再决。”

8月21日，毛主席电示彭总，要彭总认真考虑邓华8月18日的建议。毛主席还向彭总提出：“九月份能否进行此种战术反击”。8月23日彭总复电同意毛主席的指示。彭总说：“九月不举行大的战役进攻时，可选择伪军突出部举行局部进攻。”

我们当时只知道彭总指示要作战处如何制定第6次战役的计划方案，以后又要我们如何修改方案，而不知道上层的这些内情。第6次战役没有实施，是由于敌人为了配合其在板门店的谈判，已开始对我施加军事压力。即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史》中写的《粉碎敌人1951年的夏秋局部攻势》那一节。我军经过5个月的反击作战，粉碎了敌人夏秋季的局部攻势，歼灭敌人16万余人。敌人承认进攻失败，‘得不偿失’，被迫于11月27日与我方达成军事分界线协议。自此以后，战争已重点转到阵地防御作战。情况变了，第6次战役计划自然也就不再提及了。

根据孟照辉同志所说的这些内情，我有以下两点认识：第一，第6次战役计划的制定与停止执行。完全是根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绝不是彭总的擅自行为‘与中央对立’；第二，第6次战役计划的气势很大，但歼敌目标不大。这说明，我们在制定战役计划时已吸取了以往张口太大，不易全歼敌人的经验，而不是在图谋打大歼灭战。有人说彭总仍图大打，以报第5次战役转移时受到损失之仇，这种认识不仅没有根据，而且是很错误的。

孟照辉同志完全同意我的看法，明确指出当时制定第6次战役计划是完全必要的，是形势的要求，作战处制定的计划是符合彭总和中央军委的意图的。以后，中央军委确定的备而不发，以确保主动，是非常正确的。

探讨第6次战役计划，不仅是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且还是为了从中得到教益。对第6次战役计划制定的前前后后和一系列的指挥实践活动全面的正确的了解，这对于我们学习、研究毛主席、中央军委和彭总驾驭战争的艺术和战场的指挥艺术，是很有意义的，从

中使我们受到很多很深的教益。比如，第一，军事斗争服从政治斗争的原则，具体运用到作战问题上应如何体现。具体地说，作战的目的性和时机的选择应当如何配合和适应政治（谈判）斗争的需要；第二，战争指导者和战场统帅，应如何争取和保持自己的主动，如何在作战部署中体现动员全军指战员的作战积极性，等等，彭总在考虑作战部署时，把动员全军指战员的作战积极性，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是很有启迪的；第三，中央军委最后确定重兵在握，备而不发，以确保主动的方针，在战争指导艺术上是具有深意的创举，并且取得了实际的效果。

从敌人方面当时的内部情况，也充分证明了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战略、战役决策不仅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是非常英明正确的。

据战后美国公布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每半月向安理会送的“联合国军作战报告”和外国报导中透露，当时敌人得知我军备战活动后，其内部颇为不安。李奇微在报告中屡屡提醒安理会，中朝军队要发动攻势。他说：“大批中共增援部队已开到韩国，强大的炮兵预备队已开到前线，正在准备发动新攻势。”“正在进行兵员补充，大力加强兵站基地等备战活动，并取得很大进展。”“敌人的人力、装备、补给品，足以试图发动一次重大攻势。”“敌人很快要发动第6次攻势。”等等。美国专栏作家艾伦写的一篇“内幕报导”说：李奇微已向美国决策当局呈交了一份停战谈判进行以来“最暗淡的报告”。李奇微“最关切的问题是：敌兵（指我军后方）的不祥发展，明白显示共产党准备一俟天时转好，即发动全面战争。……共产党利用战斗沉寂之时，不只是建立他们的地面部队实力。并且还大肆扩充其空军的力量。现在从最低估计，共产党可能一次出动喷气战斗机六百架……地面上的情况也是同样令人郁闷。最近估计是，共军实力超过九十万人。”据称，李奇微这个报告，在美国决策当局已引起强烈震惊。曾有人“急于主张韩境停战”，并力促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检讨一下韩战的全盘战略。”

以上这些事实充分说明，第6次战役的准备，对敌人的压力是很

大的，它束缚了敌人的手脚。在当时，敌人百般阻扰拖延停战谈判，却不敢使谈判破裂；想对我施加军事压力，迫我屈服，也只能实施局部进攻，而不敢实施全面进攻。敌人的决策一直处于矛盾之中。敌人这种情况的形成，是同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确定的重兵在握，备而不发的方针是有直接关系的，起码是其重要因素之一。古人言兵有“不战而屈人之兵”一说，我想，第6次战役的准备活动，应属之无愧。

这就是彭总准备进行第6次战役计划的真实内情。

第十章

组建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中国年轻的空军人朝参战。粉碎了敌人空中“绞杀战”

一、为适应战争情况的新发展，彭总决心组建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使我军的后方勤务保障工作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我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五次战役反攻作战，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大批的人朝参战，后方勤务保障工作在新的战争情况下，发生了新的问题。主要有几点：第一，我军抗美援朝战争与在国内各次战争都大不相同。在国内各次战争，我军有人民的支援帮助，供应有保障。打到哪里就可以取之于民。抗美援朝战争是出国作战，北朝鲜已遭到美军的狂轰滥炸，朝鲜国土已成为一片废墟；再加上我军与朝鲜人民语言文字都不同，互相沟通困难，朝鲜人民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可住可吃的了。我军不仅不能取之于民，而且还要节衣缩食救济苦难的朝鲜人民。第二，在国内战争，在红军时期和解放战争中，我军的作战对象是国民党军，我军武器弹药取之于国民党军，蒋介石是我军的“运输大队长”；在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军处于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我军的武器弹药也是取之于敌人。可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作战对象是美军，敌人的武器装备全是美式，我志愿军的武器弹药开

始是缴获国民党军的，以后我军又改装苏式武器，就不能取之于敌。因此，所有的吃、穿、打、用全部要由国内供应。第三，在朝鲜战场上，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拥有绝对优势的空军、海军，完全控制了制空权和制海权，敌人对我后方交通运输线的铁路、公路和桥梁实施昼夜不停的狂轰滥炸。使我从国内运输到朝鲜前线的物资遭到很大损失，战争初期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物资遭敌炸毁、炸坏，只有三分之一的物资能运到前线。

因此，抗美援朝战争实际上是一场立体战争，没有前方后方之分，有时甚至后方的战争比前方的阵地防御作战更为激烈。

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敌人即发挥他们的空中优势，不断向我实施空中进攻。比如第一次战役后，敌人即进行了一次空中战役，炸毁鸭绿江桥、轰炸我安市（丹东市），对鸭绿江以南北朝鲜境内，则实施“地毯式”的轰炸，妄图以空军来消灭我入朝部队，没有达到目的。我志愿军连续发动了五次战役反击作战，敌人发现了我军每次战役持续时间只能一个星期。开始，敌人觉得很奇怪，经过研究后，了解到我军后方供应不上，才不能连续进攻作战。敌人的空中进攻即由“地毯式”的狂轰滥炸，发展到有重点地轰炸我军后方的交通咽喉部位，同时也不放松面的轰炸。

敌人发觉我后方向前输送物资人员的铁路、公路，一是鸭绿江上的铁路、公路桥梁。因为当时敌人还不敢将战争发展到中国境内，就将鸭绿江上属于朝鲜一侧的铁路、公路桥梁炸断。二是凡属从中国进入朝鲜的铁路、公路都必须经过清川江、价川和成川地区。因此，敌人的空军即集中轰炸这两处交通的咽喉要道。敌人称之为：“绞杀战”。不分白昼、黑夜地轰炸清川江上的桥梁和价川、成川地区的交通枢纽部。

敌人对我后方的空中“绞杀战”，对我军来说，带来了严重的困难。我军要迅速巩固前方正面的防御阵地，必须要确保后方交通运输的畅通，能够将各种军用物资输送到前方，将伤员迅速运送到后方抢救医治。

在1951年5月份，第5次战役在进行过程中，彭总和志愿军其

他首长们研究，认为我军每次战役只能打一个星期的规律，已经被敌人发觉并摸透了。因此自第三次战役后，敌人开始向我迅速发动试探性的反扑，第四次战役和第五次战役两个阶段，我军刚一结束战役行动，敌人即迅速向我大规模反扑，使我军没有了战役间隙整顿时间。这都是由于我军后方保障不能及时迅速的供应。因此，我军必须迅速解决后方勤务问题。

当时，我们作战处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后方勤务保障工作，仍按国内战争时期那一套已经很不适应了。现在战争由于美军的空中绝对优势，已使我军的战场不仅在前方与敌人正面作战，还必须在后方对付敌人空中进攻作战。当时在朝鲜作战已无前后方之分了。要保证后方供应的安全输送，必须要粉碎敌人的空中进攻。

我与丁甘如处长以及作战处的同志们研究，认为在后方仅靠消极的防空已经不可行了，必须要实行积极的对空防御。要有高射炮兵打敌人的飞机，掩护铁道兵、工程兵抢修桥梁，白天是敌人的天下，我后方输送只能利用夜间。这就要很好地组织指挥后方各兵种的协调行动。必须要将后方作为一个战场，统一指挥。在朝鲜境内的后方勤务，再不宜由国内的东北军区负责了。要由我们志司来统一组织指挥前后方的作战。

丁甘如处长将我们作战处的意见向彭总作了汇报。我也向解方参谋长作了汇报。概括一句话，就是志愿军后方供应，仅靠由国内的东北军区派出的前方指挥所来保障是不能够粉碎敌人的空中进攻和空中“绞杀战”。我们作战处的意见是：建议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来统一领导组织指挥入朝后的后勤工作，东北军区负责鸭绿江以北国内的后勤供应。

彭总和志司其他首长听取了作战处的意见后，邓华副司令对我说：彭总和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你们作战处所提的意见与我们认识是一致的。现在在朝鲜境内成立统一的后方指挥机构是适时的，也是很必要的。

志愿军首长们研究后，即建议中央军委将志愿军后方勤务工作与东北军区分开，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东北军区派出

的前方指挥所与新成立的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合并。统一领导和组织指挥在朝鲜境内的后方勤务工作和后方对敌空中进攻的作战。彭总认为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必须要有强有力的领导与指挥，他提出由洪学智副司令员兼任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志司其他领导同志都表示同意。

中央军委同意彭总和志司的意见，于1951年5月19日，决定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负责领导指挥在朝鲜境内的一切后勤工作。直接受志愿军党委和首长的领导。并任命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兼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周纯全任政治委员。

洪学智副司令员接到任命后，即找我说：“彭总要我到新成立的后勤司令部去，你从作战处挑选2名参谋给我带去。你可要舍得给好的呀！”

我立即回答说：“洪副司令，我知道你去组建志后，一定会来向我要人，我早就给准备好了，都是作战处的尖子。一名是您熟悉的刘洪洲，就不要我介绍了；一名是你还不熟悉的赵南起，他是朝鲜族人，是我们兵团入朝时，向东北局要的朝语翻译，我挑选了他留在作战处，他有文化，是在地方当干部的，为人很稳重，很聪明，很努力工作、学习，他这几个月表现很好，我已提升他任参谋了。我选派他去，既可以当参谋，又可当您的翻译，我想到志后与朝鲜方面打交道的事一定会很多。您带着他就方便多了。”

洪学智笑了：“杨迪，你还真为我想的周到呀！好，我就要这两名参谋。”

志愿军后勤司令部于1951年6月份成立后，召开了志愿军后勤工作会议，逐步建立“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的号召和并以此作为志后的任务。从此，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即统一指挥与组织志愿军后方的供应保障。为了使后勤保障的畅通，志愿军后勤司令部与国内战争时的后勤部大不一样了，志后是一个各兵种的联合的后方勤务司令部，指挥着6个后勤分部和设在朝鲜北部各地的24个后勤供应兵站、大量的仓库、几十个野战医院；还指挥几个警卫团、几个警卫营；十几个汽车团、二十几个辎重团、几个运输营、

几个工程大队、几万民工。有几个通信营，自成独立的后方通信联络系统。还配属有1个公安师担任鸣枪报警部队，几个工兵团，十几个高炮营，总人数逐步发展到22万多人。另外还有铁道兵团、军事铁路运输局等。

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成立后，我们志司作战处对如何供应各野战军进行了研究。我说：在解放战争中，我不了解其他野战军的供应方式，但我知道四野对各野战军、师的后方勤务供应，在黄克诚等同志的领导下，摸索了一套较好的方式方法，即由四野后勤部在各地区划分成几个片（如东满、西满、南满、北满等）各地区成立后勤分部。直接供应到师，各纵队只有一个很小的后勤部，只负责纵队直属队的供应。这样使各纵队、各师很轻便，也很方便。很大地提高了野战部队的机动灵活性。各纵队、各师仗打到那个地区，即自然地就转由该地区的后勤分部供应。各后勤分部是随着战役的发展，部队的前进，而随后即向前移进。丁甘如处长说：我也在东北第1纵队（即第38军），你讲的情况确实是这样的，各纵队都很满意。我们作战处的意见，你可直接向洪副司令汇报。他在东北是你们第6纵队（第43军）的司令员。

我即向洪学智副司令去汇报了，洪学智说：你们作战处研究的这个办法很好。我也很熟悉这个办法，我将根据在朝鲜的具体情况，考虑如何参照着来运用我军过去行之有效的的方式方法。

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成立后，入朝各部队的供应体制亦进行了改变。为了使各兵团集中精力指挥前线作战，志司决定：缩小各兵团、各军的后勤部，供应体制改变为以志后驻各地区的各后勤分部直接供应。也就是说，各军、师走到或打到那个地区，即由该地区的后勤分部直接供应，使各军、师都能及时得到供应。非常机动灵活又方便。

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既要保障野战部队的全部供应，还要保障援助朝鲜政府与军队的物资输送。志后必须负责后方对空防御作战，也就是粉碎敌人从空中发动的“绞杀战”。

我在下面另一节，再来写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二、年轻的中国空军于1951年1月，即开始试探性地飞向朝鲜上空，与美国空军在清川江以北上空作战。到1951年9月后，逐渐夺取了清川江以北白昼的制空权。

在我军入朝前，苏联斯大林是怀疑我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不是能够打赢世界第一流的美军。因此，本来讲好了我军入朝作战，苏联即以空军支援，可是到1950年10月8日我党中央军委决定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支援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军的命令下达后，斯大林突然通知中共中央，苏联空军没有准备好，不能从空中支援我军入朝作战。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不顾苏联的违约，毅然地独自出兵抗美援朝。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经过三次反击战役，将进犯到鸭绿江边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一直打退到“三八线”以南，收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全部国土。我军连续取得三次战役的伟大胜利，使苏联和斯大林受到很大的震惊，他们没有想到我军敢于出兵，并取得了不容置疑的胜利。

到1951年1月，我军第3次战役结束后，苏联才派2个空军师（米格15型）飞到中国辽宁鸭绿江附近的几个飞机场，传、帮、带领我国年轻的空军（我空军飞机是从苏联购买的米格15型喷气式歼击机），飞向朝鲜天空与疯狂的美国空军（飞机是F—84型战斗轰炸机和F—86型“佩刀式”喷气战斗机）进行空战。

但是，苏联空军飞到中国来带领我年轻的飞行员作战，是有条件的。即进入朝鲜天空作战，只飞到朝鲜清川江以北上空，他们的理由是：一、歼击机的飞行半径只有250公里；二、害怕苏军飞机被美军飞机击落后，飞行员跳伞飘到美军方向去，而被美军俘虏。我们认为苏方的这两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第一，从鸭绿江边的大东沟飞机场起飞到清川江的空中直线距离。最多也只有100公里，我们建议飞到朝鲜的大同江以北，即平壤上空（空中距离也不超过200公里）。第

二，当时我军已进至朝鲜“三八线”，从鸭绿江到“三八线”空中的直线距离不到300公里，即使苏军飞机被击落，飞行员跳伞怎么也飘不到“三八线”以南去。我方的意见苏联方面坚决不同意。当时苏联是“老大哥”，我空军刚组建不久，飞行员是仓促上阵的，没有经验，靠“老大哥”传帮带，就只有听“老大哥”的了。其实苏联方面提出的这条理由是借口，据邓华同志了解“苏联空军两个师虽比我们强，但从他们的活动来看也是以锻炼为主，采取游击战术，不与敌人F-86（注：美空军最新式喷气式战斗机）大队机群作战，有利则打，否则甚至敌机飞临安东上空也不起飞，最近每日出动的架次也不多。”（注：引自邓华副司令1952年5月26日《在安东空军指挥所了解对空斗争情况及意见》一文）

1951年1月21日，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航空兵第4师第28大队，在苏联航空兵的带领和掩护下，第一次升空参战，开始实战训练的练习，在清川江桥上空第一次同敌人进行空战，并击伤美空军F-84战斗轰炸机一架。这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敌人根本没有想到我国空军敢于与敌空军作战，认为是苏联的空军参战了。

苏联空军是起飞了，但只指导我年轻的飞行员如何进行空中作战。

1951年1月29日，我航空兵在清川江新安州上空再次同敌空军进行空战，我飞行员击落、击伤敌F-84战斗轰炸机各一架。

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首先接到了安东浪头机场我空军指挥所的电话报告后，极为兴奋，立即报告了彭总与志司其他首长，首长们听了后，都很高兴。彭总说：虽然我空军只能飞到清川江作战，这也就是很了不起了。中国年轻的飞行员终于敢于在天上与美军飞行员较量了。我军第一次有空军参战了。彭总要我们作战处立即发电报给安东空军指挥所。一是祝贺我空军飞行员敢于与美军飞行员作战，并取得首战的胜利。二是要他们认真总结第一、二次的经验教训。并将这些经验教训来训练飞行员。使我飞行员更成熟，不仅凭勇敢，还要提高飞行技术，掌握好空战战术战胜敌人。尽最大可能减少自己的损失。我们培养一个飞行员是很不容易的呀！

1951年1月至8月，我空军在苏联飞行员的帮助带领下，以实战进行训练，还没有较大规模地投入作战。加之，夏季朝鲜连降大雨，天上气象多变、条件复杂，当时我空军只能在气象许可的条件下，进行小机群的升空作战。

1951年8月份，我空军已训练出5个师（第4、第3、第2、第14、第6师）可以升空作战了。从9月下旬开始我航空兵这5个师，以后增加至8到10个师，开始在苏联2个师的掩护下，采取每次以3个师轮换作战的方式（因我鸭绿江以北只有4个飞机场，不能进驻过多的航空兵）。开始以航空兵大队起飞作战，以后发展到可以以师为单位升空作战，保护清川江以北我后方铁路、公路运输通畅。经过不太长时间的锻炼，我航空兵即能独立升空作战。从1951年9月正式参战，至当年（1951年）12月，将近4个月的时间内，我志愿军航空兵即共起飞3526架次，击落敌飞机70架，击伤敌机25架。由于我航空兵的积极参战。很快迫使敌人将战斗轰炸机的活动空域撤退到清川江以南，迫使敌人航空兵对清川江三角地域轰炸我江桥的“绞杀战”不得不在夜间进行（因我空军航空兵还不能进行夜间飞行作战）。并迫使敌人的B—29重型战略轰炸机从1951年10月以后，对我清川江以北的轰炸，也不得不改为夜间进行高空投弹轰炸。一直到1953年7月停战，我空军能基本上在白昼控制着朝鲜清川江以北的空域。

我志愿军航空兵的积极空战，涌现出很多英雄飞行员，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张积惠、赵宝桐同志等一批英雄人物（我记不起大部分英雄的名字了）。张积惠于1952年2月10日击落了飞行了3000多小时的美军王牌飞行员乔治·阿·戴维斯少校，有力地打击了美国空军的猖狂、嚣张气焰；有力地掩护与保障我地面后方勤务各兵种的对敌作战；大大地减少了我后方的损失；有效地保证了我前线部队所需各种物资的供应等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建立了显赫的战功。并使我年轻的空军取得了实际作战的经验，大批的飞行员在实战中成长起来，培养与锻炼出一批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中坚领导骨干力量。

邓华副司令员于1952年5月份，用半个月的时间，专门到安东

(即现丹东市) 空军指挥所调查了解对空斗争的情况, 并于5月26日向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彭总写了《在安东空军指挥所了解的对空斗争情况及意见》的报告。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报告。我极简要地将他在报告中提出的问题的标题摘录如下: 一是主观力量及作战方针问题。他分析了我空军各师的情况及苏联空军两个师的情况(前面已引用了)后, 指出: “我们对空应采取更积极的方针, 坚决打击敌F-86(注: 最新式喷气战斗机), 掩护交通, 尤其不准敌机飞入(我)机场上空。敌F-86只有两个大队约150架, 而我米格15(注: 喷气歼击机)在安东即有200余架, 力量上我占优势。只要我们积极主动, 是可以打败敌人的, 并且可以争取西线走廊上空的优势。”二是机场问题。他分析了机场分布情况后, 建议中央军委在吉林省通化、辑安(现集安)之间修两个喷气机场, 也是必要的。军委同意了, 选择在柳河(通化北)修建了一个机场。三是关于空军建设问题。邓华同志说: “敌机若遇到严重打击必拼命挣扎, 故必须准备更激烈的空中斗争。”对此他提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四是空中情况掌握问题。邓华同志了解雷达太老旧, 搜索视界不很远(只120公里), 建议向苏联购买新式搜索雷达, 最好先选几部远程的放到朝鲜去, 以及如何部署和与地面防空哨、高射炮兵的协同等等。五是加强高射炮、探照灯问题。其中讲了较多具体办法。最后, 邓华同志说: “要准备敌人(注: 将停战谈判)拖下去, 要准备更激烈的空中斗争, 有准备就主动。”

三、粉碎敌人空中“绞杀战”, 是抗美援朝战争中, 我军与美军进行的一场具有战略意义的较量

我在这本书的第一版时, 对敌人空中“绞杀战”, 我军的反“绞杀战”写的很不够, 很是遗憾。现趁再版时, 我必须补充一节, 从战略高度来说明“绞杀战”与反“绞杀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与意义。

抗美援朝战争中, 敌军是占有绝对的空中优势, 我军虽有年轻的

空军参战，但是只能飞到朝鲜清川江以北，而且只能在白昼作战。敌人的空军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既有战斗轰炸机，又有重型战略轰炸机。飞行员都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战经验丰富。敌人的导航设备也先进，它白昼、夜间都可以飞行作战。敌人飞机的活动半径也远，敌人的航空兵（海军航空兵可以从朝鲜东、西部海上的航空母舰起飞）可覆盖整个北朝鲜上空。

自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参战后，敌人即凭借其强大的空中力量，对北朝鲜实行狂轰滥炸，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北朝鲜的城镇及主要交通枢纽已被敌人航空兵摧毁。1950年10月我志愿军第一次战役以后，敌人发现我军入朝参战，敌人即以空军进行无数次的空中战役。企图用“地毯式”轰炸，消灭或阻滞我军入朝参战的军队，破坏我后方交通运输线，企图瘫痪我军后方，窒息我前方的供应保障，破坏我军的作战行动。在我军实施战役反击阶段的5次战役中，敌人的空中攻势的确是发挥了作用，迫使我军每次战役只能进行一个星期，即因后方供应不上来，只有停止进攻。敌人称我军的攻势为“礼拜攻势作战”，在第3次战役以后，敌人虽已败退，但因掌握了我军进攻的最大弱点，美军新任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就利用装备优势，采取一边收拢败退的部队，稍作整顿，一边就迅速向我军发动反扑，即所谓的“磁性战术”，不给我军以喘息休整和等待补充的时间。

因此，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与国内战争有一个显著不同的特点，就是战争没有前方与后方之分，有时甚至后方与敌空军的作战比前方还要激烈。敌人对我后方设施和交通运输线的封锁破坏，一直是敌军与我军在整个朝鲜战争中战略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敌空军正式开始空中“绞杀战”之前一段时间，我军对空防御作战的简要情况：

我志愿军入朝参战之后，敌空军（包括海军航空兵）各种类型飞机，已由朝鲜战争开始时553架，增加到1100余架，其中用于轰炸破坏我军后方的约占50%以上，主要攻击我军集结地域、补给基地、公路铁路桥梁、交通枢纽和运输车辆等，给我军造成了极大危

害。至1951年7月，敌投入到战场上的航空兵部队又有大量增加，敌空军不仅飞机数量有了增加，而且飞机的作战性能亦有很大提高。各种类型飞机约1700架，当时美军最先进的飞机，F-84型喷气式战斗轰炸机、F-86型喷式战斗机共375架。

我志愿军入朝初期，对空防御力量和后勤保障能力很弱。1950年底以前，防空部队只有一个高射炮兵团，对敌航空兵的斗争，主要是采取伪装、隐蔽、疏散等消极的防护手段，一切较大作战活动和后勤活动均在夜间进行，后方勤务部队则处于边打边建边加强的状态，而且多是临时抽调组成的。在敌飞机轰炸封锁下，工作效率很低，车辆损失很大。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8日，15天即损失汽车339辆，占我汽车总数的40%强。第1至第3次战役期间，粮食供应仅能达到需要量的25%，第4、第5次战役时，也仅为我军需要量的50%，远远不能满足我军作战的需要。

1951年1月，我志愿军经过三次反击战役，将敌军击退到朝鲜“三八线”以南后，苏联斯大林才相信我军的作战能力。我军为了加强我后方对空防御，改善我军的供应运输，经与苏联协商，苏联才答应出动空军2个米格-15型歼击机师帮助掩护和带领我年轻的志愿军空军1个大队，开始实战练习，但苏联提出他们的飞机只能飞到朝鲜清川江以北，不能越过清川江。

我地面防空的高射炮部队从1951年1月后，陆续得到加强。至1951年7月下旬，我国已从苏联以记账方式装备我军高射炮兵4个师又3个团，和50个独立高射炮兵营。整个高射炮武器76.2毫米口径的占733门，85毫米口径的仅只有72门，大部分独立营则配属在各兵团、各军，掩护前线军队作战。

我军后方勤务部队和后方勤务工作也陆续得到加强。在沈阳召开志愿军后勤工作会议后，志愿军党委于1951年5月，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志愿军于6月成立了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简称志后）。逐步提出了建立“钢铁运输线”的任务，开始建立固定的兵站线，并沿公路干线设置了夜间对空监视哨（注：夜间对空监视哨，通称防空哨。在公路干线上每隔一至三公里的山头上设一组，任务是监视敌

机活动，发现敌机声音即鸣枪报警，汽车司机闻警马上闭灯行驶或迅速躲避。采取这一措施，提高了运输效率，减少了运输车辆与人员的损失。后勤保障部队已达6个分部、24个大站、11个汽车团（3000余辆汽车），另配属公安部队1个师（第18师，后轮换为公安第1师）、工程兵6个团又2个营。铁道兵部队增至4个师1个团（即桥梁团）；还有援朝铁路工程部队6个师，到1953年，志后总兵力达22万余人。并经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商定，于1951年8月，成立了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简称“联运司”），统一管理朝鲜境内的铁路运输和铁路线的抢修维护。以上这些措施，虽然使我军后勤保障较前有了很大改善，但仍未从根本上改变供应不足的状况。

1951年7月下旬，朝鲜发生了40年来未有的特大洪水灾害，并一直延续到8月底。我军后方交通运输线受到了严重破坏：铁路桥梁被冲毁94座次，线路被冲毁116处次，中断运输最长时间达45天，最短时间为13天；公路桥梁50%被洪水冲毁。这更增加了我军粮弹等供应的困难。

敌军正式命名“绞杀战”，亦称“空中封锁战役”，是从1951年8月开始的。

1951年8月中旬，敌人为了配合停战谈判，对我施加军事压力，在敌军地面部队发动夏季攻势的同时，又乘洪水灾害，集中其空军力量，对我发动了以分割我军前线与后方、切断我军运输线为目的的大规模的“绞杀战”，亦称“空中封锁战役”。敌人为了实施“绞杀战”，动用了其远东空军力量的80%，其战斗轰炸机和战略轰炸机几乎全部投入使用，并计划以3个月的时间，全部摧毁朝鲜北部的铁路系统，妄图使我“铁路运输陷于完全停顿的地步”。

我志愿军司令部与志后司令部，密切注意了敌人的新动向。志司作战处对新发生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分析，及时向彭总和志司其他首长作了汇报，并提出了意见与建议。建议志后统一指挥在后方的各兵种联合作战，密切协同配合，严密搜集研究敌人飞机向我进行“绞杀战”的作战样式与活动规律，我后方各高射炮兵营、团、师加强对

空防御作战，并与我航空兵取得密切的联系，切不要误伤我军飞机；我铁道兵、铁路工程兵、工兵和各运输团，要研究敌机活动规律，严密组织铁路与公路的抢修与抢运。

志愿军后勤司令部遵照彭总和志司其他首长的指示，强有力地组织指挥了这场较长时间（10个月）的对空反“绞杀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我现在很简要地归纳记叙这段长时间的紧张的激烈斗争情况。

我军反“绞杀战”斗争，共分三个阶段。

我军反“绞杀战”第一阶段，从1951年8月中旬至8月底。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敌人利用洪水灾害，以铁路线为主要目标，对我交通运输线实施全面地、反复地轰炸封锁，并阻止我修复。重点地区为价川至顺川段，定州至宣川段，黄州至黑桥段。

敌军于1951年8月中旬开始，全面展开了对我交通线的轰炸破坏，每天除以小编队不间断的轰炸外，还以32机到64机的大编队出动2次。鸭绿江和西清川江、肃川江、满浦线之百岭川、熙川江、东清川江、秃鲁江、平元线（平壤至元山）之德池川等桥梁均遭敌连续轰炸。至8月底，使我整个铁路交通处于前后不通的状况。敌对我公路运输线及运输车辆的轰炸破坏亦很剧烈。

这时，我军后方正集中精力同洪水灾害作斗争，对敌人的“绞杀战”尚无充分准备。我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以掩护交通线的高射炮兵防护重点目标；以铁道兵、铁路工程兵采取各种技术手段，集中兵力抢修被破坏的桥梁和铁路；以工兵和汽车运输部队在桥梁、线路被破坏地点，组织架设便桥或舟桥、漕渡或实施分段倒运，使各段线路有机地连接起来，以保持运输不中断。这样，我争取到了部分线路通车。整个8月份，我抢运到前线的作战物资共约34000吨，初步改善了前线的粮弹供应。

我军反“绞杀战”第二阶段，从1951年9月至12月。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我反“绞杀战”斗争全面展开，敌轰炸封锁的重点转向我铁路枢纽新安州、价川、西浦三角地区，并阻止破坏我修建机场。

朝鲜新安州、价川、西浦三角地区是连接京（汉城）义（新义州）、满浦（中国吉林省对岸、均纵向）、平（壤）元（山）线（横向）三条铁路线的枢纽，是我铁路运输的咽喉。这一地区被破坏，我军南、北、东、西的铁路交通运输将全部中断；且西浦至新安州段两侧多为水田，顺川至价川段则路基较高，被破坏后修复也困难。敌将轰炸重点转至三角地区后，平均每日出动飞机五批 100 余架次集中进行轰炸，并逐渐压缩轰炸范围。至 11 月，便将轰炸范围收缩至肃川至万城之间 1 公里地段，以及泉洞至龙源里之间 1 公里处的一两点上，企图在这一两点上造成深度破坏，使我无法修复，以中断我之运输补给。在三角地区的几段仅长 73.5 公里的线路上，4 个月共中弹 38186 枚，平均每 2 公尺中弹 1 枚。这几段铁路的长度仅占我军使用全部铁路长度的 5.4%，其被破坏的处次却占被破坏总处次的 45.2%，致使该区 4 个月中，有 80% 的时间不能通车，给我军供应造成很大困难。

1951 年 9 月，朝鲜境内雨季结束，我军后方部队亦从抗洪抢险转为全力以赴地进行反击敌人空中“绞杀战”的作战。

我志愿军航空兵逐渐增加至 10 个师，在苏军 2 个航空兵师的掩护下（有时我航空兵独立升空作战）于 1951 年 9 月下旬开始，采取轮换作战的方式，每次以 2 至 3 个航空兵师与苏军航空兵 2 个师，共同进驻鸭绿江边的东沟、浪头、宽甸、凤城 4 个飞机场，投入空中作战。从空中保护清川江南北主要公路、铁路交通线和掩护在安州地区修建机场的任务（飞机场完全由我方负责修建，以备空战中，我军飞机负伤的迫降机场）。到 1951 年底，我航空兵共起飞作战 3526 架次，击落美军飞机 70 架，击伤 25 架。由于我军航空兵的积极作战，很快就迫使敌航空兵的活动空域向南撤退到朝鲜清川江以南，并迫使敌 B—29 型战略轰炸机从 10 月开始就不敢白昼飞行，而转入夜间入侵高空轰炸。（因我飞机上没有夜航设备，也没有夜晚地对空的指挥、导航设备，我飞行员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夜间飞行训练）

在这段时间内，志司及时向中央军委报告敌人进行空中“绞杀战”的情况，我航空兵与地面高射炮部队和其他各兵种反“绞杀战”

的情况，并报告中央军委，志司决定加强铁路及清川江桥地区的防空力量，除原有掩护交通的高射炮兵外，从掩护修建安州机场的部队中，抽调1个高射炮兵团，从在后方休整的各军中，抽调11个独立高射炮兵营和6个高射机枪连，在铁路线上组成4个防空区（平壤、安州、定州、价川、顺川区；殷山、新仓里区；阳德、龙池院里区；平壤、物开里区），进一步加强了铁路线上的防空力量。10月中旬开始，又将掩护修建机场的大部分高射炮兵部队调往三角地区和其他重要铁路地段。同时，中央军委还从国内抽调了1个雷达连、5个探照灯连，配合高射炮兵和航空兵作战。为了统一指挥，在志愿军后勤司令部领导下，成立了铁道高射炮兵指挥所。并按照“集中兵力，重点保卫”的原则，调整了整个防空部署。至12月，掩护机场修建的高射炮兵陆续到达指定区域，加强了对铁路运输线的掩护力量，使掩护铁路运输的高射炮兵部队达到我军在朝鲜高射炮兵部队总兵力的70%（共11个团又11个营，另2个高射机枪营），其中三分之二的兵力配置在三角地区。随着我防空力量的增强，对敌机的打击也越来越大，仅12月份即击落敌机38架，击伤68架，对保护目标的安全起了很大作用。

我志愿军在加强对空防御的同时，亦进一步加强了铁路线的抢修力量。1951年9月中旬，我铁路线上的抢修力量已达7万余人。在抢修斗争中，根据敌机轰炸情况和我之需要，采取了重点抢修的方针，即集中主要兵力确保三角地区及东、西清川江和东大同江三座桥梁。抢修部队发挥了最大积极性、创造性，如采取架设活动桥梁（白天移开，晚上移回）、以枕木排架法填补大弹坑等方法，既节约了抢修兵力和抢修时间，又迷惑了敌机，减少了桥梁损失，提高了运输效率。至12月底，三角地区的铁路全部恢复了通车。

在铁路运输方面，采取了密集的“列车片面续行法”（即在一个或几个区段上，两个以上列车取一定间隔，连续向同一方向运行，不对开），和在火车受阻地段上，用汽车实行长区段的倒运办法。为解决运输力不足的问题，还动员了志愿军各军派出一定数量的兵力抢运冬装。

1951年12月间，又专门成立了以刘居英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前方铁道运输司令部（简称“前运司”），在联运司的领导下，负责统一指挥朝鲜境内铁路运输线上的防空、抢修、抢运工作，从而加强了铁路线上反“绞杀战”作战的领导。

志司指示志后为了加强公路线上的抢修力量，解决长期以来公路上因错车不便而造成的交通梗塞、运转不灵的状况，7个工兵团和在二线休整的各军及各兵团直属队，在朝鲜人民的协助下，普遍加固加宽公路2158公里，新辟公路292公里，大大改善了我公路运输状况。

由于我航空兵、高射炮兵积极地同敌机进行斗争，和铁路抢修、抢运组织周密指挥得当，以及铁路全体员工和指战员英勇奋斗，至10月中旬，我铁路运输情况一度好转，曾争取到连续半个多月的时间通车，仅10月16日至22日7天中，通过东、西清川江桥的物资即达1947节车厢，其中21日一个夜晚即通过西清川江桥490节车厢，创造了入朝以来的最高纪录。为此，我铁路员工、铁道部队、航空兵部队、高射炮兵部队受到了中央军委和志愿军司令部的通令嘉奖。

1951年10月下旬，敌机轰炸封锁更为加剧，我三角地区铁路运输再度中断。志司即令志后迅速调整部署，重新部署力量，至12月，终于彻底打破了敌对我三角地区的封锁。据不完全统计，在此阶段，我铁路运输抢运过封锁区的作战物资共达15400多节车厢。同时我公路运输也得到了很大改善，汽车运输能力提高了75%以上。从而逐步改善了我军供应状况，保证了我军作战的基本需要，并使前线各军开始有了粮弹储备。

我军反“绞杀战”第三阶段。从1952年1月至6月。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持续时间达半年之久，敌对我铁路线的破坏更为严重。

至1951年底，敌人实施“绞杀战”，虽已超过了其原定计划时间1个月（敌原定时间为3个月），但并未达到其预期目的。侵朝美“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也承认其所实施的空中封锁战役“没有能

够阻止住敌人（注：指我军）运输其进行阵地防御所需的补给品，也没有能够阻止住敌人将部队运入北朝鲜”。但他认为“如果中止空中封锁交通线的活动，或者缩小这种活动的规模，那么敌人在一段比较短的时间内就能够积聚起足够的补给品，从而有能力发动一次持续的、大规模的攻势”。因此，李奇微不甘心就此罢手，为阻止我发动攻势，于1951年12月下旬决定继续对我进行“绞杀战”，并宣称要一直进行到“战术态势或停火协议使我们（注：指敌方）必须做出改变时”为止。（以上均引自美国空军大学：《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空军》中译本第二册）

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部为了达到从空中“绞杀”我志愿军的目的，决心增强与加强航空兵的力量。1951年底，敌人从日本增调到朝鲜1个F—84型战斗轰炸机中队（飞机25架），并改装新出厂的F—86型战斗截击机，增加到150架。同时，补充了一批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有作战经验的飞行员。

1952年头3个月，敌航空兵为了避开我军日益增强的对空炮火，被迫放弃了对三角地区的昼夜轰炸破坏，而采取了机动的重点突击轰炸我铁路线的两头，即封锁我作战物资的来路和去路的战术，对我铁路运输线实施了更为疯狂的轰炸破坏。1952年1月是我军入朝以来铁路遭受破坏最严重的一个月，桥梁被破坏136座次，线路和车站被破坏2202处次。

1952年3月以后，敌人又对三角地区采取了所谓“饱和轰炸”战术，即24小时昼夜不停地，集中所有能够用来执行封锁铁路线任务的飞机，对铁路线上的几个重点小段实施攻击。在此阶段，我铁路被敌破坏较第一、第二两阶段的总和增加了42.6%。

我志愿军司令部和志后司令部根据敌机轰炸破坏战术的变化，及时地采取相应对策：

在对空作战方面，我歼击航空兵继续采取轮换作战的方法，经常保持有3个师的兵力在第一线，同敌航空兵进行空中作战，高射炮兵则改为采取“重点保卫，高度机动”的作战方针，以师为单位并配属若干独立团和独立营，划分了三个作战区，以中、高炮保卫桥梁、

车站等重点目标，以小高炮执行机动作战任务。3月至5月从国内又增调了探照灯2个连和雷达兵3个连入朝，协同航空兵、高射炮兵作战。

在铁路抢修方面，我军采取了“以集中对集中，以机动对机动”的方针。即在确保三角地区和清川江桥通车的原则下，对敌机轰炸重点区，适当地配备了较多的兵力，迅速抢修；对其他地区，则视敌机破坏程度，临时机动兵力进行抢修。为了对付敌机对我铁路桥梁和重要地段的轰炸，还修筑了大迂回线和简易的便线、便桥，以保证顺畅通车。

在铁路运输方面，我针对敌机实施夜间轰炸多在月明期每天夜晚22时至24时的规律，就采取了利用月亏期集中突运，“抢22时”和“空、重车循环输送”等斗争方法。

在公路上，我则继续加宽、加固原有公路和构筑新的公路，并在主要河流渡口处增设水面或水下（插标杆标示）便桥，在公路沿线增设汽车待蔽所，以公安第18师（以后轮换为公安第1师）设对空监视哨（在大小32条运输线），2500公里的主要干线上共设置1308个小组，以保障公路运输顺畅，减少车辆损失。

我军在第三阶段反“绞杀战”作战过程中，由于我采取了上述有力措施，积极地同敌机进行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铁路各线通车每夜达到了68.9%至96%，公路运输能力提高了70%，5月份即超额完成了半年的运输任务，并提前完成了支援朝鲜政府的物资运输和运送给朝鲜人民的救济粮的任务。有力地保证了我志愿军与朝鲜的军需民用。

敌人在第三阶段“绞杀战”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敌人在集中轰炸我铁路线两头的同时，不断地对我重要的兵站基地进行毁灭性的轰炸。如1952年5月8日，敌出动飞机485架次，对我遂安以北之楠亭里仓库区持续进行了13个小时的轰炸，投掷各种炸弹2000余枚，这是敌飞机对我仓库区轰炸规模最大的一次。我兵站基地在同敌机斗争中，一方面组织指挥高射炮兵积极打击敌机，同时，还采取了抢卸、抢装，及时疏散、转移，加强伪装和大力修建坑道仓库等措

施，有效地保护了作战物资的安全，并给了敌机以严重打击。仅在当日（5月8日），高射炮兵第24营在楠亭里对空作战中创造了一天击落敌机7架，击伤18架的优异战绩，获得了志愿军司令部的通令嘉奖。

我军在反“绞杀战”的第三阶段，我高射炮兵共作战3277次，击落敌机198架，击伤779架；我航空兵共升空作战2588架次，击落击伤敌机148架，给了敌空军以沉重地打击。使敌战斗轰炸机实力降到了最低点（敌有2个大队的飞机几乎下降了50%），已无力对我铁路两头同时进行“饱和轰炸”，而只能轰炸清川江北岸的一头了。

1952年6月下旬敌军被迫放弃了“绞杀战”，将其轰炸重点转移到电站、工厂、矿山、重要城镇和我军防御正面80公里纵深的目标。

根据敌情的变化，我军调整了部署。同敌空中斗争的重点亦逐渐转移到正面战线，将一部分高射炮兵调到前线，我航空兵因只能飞到清川江地区，为了掩护我地面交通运输线的畅通，则加强了在清川江以北的对敌空中作战，并夺取了白昼的大部分制空权。

我军在反“绞杀战”斗争中，我志愿军空军、高射炮兵、铁道兵、铁路工程兵、工程兵和后方各勤务部队，以及在后方休整的各军部队，以无比的英勇和智慧，同敌人进行了极其顽强的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人物。在这场反“绞杀战”的斗争中，我军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仅高射炮兵和铁路抢运、抢修部队即伤亡2300余人，另损失飞机80余架、高射炮30门，被炸火车机车头502台、车辆4550节。

我志愿军反击敌人的空中“绞杀战”，从1951年9月至1952年6月，整整进行了10个月。经过与敌人长期的极为严峻艰险的较量，敌人的“绞杀战”终于被我军彻底粉碎。

1952年5月31日，侵朝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在汉城记者招待会上承认说：“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难以令人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送到前线，创造出惊人的奇迹。”战后，美国空军官方发表的《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空军》一书亦承认，“对铁路线进行的历时十个月的全

面空中封锁，并没有将共军挫伤到足以迫使其接受联合国军方面的停战条件的地步。”这就充分说明，敌人所施行的空中“绞杀战”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我军则在10个月的反“绞杀战”中，建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逐步达到了保障我志愿军作战物资的充分补给。取得了战略上的一个重大胜利。

为什么说，我军取得反“绞杀战”的胜利，是战略上的一个重大的胜利呢？道理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我军在后方取得了反“绞杀战”的胜利，就使我前线进行阵地防御的部队有了物资保障。这样，才能使我前线部队不断地巩固阵地防御作战，坚守正面防御长达2年多的时间；才能使我军有力量打败敌人在防御开始阶段不断地向我防御阵地，发动不断地进攻，而岿然不动；才能使我军能够依托防御阵地向敌人的防御阵地发动由小到大的阵前反击作战，从战略防御中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我举2个例子就可以充分说明我军反“绞杀战”胜利的战略意义，比如：我军在上甘岭3.7平方公里的两个山头上能够坚守43个日日夜夜，一方面是我军志司首长和各级指挥员的正确指挥，指战员的英勇善战；另一方面则是有了源源不断的后勤保障，才能长期坚守，取得胜利。比如，我军最后发动的金城进攻反击战役取得了伟大胜利，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我后方各种物资的保障，已经十分充足了，运到前线的各种物资，不仅充分保障了我军金城反击战役的胜利，而且还可以保障我军再打一两次大兵团的大规模进攻战役。迫使敌人不得不向我方要求立即签订朝鲜停战协定。

第十一章

敌我双方都采取战略防御，一方面坐着谈判，同时在战场上较量，时间达二年之久，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新纪录

一、敌我双方都转入战略防御，都采取阵地防御的方式，又都同意进行停战谈判

自1950年10月，中国人民组成志愿军抗美援朝后，敌我双方经过连续5次战役的大较量。美国也好，中国也好，对这场战争都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首先，从当时美国和中国的政治上、战略上来看。

美国方面：

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欧各国在苏联的支持下，都成了社会主义国家。西欧英、法等国虽然是战胜国，但是遭受战争的破坏很大。战败的德国，被分割为东西两个德国。整个西欧国力很衰弱，需要美国的经济与军事力量的支持，才能与当时的苏联相抗衡。苏联有强大的军事力量驻在东德与东欧各国，对西欧的架势是咄咄逼人。

当时美国的主要盟国在欧洲，它不能失去欧洲，必须保住欧洲。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美国的战略方针是：在经济上实行“马歇

尔计划”（注：马歇尔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提出了从经济上支援欧洲，恢复和重建欧洲的计划，故取名“马歇尔计划”）迅速重整英、法和德国的国力；在军事上，在欧洲驻扎庞大的军事力量，以与苏联军队相抗衡。当时亚洲大多数地区与国家，还是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或封建、半封建状态，几个大国内战不止（如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等），美国先是支持中国国民党蒋介石打中国共产党，企图控制中国，失败后，就集中力量占领日本，帮助重建日本，企图扶植日本控制亚洲。当时对分裂的、没有强盛起来的亚洲来说，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也不是当时苏联的战略重点，美、苏对抗的重点在欧洲。

还有，也是最重要的，美国出兵侵略朝鲜，进行的是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美国政府不可能向美国人民说明为什么要跑到遥远的太平洋彼岸一个小小的朝鲜半岛去打仗、流血死人？是为了什么？对美国人民有什么利害关系？美国4年一次的总统竞选又快到了，在位的民主党总统杜鲁门如果将这场战争长期打下去，不仅争取不到选民的支持，拉很多选票，而且必定要遭到选民的反对而丢掉很多选票。1952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共和党的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演讲中，向美国选民许下了只要他当上总统，就一定要结束这场对美国来说毫无意义的战争，再不要美国人在朝鲜流血的诺言，从而获取了大多数美国人投了他的票，使他当上了总统。出兵侵略朝鲜的民主党总统杜鲁门因而落选。

中国方面：

当时的中国，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刚刚解放了中国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和海南岛，正在进军西藏及在我国长江以南的新解放区进行大规模的清剿土匪作战，并积极进行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但整个中国在国民党的长期统治下，已经是民穷财尽，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很需要迅速恢复和重建中国的经济。

1950年6月25日爆发了朝鲜内战，这是我国所没有料想到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中国人民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抱着等于中国革命晚胜利几年的心情，放弃或者停

止一部分国民经济的建设，为了援助朝鲜人民，为了祖国东北的安宁，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毅然决定出兵援朝。在当时的情况下，定下这样的决心，是极其困难和极不容易的，只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才能有这种大无畏的魄力与胆识。

在我国决定出兵援朝前，苏联斯大林为了让我国出兵，已经答应苏联出空军从空中支援我军。可是，当1950年10月8日中共中央、中国政府和毛泽东主席下达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援朝的命令后。斯大林却反而退缩了，通知中国他们不能从空中支援我军。公开理由是怕引起苏、美直接对抗，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而实际上是苏联和斯大林看不起中国人民志愿军，认为我军打不赢有现代化装备，又有空、海军绝对优势的美国军队。

毛泽东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将彭德怀立即从沈阳接回北京开会，仍然决定不管苏联空军支援不支援，我中国人民志愿军仍按计划出兵援朝。现在回想起来，毛泽东和党中央这个决策真是非常英明、正确的，下这样的决心比解放战争时期，定下打三大战役的决心的难度不知大多少倍呀！定下打三大战役的决心，那时是有胜利的把握。出兵抗美援朝，是同我军从来没有交过手的高度现代化的世界第一流的美国军队作战，又是出国作战，人生地不熟，特别是我国的综合国力非常弱，在经济上是不是能支持得起这场战争，也是没有十分的把握的。这真是战略上很艰难又很英明的决策。

经过在朝鲜5次战役的大较量，依靠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英明正确指挥，凭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挥员和战斗员的勇敢机智和灵活的战略战术战胜敌人，将敌人打退到“三八线”，收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这些胜利的取得，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志愿军在朝鲜连续作战，已经是极度疲劳，减员与消耗很大。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切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一切为了最可爱的人”的号召下，节衣缩食，勒紧裤带，忘我地努力生产，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人民还进行了可歌可泣、非常感人的捐献运动，来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敌我双方的政治家和决策者们，都认识到如果这场战争继续打下

去，将是无休止的，不仅谁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的最后胜利，而且美国将要在亚洲越陷越深，在欧洲将要处于被动并得罪他的主要盟国。中国还要在贫穷的基础上消耗国力，而不能集中精力进行经济的恢复与建设，人民的生活也无法改善等。我国人民已经经受了几十年的战争苦难，我们不能无休止地让人民仍在战争的苦难中过贫穷的生活。

从朝鲜方面来看，更是不能长期再战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土，已被美军的飞机日夜不停地狂轰滥炸一年多了，全部国土已变成一片废墟，田园荒芜，男性公民都参加军队了，年轻的妇女也在后方服役，再加上1951年大洪水的天灾，可以说朝鲜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中，已经到了继续生存下去的极限。如果战争无休止地继续打下去，对朝鲜人民来说，后果是不可想像的或者是不堪设想的。但是，他们为了民族的生存，仍然前仆后继地战斗着，年老者、年少者，忍饥挨冻，不顾一切地支援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背送弹药上第一线，背着伤员下火线，在后方坚持生产，维护交通等等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真是举不胜举。就以我自己亲身经历为例，由于我常常乘一辆车前方后方到处跑，在我遇到各种险情或困难时，曾多次得到朝鲜人民的帮助。

当时的朝鲜战场上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美军方面：

美军虽然占有空军、海军的绝对优势，陆军拥有现代化机械化的装备，在火力、装甲、机动能力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但是朝鲜是一个狭长的半岛，只有200多公里宽，又主要是山脉纵横，平原地很少、很小，使美军的优势不能完全充分地发挥出来。

美军后方供应虽然没有我方海、空军袭击的顾虑，但它的运输线比我要远十几倍或几十倍，它的补给品要从太平洋的彼岸的美国本土运到日本、南朝鲜，这样远距离的后勤供应，给后勤保障造成很大困难，虽然美国运输舰船多，但也不能都用在亚洲。驻在欧洲的美军也需要供应。况且，美军官兵要求比我军高多了，他们打的、吃的、穿的、用的、住的等各种各样的消耗就比我军大多了。战争长期打下去，美国也是难以长期承受得起的。

还有兵员的补充，对美国来说，也是一个难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怎么又在遥远的朝鲜半岛打起仗来了，美国人民不理解，美国人对个人的自由生活与生命是特别重视的，这对美国民主党、共和党的竞选总统的胜利是极为重要。

美国出兵侵略朝鲜一年中，消耗了100多亿美元，伤亡10万余人，这个数目超过了美国在第2次世界大战第1年消耗和伤亡的一倍还要多一点。而且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后，美军由胜利进军而被迫败退到“三八线”。美军官兵对胜利失去了信心，期盼着早日结束这场战争。这样使美国各阶层的人们群情激愤，战与和的争论极为激烈。不仅美国国内吵得很凶，而且它的主要盟国英国、法国等，担心朝鲜战争长期打下去，美国陷入亚洲的泥潭越深，必将影响主要方向的欧洲与当时苏联的对抗，美国国内和其重要盟国，都对美国当权者进行指责和反对。

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的最高决策层，认识到了这场局部战争如果长期打下去，不仅看不到胜利的可能，而且将使国内人心不满，影响民主党在总统大选中获胜，美国的主要盟国的反对，又将影响在欧洲战场主要方向与苏联企图西扩的对抗。

由于上述原因，因此，在我军第5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结束后，1951年6月初，美国政府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向我国传送了要求进行停战谈判的信息。6月中旬又通过与我友好的中立国，向我试探进行停战谈判。美国军队也无力发动大规模的主动进攻了，在战场上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

我中国人民志愿军方面：

我军占优势的方面：一是进行的战争性质是国际主义的、支援朝鲜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与支持，得到了朝鲜人民的直接帮助，也得到了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支持，还得到了世界主持正义的国家与人民的支持，这是我军必胜的重要因素之一；二是我军背靠祖国，在军队数量上占优势，可以采取轮番作战，而且是经过长期战争考验的有很丰富战争经验的人民军队，已经形成了一套以劣势战胜敌人优势的战略战术，这是我军的长处。

可是，我军的短处与弱点经过与美军5次战役的较量也完全暴露出来了。一是我军的战略战术长处处在朝鲜这个狭长的半岛和特殊的地形条件下，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在朝鲜没有广阔的空间进行大迂回、大包围作战，不能围点打援，不能在这边牵制住敌人，在另一边围歼敌人，总而言之，不能发挥我军打大规模运动战的优势。在朝鲜5次战役中，只有第2次战役我军在西线实行了侧面的迂回作战，还由于受地形的限制，不能集中更大的兵力实施大迂回大包围。在东线第9兵团指挥上是采取从侧后迂回包围，但因纵贯山脉阻隔，加之天寒大雪封山，部队穿插很困难。上到山顶时，还冻死冻伤不少。第3、4、5次战役都是只能采取正面突破，突破后，再实施向左右卷击式的小迂回小包围，无法发挥我军的长处。二是由于我军没有制空权，一天24小时，只有一半是属于我军的，我军完全靠夜间行军作战，而我军又只靠两条腿走，走了一个夜晚，敌人白昼的机械化只要几个小时就走完了。三是我军后方供应，虽然是陆上运输，也只有500公里至700公里，可是我军没有制空权，这比美军从数千公里至上万公里的距离运输的困难还要困难得多了。我军的物资、弹药，日用品等，在后方运输中的损失，占在第一线战斗中的消耗、损失将近三分之一。

我军的作战方针是长期的持久战。但是若是无限期的长期，无限期的持久，建国初期我国落后的整体的综合国力经济状况也是承受不了的。

二、1951年7月10日，朝、中方代表与美方代表 在开城开始停战谈判

毛泽东和党中央充分认识到以上所述的情况与形势。因此，决定接受美国政府提出停战谈判的要求。1951年6月23日，由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提出“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休战”的建议。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同意进行停战谈判。7月1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通知李奇微，同意派代表与美方会晤。

经过双方代表商定，1951年7月10日，在我方一侧的开城开始举行朝、中方代表与美方“联合国军”代表的停战谈判。

如何来进行这场停战谈判的斗争呢？经中、朝两党两国领导同志协商，由中国派出以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同志为首的代表团，进驻朝鲜开城，负责领导整个停战谈判事宜，实施幕后指挥，并将每天谈判情况和如何进行谈判的意见和问题，直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请示报告。

在前台参加谈判的，则由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派出代表，组成朝中方面的停战谈判代表团。

朝中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是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委派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邓华和参谋长解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停战谈判的代表。

朝中方面代表经过一段时间与美方代表的谈判，发现美方并无诚意要迅速停战。敌人于8月18日向正面我军发动了夏季攻势，空军发动了空中攻势。在开始谈判时，双方已经同意将开城谈判地点划为中立区。但美方破坏协议，在开城中立区内用飞机轰炸我方代表团驻地，枪杀我方军事警察，使谈判无法进行。

朝中方面代表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于8月23日宣告中止谈判。

我方分析认为：停战谈判必定会要长期谈下去，敌人从战场上夺不来的，想从谈判桌旁得到，我方也必须以战场上的胜利，来迫使敌人坐下来谈判。根据这种情况，彭总即令邓华同志回志司，协助他指挥作战等军事、政治各方面的事宜，只留解方参谋长代表志愿军参加谈判，并由国内另派一名同志任志愿军谈判代表。

三、停战谈判开始后，美军发动大规模的空中攻势，企图从空中炸服我军

停战谈判开始后，美方并不想真正停战，仍企图以战争来取得胜利。他们在双方同意的谈判地点开城有意进行破坏行动；在正面向我

发动了夏季攻势；并凭借其空中优势向我方发动了全面的空中进攻，即所谓“绞杀战”，企图从空中来“绞杀”我军。美军“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狂妄地说：“充分发挥空中威力的全部能力，取得最大的效果，来惩罚在朝鲜任何地方的敌人。”（引自美国空军学院著《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空军》）

李奇微为了显示美国空军的威慑作用，首先对本来已被炸成废墟的朝鲜首都平壤，又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对朝鲜北部的铁路、公路的交通枢纽、各重要地段和矿山坑洞实施昼夜不停地轮番轰炸扫射。对我正面防御阵地不仅以战斗轰炸机或重型轰炸机轮番轰炸、扫射，而且开始出动武装直升机对我炮兵阵地或指挥所进行低空直接攻击。敌人狂妄地叫嚷要从空中“绞杀”中共军队。

为了粉碎敌人空中的进攻，志司作战处的同志们，遵照彭总和志司其他首长的意图，由我和同志们组成几个小组，深入下去，到敌人轰炸的重点地区现场了解情况，和现场的指挥员及其司令部，研究敌机轰炸的特点与规律。我们乘车跑了一个星期。在现场听到了、看到了在办公室仅凭看电报难以想像的情况。比如：①敌机对铁路、公路桥梁不分大小、长短，只要发现就投弹炸断，对通过陡壁悬崖之处的道路，投很多炸弹，有的炸弹坑很大很深，使我难以迅速修复；②在铁路公路交通枢纽丢下很多定时炸弹、子母弹，敌机飞走后，我人员去抢修，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大小爆炸以杀伤我抢修人员，或我已经修复好的铁路桥梁，或者火车通过时，定时炸弹轰隆一声炸我火车。在公路沿线从炸弹中爆炸时飞出很多大小三角钉，专门扎我通行的汽车轮胎等等；③只要发现我军高射炮兵阵地，敌机就轮番轰炸，企图将我军对空防御火器炸毁；④对公路沿途，凡有茂密的树林，即投凝固汽油弹，放火毁林，使我车辆白昼无处隐蔽；等等。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有意在白昼开车行驶，亲自看看敌人飞机到底如何活动。一是发现敌机特别注意拂晓和黄昏这两个时段，在这两段时间，敌人的飞机活动很频繁；二是白昼则相对要少一些，特别是在清川江以北，敌机活动较少，低空活动更少些。机型以新式的 F-86（佩刀式）喷气战斗轰炸机在中空活动。三是 1951 年 9 月份，我

空军在苏联空军的帮助下开始在清川江以北上空参战，为了避免直接与美机发生空战，苏联飞机不到清川江及其以南飞行，敌人的飞机主要集中在轰炸清川江铁路、公路桥梁作为“绞杀”战的重点枢纽部位。由于我年轻的空军还不能夜间作战，敌人的飞机则在夜间大肆活动轰炸、扫射。

很有趣的是，敌我对白昼或夜间的利用。在地面我军主要是利用夜间，敌人主要是利用白昼；在空中，敌人则是利用夜间，而我则是利用白昼。

我还驱车到新老成川这个铁路、公路交会处，这儿也是敌机“绞杀战”的重点地域之一。这儿的铁路是保障东线我军供应运输必经之地，这儿的公路是朝鲜蜂腰部的中部，正是通向东、西、南、北的十字路口。还有重要一点，就是敌人不知道这个“绞杀战”的重点地域，离志愿军司令部驻地桧仓不远。我必须到这儿去看看、听听具体的情况。

我找到铁道兵团第3师师部，该师负责成川地段及以东铁路（包括桥梁、隧洞）的抢修任务。我见到该师师长龙桂林，我们是老战友，他比我大几岁，我们的感情真是同志加兄弟。我走进他的掩体。他见到我非常热情地问我：“老弟，你是随志司首长跑前线的，怎么跑到我们后方来了？”

我说：“老龙，现在还分什么前方后方，敌人的空中‘绞杀战’已将后方变成前方了，你们这儿比正面第一线担任防御的部队还热闹呀。”

龙桂林说：“这倒是真的，美国鬼子的飞机轰炸重点一是清川江咽喉部，二就是我们这儿。每天拂晓准来轰炸、扫射一阵。晚上12点钟以前不停地来轰炸、扫射，白天少一些，我们也摸清了敌人的规律，我们抢修部队就在铁路旁的山下挖洞休息，派出监视哨，利用每一批敌机轰炸的间隙，部队就跑出来抓紧抢修；用枕木搭架填坑，但不铺铁轨，待半夜敌机少了，我们就很快铺上钉好枕木的铁轨，火车就排队一列接一列地迅速通过。”

我插话说：“你们怎么对付敌人的定时炸弹和子母弹的呢？”

龙桂林说：“开始我们不知道这些鬼玩意，正当紧张的抢修时，轰的一声炸弹爆炸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就组织专门人员研究，才知道是定时炸弹，我们的技术人员就研究怎样取下炸弹上的定时器，并请附近抢修公路的工兵老大哥来教我们如何排除定时器，我们全师的技术人员很快都学会了卸定时器，我即要师和团司令部组织一部分警卫分队，在各处观察敌机投弹时哪儿没有爆炸，待敌机过后即跑去作好标记。敌人定时炸弹的尾部都暴露在地面，容易发现。敌人丢的子母弹主要在公路上，那是工兵团和汽车团的事，我们就没有去研究。”

我笑着说：“你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呀。老龙，你讲的这些对我启发很大，帮助很大，但是，仅听你说不行，请你领我到现场去看看，使我有感性认识。”

龙桂林说：“走，我陪你到现场去看看。”

我们到各重要地段，敌机轰炸最厉害的地方，查看了敌机投下的尚未爆炸的定时炸弹、子母弹、公路上的三角钉等等。我看到敌机投的重磅炸弹，炸的坑真大，（直径有3至4米、5至6米、6至8米宽不等）真深，（有2至3米、4至5米深不等）要很快修复，的确很困难。我正好看到一组人员在卸定时炸弹，我想走近去看看，老龙一下拉住我，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不要太靠近了。我捡了几个三角钉看看，敌人真做的绝，扔到地下怎么也有一个尖朝上，头很尖，管中是空的，扎透了轮胎就可跑气。使汽车必须换轮胎，这就影响我汽车队的运输速度。甚至造成很多汽车拥挤在公路上。

我看了现场后，印象更深了。即对龙桂林说：“老龙，今晚我不走了，我要看看敌机是怎么轰炸铁路桥的，你们铁道兵又是怎么去迅速抢修，以及火车又是怎么通过的。”

龙桂林说：“你调查研究还很认真呀！好，你今晚就留下来看看。但你不能到桥的现场看，那太危险。”

我说：“不到现场怎么能看清楚，危险有什么可怕的，在朝鲜处处都危险。”

龙桂林说：“就是不能让你去桥边的现场去，不仅仅是危险，还

妨碍抢修队伍的施工。距离太近，你也看不见全貌。你在我这儿，就得听我的。晚上，我陪你到铁桥附近的山上去看，那儿有我的一个观察指挥所，看得很清楚，你也可以看到、听到我是怎么指挥抢修的。”

晚上，我就和龙桂林师长进入他的观察指挥所。看到这儿被敌机轮番轰炸的铁桥，及中弹情况；我抢修部队，乘敌机轰炸间隙，很迅速地将枕木、铁轨运送到炸断处的情况；深夜，我抢修部队迅速抢修的情况；一切真是有条不紊，很有秩序地紧张进行着。有时几处被炸断，抢修部队要分成几个组，各奔一个炸坏处，迅速抢修。火车头推着车皮在桥头等着，修复后，由师或团指挥所一声令下，火车头将车皮推送到桥头，加大马力一推，车皮就徐徐滑过江桥，那边的火车头接上，就很快拉走了，另一个火车头将空车皮又推过去，这样重车皮推过来，空车皮推过去，一直到拂晓前，桥两边就空无一人了，都进入隐蔽体。

我整整看了一个通宵。

龙桂林对我说：“老杨，你看清楚了吧？”

我说：“看清楚了敌机的轰炸过程，看清楚了铁道兵动作真迅速地完成任务，火车及时地通过铁路桥，推过来，送过去，真是井然有序，有条不紊地按步骤进行。你们组织指挥得真好。”

龙桂林说：“你客气什么，回去向志司首长报告，在我们铁道兵第3师负责的区内，一定保证铁路随炸随修随通；一定尽一切可能把敌人的飞机引到我们这儿来，以减少敌机对志司的注意。我还有一条意见，你回去向志司首长建议，再增派几个高炮营来，加强这个地域的对空防御，美国鬼子是欺软怕硬，能多打下它几架飞机，多捉几个飞行员，把他们的威风打下去，就好多了。”

说到这儿，龙桂林说：“我给你讲个我们俘虏美国直升机和飞行员的故事，你听不听？”

我说：“我看到铁道兵发给志司的电报有这么回事，具体情节不清楚，你讲讲，使我长长见识，增加感性知识。”

龙桂林说：“有一天我兄弟部队的高射炮兵打落敌人一架飞机，

飞行员跳伞了，不知他们用什么通信工具与敌人的指挥机关联络上了，不久即有一批飞机掩护一架直升飞机降落下来接跳伞的飞行员。正好，我们一位炊事班长和一名战士出去，发现这架直升飞机，敌飞行员也发现了我师这两名战士，就逃跑躲避。炊事班长一边开枪射击，一边要那名战士赶快跑回来报告。我得到报告后，就迅速派一个连去包围这架直升飞机，逐渐缩小包围圈，美国兵还是怕死，2个飞行员都被我师俘虏了，直升机被我师完整地缴获了。报告上级后，要我将缴获的这架直升飞机一定要保护好。我即要我们师惟一的英文翻译问美军飞行员，螺旋桨怎么拆卸下来，因为那玩意太长、太高，卸下来才好推着机身走，我用一个连的兵力，连推带拉硬是把飞机拉到一处伪装隐蔽好，在敌直升机原降落处，我搞了一个假现场，用很多稻草树枝伪装起来，并倒了很多汽油。敌人因直升机没有返回，第2天拂晓，即飞来几架飞机来寻找，他们飞到降落处的上空，看到了伪装，信以为真，就投下炸弹，将“直升机”炸毁，敌飞行员看到炸中后，着大火，就以为炸中了，他们完成了炸毁任务，就飞走了，我躲藏在山上看着大笑了，美国鬼子也好骗。”

我听着很有趣，问道：“我们通知铁道运输司令部要完整地将缴获的直升机拆运回国，你们是怎么拆卸的？”

龙桂林说：“上级要我们将直升机交给铁4师拆卸，怎么拆卸的我就不知道了。”

我对龙桂林开玩笑地说：“老龙，高射炮兵打下的飞机和飞行员，这样大的战果，被你们得了，你是个‘摘桃派’。”

龙桂林也笑着说：“我们发现了不去抓，不去缴获，那桃子就没有了。你不向我祝贺胜利，还挑我的不是，我不管你吃饭了。”

我说：“你们这个胜利，志司已经通报表扬了，还要我祝贺吗？我知道你们铁道兵辛苦是很辛苦，但也有好吃的，告诉你，我这次来一是了解情况，二是找你解馋，你快把好吃的拿出来，我们说了这么久，你都不问我饿不饿。我真饿慌了，快吃饭吧。”

龙桂林热情慷慨地招待我吃了一顿。

吃完饭后，我对龙桂林说：“你的意见与建议我一定向志司首长

汇报，的确要增加防空火力，多打下一些敌机，只有积极地打，才能取得对空防御作战的胜利。也才能使你摘到更多的‘桃子’。发更多的‘洋财’。”

龙桂林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可不要冤枉好人，我们发的‘洋财’，全部交上去了，你怎么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给忘了。”

说完，我们都哈哈大笑。

龙桂林所率领的铁道兵第3师在成川地区的抢修任务完成的很好，不久该师的任务向东延伸至阳德、元山，保证了火车向东运输的畅通。龙桂林于1952年被提升为铁道兵团副司令兼后勤部长。

我和作战处的同志们下部队调查了解具体情况返回志司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丁甘如同志和我将意见集中后，即去找张文舟代参谋长汇报我们的意见与建议。

张文舟代参谋长说：“我才来不久，情况还不是很熟悉，你们对我讲了，我还得去向彭总和其他首长汇报，还不如你们直接去汇报，彭总喜欢听从前线直接了解的情况。”张文舟报告彭总后，彭总就要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去汇报，并要秘书通知各位副司令都来听汇报。

丁甘如对我说：“老杨，你去调查了解的，就由你汇报，能讲的更清楚一些，彭总要询问，你也可以回答。”我看丁处长不是客气，就没有谦让了。

我们到彭总办公室后，彭总说：“是你们作战处的同志亲自看到的听到的吗？”

我回答说：“作战处的同志组织几个小组分头直接到敌人飞机轰炸的重点地区调查了解和看到的情况。”

彭总对我说：“你去了吗？”

我回答说：“我去了，看到敌机轰炸的情况，还和现场指挥员进行了交谈、调查。”

彭总说：“你就把你们了解的第一手情况讲讲。”

我即将前面所述的情况作了汇报，并举了一些生动的事例。我看首长们听着还感兴趣，略微停了一下，看看彭总愿不愿意听我们的意见。

彭总说：“你们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有些什么意见？”

我回答说：“我们几个小组回来后，和丁处长一起共同进行了研究，有几点建议：

一、建议从国内再增调铁道兵与工兵入朝，以加强各重点枢纽部和沿线容易遭到敌机炸坏，较难很快修复的地段的力量。

二、建议从国内多运些枕木、铁轨到易遭轰炸的铁路桥附近，隐蔽好，以便敌人上半夜将桥炸断，下半夜我们就可以用枕木架起来作桥架，这样能快些；另外我们还看到铁路、公路沿线炸的大坑很深、用土填土石方量太多，很费时间，填起来后也太松软，火车、汽车不好通过。我们和现场的同志研究，可以用圆木或枕木架起来，铁路上面铺铁轨，公路则铺钉枕木或圆木，这样节省时间节省劳力，比填坑快的很多。这样快速架设的轻便铁路桥，火车头承受不了，现场指挥员同志说，火车头不过江，在江两边，一边将火车箱一次推过几节，另一边快拉走，白昼将火车头压火隐蔽。

三、每天白天夜晚都要抢修，太费劳力和时间，建议另修建新的道路，绕过公路的交叉枢纽部，对公路桥进行假修复，而绕道在河流的另处架设水底桥（即桥面在水下，桥的两侧打木桩作标记），在公路沿途有些难以抢修的地段，也采取新修绕行路，我们去现地看了几处，认为以上办法都可以采用。

四、建议请国内加快组建 37 口径的高炮团、营，以加强积极对空防御的力量，力争多打落一批敌机，把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仅消极地躲飞机，敌人有恃无恐。我们在现地与指挥员同志研究了，我们的高炮部队，可以营为单位配置在各重要部位的山头上，采取真假地配置，即在一些山头设置假阵地，吸引敌机轰炸，我在另一山头的真阵地隐蔽好，趁敌机俯冲轰炸假阵地时，我高炮可突然开火射击。还可以采用游击战打“伏击”的方式，即打了就转移到新阵地，将现阵地变成假阵地，引诱敌机轰炸。现场指挥员同志说，他们将现有的少数高炮营采取这些方式，打下了敌机，减少了自己的损失。他们认为可行的。

五、建议加强对空防御报警哨的力量，在公路铁路沿线各山头上

晚上都设报警哨，使报警的枪声能够连接起来都听得到，多争取一点时间隐蔽，除公安第18师（以后由公安第1师轮换）外，后勤各分部、兵站的警卫部队在晚上也可抽出少部兵力参加报警，朝鲜人民军的后勤部队（主要是妇女）也有报警的。如果首长们同意，我们作战处就与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协商将这几股力量统一组织起来，分工负责，以避免重叠或出现接合部无人报警，可能发生的疏漏情况。

六、建议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所属各分部、兵站都要组织强有力的抢运部队，当夜间火车、汽车运输的物资运到后，即能迅速卸车，搬走，进入山洞仓库，或临时隐蔽处，使火车与汽车也可迅速进入隐蔽体。

在汇报过程中，彭总和其他首长们有些提问，我都一一做了回答。

彭总和各位副司令、代参谋长听后，他们讨论研究了一阵，认为我们提出的建议可行，并指示我们去组织落实。

彭总说：“敌人不是要‘绞杀’我们吗？那就让它在清川江新安州去‘绞杀’吧。”他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的作战地图旁，指着地图说：“我准备另修一条铁路，绕过新安州。即从宣川、龟城、宁边然后分两条岔，一条从这儿过清川江到球场，一条从这儿过江到价川（军隅里），多修两条过清川江的铁路线，敌人飞机炸断一处或二处，我们还有一处可以通过。现在战时修这条铁路，将来对朝鲜的和平建设也是很有用的，你们大家看这样行不行？”

陈赓副司令说：“老总，你这个办法很好。但要投入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朝鲜是无能为力的，都是我们从国内调来呀！”

彭总说：“新修建铁路完全是靠我们的力量，朝鲜是无能为力的。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持久作战，如果不很好解决后方供应运输，怎么坚持长期坚守防御？我相信毛泽东、周恩来会同意和支持我这样来干的。我这就向毛泽东写电报，洪麻子（洪学智）你就赶快与国内铁道部和入朝的铁道兵司令部协商，还要与东北局、东北军区协商，迅速组织力量来修建这条铁路，愈快愈好。”

听了彭总的讲话后，我深深感到彭总比我们看得高，看的更远，

不仅为了战争的需要，还想到了要为了朝鲜将来的和平建设。这样干，我们的后方运输就主动多了。新安州的清川江桥是在清川江入海口，河床低宽、水很深，每夜要抢修通车，难度极大，球场和价川处在清川江中游，河床窄很多，水也浅很多，还靠山，便于抢修和隐蔽。

四、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工事体系的形成，是我军对阵地防御作战创造性的新发展

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战略家和高明的指挥员，在指导战争，特别是指导防御作战的情况下，有一条基本原理，就是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著作中说：“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所以，战略防御问题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

我军在朝鲜转入战略防御后，两军面对面地对垒。我军开始缺少经验，只构筑野战工事，屡遭敌飞机轰炸、扫射和地面炮火的轰击，使我军构筑的野战工事，每天都被炸毁，人员伤亡也较大，武器装备损失也较多。

志司作战处每天收到正面各军报来的情况后，对发生的这些新问题怎么办？如何去解决？心中也是无数。

我对丁甘如同志说：“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是现在我军要坚守住阵地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而且对如何保存自己是最首要解决的问题，只有保存了自己才能去消灭敌人。毛泽东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坐在洞子里是想不出好办法来的，提不出适合于第一线部队的好建议来。我建议我们作战处还是组成几个小组，下去调查了解情况，回来研究提出建议。我带一个组，2位科长各带一个组，共3个小组下去，你在家坐镇，好不好？”

丁甘如处长考虑了一下说：“这个方法上次我们用了，很有效，这次还是这么干吧。这次你在家坐镇，我下去。”

我说：“还是我下去跑，因为你要经常往彭总那里去，我比你年

轻一些，身体也好一些，你身体不太好，在家里掌握全面情况好一些。”我坚持要去，丁甘如也坚持要去，我俩坚持了一会儿，丁甘如被我说服了。

丁甘如说：“老杨，这次又要辛苦你了，注意安全，一个星期之内回来，争取快一些向首长们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我去向张文舟代参谋长报告一下。”

张文舟同志是解方同志被派到开城代表志愿军参加停战谈判后从国内调来的，他原是西北野战军参谋长，全国统一组建兵团时，他任第2兵团参谋长。彭总熟悉他，中央军委考虑到为了便于协助彭总工作，就派张文舟来代理志愿军参谋长。

我对丁甘如同志说：“下部队了解情况，这是我们作战处应做的事。你去报告张代参谋长，让他知道就行了。我现在就出发。”

丁甘如说：“你真真是个急性子人，那好，你们走吧，争取时间要紧。”

带着如何巩固阵地防御的问题，我去正面第一线军、师、团了解情况，当然不能像和平时代一样来召开座谈会，我采取先下而上的办法，先到最前线的连营阵地去看、去听；走进交通沟向前沿的战斗堑壕，边走、边看、边问。

我询问了守卫在战斗堑壕和交通沟的战士、班、排长和连、营长。

我看到已挖的壕沟内的边墙都挖了不少“猫耳洞”，我问战士：“同志们，你们怎么想出来，在交通沟战斗堑壕里挖猫耳洞呢？”

班、排长告诉我：“我们在通过交通沟向前运动时，敌人的排炮有时打到沟、壕内，有的战友炸伤了，有的战友牺牲了，我们就在沟、壕两侧，挖些小洞，能够猫进一个人，这样我们听见敌人的排炮飞啸声，迅速猫到小洞子里去，这样即使炸中了沟、壕，只要不是直接命中，我们也就安全许多了。

正说着，听到敌人炮兵阵地发射炮弹的出膛的声音，班、排长即喊着进“猫耳洞”，也要我们赶快猫起来。我听到炮弹的飞啸，就在沟、壕上边很近的地方落地爆炸，将“猫耳洞”的土震松了，落在

我们身上，有位参谋还被炸塌土方压住了，但没有负伤。

我们走到背敌面山坡，营、连长们领我们去看他们挖的防炸弹的屯兵洞，也是休息洞。我看到有的挖成一个小直洞，有的挖成一个小马蹄型，有2个进出口。我很感兴趣地钻进去看了。我问他们：“怎么有的是直洞，有的是马蹄型？”

他们说：“敌人的飞机与炮弹总是来炸山背面，开始我们挖沟来休息，因为人多，沟较密集遭受了伤亡，也休息不安稳，我们就在山麓下挖小洞，半个班一个洞，在洞内休息几个小时后，在里面的同志感觉憋得慌，我们一琢磨，是不通空气，同志们七嘴八舌地议论想办法，挖出了2个口的小马蹄型，这样空气流通了，出进也方便多了。如果是土质好可以挖长一点，住进一个班。”

我问：“如果挖进过程中，遇到岩石怎么办？”

同志们说“办法我们是想出来了，解放战争中我们都会使用炸药，如果有炸药就可以用爆破将岩石炸开，这样还更坚固。”

我听后，感到基层干部想的多么好呀！用炸药将岩石炸开，可以作为加厚被覆层，并增加抗力。

我还看到山腰部和接近山顶上也挖了很多小屯兵洞，一线指战员们想的真周到，在背敌面休息时还作了多梯次的部署和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准备。

我去了解炮兵阵地时，看到有的做了很好的遮盖伪装，有的还在山麓挖进去一部分，不射击时将炮隐蔽在里面，上盖伪装网。射击时，将炮拉出来。并在附近山边挖了很多小洞，将炮弹分别藏在小洞里。有的利用小雨裂上面搭上圆木架，把整个小雨裂都伪装得看起来不出来，将炮隐蔽在里面，有的还在较远处做了一些假炮兵掩体和发射阵地，以迷惑敌人，他们笑着说：“美国鬼子很教条，只知道按战斗条令射击，我们那些假阵地就是按他们的战斗条令的规定做的。因此，每天都遭到轰炸，我们就在一边看热闹，我们和敌人玩着捉迷藏的游戏，设法找敌人开心。”

第一线的指战员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精神上却很乐观，他们在发明创造着、谱写着我军战争史的新篇章。也是谱写世界战争史上

的新篇章。

我们3个调查小组回来综合后，向张文舟代参谋长作了汇报，并建议志司通报推广这些经验。这些经验对1951年秋季防御作战，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于冬季掀起了正面第一线部队构筑坑道工事的热潮。

1952年3月，我们志司作战处又组织几个小组下部队调查研究。我又一次到第一线防御部队了解情况和体验生活。看到各师、团阵地已初步形成了以坑道为骨干，与交通沟、堑壕相结合的防御体系，这对抗击敌人的轰炸和攻击的确是很好的办法。但是，我和作战处的同志发现坑道的构筑质量和如何搞好打与防的结合，以及长期在洞内生活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召开一个会议来交流与总结构筑坑道工事的经验。回志司后，我即向张文舟代参谋长提出了建议召开军以上参谋长会议。

陈赓代司令员及其他首长们，认为很有必要开个会来交流总结构筑坑道工事的会议，就确定于1952年4月下旬召开第一线各兵团及各军参谋长会议。会议由张文舟同志主持，会议开始时，张文舟代参谋长要我在全军构筑坑道工事的情况与意见作了汇报。陈赓、邓华等志司首长到会听取了与会同志的发言，然后讲了话作了指示，进一步明确了构筑坑道工事既是为了保存自己，更是为了有效地消灭敌人，从这一目的出发，进一步更明确提出了对坑道工事的战术要求与技术要求、与坑道内生活保障的各种设置等等。

会后，各兵团、各军认真推广，使我军的阵地防御工事，形成了以坑道工事为骨干与野战工事相结合，支撑点式的，既能防又能打，能够坚持长期生活的，绵延在朝鲜“三八线”附近200多公里的正面，纵深达10余公里的防御体系。并逐渐发展成为打不垮、炸不烂的“地下长城”。

由于阵地得到巩固，我军就能从阵地防御的被动中，逐渐转变为依托阵地，由小到大，主动地向敌人实施反击作战。于1952年向敌人进行了夏季和秋季攻势，并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五、从“零敲牛皮糖”的小打，发展到中打和“万炮齐轰”的大打

对两年多的整个阵地防御作战，我不想过多地来论述，因为如果展开写，篇幅会太长，甚至可以写一本书。因此，我只想很简要地写当时某些主要的情况。

关于“零敲牛皮糖”战术的提出。第5次战役后，彭总于5月下旬派陈赓副司令员、解方参谋长回国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汇报朝鲜战争情况及下一步的作战意见。陈赓、解方同志汇报正面防御作战时说：彭总和志司领导同志认为我军一方面要巩固阵地，一方面要反击敌人的阵前进攻，对如何组织阵地防御，如何依托阵地歼灭敌人，我军正在摸索经验，采取小分队于夜间摸到敌人阵地前，在现有炮火支援下向敌班、排阵地攻击，消灭敌人一个班、一个排，拂晓前就撤回阵地，以小胜来不断歼灭敌人，同时从中吸取经验，再逐步增大兵力、火力、发展依托阵地，阵前歼灭敌人。我军在第一线的部队，还开展了“打冷枪、冷炮”的活动。在前沿阵地的敌人，每天早上、中午、黄昏前，总想站起来伸伸腰活动活动，敌人的监视哨用望远镜向我阵地窥视，敌人都无意识地将头部伸出战壕。我们了解掌握了敌人这一活动规律，即组织神枪手、神炮手（步兵小口径炮），隐蔽好，发现目标即突然地向敌人开枪、打炮。每天打死打伤几十个敌人，一个月在整个防御前沿阵地，可以打死打伤数百、数千名敌人，以少积多，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

毛泽东同志听到这些情况汇报后说：这个方法好，集小胜为大胜，阵地防御作战，就采取“零敲牛皮糖”的办法，一小块、一小块地敲掉敌人消灭敌人，从消灭敌人的一个班、一个排积累了经验，再逐步发展到歼灭敌人一个连、一个营，这个办法好。

“零敲牛皮糖”这是一句湖南的土话（方言），我是湖南湘潭人，知道这个比方是怎么回事。在陈赓、解方同志于1951年6月下旬向志司党委会传达毛泽东这句话时，有的同志不是湖南人，不明白是怎

么回事，彭总、陈赓、邓华同志都是湖南人，当然明白。陈赓就解释说：“零敲牛皮糖”，这是我们湖南的土话，毛主席用这句土话作形象化的比喻，牛皮糖是用糯米磨碎熬出来的糖块，由小商贩装在箩筐内一大块，走乡串村地叫卖，乡下小孩没有多少钱，一两个铜钱，就给敲一小块，一小块地敲卖，一天敲卖不完，第二天还可敲卖；箩筐里装的一大块牛皮糖，就是这样一小块，一小块敲下来，卖掉了，你们听明白了吧。毛主席这个比方用在阵地防御作战初期打小歼灭战是多么恰当、多么形象、准确！

这样，毛主席提出的“零敲牛皮糖”战法，就成为我军在阵地防御作战初期打小歼灭战的作战方针。阵地巩固后，要求正面各军每次反击歼敌，企图不要太大，每次歼灭美军一个排一个连，歼灭南朝鲜军一个营到一个团，要成建制的歼灭敌人。

由于我军防御阵地不断巩固与加强，入朝作战的部队（包括炮兵、坦克兵等），不断增加，后方供应不断改善，各种装备、弹药、物资等源源不断地运到前线，到1952年下半年，我军依托阵地，实施战术反击歼敌的规模不断加大。从局部地段地打，发展到有计划、有部署的几个军同时地连片地打，全线地打。由歼灭敌人1个连、1个营，发展到歼灭敌人几个营，甚至成团的歼灭敌人。作战规模由小打，发展到中打，再发展到大打。1952年秋季上甘岭之战，即由战术规模的小打，发展成战役规模的大打了。

六、上甘岭2个小高地的争夺战斗，“发展成为战役规模”的作战

“发展成为战役的规模”，这句话是引自中央军委1952年11月7日发给志司的电报。

关于上甘岭之战，各方面写的很多了，还拍了电影。我还是根据当时志司作战处了解掌握的情况，简略地回忆当时的实际情况。

上甘岭之战，是在志司首长统一部署、组织、指挥下，由2个军以上的兵力，依靠志司炮兵指挥部集中大量的炮兵部队、高射炮兵等

部队有力的支援，以及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的大力的后勤供应保障下，才使上甘岭2个面积只有3.7平方公里的小高地的战斗，坚守43天，由战斗发展成战役规模的作战。如果说是某一个军组织指挥打的，这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从军事理论上来说，1个军的作战，是不能成为战役规模的作战。

1952年9月18日开始至10月5日，志司与联司首长（当时邓华已任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在正面第一线展开志愿军7个军、人民军2个军团，向敌展开秋季战术反击作战，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敌人在我军连续打击下，已失去了先机进攻之利，并逐渐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敌人为了夺回主动权，调整部署，企图于10月3日向我发动进攻。邓华代司令员等志司首长，得悉到这个情报后，立即于当日（10月3日）下达作战命令，决定于10月6日发动全线战术反击，以求打乱敌人的进攻计划。由于我军发动了全线战术反击，迫使敌人推迟到10月14日才发动了金化攻势（代号为“摊牌作战”），企图夺取金化以北中部战线的战略要点五圣山南麓我伸出的2个要点，即597.9高地和537.7高地，2个高地面积只有3.7平方公里。

当时在这2个高地上，我军第15军45师各有1个连防守。

敌人从10月12日即以飞机、大炮对这2个高地实施2天的火力准备，14日开始在飞机、大炮支援下，地面部队向我两个连发动猛烈的全面攻击，战斗极为惨烈。

经过10月14日一天的激烈战斗，由于连续激烈战斗，志司作战处将战况进行了认真仔细地分析研究，发现敌人向我中部五圣山主阵地进攻是企图首先攻占上甘岭，突破我中部防御阵地。当即向邓华代司令员作了汇报。

邓华与志司其他首长共同研究后，即于15日给第3兵团和第15军领导打电话，令他们暂停反击注字洞南山之敌，要集中力量准备粉碎敌人向上甘岭地区的任何进攻。

第15军在上甘岭2个高地连续与敌激战7个昼夜，顶住了敌人的进攻，敌人伤亡惨重，我45师也伤亡很大，无力再组织反击。志

司作战处分析研究了一个星期的作战情况，向志司首长作了汇报并提出建议。邓华代司令等首长研究后，及时向第15军领导发出指令，指出：敌人成营成团地向我军阵地攻击，这是敌人轻视我军炮火，而采取的错误的用兵方式。这正是我军抓住敌人的错误，歼灭敌人的最好机会，必须坚决继续地战斗下去，将坚守坑道与反击作战更好地结合起来，大量地杀伤敌人，争取粉碎敌人的进攻。志司则迅速调集炮兵部队来支援作战，到10月29日已经增调炮兵19个连，及后勤支援部队运送弹药，以猛烈的炮火，有效地保护了2个高地上坑道口的安全。

志司首长与志司作战处在这段时间里，日以继夜紧张地工作，收集分析研究敌我情况的发展变化。由于连续激烈战斗，志司作战处已认识到第15军再没有较多的兵力来坚持作战了，需要增加部队上去支援第15军。我即向邓华代司令员汇报了我们作战处对敌军和我军情况的分析，建议立即派部队增援第15军。

邓华代司令问我：“你们看，派哪个部队上去增援？”

我将工作地图摊开，指着地图回答说：“第3兵团所属第12军正从第一线阵地撤出，途经上甘岭山下，准备进到谷山休整。我们建议第12军暂不要到谷山休整，就地停止前进，将该军增援上去，这样最迅速又最方便，12军与15军都属第3兵团，也便于指挥。”

邓华代司令看着地图问：“现在12军已到什么地方了？”

我指着地图回答说：“10月20日晚，该军先头师第31师正行军到上甘岭山下。”

邓华代司令当即给第3兵团领导打电话，命令第12军不要向后开进去休整，立即增援第15军作战。邓华代司令并要我再补发个电报命令给第3兵团和第12军、第15军。

第3兵团首长遵照邓华代司令的命令，迅速令第12军停止向后开进，即在五圣山以北地区集结，作为第15军的预备队，随时准备投入上甘岭作战。但第15军仍坚持要收复597.9高地后，再将阵地移交给第12军。11月1日晚第12军开始投入战斗。

11月5日，第3兵团首长遵照志司首长要求“坚决战斗下去”

的指令，对2个高地的坚守又进行调整部署，立即将第12军换上去，接替第15军进行防守。第3兵团首长决定第12军设指挥所，指挥坚守2个高地的作战。因是在第15军防守区内，为了指挥的连续性，即归第15军指挥。

上甘岭作战，从1951年10月14日敌人发动地面攻击开始，至11月25日结束，共43天（43天，是当时说出来的，就一直是这样说了，如果从10月12日敌人实施空中、地面火力准备2天的时间计算在内，就是45天）。前期即10月14日至11月6日，是由第15军45师、29师坚守上甘岭2个高地坑道。后期即从11月6日至11月25日，上甘岭2个高地，即由第12军31师、34师坚守（第12军11月1日即已开始投入战斗）。2个军大约各坚守一半的时间，2个军每天夜晚都投入2个连，上到2个高地去轮换作战，每昼夜都是经过极为惨烈的战斗。

为了支援上甘岭作战，志司炮兵指挥部陆续共调集榴弹炮兵第2、第7师，火箭炮兵第209团、第60军炮兵团，高射炮兵第601团、第610团各一部。共计各种大口径火炮114门，喀秋莎火箭炮24门，高射炮47门。还有工兵第22团第3营，担架营等部队参战。洪学智副司令领导的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倾注极大力量指挥组织后方各分部、兵站等部门和部队迅速及时的进行了后勤保障工作。

从上面的概述中完全可以看得出来，上甘岭之战，不是某1个军打的，也不是前线某一位指挥员指挥的，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真相的。上甘岭作战，是第3兵团所属第15军和第12军及大量的炮兵师、团等诸兵种的联合作战。从战斗发展到战役规模，从开始直到作战结束全过程，都是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等志司首长及时定下决心、下达命令，部署指挥的。当然前线指挥员也很好地执行了志司首长的意图、决心与命令。

上甘岭作战，是敌我双方在朝鲜战争中，战略防御阶段一次综合力量的大显示、大较量，显示了我军愈战愈强，作战能力与战术的运用非常灵活、机智，指战员不怕苦、不怕死、前仆后继的英雄气概；显示了我军步、炮协同作战的成熟与威力；显示了我军高射炮兵集中

作战，是可以夺取一块空域的；显示了我军后勤保障的及时与充足。

在上甘岭后面的我军炮兵阵地上空，敌人的飞机在我高射炮兵猛烈的炮火射击下，也望而生畏了，在那块空域上空，敌人的飞机不敢任意飞行，不敢飞来狂轰滥炸了，使我军炮兵可以发挥出强大的威力，以猛烈的炮火，轰击向我反扑之敌。有了强大的炮兵支援（43天中共发射大口径炮弹40余万发，平均每日发射1万发），才保护住了2个小高地的坑道；有了后续1个军的增援，才能够使我军在小小的3.7平方公里的2个高地，每晚不断地补充上去2个步兵连，依托坑道，坚守43个昼夜之久。

上甘岭作战的胜利，是志愿军各兵种的密切协同作战，是后方强有力地支援保障，整体力量与敌人大较量的胜利。

七、金城反击战役的胜利，我军从持久的战略防御作战中，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彭总还想打几次反击战役再停战

1953年7月，金城反击战役的组织准备阶段，我当时没有在志司作战处，而在正面的西线第46军136师和第40军120师。因此，我不能说出自己的亲身经历与体会。但在反击战役即将开始时，邓华代司令员电话令我迅速赶到金城前线参观学习。因此，我对反击战役的实施阶段是知道的。但我不是直接参与者，也就不必多说了。

当时我虽然不在志司作战处，但由于长期工作习惯，我始终注意研究着朝鲜战场整个局势的发展变化，因此，对当时整个形势还是了解的。

当时的战局是：抗美援朝战争，由于敌人有绝对优势的空军、海军，掌握了制空权，因此，实际上是一场立体战争，没有前方后方之分，有一段时间内甚至后方的战争比前方更激烈。

在敌我双方都转入战略防御后，敌人即发挥他们的空中优势，向我展开了空中进攻，即所谓的“绞杀战”，企图将我军后方供应线炸

断，炸瘫痪，使我正面前线的军队在没有有力的后方支援下而减弱战斗力，敌人再从地面发动攻势，摧毁我军的防御。

因此，对我军来说，既要迅速巩固前方正面的防御阵地，更要巩固后方的交通运输线。彭总和志司其他首长研究，后方供应仅靠由东北军区派出的前方指挥所来保障，是不能粉碎敌人的空中进攻的。因此，建议中央军委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统一领导志愿军的后勤工作和后方对敌空中进攻的作战。彭总认为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必须要有强有力的领导与指挥，在志司党委会上，提出由洪学智副司令员兼任后勤司令员，大家都很同意。

中央军委同意彭总和志司的意见于1951年5月19日决定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负责领导指挥在朝鲜境内之一切后勤工作。直接接受志愿军党委和首长领导。并任命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兼司令员，周纯全任政治委员。

志愿军后勤司令部于1951年6月份成立后，统一指挥与组织志愿军后方的供应保障。为了使后勤保障的畅通，志愿军后勤司令部与国内战争时的后勤部大不一样了，志后是一个各兵种的联合的后方勤务司令部，指挥着6个后勤分部和设在朝鲜北部各地的几十个后勤供应兵站、大量的仓库、几十个野战医院；还指挥几个警卫团、几个警卫营；10几个汽车团、20几个辎重团、几个运输营、几个工程大队、几万民工。有几个通信营，自成独立的后方通信联络系统。还配属有2个师的鸣枪报警部队，几个工兵团，十几个高炮营，总人数达22万多人。另外还有铁道兵团、军事铁路运输局等。

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既要保障野战部队的全部供应，还必须负责后方对空防御作战，也就是粉碎敌人从空中发动的“绞杀战”。

1951年9月份开始，我空军在苏联空军2个师的支援下，开始在清川江以北上空投入作战，但只能在白昼在清川江以北上空活动。夜间的天空，仍是敌人飞机猖狂地狂轰滥炸。

由于我后方顽强机敏地与敌人空军作斗争，使敌人的空中“绞杀战”没有把我军“绞杀”死，而且卓有成效地前输后送着，强有力地保证了前方作战部队的及时的供应，并发展到后来充足的供应。

在正面第一线担任防御作战的各兵团，各军及炮兵、坦克兵、高射炮兵和工程兵，在防御作战的开始时期是极为困难与艰苦的，在敌人空中“绞杀战”的进攻下，作战部队打的、吃的、用的物资都供应不上，而且敌人在正面的空中进攻与地面炮兵的轰击，对我野战工事的防御阵地，造成很大的威胁与损失。我全体指战员发挥了大无畏的精神与极大的聪明才智，经过不断的探索，创造了以坑道为骨干的阵地防御体系，被誉称为“地下长城”，使我军防御阵地达到了既能保存自己，又能消灭敌人的目的。在彭总和志司其他首长的建议下，我国内各军和各兵种部队不断入朝参战，采取轮番作战的方法，不仅锻炼了部队，而且使第一线防御部队轮换下来，得到休整和补充，恢复体力，补充兵员，使部队保持旺盛的士气。各部队越打越有经验，越打越会打，士气也就越高涨。

从战略上转入阵地防御初期，我军主要是巩固阵地，粉碎敌人向我军发动的大小规模的进攻。我军阵地逐步巩固后，遵照毛泽东主席“零敲牛皮糖”的作战方针，由小到大，采取各种方式方法，包括开始的冷枪冷炮运动，向敌人进行小规模阵地反击，到中等规模的战术反击，发展到1952年夏秋之交，在上甘岭发展到战役规模的作战。

在2年的战略防御作战中，我军后方与前方都由被动逐步转向主动。

到1953年7月，我军发动的金城反击战役，是我军战略防御转向依托阵地主动向敌人发动大规模战役进攻。这是我军在战略防御中一个质的飞跃。也就是说，开始由被动防御转向主动进攻。金城反击战役的重大胜利，使我军从敌人手中夺取了战略防御作战的主动权，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的转折，伟大的胜利。在双方面对面的阵地防御作战阶段，经过敌我双方长期的较量，敌人相对来说，在地面的火力、空中的飞机占有优势，我方相对来说是弱方，我军在依托阵地的战略防御作战中，以劣势装备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这大概在世界战争史是没有先例的。

由于我军发动了金城反击战役，取得了很大胜利，使战争的主动权开始被我军掌握，置敌于被动地位。当时朝鲜战场形势，对我军非

常有利，敌人则处于很不利的被动态势。

金城反击战役胜利进行中，邓华代司令即从北京来到朝鲜，准备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彭德怀司令员报告胜利的喜讯。彭总对邓华说：“我看根据我们现在第一线各方面的准备情况，特别是弹药准备很多，以及敌人不敢将西线美军大量东调到东线来支援南朝鲜军作战，我军可以乘胜再组织一至几个进攻战役，一直打到东线‘三八线’，将东部战线拉平至战前状态，西线我军多占‘三八线’以南的延安半岛与瓮津半岛。请你们研究讨论一下。”

邓华等志司领导同志完全赞成彭总这个作战意图。因为我军已在东线准备了很充足的弹药、粮草和所需要的各种物资，部队也集中了2个兵团，完全可以打一至几个进攻战役，将战线推进至“三八线”。当时又正当秋季到来，正是进攻作战的好时机。

这个作战意图，是以后邓华代司令员在回国的专车上，我与他谈起金城战役时，他对我说的。这从十几年后彭总亲自写的《自述》中完全看得出来。彭总写道：“我在签字时心中想：先例既开，来日方长，这对人民来说，也是高兴的。但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告就绪，未充分利用它给敌人以更大的打击，似有些可惜。”

当时的情况是：金城反击战役我军大胜，敌人大败后，美方“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已经认识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强大，如果再拖延停战谈判，不签字，对美方来说，将接着还要遭受志愿军的战役反击，甚至是连续进攻，敌人不仅要东线占领的“三八线”以北地区全部丢失，而且还要遭到更大的兵力兵器的损耗。东线南朝鲜军是不可能抵挡志愿军的强大进攻的。克拉克也不敢像第4次、第5次战役那样，再将西线美军大量调去东线增援，因为西线正面志愿军也有强大的兵团，随时都可能向涟川或铁原方向发动战役进攻。等待克拉克的仍然是失败，甚至是更丢脸的失败。因此在金城反击战役最后结束的当天，即1953年7月27日，美方谈判首席代表，奉“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的指令，要求与我方代表在停战谈判协定上签字。

金城反击战役胜利后，彭总本想乘胜再打一两次战役，将东线推

进到“三八线”。这时友方特别着急要停战，不想再打下去了。友方也听不进去了，认为有了西部“三八线”以南的延安半岛和瓮津半岛的平原稻田区，人口多；东部大山区，人口很少，稻田也很少，收复了也不能增加人口和生产粮食。友方直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提出来，趁着我军打了大胜仗，敌人又急于要求停战、签字，我们也应该同意停战签字。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认真研究了友方急于要停战的心情与实际情况，同时，从整个国际局势来考虑，从政治上来考虑，从战略上来考虑，从两党两国关系来考虑，党中央、毛泽东和彭德怀共同研究后，并同友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中朝双方决定同意美方要求，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八、志愿军不需要“顾问”，苏联还是要派军事顾问团到志司

1951年7月10日，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开始后，敌我双方都进入战略防御。苏联提出要派军事顾问团到志愿军司令部来“顾问”。因为当时在国内从军委各总部、各军兵、各兵种和各大军区、各军事院校，苏联都已经派来了军事顾问团，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都要学习苏联军队那一套条令、条例和军队作战的战略战术，并按照苏联军队那一套执行。

当时，苏联提出要按照派到各大军区的标准，派一个大型军事顾问团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当顾问。苏联提出的这个要求，很使彭总和其他志司首长为难。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还在与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我军入朝后，经过与美军5次战役的较量，用我军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战胜了敌人，并且已经取得与美军作战的丰富经验。志愿军不需要苏军的“顾问”。苏军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德、意、日法西斯军队作战的经验，他们还没有与美国军队作战的经验。而且我军的装备没有苏军那么多的大炮、坦克，也没有空军的空中直接掩护，苏军将领并不懂得我们志愿军作战的战略战术，他们也

不会打我军这样的仗。我们志愿军还没有条件按苏军战斗条令来打这场特殊的战争。他们怎么来给我们志愿军“顾问”呢？我们不希望他们派顾问团来。可是，在当时的政治背景条件下（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一边倒”），只有接受苏联的军事顾问团。

志司首长提出了因为志愿军在朝鲜仍在作战，又没有制空权，志司驻地随时都可能遭受美军空中飞机的轰炸，而且志愿军的司、政、后机关以及诸兵种，现在还不能解决苏联庞大的顾问团的住处和安全保障。因此，请只派一个小型的顾问团来，人数最多不要超过5名（包括翻译），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做到尽可能搞好安全工作与安排他们的居住与生活。

经过协商，他们同意派5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来志司。团长是一名炮兵中将，团员3名（1名少将2名上校），他们都是苏军总参谋部的，1名翻译是文职。这个顾问团是1951年10月下旬来到志司驻地的。

张文舟代参谋长即找司令部有关各处开会，告诉我们苏联派军事顾问团来志司的事，要求我们迅速给他们修建隐蔽部，靠山还要挖一条防空坑道，给他们创造一个比较安全的住处和工作条件，要管理处即派人回国给他们购买什么烤面包炉及香肠、奶油等食物及西餐用的餐具等。

我们这些处长们对此并不欢迎，也就不热心。我说：“志愿军打仗还要苏联军队派人来‘顾问’吗？他们打仗的那一套，我们用不上，他们也不懂也不会打我军这样的仗。我们在朝鲜的条件就很艰苦，还要给他们修建安全的住处，还要给他们挖条坑道，又要给他们另起炉灶做西餐，特别是我们作战处，还要经常向他们介绍情况，我们的参谋人员并不多，现在就忙不过来，这完全是给我们添麻烦。”

张文舟代参谋长听了我带有牢骚的话，即说：“苏联派军事顾问团来，是彭总和志司首长们同意了，我们要坚决执行，要做好工作，不要有抵触情绪，中苏友谊与团结是重要的，我相信你们会做好的。”

我说：“参谋长，牢骚话是说说而已，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牢

骚，牢骚话说完就没有了，你交待的任务，我们大家一定会做好，请你放心。”

苏联顾问团来到志司，彭总接见他们后，即让邓华副司令员负责与顾问团打交道。

邓华副司令员对我说：“顾问团提出，他们每天要到作战室去了解情况，你可指定人专门与他们联系，只谈敌我战场情况，其他与作战无关的事你们就不要说了。他们还提出每周要向他们的团长综合汇报2次情况，我已告诉他们，每星期一、星期四去他们那儿汇报情况，你介绍综合情况，由情报处给他们介绍敌情。”

我说：“司令，这个顾问团是给我们添麻烦，他们能顾问什么？他们能打我们现在这样的仗吗？不如改名叫‘观察组’，这还名副其实一些，他们只能了解我军与美军的作战情况。”

邓司令说：“顾问团就是顾问团，你怎么能随意改名。这是政治，你懂不懂？不准你乱说，为了中苏友谊与团结，你们一定要认真对待。”

苏联顾问团来后，看到我们给他们安排的住处与伙食比他们想像的好多了，很满意。他们要求迅速展开工作，我即领他们来到作战处（在矿洞里），向他们介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整个情况。以后每天由两位上校来到作战室了解情况。开始我按规定每星期给团长介绍2次情况，以后由于我工作太忙，又经常下部队，陈赓副司令员还要我参加写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工作。我就对丁甘如处长说，请他去向顾问团团长介绍情况，行不行？丁甘如也不愿意去。我们商量，丁处长说：“我带领作战科长孟照辉去介绍情况，待过一两个星期，就交给孟照辉去介绍，我们就推脱出来了。”我说：“这个办法好，我赞成。”以后就由作战科长专门去与顾问团打交道。

第 十二 章

紧锣密鼓地组织准备朝鲜西海岸 的抗登陆作战

一、美国新当选总统艾森豪威尔，企图从朝鲜东西 海岸登陆，一举结束朝鲜战争

1952年是美国总统大选之年。为了配合总统选举，民主党在任总统杜鲁门，下令朝鲜战场上的美军向我发动进攻，企图以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来争取美国选民支持他连任。因此，在总统竞选最后时间，敌人于10月14日向我发动了“金化攻势”，妄图攻占我军防御阵地中部的武圣山，以突破我军防御。敌人首先向五圣山主峰下的上甘岭2个小高地发动进攻，敌人原以为集中绝对优势的空军和炮兵依靠坦克掩护地面部队向我攻击就会很快取得胜利。没有料到在这2个小高地的作战，规模不断扩大，时间不断延长，一直打到11月初，美国选举投票之日，还没有攻占下来，这样，杜鲁门不仅没有拉到连任的选票，而且失去了很多选票，终于落选。

美军大肆宣传的“金化攻势”受挫，在美国国内外引起强烈的不满，美国人民及其欧洲主要盟国，都要求迅速结束对朝鲜这场无限期的战争。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是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欧洲盟军统帅，组织指挥在法国诺曼底登陆作战，进攻欧洲大陆和德国的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他在发表竞选演讲中，要求美国选民投他的票，

他许诺说：只要他当上了总统，他“将亲自去朝鲜，并结束这场战争”。美国人民已厌倦了这场与他们这毫不相关的，而且又是无休止的看不到胜利的战争。美国选民们就将迅速结束这场战争的希望，寄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美国赢得荣誉与胜利的盟军统帅身上。这样就使艾森豪威尔登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

民主党的总统杜鲁门是文人，不懂军事，不能直接到朝鲜战场上来视察，只能在威克岛上与麦克阿瑟会晤，听麦克阿瑟说什么就是什么。

艾森豪威尔是军人。他于1952年11月当选总统后，在他还没有上任之前，即于12月上旬，带着他准备上任的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太平洋战区总司令等秘密来到朝鲜，与他的老部下美军“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第8集团军司令泰勒中将等会晤，听取战场指挥官的意见，并与他们研究如何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他们一致认为：“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一条固定不变的战线上，继续承受看不到任何结果的伤亡。小山丘上的小规模进攻是不可能结束这场战争的。”“我们唯一的办法最后只能是不顾一切危险，全力发动一场进攻。”（引自艾森豪威尔著《受命变革》一书）

艾森豪威尔回国后，又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和麦克阿瑟（他过去是艾森豪威尔的老上司，又同属共和党）会晤，他们当然也都是主张“打”的。

艾森豪威尔经过战场视察和各方面的会晤后，就大唱要用更大的进攻来结束朝鲜战争，说什么“不能容忍朝鲜冲突无限期继续下去。”他知道要从朝鲜正面发动进攻，来突破我军坚固的防御阵地，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而且要付出很大的伤亡代价的。美国兵的死亡，这是美国人民不会答应与容忍的。组织渡海登陆作战，这是他的拿手好戏。因此，他决心以美军的海空军的绝对优势，从朝鲜东西海岸实施登陆作战。他还没有正式上任当总统，就命令侵朝美军“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组织专门班子，迅速制定在朝鲜的登陆作战计划，并要他的老部属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五星上将审议后，即令克拉克组织部队按计划进行实战演练。

我军得悉美军准备集中美军和南朝鲜军共7个师（其中美军有3个师）为第一梯队，企图在朝鲜东西海岸实施登陆作战。时间定在艾森豪威尔1953年1月20日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后，于2月份即实施大举进攻，以求迅速结束朝鲜战争。艾森豪威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上是胜利者，是西方同盟军的“英雄”。他自认为在这小小的朝鲜战场上必胜无疑，想再显诺曼底登陆胜利的“雄风”，以这次“胜利”作为他上台的第一出好戏，实现他在竞选总统时，对美国人民许下的迅速结束朝鲜战争的诺言，同时也解除西方盟国对美国将主要精力被牵制在亚洲，而减弱在欧洲对抗苏联力量的不满，从而赢得美国国内与国外的信誉与荣耀。

艾森豪威尔的梦真是做得太美妙了。他竟然不去想想他现在的对手是谁？他的老上司麦克阿瑟为什么被打败了？他这个统帅能比中国人民志愿军统帅彭德怀高明吗？能与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毛泽东相比较吗？他真的能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吗？等待他的是胜利的荣耀，还是失败的耻辱吗？……

二、我大军重点防御西海岸。邓华奉命兼任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

我们志司作战处紧密地注视着艾森豪威尔在竞选美国总统的游说演讲活动中，对选民们表示只要他当选总统，即到朝鲜去结束朝鲜战争等有关的讲话。

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后，我和作战处的同志即研究，认为他肯定会对朝鲜战场采取新的行动。我军上甘岭战役的胜利，美军已经尝到了我军正面防御阵地的坚固性，如果要采取大规模行动，很可能是向我侧后进攻，因为登陆作战是艾森豪威尔的拿手戏。志司作战处立即将主要精力对艾森豪威尔可能采取的新的、大规模的登陆作战行动，进行认真的研究。随时准备向首长提出我们的意见。

已回到北京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司令员，于1952年11月23日，给志愿军代司令邓华等领导同志发来电报指示，要求志

司“立即进行反登陆的准备工作，以预防来春（注：指1953年春）敌人从我翼侧登陆。”

邓华代司令员把我叫去，问道：“彭总来的电报你们看到了吗？”

我回答说：“我刚刚看到。”

邓华代司令说：“你们作战处注意到艾森豪威尔的言行了吗？你有什么看法和意见，讲给我听听。”

我回答说：“司令，在上甘岭作战过程中，我们在贯彻执行您下达命令与指示的同时，即特别注意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活动中，对朝鲜战争所发表的言论。在11月上旬他获得胜利后，我们作战处就分析，他对朝鲜战争既然向美国选民许下了诺言，肯定会有所行动。艾森豪威尔也说过不要听‘言语’，要看‘行动’”。

邓华代司令说：“你们注意研究这就好，作战处就应该是这样，既要研究战场的变化情况，又要注意研究从政治上、战略上可能影响朝鲜战局的情况。”

邓华代司令在找我研究工作时，总是循循善诱地对我进行教育和启发，这种联系实际的教育，很深刻，是不容易忘记的，对提高我的认识水平和思维的方法，开阔我的视野，的确是有很大的帮助。

邓华代司令接着说：“我找你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和意见。”

我在邓司令直接领导下工作几年了，首长了解我，我也了解首长，在他面前说话比较大胆，可以做到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没有什么顾虑。我说：“艾森豪威尔是一位军人，他当选了总统，对他在竞选中所发表的言论，许下的诺言，有的也会像其他政客那样，说过就不算了。但在军事方面的诺言，他很可能要有所表现的，他说过在朝鲜战争问题上要看他的‘行动’。我们分析他会采取新的行动，朝鲜战场上美军的将领都是他的老部下，也会怂恿、支持他们的老上司对朝鲜战争采取更大胆的行动，以扭转战局，争取迅速结束战争。”

我略加思索又接着说：“上甘岭已经教训了美军，敌人想从正面进攻是攻不动的。艾森豪威尔不会干这样的傻事。我们判断他很可能会采用从我侧后海岸登陆作战，彭总的电报中也指示清楚了。”

邓华代司令说：“彭总是指示清楚了，我想要听听你们的具体意见。”

我说：“艾森豪威尔是诺曼底登陆的胜利者，他会自认为那么大规模的登陆作战，他都胜利了，小小的朝鲜，对他来说登陆作战就算不了一回事了，这些人都是狂妄自大，总是以胜利者自居，看不起我们的。”

邓华代司令听后笑了，说：“你继续讲下去。”

我说：“敌人很可能在东西海岸，对我军侧后方实施登陆，企图截断正面我军的退路。与正面敌军相配合夹击我军。他们的胃口是很大的”。

我看邓华代司令抽着烟，一方面听我说，一方面在看地图。我就接着说：“东西海岸的地形情况，司令都很熟悉，我就不啰嗦了。根据地形及各方面情况，我们认为敌人从西海岸实施大举登陆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邓华代司令抬起头来对我说：“你说说可能性更大的理由。”

我说：“敌人如果从西海岸登陆成功，一、可迅速夺取朝鲜的临时首都平壤，既取得军事上的战果，又可取得政治上的效果；二、可迅速截断朝鲜北部的的主要铁路、公路交通线，这等于卡住了我志愿军的咽喉。敌人空军的‘绞杀战’就是想妄图卡住我军的咽喉，但没有成功，如果登陆成功，从陆上就真可以卡住了；三、敌人从西海岸登陆，这是打到我军的要害上了，敌人可以取得类似仁川登陆的作用，甚至还要大的效果。”

邓司令看着地图在沉思着，听着，没有抬头，又问道：“那你们有什么意见呢？研究了没有？”

我说：“我们研究了，我们的建议：一是将在第二线休整的各军立即调赴西海岸。东海岸方面的元山、咸兴一带有一二个军就行了；二是我们反登陆作战，仅靠步兵不行，这从上甘岭作战中，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必须要有强大的炮火支援，必须要有强大的高射炮兵掩护，因此，很需要增加炮兵与高射炮兵部队；三是我军坦克第3师已入朝来轮换坦克第1师，是不是可以把坦克第1师留下来，在朝鲜西海岸

体整补充，准备投入反登陆作战。这对加强滩头作战和反空降作战很有利；四是我空军已在清川江以北上空参战，是不是可以延伸到大同江上空，这样我地面部队就有了空中掩护了。还有海军已在安东大东沟港（即现在东港市）有快艇大队，也可以在近海打击敌人的登陆舰艇。”

我接着说：“对反登陆作战，我们既没有理性知识，也没有感性知识。我只在司令员指挥打海南岛时，研究过美军对日军海岛登陆作战和日军反登陆作战的一些战例，现在看来很多经验是用不上的。现在作战处的同志正在集中精力研究反登陆作战的新课题。”

邓华代司令员神情严肃地说：“反登陆作战，我们都还没有经验，都要重新学习。这次反登陆作战是对我军一次更严峻的考验，是与美军更大的一次较量。我相信我军的各级干部会经受住这场严峻的考验，我们一定要战胜敌人的登陆作战。你们在研究学习这个新课题，这很好，我也在学习研究这个课题。但不仅你们学，还要搜集材料，发给部队干部都来学习，尽快进入情况。要赶在敌人登陆之前学好、研究好、并具体运用好。具体组织由张文舟代参谋长负责，我准备回国当面向毛泽东主席与彭总汇报和请示。你赶快将可能调动哪些部队和特种兵，哪些到西海岸，哪些到东海岸，标在地图上给我，以便于我在地图上研究，我研究考虑好后，你再将我研究后的决心部署重新标在地图上，我带回国去。现在我正在思考整个朝鲜战局以及今后工作等问题，准备给中央军委写个报告。你也去做好准备，我随时会叫你来。”

1952年12月4日，邓华代司令员向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明年的方针、工作任务以及防御战术问题向主席的报告》。随即回国去当面向毛主席和彭总汇报，临行前邓华代司令员把我叫去，吩咐我，迅速将反登陆作战的具体方案准备出来，待他回来后，向他汇报。

1952年12月中旬，邓华代司令从国内返回到志司，即听取了我关于作战处研究的反登陆作战方案准备的汇报。

我汇报说：“艾森豪威尔已于12月上旬率领他的国防部长查尔

斯·威尔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五星上将、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等主要将领到朝鲜与‘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和第8集团军司令马克斯威尔·泰勒中将等将领开会。一致认为要用扩大进攻来结束朝鲜战争。艾森豪威尔已令克拉克制定进攻的实施计划，经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正在进行演习。看来，美军向朝鲜登陆作战开始进入实兵准备阶段。我们分析判断，敌人可集中美军3个师、南朝鲜军4个师，共7个师实施登陆作战。艾森豪威尔是善于集中使用兵力的，因此，可以肯定敌人会集中主要力量向西海岸实施登陆作战，在东海岸只会是以一小部分兵力，实行佯动，以牵制我军。”

·我们建议：“我军的反登陆作战准备：一是准备敌人主要力量会在西海岸实施登陆；二是登陆地段主要将在清川江至汉川间；三是在登陆的同时，敌人的空降187团会在我战役后方空降，1950年10月敌人侵占平壤时，就以空降187团实施了空降；四是登陆的时间估计可能会在艾森豪尔1953年1月20日正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后，就会实施，也就是1953年3、4月间。因2月份天气太冷，不便于登陆作战。”

、邓华代司令说：“将你们写的反登陆作战方案准备的报告放在我这儿，我好好审阅后，再向军委报告。我即将召开志司党委扩大会，传达毛主席和彭总的指示，研究如何迅速贯彻落实。”

志司党委于1952年12月17日，召开党委扩大会议。邓华同志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三个肯定：一是肯定敌人会登陆；二是肯定敌人要从西海岸登陆；三是肯定敌人在清川江至汉川间登陆。我们应从这一基点出发，来确定我军之行动方针等指示。在会议要结束的当天，即12月20日收到中共中央给志愿军下达了“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命令。

中共中央的命令指示的很详细，并正式任命“以代理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同志兼任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以梁兴初同志为西海指副司令员，西海指的其他干部应予加强。”

邓华同志决定将党委扩大会议延长一天，主要学习领会中共中央

的电报命令，各兵团、各军的领导同志听了传达后，都异常兴奋，有的兵团和军的同志说：“艾森豪威尔这个军人总统，想上台后就在朝鲜来和我们较量，他太不自量了，也不研究了解我们是什么军队。他想用大打来结束朝鲜战争，正好，我们也想用大打来结束朝鲜战争，在这个问题上，艾森豪威尔和我们想到一起了。我们要打他个落花流水，将敌人淹死在黄海里。”

邓华同志说：“现在会议就开到这儿。担任正面防御的各兵团、各军切不要疏忽大意，不要以为敌人从侧后登陆，正面就太平无事了。你们更要加强正面的防御工事，你们还要做好充分的出击准备，如果敌人胆敢在西海岸登陆，正面各军就主动出击，狠狠地打，依托阵地进攻敌人，拖住正面的敌人。如有可能突破正面敌人的防御，使敌人顾此失彼，那就更有力地配合与支援了反登陆作战，至于西海岸与东海岸防御部署及西海指的扩建，会后我们研究后，即下达命令，各兵团、各军即遵照命令执行。”

散会后，邓华叫住梁兴初说：“老梁，你现在已经不是38军军长了，军长由江拥辉接替你，你就在这儿向江拥辉交代一下，不要回38军了，就上任西海岸指挥部副司令员的职务吧。我们共同来研究西海岸作战部署等问题。”

梁兴初回答说：“我服从命令听指挥，这就去向江拥辉交待一下。”

邓华代司令又对我说：“西海岸是当前朝鲜战争的主要作战方向。西海指由过去的指挥所扩大为指挥部，在指挥部里，要成立各军种、兵种指挥所或指挥室。调你去任作战处长，你现在即去准备一份对西海岸的作战部署文件，明日我们就进行研究。”

邓华代司令已和我说过他的作战意图，我这时再问就是多余的了，我只回答道：“我一定按照司令的意图起草好作战部署的命令。”邓司令员调我到西海指去工作，我很高兴，一方面是首长的信任，一方面是能亲自参加一场反登陆作战的新的诸军种兵种联合作战，对自己可以学到很多新的知识，积累很多新的经验。

梁兴初副司令在一旁听了邓司令对我说的话，待邓司令交待完

后，即笑嘻嘻地对我说：“杨迪，你去西海指当作战处长，我很高兴，在朝鲜这两年来我们已很熟悉了，我了解了你，你也了解了我们，我们在一起工作，一定会很愉快的。”

我说：“梁副司令，我向你学习，也是你刚才对邓司令说的服从命令，听指挥，保证领会好首长的意图，完成好首长指示的各项任务。”

梁兴初副司令说：“我完全相信。你赶快去准备起草部署命令吧，我找江拥辉去。”

三、紧张而又愉快的战役勘察

我按照邓华司令员的意图迅速起草了“粉碎敌登陆进攻部署”的命令，经邓司令员、梁兴初副司令等首长们讨论研究后，于1952年12月23日发出。

邓华司令找我说：“组织扩大西海指的问题，我已与志司其他领导同志商量好了，人员都从司令部各处，政治部有关各部，及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指挥所抽调。具体怎么样抽调，由你去与他们协商，组织西海岸指挥部的任务，就交由你具体负责，指挥部的位置你选择好后，向我报告。指挥部的组织准备工作，越快越好，能不能三至五天内完成？”

我回答说：“5天之内一定完成。因为不仅要选调人员，还要准备资料及各种必要的物资保障。”

邓华司令员说：“怎么组织指挥部，不需要我讲，我相信你会办好，有些事你可去请示梁兴初副司令。”

我找到梁兴初副司令，对他说：“梁副司令，你对组织指挥部及位置的选择有什么具体指示？”

梁副司令说：“杨迪，你还要问我吗？你选择了多次指挥部位置了，你选好后，将指挥部人员组织好后，告诉我，我们就出发到现场去勘察。”

我即去找政治部杜平主任，报告组成指挥部要从政治部抽调人员

的事。他说：“杨迪同志，你就按邓司令员的指示去找政治部各部商量抽调人员，我已告诉有关各部了。”

我说：“主任这么交待，就好办了。”

杜平说：“你去办吧！”

我即去找了组织部长曹德连同志，向他讲明意图，请他帮助从政治部抽调人员。

然后我请司令部各处长来作战室（在战时司令部已形成以作战部门为中心的工作方式与习惯，因此，我可以请各处长来开会研究问题），讲明邓司令的意图，请他们抽调精兵强将，特别请通信处多带几部电台和无线电话，以及能够架通各军的有线电话。请他们在5天内一定要办好。各处处长都很痛快地答应了。

我又到炮兵、工程兵和装甲兵指挥部，传达邓司令员的指示、协商抽调人员，组成西海指的炮、工、装指挥所，他们都很积极，保证在5天内组织好，即可去西海指开展工作。

我与作战处作战科长孟照辉共同在地图上研究指挥部的位置。我们认为在价川西南10余公里的泉洞位置较好。符合指挥部配置的原则，第一，泉洞就在我海岸防御主要方向的纵深；第二，位置适中，便于指挥清川江南北及第一防御地带和第二防御地带的各军；第三，在价川、安州、顺川之间，及平壤以北便于指挥反空降作战；第四，是山区，有很大的金矿洞可以利用，交通又很方便，几个方向都有道路，只要略微修整一下，就可以通汽车。

我即拿着地图去向梁副司令报告，他说：“我们一起去寻找邓司令，你就不要讲两遍了。”我随他到邓司令办公室（也就是休息睡觉的掩体）。我先汇报了指挥部位置的选择，并讲明了理由，邓司令和梁副司令看着地图，听后很满意。邓司令员说：“就这样定下来吧，老梁，你带杨迪他们到现地去看看，如果确实很好，就在泉洞安营扎寨，好不好？”

梁兴初副司令说：“好，我们明天就走。”

然后我又汇报了从司令部、政治部及炮、工、装指挥部所抽调人员组建指挥所的情况，以及直属各分队的抽调与组成。

邓司令说：“我们指挥部要精干，不设政治部，各军的政治工作仍由志愿军政治部负责领导，我们只在指挥部内设政治工作处，只负责指挥部机关和直属队的政治工作。”

邓司令说：“梁副司令，你和杨迪明天带管理处的人员先走，司、政机关及各兵种的人员后天走。杨迪，由你指定一位同志负责带后续人员及直属分队去。”

邓华司令员接着说：“我把志司的工作向杨得志副司令员交代一下，晚几天就去。我现在是既要管志司又要管西海指，但现在主要精力在西海指。”

梁兴初副司令和我乘车来到泉洞。

我们进入洞内观察和选择机关部门的配置，发现这个矿洞真大，有两个通道出口，通道很宽。西南方向的通道间，还有一处较宽的小广场，洞深处往下一层，还有一个大广场。

我说：“梁副司令，我建议首长们和作战室配置在西南方面的通道，向东的那条通道较长，可配置机关各部门。里面下层那个大广场，可以开几百人的大会，我要工兵搭个大一点的台子，国内慰问团来还可以在这儿演出，演一场，指挥部的全体干部、战士就都可以看完。这样演员可集中精力演，我们也可以专心地看。不必提心吊胆地防敌人飞机来轰炸。我们挨炸关系倒不大，炸了慰问团，我们就不好向祖国人民交待。”

梁兴初副司令爱开玩笑，对我说：“你是既选指挥部又选演戏场，打仗不忘看戏。你就这样去办吧！不仅要搭个舞台，还要钉上木板条凳，使看戏的干部、战士都可以坐着看。”

我也笑着说：“副司令，你比我想的还周到，我一定照办。”

西海岸指挥部（简称西海指）成为名副其实的陆、海、空三军和各兵种的联合指挥部。在指挥部内有司令部各处，还设立了空军前方指挥所、海军办公室、炮兵主任办公室、装甲兵第二指挥所、工程兵主任办公室。

我迅速把指挥部配置好后，即要孟照辉科长与管理处长具体落实。我即同有关部门协同，投入反登陆作战部署的图上作业的各项准

备工作。以便邓司令员到后，即可向他提出我们的建议和组织现地战役勘察。

在这里顺便说明一下，我们当时的习惯是叫“反登陆”，国内东北军区的苏联顾问对我们这个军用名词有意见，说什么反登陆这个名词只是防御的概念，不合适，苏军新的战斗条令中是称“抗登陆”，这个名词不仅只是防御，还包括进攻。我们当时在“一边倒”的思想指导下，就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从此就改称“抗登陆”。

邓华司令员到达后，他与梁兴初副司令即召集指挥部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开会，因为梁兴初副司令已召开了指挥部组成的会议，对司令就直截了当地说：“今天我们首先进行西海岸抗登陆作战的图上作业的研究，然后即到各军去看地形，与各军、师领导现地勘察与研究，对照图上作业的部署是否合适。”

邓司令转身对我说：“图上作业你准备好了吧！你先讲讲。”

我即要参谋把标好的地图挂好，进行汇报。

我说：“敌人在西海岸登陆的主攻方向，中共中央在12月20日电令中已明确判断在汉川江、清川江、鸭绿江一线，敌人以7个师左右兵力进行冒险登陆进攻的可能。”

根据上级的判断，我们认为我军的抗登陆防御宜在清川江南北地段，而重点是汉川江到清川江南北地区，其次是大同江口的镇南浦和清川江以北定州东西地段（即云田至郭川）。

兵力、兵器的部署采取有重点、大纵深的配置，清川江以南为主要防御地段，该地段的部队与各兵种的部署：

第一梯队：

一、以第38军（包括第138师），并指挥炮兵第1师另附属各种炮兵共5个团、3个营，该军所有炮兵统归炮兵第1师师长指挥，还有2个坦克团（当时叫战车团）和2个工兵营，担任汉川江（含）至清川江段主要防御地段；

二、以第50军并指挥炮兵第2师，另各种炮兵2个团、4个营，坦克兵1团和工兵2个营。担任清川江以北并古军营（含）一段防御；

三、以 54 军担任铁山半岛和辽东半岛大孤山一段防御；

四、以朝鲜人民军第 4 军团及 1 个旅团，担任镇南浦大同江以北到汉川江一段防御；

第二梯队：

一、第 16 军位于价川、顺川及以东地区，负责支援第 38 军汉川以北，清川江以南作战；

二、第 39 军位于江东、殷山、慈同地区，负责支援第 38 军汉川方向及人民军第 4 军团的作战；

三、第 40 军位于博川、泰川、纳青彦地区，负责支援第 50 军作战；

四、坦克（战车）第 1 师，位于顺川地区机动。

在我防御纵深敌人很有可能空降，主要空降区域可能在价川、顺川地区，或平壤以北，我们已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第 2 梯队各军，都有迅速消灭敌空降兵的任务。

对炮兵、坦克兵和工程兵的部署已与炮办和装指、工指协商了，请他们讲，他们讲的更清楚。

梁兴初副司令说：“杨迪他们制定的图上作业我已听了他的汇报，我看，作为一个初稿，在现地勘察中，与各军研究再修改。邓司令，你看这样行不行？”

邓华司令对我们所制定的计划基本上是满意的，就说：“同意梁副司令的意见，杨迪，你赶快制定出一个现地勘察行动计划来，争取明早就出发。”

我回答说：“司令，勘察计划我已制定出了，现在就可以汇报。”

邓司令笑了，他知道我对他意图的了解，也很熟悉我的工作速度。就说：“那你就说吧。”

我汇报完现地勘察计划后，邓司令对梁副司令说：“老梁，就按杨迪制定的计划勘察好不好？”

梁兴初副司令说：“好，杨迪，你就去通知各军做好准备，要他们也拿出一份图上预案来。”

我回答说：“我已经与各军司令部通电话了，他们问我指挥部是

怎么部署的，我说我们搞了一个意见，司令和副司令还没有审查。他们一定要我们作战处的意见，我考虑他们已按邓司令的意图进驻到了应该部署的位置，我就分别对各军讲了个大概意思。上下通通气吧。我已要他们准备好图上作业了。”

邓司令听后说：“你快准备和组织好，人不要太多，车辆多了目标大，等我们勘察后，你再组织机关各部门去对口勘察。各军也只要主管领导参加，各师领导在各师防区等着，先看清川江以南的38军和16军。一天能不能看完一个军的防御阵地？有没有计算？”

我回答说：“据我计算，看第一梯队军阵地，一天的时间太紧张了，半天看一个师，就得三个半天，最后还得综合研究，司令、副司令还要集合师长们来作指示，使他们有个整体的概念。因此建议看第一梯队军用2天时间。看第二梯队军有一天多点的时间是可以的，还有炮兵师、坦克师等。我计算了一下，共需10天到15天的时间。”

我又说：“刚才司令说，参加勘察的人员不宜太多，我想建议让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领导同志参加，因这次特种兵多，他们很需要直接领会首长的意图和各军、师领导研究对各兵种的使用。”

邓司令说：“就按你的计划和意见进行。勘察中有变化再改动计划。这次一定要好好勘察，在现地将部署研究仔细些，并通过现地勘察来统一各军、师指挥员对抗登陆作战的认识。”

第二天拂晓，我们即出发到38军，江拥辉军长在路旁等我们。我乘的车在最前面，后面才是邓司令、梁副司令等。

我停车下来即问江拥辉军长，我说：“江军长，你安排两位司令先从哪个师看起？”

江军长说：“老杨，我们准备今天先看正面的112师和114师，明日上午看第二梯队的113师。”

我说：“我们也是这么想的，你去见见两位司令，我们就直奔第112师海滩，先看滩头阵地。”

江拥辉说：“不先上山？”

我说：“邓司令这次特别注意看海滩，他有很多想法，到那儿看了再说吧！”

我领江拥辉军长等去见邓司令、梁副司令，并向他们报告了勘察路线，他们没有下车，表示同意，要江军长领着先走。

邓司令对海滩看得很认真，很仔细，提出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把38军作战科长李光兮和侦察科长张魁印问住了。江军长没有料到邓司令会问得这么细，这么深和广，邓司令看到这个情况，就知道军的同志还不完全明白他的意图。

邓华司令说：“我为什么对滩头这么感兴趣，问得这么多呢？我的意图是抗登陆作战，首先要力争在滩头多消灭敌人，在敌人下了登陆舰、艇后，正是没有站稳脚的时候，如果我们从敌人涨潮时的下水线设置钢筋或水泥柱桩阻碍与迟滞敌人前进，将敌人登陆工具撞坏，我军山麓下的炮兵猛烈向敌人射击，坦克向登陆之敌冲击，如果我空军能飞到上空支援作战，就可争取消灭敌人于滩头，或消灭敌人大部至少一部于滩头。这对我军等着敌人上岸后再去打它，有利得多。孙子兵法上讲半渡而击之，这是我军歼敌最有利的时机。”

邓司令停了一下又说：“江拥辉同志，请你与炮兵、坦克兵、工程兵好好共同研究如何在滩头涨潮水面多设几道障碍，炮兵可以组织几层火力，特别注意组织战防炮打敌人的运兵登陆舰艇，及正在登陆的坦克，我军的装甲兵怎么与步兵在滩头协同作战等问题，这都是一些新问题，需要我们好好学习，认真研究解决。”

邓司令讲了这一席话，使我们大家顿开茅塞，大长见识。我心想，邓司令这样有文化根底的高级将领，他接受任务后，不知道看了多少中外有关抗登陆作战这方面的书籍与研究这方面的战役战例呵！

在勘察第一线山头阵地时，邓司令明确指出，哪儿是重点，如何注重结合部等等，在建筑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工事体系中，如何将野战工事与坑道结合得更好，支撑点搞得更好。邓司令说：“我军在正面构筑防御工事时，我们是面对敌人，不能从敌人方面来看我们的工事构筑得合适不合适，现在我们还没有面对敌人，而是面对大海就要注意从敌人将如何实施登陆作战，来观察考虑研究问题，使我军的防御工事，火力配系更能发挥作用。”

看完112师防区后，到该师师部去吃午饭。梁副司令因为是38

军的老军长，刚下车就对 112 师师长李忠信说：“李忠信，你准备了些什么可口的饭菜给邓司令吃？”

李忠信回答说：“老军长，我是按老规矩两菜一汤准备的，保证够吃。”

梁兴初火了，说：“什么两菜一汤，现在不是在正面前线，现在是面对大海，你连海鲜都没有搞点来给邓司令尝尝鲜？”

这下可把李忠信搞得尴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江拥辉军长来找我，说：“老杨，这怎么办，一时也来不及搞海鲜了，你给出个主意，让李忠信下台阶吧。”

我笑着对梁兴初副司令说：“副司令，你知道邓司令最喜欢吃什么菜吗？”

梁兴初瞪眼问我：“邓司令最喜欢吃什么菜？你快告诉我，我要李忠信去搞来吃。”

我说：“邓司令最喜欢吃辣椒炒肉丝，而且辣椒要多一点，这对他来说比吃海鲜还香呢！”

梁兴初副司令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这个杨迪，怎么不早说呢？李忠信，赶快搞辣椒炒肉丝。”

邓华司令员在一旁笑了。

江拥辉军长对我说：“老杨，你可帮我们解围了，今晚到军部吃饭一定准备海鲜。”

我悄悄地对江拥辉军长说：“江军长，你晚上吃海鲜还得准备点酒，邓司令爱喝点酒，梁副司令的酒量你知道。吃海鲜喝点酒可消毒呀！”

江军长问我：“老杨，还要准备什么，你告诉我，我好通知军部准备。”

我说：“你们军的文工团在吧！两位司令都才学会跳舞，如果你能晚上组织跳舞，保证两位司令会高兴。”

江军长说：“呵！我只忙着准备看地形了，忘记准备晚上跳舞的活动了。我告诉你，现在我们军的领导和师的干部也都在学跳舞，可来情绪哩！我们也很喜欢跳舞，平常我们还不好专门组织跳舞哩！趁

这个机会好好学学跳舞，你这个主意出得太好了。”

现在的读者一定很难理解，在那战火纷飞的年月里，怎么还能跳舞呢？何况那时候的干部都是一些“老土”，他们怎么能学会跳舞呢？其实人们不理解，当时的干部，看起来穿着是很“土”，可是我们的脑袋可一点也不土，我们绝大多数都很聪明，用现在的名词来说“智商”很高。请问：如果真“土”，我们怎么能战胜很“洋”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呢？这些干部都是有血有肉的年轻人，都有崇高的理想，高尚的情操。在残酷的战争条件下，随时面对着流血、牺牲，但对我们这些有理想的青年来说，都是无所畏惧的，我们都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

那么舞又是怎么跳起来的呢？1952年10月祖国第2次赴朝慰问团，到志愿军前线各地慰问演出，在敌人飞机的威胁下，不能在露天演出，朝鲜原有的剧场、会场都被炸成瓦砾场，慰问团的同志们就因地制宜，分散以小规模的小分队，在坑道中、山洞中、掩体中为志愿军指战员演出，这样的演出就没有台上台下之分，在演出舞蹈时，演员们就请观众同舞，志愿军一些干部想舞，又不会舞，慰问团的领导同志就要演员们教跳舞，这样就学起跳舞来了。什么四步舞、三步舞等等，开始时演员们数着“一、二、三、四”，“一、二、三”。我们当时很年轻，20多岁、30岁左右，志司首长、各军领导也只有30多岁、40岁左右，很快都学会了。

写到这儿，关于跳舞，还有有趣的故事。当时志愿军铁道运输司令员（兼铁道军事管理总局局长）刘居英同志，他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跳舞时他只坐着看，手打着拍子。我去问他：“刘司令，你怎么不跳？”他说：“我会跳，但我与我的同学夫人有协议，我俩互相自觉遵守。”我笑着说：“你们还有举案齐眉的爱情协定呀！真值得我们学习。刘司令，那就请你教我到底该怎么跳呢？我现在是跟着音乐旋律瞎跳。”刘居英同志说：“我看你跳的姿势不好，舞步也不正规，我从理论上来教你，好不好？”我又笑着说：“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嘛！请教请教。”他说：“你去拿张纸、拿支笔来，我一边说，一边画给你看。”刘居英司令是理工大学毕业的，图画的可好哩，他

说：“跳舞不是军队队列训练，不是先出左脚，而是先出右脚，随着舞曲的旋律、节奏的快慢来跳，一步走多远，向左怎么旋转，向右怎么旋转。”他边说边在纸上画足迹的步法图案，及旋转的图案。

刘居英司令说：“你先跳好四步舞，再跳三步，循序渐进，再学跳探戈舞，跳好探戈舞，那可优美哩！”我请教他探戈舞怎么跳，他就在纸上画了跳探戈舞的步伐图案，并边画边讲解，我都听明白了。他说：“要特别注意跳舞的姿势，这样才有使自己陶醉在美的旋律享受中，不讲舞姿那没有意思。”他即指着正在跳舞中有的同志舞姿很不好看说：“那样难看的舞姿，不是美的享受。”他又拿起笔在纸上画起舞姿人像画。他画的姿势真美。我说：“刘司令，你给我上的这场跳舞理论课，使我把跳舞从只是娱乐上升到美的享受。真谢谢你。”刘居英司令说：“谢什么，这是闲聊，还得让你自己去理解、体会。可不要到处说我教你呀！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你一定要守约。”我一直守约，保守着我们两人的“秘密”已经46年了，其实这不算什么秘密，只是人与人之间要讲的信任。现在已超过保密年限了。

还是回到我们随邓司令、梁副司令在第38军看地形上来吧！

邓司令看地形很仔细，对照地图问的也很细，跟随他看地形，一点也不能马虎，更不能躲得远远地偷懒怕问。我们只能看得更仔细，更认真校对我们作战处所绘制的地图，标绘的是否准确。跟随邓司令看地形的军长、师长们也是很紧张，随时准备回答邓司令的提问。

上午，我们看了112师阵地，邓司令提了不少问题，江拥辉军长和李忠信师长都答得很好，邓司令员也向我问到一些问题，我也如实地对答了。吃完午饭就去114师阵地，翟仲禹师长在等着我们，一直看到快黄昏了，梁兴初副司令有点急了，他就要我去催邓司令。我对司令说：“司令，天要黑了，海上起雾了，风也很大，快看不见了，该看得都看了，你也都作了指示，今天是不是可以暂告结束。”邓司令拿着望远镜看还没放下来，对我说：“今天看得很好，海上、陆上的情况都亲眼看了，也问清楚了。现在几点钟？”我有意将时间讲多点就回答说：“朝鲜时间快6点了。”他似乎才想起来看表，对我说：

“还不到5点钟，你怎么说是6点？”我说：“司令，我说的是朝鲜时间，没有说错呀！”邓司令笑了，说：“今天看得很好，下山吧。”

我们来到第38军军部天已经黑了，又是冬天，一天在野外看海滩、爬山头，冻得够呛，因工作起来很紧张没有感到冷，回到38军军部就感到冷了。我因为同该军的领导同志很熟悉，就不客气地喊道：“李（际泰）参谋长，太冷了，请你要管理科把窝棚烧热一点呀！”

吃完晚饭，梁兴初副司令就嚷道：“江拥辉，吃了饭就要我们睡觉，没有安排什么活动吗？”

因江拥辉军长已和我商量好，作了准备，就不慌不忙地回答说：“首长，不要急，我领首长们到另一个地方去看看。”

我即说：“司令，副司令请你们打打身上的灰土，换上一双皮鞋吧！”

梁副司令明白了，笑着说：“杨迪，你和江拥辉搞什么名堂了？”

我说：“江军长没有搞什么名堂，只是因为首长们紧张工作了一天，冻得够呛，想使首长松弛一下，搞点热身活动。”

真难为他们在山边找到一间还没有完全炸坏的小学校的教室，窗户挂上了红黑布遮住了灯光，屋里挂了一盏汽油灯，地下是朝鲜大炕席，军部文工团的同志们已在等待着。

这是志司首长第一次在部队跳舞，当掀开门帘请邓司令先进时，他就是不进，推让了一会，我说：“江军长、吴（岱）政委你们先进去吧，也不要让同志们站起来欢迎，随便一些，你们先跳起来，司令再进去。”吴岱说：“那怎么行，我们先进，你请司令、副司令随后进好不好。”我说：“我们就这样试试看，你们先进，我就请首长进。”

进去以后虽然没有作介绍，但是军文工团认识梁副司令，梁副司令就将邓司令推到前面，大家看到邓华司令就都自动地站起来热烈鼓掌欢迎。邓司令也就以鼓掌回答他（她）们。我即对吴岱同志说：“吴政委，要乐队奏乐吧，跳起来就好了。”

第二天拂晓后，我们即去113师阵地，下车后向山上走时，梁副

司令对江拥辉说：“昨晚你们搞的那个跳舞场地太差劲，地下铺着炕席，怎么转圈，今晚在 113 师师部附近能不能找一个有木地板的地方。”江拥辉说：“我就派人去 113 师师部去找。”

中午看完 113 师阵地后，邓司令对我说：“今天下午准备召开 38 军三个师的干部还有配属他们指挥的兵种主要领导同志来开个座谈会，你把我一天半看地形说的话，整理出来了没有？”

我回答说：“昨天你讲的已经整理出来了，今天上午讲的回到 113 师师部中午再加上去，保证司令下午能用上。”

邓司令说：“你昨晚不是也在跳舞吗？舞会完了已是半夜了，难道你一晚没有睡觉？”

我说：“我在舞会中出来了，与作战处来的同志共同研究后，孟照辉科长不跳舞，就由他整理出来，舞会完了，我看了整理稿后才睡的。”

邓司令已知道我的工作方法，就不多问了。下午召开会议时，我将他在看阵地上所讲的话都归纳整理出来交给了他。

我们在 38 军看地形时，第 16 军军长尹先炳来了几次电话找我，问邓司令怎么活动的。我说：“每天拂晓后即去看地形，黄昏后才下山。很紧张，看得很仔细、询问得也很仔细。请你们军、师领导同志将地形情况及阵地构筑、兵力部署、火力配置等情况准备充分一些，以备询问。”尹先炳又问：“吃得怎么样？晚上干什么？”我说：“这些问题我不好回答。你去问 38 军吧！”

以后，第 39 军吴信泉军长、第 50 军蔡正国第一副军长和 40 军温玉成军长，都提前打电话来问我。我就按类似答复 16 军的口径回答他们。当然我还是根据各军的具体情况来回答的。

看地形看到第 50 军 148 师，发生了一个小故事。中午在师部吃饭，我们吃着感觉他们做的菜很有特色，比如：红烧狗肉完全是南方做法，带皮又香又好吃，清蒸鱼很鲜嫩可口，浇汁锅粑（当场浇汁，炸得直响）又香又脆。我们已经吃了 3 个军的炊事员做的菜，都没有 148 师炊事员做得好吃。我就问 148 师师长赵鹤亭，我说：“赵师长，我们吃了一路的饭，只有你们师的炊事员做的菜味道最好，你老

兄真有办法呀！”赵鹤亭师长只笑不答。

邓华司令对这些菜很合他的口味，很满意，也就说：“赵鹤亭，你有什么秘密？杨迪问你，怎么只笑不答？”

赵鹤亭看邓司令说话了，就不好不说了，他说：“邓司令，菜是一位厨师做的，他是国民党60军起义的一位师长从云南带出来的厨师，那位师长回云南，这位厨师不愿走就留下来了，正因为他菜做的好吃，我又是湖北人，很对口味，就把他打‘埋伏’了，只有我们曾军长知道（注：曾泽生军长是国民党第60军军长，解放战争中长春起义后，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50军，曾泽生军长亲率50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当时曾军长正回国治病。）一般情况我不让他露手艺，怕留不下。今天邓司令梁副司令来了，我才让他拿出真功夫来。”

我们听后都大笑起来了，梁兴初笑着说：“赵鹤亭，你真会享受，‘埋伏’着大厨师呀！”

赵鹤亭耳朵听觉不太好，听岔了，就说：“梁副司令，他年龄不大，还不到30岁的小伙子。”

邓华说：“这个厨师你送给我好不好？”

赵鹤亭说：“司令要，我敢不给，如果是别的首长要，我真是不会给的，也不会像今天这样，让他出来露一手哩！”

邓华说：“一言为定，我要定了，你谁也不能给，也不要打‘埋伏’了，就听我的调令吧！”

赵鹤亭说：“打仗只要司令一声令下，我们全师都得上，现在司令调一名炊事员，一定送去。”

这位叶师傅从此跟随邓司令，一直到1959年。现已在沈阳退休养老了。

还是言归正传，讲勘察。

我们最后来到朝鲜人民军第4军团勘察时，因为是友军，我只是将邓司令、梁副司令到该军团的勘察计划通知了他们。吃饭、跳舞的事就没有说，也不能说。可是我们在人民军第4军团白天看完地形后，晚上来到军团部，他们盛情地按朝鲜民族方式宴请邓司令和梁副

司令。我们吃完饭后，没有料想到该军军团长正式邀请邓司令、梁副司令去跳舞。我问翻译，他们怎么会组织舞会呢？翻译去了解后，对我说，人民军第4军团已了解到志愿军各军都组织了跳舞。两位司令在这种外交性质的场合不便推辞，就去了。到了舞场我看面孔熟悉，这不是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吗？（即歌舞团）我即故意问该军团的参谋长，我说：“参谋长同志，你们军团的文工团真好呀！”该军团参谋长说：“我们军团长很重视这次邓华司令来军团视察，他不仅是西海指的司令员，而且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司令员，军团长报告了人民军最高司令部，统帅部指示要高规格接待，并特意将人民军协奏团派来欢迎邓司令员。”

我赶快把这个情况悄悄地告诉了邓司令和梁副司令。邓司令也就更加热情表示友好，人民军协奏团的团员都认识邓司令，入场时都起立热烈鼓掌欢迎，邓司令向他们鼓掌致意并特意走向协奏团团长及主要演员面前与他（她）们一一握手问好。在跳舞中间还穿插有独唱、小合唱等节目。晚会气氛很热烈。

这次勘察，就是这样从一个军到一个军，从一个师到一个师地边看边议。我们整整看了半个月的地形。白天跋山涉水非常紧张、劳累，工作十几个小时。到了晚上过得也很愉快、轻松。因为差不多每天晚上都组织舞会。邓司令在作战上、工作上对各军军长要求是很严格的，但在生活上还是很照顾体谅部属的。这样的场合他就装不知，什么也不问不说，我也知道首长的特点，就不必向他报告请示。

当时邓华司令、梁兴初副司令只有40来岁，军长们的年龄只有30多岁，师这一级只30岁左右，有的还不到30岁，都是壮年或小伙子，精力都非常充沛，又不面对敌人，而是面对大海，虽然冬天，也不怕冷。我对梁副司令及当时在场的军长们开玩笑说：“我们这次战役勘察，劳逸结合得很好，白天紧张认真地看地形，晚上愉快地跳舞，这种白天看，晚上跳的战争生活，比我们刚入朝时，只有紧张、饥饿、疲乏大不一样了。”

梁兴初副司令笑着说：“我记得斯大林说过，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铸造的人。不管是用什么材料铸造的，但我们总还是人，我

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呀！战争是很残酷的，但我们有崇高理想的乐观主义者，我们在残酷的战争中，找点生活气味，这多么好呀！多么惬意呀！”

我说：“梁副司令，你这番话说的太好了。我刚才说，白天看、晚上跳，还怕挨你的批呢。”

大家都哈哈大笑。

梁兴初副司令说：“杨迪，我什么时候批过你？你讲的都是实话，这有什么可批的。”

这就是邓司令、梁副司令带着我们在朝鲜西海岸进行的紧张而又愉快地战役勘察工作。

四、严肃认真的作战会议与轻松快乐的跳舞晚会

我们完成了第一次现地战役勘察，返回西海指后，邓司令对我说：“给你7天时间，把抗登陆防御作战方案搞出来，以便召开师以上干部作战会议。”

我回答说：“司令，这次我可要讲点价钱，我计算了一下，7天时间不够用，因为炮兵和坦克兵指挥员和参谋人员，都还要去各军进行战术勘察，要根据您现地的指示，具体研究协同作战部署与计划，他们不仅要到主要防御方向师的第一线，还要到主要反空降地域勘察。他们到现地与各军、师协商好了，我才能综合他们的计划，在他们去勘察时，我还要与空、海军协商，研究陆空协同作战计划和我海军快艇的作战方案，以及空海军协同的作战方案，我与各军种、各兵种将协同方案研究制定出来后，才好综合制定整个西海岸抗登陆作战方案。请您最少给10天时间，最好是12到15天时间，留点余地，然后还要向您和梁副司令汇报审批。我保证1月25日前可以将作战方案及军兵种协同作战计划拟制出来。行不行？”

我还说：“司令，如果敌人真的在3月份登陆。那我们的准备时间是很紧张也很仓促的，为了争取时间，建议各军对坑道工事，炮兵阵地，坦克工事的构筑，应根据您在各军、师勘察时的指示，加速进

行，要将施工队伍组织好，作业人员分三班或四班倒，轮流休息，24小时不停的施工。”我想了想又说：“还有近海滩中及海滩上，设置障碍的材料，需要大量的报废的铁轨。我下去了解情况时，发现被敌机炸坏的铁轨，倒是很多，要请铁道兵协助，按要求的长度锯断后，由汽车团运到主要滩头，由工兵团负责打桩设置。这项工作很重要，又很急。只有设置好海滩障碍物，才能实现司令首先大量歼敌于滩头的决心。”

邓司令考虑了一下，说：“这次作战计划难度是很大，这是我们第一次制定陆、海、空三军和多兵种的协同作战计划。既要制定步、炮、坦协同作战计划，还要制定陆空协同、海空协同作战计划及后方保障计划等，比过去作战计划要复杂多了。你计算的有道理，就给你15天时间，将作战计划制定出来，然后向我汇报，预定2月初召开作战会议。要把会议的准备工作做充分，把我们的作战计划考虑的周详一些。同时通知各军要他们也把作战计划和协同计划制定得详细一些。”

邓司令员停了一下，又说道：“同意你提出的抓紧施工的意见，你即通知各军，第一，要他们按我所讲的要求抓紧构筑工事，轮班作业，分三班或四班由各军、师自定，一天也不能耽误，隔一天向西海指报告一次坑道及各种工事的构筑进度；第二，海滩障碍物的设置，就按你的意见，由你去与铁道指挥部和各军协商解决，调汽车团、工兵团也由你去办。”

这半个月，不，应该说是15个昼夜，我们真是很紧张地工作着，很少睡觉，只是打个盹，这在战争年代是常事了。我们与各军种、各兵种之间配合的很好，按时制定好计划，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也大力支持，具体后方勤务保证由第5分部负责，他们根据作战意图与部队部署，按时制定了后方保证计划，我和作战处的同志们准时将整个抗登陆作战方案制定出来，并标绘在地图上。

1月27日，邓司令和梁副司令召集我们作战处、司令部有关处长及空军前方指挥所、海军办公室、炮兵办公室、装甲兵第二指挥所、后勤第5分部等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汇报抗登陆作战方案。首先，

我将整个方案进行了汇报，然后各军种、兵种及后勤第5分部也分别作了汇报，整整汇报了2天。邓司令、梁副司令在听汇报时，对照着地图，看得很细，提出了很多问题，问了很多数据，我们都一一做了回答和说明。

听完汇报后，邓华司令与梁兴初副司令交换了一下意见。即说：“我们基本上同意你们制定的作战方案，以及各军种兵种制定的协同作战计划以及后勤5分部制定的后勤保障计划，你们就按这个计划去组织落实。”

邓华司令对我说：“杨迪，你通知各军，2月5日西海指召开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为各军军长、政委、参谋长和各师师长、政委，要他们2月4日黄昏前来报到。”

我说：“各军的作战科长和炮兵主任是不是可以来列席会议，以便开会讨论时，各军自己好研究，也好修改协同计划，也只多十几个人。”

邓司令说：“好，就这么办吧。”

为了开会，我们研究确定在矿洞西南方向的那条通道中一处宽大一些的广场作为会场。我要管理处和工兵处将较宽的地方，钉上木板，四面墙上钉上木板好挂地图，如果材料充足也可钉天花板，以防止上面掉下碎石子，砸伤人员。再做一些容易能搬动的小条桌，小凳子，我想到这些军长、师长们来，一定会要求晚上组织跳舞的，做些活动的小桌子、小凳子搬动方便。因为在战役勘察过程中，他们就曾向我说过，到指挥部开会，要我一定组织跳舞。

我还要工兵处和管理处在两个洞口外山岔的树林中搭一些半掩体式的小窝棚，在洞内通道用木板再隔出一些房间，供来开会的军、师领导同志住。我对管理处长说，我们不分谁住洞内，谁住洞外，采取先来先住，后来的住剩下的。我知道各军、师长们都会愿意住洞外的，我们不可能都解决。至于小吉普车，首长们都是一人一辆，车太多了，暴露目标，要接待的同志，来一批就告诉他们的司机将车开回部队去，到会议结束时再通知来接。一切准备工作完毕后，我向梁副司令去汇报。他说：“我一边听你说，一边看准备到底怎么样。”我

和管理处长陪着梁副司令一边看，一边走着说。看完了也说完了。梁副司令表示满意。问道：“伙食准备得怎么样。他们来开会要尽可能招待好些。”管理处长回答说：“我们商定了已派人回国到安东、沈阳去采购了，尽可能搞好些，我们也想到了，如果搞不好，他们会说我们小气呢。”

梁副司令听了笑着说：“要搞好，不要让他们骂。杨迪，你还可告诉后勤5分部，要他们在副食品上大力援助一下嘛。”

我说：“好，我与后勤5分部同志商量。副司令我还有个问题要请示。”

梁兴初副司令说：“什么问题？”

我说：“我们去各军看地形，他们每晚都组织有舞会，现在这些军长大人舞兴可高哩，会议开5天，我们是不是每晚都组织舞会。”

梁兴初副司令笑了，说：“礼尚往来嘛。我不管，他们也不会找我要跳舞，这是你的事，你看着办吧，你不是已经把会议室按两用准备的吗？你去请示邓司令。”

我说：“这还要请示邓司令吗？”

梁兴初副司令对人很和气，很平易近人，我可以无所顾虑地和他说话，我就说：“我知道两位司令跳舞也正在兴头上，我也是一样，我就安排每天晚上都跳舞，正好祖国慰问团在我们开会期间来慰问演出，不跳舞的就去看戏，这样好不好？”

梁兴初笑着说：“你怎么办，怎么安排，我都没有意见。”

2月4日黄昏前，各军的同志们都按时陆续到达西海指，晚上6时半（18:30）梁兴初副司令召集各军领导开了一个简短的预备会，讲了这5天的会议怎么开，他说：“邓司令说，要充分发扬军事民主，指挥部将作战方案讲了后，请各军、师同志们畅所欲言，然后将你们的意见归纳修改，由邓司令最后宣布西海指抗登陆作战的决心与部署。会议准备开5天。”各军同志都表示赞成。

散会后，可就热闹了，军长们都问我：“老杨，今晚你准备要我们怎么过。”

我说：“正好祖国慰问团到我们这儿慰问演出，请你们看戏。”

他们说：“慰问团到我们那儿慰问过了，演出的节目我们都看了，我们今晚要跳舞，请你快去组织吧！”

我笑着说：“我知道各位军长大人会要跳舞，我已准备了舞伴，但还没有要她们来，我现在就去打电话，请他们乘车赶来，一个小时内可以开始。”

他们问：“哪个文工团？你可不能随便对付我们呀！”

我说：“我敢随便对付你们吗？但现在保密。”

我即去给公安第18师领导打电话，请他们立即将文工团派来。

一个小时以后，舞会开始了，我去请邓司令和梁副司令也来跳舞。他们问：“你从哪儿请来的，这么快。”我说：“是请的公安第18师文工团，他们距离近，又是最好的，我想让各军、师领导们开开眼界，我们指挥部组织的舞会不能比他们差。”邓司令、梁副司令都知道公安第18师文工团的舞跳得好，都笑了，起身就走。梁兴初副司令对我说：“你杨迪是想和各军搞比赛嘛！”我笑着说：“是有这个意思，但不能说，来个心照不宣吧。”

这场舞跳到半夜了，大家情绪都很高，我一看表已经12点了，就要政治处的同志宣布舞会今晚到此结束。大家不愿意，还要跳一会儿。

我说：“明天还要开会呀！”邓华司令、梁兴初副司令领头先走了，大家也就不好再继续跳了，余兴未尽地、边走边夸公安18师文工团乐队演奏水平和跳舞水平真高。

第2天吃早饭时，军长们见到我，都对我说：“老杨，你昨晚请的公安第18师文工团比我们军、师文工团的水平高多了，你在看地形时说：“白天看，晚上跳。好，现在指挥部召集我们开会，我们就来个白天开会，晚上跳舞，好不好？”

那些师长们对我说：“杨处长，白天我们集中精力开好会，晚上你就给办个跳舞短期集训班，让我们见识见识，好好学习学习。”

2月5日8时，西海指作战会议开始。梁兴初副司令主持会议。讲了这次会议如何进行的安排。

邓华司令首先说：“我们在战役勘察的基础上和各军进行了现地

研究，然后各军种、兵种又分别和各军共同进行了现地研究，指挥部经过综合研究制定出了西海岸抗登陆作战方案。这次作战会议，就是集中讨论研究，并定下这个作战方案，先由杨迪向大家介绍整个的作战方案，然后分组讨论，充分发扬军事民主，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最后我再讲。”

邓华司令员即对我说：“你开始讲吧！”

我即站到挂着地图的旁边，指着地图进行介绍（当时不习惯拿稿子念，自己干的事都装在脑子里了）。现在回忆当时的介绍，大体分以下几个部分：第一，敌人的企图，可能使用陆海空三军的兵力，可能登陆的主要地段和可能主要空降地域，敌人可能进攻的作战样式等；第二，我军的决心与部署。主要讲了邓司令员和梁副司令员决心首先集中空军、炮兵和坦克的火力，争取大量歼灭敌人于登陆开始的浅海和滩头，以利于第一梯队军坚守第一防御地带。在空军的掩护下，在强大炮火和坦克的直接支援配合下，抓住有利时机，适时向登陆尚未站稳之敌发起反冲击作战，坚决不让敌人突破我第一梯队军的防御地带。为此，第二梯队军要准备及时迅速增援第一梯队军，参加反击作战。如果敌人在我战役纵深空降，第二梯队军应与坦克兵在炮兵、高射炮兵的支援下，力争大量歼灭敌人于空降中，或空降后尚未收拢，即迅速将敌分割歼灭，务必要稳住我后方阵地，还请注意各军各师之间的结合部，防止敌人从我结合部钻进来；第三，我空军应尽最大可能将敌航空兵拦截在我主要防守地段上空之外。当我地面部队向登陆之敌实施反击作战时，我航空兵应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域掩护与支援我地面部队的作战，但应注意以一定的力量（包括高射炮兵）保护机场免遭敌机偷袭跑道。海军快艇大队主要攻击敌登陆舰艇和后续登陆舰艇，要发扬海上近战的威力，冲向敌舰艇越近，鱼雷的命中率就会越高；第四，抗登陆防御工事，要构筑成以坑道为骨干的既能防，又能出击消灭敌人的防御体系，就是说要注意做好出击的野战工事；第五，我军抗登陆作战，是陆军、空军、海军的联合作战，又是多兵种的协同作战，通信联络的顺畅极为重要，如果通信联络出了故障，就可能会影响整个抗登陆作战，至少要准备2种以上的

通信保障方法，请各级通信部门，参谋长们特别要抓好通信保障，也请首长们特别注意通信部门的工作；第六，后方勤务保障是极为重要的，请专门开会研究落实；第七，发扬我军优良作风，英勇顽强，机动灵活，密切协同，团结一致，坚决抗击登陆之敌，一定要争取抗登陆的全胜。

我讲完后，梁副司令说：“各军种、各兵种的同志还有什么要讲的，可以简明扼要地讲讲，使各军、师的同志对军种、兵种协同作战能更明白一些。”

空军、炮兵、装甲兵、工兵的同志都作了补充发言。

我们指挥部的同志讲了差不多一整天，已经快到了晚饭的时间了，梁副司令说：“今天指挥部同志讲了，明天各军分别讨论，各军还可与军种兵种的同志交换意见，有些问题还可与指挥部各处研究，预定以2天时间，给你们讨论与分别研究，第4天大会发言，最后请邓司令作结论。具体有什么事，你们就找杨迪吧，现在休会，吃饭。”

会议第2天各军开始讨论。

邓司令、梁副司令和我们指挥部的各处人员都分别到主要方向上的军去听听他们的讨论。各军对作战方案讨论的很认真，研究的很细，各师把他们的作战计划与军的计划和西海指的整体计划相对照，各军参谋长也将他们的计划，上对西海指的，下对各师的都互相对照找问题、提问题，讨论得很热烈。

各军经过2天的热烈认真地研究讨论后，即进行大会发言，发言讨论很热烈，邓司令、梁副司令不时插话询问军师长们，他们都能准确地回答。对与空军协同作战问题，因是我军从来没有过的事，邓司令有意地问了这方面的问题，有的同志就回答不清楚，空军前线指挥所的同志即作了详细地解说。坦克与步兵协同作战时，步坦通信问题没有解决好，坦克的通信器材只能对坦克，不能对步兵，步兵又不能在坦克指挥车中增加无线电话，坦克内部没有地方装置，用土办法联络也不行，这个问题还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海军办公室的同志也发言说：“快艇海上进攻时我们又计算了一

下，时间上的协同还要进一步研究……”

我听了这些发言后对邓司令和梁副司令说：“听了各军、师领导同志的讨论发言，给我启发教育很大。使我深深感到现代化的三军联合作战，以及地面诸兵种的协同作战，问题的确很复杂，我们是在边学边干，作战计划中疏漏之处比较多。这次会议结束后，我们立即与各军有关部门及各军兵种再进行一次仔细地研讨，一定遵照司令的决心将作战协同计划搞准确。”

我和作战处的同志在每天讨论后，即进行了研究，为邓司令的总结及宣布决心做好准备。2天的讨论后，我和作战处即将修改好的作战计划，重新标绘的地图，并修改了文字材料交给了邓司令。

邓华司令要我请梁副司令来，说：“会议明日上午休息半天，今晚我们将各军，各军种兵种同志的发言，好好研究一下，将我们的计划进行修改，我除了宣布抗登陆作战命令，还准备讲几个问题，我的讲话也要充实一些。”

邓华司令认真仔细地边看文字材料边对照地图，因为他已经胸有成竹了，所以看起来较快，有不符合他的意图之处，他一眼就看出来了，马上告诉我，此处要怎么改，还问我为什么那处你是这样改了？我将改的理由说明后，他认为有道理的，就不问了，没有道理的或理由不充分的，他就将他的意思说出来，我按他的指示做修改，这样研究到晚上12点多钟。第2天上午，研究了她的总结讲话。

2月9日下午，梁副司令主持开会，说：“现在请邓司令宣布抗登陆作战决心和作战协同计划方案。并作有关作战战术问题的讲话。”

邓司令开门见山地说：“去年（1952年）11月23日彭总就有电报指示，12月上旬毛泽东主席又当面向我作了指示，12月20日中共中央正式下达了命令，要求坚决粉碎敌人在西海岸的登陆冒险，争取战争更大胜利。对党中央、毛主席和彭总的命令、指示，志愿军党委已召开了扩大会议进行了传达学习，同志们都很清楚很明白了。我们的决心与作战方案就是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和彭总的电令与决心来拟制的，现在部署在西海岸的志愿军有6个军19个师，人民军1个军团另1个旅，地面炮兵2个师，共有14个团另9个营，高射炮兵2个

团另13个营，战车（坦克）兵2个师6个团等部队，还有空军10个师和海军1个快艇大队。有强有力的后勤保证。西海指的抗登陆作战方针是：积极防御，坚决歼敌。我们的决心是：在敌人可能登陆的主要防御地段，采取大纵深的梯次配置，炮兵和装甲兵（坦克兵）主要配置在主要防守方向和反空降地域。决心：“在空、海军的配合下，首先大量歼灭敌人于登陆过程中，即浅近海和海滩；歼灭敌人在我战役纵深空降的空降兵或战术纵深空降的直升机；坚决死守第一防御地带，适时向登陆之敌实施战术，战役反击作战，粉碎敌人的登陆进攻，坚决完成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彭总赋予我们的抗登陆作战任务。”

停了停，邓华司令员接着说：“作战方案已根据大家提的意见做了必要的修改，各军种、兵种间的协同作战计划，还有不完善之处，会议结束后，由作战处和各军种、兵种与各军再仔细地研究，使之完善。陆、空、海三军联合作战，这是我军有始以来第一次，我也没有经验，从我起都要认真刻苦地研究现代化的联合协同作战。入朝初期我们没有和美国军队打仗的经验，后来经过几次战役，也就会打了，而且打得很好，取得很大胜利。我相信，我们这次抗登陆作战一定能打得很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们的参战部队都是我军的主力，只要各部队互相学习，团结协作，主动支援，充分发挥我军的优良传统，胜利肯定属于我们。”

邓华司令员接着又说：“有关抗登陆作战的政治工作，志愿军政治部即将召开政治工作会议，由志政统一部署，这次会议就不讨论研究了。”

邓华司令员继续说：“我最近对反登陆作战的战术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探讨。我想把我研究的意见讲出来，希望引起同志们对反登陆作战战术等问题进行学习，研究。反登陆作战是我们的新课题，都要认真学习研究。”这就是邓华同志关于《反登陆作战战术问题的研究》的论著。这篇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对情况的估计，确定了反登陆作战方针是“积极防御，坚决歼敌。”反登陆的防御组织原则：反空降问题；反战车（即坦克）、反登陆艇问题；连续反击

问题。

邓司令判断敌人登陆的时间，可能在三、四月间，冰雪解冻以后。要求各部队必须于3月上旬完成一切反登陆准备工作。最后，邓司令充满信心地说：“如果敌人敢于冒险登陆，一定要在我们面前遭到惨重失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邓华司令员讲完后，梁兴初副司令说：“各军回去后，根据邓司令员的决心，西海指的作战计划，你们再进行一次现地勘察和现地作业，把作战计划制定得更准确些。各军种、兵种再到各军去协商一次修改不准确的地方。还要强调几句，一定要抓紧工事构筑，一定要加紧海滩障碍物的设置，尽可能多层次的设置，我们即调工兵团、汽车团去，请铁道运输司令部多收集废铁轨。抗登陆的准备时间很紧，各方面工作都要想到，每天上午8时要向西海指作战处报告前一天的工作进展情况和进度。”

梁副司令最后强调说：“邓司令讲的反登陆作战的战术问题，讲得很深刻，也很透彻。随后印发给你们。我们一定都要认真学习、领会，并结合实际，认真贯彻到反登陆作战的实际准备工作中去。”

会议开得很紧凑，也很紧张，参加会议的军、师首长们都很高兴，个个都是信心十足，一定要打胜这一仗。

各军、师长和政委对会议期间每天晚上的舞会，也很满意，最有趣的是开会的第3天晚上，因上海越剧团正好到了西海指，政治处安排晚上欢迎越剧团慰问演出，演出的节目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我想大家一定会去看，中午休会时，我作为好消息宣布。会后，爱跳舞的军长、师长就找我，他们不看戏要跳舞，而且还提出很“苛刻”的要求，要请越剧团的演员来跳舞，因为越剧团都是女同志。

我就去找政治处肖处长商量。

我说：“老肖，军、师长们给我出难题，今晚要与越剧团的同志跳舞，我想了一下，是不是可以来个折衷办法，就是将慰问演出提前，下午演出，在矿洞里演，白天晚上演都是一个样。晚上，请越剧团的同志们都参加舞会。这样安排，机关的同志们看了精彩的演出，也给开会的同志们组织一场精彩的舞会。你看这样安排行不行？否则

这些军长、师长大人们会缠住我没完没了的。”

肖处长说：“真没有办法，就只有这样了，今天我主持欢迎会，我与慰问团的同志商量商量，请他们于下午提前演出。”

我向这些舞迷的军、师长们讲了我们正在商量解决的办法。他们说：“我们要求，请越剧团的同志们都来跳舞。”

我故意说：“这种要求，我无权决定，我们去与慰问团的同志商量，尽量争取满足你们的要求。”

他们说：“你可不要只消极的商量，请你积极的想法请她们来呀！”

我笑着说：“我这个作战处长，还兼文化部长，又没有给我下这个兼职的命令，你们尽给我出难题。”

他们向我抱拳说：“你这位作战处长，可不是一般的作战处长，这类难题，我们不找你解决，去找谁解决，你肯定会给我们解决好，以后你找我们办什么事，我们也一定照办。”

我说：“你们不要给我灌迷汤了。你们提的交换条件，是假人情，我找你们的事，都是奉命行事，你们必须得办。对不对？”大家笑着推我走，要我赶快去商量。

那个晚上的舞会，越剧团的全体同志都请来了，她们到朝鲜来慰问志愿军指战员同志们的，还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军长、师长和政委，她们都非常高兴、热情，使舞会达到最高潮。

会议结束的那个晚上，大家真是跳得非常欢乐，过了半夜，吃了夜餐，各军、师长和政委们高高兴兴上车时笑着对我说：“这次作战会议，你组织得真好，白天开会很紧张很认真，晚上跳舞也很欢乐很高兴。下次来开会还请你这样办吧！”

我说：“会议是开得好，但跳舞你们尽给我出难题，以后我们到你们那儿去，我也要给你们出难题。”大家在欢笑中告别。

五、梁兴初副司令员在西海指

邓华司令员对整个朝鲜西海岸的抗登陆防御作战进行了现地战役

勘察，和西海岸指挥部一起研究，明确了战役意图和决心，确定了战役部署和协同作战计划，防御阵地工事构筑、后勤保障等，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作战会议后，即准备返回志司。因为还有东海岸防御，正面作战等全局大事要他去处理。

邓司令临走前对梁兴初副司令和指挥部的各部门领导同志说：“西海岸的抗登陆防御决心、部署等各项工作都已经确定了，我就放心了。现在的工作是抓紧落实，抓紧准备，我们要从敌人准备提前登陆来准备，只要我们准备好了，这样就主动多了。艾森豪威尔也得考虑考虑他的拿手好戏是不是能唱起来，是不是能唱好哩。”

邓司令接着说：“我走后整个西海指的全面领导指挥工作，交由梁兴初副司令全权负责。在以后的准备过程中，我只能抽时间来看看，我完全相信梁副司令。西海指各部门领导同志，要在梁副司令的领导下，把指挥部的工作做好，并经常检查督促各军、各师及各兵种，抓紧把各项准备工作做好，随时准备迎击和粉碎敌人的登陆进攻。”

邓司令停了一下，又对我说：“杨迪，你即起草电报，通知西海岸各军、各军种、各兵种及后勤第5分部，在我回志司期间，西海指由梁兴初副司令员全权负责。要求西海指各部队领导同志必须服从梁副司令员的领导与指挥。”

梁兴初副司令对我们说：“邓司令这段时间已将西海岸的防御决心和部署都明确了，我们只是怎么贯彻执行好。各部门仍按计划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并严格检查督促部队的准备工作的质量与进度，每天向我报告。”

梁兴初副司令员是井冈山的老红军，由战士凭战功提升上来的战将。他为人豪放、直爽、平易近人，处理问题果断有魄力，只要他认定的事，是说不二一的。向他汇报问题，他最讨厌啰啰嗦嗦，有意见又不敢直说出来，他听汇报要求简明扼要，直截了当，干脆利索。

梁兴初副司令与我算是老熟人了，解放战争期间在东北野战军，就有所了解，可是我没有直接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现在才真正是他的部属了。我了解了他的特性，能较快地领会他的意图，他有时想要做

的事，我也想到或提前做了，当他提出来后，我能很快将执行情况及结果向他汇报，他交待的事，我很快即可做完。这样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对我的工作很满意，个性上我们都是直来直去，他想得不够周到之处，我敢于直言，他不仅不忌讳，而且喜欢这样处理问题，我有时工作做得不当时，他也是很直截了当地指出，并指示应该如何去做。因此，我们上下级之间很快相处的很融洽，配合得也很好。

在作战会议开完后，约 10 来天。梁副司令对我说：“杨迪，我看现在已将作战会议后的修整补充作战方案的工作干完了，我们到各军、师去检查一次他们对会议贯彻落实情况吧！”

我说：“好，我马上组织人员跟随你去。”

梁兴初说：“不要组织很多人，就是我们两个人，带 2 名参谋就行了，两辆车，这叫轻车简从吧！人少工作起来方便，人多嘴杂，使部队还不好接待。”

我即回答说：“梁司令，你仅带我可不行，现在是多兵种联合作战，至少要带上炮兵和装甲兵的负责同志，在检查工作中会有很多问题，4 辆车也不算多呀。”

梁兴初说：“好，要他们也去，再不要增加人了，你安排一下，先从哪个军检查起。”

我想了一下说：“梁司令，我们这次不照上次先看主要方向，那是第一次战役勘察，我建议：这次从北向南顺着走，即先从铁山半岛第 54 军开始检查，这样行不行？”

梁兴初副司令说：“改变一下也好，就这样安排，你先用电话通知清川江以北的 3 个军，等在清川江以北看的差不多了，再通知南面的 3 个军，同时报告志司和邓司令。我们明日拂晓就出发。”

出发前临上车时，梁副司令笑着对我说：“杨迪，上次勘察后，你对我说什么来着？”

我很快反应到了，立即回答：“白天看，晚上跳。”

梁兴初说：“你记性倒挺好，这次你就看着办吧！”

我笑着说：“梁司令，这次人少，我一定遵令贯彻执行。”

梁兴初副司令率领我们来到第 54 军，丁盛军长陪同。梁副司令

工作起来极为认真，他又是从基层上来的，当过各级指挥员。从战役上一直到战术上的各个方面看得非常准确，指出存在的问题都切中要害，比如：某处兵力不该这样部署，某处火力点死角过大，火力发挥不出来，坑道的出口方向选择不合适，野战工事哪儿挖的不符合作战要求等等，都指点得一清二楚。有些同志过去听说梁副司令有点大大咧咧，经过随同他工作，都改变了看法，从外表上看似乎大咧，其实很细致、认真，考虑问题很深远、周到。

梁副司令认为54军虽然是在次要方向上，但准备工作做得很认真，表示满意。我笑着对丁盛说：“丁军长，这次梁副司令来检查准备工作，还是按邓司令员进行战役勘察一样，白天看，晚上跳。”

丁盛军长知道梁副司令对他们的工作表示了满意，他很高兴，对我说：“你放心，我们已知道梁副司令特点了，晚上我们已准备好了，地方我们修整了一下，比上一次好多了。”

我们一路看到了第38军时，梁副司令到了38军就等于到了家，江拥辉军长等陪着他检查准备工作，我认为本来38军的准备工作抓得很紧做得很好，可是梁副司令对38军各团的干部全熟悉，一部分营的干部也认识，因此他常常指名道姓的向团长们提问，答得对，就表扬几句，说够当团长的资格；有的团长答不对，就批评说，你这个团长怎么当的。看阵地构筑的工事时，这儿有什么毛病，那么有什么不对，都一一指点出来。走到海滩看到海滩障碍物的设置，我看搞得很好，一点也不比50军差，可是梁副司令尽挑毛病说：“海滩障碍是很重要的，你们搞得不如50军的好。”

我插嘴道：“梁副司令，你太不公道了，我们看了50军的，我认为38军设置的障碍物搞得很好，你看，他们还比50军多加了一道障碍物呢！”

梁兴初副司令笑了，说：“我看到了，你说我不公道，你就公道吗？你想当着江拥辉的面说他们好，拍什么马屁。”

我笑着说：“梁副司令，你现在不是38军军长了，江拥辉同志也不是你的副军长了，你是西海指的副司令，我看你到了38军后，就变了调，好似你还是38军军长，所以我说你不公道，不是我想拍

江军长的马屁，而是想说句公道话。”

大家都大笑起来，江拥辉军长说：“副司令和作战处长，展开论战了，真有意思。”

我笑着说：“江军长，梁副司令今天看也看累了，说也说累了，今晚就让首长休息，不要跳舞了。”

梁兴初副司令笑着大声说：“好个杨迪，你竟敢自作主张，取消我的跳舞权利，我罚你今晚不准进舞场。”

我们一边说笑着，一边看，梁副司令一边指点着，他回过头来，对我说：“杨迪，晚上给 50 军蔡正国（第一副军长）打个电话，将 38 军海滩障碍的新做法，告诉他们，要他们也这样做，也可以派人来 38 军看看。”

我回答说：“一定照办。38 军将海滩靠山的突出部削成陡壁，并将炸下的大石头乱放在沙滩上，这样既可以防坦克，又使敌登陆艇冲上来后增加了困难，可以减慢敌人的速度。我建议将这个经验可以推广。”

我们检查到最后是配属 38 军指挥的第 46 军的 138 师，他们是新人朝的师，对朝鲜的情况不熟悉，我们对该师的领导同志也不熟悉。梁副司令对他们就客气和宽容多了，不是那么很严厉。表扬多，批评少。

在西海指这段时间，与梁副司令相处中，他更了解了，我也更熟悉了他。我们上下之间可以说已亲密无间，他对工作总是让我放手大胆地去干。他对我说：“各军来的电报电话凡属要答复的你就答复好了，不要总是来向我请求，大事报告我，小事你就办。”

我说：“如果我办错了，那就不好了，我也负不起这个责任呀！”

梁副司令说：“你在这段时间内，我注意观察你了，还没有看到你处理什么问题处理错了，我看你也是敢直说，敢干的。你不要对我来这一套，如果你处理出了差错，改了就是，有我负责，你怕什么，就这么定了。”

在这样的首长领导下工作真痛快，干什么也有劲。

30 年以后，即 1982 年，他到东北来，先到的哈尔滨，即给我来

电话，我接到电话，听对方说：“你是杨迪吗？听出来我是谁吗？”

我一听就听出来了，非常高兴地说：“梁司令，首长好，你在哪儿来的电话。”

梁司令在电话里说：“杨迪，你还记得我，30年不见，还能听出我的声音，你好吗？全家好吗？我现在哈尔滨，到沈阳我们就可以见面了。”

我回答说：“司令还没有忘记我，到了东北就给我打电话，我真没有想到，我真想很快见到老首长，什么时候来沈阳，我好去接首长。”

梁司令说：“还没有定日子，也不知道会坐哪趟火车，到了沈阳我再告诉你。”

梁兴初司令到沈阳后，我与老首长久别重逢，特别高兴。

1985年10月下旬，我正在海南岛，在听新闻广播时，听到了梁司令病逝的噩耗，极为悲痛，我党失去了一位共产主义战士，我军失去了一位身经百战的战将，我失去了一位敬爱的老首长。

六、艾森豪威尔妄图从朝鲜侧后实施登陆进攻的美梦破灭了

1953年1月20日，艾森豪威尔正式当上美国总统后，发表的“国情咨文”，竭力鼓吹继续侵朝战争，还妄图唆使逃到台湾岛上的国民党军进攻我国大陆，以配合他在朝鲜发动冒险的登陆进攻。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及时发表了严重的警告，明确表明：“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罢手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引自毛泽东1953年2月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主席的讲话，明确地向全世界向美国表明我国的立场和坚决与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斗到底的决心。毛泽东主席的讲

话传到朝鲜，更加鼓舞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战员争取胜利的信心，西海岸的全体指战员则更加加紧进行抗登陆的准备工作。

毛泽东坚定的讲话，使艾森豪威尔原想在他上台后2月就发动在朝鲜的登陆作战，不得不认真地考虑了。他命令侵朝美国总司令克拉克加强对朝鲜北部的侦察活动，搜集情报，他要了解毛泽东的讲话是口头上的强硬，还是真的采取了具体的强硬措施。侵略朝鲜的美军，不仅加强了空中侦察，而且利用夜间空投的方式，或派直升机空降的方式，派遣大批特务空降到北朝鲜后方，特别是对西海岸和东海岸进行侦察活动，收集各方面的情报。我军捉了一些敌人派遣的特务，但是敌人的特务不可能都捉尽，特务们搜集了大量我军加强准备的各方面情报，新的大量军队入朝参战的情报，甚至我方在朝鲜北部抢修新的铁路、运输更繁忙，大量的物资囤积等等，都用携带的无线电机，向侵朝美军总部作了报告。我们的监听电台在这段时间总收听到一些特别的无线电信号，因当时我军没有完备的定向测量设备，也就无法去抓获这些暗藏的特务。

艾森豪威尔得到这些情报后，他知道毛泽东不仅只是口头上的强硬，而是采取了很强硬的具体准备。他犹豫了。2月份没有敢发动进攻，3月份也没有敢发动进攻。我军抓紧这段时间，不论是西海岸、东海岸，还是正面，很紧张地进行了各项作战准备工作。

在这段准备时期内，邓华代司令员命令我军在正面采取：如敌来攻，则坚守阵地，给进攻之敌以大量杀伤；如敌不向我阵地进攻，我则选择敌人的薄弱部，用“零敲牛皮糖”的方式，依托阵地，逐点攻歼敌人，打小的，中等的歼灭战，各军一次歼灭敌人一个连、一个营，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以达到拖住敌人，破坏敌人企图向我侧后实施登陆的企图。

正面之敌，为了再次试探我正面防御的稳定性，于1953年1月25日，向我发动所谓“空、坦、炮、步协同作战实验”，克拉克上将以为“实验”会成功，邀请了一批记者和高级军官去参观。结果他发动的“实验”作战，被我防御部队打得大败。使这些参观作战的记者大为沮丧，发出了很多消极悲观的报道。这样，在美国国会议员

中引起了很大震动，纷纷谴责美国军方，让美国士兵去白送死。美军这次很不成功的“实验”，给艾森豪威尔发热的头脑浇了一瓢冷水。他不得不思考从正面进攻都攻不动，那么从侧后登陆能成功吗？他自己也开始怀疑与动摇。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统帅盟军的登陆作战“英雄”，在朝鲜遇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却迟迟下不了登陆进攻的决心。

到1953年4月份，我抗登陆准备工作已完全就绪。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看准了时机，他命令正面防御各军，按预定作战计划，采取主动出击。开始有选择地向敌人连以下目标实施阵地进攻。4月份，我军连续在正面进行战术反击作战和偷袭等各种样式的作战，共歼灭敌人14000多人。

经过全体指战员4个月的紧张而有秩序地努力准备，整个西海岸的抗登陆的防御体系也已形成，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敌人胆敢发动的登陆进犯。美国的参议员指责美军在正面进攻的失败是“角斗士比赛”。那么，如果敌人胆敢发动登陆进攻，那就是疯牛向铜墙铁壁上撞，要使敌人粉身碎骨的。

对朝鲜西海岸抗登陆战役的准备，用这么长时间、集中这么多人力、物力，进行这么大规模的战役准备，大概这在国内解放战争的三大决战中，准备时间也没有这么长，准备的规模、投入的物力、财力也没有这么多。但是，这是很有意义的、很值得的。由于我军准备充分，阻止了敌人的一场疯狂的冒险，使我军减少更大的损失，特别是避免了更大的伤亡。

艾森豪威尔企图向朝鲜西海岸和东海岸实施大规模登陆作战，一举结束朝鲜战争的美梦破灭了。美方不得不要求恢复停战谈判。1953年4月26日，双方代表回到谈判桌旁来。中断了6个月零18天的停战谈判，重新恢复。

第十三章

邓华代司令员先命我到西线代职 取经，后又令我到东线参观学习

一、邓华代司令员电话，令我到西线第46军136师 代职取经。途中我与敌飞行员玩游戏

- 1953年4月，西海指各部队很好地完成了抗登陆作战的一切战役准备工作后。我们从各方面得到情报，知道美国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已经获悉我军在西海岸、东海岸已严阵以待，迫使敌人放弃了企图采取渡海登陆作战，结束朝鲜战争的计划。

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邓华及志司其他首长，决定以部署在西海岸、东海岸新入朝参战的各军，轮流到正面第一线去，轮换坚守正面防御作战时间较长的军，使第一线防御的部队可以换下来休整。轮换的时间3个月、半年不等，这样使新入朝参战的部队都能取得与美军作战的经验。

无仗可打的西海指干什么呢？梁兴初副司令员是坐不住的，他经常要我陪他到各军去视察工作，特别是到要轮换到第一线去的军，亲自传授与美军作战的经验并帮助他们解决需要解决的问题。到刚刚轮换下来的军去表示慰问和指导工作，并听取他们与美军作战新的情况与经验。西海指的机关则继续组织抗登陆作战各方面的理论知识学习和图上或沙盘作业，定期组织人员下去检查工作。指挥部已没有刚开始时期那么紧张了，各项工作已经进入正常状态。

5月初，我突然接到邓华代司令员电话。

邓司令在电话中问道：“杨迪，你们现在干什么？”

我回答说：“指挥部的工作已经正常，我经常陪梁副司令下部队，到要去正面的军送行，介绍与美军作战要注意的问题，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到轮换下来的军去慰问和帮助解决问题，我借此机会了解正面作战情况与经验，向他们学习、取经。”

邓司令说：“你注意到轮换下来的部队取经，这很好。现在看来敌人已基本上放弃了企图在西海岸登陆的计划，西海指的工作也就不会繁忙了，艾森豪威尔不能兑现从战场上迅速结束朝鲜战争的诺言，想从正面大打也打不动，那么很可能只有靠从正面的局部进攻来配合停战谈判，争取结束朝鲜战争了。现在敌人要求恢复谈判，就可以看出这样迹象来。而我们正面的阵地更加巩固了，敌人很难攻得动，我军在西海岸、东海岸的防御体系也完成了，我们没有后顾之忧，而且东、西海岸的部队随时可以增援上去，加强正面反击作战。我现在正准备要加强正面我军的反击作战，你不要待在西海指去向轮换下来的部队取经了，你到西线第一线一个师去代职，参加直接的指挥作战，这样直接的学习取经会更好一些。现在第46军136师在第一梯队，你就去136师代理副师长，该师师长现在不在位。同时，你还要从自己的实际体验中，了解第一线的第一手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让我知道真实情况。我即给第46军发一份你去136师代职的电令。我再给梁副司令打个电话，告诉他你是暂时去代职，在西海指的职务不免掉，这样他会同意放你走的。”

我立即回答说：“我坚决服从命令，这对我的锻炼太好了。司令，什么时候走？是不是马上就走？”

邓华司令说：“你准备2天内走。好了，我这就给梁兴初打电话。”

一会儿，梁兴初副司令告诉我说：“邓司令来电话了，要你到第46军136师代理副师长，学习取经，我向邓司令说，我很赞成，就是不要免你在西海指的职务，邓司令同意了。”

我说：“我服从命令，我明日就走，行吗？”

梁副司令说：“说要你走，你就走，同我一样的急脾气，那好，明日你走，因为你还是西海指的人，还要回来，我就不欢送你了。”

我笑着说：“梁司令，还是‘欢送、欢送’嘛，我们好改善一下伙食。”

梁兴初副司令也笑着说：“你真会抓住时机改善伙食。好，你自己去告诉管理处，晚饭要处长们都聚到我这儿来，一起改善一下。”

我把工作交给李庆三副处长，第2天拂晓即乘车出发，只带了一名警卫员。

临上车前，我去向梁副司令告别，他嘱咐说：“杨迪，白天乘车向南走，上空没有我们的飞机了，可要小心呀！”

我说：“副司令，我和敌人的飞行员打了2年多的交道了，积累了防空经验，想和敌人的飞行员闹着玩一下游戏。”

梁副司令说：“你这个冒失鬼，可不要拿生命去闹着玩呀！”

我说：“在西线，我对敌机活动的规律已经掌握清楚了，我想这不会有什么问题，现在树叶都绿了，也好防空，白昼行车比夜晚开小灯走痛快多了。请首长放心，我到46军即向首长报告。”

我选择的行车路线，是绕开平壤至沙里院的平川大公路，而是走成川、祥原，直插沙里院以东，这是平（壤）沙（里院）线以东的一条山路。但市边里那个交通枢纽是绕不开的。汽车在大同江以北行驶很顺利，没有遇到敌人的飞机。过了大同江后，敌机开始多起来了。开始敌人的飞行员没有料到大白天敢有汽车行驶，飞过去了。不一会第2批（每批是2架）敌机飞来了。我发现后，即告诉司机小张，沉着，开慢一些，等看到敌机发现我们，开始俯冲投弹时，我们即加大油门，向后侧退10多公尺，靠左边找处山边即停车。小张答应：好。当敌机飞来发现目标，准备向我们俯冲时，我即要司机立即向后倒车，约10公尺左右靠左停下来，但车不要熄火，仍发动着。正当这时敌机扔的炸弹在我们前面爆炸了，飞机正向上飞，我即要司机加速向前冲去，开到不远的公路左旁的防空掩体内去。敌机掉转头绕一个圈来俯冲扫射时，它轰炸的地方没有烟火，目标消失了。它就沿着公路俯冲盲目扫射，将子弹打完后，飞走了。

我对司机和警卫员说：“白天行车与夜间不一样，夜间敌机先扔照明弹，要发现目标再投弹，我们可以利用敌人丢完照明弹，飞机绕圈的空隙加速向前开去，离开照明区。白天行车就不一样了，敌人的飞行员发现目标，它不要绕圈，就可以直接投弹，但它瞄准目标时，因汽车是向前开的，它一定会计算汽车行驶速度，而将瞄准器中的目标略为提前。我们向后倒车，就距敌人飞行员瞄准的提前量远了，不能击中目标。为什么要向左靠呢？因为敌人飞行员知道我们行车规则是右侧通行，我们现在是跑单车，靠左行驶没有关系。”

我接着又说：“我军的工兵团，都在向南去前线的公路两侧挖有很多防空掩体。发现敌机时，即可开进临时掩体内躲避。我们当时正巧，在公路旁两个防空掩体之间。我们继续向前行驶时，一方面要注意天上，同时还要注意公路两旁哪儿有防空掩体。”司机小张和警卫员小孙说，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心里也踏实一些，刚才真有些心慌，我们看到处长不慌，我们也就好多了。

当我们车离开山区，正向沙里院以东行驶，准备走大公路穿过市边里（现在朝鲜平山郡）时，发现敌人的飞机又来了。这时我们的汽车是正下山拐弯由东向西行驶，敌人的飞行员是从南向北飞，发现我们这个目标。我即告诉司机加快速度向前冲，不远有个被炸毁的居民点，冲下公路开进那个已成废墟的村中，发现还有一个稻草垛，汽车即直开进草垛中，又使敌人的飞行员扑个空，目标又消失了，敌机将它携带2枚炸弹扔掉，子弹扫射光后飞走了。

敌机飞走后，我看手表已经10点钟了，我说：“我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会，吃点干粮喝点水，等到11点以后我们再走。”

司机、警卫员也愿意休息一下，刚才两次遇敌机轰炸，把他们搞得很紧张，休息松弛一下，再填饱肚子，很高兴。

我又对他们说：“小张，刚才我让你加速向前冲，这是因为敌人的飞机不是直对着我们，我们这个小目标在飞机上的瞄准器里，横着跑过去，在这一瞬间瞄准器里的目标消失了，这就使敌人要重新捕捉目标，敌人飞行员可能先在公路上寻找目标，我们就离开公路躲藏起来使他找不到。”

管理处同志对我很优待，给准备了馒头、咸菜，还有2桶牛肉罐头，我们三个人吃完后，喝了军用水壶的水。小张问我：“怎么现在不走，这又有什么原因呢？”

我说：“有原因，现在正是敌人飞机从北向南返回机场去吃午饭的时候，美国飞行员既骄傲又娇气，到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要吃饭，还要休息一下。因此，11点30分钟到13点30分钟，这2个小时内比较安全。下一步我们要通过市边里，市边里是我军前线的后方最重要的公路交通枢纽，公路通往东西南北，我们要提高警惕，注意观察飞机，加速通过。”

我接着说：“小张，通市边里的公路很平坦，没有可掩蔽的地方，但公路沿线，我军工兵挖的汽车掩蔽沟的密度大一些，不要怕，你记住，发现敌机，你就将车向左边掩体内开，我们是跑单车，现在公路很少有车跑，你沉着大胆地开，我当前方观察员，小孙你脸朝后坐（我们吉普车都是将车篷放下，敞篷车），当后方的观察员。发现飞机，就喊。比如喊：左前方发现敌机，右后方发现敌机俯冲。小张，你听到我们的喊声报警后，即迅速向左边的最近的防空沟里的掩体内开。停下车后，我们即分散躲在沟里挖的猫耳洞里，待敌机扔下炸弹后，敌机还没有绕过来，我们即分散跑到另外的壕沟里去，待敌机扫射时，可以避免伤人，或减少伤亡。”

司机小张开车技术很好，胆大心细，警卫员小孙很机灵又勇敢，在战争年代就要找这样的司机与警卫员。

我对司机说：“我们要下午3时到达第46军军部。这时敌人飞机活动少，白天也好找军部住的山沟。下午3时以后，道路上车辆开始多了，接近黄昏是敌人飞机猖狂活动的高峰，我们要避开这个高峰。”

当我15时到第46军军部时，见到了肖全福（以后改为“夫”）军长，吴保山政委和曾雍雅副军长，该军入朝时，我去过该军，我们都已认识，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

肖全福军长笑着对我说：“杨迪同志，我们已收到邓司令发来的电报，命你到136师代理副师长，我们很欢迎，我们也知道，你不只

是来代理副师长，还是邓司令派你来了解第一线的 firsthand 情况的。”

我说：“肖军长，我是任代理副师长来参加反击作战学习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了解情况是次要的。而且是在自己的实际学习中来体验战场的实际情况，我可不是从志司下来的呀！”

吴政委问我：“你怎么白天行车？白天很容易被敌机发现，遭受轰炸。”

我说：“这些道路我都跑熟了，对西部敌机活动规律与轰炸扫射这一套，我也摸到规律了，白天走比夜间走方便，特别是中午左右，接近第一线我觉得更安全一些。”

曾雍雅副军长说：“你讲得有道理。你这位老志愿军，比我们新入朝的这方面经验多。”

我问道：“各位军首长，我是不是现在就去 136 师？”

肖军长说：“不要急，在军部住一晚，明天去。”

二、在 136 师，我参加组织指挥一次对敌阵地小规模反击作战

第二天我到达 136 师时，该师政委皋峰、参谋长曹炳海迎接了我。

皋峰同志说：“现在师里只有我们两人，有的同志有病，有的回国办事去了。我们欢迎你任副师长。”

我说：“皋政委，我是任代理副师长，不算是正式的副师长，是来第一线学习取经的。3 月间你们向美军实施反击作战，打了胜仗，受到志司的表扬，对司令指定令我到你们师来学习。”

曹海炳参谋长说：“我师与兄弟师共同作战取得了小的胜利。那是 3 月下旬，我们进攻马踏里西山、梅岬里东山，这个山敌人叫‘织女星山’。我们依托阵地，黄昏后，迂回到敌人阵地的侧后方，在炮火的支援下，向敌人发起攻击，给敌人打个措手不及，一个晚上就解决了战斗，全歼美国陆战第 1 师和土耳其旅共 3 个排，还有南朝鲜军 1 个班。”

我说：“136师入朝不久，调到正面也不久，上来就打了歼灭美军3个排的胜仗，这可是一个不小的胜利，讲老实话，打美军是不好打的。”

皋峰同志说：“明日要曹参谋长陪你到各团去看看，认识一下各团的领导干部，熟悉部队，看看地形。你看这样安排行不行？”

我说：“我正想要赶快进入情况，皋政委这样安排很好，到师里我是一个新兵，一切听你和曹参谋长安排，并请不要客气地帮助我。”

我对师的二位领导同志的初步印象是：皋峰同志是一位正直爽快的人，待人和蔼，我们虽是第一次认识，感到他很热情，不傲气。曹海炳同志不太爱说话，待人诚挚，在工作中，我们之间能够互相交谈沟通。

我到达136师时，该师正在准备一次小规模的前方反击作战。

曹海炳参谋长在陪我到各团去了解情况和熟悉团营干部时，当在各团阵地前沿看地形，观察敌人的阵地和防守情况时，他对我说：“我们正在军的统一部署下，准备第一梯队2个师同时攻打几个敌人的前沿班、排阵地，歼灭突出之敌。”

我们回到师指挥部后，我即请曹参谋长和我一同到作战科，看了他们的沙盘作业，请他向我说明军首长的意图，以及我们师怎么组织实施这次反击战斗。

曹参谋长说：“准备以407团第1连在炮兵一个营的支援下，沿交通壕分2路迂回到敌马踏里东南山后侧向敌攻击，正面进攻的分队待迂回分队打响后，即向敌发起冲击，包围歼灭敌人。”

我考虑了一下说：“以一个连去攻击美军一个排，兵力够不够。据我在几次运动战中的经验，我军要歼灭敌人的一个排，如果都是在运动中，我军发挥夜战近战的长处，还可以达到目的，如果敌人已处于防御状态，我军一个连攻歼敌人的一个排，就困难了，我们师炮兵团，用全部火力来支援，火炮口径小，火力的破坏率不很大，不一定能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这些问题不知道军首长是怎么考虑和部署的。”

曹参谋长说：“我师这个连是攻打锦州的‘白老虎连’，战斗力很强，很能攻坚作战，军首长说，军炮兵团大口径的火炮，在炮火准备时，支援我师摧毁敌人的炮兵阵地和主要火力点。”

我问：“具体的步炮协同计划是在现地制定的吧？”

曹参谋长说：“炮兵团的同志与第407团的同志去看了。”

我即请作战科长、侦察科长领我到407团，要该团团长领我到冲击出发位置去看看地形，向他们详细询问了我军如何接敌运动，如何与炮兵协同，我迂回分队与正面攻击部队如何配合，团指挥所的位置与突击分队的通信联络等问题。

407团团长和两位科长都能回答出来，我说：“我很相信‘白老虎连’的战斗力很强，能够取得战斗的胜利。但是，我军1个连攻歼敌人一个依托阵地防御的排，而且一个晚上要解决战斗，我们有第2梯队连作准备吗？我们既要想到一定会胜利，但也要想到万一，这个道理你们都懂，如果发生万一的情况我们怎么处置？”

该团团长说：“军首长说，这次作战，我们只能胜利，我们相信一定会胜利，我们的准备工作都是这样准备的。也准备一个连作预备队。”

我因初到这个师，不便再说什么了。

我只问道：“一切都准备好了吗？什么时间发起攻击？”

团长说：“一切都准备好了，今晚部队即运动到冲击出发位置隐蔽，军首长规定明日黄昏发起攻击。”

我回到师指挥所后，把我看到的情况和意见，比较委婉地向皋峰政委讲了。

皋峰说：“我们有把握，我到一连去检查了，干部战士情绪很高，求战心切，今晚该连即向前运动，黄昏时我们俩人去为一连指战员送行，请他们喝口胜利酒，再给全连指战员鼓一鼓劲，使士气更加高昂。”

我知道已再不便说什么了，就答应黄昏与皋峰同志一起去一连送行。

黄昏，我与皋峰政委到达该连，连队正整装待发，皋政委在连队

前作了鼓动讲话。我因新来，连的干部不认识我，皋峰将我介绍给连队，并要我讲话，我只说：“英雄的‘白老虎连’一定能打胜仗，我们一定为英雄连队开祝捷庆功大会，祝英雄们胜利！”指战员的情绪的确很高涨，个个都高喊着口号。

我不知道该师还有这个习惯，要给指战员们喝送行酒。一桶白酒提来了，该团团长、政委对皋峰和我说：“请师首长为勇士们送行，每人喝一口胜利酒。”

连队列队两路行走，我与皋峰政委各拿一个茶缸盛满了酒，当战士们走到面前时，即请他们喝一口酒，重复说着，祝他们胜利。

在黄昏后的夜幕中，我看着战士们迈着雄健的步伐，向着前沿进攻出发阵地开进。我脑海里回想着，几十年来，我参加过无数次的送部队投入战斗前的活动，都没有给每位指战员临行前喝口酒的方式（有吃饭会餐喝酒）。本来当我了解了这次战斗的部署的打法后，就有不同的看法，我到底不是一个新入朝的同志来学习取经，而是老志愿军了，这种部署和打法在我军初入朝打运动战时期，敌我都在运动中，有过取胜的例子，如果美军防御，我以一个连消灭敌人一个排，据我所知，在当时还没有。何况美军已与我军打了2年多了，现在又是两军阵地对垒，敌人的火力配系比我军强多了，敌人防御工事也已完成了，又是在西线丘陵地带，地形对我并不很有利。3月下旬敌人已经吃了一次亏，敌人一定会加强防御的。但因46军从军到师，他们一切都部署好了，我再提意见是很不明智的，不仅不会被接受，还可能产生误会。在第一次参加以酒送行后，看着指战员们前进的背影，我不知哪根神经触动了，油然想起了战国时代荆轲离开燕国在易水边喝酒唱的诗歌……

我很快压制住那根可恨的神经，集中精力思考着怎么来克服困难，争取战斗的胜利。我想如果组织指挥得好，参战连队又能机动灵活地处置各种情况，炮兵配合支援得好，特别是团炮兵抵近射击打得好，将敌人的轻重机枪封锁，使步兵能减少伤亡，冲上去也是有可能争取胜利的。

我们回到了师指挥所，了解到连队已全部进入隐蔽阵地，还要休

息隐蔽一个白昼。我们也抓紧时间稍事休息。

下午，我与曹参谋长坐镇在指挥室，收听着团营的电话报告，一切都正常，按时发起冲击后，开始还顺利，我军炮火只将敌火力压住不长时间，敌人的炮火、轻重机枪即恢复了射击，敌人的飞机也开始飞临受攻击的阵地上空丢照明弹和轰炸扫射。

我分析判断我军的炮火准备的火力，没有将敌人的指挥系统打乱，也没有将敌人炮兵阵地摧毁，没有将敌人轻、重机枪射击口封锁住，只是使敌人遭受部分损失，敌人已经有经验了，很快恢复了通信指挥系统。在这种情况下，我军的进攻一定会遇到很大困难。

我知道我是代理副师长，而且是来学习的，没有直接指挥下达命令的权力，就请皋峰同志来研究怎么办。我说：“我军进攻受阻，建议请求军炮兵团支援向敌阵地轰击，掩护我军继续冲击。令我一连二梯队投入战斗，迂回到敌侧后，组织第二次冲击，直捣敌排阵地指挥所。”

皋峰同志和曹参谋长同意我的意见。可是命令传达到营就传不下去了，与攻击连的通信中断了，当即令营派干部传达命令，协助指挥。

午夜2时左右，一连的副连长一直跑到师指挥所来。报告说：“首长，我连第二次攻击受阻，部队伤亡很大，连长和排干部都牺牲了，战士也剩下不多了，我想撤出战斗，但通信联络断了，我跑到团指挥所，团长要我来向师首长请示报告，是否可以撤，现在不撤，拂晓后，一个人也就撤不下来了。”

我听后，立即说：“撤，你赶快回去立即将剩下的战士撤下来，并将负伤的同志背下来。”我向曹海炳说：“参谋长，这样可以吗？”

曹海炳不表态。我脑海一闪念是不是我不应该说，但我仍坚定地回：“曹参谋长，撤下来吧，拂晓后，就一个人也撤不下来了。”

曹海炳说：“我是参谋长，不知道皋政委同意不同意。”

我也顾不上他对我的态度，立即对一位参谋说：“你赶快请皋政委来。”

皋峰同志来后，我简要说明情况，他即表示同意撤出战斗。

我即对那位副连长说：“请你跑步回去，将剩余战士和伤员立即撤下来，负伤同志都要背回来，不准让敌人抓一个活的。快跑去执行吧，我看这位副连长又饥又渴又累的样子，就要参谋给他一壶水一包压缩饼干。令他边跑边吃。”

曹参谋长心情沉重，坐在那儿一声不吭。

因进攻作战失利，看到这种局面，我立即到作战室告诉作战科长，请他到团指挥所去，帮助该连撤出战斗，并将撤出的情况立即报告。

三、我到第40军120师阵地参观学习，眼睁睁地看着敌机炸弹向我投来

经过在136师参加指挥攻打马踏里东南山战斗后，我认为我到新入朝部队任职，是老兵遇到新问题，又不好说。

正好，我得知这时邓华司令到第19兵团来检查工作，我即给邓华司令的秘书周绍忱同志打了一个电话，我想去向司令汇报一个情况，周秘书要我等一下，马上报告了邓司令后，即对我说：“首长同意你来兵团汇报。”

我来到第19兵团，这是我第一次到这个兵团，新任司令是曾思玉，曾司令待人很热情，从此我们就相识了。

曾思玉司令对我说：“你来得正好，祖国慰问团还在我们兵团，今晚欢迎邓司令组织跳舞晚会。也请你参加。”

我说：“曾司令，我的运气真好，正好赶上了兵团欢迎邓司令的晚会。我已经好久没有跳舞了。”

我向邓司令汇报我了解的情况。

邓司令问我：“46军这次组织的反击作战，打得怎么样？”

我想了一下，还是不要将我的看法全部讲出来，因为46军还是才到第一线参战，与美军作战要有一个认识与积累经验的过程，将来让他们自己去总结经验教训吧。

我说：“西线的敌人都是美军或英军，经过两年多的防御对垒，

敌人的阵地构筑已完善，特别是敌人的炮火组织得很好，射击准确，敌人每天的排炮封锁射击，很有规律，西部都是丘陵地带，不宜于我军组织较大的阵前反击作战，这次46军组织的反击作战，并没有占到便宜，我建议在西线（特别是靠近开城以东地区），不宜打一个排以上的敌人，还是采取小打，打敌人一个班或两个班的突出阵地及冷枪冷炮的打法为好，新上来的部队要有一个实践认识的过程。”

我停了一下说：“司令，我不想固定在136师代职学习，老实说，对我来说还是到老志愿军去，可能学的东西更多些。”

邓司令明白我的意思了，没有批评我，也没有反对，只是说：“那你就在西线各军去跑跑，作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向志司报告，但是在136师代职学习的命令暂不取消。”

我说：“司令，你这样安排对我来说能够学习到更多的经验。”

邓司令说：“你到哪个部队去，要告诉46军以便我随时能找到你。”

我回到第46军军部，即向肖军长吴政委作了汇报。我说：“我在第19兵团曾司令那儿了解到，最近在我们军暂时不会组织向敌人的反击作战，我就向邓司令请示，允许我到附近军去参观学习，邓司令同意了，要我报告军长、政委。”

肖全福军长说：“我们知道你在136师待不长。你到老大哥军去作调查研究，请你一定将他们的好经验及时告诉我们，或要我们去参观学习，在没有接到调走你的命令之前。你仍是我们46军的干部，对不对？”

我说：“是的，我的活动随时向你们请示报告。”

我停了一下说：“我40军120师归我们军（46军）指挥，我想到120师去参观学习几天，可以去吗？”

吴保山政委说：“你到哪儿去都行，只要告诉我们，以免邓司令找你，我们不知去向就不好了。”

我当日即到第40军120师，该师还在第一线阵地，有对46军第一线师传帮带的任务。我到了该师指挥所后，师长郑志士、政委张纪之都非常熟悉，打海南岛就认识了。

郑志士师长最爱开玩笑，对我说：“老杨，你要晚来一天，我们就下山了，既然你来，我们就多呆一天，陪你到前沿阵地看一遍，尝尝美国鬼子的炮弹，也不虚你到敝师一行。”

我说：“老郑，我就是赶在你们还没交完阵地前，到你这儿来尝尝美国鬼子的炮弹味的，现在就请你领我到第一线去参观学习，好吗？”

张纪之政委说：“老杨，你们两个急性子碰到一起了，不要刚到就走嘛，吃了饭再看。”

我笑着说：“我们走到哪个团、哪个营就在哪儿吃，晚上回到师指挥所，你准备招待一下吧。”

郑志士同志说：“又不要坐汽车，走路方便，今日看个团，明日看个团，让你将一天 24 小时的情况都了解，你回去好向邓司令汇报。”

我们一边走，一边看，还一边聊，因为是白天，我说：“西线无战事呀”！（注：我这是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法西斯的军队全力向苏联进攻，美、英军队迟迟不从法国登陆开辟第二战场，当时记者们以“西线无战事”来描写美英国军队的）

郑志士同志是一位有文化知识的师长，他知道我说这句话的由来，就说：“你走一段，就会看到有没有战事。”

果然，当我们走到山麓下，正准备通过通向敌方的小山沟时，敌人一个炮群的排炮弹呼啸而来，我们立即就地卧倒。可是走在我们前面的同志，正在山沟中间，他们虽然卧倒了，但敌人那一排炮弹，正击中了他们，当炮弹刚爆炸，我和郑师长不约而同地立即爬起来向前奔跑，迅速越过这个死亡的山沟，我们在奔跑中经过刚刚倒下的同志，我看了一眼，真是惨不忍睹，几位烈士都被炮弹炸中开膛破肚，我们不能停下来吊唁死者，因为我们是乘敌人炮兵退炮弹壳和上炮弹这一瞬间，必须迅速跑到山那一边去，如果停下来，必死无疑，果然，当我们跑到对面山下，第二排炮弹又呼啸而来。

郑师长对我感慨地说：“老杨，战争就是这么残酷，随时都面对着死亡，你看到了，刚才走在我们前面的战士，就是这样倒下了，他

们的血流在朝鲜的土地上，我看到可爱的勇士倒下了，但不能向他们致最后的敬礼，我的心里是多么的痛心呵！我国的《义勇军进行曲》中有一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我们现在的情况不就是这样吗？”

我很沉痛地说：“你说的完全正确，我国还有一句成语叫‘前仆后继’，在我们前面的同志倒下了，我们跨过烈士的鲜血，冒着敌人的炮火‘前仆后继’地前进。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中华民族最可爱的英雄儿女，为了抗美援朝，已经有30多万指战员的鲜血洒在朝鲜的土地上了，中朝人民和军队在共同战斗中建立的友谊，真正是用英雄烈士们的鲜血凝成的，这不是一句漂亮的口号，是完完全全的事实，我们两人如果仍能在这场战争中幸存活活的话，一定要告诉两国人民、教育两国后代，这种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永世不忘啊！否则就是可耻的背叛。”

在近两天的看前沿阵地的行动中，上述类似的残酷的场面就有好几次。

我在120师坑道里住了一个晚上，第2天拂晓就发生了一次险情。前沿的坑道比较矮小，空气流通不太好，拂晓，我到坑道口外去换空气。郑志士同志还特别嘱咐我，要我不要走远了，听到飞机声，好往坑道里跑，我答应他只在坑道口活动活动。

我出了坑道口，看到右边是师指挥所的厨房正在做饭。我就往左边山坡走，山很陡没有很大的回旋余地，我信步走出大约50米，就听到飞机声，我抬头看，是高空编队飞行的B26型轰炸机，我认为轰炸机是炸后方目标的，第一线是敌人战斗轰炸机的目标，我就没有往坑道口跑。可是正在这时，敌人这批重型轰炸机的炸弹好似是直对我投下来了。我急忙寻找躲藏之处，只发现山边有个厕所棚，我就别无选择，钻进了那小厕所棚，我想如果不直接命中，这个棚子还可以挡炸弹皮，缓冲一下，不致直接炸中我。

我蹲在棚子里，眼看着炸弹直向我落下来，这时我什么也没有想，看到这个棚子是用圆木搭的还顶用，只有听天由命了，跑也无处可跑，躲也无处可躲。大概是师指挥所厨房冒烟，被敌人的飞机发现了目标，就扔炸弹，炸弹都在厨房及其附近爆炸了，炊事员因离坑道

口近，都跑进坑道里了。

敌人的炸弹片还是光顾了我，但是很幸运，是一块不太大的弹片，掉到厕所棚上，由棚子的圆木缓冲了一下，再击中我的后脑勺，流了血，我也顾不得什么，就赶快往坑道口跑。

我跑进坑道里，郑志士、张纪之同志看到我说：“炊事员都进来了，我们问你在哪儿，都说不知道，有个炊事员说你向左走去了。可把他们吓坏了，又不能出去找你，如果你发生了万一情况，我们可就不好交待了。”

老郑爱开玩笑说：“老杨，你还活着，真是万幸万幸。这才怪哩，美国的重型高空轰炸机，很少有在我们第一线阵地投弹轰炸。你来了，敌人飞机就光顾。嘿嘿，我想你是不是把美国飞行员被我军击落，跳伞后，带在身上的那小无线电机，留着当玩具玩，同高空飞行的美国飞机对上了信号，使我们挨炸，你自己也差点儿报销了，对不对？”

我也笑着说：“老郑，你真会开玩笑，你们都知道美国飞行员跳伞后带的小无线电机，那个战利品谁敢留下不上交？这些新玩意都要送回国去研究的，我敢留着玩？你要赖我，我就不客气地说了，我出坑道口看见你们厨房正升火做饭，烟筒冒着烟。美国飞行员对冒烟看得可准哩。”

老郑拍着我说：“老杨，本来我想占你的便宜，反倒被你将了我一军。怎么？你后脑勺流血，快找医生来看看，炸破脑壳没有？”

我说：“可能后脑勺炸破了一块，不会太厉害，要很厉害，我哪有精神和你开玩笑。”

医生很快来了，后脑壳炸破了一块皮，没有炸伤脑骨，真是万幸。

郑师长说：“老杨，还继续看地形和看敌人前沿防御阵地吗？”

我说：“继续看，我要了解敌人炮击的重点与规律。不过晚上不在你这个洞里住了，空气流通不好，憋得慌，到你们山下师部去住吧。”

我们仍然在敌人不时地炮击、枪击的情况下又看了一天，使我不

仅看了地形，更了解了敌人阵地前沿的情况和炮火配置与射击规律，了解了敌人炮火注重控制那些地段与地点。

四、到开城去看望李克农同志。我忘不了在北平国、共两党军事调处执行部时，他对我的教诲

当时 120 师师部离开城只有 30 多公里，我很想到开城去看望领导停战谈判的老首长李克农同志。自从 1946 年夏，离开北平（即北京）国、共两党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后，没有再见到李克农秘书长（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已有六七年了，很想念这位仁慈可亲可敬的老首长。

我对郑志士和张纪之同志说：“这儿离开城很近，我想到开城去看望李克农老首长，这是一次很难得的好机会。”我即用电话报告了 46 军吴保山政委。

郑、张两位同志听说我要去开城，他们也要去，郑志士同志说：“老杨，我们师就在开城附近，很想到开城去看看，可是，我们没有熟人，不知道去找谁，怕不应该去而挨批评。你去，正好，我们同你一起去看看我方与美方停战谈判怎么谈的。开城是朝鲜的古城，是个什么样子，去看看停战谈判的地方，这样回国后也就不遗憾了。”

我说：“好呀！正好有伴一起走热闹。你说没有熟人，其实你们有老首长在开城呀，是我们志愿军的谈判代表，解方参谋长，他原来不就是你们 40 军的副军长嘛。”

张纪之同志说：“解参谋长在 40 军当副军长，时间不很长，当时我们还只是副师长、副政委，接触不多。首长在开城又很忙，不敢去打扰呀。”

我说：“我们明天去好嘛？我想我们不能空手去，我们战士捡了敌人的子弹壳，炮弹壳等做了一些工艺品，祖国慰问团来前线慰问，各军都送给他们作纪念品，他们可高兴了，视为珍品呢。你们师也会有，我们带几件做工很精巧的，送给李克农首长和解方参谋长作纪念，略表一点志愿军战士的心意，好不好？”

张纪之说：“这个主意太好了，我马上要师政治部选几件来，随你挑选。”

我说：“解方参谋长现在还是我的顶头上司，你们送老首长纪念品比我送意义大多了。我只送李克农老首长的。”他们说，这个办法好。

我选了一个用炮弹壳做的花瓶，战士们中真有人才，做得很好，在弹壳上刻了一些花纹，还刻上了《敬赠给祖国的亲人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

开城及其附近是中立区，敌人的飞机不来轰炸。我们大白天乘车就不要注意防空了。来到开城，我首先找志愿军司令部的同志，请他们给我们安排住处，汽车也不必隐蔽了，就放在院子里，这是我们入朝后2年多时间第一次暴露汽车。

我和郑志士、张纪之同志一同先去看望解方参谋长。

解参谋长知道我们来了，在他住处的院子里出来接我们，他认识郑志士和张纪之同志，当我要介绍时，他说：“这还要介绍吗？我都认识，40军120师的老熟人嘛。”解参谋长的记忆力很惊人，他还叫出了郑、张两同志的名字，并和他们亲切地握手。

正好当天没有谈判。解参谋长要我们多坐一坐，他很想了解前线部队和作战的具体情况。

我说：“参谋长，前方情况就请郑师长、张政委向你汇报，他们师还在第一线阵地，这真是第一手材料。”

我们都笑了。郑志士同志还是爱开玩笑，说：“老杨，向参谋长汇报这是你作战处长的事，我们一个小小的师长离得太远了。”

解方参谋长笑着说：“都是熟人，我还是想直接听听老部队的情况，志士同志和纪之同志我听你们讲。”

解方参谋长留我们在他那儿吃午饭。吃饭过程中，我们问了他与美方代表谈判的情况。

我说：“参谋长，你在领导我们工作时，没有看到你声色俱厉说，可是你和美方代表谈判时，那种气势、那种语气，我们听了广播，很是气势逼人，义正词严，句句在理，使美方代表无言可对，或

是强词夺理，黯然逊色。外国记者对你的报导和描述很生动，很精彩，很有意思。我们听了，看了，真很高兴。”

解方参谋长说：“其实这些发言和辩论稿都是李克农副部长领导我们准备好的，并且报告了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批准的。有些地方毛主席、周总理修改后就更有分量，更有气势了。因此，我讲起来就很理直气壮了。”

吃完饭后，我对解方参谋长说：“参谋长，我很想去看望李克农部长，不知道怎么才能见到他。”

解方参谋长问我：“你怎么认识李副部长的。”

我说：“1946年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我在叶剑英总参谋长身边工作时，李部长是中共代表团的秘书长，我归李部长直接领导，李部长对我的教诲使我终身不忘。我当时年轻不懂事，闹出了一些乱子和笑话，他对我批评教育很严厉哩，在他领导下，使我在一种新的环境中，在国民党特务包围中，学会了不少与敌人文斗的本事，经受住了考验。因此，我特别想念这位老首长。”

解方参谋长听了后，说：“呵，原来如此，你和李部长还有这么一段历史关系，那我领你去见他，他就住在我隔墙的那个院子里。”

解方参谋长对郑、张两位同志说：“那你们两位就去参观参观开城这座朝鲜的古城，我派人领你们去。”

解参谋长忽然想起来了，说：“呵，李部长是通宵工作，白天睡觉，现在可能还没有起来哩。下午3点钟我们去。”

我说：“那我也先去参观，到下午3点钟我到首长这儿来，您也需要睡一会午觉，李部长熬夜，参谋长也是陪着熬夜的。”

下午我们按时到解参谋长住处，他的警卫员告诉我，首长刚起床，在等你呢。

解参谋长听到我的声音就出来了说：“杨迪，我们去李部长那儿，我刚才打电话告诉他，你要去看他，他欢迎你，等着你呢。”

我们来到李克农副部长（当时是我国外交部副部长）住处，李部长很热情地接待了我。

我见到老首长心情很激动，敬礼后，双手紧握他伸出来的手，我

稍稍稳定了一下激动的情绪说：“李部长，有六七年没有见到老首长，真很想念您。我早知道您在开城坐镇指挥停战谈判，真想跑来看您，但又不可能，这次邓华司令员令我到西线 136 师来代职，离开城近了，我就跑来拜见老首长。首长身体好吗？”我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不知怎么说才好。

回想往事，仍历历在目。1945 年底我随叶剑英总参谋长到北平参加国、共两党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美国人作所谓的调停者，三方停战谈判就叫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李克农同志任中共代表团的秘书长，负责管理中共代表团的全体人员，同时负责领导和恢复地下党的工作。我因是中共代表团叶剑英委员的作战参谋（对外叫机要参谋）就直接归李克农秘书长领导。当时我很年轻（22 岁），没有地下工作和外交工作的经验。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首席委员叶剑英同志的办公室在协和医院西门一楼，住处在故宫后的景山东大街，对外叫叶公馆，还在老北京饭店二楼有一套房间（当时老北京饭店 2 楼叫 1 楼，都住的中共代表团人员），一切的佣人都是由国民党方面派来的，都是复兴社（又叫励志社）戴笠的特务，也就是说叶委员的办公、住处都是被国民党的特务包围着。

李克农同志是长期做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如何与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作斗争，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他在北平的工作异常繁忙，但对我抓得很紧，差不多每天都抽出时间来听取我的汇报。开始我只知道汇报工作，他即教导我，对我说：“小鬼，（注：叫小鬼，这是在当时我党我军内对年纪小的同志的爱称）这里不是延安，是国民党统治区，特别是你，在叶委员身边工作，是特务的重点目标之一，你完全是在国民党特务包围之中，你要保护好自己，做好保密工作，千万不能失密，叶委员的所有电报、文件都经你手，还有叶委员的印章也由你保管，如果你要出了问题，丢失了重要电文，将停战谈判中我方的方策略让国民党、美国人偷去或抢去了，那造成的危害就太大了，是不可挽回的。”

我真紧张了，就问“秘书长，我走到哪儿特务就跟到哪儿，那我怎么办？这些电文我收到后又必须往叶公馆，协和医院和北京饭店

以及您住的翠明庄这儿来取来送。一路上又只我一个人，怀中揣着电文和印章，真使我提心吊胆，我现在是硬着脑袋跑，我身上总带着一个打火机，一小瓶酒精，随时准备烧电文，如果来不及就将酒精倒在身上一起烧。”

李秘书长听后笑了，说：“傻小鬼，你这是看小说从小说中学的吧！你这个办法精神可嘉，但在国、共两党两军谈判时不适用。”

我急了，问道：“秘书长，那怎么办？”

李克农同志说：“小鬼，你不要急嘛，要学会和特务斗智。你不敢去接近他们，敢不敢和特务们交朋友？”

李秘书长这样一说把我说愣了，我说：“秘书长，我是共产党员，八路军战士，我怎么能去与国民党特务交朋友呢。这不丧失了立场？”

李克农同志听后，笑着对我说：“小鬼，你还年轻，这就叫政治斗争，这是与国民党斗争的一种方式。派来监视我们的特务大部分人都是戴笠的复兴社的人员，国民党军方的委员郑介民就是国民党的情报厅长，大特务头子。叶参座在上面与国民党大特务头子斗，你就在下面与小特务斗。你不要怕，你就在叶参座这几个活动地点，甚至包括住在我这儿（翠明庄）的国民党那个中校军官，你都可以和他们交朋友。戴笠、郑介民的特务并不都是铁板一块，我们研究了包围我们的特务很多都是在北平收罗来的日伪留下的小特务，国民党的特务并不真信任他们，包围我们的那些特务有很多是为了养家糊口当狗腿子跑，你去给他们一点小恩小惠，他们会乐意的，如发现他们有什么困难，你主动去帮助他，他会感激你的，会使他们对我党有新的认识，以后你对这帮小特务不要鄙视他们，不要不理他们，对他们表现客气一些，尊重他们的人格。以后你骑着摩托车跑时，他们骑着自行车跟踪你，你不要故意逗他们开得很快，使他们赶不上你，你可以有意开慢点，让他们能跟上你，熟悉后，你还可以一边跟他说话，这样说话，没有人监视他，他就无顾忌，慢慢地不是他们包围你，监视你，而使成为你的朋友，他们认为你够朋友讲义气，就会起着间接保护你的作用。他们这些人，既是特务，有的还是江湖上的帮派会

员哩，如果你朋友交好了，他们可能会给你暗中通报一些情况的，这就是做敌人的工作，利用敌人的矛盾，为我所用。你这笔特殊费用，直接向我报销。你去做，每天向我汇报，我再教你如何进一步做。你懂了吗？你放心大胆干，我会暗中派人保护你的。”

我回答说：“我懂了，我试试做做看，随时来汇报请示。”

按照李秘书长的教导，我主动与驻地监视的特务交朋友，不长的时间就收效了，有的特务偷偷地告诉我一些上级要他们干什么等等，有一次坐镇翠明庄专门监视李秘书长和监视我电台、机要人员的一个中校特务，对我说，他晚上有事，想借我的摩托车用，我当即很慷慨地答应借给他用，他很高兴。我随即去报告李秘书长，秘书长夸奖我说：“小鬼，你长大成熟了，这样做很好，看他们玩出什么花样来。”这个中校特务以后对我友好多了，对我没有轻举妄动。

由于国民党的破坏，停战谈判长期没有什么结果，我就向李秘书长请示让我到前线去，他说“我同意你去前线，你自己向叶委员报告，他放你走，我也放你走。”

我就这样一直沉浸在回忆中。

李副部长看我紧紧握着他的手不说话，他就大声说：“小鬼，你好像走神了，握着我的手不放松，也不说话，你在想什么？”

我很不好意思地松开了手，说：“老首长，不知怎么搞的，脑子里一下就想到您在北平教导我怎么和国民党特务作斗争的那段经历来了。在您的直接教导下使我从一个很单纯的青年，成长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青年。”

接着我赶快将挂包里装的礼品拿出来，送给李部长，说：“老首长，这是前线战士们将缴获敌人的炮弹壳，特别是把打下来的飞机皮，做的各式瓶、罐和点油灯等，再刻上花纹、打油诗，新颖好看，我选了几件送给老首长作个纪念。”

李克农副部长接过送上的几件纪念品，认真地看着，深情地说：“我们的战士真是英雄好汉，从他们制作的这些纪念品，就充分体现了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我很喜欢，我要带回祖国，用它来教育人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最可爱的人又是多么的最可敬呵！”

接着他又说道：“小鬼，我谢谢你送的这几件纪念品。并请你把我对最可爱的人的敬意，转告前线指战员。”

我回答说：“李部长，您是没有配戴志愿军胸章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在朝鲜谈判这条战线的指挥员，您就是祖国人民称颂的最可爱的人。”

李克农副部长笑了。随即说：“小鬼，听说你现在干得不错嘛。在志司成了邓华同志的‘活字典’了。”

我赶快抢着说：“老首长，我可离活字典还差得远哩，只是想努力把工作做好，不辜负老首长们对我的教导与期望。”

我接着说：“老首长，您总在第二条战线指挥作战，远的不说，就说在北平军事调处部中共代表团吧，你既要领导好中共代表团的全体同志在国民党包围中不发生任何问题，又要为党中央利用北平这个交通点做好南来北往调动干部的工作，还要领导和恢复国民党区的地下党工作，白天黑夜地忙碌着。现在您又坐镇开城指挥停战谈判，又是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我真担心老首长的身体是不是顶得住呀！”

李克农副部长说：“我这一辈子主要就是做地下工作，幕后工作很习惯了，因为生活很不规律，身体是差一些，为了党的事业，就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了呵。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志愿军指战员在战场上战斗流血牺牲，还随时要遭轰炸，我在开城这个第二战场作战，至少现在已经不要担心遭轰炸了。”（注：停战开始美军为破坏停战谈判曾轰炸过开城）

李克农副部长停了一下说：“只要你们战场上那条战线打好了，我们停战谈判这条战线才有戏唱，才好谈判。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停战谈判就是政治，这些道理你现在已经懂了，不必再要我讲了，你回去对邓华同志说，请他指挥志愿军在战场上多打胜仗，打大胜仗，才能使美国人在谈判桌子旁坐下来认真谈判停战。现在敌人也是想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以提高他在谈判中的价码。其实美国政府从他的战略利益上讲，主要在欧洲，不在亚洲，他们及其主要盟国是很想谈判停战的。但是，美国又很想在朝鲜战场上得到有利于他的停战；加之南朝鲜李承晚不想停。我们在这儿住着也不轻松，每天在研究与敌人

如何唇枪舌战。你们真枪真炮打了大胜仗，把敌人打痛了，打得敌人知道没有希望在战场上取胜了；就会迫使美国人坐下来签订停战协定，我看这个日子不会太久了。对你，我不说外交辞令，只要我军夏季攻势打得好，我判断今年秋季前会签订停战协定的。”

我静静地听说。这是老首长又给我上了一场很好的政治与军事斗争的辩证关系课呵！

李克农副部长看我听得很入神，突然换了话题，对我说：“小鬼，你刚和我见面时想到在北平我教你如何与敌人特务作斗争的事，你还记不记得我交给你完成的任务，完成得很好的事吗？”

我怎么能老在老首长面前说自己过去应该做的事呢。就说：“老首长，您说的是什么事？”

李克农副部长说：“我记得很清楚，一件是1946年3月20日国民党特务，组织一批不明真相的人所谓‘难民’，突然冲进协和医院叶委员办公室的走廊中，当时只有叶参座和你在办公室，叶参座坐在办公桌旁纹丝不动，你在叶参座的指挥下，坚决顶住了办公室大门，没有让那帮坏蛋冲进办公室，危及叶参座的安全。你还及时打电话将美方那个姓杨的上尉翻译叫下来，到叶委员办公室，叶委员严正地要他驱走这帮受国民党指使无理闹事的家伙，使叶参座安全离开协和医院。当时我们在外面指挥，组织谈判代表去与美方及国民党方面谈判，揭露他们破坏停战谈判的协议，使他们理屈词穷，不得不撤退他们组织闹事的人群。我们的斗争取得胜利。为了抗议国民党破坏调处执行部的工作，中共代表团都不去上班了，并向新闻舆论界，揭露国民党破坏停战谈判的阴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小鬼，我记得不错吧！”

我回答说：“部长，您说我是活字典，您才是真正的活字典，您脑子里什么事，什么人都记得清清楚楚。”

李克农副部长又说：“1946年夏，党中央在延安没有钱用了，陕甘宁边区银行空空的，发电报来，要叶参座和我想办法，无论如何要到东北局去要钱，以解延安的困境。我与叶参座研究，决定由他出面去借美方首席代表饶伯森委员的专机并请他的翻译去。我们反复研究

派谁去才能完成任务，最后决定派你去，当时觉得你年纪虽轻，但对党很忠诚，办事干练很机灵，与国民党特务周旋有成绩，还有你与美方那个中央情报局的杨翻译关系处的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叶参座是以私人名义借用美方委员的专机，你是叶委员的机要参谋，又有美方委员的翻译与你同去，国民党怕得罪美方委员，不敢过于干涉。你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运回了5个大皮箱的金条金元宝。你大概不知道，当天我们都在叶公馆等你回来，因为北平的国民党怕我党地下党员和老百姓晚上进城，城门下午5时即关门，并给国民党宪兵把守，严格盘查进出城门的人员车辆，我们看手表四点半了你还没有回来，可把我们急坏了。”

我回答说：“李部长，那天是星期六，我们飞机下午到沈阳降落加油时，美方翻译 captain（上尉）杨看到有一架美军飞机，就要起飞到北平，他是为了赶上能早到北平去玩女人，就对我说，今晚他的上司罗伯特将军（美方委员）不在北平，他要早回去，他坐那架飞机先走，要我一个人坐这架专机回北平。他没有等我提出意见，就跑到那架已经发动了的飞机飞走了。当我一个人乘坐美方专机降落北平西郊机场后，打开机门，没有看到来接我的我们代表团的汽车，我非常着急，我想不管怎么要赶在5点钟以前进西直门。正好有辆民用卡车在停机坪附近，我即招手叫来，问他们拉货进城不？他们说拉货，要讲价钱。我因身穿国民党的少校军服，又是专机，就摆起威风来了，我说，讲什么价钱，你们给我拉走，一定给比你要的价钱多一倍，你们来搬箱子。我掏出一叠国民党的钞票说：先付给你们定金，快给我搬。搬运工扛箱子时，很重，对我说：长官，你这箱子怎么这么重？我说：不要废话，这是执行部的电报机器，可不能损坏，你们把汽车开过来，对着机舱舱门，这样又快又省劲。他们不敢开近飞机舱门口来。我说：有我在，你们怕什么？快开近来搬。我当时真是急得汗湿透了内衣，但外表要表现很镇定沉着。

“正在这紧张的时刻，我发现我们代表团的车来了，就赶快叫我们的汽车开近飞机舱门，要那辆车的工人将箱子搬上我们自己的车上，我就放心了。对那辆车的人说：“不用你们的车了，定金就赏给

你们去喝酒吧。”那些人也愣了，但他们没有白搬，还得了便宜，就向我说：谢谢长官啦！

“我上了我们的汽车后，即要司机同志赶快开，一定要在5点钟以前进入西直门。我们车进了西直门后，就看到国民党的宪兵队正向城门走去，要去关城门了。”

李副部长说：“第二天，我们就利用到延安的班机，将这5箱金条元宝等分成十几箱，每个提着作行李箱上飞机，很顺利地送到延安党中央，可解决中央的急需哩，党中央还专为此发来了电报，我当时没有告诉你。”

李副部长笑着对我说：“小鬼，你还记得你犯了个大错误，我严厉地批评了你的事情吗？”

我很不好意思地说：“我记得那次犯错误，我认为首长的严厉批评，是对我的关怀与教育，我永远记着老首长的严格教诲。”

李副部长听后大笑，说：“当时我批评你带‘摩托女郎’，是不是？”

我回答说：“是。”

不知不觉我们谈到快要吃晚饭了。李部长留我吃饭，我一直把李副部长不仅当作老首长，而且当作我的长辈，仍像在北平时调皮地说：“您还是那样清茶淡饭，油水太少，我现在想吃大鱼大肉解馋。您现在还是坚持不吃小灶，和同志们一起吃大锅饭，您要是吃小灶我就留下，要炊事员把您好吃的都拿出来给我吃。”

李副部长笑着很亲切地对我说：“你这个调皮的小鬼，还是那样调皮，你要还在我老头子身边工作，我也会年轻呀！我知道你们志司有个食堂，你一定告诉他们给你准备好吃的了，我就不留你吃大锅饭，你现在已经是吃小灶的干部了，你去解馋吧！”

我忙说：“老首长实话报告您吧，还有40军120师师长、政委和我一起来的，他们一定要我在志司食堂准备一顿好饭吃，我不得不去，您可不要怪罪我呀！”

李克农副部长说：“我看到你们这些年轻干部的成长和乐观精神，打心眼里高兴，怎么会怪你呢？你代我向120师两位年轻人

问好。”

我回到住处，郑志士、张纪之同志正等着我。刚进门就对我嚷嚷：“你怎么才回来，我们饿极了，等你吃饭哩。”我们就一起来到食堂。

吃完饭，我们一同在开城街上散步，他们问我怎么与李副部长谈了这么长时间。我就把我与李克农同志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的那段经历讲给他们听，他们听着很感兴趣。

老郑说：“打仗是和真刀真枪的敌人对着干，你这是和敌人特务面对面的斗智呀，很有意思。”

老张问：“李部长批评你带‘摩托女郎’是怎么回事？你这家伙跑到国民党的花花世界去带什么‘摩托女郎’，我们只听说美国兵在中国带‘吉普女郎’，还没有听说有你这个名词的，快向我们坦白是怎么回事？”

我说：“这同美国兵的‘吉普女郎’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是我们中共代表团内同志们闹着玩的。在北平时，有一天吃过晚饭，大家都在翠明庄饭店门口散步、闲聊，当时耿飏同志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他从张家口运来一辆摩托车。我对他说：‘你是少将副参谋长，是应该坐小汽车，哪有少将骑摩托车的，不仅有失你将军的威严，也掉我们中共代表团的价，你就把摩托车借给我这个少校军官骑吧！’他听我说的有道理，就将摩托车给了我。我有一天正骑着摩托车回到翠明庄中共代表团住处，当时地下党刚介绍来一位年轻的女同志来工作，穿着当时北平知识女女士们的时装，这样着装在我们这群“土包子”看来，很风流惹人注目，她也正在饭店门口与大家玩。她突然对我说，她想坐我骑的摩托车兜风玩，问我能不能让她坐在我的后面。我当时也没有想到什么影响，顺口就说，只要你敢上来坐，我就敢开着跑。大伙儿也就鼓我带那位女同志坐，在场的女同志也鼓她，她是位知识分子，很大方，真的就坐在我的摩托车后座上了。我原以为她会害怕和害羞，不会上来，这样真使我骑‘虎’难‘上’了。年轻人的好强心驱使着我，我真开着摩托车绕紫禁城（故宫）转了一大圈。事情又那么凑巧，李部长也出来了。正

当我们回到翠明庄饭店门口停车，那位女同志笑嘻嘻地下了车，李克农秘书长却向我瞪着眼，等那位女同志进去后，李秘书长即把我叫住，要我跟他走，到他房间，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开口就说，我们在报纸上登载骂美国兵在中国拉着中国女子在吉普车上胡作非为，老百姓骂叫‘吉普女郎’。你刚才骑着摩托车，后面也坐着一个女郎，这如果让国民党的记者、特务捕捉了镜头，说中共代表团某某少校军官带‘摩托女郎’兜风，那影响有多坏。新调进来的这位北平的女同志还年轻，又不是解放区来的，也不是党、团员，不懂我们党内的纪律，你虽年轻，但入党已七八年了，竟干出这样违犯党纪军纪的事，这是一个大错误，你要作深刻的检讨，但不能让那位女同志知道我批评你了。我要告诉你，如果明天国民党的报纸，不论是日报或小报登出你今日骑摩托车带女郎的新闻，我就立即送你回延安，并要受到严厉处分。这可真把我吓坏了，一晚没有睡着觉。睁眼等着明早国民党的大小报纸出版。真万幸，大小报都没有登出这件事。第二天晚上，李部长又找我去，对我说：“小鬼，你还幸运，没有被国民党记者、特务抓着这件事来丑化我们代表团，现在对你从轻处理，你给我写个深刻的检查，明日交给我。但也向你讲清楚，你对那位女同志不要表现出来任何情绪，像没有那回事一样的该接触就接触，该和她说话，就说话，因为她是新来的，不懂我们的规矩和纪律，这样的事，对她这样大城市的知识分子来说不算什么事。”

老郑听完说：“你真够胆大妄为的了。”

郑、张接着又问：“那位女同志是谁？”

我说：“李克农同志特别嘱咐我，要守口如瓶，不能对任何人讲，这是纪律。你们说，我能告诉你们吗？”

张纪之同志说：“还很神秘，我们遵守纪律，不问了。”

现在这本书再版，我想这也是57年前的事情，早已超过国际标准30年的保密期限，可以解密了。这位女同志就是王光美同志。我想王光美同志早已忘记了此事，对她这位辅仁大学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况且她并不知道为了此事，李克农同志很严厉地批评我的情况。但对我来说，则不是一桩平常的小事了，李克农同

志要我接受教训，以此为戒，那我怎么能够忘记呢？王光美同志与我现在都已经是耄耋老人了，我想她不会在意我讲出她的名字来吧！

当时，板门店已经与美方恢复了停战谈判，我们都想去看看板门店停战谈判是个什么样子。郑、张两位同志要我去向解方参谋长请求，批准让我们去看看。我报告解参谋长后，他同意了。并派了志司一名工作人员陪我们到板门店参观。我们在中朝方一侧看到那间停战谈判的简易房子，陪同的同志告诉我们，这间谈判室是我方提议，由我方新建的，准备停战协定签字时用。谈判室是在美方与中朝方军事分界线中间，室内的谈判长条桌中线，即为两军的军事分界线，美方谈判代表从南面门进出，朝中方谈判代表从北面的门进出。双方都不越过军事分界线。

朝鲜人民军在谈判室的北面竖立了一面朝鲜国旗，并有几名战士值勤站岗。美军在南面竖立了一面“联合国”旗，也有几名美国士兵值勤站岗，双方各在谈判室外，各自一方外面建了一间休息室，作为各自代表及工作人员休息用。

因我们去参观时，双方正在谈判，我们只能在外面我方一侧看看，到我方休息室坐了一会，与在场的工作人员聊了一下当天谈判的情况。我们即返回。

我在离开开城之前，又去看望了李克农部长，向他告别。

李副部长说：“你们要看的地方大概都去看了吧，来看看也好，这也是朝鲜战争的一个战场。你们那边是武战场，我们这边是文战场。你在广播中也听到了，我们常说，敌人从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想要从谈判桌旁来得到，那是痴心妄想，达不到的。我们这儿谈判的进展快或者慢，顺利或者不顺利，都由你们那个武战场的胜利来决定。”

李克农副部长又说：“彭总已回国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了，陈赓同志也回国了，现在是邓华同志负责指挥中朝军队作战。你回去见到邓华同志代我向他问好，我希望你好好干，你在战场上还专程跑来看我，朝鲜战争停战后，你到北京去，一定要告诉我，一定要来看我。”

我回答说：“将来到北京，我一定去拜望老首长，我衷心地请老首长注意保重身体，您太累了。”

他笑了笑，点点头。

我即向他敬礼告别，也是永远的告别，我从此再也没有可能去拜望这位我很尊敬的德高望重的老首长了。朝鲜停战后，李克农同志回国，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上将军衔。于1962年2月在北京病逝，享年仅64岁。噩耗传来，我极为悲痛。

五、金城反击战役即将开始，邓华代司令员令我立即赶到东线去参观学习

因为朝鲜停战谈判，有关我方战俘遣返问题，谈判了很长时间不能达成协议。这时，我东西海岸抗登陆作战准备已经完成，正面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的工事已经完成，防御阵地基本巩固。但敌人仍妄想战场上得到便宜，不想迅速达成停战协议。南朝鲜伪总统李承晚则极力破坏已达成的停战协议条款。

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毛泽东主席指示，要志愿军“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邓华代司令员等志司首长决心对敌人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以积极的打来配合停战谈判。决定向敌人发动夏季攻势，从战场上打击敌人的气焰，中央军委（当时彭德怀同志已回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批准了邓华代司令员的决心。

邓华代司令员于1953年4月底至5月初，召开了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决定分步骤、分阶段地向敌人发动夏季攻势“消灭敌人，锻炼部队，吸取经验，以配合板门店的谈判。”并作了一系列的作战原则指示。

邓华代司令员等志司首长判断，6月份不可能达成停战谈判协定，遂下令正面各军可选择敌人连以下目标，发动依托阵地反击作战，先打小反击，歼灭排、连的敌人，取得经验，再逐步扩大作战。

考虑到停战谈判正在进行，为了不给敌人制造宣传舆论，并争取

世界舆论同情我们，邓华代司令员决定夏季攻势“战役不采取统一时间开始”，各兵团、各军谁准备好了，报告志司批准后，就可以向敌人发动进攻。

由于主要是南朝鲜伪总统李承晚反对停战，因此，邓华代司令等志司首长于6月1日，决心集中力量打击南朝鲜军，命令第一线各兵团、各军向敌营、团阵地发动反击作战。狠狠地打击与歼灭敌人。这个阶段我军先后向敌人51个团以下阵地，实施了65次的战术进攻，给予南朝鲜军第5师、第8师以歼灭性的打击，创造了对敌坚固设防的阵地进攻中，一次能够歼灭南朝鲜军1个整团的辉煌战例。

由于我军反击作战的胜利，迫使美方代表不得不回到谈判桌旁来。1953年6月15日，美方与中朝方就停战谈判协定的各条各项都达成了协议，可是南朝鲜伪总统李承晚仍然顽固地、坚决地反对达成停战协定，并公然以扣留我军战俘的行动来破坏停战协定。

当时，彭德怀司令员正从北京赴开城，准备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到平壤时得知南朝鲜李承晚破坏停战的情况，即于6月20日22时发电报给毛泽东主席，建议推迟停战协定签字时间，再给南朝鲜李承晚军队以沉重打击，并说邓华的意见，再歼灭南朝鲜军15000人。毛泽东主席立即回电同意彭总的意见，并很肯定地指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到何时要看情况发展才作决定。并对再歼灭南朝鲜军一万余人，认为极有必要。

邓华代司令等志司首长，遵照毛泽东主席和彭总的电令，立即决定组织夏季战役的第三阶段，狠狠打击南朝鲜军，有力地配合停战谈判，决心在金城地段实施反击战役。令第20兵团统一指挥5个军，以强大的炮兵（山炮、野炮、榴弹炮共1000门），还有第9兵团24军在侧翼配合作战，向金城以南的南朝鲜军4个师发起进攻。并令第20兵团精心组织准备、精心指挥，预定7月10日左右发起进攻，务必取得战役的胜利。并准备连续作战，一直打到李承晚及美军的支持者们低头服输，不再阻挠破坏停战协定的签字。

邓华代司令组织指挥的这次战役，是我军阵地防御两年多以来最大的一次战役行动。为了使我能从这次反击战役中学习组织指挥的

经验，他在百忙中，令秘书周绍忱将电话打到第19兵团司令部，要他们立即通知我，迅速赶到东线金城地区第20兵团，参观学习金城大规模的反击战役作战。7月初，接到第19兵团司令部转达的电话，我极为兴奋，立即告诉136师皋峰政委，并用电话报告了第46军首长。

我对第46军肖军长说：为了争取时间，我就不到军部了，直接到第19兵团司令部去。军和师的领导要我留一天，要欢送，我谢绝了军、师领导同志的盛情好意，因为邓司令员要我接到他的电话后，立即赶赴20兵团，我不能停留了。

我当天下午赶到19兵团司令部，立刻与邓司令的秘书周绍忱同志通了电话，请他较详细地告诉我邓司令的意图。

周绍忱同志说：“司令员要我通知你，西线没有什么仗打了，你再待在那儿取不到经了，现在正要在金城地段打个大反击战役，还准备在东线连续打几个大仗，如果这仗胜利很大，也可能是最后一仗。首长想到了你，要你赶快到东线第20兵团去，因为现在战役准备已差不多了，快要打了，你不便参加工作了，就要你去参观学习。首长已要我打电话通知第20兵团杨勇司令员。你从第19兵团直接去第20兵团，该兵团部的位置你知道。你什么时候可以到达告诉我，我再转告20兵团司令部，让他们在沟口接你，以免你到处找。”

我说：“老周，我听明白了，谢谢你了，请你向司令报告，我明日黄昏前一定赶到第20兵团。也请你将我到达的时间，通知20兵团司令部，因为这条从西到东的横向道路我没有走过，只有看着地图走。明日黄昏几点钟到就说不准了。”

周绍忱同志说：“你白天走，敌人的飞机会找你的麻烦哩。”

我说：“请你放心，没有事，白天好走。我爱同敌人飞行员开玩笑，做游戏玩哩。”

因在西线和在开城照了好几个胶卷，没有冲洗，我到19兵团司令部后，即问兵团作战处，他们有没有冲洗、印相和放大机。余震副处长说，只有冲洗胶卷和印相的设置，没有放大印相机。我就在他们的洗印机掩体内忙开了。我当时爱好照相，冲洗、印相、放大这套技

术也都学会了，兵团作战处有设备，都不会用，余震同志就跟着我学，我一边冲洗印相，一边教他们，一直干到将要天亮。

第19兵团作战处一位参谋进来说：“杨处长，天快亮了，你还没有休息，白天怎么赶路？是不是休息一会儿。”

我说：“马上就完了，我不休息了，只要司机休息好，我可以在车上打个盹就行了。请你准备吃早饭，并请给我们三个人带顿午饭。”

我出发时，天刚亮，第19兵团领导还没有起来，我不便去叫醒他们，就请作战处余震副处长代我向兵团首长致意。兵团作战处的同志对我白天行车很担心。我说：我与敌人飞行员打了两年多的交道了，已掌握了他们的活动规律，大白天走很安全。

上路后我们拿着地图对照着走，这地图是日本人占领朝鲜时代绘制的，很不准确，我们只有拿着指北针，按着方向行驶了，敌人的战术飞机集中在金城方向轰炸扫射，而在西线及金城以西活动较少，我们只遇到了敌机2次袭击，仍像捉迷藏似地没有被敌机炸中。当日黄昏前到达第20兵团司令部，安排好，即去见兵团首长。

我见到第20兵团杨勇司令员，向他敬礼报到，我说：“杨司令，我奉命来20兵团参观学习。”杨勇司令员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对我说：“你是老志愿军了，邓司令要你从西线赶来，就请你参与兵团司令部的战役组织指挥工作。”

我回答说：“杨司令，邓司令是要我来参观学习的，没有其他任务。因为你们的一切战役组织工作都已经准备完毕，只等邓司令下令进攻了。你指挥的这次反击战役，是两年多来，我军阵地防御作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我是来学习兵团怎样在诸兵种协同下，依托阵地，突破敌人的防御阵地，并向敌防御纵深发展进攻。我是诚心诚意地、老老实实地来学习的。”

杨司令说：“你既然只奉命参观学习，那我也就不好强要你参加工作了。”

1953年7月，正是朝鲜雨季开始的时节，7月13日21时，在天空浓云密布即将要下大雨之际，我三路进攻大军，在这种极不利于发

动进攻的天气条件下，出敌不意地，突然向敌人发动进攻，1000余门大炮轰鸣，炮弹密集地、猛烈地射向敌人阵地，炮火准备近半个小时，把敌人打得昏头昏脑，我步兵和坦克即向敌人发起冲击，迅速突破了敌人防御阵地，迅猛地向敌纵深发展进攻。

侵朝美军总司令克拉克和第8集团军司令泰勒于7月16日飞到前线，准备组织兵力实施大反扑，企图夺回所丢失的土地。

志司首长得悉敌人准备组织大反扑的情报后，即于7月17日18时命令第20兵团，为了防止和粉碎敌人的大反扑，我进攻的各军即暂时停止前进，迅速加紧构筑工事，坚决巩固现已推进至敌占区8公里至10公里的金城川以北地区。因为当时为了停战谈判，既要歼灭敌人，更要多占领土地，将敌人所占金城突出部切齐，使停战线重新划定，对我有利。

敌人为了夺回金城以南丢失的170多平方公里土地，集中了美军及南朝鲜军共8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向我军进行大反扑，我军坚决抗击敌人的反扑，一直战斗到7月27日，敌我恶战10来天，我军坚守阵地击退敌人1000余次的反扑，我军始终坚守住了已攻占的土地，并使敌人付出了巨大的伤亡。

为了配合金城反击战役，志愿军邓华代司令员下令，命令正面各军全线向敌人实施攻击作战，使敌人无法向金城方向增调兵力。

六、邓华代司令员令我迅速返回志司，我在途中遭敌机的轰炸扫射，经受了2次死亡的体验

7月17日18时，邓华代司令员命令第20兵团暂停进攻，调整部署，占领有利地形，迅速构筑工事，迅速准备抗击敌人的大反扑。他即考虑到下一步的作战计划。7月18日上午邓华代司令即要他的秘书周绍忱同志给我来电话，说：“首长说，金城战役的进攻阶段基本上已经结束，现已转入巩固阵地阶段，首长要你立即返回志司向他汇报金城战役的第一手情况。”

我说：“老周，请你报告司令，我于今晚（7月18日）即出发返

回志司。”

随即我即向杨勇司令员报告，邓华司令员要我立即返回志司。他问我什么时候走。我说，今日黄昏就走。他要我一路上行车注意安全。我表示谢意，告辞。

不幸的事情却在胜利的前夕发生了。

吃完晚饭，警卫员小孙收拾了行装，等着司机小张将车开到掩蔽部来，等到快天黑了，还不见司机开车来，我着急了，即要警卫员去找，一会儿小孙急急忙忙地，哭着跑回来了，说：“处长，不好了，小张开着车刚出汽车掩体就遇到敌机扫射，他坐在驾驶位置上，被敌机子弹击中，牺牲了。”

我听后悲痛极了，什么？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小张怎么能被打死了呢？我迅速飞跑到汽车掩体处，看到汽车停在掩体外，小张脑袋倒在坐椅的靠背上，敌人的子弹正击中他的头部和心脏部位，当即牺牲，血流满身。第20兵团司令部管理处的同志也跑来了，在战争年代处理战友的牺牲不能犹豫，拖长时间，还要遇到敌机轰炸扫射，再增加伤亡，我在极度悲痛中强忍着悲痛，擦净小张脸上胸前的鲜血，和小孙将小张的遗体小心地抬下来，放在跑来抢救的医护人员的担架上，我们向他默哀敬礼、最后告别。即请20兵团管理处妥善处理后续，并登记在参加金城战役牺牲的烈士名册上。我很喜爱的聪明机灵的司机小张，就永远长眠在刚刚收复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中了。回到西海指后，我请政治处登记并报告烈士的家庭。小张是东北的贫苦农民的孩子，因共产党实行土地改革，分得了土地，即主动报名参军，他常对我讲，等战争胜利后，要我允许他复员回家种地，孝敬他那贫困的父母，他的这个最起码的愿望与要求也无法实现了。多么可爱可敬的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好战士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有39万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优秀指挥员战斗员，为了支援朝鲜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献出了宝贵生命和青春的年华，再也不能回到祖国。

第20兵团司令部管理处迅速给我派了一名司机，因为车辆并没有打坏，仍可行驶，我和小孙含着极为悲痛的心情在夜幕降临时，离

开金城前线。

东线的公路我没有走过，很不熟悉，又都是山路，很不好走，新司机也不熟悉道路情况，公路上前输后送的车辆很多，道路很拥挤，车行驶的很慢，没有走多远已是半夜，我发现公路旁有条小山沟口有一两栋民房。我对司机说，我们今晚不走了，就在路旁的民房内休息，到天亮后再走，白天行驶比夜间行驶方便多了。我们进房内后，还有地炕可睡觉，我就和司机、警卫员先出去把汽车隐蔽好再休息，以免拂晓敌机发现，把汽车炸坏，延误按时到达志司的时间。

7月19日拂晓起来后，我们就准备出发，出房观察一会儿，发现敌人飞机两架一批，不断地沿公路飞行，只要发现可疑物体即俯冲投弹、扫射。这种情况与朝鲜西部敌人飞机活动大不一样，敌机在东线肆无忌惮地飞行，甚至沿公路低空飞行。当时我想敌人在地面打了败仗，就从空中来进行报复。敌人的飞行员怎么比西部的飞行员胆子大呢？我想起来了，西部清川江以北上空，有我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把敌人飞行员打怕了，因此在西部不敢放肆。我军的飞机活动半径飞不到朝鲜东部。我军对空防御的高射炮兵重点在西部，在金城前线掩护地面炮兵作战，纵深沿线高射炮兵较少一些，美国飞行员在东部没有受到过狠狠地打击。因此，活动很猖狂。

我观察与思考到这些情况后，决定拂晓后不走了，改为上午10点钟以后走。我把西部敌机活动的规律，用到东部来，认为上午10时以后至下午3时前，这段时间敌人飞机的活动会减少，我们可以按照西部行车的经验，来和敌人飞行员捉迷藏。以后的事实，证明我将西线的对空经验搬到东线来是错误的。

7月19日10时后，我乘车出发，车正从一座山上向下坡行走，因为是山区，我们的观察视野受到很大限制，敌机又飞得很低，当发现敌机和听到飞机声音时，当时公路正是下坡，敌人的飞机已经飞到我的车辆后面了，前面约100公尺远就是一个转弯道，车既不能够加速向前冲，怕来不及拐弯而翻车掉到山沟里去。又不能急速向后倒车，因是上坡路，倒车爬坡不能快速。我就要司机将汽车停下来，我和小孙沿山往上坡跑到山边趴下，司机吓得滚到山下去了。第一架

飞机投弹没有炸中汽车，转回来扫射时，子弹就从我们身边噗哧噗哧地一长串射下来，弹头入地冲起的泥土都落在我的身上、脚上。当时我心想真侥幸呀！

第一架敌机飞过后，我赶快爬起来又向上跑了约100公尺，靠山坡边卧倒，这次可就倒霉了，敌人的第二架飞机看到他的长机炸弹投在汽车的前面爆炸了，没有炸中目标，他就稍向后瞄准，炸弹投偏后了，正在我躲避的山边上面爆炸了，炸弹将炸翻的土石都打压到我身上，将我全身压埋了。开始时我用双手撑着，想留点空隙能有空气，身上的土石块越压越多，我已承受不住压力了，空隙一点也没有了。当时我心里很明白，我将被敌机炸死了，脑子里没有想到什么豪言壮语，只是很不服气，只想我入朝以来，乘车在朝鲜战场跑来跑去，各种各样的情况我都处理得很好，各种各样的危险，我都经历了，有好几次，总是从死亡线边上转过来了。我与敌人的飞行员玩游戏、捉迷藏每次都把敌人飞行员耍了。总认为自己已经有了对付敌飞行员的经验，敌人飞行员对我无可奈何。这次跑到东部，没有很好研究敌机活动规律，就是这样死了，心里问自己，难道我就是这样死在美国鬼子的炸弹下吗？……想到这里我已感到胸闷，憋得慌，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已处于昏迷窒息，最后只重复想了一句：“就这么死在美国鬼子炸弹下，真冤！”就不省人事了。

这是我第1次死亡的体验。是在黑暗中昏死。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感到被人缓慢地拖着，慢慢地把我从埋葬的石土中拖出来了，我什么也看不见，心脏仍有微弱的跳动。警卫员孙连元同志推开压在我身上的石块和土块，声嘶力竭地哭着喊着：“处长，处长，你还活着吗？”“你听到我在喊你吗？我是小孙呀！”他用毛巾将我的脸、眼睛上压的土块擦掉，这时我微弱地出了一口气，他看见我出气，就不顾一切地背着我向公路拐弯处一个报警的岗哨棚跑去，那个棚内有铺炕，他把我放在炕上，报警岗哨跑来了，很机灵的小孙，就请他们赶快去找最近的抢救所，叫担架抬我，来医生抢救我。（以上的抢救情况，是我后来听小孙说的）

当时我仍处于昏迷中，不知什么时候把我抬上担架的。担架正走

着，敌人的飞机又来了，发现了目标，担架队员即将担架放在公路的流水沟内，他们都躲藏了。敌机又投炸弹了，爆炸声把我从昏迷中震醒，呵！敌机又来炸我了，我仰面躺在担架上，头昏脑涨，浑身都很痛，一动也不能动，我的眼睛睁不开，但我能感觉到敌机正在轮番投弹，扫射的子弹就从我的担架旁噗哧噗哧地溜灰烟地扫过去。敌人炸弹爆炸声，使我脑子稍微恢复点知觉，我只想了一句，敌人的飞行员大概知道我这两年多太要他们了，这次是非要炸死我不可。我头脑又昏迷了，再次失去知觉。

这是我第2次对死亡的体验。也再没有什么感叹，一个人仰面对着空旷的苍穹，心情是平静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我在昏迷中，不知担架队员把我送到哪个师的收容所，以后又转到师医院。我现在还保存着该师医院的原始记录作为纪念。

原始记录是这样摘记的：被敌机轰炸地点是“珙洞郡上岭砥里。”时间是“十九号上午十一时，敌机轰炸，塌土石压没全身，且近爆炸区，时呈昏迷，人事不省。耳、鼻、口腔处出血。经急救……用担架转入师收容所，途中咯血4~5次，入师医院后，患者呈昏迷……”

抢救我的那个师，迅速向上级报告。我不知道志司和西海指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只知道7月21日早晨派来接我的救护车与医护人员等都到了。我仍处在昏迷中，来接我的医生经与师医院研究，因我的伤情重，全身疼痛，仍吐血不止，暂时不动为好。直到7月23日，我从昏迷中醒来后，我也不知道是谁俯身在我耳边告诉我，志司派人来接你了，我微弱地说：我要走。他们问，你愿意到哪儿去，我说，把我送回西海指吧，我又昏迷了。

至于怎么护送我到西海指的，我不知道。只是看到原始负伤记录中写着：24日10时已经到了西海指卫生所。

我即在西海指治疗养伤，休息恢复健康。

有个插曲故事，这是我一生无法改正的教训。本来可以不写这个故事。但我想写出来，对年轻好胜的人们看了后，可能会从中得到一点益处，不要重复我这个一辈子都不可挽救的教训。这就是：

我在治疗休养中，躺在床上不能动（当时因医疗器械条件差，没有检查出我严重的脑震荡和左边第6根肋骨被炸断、两耳耳膜穿孔），当时不记得是欢迎或庆祝什么（可能是过“八一”建军节），西海指干部会餐，同志们一定要我去参加热闹热闹，我说：“我不能起床，翻身就很痛，脑袋迷迷糊糊的难受。”

同志们说：“你还不知道，停战协定已签字了，我们胜利了，志愿军各部都开了庆祝胜利大会，当时你还在昏迷中，梁副司令不让我们告诉你，让你好好静养治疗。现在看你已经比刚抬回来时好多了，正好今日又会餐，你无论如何要去，一定要去，我们用担架抬你下山去。”

我听到停战协定已签字了，停战了，我们胜利了，非常高兴、非常激动。我说：“盼望已久的停战终于胜利了，这么大胜利我豁出来了，去，一定去。”同志们就要来抬我，我坚决拒绝抬我。我说：我一定坚持自己走去，同志们扶着我走到坑洞外，停战后，已经在山下搭了一个大礼堂，既可以开会，演出，又是食堂。

当时，庆祝胜利的场合是一定要喝酒的，而且是用饭碗（当时没有酒杯）。我说：“我头还迷糊，头痛不能喝酒。”同志们都是年轻人，也少医学科学知识，就都用激将法要我喝酒。同志们说：“敌人炸都炸不死你，我们要你喝酒，就能喝死你？不喝就是孬种，怕死。”什么激将的话都说出来了。

那时我们对于酒对大脑神经、身体的强烈刺激所要产生的恶劣作用和后遗症的科学知识，一点也不懂，特别是对头部负伤后，不能受酒精的刺激更不懂。加之我当时年轻好胜争强，就大声说道：“谁怕死？谁是孬种？要喝就喝。”这一下可糟透了，同志们都开怀畅喝（不是饮），你一碗，我一碗，就把我灌醉了，不省人事。

同志们把我抬到山上坑道中的棚屋内，当第2天我从昏迷和酒精挥发后醒过来时，守护在我床旁的医生埋怨我，说：“你不该去喝酒，你本来脑震荡很厉害，心、肺都有伤，要静养、恢复，不能再经受外界的新刺激，如果得了后遗症就不好治疗了。”我说：“被同志们激得真没办法，加之听到停战签字的胜利，太兴奋了，就忘乎所以

了。医生同志这怎么办？”医生说：“只有用镇静剂治疗和继续静养，你身痛，还不知道骨头伤了没有？手提 X 照射机又显示不出来。”

从此，我因脑震荡所受的损伤，经酒精刺激后，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还不能恢复，每天要靠服用大量的安眠药才能入睡。年轻的人们呵！劝你们不要在喝酒上好胜争强。

大概是 8 月 20 日左右，梁兴初副司令对我说：“杨迪，西海指卫生所治疗条件不行，我已与邓司令商量好了，送你回国去北京的医院检查治疗养伤。把伤治好养好后再回来。”

首长的关怀很使我感动，我于 8 月底回到北京，即住进当时在东交民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医院。

那位两次将我从死亡中抢救出来的警卫员孙连元同志，西海指机关党委给他立了二等战功。不久，我即将他送到牡丹江文化学校，要他好好学习，有了文化，才能更好地为党为人民服务。我回国后，问牡丹江文化学校的领导同志，孙连元同志的学习情况。学校领导同志告诉我说：孙连元同志到校不久就不愿意学习，要回家去，说土改后分到的田地，他还没有看到，就参军了，现在和平了，要回去享受土改的成果。

我念念不忘他，因为他的家是在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的乡下。一直到 1971 年我到赤峰，专门到翁牛特旗去找到了他，这个当年很聪明很机灵的年轻战士，已经成为一个还是没有文化的老农民了。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告诉昭乌达盟军分区司令员，孙连远同志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了二等功的功臣（并把保存在我手中的立功证书交给了他），请他建议地方组织是否可将孙连元同志调到旗（即县）安排他力所能及的工作。旗党委知道他的情况后，即安排到旗工作。

这位很聪明机灵的青年战士，由于没有文化，又不愿意学习文化，使他的聪明才智没有能够发挥出来，是多么令人惋惜！现代的年轻人啊！希望你们从这位当年的年轻战士的经历得到启迪，不要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要看远一些，必须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只有使你的脑子用文化知识武装起来，你的聪明才智的能量，才能真正的发挥出来，你的人生价值才能体现出来。为自己，为小家，为国家，为民族，发出最大的能量，作出最大的贡献。

七、金城反击战役的胜利，我军夺回战争的主动权，迫使敌人急于要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我军在2年多的战略防御作战中，由不断地巩固防御阵地，粉碎敌人的局部攻势，进而到我军由小到大的战斗、战役规模的反击，发展到强大的金城战役进攻作战，完全从敌人手中夺回了战争的主动权，迫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在我军强有力的打击下，迫使美国及南朝鲜李承晚已无可奈何了，如果再不签订停战协定，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大的打击、更大的伤亡和丢失更多的土地。

1953年7月13日我军在金城地段，发起战役进攻后，至16日，在我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迫使美方代表对有关停战谈判协定的所有问题，对朝、中方代表作出了明确的保证，并保证不让南朝鲜李承晚阻止协定的实施。

当时，美国政府在国内人民的反对及其同盟国的压力下，美国军人总统艾森豪威尔也看到了战争主动权的丧失，对美军来说将意味着更大的失败在等待着他们。因此急于想结束战争。

从朝鲜战场的敌我力量对比情况来看，我军完全有力量、有能力，再打一两次进攻战役，将朝鲜东部推进到“三八线”。可是，朝鲜方面这时也不讲“进攻、再进攻”了，要求急于停战。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从整个国际形势，从国内的经济恢复建设，整体上来考虑，朝鲜这场战争如果不停战，长期打下去，根据我国当时的综合国力，是不可能完全战胜美帝国主义军队。美国也不可能战胜强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已经饱受战争苦难，也急于要签字停战。停战，对双方都是比较恰当的、都能接受的结束战争的方式。这是从政治上、战略上来考虑。

因此，在我方已将敌人打痛了，美方急于想停战的关口。党中央和毛泽东、彭德怀等政治家、军事家们从全局出发，经过与朝鲜金日成首相协商后，同意与美方签订停战协定。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在开城板门店，朝、中方面新建的

停战签字大厅内，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美方“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分别代表双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中、朝、英三种文字）上签字，并已商定，双方首席代表签字时间，即作为停战协定生效时间，从7月27日10时以后12个小时，即27日22时起，朝鲜战场地面、空中、海上的战斗全部停止。

双方首席代表签字后，各自将已签字的停战协定带回，由交战双方的最高司令官签字。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在平壤签字。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在开城签字。美军“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上将在南朝鲜汶山签字。

写到这里，我想引述一下当时美军“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上将的心情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五星上将的心情，以及中、朝联军司令员彭德怀元帅的心情。这是很有意思的，也是耐人寻味的。

侵略美军“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他所著的《从多瑙河至鸭绿江》的回忆录中，描述了他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心情，他写道：“我执行政府指示，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我感到一种沮丧的心情，我想，我的两位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将军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当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布莱德雷五星上将，则说得更直截了当。《麦克阿瑟》一书的作者写道：“布莱德雷说出了他的名言，即同中国的战争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方，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中朝联军司令员彭德怀元帅在他的《自述》中写道：“我在签字时心中想：先例既开，来日方长，这对人民说来，也是高兴的。但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告就绪，未充分利用它给敌人以更大的打击，似有一些可惜。”

美方“联合国军”总司令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与中朝联军司令员在签订停战协定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情，两种完全不同的论述。

彭总的心情一方面“是高兴的”，一方面又觉得还可给敌人更大

的打击而没有能再打，“似有一些可惜。”

据我当时在金城前线了解的情况，我军在1953年夏季攻势中，即不断地向正面前线集中兵力、兵器和各种作战物资。在东线兵力上已集中了第20兵团、第9兵团，共8个军，炮兵8个师（包括榴弹炮、火箭炮、战防炮兵）高射炮兵3个师，坦克兵1个师及近10个工程兵团等。还有在东线的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同时参战。志愿军后勤司令部集中了10个汽车团共2000多辆汽车，不断地向前运送各种作战物资达数万吨。仅以金城战役为例，我军在25公里的正面，即集中兵力达24万多人，火炮达1360多门，每公里平均火炮近55门，密度是够大的，第一次炮火准备即消耗炮弹近2000吨。

根据当时我军在金城地区集中的兵力、兵器及各种作战物资，还够打2个金城战役这样大规模的战役，完全有可能将朝鲜东部地区推进到“三八线”，如果这样，那么中朝军队不仅完全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国土，而且在西线还收复了“三八线”以南的延安半岛与瓮津半岛这块人口稠密、盛产稻米的鱼米之乡。

我的理解是，彭总感到“似有一些可惜”，可能是拟在战役上乘胜再打一、两个战役，将东部地区推进到“三八线”，再签订停战协定。但是彭总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他从政治战略上考虑，还是同意了美方迫切的要求，在已达成的停战协定上签字。也考虑到了当时友方朝鲜的具体情况与心情。这是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的风度，完全是从全局来着想的。

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大量地歼灭了敌人，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在战略防御作战中，夺得了战争的主动权；收复了朝鲜人民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土。这是非常伟大的胜利，创造了战争史上的新篇章。

八、我很荣幸地在北京参加志愿军国庆节观礼代表团

1953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周年。当时每年国庆
— 302 —

节都在天安门举行庆典活动，有阅兵式，和群众大集会及游行，当年于7月27日又签订了朝鲜战争的停战协定。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央决定要志愿军组织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回国，参加国庆节观礼。

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杨得志为团长的国庆节观礼代表团，于1953年9月27日抵达北京，在火车站受到各界代表和首都人民的热烈欢迎。

代表团到达北京后，杨得志副司令员派人来通知我，告之我是志愿军国庆节观礼代表团的成员，要我去代表团报到，参加代表团在节日期间的活动。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意外的喜讯，使我非常高兴，感到非常荣幸，我当即到代表团报到。见到杨得志副司令员，他很热情地对我说：“杨迪，我们组织国庆节观礼代表团时，就想到了要你参加。”杨得志同志接着询问了我的伤情及检查、治疗、恢复的情况。我简要地向他作了汇报后，说：“杨司令，我现在已经恢复好了，我想过了国庆节就返回前线。”

杨得志副司令说：“你恢复得很快，我很高兴，你不要着急，先参加国庆节观礼代表团的活动结束后再说。”

当晚，郭沫若同志以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名义在和平饭店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欢迎“最可爱的人”志愿军国庆节观礼代表团。代表团全体同志在杨得志副司令率领下，列队入场。郭沫若同志等很多首长在门口欢迎我们，和我们一一握手，欢迎宴会的气氛很热烈，互相举杯祝贺胜利。然后还观看了文艺节目。对我们代表团的同志来说，都是大开眼界，绝大多数同志是首次进首都北京。首次参加这样的正式宴会。到半夜回到招待所，我们都兴奋得不能入睡，互相都在“高谈阔论”参加宴会的心情。

国庆节前两三天白天参观名胜古迹，晚上，或有欢迎宴会，或请观看文艺晚会。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9月30日，我收到了一张到中南海礼堂去参加国庆节的庆祝晚会的请柬。因为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同志都参加，因此对参加晚会都控制很严，只有各方面观礼代表团的领导

同志才能参加。志愿军代表团也是正副团长及著名的战斗英雄才受到邀请参加。我当然没有这个奢望，可是，荣幸与幸福落在了我的头上。我突然单独接到了专门派人送给我的一张晚会入场券。送票的同志告诉我，这是李树槐卫士长要他送给我的，并说：“李树槐同志知道你来了，很想来看你，但因国庆节前中央首长的活动很多，他特别忙，他实在是脱离不开，就派我给你送票来。”我对送票的同志说：“谢谢李树槐同志想到了我，给我送票来，但我进不了中南海，我又不好意思去坐被邀请参加的领导同志和英雄代表们的汽车。”送票的同志说：“李卫士长已交待了，要你在住地等着，下午6时我来接你。”

我和李树槐同志是在延安时认识的，李树槐同志是朱总司令的卫士长，我在军委一局（作战局）工作，都住在王家坪，互相很熟悉。特别是1945年底，他从延安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任叶剑英总参谋长的卫士长，我是叶委员的作战参谋，吃住在一起，更熟悉了。我们共同对付国民党的特务，保卫叶委员的安全，使我们同志间的关系，更亲密了。

9月30日晚上我被接进了中南海，接我的同志把我领到我的座位上，他说：“今晚中央首长们都来，全国政协委员们都来参加，还有外交使节等等，各方面观礼代表团也不少，你的座位只有稍靠后一些。李卫士长等会就会来看你，他实在太忙。”他还说：“散会时你不要自己走，等我来送你，你自己走不出去的，请你一定要等我，不要走动。”

我坐下不一会，李树槐同志急急忙忙地走来了，我站起来，互相热情地紧紧地握手，他说：“实在对不起，不能去看你，聊聊分别后的情况，听听你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我实在太忙了，你是知道的，我这个卫士长，又兼中南海中央首长的警卫处长，一天24小时随时听令。”我说：“我知道你的工作情况，中南海的同志也是不准随便与外面人员接触的，我们现在见面了，而且都很好，我要特别感谢你想着我，送给我能参加晚会的票，使我能参加这个大庆典的晚会，能亲眼看到毛主席和中央的领导同志。”李树槐同志说：

“我知道你的心情，因此特意给你安排能够看得见毛主席等中央首长的位置。告诉你，等一会毛主席等中央首长都从这个方向进来，你在这儿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对不起，我不能陪你了，散会时，你怎么走，我已安排好了，我就不能来送你了，请你理解和原谅了。”我们再一次紧紧地握手告别。

十月一日，到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我被安排在左面前高层的看台上，既可看得清楚天安门广场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又可回过头来，抬头看清站在天安门上的毛主席等中央首长。我高兴极了，兴奋极了，感到非常荣幸。

国庆节的观礼活动结束后，志愿军观礼代表团的英模代表即要分散到各地去作报告，介绍抗美援朝战争的英雄事迹。

我向杨得志副司令说：“杨司令，我这次能参加国庆节观礼，感到很荣幸。请允许让我返回朝鲜前线，我已经可以工作了。”

杨得志副司令笑了，说：“代表团的同志都要分赴祖国各地作报告，中央要我留下，准备在10月中旬向全国政协作汇报。你坚决要回前线去，好吧，你就回去吧！”

我又返回到朝鲜西海指。

第 十 四 章

志愿军司令部 6 次变更指挥位置， 9 次遭敌机轰炸，彭总有 2 次险 些遇险。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真实 情况。志司及时向总参谋部报告 情况

在 2 年 9 个月零几天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共移动了 6 次指挥位置。选择指挥位置的原则是：位置适中，尽可能靠近前线便于指挥，选择大山沟、树林茂密、有水和有矿洞，既便于隐蔽防空，并要有能进能出的可通行汽车的道路便于行动。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人们大概只知道一次志愿军司令部遭到美军飞机轰炸，就是毛岸英同志被炸牺牲的那一次。其实这已是志司在大榆洞第 2 次遭轰炸了。以后在新成川以西铁路隧洞、金化以北下甘岭、寺洞、桧仓都遭到敌机的轰炸。志愿军司令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遭到敌人飞机轰炸扫射共计有 9 次。（还有 2 次在桧仓附近的轰炸没有计算在内）

一、志司第 1 次指挥位置在大榆洞。在大榆洞第 1 次遭敌机轰炸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后，志愿军第 13 兵团司令部即进驻

鸭绿江南岸朝鲜境内的朔州以东偏南的大榆洞（北镇西北）。

在大榆洞，于1950年10月25日正式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这是志愿军进入朝鲜抗美援朝，志愿军司令部的第1次指挥位置。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在大榆洞指挥了第1、第2次战役。

志愿军入朝作战后，美军依仗其空中绝对优势，而我军对空防御武器则很少，当时连37毫米的高射炮都没有，只有一部分团有少数高射机枪连。敌人的飞机活动很猖狂，对北朝鲜每条山沟、道路都侦察，只要发现可疑目标就狂轰滥炸和机枪扫射，野马式战斗轰炸机（P51、螺旋桨单发动机）低飞到离地面只有二三百公尺，甚至飞到电线杆以上的超低空。

志愿军第1次战役后，志司组织司机打扫战场，缴获敌人汽车近60辆，开回到大榆洞。彭总及志司其他首长和我们机关同志都很高兴，洪学智副司令员指示我去指导警卫营（以后扩编为警卫团），将这些车辆隐蔽在大榆洞沟口的一条小山沟里，都进行了很认真的伪装，将每辆车拉开一定距离，用稻草覆盖在车上，像一堆稻草，并将车辙印都扫除了。洪学智副司令员对此很关心，伪装完后，我请他去检查。他检查后，很满意，认为伪装得很好。

11月15日，敌人的飞机到大榆洞山沟口一带超低空飞行侦察，企图发现目标，因为敌机飞得很低，螺旋桨旋转起的风很大，有的汽车上覆盖的稻草被风吹散了，暴露了目标，当即遭到敌机的轰炸扫射，炸坏了30多辆。

敌机轰炸后，我迅速跑去一看，连声说：糟了，被炸坏这么多汽车。我赶快叫随来的参谋跑去报告洪学智和解方首长。洪学智和解方很快地跑来了，看到被炸坏的情况，很生气地大声说：“这是怎么搞的？怎么暴露了目标？怎么炸坏了这么多汽车？”

我检讨说：“我们没有将稻草捆在车上，敌机超低空飞行，飞机螺旋桨的风将稻草吹散，暴露了目标。我们也缺少经验，用对付国民党军飞机的办法来对付美军飞机，遭到了损失。是我考虑不周，工作没有做好，我应该负责。”

洪学智副司令和解方参谋长听后，没有过多地批评我。洪副司令说：“你们要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对空防御的伪装一定要研究办法，彻底伪装好。以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我军从敌人手中好不容易缴获来的，又是我们最需要的汽车，被炸坏了真叫人心痛”。

我很诚恳地说：“我们保证从这次挨炸中接受教训，认真研究，努力搞好防空伪装，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以后听洪学智副司令告诉我，他报告彭总后，彭总很生气，批评司令部没有搞好伪装和防空，使正需要使用的汽车，一下就被炸坏30多辆。洪副司令替我们承担了责任。

但是，这次敌机并没有发现大榆洞有指挥机关。

二、志司在大榆洞第2次遭敌机轰炸。彭总第1次险些遇险。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真实情况

我军入朝前，已研究认识到了敌人有绝对的空中优势，也了解到北朝鲜矿洞多。因此，我军入朝后的指挥位置，以选择有矿洞的山沟为主要条件。

1950年10月22日第13兵团进驻朝鲜北镇西北的大榆洞。那条山沟是个矿区。因为敌人有绝对的制空权，对敌人的飞机在朝鲜北部不断地轰炸扫射，有一定的防空认识，但认识还很不深刻，认为敌人的飞机没有什么了不起。因此，我们都没有住进矿洞，加之矿洞又深又流水，太潮湿，还要用大批材料隔房间，工程较大，也没有地方去搞这么多木材，我们想现在是打运动战，志司是指挥机关，要随着军队的前进而向前移动的，不能在一地久驻。我们就选择了靠山坡边一些没有被炸坏的房子，分散进驻。给彭总选择在山沟靠里靠上一处在两个小山之间，原矿山放炸药的一间屋子，作为彭总的办公室兼休息室。并在房子附近山坡下，给他挖了一个防空洞。所谓的防空洞，就是挖的类似解放战争时期防空那样的猫耳洞，只挖的稍为大一些，可以睡2个人，摆一张炕桌。志司其他首长和机关也在附近的山麓挖了一些小的猫耳洞。

就是挖这样的简易防空洞，彭总还不愿意，还批评了洪学智副司令，不让挖，说：“挖这些玩意儿干什么，还怕死吗？”洪学智这次可没有听彭总的批评，还是要工兵继续挖，要求工兵加快速度，快些挖出来。

第1次战役后，敌人的空中活动更加猖狂了，野马式战斗轰炸机，沿公路、穿山沟低空飞行侦察，发现可疑目标就轰炸扫射。对大榆洞沟这条山沟也注意了，不断地飞来飞去。11月中旬在大榆洞沟遭到敌机轰炸，促使我们更警觉了，加强了防空措施：一是要求机关各部门一定要提高对加强防空的认识，不能存在一点麻痹大意的思想；二是没有挖猫耳洞的，一定都要迅速挖好；三是都要在拂晓前做好早饭午饭，烧好开水，天亮后白昼不准冒烟；四是白天人员都离开住的房屋到猫耳洞去工作；五是将车辆隐蔽好，白天不准开车进出沟里，在山沟口加设岗哨检查车辆进行拦阻。

11月23日，敌人的侦察机对大榆洞这条山沟低空飞行好几次。我即向解方参谋长报告：“参谋长，情况不妙呀！敌人大概发现了我们这条山沟驻部队了，今日敌机的侦察飞行很异常，建议研究布置一下明日的防空，彭总住的那间独立房子目标大，必须特别注意防敌飞机的轰炸。”

解参谋长同意我的意见，他即召开机关各部门领导干部开会，重申防空纪律，严格要求明早拂晓前，吃完饭都一律要进入防空洞。他随即去与邓华、洪学智、韩先楚、杜平等首长研究如何去说服彭总能在拂晓前进入猫耳洞去防空。

不久解参谋长来到作战室，我向他汇报了机关布置防空落实的情况后，即问他：“彭总同意进猫耳洞去防空吗？”

解参谋长说：“彭总不愿意去猫耳洞内防空，还说：‘谁怕死，就去躲飞机。’我们几个人研究、商量好了，不管彭总愿不愿意躲飞机，也不管彭总骂人，明早必须要动员彭总甚至拉着他去防空。我们几个人都推举洪副司令去劝说彭总，因为他们两人休息时爱下象棋，谁也不服输，就要他拉彭总去防空洞下棋。”

第二天（即11月24日）拂晓前，我派参谋分头去检查防空落

实情况，我自己也准备到重点地方去检查，这时，邓华副司令员派人来找我，对我说：“你到彭总那里去看看，看洪副司令是不是已把彭总拉进防空洞了？”

我迅速跑向彭总的防空洞，正看着洪副司令推着彭总进防空洞，并说：“老总，我和您下三盘，今天非赢你不可。”因为彭总唯一的爱好就是休息时下象棋，平时休息总是和洪学智对弈。洪副司令棋下得好，有时连赢彭总两盘，彭总就急了，说：“洪麻子，你搞什么鬼名堂？”洪学智说：“老总，我敢在您面前搞鬼名堂吗？再下就下，可不要悔棋。”结果总是洪学智在彭总不觉得是让棋的情况下，让彭总赢一盘棋，形成平局。

趁彭总和洪副司令正在摆棋子时，我赶快跑去向邓副司令报告。在我路过彭总办公室时，看到烟筒冒烟，立即跑进里面去看看，房里还有三个人正在用鸡蛋炒米饭吃。这些鸡蛋是前一天黄昏，我看到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派到志愿军任副政治委员的朴一禹次帅（朝鲜金日成是元帅，下有三位次帅）给彭总送来一小筐鸡蛋（约10多个）。这在当时的朝鲜是极难得的，当时彭总已吃过晚饭，还没来得及吃。三人中我只认识成普同志，那两位同志我只知道一位是彭总的俄文翻译，一位是才从西北调来的参谋，他们的姓名我不知道。

我问成普：“老成，你们怎么敢用送给彭总的鸡蛋炒饭吃呢？赶快把火弄灭。”

成普说：“我怎么敢呀，是那位翻译同志在炒饭。”我不高兴地说：“翻译也得听从统一的布置，你要他赶快不要炒饭了，快将火扑灭，赶快离开房子，躲进防空洞去。”

成普说：“我们马上就走。”

说完我就向邓副司令的防空洞跑去。

拂晓后，敌人的飞机编队飞临大榆洞上空，也不绕圈子就投弹，第一颗凝固汽油弹正投中彭总那间办公室，敌机群先将凝固汽油弹和炸弹投下后，绕过圈来就是俯冲扫射，然后就飞走了。

我迅速跑出来看看敌机轰炸情况，一眼就看到彭总办公室方向正着大火冒烟，立即迅速跑去，彭总办公室已炸塌，正着大火冒烟。看

到成普满脸黑糊糊地跑出来，棉衣也着了火，我要他赶快把棉衣棉裤都脱了，躺在地下打滚，将火滚灭。（凝固汽油弹，在当时是美空军的一种新式炸弹，用水扑灭不了）

我问成普：“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成普说：“听到飞机投弹声，就从你让我打开的窗户门跳出来的。”

我急着问：“那两位同志呢？”成普说：“他们往床底下躲，没有出来。”

我着急地大声说：“他们怎么向床底下躲？一定被凝固汽油弹烧焦了。”我就要随来的参谋赶快去叫警卫营派部队来救火，叫医护人员来救人。

这就是毛岸英同志被炸牺牲的真实情况。

随后，我迅速跑到彭总和洪副司令的防空洞，看到他们很安全就放心了。

我急喘喘地向洪学智副司令报告：“洪副司令，不好了，彭总办公室炸毁了。”

洪学智副司令急着问：“里面的人都出来了吗？”

我说：“只有成普跳窗户出来了，还有两位同志没有出来。”

彭总和洪副司令一听那两位同志没有出来，就急了，他们迅速出了防空洞，洪学智喊着赶快派人抢救。我说，“已调来部队和医务人员抢救。”

洪学智副司令很快向着火的房子跑去，我也跟着跑去。

火扑灭了，那两位同志烧死在里面了。洪学智副司令很着急地说：“这可糟了，这可糟了！”我听了莫名其妙，又不好问。洪学智副司令要我赶快去报告邓副司令，他去报告彭总。

当邓华副司令等首长听了我的汇报后，都奔向那烧塌的房子，也急着很悲痛地说着：“这可糟了，这怎么交待呀！”

我仍是不明白彭总和其他首长们为何这样着急和悲痛。我心想，这有什么不好交待的？由此，我突然想起了在11月13日志司开作战会议时，彭总严厉批评梁兴初军长，大家都很紧张，都不敢说话，我指地图稍偏了一点，彭总就批评了我。唯独那位俄文翻译，年纪轻轻

的，在当时会议那样严肃的气氛中，敢在彭总面前说这说那，彭总没有说他什么，而只坐着不吭声，邓华副司令等首长也没有制止他说话。我想，这位年轻同志大概不是一般的翻译。

邓华副司令对我说：“杨迪，快迅速找个安全的地方作为彭总的指挥室。”

我说：“山下有个用钢筋水泥制作的有2公尺高，约有200公尺长的夏天下雨的流水洞，上面有土覆盖还有枯黄的小树和草，不易被敌机发现。我看这条流水洞，可以作暂时的隐蔽部，我即派部队很快去清理，并很快在洞里隔出若干个木板房间，彭总和首长们及作战室、机要部门都可进去。”

邓华副司令说：“好，你赶快将这个流水洞清理出来，先隔一个木板房间，请彭总先进去。”

接着邓华副司令员说：“我们已知道麦克阿瑟已命令美军于今日（24日）10时向我军发动进攻，在这种忙乱的情况下，一定要保证志司与各军、师不间断的指挥，并保证彭总指挥我军于25日黄昏，向进攻之敌发起反击作战。”

我说：“邓副司令，请放心，我一定按您的指示办好一切应做的事情，电台及机要部门我已和通信、机要两位处长研究好了，即使在刚才敌机轰炸时，各电台都在防空洞内展开工作，没有停止与各军、师的联络，现在各电台对上对下的联络都很顺畅，一定保证做到不间断指挥。”

随后我指示警卫营及工兵连迅速清理流水洞和间隔洞内的木房，并派一名参谋和工兵参谋去具体指导。清理工作三四个小时就完成了，不仅给彭总在流水洞中间位置处，隔出了一间较大一点点的房间，并钉上了木板，参谋们迅速地挂好了地图，在地图上标好了当时敌我军的作战态势。同时给志司各位首长都隔出了一小间，可以放置一张行军床和一张小条桌（所谓桌子是用木板临时钉的）。机要处译电员和作战值班室也可以进住。

洪学智副司令请彭总进住流水洞后，彭总表情很沉重严肃，除了看电报看地图和研究正在进行的作战问题外，其余时间就一个人坐着

不说话，发闷。其他志司首长也都不像过去那样有说有笑了，在一起只是研究作战问题。

就是平常有说有笑的丁甘如处长，也不说笑了。我实在憋不住了，就问他，我说：“丁处长，今早牺牲的这两位同志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由于他们的死而使彭总等首长们都沉浸在悲痛中？还有你也很沉寂了，不和我们说笑了，这是为什么？”

丁甘如同志长叹一声，悄悄对我说：“炸死的那位俄文翻译，是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同志。那位参谋是彭总从西北第一野战军刚调来的叫高瑞欣同志。毛主席的儿子炸死了，这怎么向毛主席交待？主席最喜欢这个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儿子，回国后要他到农村、到工厂去体验生活，这次又把他送到朝鲜战场来体验战争，刚入朝一个月就牺牲了，我们知道情况的人都很悲痛难过。老杨，这件事是绝对保密的，因为你是作战处副处长，来问我，我也了解你、信任你，不会乱讲，就告诉你。你一定要遵守纪律，这事在没有正式公开以前，你不准对任何人讲。”

· 我听后说：“呵！原来如此，请你放心，我绝对遵守保密纪律。”

志司被炸的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即给志司党委发来电报，要求志司党委对彭德怀同志的安全负完全责任，一定要保证彭德怀同志的绝对安全。

正是志司被炸的这一天（即11月24日）上午10时，侵朝美军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正在朝鲜北部的新安州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部，狂妄地宣布“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最后的一次攻势已经开始，美国士兵可以回家过“圣诞节”了。我想，如果麦克阿瑟能知道这天早晨美军飞机轰炸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并炸中了志愿军司令员的指挥室，那他将会何等地嚣张呀！可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和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室，虽然遭到了轰炸，但仍然有条不紊地指挥着前线的军队，遵照彭总和志司其他首长制定的作战计划进行作战，不仅顶住了敌人的进攻，并于敌人发起进攻的第二天（即11月25日）黄昏，向进攻之敌发起了战役反击作战（即第2次战役），迅速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并迫使敌人从西线的清川江以北和

东线的长津湖、黄草岭和清津，一直败退到“三八线”。

战争就是在各种各样极为险恶和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实实在在地考验着双方的指挥员和指挥机关的意志、组织指挥的艺术与才能，考验着双方军队的战斗意志和战斗力。这次较量，充分显示了彭总和志愿军几位首长的英雄本色，显示了志愿军司令部组织指挥的能力，显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胜过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三、志司第2次前进到新成川以西铁路隧道中。在此第3次遭敌机轰炸

第2次战役我军取得了伟大胜利，迫使美军向“三八线”大退逃。志愿军西线各军奉彭总命令正向南前进，尾追敌人，东线第9兵团亦奉命向咸兴、元山地区前进，准备休整。

彭总在大榆洞坐不住了，决定志司必须前进，并指示在朝鲜蜂腰部中部，选择适当的指挥位置。

解方参谋长派丁甘如处长率领先遣人员并带电台，前往新成川地区选择指挥位置。新成川地区位置是适中，但该地区是丘陵地带，没有高山深沟，因彭总催的很急，要立即离开大榆洞，丁处长就选择在新成川以西、顺川至新成川的铁路一条较长的隧道洞，作为临时的指挥所，先进驻后，再继续选择更合适的位置。

该隧道洞穿过一座不太高的山，山上有松树林，附近都是较大的丘陵，山区都有树木，目标不太明显，为了安全，设营先遣队在隧道洞两个口外都用草袋装沙土，（因土已冻，从附近河床中取的沙土），垒成了挡护墙，并用树枝伪装好，以防敌机火箭弹射击，先遣设营队并迅速将洞内设施准备好。

1950年12月10日，彭总和其他首长及志司指挥机关进至新成川隧道洞。洪学智副司令员先到，对指挥所的设置检查后，认为沙包层挡的薄了一些，也矮了一些，要求加厚加高。他说：“无论如何不能让敌人飞机发射的火箭弹射穿。隧道洞尽量减少人员。”我随后向丁甘如处长说：“除了按洪副司令指示执行外，建议在洞口两头不住

人，在洞里面加道防护墙，也用沙土垒筑，这将更保险一些，请你考虑。”丁处长接受了我的建议，组织工兵部队迅速加高加厚隧道口的防护墙，并在洞口内增建防护墙。只留志司首长和机要部门、作战室值班人员在洞里，两头各住一个警卫班。其余人员都在洞口山边挖防空洞或利用山沟雨裂搭棚。

志司进驻后，第二天，敌人的飞机发现这条铁路隧道口外部变了样，垒起的防护墙伪装再好，也会使敌人发现洞口堵住了。因为敌人的飞机飞得很低，飞行员用眼睛都可以看清楚。

我为了熟悉地形，就到各处去察看，在山顶上向下看，一条笔直的铁路从山洞穿过，而山洞两头被挡住了，隧道洞和铁路桥梁就是敌机注意的目标，第1次战役第38军指挥所在铁路桥下即挨了炸，隧道洞又直又高，如果敌人飞机轮番用火箭弹射击及投弹轰炸，危险性是很大的。因为这次是丁甘如处长负责选择指挥位置的，我就向他提出我的看法，并建议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有矿山洞的地方，矿洞比隧道洞好多了。丁处长同意我的意见，我们就共同在地图上选择和研究到哪儿去好，我们看到地图上在新成川以南30多公里的成川郡西南5公里地区，君子里标着有个矿区的符号，我们认为选到那儿去好。就由丁处长去向洪副司令、解参谋长汇报。他们表示同意，当即令丁处长率领先遣设营人员带电台前往君子里了解情况，看是否适合作为志司进驻指挥的位置。

志司进驻隧道洞后，第二天敌机不断飞到上空侦察，到第三天拂晓后，敌机群就飞来俯冲轰炸，并向洞口投下炸弹和发射火箭弹。

当时我正在洞口旁边的防空洞（猫耳洞里），听到敌机群的声音，我即派人迅速跑进洞内去报告，飞机群来了，洞里的人千万不要出来。我即跑到山顶上，隐蔽在树林中，观察敌机群的情况。敌机第一批机群炸西口，飞走后又一批机群炸东口。看到敌机俯冲先向洞口投炸弹，然后绕过圈来再向洞口发射火箭弹，炸弹投偏了，火箭弹因是等于是直接瞄准射击，都击中了，打在沙包上，西面洞口发生较大的险情，有一发火箭弹从炸塌的沙包上面穿到洞口里，在洞里面那道隔离墙爆炸了，才没有穿进去。

敌机轮番轰炸、扫射一阵后，没有发现地面有人员跑动，可能认为是我军储藏物资的仓库，随后就飞走了。

洪学智副司令和解参谋长首先跑出来，看到我正在现场，就对我说：“炸得好厉害，我们在洞中只听到爆炸声不断，沙子和烟灰直向洞口里窜。你看到人员伤亡、物资损失没有？”

我说：“由于隐蔽得好，现在还没有发现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洪副司令，你指示要加厚加高防护墙可起了很大作用，我看到防护墙遭到了很多枚火箭弹的直接射击，被炸得剥了几层皮，就是没有炸塌。洞口里那道墙也起了作用，我看到有一发火箭弹从炸塌的沙包上射进去，被挡住爆炸了。”

洪学智和解方首长全面巡视一遍后，对我说：“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下去了，要赶快走，即使敌机没有发现是指挥机关，就是把这儿当仓库，也会不断来轰炸的。这样不仅对彭总的安全无法绝对保证，而且敌机每天来轰炸也影响指挥。你去看看丁甘如来电报了没有？如果没有来电报，你就发个电报催催他，告诉他，我们准备今晚就走。”

当日，收到了丁处长发来的电报，说君子里有个大金矿洞，洞内有几层，志司首长和志司机关全部可以住进去。可以防御敌人飞机的轰炸。洪学智和解方首长将君子里的情况报告彭总，彭总仔细地看了地图后，表示同意进驻君子里。

志司在成川以西铁路隧洞的临时指挥位置，只住了2个昼夜，挨了第二次轰炸。

四、志司第3次转移，前进至君子里

彭总和志司于1950年12月12日黄昏，从成川以西铁路隧道洞临时指挥位置出发，于当日深夜到达君子里。

丁甘如和张仲三同志动作真快，当指挥所到达时他们已将带的发电机装好，洞内已经架设好了电线和电灯，洞内有了电灯，进出就方便多了。通信处的同志也将电话架设好了，电话总机已装好，即可通话，电台也在洞外选择了位置架设好了，并与各军及第9兵团都沟通

了无线电联系。工兵已将彭总和志司其他首长以及作战室、机要室的木板房子都初步隔好了。

我进洞后，首先去看了彭总的住处，他们选择在洞内一处开挖较宽一些的通道处，该处较高一些也稍微干燥一点，志司其他首长的木板房也还可以，比大榆洞那个流水沟好多了。然后，我把整个矿洞看了一遍，这个矿洞很大，不仅有较宽的通道，而且里面还有一个小“广场”，可以作为开会用的会场。另一个出口的通道也较长，司令部机关都可以安置的了，矿洞的下层有条通道，正好可以安置政治部。

整个矿洞内，上面不“下雨”（即滴漏水），下面没“小溪”（即流水），洞内只是潮湿，彭总和志司其他首长们的住处，作战室、机要室加上个电炉子，定时开开烘烤一下，可以干燥一些。

我还请通信处的同志领我到洞外去看了看电台的架设情况，我看了电台都架设在附近靠山的树林子里，还挖了防空的猫耳洞，垫上了稻草，可以坐着工作，也可以躺下休息。

我全面看了以后，就较为胸中有数了，回到作战室，值班参谋将起草好的进驻君子里的电报（上报中央军委、下发给第9兵团和西线各军，并发给东北军区）给我看，我略作修改后，即要参谋送解方参谋长批复。

我去找丁甘如和张仲三同志，他们正在布置和检查机关各部门的车辆。我对他们说：“丁处长，老张，我洞内洞外都去看了一遍，这么短的时间，你们部署的真好，想的真很周到呀！”

丁甘如同志说：“老杨，我和老张到了这儿后，根本没有休息，就洞里洞外到处跑，看了很适合，一方面给你们发电报，一方面就进行配置，好在我们在这儿找到一些现成的圆木和木板，就要部队分头干起来了。老张跑上跑下亲自指挥着，比我更累。”

丁甘如接着说：“彭总和几位副司令员、解参谋长、杜平主任来后，我领他们到住处，彭总对这个地方比较满意，洪副司令说，这个地方选的不错。我让他们在成川铁路隧道洞挨炸受惊了，这次下决心一定要选个有矿洞的地方。首长们满意了，我总算没有白忙。也就不

觉得累了。”

张仲三同志说：“老杨，这次好在你提醒我们，把警卫、工兵部队都先带来了，备份的发电设备也带来了，这样我们就不致于干等了。‘罗子’（通信处副处长罗长波，这是我们在第43军一起工作时，对他的爱称）把电台、电话都带来了，配合的很好，这样我们就一切准备的差不多，你看，能保证彭总和其他首长不间断地指挥吧。”

我说：“老张，你真逗，还想要我来评说吗？你是开设指挥所的老手了，经验非常丰富，你是不是要我说，向你学习呀！的确你们真辛苦了，抓紧时间去休息一下吧！”

我们都高兴地笑起来，同志间的战友情谊，亲密无间。

天快亮了，我和衣躺在行军床上打了个盹，就起来到矿洞外去看外部的环境。我先爬到较高处看看全貌。看到这个山沟比较宽一些，两面的山不算太高，但都有树林，进出的道路比较明显，山两边还有一些房屋没有被炸坏，我想，晚上还可利用。我告诉参谋去调一个工兵连来，在这些房子的后山坡下挖一些猫耳洞，以备必要时用。我知道有的首长白天出来后，发现这些房子，半夜工作后，会跑出来到这些房子里休息的，因为房子不潮湿，还可以烧地炕，热乎乎地睡一会，比在矿洞里潮乎乎的要解乏。

我还要参谋去通知警卫团，加强对进出道路的控制，白天不让车辆通行，拂晓，即将夜晚通行的车辙给扫去，不要暴露这条沟有汽车辙印，以免被敌机发现，挨轰炸。

彭总和志司其他首长就在君子里指挥了第3次战役。韩先楚副司令令我组织“韩指”随他到前线去了。

第3次战役取得伟大胜利后，1951年1月25日至29日，中朝两国军队的高级干部（中国人民志愿军是西线各军军长、政委，朝鲜人民军是军团长），在君子里召开了仅有的一次共同总结作战经验的会议。

在准备开这次作战会议时，朝鲜方面提出，由他们自己准备人民军将领的住宿和吃饭。因这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内，我们就不便管他们

的吃住了。

我们志愿军西线各军军长、政委来开会，司令部本来在矿洞里给他们准备了住处，但他们到后，看到洞外有民房，进去一看暖暖和和地，他们就不愿进洞了，对我说：“杨迪同志，住这儿比住洞子好多了，后面山坡还挖了猫耳洞，也好防空，我们就不进洞了。”先到的军长、政委不进洞，后来的也都不愿进洞了。

我也劝说不了这些军长、政委，没有办法，我只有去向洪学智副司令员和解方参谋长报告。

洪学智副司令说：“走，去看看他们。”

我陪同洪学智副司令，来到这些房屋里，各军军长和政委们正在一起聊天。看到洪学智副司令来，都站了起来。洪学智副司令与他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

洪学智副司令笑着说：“杨迪告诉我，请你们各位进洞去住，你们不愿意进去？”

38军军长梁兴初笑着冲我说：“好呀！杨迪，你劝请我们不动，就跑到洪副司令那儿告状去了。”

我也笑着说：“各位军长、政委，我可不是告状呀！我得向洪副司令报告你们都来了。顺便讲了你们要住在民房里，洪副司令说，来看看你们。”

洪学智副司令笑着说：“你们不愿进洞住，那我可得先向你们说明，如果美国鬼子的飞机来轰炸，被你们撞上了，那我不负责，由你们自己负责。我怕你们的老婆来找我闹。向我要丈夫，那我怎么办？”

40军军长温玉成说：“我们活着，自己负责，如果我们‘报销’了，那我们也负不了责了，还得你洪副司令负责。老婆找你闹，那好办，你再配给她们一个丈夫，她们不仅不会闹，还会高兴哩！”（注：为什么说“配给”？这是在战争年代够结婚条件的干部。条件是：28岁、7年党龄，团级以上干部，我们编称“287团”顺口溜，在战斗部队没有机会接触到女同志，更说不上谈恋爱了，一般都是由组织上有意识地介绍一位政治思想好的女同志给那位干部，我们就叫“配

给”)

大家哈哈大笑。

洪学智副司令说：“你们凑到一起真热闹，我进来前，你们在聊什么呀！”

39军军长吴信泉说：“我们天南海北，在聊入朝后的这几次战役打的情况。”

洪学智副司令再不说请他们进洞住的事了，就坐下和他们一起聊起来。我明白洪副司令也不想劝说他们进洞了，因为他自己有时半夜，也是跑出来到这些房子里睡一个暖和觉的。

志司在君子里驻了近2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敌人的飞机虽然每天都在上空飞来飞去，但由于我们有了防空的经验，隐蔽的很好，也没有搞新的显眼的掩蔽部和掩体。仍保持原状，因此敌人飞机没有发现目标，也就没有遇到敌机的轰炸扫射。

五、志司第4次转移，前进到金化以北的下甘岭， 在此遭敌机2次轰炸（第4、5次）

我军发动的第3次战役，将敌人打退到“三八线”以南。不到半个月的时问，即1月15日，新上任的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中将，即发动了向我汉江南岸实施试探性的反扑进攻。到1月27日即开始较大规模的进攻。

我军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彭总决心实施第4次战役。

第4次战役是在“三八线”以南向敌人进攻，因此在君子里的志愿军司令部，已离前线较远了。彭总指示，志愿军司令部必须前进，指挥位置必须尽量靠前，以便于直接指挥部队。第4次战役一方面要指挥“韩集团”（韩先楚副司令率领的前指）在汉江南岸的机动防御作战，一方面是要便于指挥“邓集团”（邓华副司令率领的前指）在东线横城地区实施反击作战。还要指挥东部朝鲜人民军“金集团”的作战。（彭总指挥朝鲜人民军就以“联司”名义，下达命令）因此，彭总决定将志司前移到金化以北地区，这个位置比较

适中。

当时我已随邓华副司令员到横城方向的东线指挥所（即“邓指”），因此，对志司第4次前进的具体计划与实施情况不了解。只知道志司已于1951年2月初进驻金化以北约10多公里的下甘岭，此处有石灰矿洞，是一条比较隐蔽的山沟。

彭总在金化以北下甘岭的山沟里，指挥了第4次战役。

志司进驻金化以北下甘岭后，敌人飞机差不多每天都到上空“光临”，但没有发现目标，只是无目标地乱投弹、扫射。

志司第4次遭敌机轰炸，是在1951年2月中旬的白天，敌人野马式战斗轰炸机4架，飞临志司上空轰炸扫射，炸中了装甲兵指挥所，因志司机关已养成了良好的防空习惯，到一处即挖防空洞，每天都是拂晓前吃完饭，烧好水，白天不冒烟火，不进出车辆，一切行动都在夜间。因此，装甲兵指挥所虽挨了炸，但是一个空掩体，人员都已进入防空洞，只发生了险情，没有损失，坦克第1师师长赵杰听到飞机声才躲藏，好在他跑得快，刚进防空洞，敌人的炸弹就投下来了。

志司第5次遭敌机轰炸，是发生在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的干部部长还有另一位副部长，到志司向朴一禹（人民军次帅）同志汇报工作的日子。他们在离开朴副政委的防空洞后，走向掩蔽好的汽车处，准备乘车离去时，正好敌机飞到上空投弹轰炸，他们没有来得及躲避而伤亡。

六、志司第5次向空寺洞转移途中，进至寺洞，第6次遭敌机轰炸。彭总第2次险些遇险

第4次战役后，敌人的空军为了配合和支援地面部队向北进犯，敌机活动极为频繁，不分白天黑夜不停地在志愿军及朝鲜人民军部署的上空无目标地狂轰滥炸。志司驻地上空敌机也是不停地飞来飞去，有时丢几枚炸弹，扫射一阵，这样既影响彭总和志司的安全，也影响指挥。加之，新入朝参战的第3、第19兵团已快开到前线，东线的

第9兵团已从咸兴、元山南下，志司也应选择一个适中的位置，以便于指挥更多的部队。

我们作战处，根据志司首长的意图，在地图上研究选择志司新的指挥位置。我们从地图上看后认为转移到伊川西北上甘岭北麓的空寺洞比较合适，那儿有金矿洞，有高山、有树林、沟岔较多，既便于隐蔽，又便于志司机关的展开。

我将作战处研究的意见，向解方参谋长报告后，解参谋长又与丁甘如和我一道在地图上进行了研究，他也认为合适。解参谋长即直接去向彭总和志司其他首长汇报，并要我们拿着地图跟他一起去。

彭总和志司其他首长同意了我们的建议。洪学智副司令员和解方参谋长随即派丁甘如处长和管理处张仲三副处长，率先遣人员与有关勤务保障分队前往了解情况和现地制定志司机关的配置。

因敌机活动太疯狂，这次志司转移就采取分批乘汽车与徒步分批前进的方式前进。志司机关同志为避免遭受敌机的轰炸，就不乘汽车，而采取黄昏后，徒步行军。志司首长乘汽车也分批走，中途在寺洞停留一昼夜，等待徒步行军的机关同志。

首长们第一批是彭总和解方参谋长及彭总办公室人员，第二批是洪学智副司令员和杜平主任，我随邓华副司令员是第三批。

1951年4月6日半夜，彭总和解参谋长到达寺洞。因只在此住一个昼夜，就选择在山下没有被炸毁的几间民房，临时住一昼夜。丁甘如处长已先要工兵连迅速在这几间民房后挖了防空洞。因朝鲜民房都有后窗，等于后门，开窗即可直接进洞，距离很近。解方参谋长看了彭总住的民房后山那个防空洞浅了一些，就要工兵连加挖深一些，并拐一个弯。彭总住的对面山坡下的民房后面，也挖了几个小防空洞。

随后，洪学智副司令员和杜平主任到达，同解方参谋长住一栋民房里，工兵连也在这几间房后山挖了防空洞。

洪副司令到后就去看彭总的防空洞，认为还可以，但洞口的防护墙要加高加厚一些。就指示张仲三副处长要工兵连再加高加厚。

4月7日早3时左右，邓华副司令到了，他对我说：“你去看看

洪麻子，他们住在哪儿。”正好张仲三副处长在等着接邓副司令，我即要他直接向邓副司令汇报。

张仲三即指着那几间房子说：“彭总和洪副司令他们都住在山沟两边的几间民房里，解参谋长交待将彭总旁边那间房子留给邓副司令住。”

邓华一看彭总住在那边山下，洪副司令就住在我们车辆所停的这边山下，他就不走了。对张仲三说：“我就在洪副司令住的房间里加一张行军床，天都快亮了，有个地方躺下睡一会儿就行了”。

张仲三说：“那太挤了。”

邓华副司令说：“只要能放下行军床就行，快一点，我太累了。”张叫战士加了一张行军床，邓副司令和衣倒下很快就睡着了。

我问张仲三同志，丁处长他们住在哪儿。他说，附近山旁还有几间民房，丁甘如处长就住在那几间房子里，机关也准备在山上树林里休息和工作一个白天，黄昏后就继续向空寺洞行进。

我看着彭总和其他首长们都住在山下民房里，很不放心，天亮后，敌人的飞机肯定会到这儿来飞转寻找目标，万一敌机向这几间民房乱炸乱扫一阵，那怎么办？我也无心睡觉了。就与张仲三同志商量，问他附近防空哨怎么布置的，是不是鸣枪报警的枪声能传送到各防空哨。传到我们这儿能听清楚枪声吗？他说，他们到后，增加了防空哨，并作了试验，认为可以连续听到报警的枪声。我还有些不放心，我即派参谋到附近防空分队去，要他们今晚和拂晓以前，在附近山头上增加防空哨。我和老张再走到彭总的房后看了一下防空洞，认为还可以。

我对张仲三同志说：“老张，首长们都在民房里住，你我都很不放心，我建议今晚你就辛苦一晚，不要睡了，现在已快要天亮了，找几个警卫员聊一聊，以防万一，好不好？”

张仲三说：“好，你到作战室去掌握情况吧，我知道你今晚也不能睡。”我们是老战友了，说完会心地笑了笑。

我走到半山坡上的树林中临时搭的帐篷里，躺在行军床上，想睡但不敢睡，就起来与值班参谋研究敌人北犯进展情况，我军新入朝兵

团的开进情况。我一进入情况瞌睡虫也就跑了。

4月7日天刚拂晓，我们听到了防空哨鸣枪报警：敌机来了！我和丁处长一道跑到树林边，向天上一看，敌机已快临头了，往下看，首先看到彭总那房间里的人员在往防空洞跑，再往邓华、洪学智、解方、杜平等首长住的房间看，他们也出了房间在跑，可是都没有往防空洞跑，而是沿着山边跑到另一条沟岔里去了，看到洪副司令还摔了一跤，爬起来后，被警卫员搀扶着跑，也跑过山沟里了。

敌人的飞机临空也不转圈，首先朝那几间民房投炸弹，扔掉炸弹后，即绕过圈来，就低空扫射，一直到将携带的子弹打光才飞走。我们当时正在山坡上找了一个隐蔽处观察敌机轰炸、扫射的全过程，敌人的飞机对那几间民房都进行了扫射，丁甘如处长和我们都沉闷的思考着谁也没有说什么，这时我们两人的心情极为紧张，提心吊胆，万一炸着一位首长，那损失就太大了，如果发生了不幸，那怎么办？怎么交待啊！

我和丁处长看到敌机扫射完最后一梭子弹后，经验已告诉我们敌机要飞走了，我们还没有等敌机飞离上空，就向彭总住的房屋跑去，看到彭总住的民房被炸中，被机关炮子弹扫得很厉害，躺的行军床都中了机关炮弹。当我们赶到彭总防空洞，看到彭总安然无事，我们的心就放下了。

这是彭总第2次遇险。

彭总看到我们后急着问道：“几位副司令、参谋长、主任怎么样？没有事吧？”

丁甘如回答说：“敌机飞临上空前，我们在山坡上看到他们都出了房屋，但没有进防空洞，都跑到那面小山沟去了，我们现在就去看他们。”

我们跑到邓副司令等首长那个房屋一看，他们睡的行军床都被扫射的一溜子弹眼，被褥都打坏了。

这时邓华等首长也都返回来了，看到这个情况，邓华对洪学智双手抱拳说：“老洪，这次我这条命一半是马克思在天之灵，一半是得到你老弟嗓门大，个儿高，力气大，要不是你把熟睡的我连喊带推地叫醒拖走，我就报销了。”

洪学智副司令说：“那你怎么感谢我，请客吃狗肉。”

邓华副司令说：“那好、好，我一定从国内搞一条狗、搞一瓶好酒，请你和大家喝一杯、吃一顿。”

邓华副司令接着问我：“彭总那儿怎么样，挨炸了吗？”我回答说：“丁处长和我跑去看了，彭总的住房被敌机扫射了，但彭总在敌机轰炸前，被警卫员扶进了防空洞，时间只差那么一点儿，没有被炸着，真太危险了。我们在山坡上看着可吓坏了。”

邓华、洪学智等首长听后，吓了一跳，迅速跑向彭总的住房，看到房间被扫射的情况，立即跑向彭总的防空洞，正好彭总从防空洞内出来。彭总说：“你们都来了，一个不少，都安全，这就好。刚才他们告诉我，我的住房被扫射中了，我睡的行军床也被扫射坏了。我们去看看。”大家看了彭总安全，就放心了，即随彭总到他的住处看了一遍。

彭总风趣地指着被炸的房子说：“美国鬼子总想找我，找到后，连皮都没碰着我。过去国民党、日本鬼子的炸弹，子弹总想打中我，就是打不中，现在连美国鬼子的炸弹、子弹也打不中呀！大家都平安无事就好。”

洪学智副司令说：“老总，您可不要再吓唬我们了，保证您老总的绝对安全，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交给志司党委的任务呀！今天白天就请彭总在防空洞内办公、指挥。到空寺洞后，一定请老总进到矿洞子里去住吧，潮湿一点总比挨炸好。住进矿洞后，我们再想办法来解决潮湿等问题。”彭总听后没有反对，当晚到了空寺洞，彭总和志司首长们都住进了矿洞。

彭总办公室许之善同志（原是总参作战部参谋）因车祸回国治伤。他即将志司几次遭敌机轰炸的情况，向总参作战部李涛部长写了书面报告，并建议中央军委再度要求志司党委指定专人，负责彭总的安全。李涛部长报告了中央军委。中央军委接受了这条意见，再次发来电报，要求志司党委一定要采取措施，保证彭总的绝对安全，并指定由解方参谋长负责。

解方参谋长即找各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开会，传达中央军委的指示，并研究采取什么措施，贯彻落实。

我说：“保证彭总安全的确是一件大事。现在就是要创造条件，使彭总能在矿洞里住下去，还要保证彭总的身体健康不致生病。我认为：主要是要解决矿洞里的潮湿、通风，每天还能使彭总见到阳光与呼吸新鲜空气。”

解方参谋长说：“那你们想想用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张仲三说：“解决潮湿的问题，一是可以在隔的木板房间里装电热器；二是将淌水的流水沟挖深点，让水都从沟里流出矿洞外，上面加盖。”

解方参谋长说：“水沟挖深加盖是可行的办法。我们的柴油机发电只够洞内照明用。电热器很费电，断了电怎么办？”

我想了一下说：“这儿树林很密，是不是锯些树在坑洞口旁挖半掩体式的防空棚，上面和四周都用圆木钉起来，并开有窗户，里面墙上钉上木板，好挂地图，地面钉上木地板防潮，外面垒上草坯和松树枝，敌人飞机不来就在外面办公，听到飞机声音就往洞内跑。”

解方参谋长说：“这个办法可以试试看。你们赶快与工兵指挥所的同志共同研究一下，搞个完善的方案来向我们汇报。”

这样就在空寺洞山坡上的坑道洞口旁，搭起半掩体的防空棚房，并开了直通矿洞口的门。

我们还考虑到入朝参战的军队多了，如果彭总召集各兵团和各军军长、政委来开会，他的小办公室坐不下，就搭起了一个可坐几十个人的会议室。

第5次战役2个阶段的作战，彭总和志司其他首长就是坐镇空寺洞指挥的。

第5次战役后，志司也是在我们准备的这间会议室召开了各兵团司令、政委和各军军长、政委的作战会议。

七、志司第6次转移，进驻桧仓。在桧仓3次（第7、8、9次）遭敌机轰炸

1951年6月10日，我中朝联军结束第5次战役第2阶段作战，

敌我双方都转入战略防御。

这时，虽然停战谈判已经开始了，但美军仍不甘心在战场上的失败，在谈判桌旁，气焰嚣张。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彭总准备再向敌人发动进攻，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在这段时间，彭总与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与金日成之间，反复协商如何打，什么时候打第6次战役。

因为要准备再向敌进攻，为了便于指挥，志司仍住在空寺洞。到了8月，中央军委最后确定：重兵在握，备击不发，以确保主动的方针。暂不打第6次战役了。

作战方针确定后，我们作战处即向邓华副司令员建议：现在已不准备打大的进攻战役了，而要转为战略防御，巩固阵地作战。现在，志愿军已有几个兵团、十几个军都在第一线展开。而且，彭总有意图要对后方的东西海岸加强设防。因此，志司的位置现在仍驻空寺洞，已经不适宜了，宜选择在既要能指挥正面作战，又要能指挥东西海岸的防御作战的适当地点。

邓副司令员同意我们的意见，要我们作战处从地图上选择一处适中的位置，研究好后，再向彭总和其他志司领导同志汇报。

我和丁甘如处长与作战处的同志在地图上反复查看研究。选择了朝鲜蜂腰部的桧仓，认为这个位置很适中。我们即拿着地图去向邓华副司令员汇报，建议志司转移进驻桧仓，那儿距离前线和东、西海岸都不远，又是山区有矿洞，距离平壤不到100公里。邓华副司令仔细地看了地图后，认为可以。即向彭总报告。

彭总表示同意后，邓副司令即派丁甘如处长和张仲三副处长率先遣队去现地了解情况，并部署指挥机关的设置。丁甘如处长第2天就发来了电报，认为桧仓很适合，位于平壤以东约90公里，是个山区又是一个大矿区，有上下两层矿洞，沟还很深，山沟岔也多，都是树林，山上矿洞可住机关，山下矿洞可住首长们。

彭总和邓华副司令等首长看了电报后决定志司进驻桧仓。

1951年9月上旬，志司即转移至桧仓。

我们进驻桧仓后，刚刚展开工作，正在洞口建设防空掩蔽部。还

没有完全建设好。我不想住进矿洞，因为已经掌握了敌人飞机活动规律，而且敌我双方都已转入阵地防御了，情况的变化已不像运动战那么多、那么快、那么大了。我和作战处几位科长就选择了山沟南面的一条小沟岔里有几间靠山的独立房屋住，可以烧热地炕（朝鲜民房进屋就是炕），我请通信处给架设了电话，使志司首长和作战值班室的同志随时都可以找到我们，我们有事也可同有关人员通话。每天晚上在作战室处理完各方面报来的情况后，我们不值班的同志，下半夜即跑到那间小屋子，去睡几个小时好觉，恢复一下疲劳，丁甘如处长对我说：“老杨，你真会选择地方！我们俩应该有苦同受，有福共享嘛。我要搬到你这个屋子来，咱们共‘享福’。”我笑着说：“我很欢迎你搬来住在一起，睡觉前，还可随时商量问题。”

9月中旬的一天晚上11时左右，我在作战室将工作处理完后，下山再到彭总等首长们办公的矿洞里，向首长们简要地汇报一天的作战情况后，出来向山沟另一面我们那间小屋走去，刚过了山沟，将要走到我们住的那间独立房屋时，就听到各防空哨已鸣枪报警了，随即听到从北面飞来的飞机声音，这声音不是战斗轰炸机的声音，而是大型轰炸机的声音，我仔细一听是美军B-29轰炸机群，我赶快跑到那间房子的后山观看矿洞那边（即山沟的北面）山上山下都没有人走动，我就放心了。志司机关和部队的同志们都有了防空经验了。

当时丁甘如处长正在那间独立房屋里，听收音机新闻广播，我就赶快跑到房屋外，叫道：“丁处长，飞机来了，赶快出来。”丁甘如提了他那心爱的手提式收音机跑出来后，我们一同躲在山坡的陡峭处，敌B-29轰炸机是高空水平投弹，看到上空黑黑的机群，密集的炸弹投下来了。这是志司第7次遭敌机轰炸。

我对丁处长说：“千万不要投到彭总他们住的矿洞口。这个矿洞口前面是矿渣推出来填成的一块小平地，彭总和志司其他首长休息时出来，就利用这块小块平地散步。山上那个洞口是直陡的，炸弹炸不着。”

丁甘如带开玩笑讥讽的口吻说：“敌人飞行员大概是在北面没有找到合适的目标，没有将炸弹投掉，在返回途中找这么个大山沟瞎

投，好返航降落。”

我也笑着说：“你的判断有一定的道理，但看来不像是盲目投弹，是已经发现这条沟可疑而来轰炸的，可能就是来轰炸这个山沟里的矿洞的，炸毁矿洞，破坏生产，也是敌人狂轰滥炸的目标之一。投弹那么密集，还相当准确，如果是无目标的乱投，弹着点就会很零乱，而不会这么集中。”

丁甘如说：“你说的道理充分些，我们还是不能麻痹，不能疏忽大意，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把志司的防空搞好，明天就开个会吧。”

我说：“好，照你说的办。”

我们看到炸弹正炸在山沟的北部山坡上，炸弹爆炸响声很大，连续响了一会儿，带起来的沙石满天飞，从我们所在位置看，离彭总和其他志司首长们住的洞口很近，可把我们吓了一跳。敌机群刚飞走，我们就赶快往北面山坡跑，跑到山沟边，只见北坡那块平地的靠沟边和下面山沟，到处是炸弹坑。我们跑上山坡，用眼测量了一下，这批炸弹距离彭总等首长们住的洞口大约40公尺远，真够危险了。

看到被炸之处，正好是我刚刚从此处走过，时间也不过10分钟吧，我很庆幸我早走离了死亡的10分钟，如果稍晚一点，走慢一点，那真是粉身碎骨升天了。丁甘如对我说：“老杨，你好险呀！又捡了一条命。”

张文舟代参谋长从洞里跑出来了，正碰到我们俩人，他说：“我们在洞里听到炸弹响声很大、很近，我们以为炸中洞口了哩，到底炸在哪儿？”

我们领他到山坡平地边沿，指给他看，一看敌人的炸弹没有长眼睛，虽然投了那么一大批重磅炸弹，但啥也没有炸着，特别是没有炸中矿洞口，接着我讥讽地说：“敌人B-29轰炸机丢了这么多重磅炸弹，明天我们可以捡很多废钢废铁了。送回国内的兵工厂，用美国鬼子的钢铁，制造出重型炮弹，再送还给美国佬，要敌人用血来偿还。”

张文舟代参谋长笑着对我说：“杨迪同志，你明天就组织人员捡

炸弹皮吧！这些炸弹皮真还有用哩。”

我们说说笑笑一会儿后，张文舟代参谋长说：“你们都已经知道了，我们的空军在苏联空军的帮助下已经参战，活动半径只到清川江，我们要求再南飞，苏联空军不干，很怕他们的飞机如果被击落，驾驶员跳伞飘到美军方向去当俘虏。但这些话是很保密的，美国人现在还不知道。这样，大白天美军的战斗轰炸机不敢飞到清川江一带放肆乱轰炸、扫射了，就是最新式的‘油挑子’（注：副油箱在机翼两边）佩刀式（F-86式）喷气战斗轰炸机也不敢像开始那样在北部上空，肆无忌惮地乱飞了。我们的空军还不能夜间作战，敌人战斗轰炸机夜航设备好，敌人就增加了夜间的轰炸活动，特别是对交通枢纽的轰炸，以阻止和破坏我后方的运输线。”他接着说：“敌人用B-26或B-29重型轰炸机高空轰炸，如果炸中了，那破坏会更大，因此，我们这儿仍要特别注意防空，你们要立即研究如何加强志司所在地的防空。”

我和丁甘如同志研究，为了保证彭总和志司其他首长以及志司机关的安全，我们建议在桧仓附近山头增加防空监视哨，并在桧仓附近山顶上增加几个高射炮兵营就可以了，如果增加高射炮兵部队过多，这样反而会增加敌人飞机的注意。但在成川地区及桧仓的东部、西部增加高射炮兵，这些地区都有铁路，公路通过，是交通枢纽，敌人飞机很注意交通枢纽和重点铁路、公路运输线，每昼夜不停地飞来轰炸，我们将高射炮兵增加到这些地区去，加强这些交通枢纽的防空火力，就可以打击敌人夜间的狂轰滥炸。在桧仓，如果敌人没有发现我们这儿是指挥机关，敌机不是有目的经常来轰炸，我们来个保持高射炮火的“静默”，这样对桧仓反倒会安全些。我们将这些建议向邓华副司令和张文舟代参谋长汇报后，他们同意我们的意见。

一直到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订，敌人的飞机只从桧仓上空飞过，而没有发现桧仓是志愿军司令部的驻地。彭总和志司其他首长、志司机关也逐渐都在矿洞口外，甚至在半山坡上，修建了一个一个的防空棚屋，也没有遭到过敌机的轰炸。自此，彭总和志司其他首长，在桧仓指挥了两年多的正面阵地防御作战，和东、西海岸的防御

部署、工事构筑。粉碎了敌人从正面的进攻，向我后方的“绞杀战”，及企图从侧后登陆。我军进而向敌发动由小到大的战斗、战役反击作战，直到金城大举反击进攻战役，从防御作战中，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迫使敌人不得不达成停战协定，签字议和。

一直到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回国，志愿军司令部才离开桧仓回国。

八、志愿军司令部按规定，及时向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报告抗美援朝作战情况或请示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我们志司仍是按中国人民解放军规定的制度，及时向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报告在朝鲜战场上的作战情况，请示需要军委、总参谋部解决的问题。

彭总和志司其他首长、参谋长，要求志愿军司令部应遵照执行国内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对各战略区、各野战军的要求与规定。并指出，朝鲜战争的情况，比在国内解放战争时期的敌、我情况变化要快得多，我们的报告就要更快更准确地将我情、敌情及时迅速上报，以使军委和总参谋部迅速了解朝鲜战场的情况。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过程中，志愿军司令部按照规定每个星期向北京总部进行一次综合性的报告，每次战役的重要发展情况都迅速及时上报。

当时志司与北京总参谋部的有线通信在朝鲜境内很不方便，一方面是朝鲜境内有线通信线路很少，还是日本占领时期留下来的，友方还没有来得及改造，同时我军也不便在线路上采取加密措施，再加上敌人飞机的轰炸破坏。因此，我志愿军司令部与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主要是靠无线通信，发电报报告、请示。比较长的总结经验报告，会议报告和统计表等等，则派专门的机要通信员乘通信吉普车送到安东，交给东北军区驻在安东专为志愿军送信件文书的机要通信员乘火

车转送到北京。

志司作战处每日均将各军行军、作战情况综合报总参，每次战役定下的决心，较多的是由彭总亲自起草，直接报告毛泽东主席。我们作战处即根据彭总的决心，迅速将定下决心的具体敌、我军详细情况，用电报报告军委、总部。待毛泽东主席回电批准后，即由作战处起草，下达给各兵团、各军的战役作战电令，并报军委、总参谋部。在每一次战役过程中，因为情况发生新的变化，彭总要改变决心，调整作战部署，改变进攻方式或防御样式时，作战处即根据彭总的意图，迅速起草电令，发给各兵团、各军并报军委、总参谋部。

在每次战役之前，志司作战处要将我军各兵团、军、师部队的位置，存在的问题等综合上报总参谋部，在每次战役过程中，各兵团、各军、师发展的情况，及时分别报告。战役结束，即迅速首先简要综合向军委、总部报告整个战役发展情况及主要经验教训。然后再送书面的较详细的总结报告；志司情报处在每次战役前，总是将敌人情况，迅速地电报总参谋部，在战役过程中直至战役结束，有较大的新的敌情，即随时报告；志司军务处则在每个月25日，或每次战役结束后，将我军人员伤亡、武器弹药的消耗等先用电报简要报告，然后送详细的书面报告，并提出请求补充的具体数目，等等，志司通信处、机要处为了防止敌人破译我军的密码与电台通信讯号，他们采取较为频繁地更换密码与讯号，这都要及时报告总参。志司各处向军委、总参谋部的电报报告或书面报告，都是以志司的名义上报。（如属各处专业性的报告，则由各处直接报告总参谋部所属各部）

总参谋部对志愿军司令部的工作是很重视、很关怀的。总参谋部所获悉的有关朝鲜战场的敌军情报，以及有关军事、政治情报，都很及时地通报给志司。这样就使我们可以将从战场上各方面收集到的情报，进行对比分析，得出较为准确的情报。我们也将上下对比的情报，分析后的结果，报告总参谋部。总参谋部也将我们志司上报的情报，进行分析研究，及时向志司下达指示。使志司对情报的了解与掌握更为准确，这为我们向志司首长提供意见与建议起了较大的作用。总参谋部不仅只向志司通报情况，而且还向志司询问某些方面的事

项、问题。志司对总参谋部的查询与提出的问题、要求，我们志司各有关处，都做到了有问必答，及时准确地回答了总参提出的各类询问与问题，以及要求志司要做到的事项。有时，总参谋部还派干部到朝鲜战场来，亲自了解情况和检查指导工作。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军委总参谋部对志愿军司令部的工作都进行了及时的、正确的指导。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过程中，志愿军司令部在参谋长的领导下，各处像一部机器似地，很紧张、很有节奏地，有条不紊地，根据志愿军首长的意图各处都是密切协同合作，为了战役、战争的胜利而努力地主动地工作着。志愿军司令部各处对上级都做到了主动、及时和准确地向军委总参谋部报告各方面的情况，根据我的记忆，总部没有批评过志司各处有错报、迟报的情况。对下，志司各处对志愿军所指挥的各兵团、各军以及志愿军后勤司令部，都做到了及时、准确地向他们通报情况，下达彭总与志司其他首长的意图与决心，以及志司首长的指令、指示等等。各入朝参战部队，对志司的反映都是很好的、很满意的。志司各处与各兵团、各军的首长、指挥机关相处是很融洽的，他们没有向彭总或其他志司首长“告”过志司各处的“状”。

我们作战处与各兵团、各军因为接触的很多，也就更为熟悉。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志愿军司令部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有力地保证了彭总与志司其他首长对入朝各兵团、各军和志后的顺畅指挥。我没有听到过首长们对志司各处的批评。至于赞语我就不必说了。

第 十 五 章

邓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独特式 地凯旋回国

一、邓华代司令员令我随他回国

1954年3月下旬，邓华代司令员的秘书周绍忱同志来电话说：“首长让我通知你，他即将回国，要你随他一起回国。并要你从西海指选几名参谋，到沈阳军区司令部去工作。”

我问道：“老周，司令什么时候回国，从西海指选参谋到沈阳军区去干什么？”周绍忱说：“就在这个月（3月）底走，邓司令先到平壤去向金日成首相和朝鲜党政军领导辞行，然后到你们那儿。中央军委已有命令调首长回国任沈阳军区司令员，要你随他到沈阳军区司令部工作，从西海指选几名有作战经验的参谋去沈阳军区司令部工作。”我又问道：“那么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由谁代理呢？”

周绍忱说：“首长的志愿军代司令兼代政委还不免职。志愿军的工作由杨得志副司令、李志民副政委负责。请你先准备好，具体行动时间确定后，我即通知你。”

我要回国了，很高兴，朝鲜停战已经8个月，没有战事了。只是在执行停战协定的过程中，美方故意制造麻烦。我们志愿军已开始分批回国。留下来的各军，全力帮助朝鲜政府和人民重建家园，恢复生产。

我把邓华司令员的秘书来电话所说的事，报告了梁兴初副司

令员。

梁兴初副司令员说：“好呀！你走吧，我看西海指也没有什么事可做了，我也可能要回国了。邓司令要你带参谋走，你自己去挑选，三个、四个都行。你把作战处的工作就交给副处长李庆三，我也不再任命作战处处长了。”

3月25日左右，邓华司令员给我来电话说：“杨迪，你都准备好了吧。挑选的参谋要他们直接到沈阳军区司令部去报到，调转的手续，你自己派人去志愿军政治部办。我准备明天到平壤向金日成首相辞行，大约两三天的时间，然后到西海指看看同志们，那时你就同我一起走。”

我问道：“司令，我们怎么走？要带什么用的吃的吗？”

邓华司令说：“我已要铁道运输司令部准备了一辆轻油车，我们从顺川上车，乘轻油车绕道朝鲜东北部走，看看东北部的地形，从图们回国。在车上吃的用的我已要周绍忱通知铁道军事运输局准备了。”

我回答说：“司令，这样走太好了，我一切都准备好了。并且已报告了梁副司令。”

邓华司令说：“我去西海指的时间，我已要周绍忱告诉梁兴初同志了。”

我思考一下，我要准备什么呢？一是立即请政治处派人到志愿军政治部办理我和4名参谋去沈阳军区调转手续。二是打电话给志司作战处，告诉他们邓司令回国要走朝鲜东北部去看看地形，请他们准备一份朝鲜东北部的10万分之1或20万分之1的地图，我派参谋去取。

邓司令于3月29日上午到西海指，梁兴初副司令员召集各处领导同志欢送邓司令，他们之间还单独谈了话。

邓司令告诉我，明早（30日）就到顺川上轻油车走，他说：“我这次到平壤去辞行，金日成首相很热情地欢送我，我告诉他准备乘轻油车从朝鲜东北海岸回国，顺便看看沿途地形，以便以后如果需要入朝作战时，东北部的地形我就知道了。金日成首相听后，很同

意我这个行动计划，并令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派一位少将陪同。一是看地形可以向他询问情况，二是沿途停车便于与朝鲜地方党政军部门联系接待。金首相还说要他们的有关部门通知沿途党政军领导同志好好接待，我推辞了。金首相说，在朝鲜人民处于最困难的时候，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3兵团首先入朝，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军的司令员，现在又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理司令员，一定要沿途好好接待，欢送我回国。我本来想悄悄地回国，看来又要麻烦朝鲜方面了。”

我说：“司令，我可从来没有对您说过奉承话，我认为这样欢送您回国，是符合外交礼节的，您是当之无愧的。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派人陪同，沿途朝方接待，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也方便多了。为了便于说话和联系，我们一定要带一名朝文翻译。”

邓司令说：“你还不知道我轻车简从的习惯吗？我们人越少越好，我只带了一名秘书和一名警卫员，你只带一名警卫员，我们一共5个人。我在平壤已见到了朝鲜那位少将，他会说中国话，可能他还要带翻译哩。你不是还可以听懂和说一些朝鲜话嘛，可以当半个翻译。”

我说：“那可不行。我的朝语只能问问路及生活上的一些话，怎么能当司令的半个翻译。西海指有位朝语翻译很好，可随我们走，有我们自己的翻译，这样从两国两军的交谈上是得体的，也方便一些。到沈阳后，再要翻译回西海指。”

邓司令听后，说：“你说的有道理，就带一名翻译吧。”为了照顾好邓司令员途中的生活，我还自作主张，带了一名管理员。

二、邓华代司令员乘坐轻油车，走朝鲜东北部看地形

1954年3月30日，邓华司令员谢绝了梁兴初副司令员及志愿军其他首长和机关同志们的欢送，只带我，各乘一辆吉普车到达顺川火车站。所谓的火车站，只是在停战后，搭了几个简易的房子，站台也

被敌机炸的坑坑洼洼的。

朝鲜人民军那位少将带了一位上校，在车站等待和迎接邓司令员。开始按照外交规矩，那位少将讲朝语，由那位上校翻译，邓司令讲中文后，由我方翻译成朝语。后来就都讲中国话了。因朝鲜人民军两位同志都会中国话，那位上校是位参谋，以后熟悉了，才知道他们都是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回朝鲜的。

当时朝鲜的铁路主要都是运输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人员和物资，援助朝鲜的物资也都是从安东、辑安通过。朝鲜的铁路指挥系统都已被敌飞机炸毁了，铁路是由志愿军负责抢修。为了运输和抢修指挥方便，铁路由志愿军铁道运输司令部统一指挥管理。

志愿军铁道军事管理总局来了一位负责同志，他和中、朝两方的站长都在等候。我即向军代表说：“轻油车的车长和司机是否已经知道了今天的运行计划吗？”军代表说：“都已经告诉他们了，并已通知沿途各车站。”军运总局那位负责同志（忘记姓名了）问我：“杨处长，今天只是运行到咸兴，没有变化吧？”我说：“现在还没有改变计划。到咸兴后，明日邓司令想到咸兴以北长津那一带看看地形，请你询问去长津的铁路是否可以行驶，并要咸兴车站军代表作好行车运行方案。”

军运总局那位负责同志对我说：“咸兴车站有志愿军军代表，但是过了咸兴再往东北行驶，志愿军人员与作战物资不从图们过江，只有援助朝鲜的物资有一部分从图们过江，因此，过咸兴后铁路就没有志愿军代表了。那怎么办？”

我说：“呵！这是我没有考虑到的新情况，请你待我们开车后，立即向咸兴东北沿线各大火车站派出志愿军军代表，协助朝方铁路调度。为了争取时间，是不是先从阳德、高原、元山、咸兴等处抽调人员先去，他们对东北部铁路情况熟悉，如果人员不够再速抽调人员去加强，一直到图们南岸的南阳站。以保障这一路行车安全调度方便。”

我又说：“我一定还有想的不周到的地方，你是负责铁路运行的领导，又是铁道专家，请你考虑周到，掌握指挥沿途的运行，一切都

拜托你了。”

军运总局那位负责同志说：“杨处长，请你放心，这是我们的职责与任务。这是特别专列的运行，我们会尽全力保证邓司令一路行车的安全的。”

我说：“谢谢你们了。”

邓司令很快上了车，我令军代表和站长发出开车信号。

因为是要看地形，轻油车以较缓慢的速度行驶。

当时的轻油车可能现在铁路局已经没有了，我问了一些年轻人他们都不知道。实际上，火车的轻油车相等于一节列车车厢，像大型公共汽车，驾驶室、发动机都在车厢的前面，烧轻柴油，所以叫轻油车。乘车的人员有座位，也可以架设临时床位，还可以在车上做饭。如果长途行驶，驾驶员要有2套人员，乘坐人员要架床就只能乘10多人。这种轻油车是过去专供铁路局局长巡视铁路沿线使用的，很方便。它虽只有一节车厢，但规格高，等于一列专列，它行进时可以临时改变行驶计划，沿途列车都要让路，让它先行，只要有铁路，轻油车即随处可走，随时可停可开，很方便，快捷。

由于是白天行车，视野很好，沿线的地形地物各种情况都看得很清楚。我将地图按运行的方向，展开在一张行军桌上，使邓司令坐在地图旁边，即可看到正前方的地形情况。

我们看到沿线的村庄、城市、车站都被敌人的飞机轰炸成一片废墟，火车站才恢复了临时信号灯，主要靠旗语指挥。沿途还活着的朝鲜人民，大多数是妇女、小孩和老人，在他们居住的废墟上，清理着或寻找着什么。

邓华司令看见这些情况，对朝鲜人民军陪同的那位少将说：“战争虽然停止了，但朝鲜人民仍在苦难中煎熬。克服这种苦难，是需要几年时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才能恢复到战争以前的状态。”

朝鲜人民军少将说：“金日成首相正在领导制定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计划。”

邓华司令说：“毛泽东主席、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彭德怀司令员已决定，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全力以赴，帮助朝鲜人民迅速恢复生产，加快

重建家园。我离开志愿军司令部前，已遵照我党、我国政府、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指示，开会进行了研究和部署，志愿军的工作重点已转移到帮助朝鲜政府和人民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要求各军在驻地分片负责与朝鲜党和政府联系志愿军可以承担的任务。”

那位少将说：“我们深表感谢。”

邓华司令说：“这是我军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轻油车行驶到新成川线，我说：“司令，新成川以北就是德川，你看根据这样的地形情况，第2次战役第38军和42军突破敌人的进攻，插向三所里，真是很不容易的。”

邓司令用望远镜向北面看了一会儿，再用手在地图上量了一下，说：“北面的地形是比较复杂的，我军迂回进攻是有一定的难度。”

为了使邓华司令员中午能休息一会儿，我要警卫员给他架起了我们带来的行军床，让他睡一会儿午觉。

黄昏，轻油车到达咸兴站。咸兴市是朝鲜东北部最大城市，1950年10月，美军越过“三八线”向北进犯，麦克阿瑟以美第10军从兴南、咸兴登陆，向长津方向进犯和沿铁路向清津方向进犯。咸兴地区是邓华司令员此次朝鲜东北行，要看的第一个重点。

我向邓司令建议在咸兴一带待2天时间，向北看到长津，向南看看和研究美军登陆和撤退的咸兴沿岸及其兴南港口情况。

邓华司令员表示同意。我即告诉朝鲜人民军陪同的那位少将，请他通知咸兴铁道部门负责同志。我还告诉随我们行动的铁路军代表，下车后与朝鲜咸兴铁路部门协商明早到长津，当日返回咸兴的行车运行计划。

三、车到咸兴市，邓华代司令员受到当地朝鲜党、政、军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与欢送。看了地形，参观了工厂

轻油车到达咸兴停稳后，咸镜南道（注：朝鲜的道等于我国的

省) 朝鲜劳动党道党委责任书记、道的委员长及咸兴市党政负责同志以及朝鲜人民军第2军团长等主要党、政、军领导人都到车站来欢迎。互相热烈握手并致问候, 朝鲜同志说了很多热情友好的话。

朝鲜劳动党咸镜南道党委责任书记说: “邓司令官同志, 我国党中央和政府通知我们, 司令官回国要路经咸镜南道, 我们听到后都非常高兴。您为我们朝鲜和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我们是真心实意地欢迎司令官来咸镜南道视察工作, 并以非常感激的心情欢送司令官回国。我们本来要热烈地欢迎与欢送司令官, 可是上级指示, 司令官是秘密回国, 司令官本人也向我们伟大领袖金日成首相提出了沿途不要组织迎送。金日成首相指示我们, 邓司令官到达和离开时, 各级领导同志都要欢迎和欢送, 并要我们尽可能接待好司令官同志。今天我们遵照首相同志的指示, 党、政、军主要领导同志都来欢迎司令官。”

邓华司令员说: “非常感谢咸镜南道及咸兴市的党、政领导同志, 感谢与我们并肩作战的人民军军团长同志。我去平壤向金日成首相辞行时, 首相同志就说要指示沿途各道、郡的党、政、军领导同志及人民热烈欢迎、欢送。我非常感谢金首相对我的关怀与爱护。我向金首相说明了我是奉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命令秘密回国, 我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职务还保留着, 因此不宜公开宣传。金首相说, 那就不搞公开的欢送了, 他就令人民军总参谋部派这位少将同志陪同送我。我非常感谢金首相对我的关照。今天各位党、政、军领导同志都来欢迎我, 真是担当不起了, 非常感谢。”

经过这种简单而又热烈的欢迎后, 朝鲜同志邀请邓华司令员下车, 到他们新建成的办公棚屋去, 本来邓司令不想下车去打搅他们, 出于礼节他在朝方领导人的陪同下, 来到离火车站很近的办公棚屋, 朝方尽他们的可能在屋内摆置了桌椅, 还摆上了苹果。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了。不一会就摆上了餐具, 要宴请邓华司令员。我看朝鲜咸镜南道的领导是尽了很大的努力来宴请的, 饭菜是按照朝鲜民族习俗做的, 还摆上了朝鲜人参酒, 他们在席上不断地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邓华司令官在朝鲜人民正处于危急之际入朝参战, 支援了朝鲜, 朝中

人民和军队联合作战，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的“联合国”侵略军，迫使美帝国主义停战签字，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我们共同胜利干杯，为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干杯，为朝鲜人民伟大领袖金日成首相干杯，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干杯，为邓华代司令员干杯……气氛很热烈。

宴会后，邓司令要回车厢休息，朝鲜咸镜南道的领导同志坚决要留邓司令在他们的临时的办公棚屋休息，邓华在朝方一再挽留下，盛情难却就留下了。我对邓司令说：“司令，你在这儿休息，我回轻油车上去睡，以便安排明日行程，轻油车上需要留人。”邓司令说：“这样好，你去吧。”

第2天一早，我们即乘轻油车，向长津方向驶去，主要看看第2次战役期间美军第10军向长津湖方向和五老里、赴战岭方向是怎么进攻的，我第9兵团是怎么反击敌人的。

赴战岭山脉海拔最高2500多公尺，高山峻岭，有两条由北向南不宽的山沟，从五老里分岔有一条铁路，一条公路通向长津湖和赴战岭，根据这样的地形，敌人的机械化军队很不好展开。看来当时麦克阿瑟以第10军从咸兴登陆，并不是来准备打仗的，是以为朝鲜人民军被他们打败了，朝鲜东北部空虚，也就不顾朝鲜东北部大山区，企图乘胜长驱直入，不战而占领整个朝鲜。敌人根本没有料到会遇上强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会在这大山区出现，与他对抗。美第10军的组成都是美军与南朝鲜军的精锐，但在大山区内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展不开，加之正是寒冬季节，大雪封山使敌人的精锐发挥不出力量来。

邓华司令员看了大兵团在这样的很难作战的地形条件，并听了朝鲜方面介绍当时的气候条件后，深有感叹地说：“第9兵团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作战，并取得了重大胜利，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东线的胜利，西线的胜利把麦克阿瑟的头脑打昏了，把他的整个战略战役企图都打破了，正如彭总说的，第2次战役的胜利，将敌人打退到了‘三八线’，收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

看了长津湖方向的地形后，我心想：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摄氏零下

40度，天寒地冻，大雪封山，翻越2500公尺高的赴战岭，将美第10军打败，赶下大海逃跑。这比1796年拿破仑指挥对意大利进军时，越过法、意边境阿尔卑斯山那个“天险”，不知要险恶多少倍。而且拿破仑是在没有战斗情况下的行军，在季节上，拿破仑是4月的春天，我军是冬天。历史学家把拿破仑那次行军，吹得神乎其神，如果与我军相比较，就没有什么可神的了。我军才是真正的英雄。

我们下午4时即返回咸兴市。

咸镜南道和咸兴市领导在等着我们，即请邓司令去参观朝鲜引以为骄傲的“二·八”维尼龙工厂（注：2月8日是当时朝鲜人民军的建军节日，故名二·八），该厂已开始恢复生产，说老实话，我是第一次参观化纤工厂，从原料变成化纤到织成衣服的全过程，我觉得很新鲜，很感兴趣。邓华司令员在一边看、一边询问。参观后，邓司令对该厂领导和道、市领导同志说：“祝贺你们在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首相领导下，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恢复了战争的破坏，迅速恢复了生产。我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战员，向贵厂和全体工人和技术人员同志们致敬和祝贺，并表示亲切的慰问。”我们都热烈鼓掌。朝鲜陪同的领导人和该厂的领导都很高兴。

该厂厂长说：“今天，中国人民志愿军邓华代司令官亲临‘二·八’维尼龙工厂参观视察，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并说：“我们工厂是在敬爱的领袖金日成首相亲自关怀、指导下恢复生产的，停战后，首相同志已经来我厂视察两次了。”随即将他们厂生产的维尼龙化纤衬衫赠给邓司令，也送给我们每人一件，该厂长说：“这是我们厂恢复生产后的第一批产品，赠送给尊敬的邓华司令官做纪念，我们感到很荣幸。”

朝鲜咸兴市“二·八”维尼龙工厂是该国大型的化纤工厂，是引以为骄傲的工厂，后来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时，在金日成首相陪同下参观了该厂。因此在周总理逝世后周恩来的半身铜像就建在这个工厂的广场上，邓颖超副委员长访问朝鲜，到此工厂参加了周总理铜像揭幕仪式。

当晚，我们在咸兴市吃晚饭时，特为招待吃狗肉。邓华司令员喜

欢这道菜，连声说这狗肉好吃，由此而发生了感人的故事。

当晚邓司令员仍在朝方道委员长办公棚屋住宿，我们回轻油车上住，晚上我突然听到狗叫声，我的警卫员小孙好奇，跑下去看了，原来是朝鲜同志正将一条狗用绳子套在颈上勒死。他们说：“上级首长指示他们，一定要找条肥壮的狗，今晚上要连夜炖烂，明早要请邓司令官吃狗肉。”我知道后很受感动，要知道当时要在朝鲜搞到一条肥壮的狗是很不容易的。朝鲜地方的同志们对邓华司令员是多么的尊敬与感激呵！我认为这也是朝鲜同志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种友好感激心意的表达。

果然，第二天的早饭又吃上了新鲜的狗肉。后来在轻油车上，我把这个感人的故事讲给邓司令员听。邓司令听后深受感动地说：“我无意中说了一句好吃，他们就那么认真，以后我们说话还真得注意，不要再增加朝鲜同志的麻烦了，他们现在还很困难呵，搞条狗也很不容易呀！”

上午，我们乘轻油车到兴南港和海滩去观看美军登陆和撤退的地段，朝鲜地方党政军领导同志陪同前往，我们下车后，朝鲜人民军第2军团准备了汽车，由军团长陪同邓华司令员将汽车开到兴南港一处制高点，军团长向邓华司令员介绍了美军登陆及撤退的情况，邓华司令员看后说：“这样开阔的海面，这么好的海滩还有兴南港，这的确是登陆进攻较理想的战场。可是美军败退时，从这里撤退也够狼狈的了，调集了300余艘舰艇，以舰炮与空中火力构成一道弧形的火墙，使我军无法突入追歼撤退之敌。只有令第9兵团停止进攻，敌人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撤退。”

看了兴南港一带地形后，朝鲜地方党政同志即请邓司令员到另一处面临大海，背靠森林，环境极其优美恬静的地方。进入警卫圈后，发现在森林中有一座别墅。我们按照朝鲜人民的习惯，进屋脱鞋，咸镜南道书记告诉邓司令说：“伟大领袖金日成元帅每次到咸镜南道来视察工作，就住在这儿。”这栋房子不知为什么没有遭到敌人的破坏。我估计：因为此处很隐蔽，可能敌人进攻时，只顾进攻，撤退时只顾匆匆上船撤退，没有发现森林深处的这栋别墅。朝鲜同志已在这

里准备了午饭，他们说是遵照金首相的指示，在此招待邓华司令官的。

我们来到火车站将要登车时，朝鲜方面所有的党政军领导同志都在站台上列队欢送。邓华司令员一一和他们握手告别，对咸镜南道、咸兴市的领导同志及人民军第2军团长的盛情接待，表示由衷的感谢。朝鲜同志们对邓华司令员的敬意和依依惜别之情，在他们的眼睛和脸上都表现出来了，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我们这一代亲自经历的人体会最深，希望我们两国、两军的后代，珍重这种用鲜血凝成的友谊。

四、轻油车行驶在高山峻岭中，一条建筑特殊的铁路通向鸭绿江边的惠山镇

我们告别咸兴，上车后，即向东北方向行驶。在咸兴时，我已向邓司令作了下一步行动计划的汇报。我建议：第二个重点经端川、金策市（注：金策是金日成的战友，军衔是次帅，战争中牺牲，朝鲜议会和政府将他的家乡命名为金策市），稍事停留，看看那一段的沿海地形，然后向北，向鸭绿江边的惠山镇行驶，因为1950年10月美军及南朝鲜军在咸兴登陆后，即以美军第7师一个团和南朝鲜军第3师一部，长驱深入，进犯到鸭绿江边的惠山镇，隔江就是我国的长白县（即现在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我们现在亲自去了解敌人当时进犯的情况，对今后万一再发生类似的情况，我们即可事先采取一些必要的防范措施。

邓华司令同意我的建议后，我已在咸兴向军代表作了布置。我们的轻油车沿海岸行驶，从行驶的左方向看去，都是大山深沟，树林茂密，从行驶的右方向看去，则是茫茫大海，这条铁路线暴露在敌人海军舰艇的直接轰击下。

我们在金策市过夜，第2天早晨，轻油车继续向东北方向行驶，到吉州后，即转向西北行驶，因是从山下向山上爬，轻油车的马力不够，爬不动，即在后面加挂了一辆蒸汽机车头，向上顶。即使这样，

车速还是很慢。这条铁路修建的很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朝鲜时期，为了开采金矿和砍伐森林资源而修建的。山高林密，沟又狭长，铁路像盘山公路似的，逢山穿洞，过沟搭桥，火车是穿隧道，过桥梁，一个盘旋地一个盘旋地向山顶上爬，开始把我搞糊涂了，这是什么铁路？穿过隧道过了桥，一个圈出来，似乎还没有离开原地。我就去向司机请教，司机告诉我，铁路的最大坡度不能超过千分之15—20度，这条铁路就是爬山路，海拔的高差距有2500公尺，因直线距离不长，高低差很大，旋转圈距离就长多了，铁路就是这样来回螺旋式地慢慢地往上爬。轻油车司机没有在这条路上行驶过，因此他也说不清楚到底要绕多少个圈，才能上到山顶。

我们终于爬上了威兴山脉的最高峰——盖马高原上。这是朝鲜最高的高原（海拔2500余公尺）。然后行驶一段，就到达鸭绿江边的惠山镇。

我对邓司令说：“司令，美军真轻敌疯狂，他为了迅速占领朝鲜全部国土，在这样难以通行的大山区，还最冒险进到鸭绿江边的惠山镇。在没有亲自看到这边的地形前，我只认为美军在西线以南朝鲜军冒进到鸭绿江对岸的楚山，就感到敌人太敢于孤军深入了。看了这边的地形后，美军与南朝鲜军穿过深山老林到达惠山镇，使我更加认识了美国不仅是要占领全部朝鲜，而且还非常明显地要威胁我国东北的安全。”

邓华司令说：“是呀，我们这次到惠山镇来，是很必要的，亲眼看看这里的地形情况，美军和南朝鲜军竟然不顾兵家之大忌，不顾一切地要进犯到我国边镜和鸭绿江上游对岸，以威胁我国的安全，进而入侵我国的野心更加明显，从而更加证明我们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迅速决定调我们第13兵团到鸭绿江边，以后决定出兵援朝，是完全英明正确的决策，是非常必要和适时的。”

近午，我们到达惠山镇。惠山镇是鸭绿江的最上游，水很浅，可徒涉，河床也很窄。我们站在河边可以看到我国的长白山，看到长白县城，看得清清楚楚。惠山镇不大，人口也不多，没有遭到敌人大的破坏，但居住在这儿不多的朝鲜人民仍遭受到美军与南朝鲜军侵占之

苦难，吃的穿的都被南朝鲜军抢光了。惠山镇虽然远离“三八线”，但他们赖以生存的金矿不能开了，森林伐木也运不出去了，在深山老林内仍饱受饥寒交迫之苦，靠隔江的我国长白县的支援帮助他们维持生活。

惠山镇的朝鲜党政领导同志对我们很热情，要请邓司令吃午饭，邓司令看到当地朝鲜人民生活太苦的情况，婉言谢绝了，说：“我们要赶在天没有黑以前返回，好从北向南再看看沿途的地形。”

五、从清津到罗津，要走一个大马蹄形。我们对“祖国啊！母亲”的体会更深

我们从惠山镇返回，路过吉川，没有停车，直向清津行驶。将近深夜，我们到达了朝鲜咸镜北道（等于中国的省）的道府清津市。道和市郡的领导同志在深夜仍都到车站欢迎邓华司令员。

朝鲜劳动党道委责任书记和道委员长，一定要请邓司令下车去休息，邓司令再三推让，朝鲜同志还是坚持请他下车。盛情难却，邓华司令在朝鲜地方党政领导的陪同下，下车去休息了，我们坚持在轻油车上休息。陪同的那位少将已与我相处很熟悉了，他说：“我陪司令官下车，留上校同志陪你在车上住，明早由上校陪你下车用早餐，就不要在车上吃饭了。”我说：“这样安排很好，谢谢你。”

清津市是美军与南朝鲜军在咸兴登陆后，向朝鲜东北进犯最远的地方，南朝鲜军首都师一部向北进犯到清津。南朝鲜军首都师一部撤退时，是直接从清津港乘船撤退的，虽进行了破坏，但还留下了一些居民的房屋，我们在清津只计划半天时间，参观和看地形，该市有朝鲜人民军一个守备旅，旅团长陪同邓司令观看了海岸炮兵阵地。这个阵地修建的很好，炮都置于坑洞内，发射时，可推出到坑洞外，他们用铁轨式的方法将火炮可轻松地推出推进，朝大海方向，伪装的也很好，邓华司令夸奖了他们，使该守备旅旅团长很高兴。

午饭时，朝鲜咸镜北道的领导同志尽了他们最大的可能来招待邓司令，因为这是邓司令要离开朝鲜最后的一个道的首府了，他们已奉

朝鲜劳动党中央的命令，要在此举行一次盛大欢送。陪同的少将将情况告诉我后，我即报告了邓司令。邓华立即亲自对那位少将说：“请你转告咸镜北道及清津市的领导同志不要搞盛大欢送。我还没有离开朝鲜，还要到罗津去，朝鲜人民遭受战争的苦难，中国志愿军是亲眼所见，我们是共患难的兄弟和同志，有深切体会，吃顿便饭就行了。”

朝鲜同志对中国人民志愿军与他们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的感情是很深的，特别是对邓华司令员的感激之情很深，总想用一种形式表达出来，因此，他们还是尽他们当时可能做到的，来欢送胜利回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邓华代司令员，宴席上当然有邓司令喜欢吃的狗肉，再加上一些海产品，特别是生鱼片和明太鱼。还把可能是战前留下来的酒都拿出来了。

朝鲜劳动党道委书记致辞，热情洋溢，感激中国党、中国政府和毛泽东主席，感激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朝鲜党、政府和人民的支援，打败了美帝国主义侵略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邓华司令员致辞，感谢朝鲜同志的热情接待，感谢在战争中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首相和朝鲜劳动党、政府和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关怀爱护与支持帮助。

总之，双方不断地举杯敬酒，不断地颂扬中朝友谊，体现了中朝两党两国人民与军队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与感情。

我则很注意那盘生鱼片，这是我第一次吃生鱼片。我询问朝鲜同志这是什么海鱼，有的说是鸦片鱼，有的说是深海鱼，有的说只要是海中的鱼都可以生吃。我问，怎么吃法？他们说：“要先在醋里泡一下杀菌，再沾调料及辣椒。”那位朝鲜上校参谋因为与我相处熟了，也就不拘谨了，笑着对我说：“处长同志，我先做个示范吧？”

第二天离开清津后，我们又要爬咸镜山脉了，又是2500多公尺高，还是用另一个火车头从后面顶着行驶到山顶后，这个火车头即返回。轻油车行驶到会宁，我们看到图们江了，思念祖国的感情油然而生。我们在国内唱歌中常有“祖国啊，我的母亲。”我们已在朝鲜战斗了三年六个多月的时间了，这时看到图们江对岸祖国的土地、山

水、树木和同胞，真亲身体会到了儿子对母亲的亲近的情感特别浓厚。

邓司令看到我的神情，问道：“杨迪，你在发什么愣？在想什么？”我说：“司令，我在想母亲。”

邓司令说：“你母亲不早就去世了，这么大的人了，还像小孩子一样。”

我说：“我不是想生我的母亲。”

邓司令明白了，很有感慨地说：“我们看到了祖国的山河土地，很自然会想起祖国，你在想母亲，我也在想母亲呵！你可以将感情表露出来，我可不行呵！我只是埋藏在心里，没有表露出来。”邓华指着图们江说：“看到图们江，江那一边就是我们的祖国，祖国就是我们的母亲，我们出国已经3年半了。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为了援助朝鲜人民，为了保卫祖国母亲的安宁，我们不顾一切地与当今世界上最强大、装备最现代化、又有海空军绝对优势的美国军队作战。我们的党中央，我们的毛主席，我们的彭总的决策、指挥是多么的英明伟大呵！我协助彭总指挥，你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我从各个方面都与彭总差距很大，要当好彭总的助手，三年多来，我一点也不能稍有松懈，特别是要我代理彭总指挥整个志愿军，是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呵。我们终于恢复了朝鲜的国土，实现了朝鲜的停战，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在回国的途中看到只有一江之隔的祖国土地，这时心情真的很激动。你说想母亲了，我们心情都是一样呵！”

邓司令和我坐在摊着地图的桌子旁，凝神贯注地看着左方向图们江对岸祖国的土地，看着如画的祖国江山，看到江对岸的同胞、村庄、树林、花草和悠闲的牛、羊、鸡、鸭等等，心中美滋滋的，邓司令此时什么也不问我，我也什么不说。

轻油车到达铁路马蹄形的顶端，朝鲜的南阳。邓司令对我说：“你去告诉军代表，车在南阳站稍停10分钟吧，我们到南阳江桥去看看。”我说：“好，干脆将轻油车开到图们江桥南端，从朝鲜境内看祖国的图们是另有一番情意。”

邓司令在朝鲜人民军少将陪同下，走到朝鲜的南阳通图们的江桥

中线，当时桥上的国境线，都没有警卫看守，两国国界可以随便跨越。邓司令信步跨过了桥中线，走到属于我国的桥上，然后回过头来看朝鲜的南阳，对我说：“你看南阳就在高山下面，那边的山比图们高，可以鸟瞰整个图们呵！”

我们返回上车，沿图们江右岸朝鲜一侧向南行驶，直到图们江口中国、朝鲜、苏联三国交界处最近的洪仪里停车。邓司令一定要走到图们江口去看看，轻油车即开到朝鲜通苏联的铁路上的朝鲜一侧，作很短暂停留。朝鲜陪同的同志没有下车。邓司令就只要我随同他走到图们江口附近看了一会儿。我们很快看清楚了三国交界处的图们江入海口，即返回车上。

六、邓华司令员在罗津与苏联顾问的一席谈话。苏联顾问讲到苏联的援助，邓司令员只好讲出援助的真情

我们到罗津港已是黄昏了，朝鲜罗津市的党政领导同志都到车站来迎接邓华司令。

罗津港因距离苏联很近，美国大概是为了照顾与苏联的关系，不想在朝鲜与苏联引起直接对抗，因此，美军飞机没有轰炸罗津港。罗津是当时朝鲜唯一没有遭受轰炸破坏的城市，城市居民房屋街道和工厂都仍是原貌。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时期也因为罗津距苏联很近，是日本与苏联对抗的前线。因此日本人对罗津也没有搞什么建设。罗津港并不显现是一个大港口的城市。

晚上，朝鲜罗津市的党政领导同志在日式的旅社请邓华司令员吃饭，在门口迎接邓司令员的行列中，发现有一位苏联人，我们有点奇怪。经主人介绍，这位苏联人是1945年8月朝鲜解放后，苏联帮助朝鲜在罗津建设了一个造船厂的苏联顾问。

吃完晚饭后，朝鲜同志留邓司令住在这个旅社内。那位苏联顾问事先并没有与朝鲜主人商量，就对邓华司令说：“司令官同志，我很

荣幸能在罗津见到您，我想明早邀请司令官同志共进早餐，可以吗？”

这突然的邀请，按照外交惯例是很不礼貌的，一个普通的顾问，事先不和我们协商，也不经过朝鲜主人（从此可见苏联人的傲慢），就直接向邓华司令员提出邀请，我们也不知道朝鲜方面的意见与态度。邓司令以他的身份（此是对外，就得讲身份了）是不宜直接答应苏联顾问的邀请的。

我即对那位苏联顾问说：“同志，您邀请邓华司令员共进早餐我们表示高兴，但这没有在邓华司令员在罗津的行动计划之中，请你等我们与朝鲜同志协商研究后，看看行动计划中是否可以添加进去，再通知您，好不好？”

那位苏联人听后，可能听出他已失礼了，但仍不愿放下他的大国主义架子，耸耸肩说：“那好，我希望您能安排上，使司令官同志能够接受我诚心的邀请。”

随后，我即找朝鲜陪同的少将，问他这是怎么回事，我说：“少将同志，你是主人，请你们考虑邓华司令员是不是接受苏联同志的邀请？”

那位少将说：“请您稍等，我去问一问罗津市的领导同志。”很快地他即回来，对我说：“我问了罗津市的领导同志，事先苏联顾问并没有告诉他们，他们不知道。请你们定吧。”

我说：“邓司令员现在是在朝鲜，司令员很尊重主人的意见。”

那位少将高兴地说：“你们很尊重我们，我很感激，我去与罗津市的领导同志商量后再告诉你。”

朝方商量后，那位少将来到我的房间，对我说：“既然苏联顾问已直接向邓司令官提出了邀请，我们商量后，觉得不好驳顾问的面子。我们想请邓司令官答应苏联顾问的邀请。这是我们的意见，请你考虑，决定。”

我说：“邓司令员是尊重朝鲜主人的意见的，如果朝鲜同志同意，邓司令员明早可以去苏联顾问那儿吃早餐。但请少将同志和罗津市一位领导同志一同去参加，这样合适一些。并请找一位懂俄语和中

国语的翻译，以免让翻译用三种语言，翻来翻去，占用了三分之二的
时间，我知道朝鲜同志有的懂俄语、有的会说中国话。并请罗津市的
领导同志能通知苏联顾问，我们不便直接与在贵国工作的苏联顾问打
交道。你看这样好不好？”

那位少将听后，很高兴。这样既尊重了他们，又使他们不得罪苏
联人，并使他感到我们不避着他们单独与苏联人接触，即对我说：
“这样安排很好，我们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我说：“按朝鲜时间明早 8 时 30 分至 9 时 30 分（即北京时间 7
时 30 分至 8 时 30 分），一个小时吃饭好吗？上午，邓司令还要看看
罗津港哩。我们不知道苏联人在哪吃饭，请你们来陪邓司令员去。”

随后，我向邓司令员作了汇报。他同意我的处理办法，认为这样
做各方面都照顾到了。

年轻的苏联顾问，大概在朝鲜已习惯说了算的方式，没有想到与
中国人打交道就碰了一个软钉子，但又给了他面子。因此，第 2 天 7
时 20 分，苏联顾问就来到旅社，邀请邓司令员。当天那位苏联顾问
表现大不一样，放下了高傲的架子，知道讲礼貌了。他大概把他的食
品都拿出来了，可能还向朝鲜方面要了一些。参加早餐的共 6 个人，
即邓华司令员、我、朝鲜罗津市委第一书记、陪同的朝鲜少将，苏联
顾问及一名翻译。

苏联顾问高高兴兴地拿出一瓶伏特加白酒，说这是苏联最好的
酒，请司令员喝，邓司令让他倒了一小杯，他给每人倒完酒后，即举
杯祝酒。邓司令也举杯表示谢意。

苏联顾问并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中国军队。他只了解美国是个
强大的大国，军事强国，只有苏联和苏军才能与美国对抗，他对中国
和中国军队敢于和美国军队打仗并战胜它，对他来说是简直不可思议
的事。因此，他对邓司令员的提问，显得很无知、可笑，这可能反映
一部分苏联人对中国的不了解。

苏联顾问问：“请问司令员同志，美国军队装备精良，又有强大
的海、空军，当时中国军队怎么敢于出兵援助朝鲜打美国军队呢？”

邓华司令员轻轻一笑说：“中国人民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

席领导下，打败了美国支援的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蒋介石的 800 万军队，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即解放了全中国。请问你这位苏联同志了解这些情况吗？正当我国恢复被国民党政府破坏了的国民经济，正要开始恢复和建设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时候，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即打着‘联合国军’旗号，支持南朝鲜李承晚军队，向北进犯，朝鲜人民处在最危难的时候，毛泽东主席、中国党和中国政府、中国军队义不容辞、义无反顾地支援朝鲜人民反抗美国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侵略，支援朝鲜收复国土，并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邓华司令员停顿了一下，点燃了一支香烟，接着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公开的秘密，我国政府并没有和美国宣战，而是中国人民自愿地组织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美国政府也没有敢于向中国宣战。美国与我国是不宣而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我军虽然在装备上不能与美军相比，又没有空、海军支援，当然在 1951 年 9 月后，我国年轻的空军在苏联空军的帮助下，能够在朝鲜清川江以北与美国空军作战，但仍然不能飞到前线去支援我地面军队作战。但是，我们进行的是正义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有不怕苦、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也可以想想在苏联卫国战争年代，苏联人民及其军队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是怎么克服困难，战胜当时强大似乎所向无敌的德国法西斯军队的。”

苏联顾问似乎听明白了一些，可是竟然以老大哥的优越感说：“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在苏联无私的用武器重新装备下，与美军作战的。”

邓华司令员立即严肃地说：“苏联同志是给了我军的武器装备，给了飞机、大炮和汽车等等的帮助，这些武器装备的确帮助我军打败美国侵略军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很感谢苏联同志的帮助的。”邓华同志停了一下，话锋一转，说道：“既然苏联顾问同志说到了苏联的无私援助，那我就在这个小范围内把苏联同志援助的真实情况简单地讲几句。苏联政府对我军的武器装备的帮助，并不是无偿的援助，是我国用记账的方式购买的，而且还要付利息的。”

那位苏联顾问听了后，似乎不相信，但又无言以对。朝鲜同志听了后，觉得很惊讶。邓华司令员看到他们表情反应后，继续说道：“我国对朝鲜的援助，不仅是无偿的，而且只要朝鲜党和政府提出来要什么，只要我国有，就无偿支援，我国没有的，也努力设法生产出来支援朝鲜。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是付出巨大的牺牲的，志愿军的指战员的鲜血流在朝鲜的土地上。牺牲的烈士们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同志，永远长眠在朝鲜的国土上。现在停战了，胜利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继续支援朝鲜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这都是无偿的援助。我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的援助。”

当翻译同志进行翻译时，我对邓司令说：“司令，你讲这些就够了，不要再和这个高傲的苏联人说什么了。你已经明白地向他说明了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是有偿的。也让他们知道我们对朝鲜的援助才是真正无偿的。原计划安排一个小时的早餐时间也到了，是不是就可以结束了。我们还要看地形。”

待翻译完后，邓司令说：“谢谢苏联同志招待我们吃了一顿很好的早餐，我很高兴。我们按计划还要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即起身走出他那个小餐厅，与苏联顾问握手告别。所谓的早宴，就只有几个罐头，几片面包，一小碟鱼子酱，一杯炼乳冲的牛奶，我的肚子还没有吃饱。

在座的朝鲜同志听了邓华司令员这一席话时，表情很惊讶。出来后，那位陪同的朝鲜少将对我说：“我们都以为苏联给中国人民志愿军武器装备是无偿援助的，没有想到你们是记账买的苏联武器，这真使我们难以理解。你们真是无私的援助我们，更使我们对中国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敬佩与感激，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同志们更加热爱。”

七、朝鲜咸镜北道的领导赶到罗津，为邓华代司令员举行最后的欢送。我们告别朝鲜，回到祖国的图们

上午，我们在罗津看完了地形，回到旅馆时，出乎我们意料，朝

鲜咸镜北道党委书记和道委员长在旅馆门前迎接邓司令员。

邓司令对他们突然地出现感到很吃惊。一边与他们紧紧地握手，一边问道：“书记同志，委员长同志，我们在清津已经告别了，你们怎么又到罗津来了呵！”

党委书记说：“司令员同志离开清津后，我们即向平壤作了报告，金日成首相指示我们一定要到罗津最后欢送邓司令员，我们是奉领袖的命令专程赶来欢送司令员的。”

邓华司令员非常诚恳热情地说：“非常感谢金首相的关怀，真是不敢当。”

中午饭是按正式宴请贵宾的规格进行的。

朝鲜劳动党咸镜北道党委书记致了热情洋溢的欢送词。

邓华司令员也即席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

宴会在极为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当最后告别时，朝鲜同志热情地含泪拥抱了邓司令员。

邓华司令员也热情地与朝鲜同志拥抱告别，并再一次地特别请道委书记转达他对金日成首相的敬意与感谢之情。

轻油车到达朝鲜南阳后（即图们的对岸），我们要在这儿与陪同的朝鲜人民军少将与上校告别。临下车时，朝鲜陪同的少将和上校向邓司令敬礼、握手告别，并讲了很多依依不舍的话。我送他们下车后，要翻译将一路上多余的罐头、熟食、大米和面粉等食品交给他们，他们非常高兴，紧握着我的手对我说：“杨处长同志，您想得很周到。说老实话，我们不带食品，就要饿着肚子回平壤，真谢谢你们了。”我也紧握着他们的手说：“祝你们顺利地返回平壤。”

邓华司令员也下车与朝鲜陪同的少将与上校告别，向他们表示谢意。对这次从朝鲜东北部回国，朝方安排得很好，再次请他们向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转达他诚挚的谢意。

我们登车后，陪送的朝鲜两位同志在车站向邓华司令员敬礼告别，并不停地挥手，直到他们看不到我们，我们也看不到他们。

傍晚，我们的轻油车即驶上了图们江铁路桥，快速地回到祖国的图们。我们事先没有通知地方党政机关，只请东北军区通知延边分区

和图们驻军，他们在图们车站迎接了邓司令员凯旋回国。

车到达图们后，我很自然地想起了，邓华司令员是1950年10月19日下午从安东铁路桥，乘吉普车跨过鸭绿江，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3兵团进入朝鲜抗美援朝，今天，是1954年4月6日黄昏，邓华以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兼代政委的身份，从图们江的铁路桥乘轻油车回到祖国的图们，他在朝鲜协助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3年近6个月的时间，胜利凯旋回国。

八、邓华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功勋卓著，名垂千古，建立的卓越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从第13兵团开进到鸭绿江边后，邓华司令员发挥了他超人的智慧与组织指挥才能，在洪学智副司令等兵团首长的协助下，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内，迅速整顿了各军，恢复到准备打仗的状态，完成了各军由和平转入战时，由打国民党军转到打世界上第一流的美军的思想大转变。这在当时难度是很大的，如果没有邓华为首的兵团首长坚强的、正确的领导与指挥，是很难做得到这么快，这么好的。我是当事人，又是在他们领导下，具体执行的一员，是亲身感受到的。

彭德怀同志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1950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同一天，第13兵团与彭总所带领的指挥班子，在朝鲜大榆洞组建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中央军委任命邓华为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从此邓华就成为彭总的第一助手，很好地协助彭总从始到终，指挥整个抗美援朝战争。

彭总对邓华是很器重的，重要的作战会议与主要方向的作战，都委派邓华去代表他主持或指挥。第1次战役结束后，志司召开的作战会议，即由邓华作主报告。第2次战役后，彭总决定在38军军部召开西线各军军长参加的作战会议，志司已有韩先楚副司令在38军，但彭总仍委派邓华代表他去主持召开这次会议。第4次战役主要方向东线的反击作战，即委派邓华组织“前指”去指挥东集团的战役反

击作战。第5次战役第2阶段结束后，彭总即委派邓华率领西线先入朝的几位军长回国，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汇报和请示朝鲜战争等重大决策问题。1951年7月与美方开始停战谈判时，彭总委派邓华为人民志愿军首席代表。到8月下旬，停战谈判由于美方的破坏，谈不下去了，主要靠战场上来解决问题，彭总即将邓华调回志司，协助他指挥整个朝鲜战场的作战和粉碎敌人空中的“绞杀战”。

1952年上半年，彭总和陈赓同志先后回国后，中央军委命令邓华任志愿军代司令兼代政委，担负起指挥志愿军的全部责任。

1952年下半年，美国新当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企图向朝鲜西海岸实施登陆作战，妄图想以登陆作战来结束朝鲜战争。当时我大军调集西海岸，西海岸成为主要方向。1952年12月彭总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令代理志愿军司令的邓华去朝鲜西海岸兼任中朝军队联合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负责组织指挥准备西海岸抗登陆作战。

邓华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很善于从实战中总结经验，将实践上升到理论，再指导实践。他在这方面的论述与著作是很多的。如《对美军作战的初步经验》（1951年1月8日）一文，这是他经过入朝作战3次战役后写成的。他精辟地分析了敌军的特点，明确提出了我军作战指导方针，以及我军作战战术上的几个问题，论述的很详细具体，因为他兼志愿军的副政治委员，在这篇论述中还对我军政治工作提了几个问题，对后勤供应问题也有论述。

《论朝鲜战场持久战》一文，这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经过5次战役后，他及时地总结第5次战役的经验教训，在1951年6月下旬，志愿军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他分析了志愿军入朝8个月来，经过5次战役的情况与经验教训，对如何实行持久作战的方针，对今后进行战役进攻和反击作战，根据敌人的特点及以往的经验，必须注意的问题，对如果停战谈判破裂，可能发生的情况，如果战争持久打下去，如何使敌人的有利因素，转变为不利因素，使我军的不利因素，转变为有利因素等问题，都作了精辟的论述。

在朝鲜战争敌我双方都转入战略防御后，邓华同志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对如何组织阵地防御，如何巩固阵地及如何依托阵地组织反击

作战消灭敌人，都及时总结了经验，指导部队，他的主要论述有《调整部署，加强纵深工事，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这是他在1952年6月，在志愿军党委召集的兵团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他论述了对停战谈判的估计及我军作战指导方针；调整部署，加强我们打击敌人的机动力量；加强纵深工事，完成整个防御体系。

他代理志愿军司令和政委后，于1952年11月30日，在志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积极防御作战的若干战术问题》的报告，精辟地论述了防御组织问题；防御作战问题；对坚固阵地的攻击问题。这些都是他从实战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论述的非常详细和精辟透彻，并指挥各兵团、各军运用到反击作战中去。

他在组织指挥正面夏季反击作战中，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指导各兵团、各军指战员提高战术思想水平，使攻势越打越顺利，越打越大。

1953年4月，邓华同志提出《关于举行夏季反击战役的几点意见》。在这篇论述中，对举行夏季反击，在战役指导上，提出了10个问题，征求志愿军其他领导和各兵团领导同志的意见。然后于4月30日志愿军党委召集各兵团领导干部开会进行讨论，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都同意邓华同志提出的《几点意见》。

他于1953年5月，又作出了《举行夏季反击战役准备工作的补充指示》。对夏季反击战役的目的；如何选择攻击目标及作战；关于兵力部署；战役中弹药使用；战术问题等五个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明确的论述。并指导各部队根据具体情况，运用到夏季反击作战中去，特别是运用到金城战役反击作战中。

在组织准备抗登陆作战时，邓华同志研读了很多外国有关登陆和抗登陆作战经验的书籍，他综合了各国军队作战的经验，集中研究了抗登陆作战问题，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和独特的见解。

1952年12月，志愿军党委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部署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邓华同志在这个会议上作了《当前反登陆作战准备的任务》的报告。他分析了当时的敌我情况，提出了加强海防部署问题；关于抢修道路与加强运输问题；关于为了完成反登陆作战准备

的任务，必须做好后勤保障的保证问题，等等。

1953年1月间，他在朝鲜西海岸看地形并视察了各军的海岸防御后，于2月9日在西海岸指挥部召开师以上干部作战会议上，作了《反登陆作战战术问题的研究报告》。他首先分析了敌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登陆作战的情况，然后提出了：反登陆的防御组织原则；反空降问题；反战车（注：即坦克，当时我们叫战车）、反登陆艇问题；向登陆之敌实施连续反击问题等。

邓华同志不仅善于指挥地面诸兵种的联合作战，当我空军投入作战后，即对空军作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独特精辟的见解。他于1952年5月，到安东（现丹东）空军指挥所，调查研究半个多月后，即向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彭总（彭已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写了《在安东空军指挥所了解的对空斗争情况及意见》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提出了：主要力量及作战方针问题；战场问题；力量准备与空军建设问题；空军情况掌握问题；加强高射炮、探照灯问题等。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志愿军党委于9月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停战后的工作，邓华同志在这个会上作了《停战以后继续备战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对今后朝鲜局势作了估计；提出了我们的备战方针和几项主要的准备工作。

邓华同志在1953年10月，向中国人民第三次赴朝慰问团作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三年来的胜利》的报告。他对抗美援朝战争作了全面性的总结。讲了三年来的作战情况；三年来的胜利；我们是怎样克服了困难，战胜了敌人。

1954年1月，邓华同志回国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全面地作了《抗美援朝战争经验的介绍》的报告。阐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特点，作战指导上的体会，以及若干战术问题。

以上我只列举了邓华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主要论著，至于他到各兵团、各军、各兵种视察时或参加作战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发出的无数的电报与指示，都充分显示了邓华司令员在现代战争中的高超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素养是很高的。

在朝鲜战场，我军在运动战阶段的连续5次战役，在转入战略防御后，我军巩固阵地防御及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的完成，后方反抗敌人空中绞杀战的斗争，正面防御由小到大的反击作战，发展到战役规模的上甘岭之战，以及最后的大规模的金城反击战役，都浸透着邓华同志的心血，和组织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才能。

由于邓华同志很好地很有力地协助了彭总的全面指挥作战，得到了彭总的高度信任。1952年4月彭总奉命回国后（其中陈赓同志只代理了2个月司令就回国了），即将指挥抗美援朝战争的全付重担都交给了邓华同志。即使到1954年3月，中央军委调邓华同志回国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之职，仍让他保留志愿军代司令和代政委之职。1954年9月，彭德怀同志正式请辞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职务，这时邓华已任沈阳军区司令员近半年了，中央军委仍任命邓华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直至1954年10月才任命杨得志任志愿军司令员。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邓华同志很有力地很好地协助了彭总的指挥，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并与彭总建立了深厚的同志感情。正因为此，在1959年庐山会议，邓华同志受到了最大的株连，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当时邓华同志年仅49岁，正是年富力强，政治思想水平军事理论水平都很高，又有文化知识，善于接受新事物，是我党我军最优秀的高级将领之一。可是一受迫害竟达18年之久。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8月他才出来。这时的邓华司令员已被折磨得身患重病，已经是67岁的老人了。邓华司令员复出后，我很想去北京看望他老人家，因他到南方治病去了而未看成。没有想到老首长竟于1980年7月3日病逝于上海，享年仅70岁。

我有幸能在邓华首长的直接领导和教诲下工作10年，感到非常自豪。1959年庐山会议，老首长蒙受不白之冤，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残酷的折磨，使老首长过早病逝，噩耗传来，我悲痛已极。我痛哭谆谆教导我成长的老首长，痛哭我党我军失去了一位栋梁将才。

敬爱的邓华司令员的一生，是为人民光辉战斗的一生，他为党为人民所建树的赫赫战功，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伟大功勋，以及他为人的高尚品德和风范，将永远光照人间。

第 十六 章

彭总两次指示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

一、陈赓副司令员第 1 次领导我们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

1. 彭总指示：要及时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并指定由陈赓副司令员负责

1951 年 7 月以后，我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连续 5 次战役后，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根据当时敌我情况，决心转入战略防御，持久作战的方针，敌人也因各种困难无法克服，不能向我实施进攻，也转入战略防御。由于朝鲜是个半岛的特殊地形条件。敌我双方都采取阵地对峙的战略防御。

1951 年 7 月 10 日，敌我双方开始停战谈判，但敌我双方都一方面调整部署，一方面构筑工事，巩固防御阵地，仍然准备在战场上比个输赢。1951 年 9 月，志司进驻桧仓后，当年冬季，正面战局相对稳定。

1951 年 11 月下旬，彭总考虑到利用这一短暂相对稳定的战局，及时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彭总与志愿军其他首长商量后，其他首长都赞成彭总的意见，认为很有必要总结前一阶段战争的经验。彭总说：“既然你们都同意总结经验，那么由谁来负责呢？”当时邓华副

司令虽然已从开城回到志司，但还有可能要回到开城参加谈判。洪学智副司令员已到后方勤务司令部去工作了，韩先楚副司令员要到西海岸新成立的指挥所去，宋时轮副司令员才到职不久，解方参谋长是志愿军谈判代表已到开城谈判去了。大家想来想去想不出由谁来负责。

彭总说：“就请陈赓同志负责吧。”

陈赓副司令员说：“彭总既然指定要我负责，我就不好推给别人了。但是，我要说明，我来朝鲜时间不久，前几次战役都没有参加，不了解整个情况，如果总结不好老总你可不要批评我呀！”陈赓同志很幽默，既有大将风度，又爱开玩笑，也只有他敢在彭总面前说开玩笑的话。

彭总对陈赓同志说：“又不要你写，是要你负责，要你领导。你陈赓同志我们大家都知道，都了解，黄埔军校一期的高材生，你一定能总结得好。就这么定了，你去准备人马，只组织一个小的写作班子就行。”

其他几位副司令副政委都拥护彭总的点将。

陈赓笑着说：“既然老总点了我，你们各位又都同意，我只有一票，少数服从多数，我就负责干，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事要找你们几位，你们可要支持我。”

几位副司令员说：“陈副司令的指示我们哪个敢说不执行。”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2. 陈赓副司令员让我组织人员具体负责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的工作

陈赓副司令员找我去，对我说：“小老乡（注：我们都是湖南人），彭总让我负责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彭老总的意思是要组织小班子来写，我也认为组织小班子写好。人多了，一是没有地方住，更没有地方来写；二是人多嘴杂，吵来吵去拖延时间，杨迪，你熟悉情况，请你提出个具体意见来。”

我说：“陈副司令，利用现在冬季，正面战事不紧张这段间隙来总结抗美援朝经验太好了。首长要组织小班子来写，我很赞成，我建

议这个小班子有5、6个人就可以了。”

陈副司令不等我说完就说：“小老乡，你说小班子5、6个人就可以了，你这个意见正合我意图，那你说要哪些人来呢？要一个顶一个，不要有吃闲饭的，我可不管吃闲饭的人。”

我说：“副司令，我建议调各兵团司令部的作战处长来写。一是他们最了解首长的意图和部队的作战情况；二是这些同志都是一个顶一个，有一定水平，都能写，一个也不是吃闲饭的。”

陈副司令说：“你报报姓名，我听听，看看行不行。”陈赓同志捏着指头等我报名。

我说：“第3兵团司令部作战处长王振夫同志，第9兵团作战处长金冶同志，第19兵团作战处长原星同志，第20兵团作战处长杨尚德同志，我正在想着原来的第13兵团是谁来合适一些。”

陈赓同志迅速说：“你点的这4个同志点得都很好，那么最先入朝作战的第13兵团，没有兵团了，那点谁好呢，点你自己那不行，你是志司的人了。”这时我已经想好了。我说：“我想调第40军司令部作战科长尹灿贞同志来参加，行不行？”

陈副司令说：“原第13兵团的人你都熟悉。好！就这5位同志。”

陈赓同志接着说：“各个部队都有人了，再加上你一个，共6位同志，正好你说的5、6个人。”

我说：“我也参加吗？是不是由丁甘如处长参加合适一些。”

陈赓同志笑着说：“你这个小老乡啊，脑袋瓜子想的还很多，你情况很熟悉，你不仅参加，而且我决定这个小班子由你负责。我只是原则领导，你具体组织实施。”

陈赓副司令又说：“人选就这样定了。你通知各兵团就说彭老总要我陈赓负责，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我要抽调他们的作战处长来写，谁也不准讨价。不仅人要来，而且要将作战的资料都带来。要他们一个星期内来志司报道。其他的生活安排就是你的事了，我不管，你准备好后，告诉我来检查。人员到齐后，告诉我来看看他们，就这样定了，你去执行吧！”

陈赓副司令说话很幽默，很有风趣，在幽默风趣中很轻松很果断地把问题处理完了。

陈赓副司令员向我交代任务后，我即告知了丁甘如处长，随后我即去选择地点。因为在电话中我通知各兵团作战处长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向我提出，不愿意钻到矿洞里去写，请我在矿洞外选择一处能够防空又能够工作、生活的地方。我与这些处长都很熟悉了，他们也就不客气地向我出难题，既要工作又要考虑他们的安全，两方面都要照顾到，这个地方很不好选。

我选择离矿洞不远，隔一个小山的矿山原放炸药的炸药库，这个炸药库是在一个小山沟里，四面还有厚厚的围墙，围墙内有一间放炸药的矮小房间。我看这个地方很好，就去请陈赓副司令员来看看，请他确定。

陈副司令看后，对我笑着说：“小老乡，你真会选地方，这个地方比较隐蔽，又不太潮湿，房间里还有地板，你把他们请来是享福，还是写总结？”

我也笑着说：“陈副司令，他们提出了条件，要我找个舒适一点的地方，我看了几处地方，还是这个地方较好一些，以免这些同志来尽挑毛病，影响他们思考问题。副司令，您是知道这些大参谋可不好侍候啊。”

陈副司令说：“好，就在这里吧，在房间里多开几个窗户，一是白天阳光足，二是敌人的飞机要光临，你们也好跳窗户躲一躲。你还可以挖几个防空洞以防万一，可不要把这些宝贝炸了，如果万一他们挨了炸，我就不好向那些兵团司令交待了。”

停了一下，陈副司令还是笑着说：“一切工作条件，包括吃饭、睡觉等都由你负责安排，如果你安排不好，他们有意见，我就当着他们的面打你的屁股。”

3. 陈赓副司令员对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方针、原则与要求

1951年12月上旬，各兵团司令部的作战处长和第40军作战科

长都来到了志司，我把他们安排到炸药库住下。他们对我开玩笑说：“你要我们住到炸药库，是不安好心，是想把我们一起都炸掉呀！”我笑着说：“不只是炸掉你们，还有我呢，我也到这里来一起住，准备和你们同归于尽。”

第19兵团原星同志说：“玩笑是玩笑，杨处长安排的这个地方，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得多了，我们住在绿树成荫的土围子里，环境优美，又幽静，又安全，真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呀！”

我笑着说：“老原，我建议，我们之间不要称什么处长处长的，我现在宣布，在这个土围子里我们都是同志关系，都不要称职务官衔，称老金、老杨，这样就更亲切更随便一些。好不好？”

大家都说：“好，这样随便松弛一些，也好思考问题。”

第20兵团杨尚德同志与原星同志原来都是华北野战军的，互相熟悉。也笑着对原星说：“老原，你刚才说什么我们住在绿树成荫的土围子里，我怎么没有看到呢？请问，现在是什么季节？”

大家都哈哈大笑，原星并不示弱，回答说：“老杨，你怎么不知道有长青不老松呢，我们是在松树林里嘛！松树是不管春夏秋冬四季常青的。”

我们正在热闹着，陈赓副司令进来了。大家就停止了说笑，站起来立正，我即说：“陈副司令，我想把他们安排好后，再去请您来，他们刚到齐，还有点乱七八糟。”

陈赓副司令说：“我问秘书，大家是不是都到齐了，秘书告诉我，都已到齐，我就来了，你还讲那么多规矩干什么。杨迪，你给我介绍认识认识。”

我即一位一位的向陈赓副司令介绍。陈赓同志与他们一一握手，并对每一位同志都简要地询问了几句。

陈赓副司令说：“大家先坐下，我们现在认识了，就开始工作，好不好？”

陈赓副司令说：“这次请你们来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是彭总的决定，彭总历来很注意及时总结战争经验的，志愿军入朝作战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经历了5次战役的运动战阶段，入朝5次战役是以

运动战为主，各种作战形式都运用了，而且都打的很好。特别是在没有制空权的条件下，利用夜间作战，近战歼敌。在后方供应不上的极困难的条件下，连续作战克服了难以想像的困难，发挥了我军的长处，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军以劣势装备，在没有空军支援的条件下，消灭了大量有海空军优势的现代化装备的敌人，迫使敌人撤退到三八线，不得不提出停战谈判，这是个很了不起的伟大胜利。

停了一下，陈赓同志接着说：“现在敌我双方都转入战略防御，处于面对面的阵地防御，我军以劣势装备不仅在运动战中打败了敌人，而且现在正在尝试着以劣势装备实施阵地防御。从今年6月，第5次战役结束后，到现在已经5个多月了，我军在阵地防御中顶住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并正摸索如何巩固阵地，保存自己，歼灭敌人。现在阵地防御作战时间虽然很短，但已经开始创造了很多很好的经验。”

陈赓副司令说：“现在召集你们来总结战争的经验，不仅要总结前5次战役的经验，也还要总结阵地防御初期的经验。你们都知道，总结经验的目的是，就是遵照毛泽东主席所说的，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与国内红军时期的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不同，我们是以劣势装备，与世界上第一流的现代化的、拥有海空军绝对优势，又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败了德、意、日法西斯军队，自称天下无敌的美国军队作战，这个经验是十分宝贵的。所以彭总提出来要总结经验，既用于指导我志愿军继续与美军作战，又可用于国内部队吸取这场现代战争经验，改进与提高我军军事训练的质量。我讲了这些，就是这次总结经验的目的。”

陈赓副司令喝了一口茶水，接着说：“至于怎么来写总结呢？我这几天就是考虑琢磨这个问题。我想首先要将在朝鲜内战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为什么要支持南朝鲜李承晚（伪总统）向北进犯侵略朝鲜。我党中央、毛主席及时果断地决策，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正确和深远的意义写出来。这不仅包括军事战略，而且是政治战略的决策；包括对敌我双方的战略企图，敌我力量的对比等等。因此，我想总结这场战争的经验，主

要从战略的高度，从战略的角度来进行总结，不要只是写第1次战役打到第5次战役是怎么打的，也就是说不要就战役总结战役，要从战略的角度、高度来总结5次战役的经验。我想这是要总结的总的指导思想。”

当陈副司令停顿喝茶时，我就说：“陈副司令，我听是听明白了，但您说的这样高的指导思想，从战略高度来指导写战役，我可没有这样的想过。您这个要求太高了，我怕达不到司令的要求，完成不好任务。”

陈赓副司令说：“杨迪，你怎么想的，我说的这个水平并不高，我刚才讲了这是一场战争，既然总结一场战争的经验，不从战略上写清楚，又怎么能写好战役呢？自从朝鲜内战打响以后，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下令组建东北边防军，邓华同志率领第13兵团，开赴东北鸭绿江江边，你就随邓华同志来了。我那个时候还在越南呢，你还不了解战略意图？你不要带头叫苦，叫苦也不行。”

我说：“陈副司令，请首长不要误会，我这不是叫苦，我们这些同志没有战略水平，过去写战斗总结和战役总结都是就每次作战情况写的，都是写的什么：战前情况和任务，决心和部署，作战准备，作战经过，经验教训这一套，首长说要从战略高度、角度来写，我一听就把我吓住了，因为我没有写过战争经验总结，而且战略上的情况我们很多不知道。”

陈赓副司令说：“你们在总结经验中要注意，对有损中朝两国两军友好团结的话不要说，更不能写，要以团结友谊为重，你们要千万注意。”

我说：“副司令，我一定认真好好学习，领会司令的指示精神和意图，和同志们一起完成好写总结的任务。”

第3兵团作战处长王振夫也表示同意说：“陈副司令，你在第3兵团当司令兼政委时，要我们总结作战经验，也只是要我们从战役角度来写，也没有说过战略呀！”

陈赓副司令听后笑了，说：“你们这些年轻人真是年轻，用我们湖南的土话说，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嘛，我当兵团司令，是战役范围的

事，就只能讲战役方面的问题，现在是在志愿军司令部这个山上，志愿军是战略军团，这比兵团哪个山又高又大，这是代表彭老总来总结战争经验，就必须讲战略。”

其他几位同志说：“陈司令您开始那么一讲，真把我们吓了一跳，我们真的从来没有考虑到从战略方面写战役，司令给我们上了战略学与战役学这一课使我们头脑开窍了。”

陈赓副司令笑着对我说：“杨迪，他们的脑壳都开窍了，（注：湖南土话头脑叫脑壳）你这个脑壳开窍得怎么样？”

我说：“司令，我明白了，脑壳开窍了。”

陈赓副司令继续说：“都明白就好，我再重复一下，我们这次总结，必须从战略高度，战略角度来写，才能总结出水平来，才能达到彭总的要求，千万不要写成战役、战斗的经验总结，这是指导方针，你们必须弄懂、弄明白以后才能下笔写。”

陈赓副司令接着说：“怎么写呢，杨迪，你想了没有？”

我自受领任务后，我是想了怎么写，但我这是第一次在陈赓司令员直接领导下工作，还不熟悉他的思维方式与工作方法（如果是在邓华、洪学智、韩先楚首长面前，我就敢说了）现在陈司令已将意图说得很清楚了，我想他已经胸有成竹了，我怕说出来不对他的思路，就回答说：“司令，我还没有想好，请您把您脑壳里想的都说出来吧，就不要考我了。”

陈赓副司令说：“你这个小老乡，跟我要心眼呢。好，不考你啦。我的想法是：首先写个总章，就是我开始讲的，将这场战争是怎么由朝鲜内战发展到美国出兵侵略朝鲜，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出兵抗美援朝的，然后再写战役，写每个战役时，一定要将当时敌我双方的政治、军事和战略意图、战场情况简要的写清楚，然后再写战役的发展情况。朝鲜战争有情况特殊，第5次战役后出现了一个停战谈判，这要单独写一章，这是世界战争史上没有的创举，敌人打不赢，就要求停战谈判，战争一边谈一边打，这很有特殊性。敌我双方都转入了战略防御，而且都采取阵地防御的方式，这也是世界战争史的新记录。但这个过程刚开始几个月，还看不准规律性的经验来，可以简单

的写。据我判断，战略防御阶段时间短不了，是持久战，等到以后再总结吧。当然要把这场战争中，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的战略反击阶段的经验教训，要很好地总结出来，这是重要的。”

陈赓副司令停了一下，又说：“还有一种写法，就是写一章总论，然后，综合分几个问题来论述。我脑壳里想到的都倒出来了，以后想到什么再说。你们可以将我所说的这些意见，根据你们所想的结合起来，好好研究讨论，先写出个提纲来我们再研究，好不好？”

陈赓副司令停了一下又说：“呵，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写战争总结，一定要实事求是，既不扩大也不缩小。打胜仗要写，打得不好的仗也要写，经验要写清楚，教训要写透。还有就是不要争功，要注意团结，各个兵团都是来自各个野战军，而且都是各个野战军的主力，一定要注意照顾到各军，不能偏颇，要站在志愿军总部的立场上来写，可不要站在你们兵团的立场上来写，要站好立场，这样才能写出志愿军的总结来。”

大家都说这样好。我还说：“我们一定遵命，争取以较快的速度研究出提纲来。”

陈赓副司令说：“你们这个小写作班子，由杨迪负责。怎么分章，由谁负责写哪章，都由杨迪负责与你们商定。原则是：既要分工又要合作，你们来自各个野战军，各有各的写作风格和方法，你们要商定好，一定要写成一个风格，文字上可不能各唱各的调，这就由杨迪来抓总了。”陈赓同志带笑指着我说：“小老乡，你如果不把这个小合唱组，唱歌唱得很和谐，唱成一个调，一个韵律我就打你的屁股。”

同志们都笑了。我说：“这几位同志都是各野战军的精兵强将，我一定很好地向他们学习，我们一定很好的合作，唱成一个调子。请首长放心。”

陈赓副司令员还对我说：“杨迪，你不仅要负责好总结写作工作，而且各方面的保障工作也都由你负责保障好。特别是伙食要保证，在现有条件下让他们吃好一些，注意他们的身体，请医生常来看

看，不要生病，使他们能高高兴兴地、很健康地集中精力来思考和写作。”陈副司令对在座的同志们说：“如果杨迪的保障工作没有做好，使你们吃不好，屋内的炉子不暖和，使你们挨冻、生病，你们就向我告状，我就收拾他。”陈司令诙谐风趣的讲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我笑着说：“司令，我这份差事可不好干，你又要打我的屁股，又要收拾我，我干不了，我辞职好不好。”

陈赓副司令笑着说：“不批准辞职，不好干，也要干好，我相信你会干好的。”

我说：“司令，既然不准我辞职，还必须干好，那我只提一个条件好不好？”

陈赓副司令说：“你还向我讲条件，好大胆呀！什么条件？”

我说：“正因为我胆子小，我才提条件哩，只是请求司令对有关部门给我们说几句话，以免其他部门说我们闹特殊。我也好去找他们解决问题。我保证我们能遵照首长的意图，尽可能快地将总结写出来。”我对在座的几位处长说：“你们说我向司令员下这个保证，可以不可以，这还得你们都同意才行。”他们都说：“你提的这个条件，司令一定会答应的。至于我们么，都能保证按时按质量完成任务。”第9兵团金冶还说：“陈司令，我们6个人一定唱一个调，请首长放心。”

陈赓副司令员听后，很高兴，说：“你们几位齐心协力，集中精力，快速度高质量写好总结，我当你们的后勤部长，有困难找我。其实你杨迪在志司去找哪个部门，哪个部门都会帮助，会支持你的，还需要我去说话吗？”

我说：“司令，我可不敢自己随便去找各部门办事，您得授权给我，准许我打您的旗号，去请他们帮助解决问题。当然请司令放心，我从来不会打着首长旗号去胡作非为。”

陈赓副司令说：“谁还不相信你。我给各有关部门说一声，你就拿着我的鸡毛当令箭吧。”

我笑着说：“陈司令，你的令箭可不是鸡毛，而是‘虎符’。”
同志们都笑起来了。

陈赓副司令说：“今天第一次和你们见面，现在该讲的都讲了，我看你们个个都很年轻很精干的，我很高兴，我的信心就很足了，相信你们能写好，从现在开始进入工作，以后我会经常来的。”

我们送走了陈赓副司令，就议论起来了，大家都只听说陈赓副司令员对部属很随和，爱开玩笑，今天初次见面，就像是老首长与老部下交谈。在谈笑风生中，把这次总结经验的目的、指导方针、原则和要求都讲得很明确了，大家心里都感受到了首长对我们的信任与无微不至的关怀，心中热乎乎的，对写好总结都信心十足。

4. 我们在“炸药库”里聚精会神地写总结，5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征求意见稿

我们6个人组成的小写作班子，将陈赓副司令员的指示，认真学习和讨论了两三天。

我对几位处长说：“陈副司令的指示，我们现在基本上领会了，我建议现在用几天时间看材料，你们带来了本兵团和各军的材料，我也要志司作战处将各次战役的材料分类准备好，我们可以用10天左右的时间看材料，在看材料的后期，可以一边看材料，一边思考怎么写，请各自写出一个提纲来，我们集体讨论。从研究、讨论提纲中，就可以从大的方面统一认识，多费点时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讨论提纲。这样安排行不行？”

几位同志都发言说：“现在就按你说的开始干，待看完材料后，胸中有数了，我们进入情况后，再研究研究。”

我们6个人讨论编写提纲很认真，争论起来也很热烈，我们都是作战处长，只要进入情况，思考能力是很强的，各方面思考的都比较周到。

我把大家讨论的意见整理出来，形成了一个初步总结提纲。

陈赓副司令员看了我们经过集体讨论，形成的总结提纲后，他亲自来到我们这个“炸药库”。陈副司令说：“你们干得真快，而且干得不错，我仔细看了你们编写的纲目，基本上同意你们这个纲目。纲目好是好，到底还是纲是标题，还没有内容，谁知道你们脑壳里是怎

么想的。我的意见是你们每人先写出一节来，一是看看你们脑壳里想的与这个提纲是不是一致；二是看看你们各路诸侯的写作方式和写作风格是不是一致。这就叫试写吧，写出来后，你们先讨论，互相取长补短，把写作方式和风格统一起来。”

陈赓副司令又很幽默地说：“对每人写出的这一节，要研究讨论是不是站在志司的立场上写的志愿军的总结，可不要写成某个兵团的经验总结啊！”

听了陈副司令很有风趣的讲话和指示后，我们都表示一定遵照陈副司令的指示，各写出一节来，用具体的事例，来统一认识，统一风格，统一写作方式。

陈副司令表扬我们说：“你们这段时间不长，干的很好，提纲也对路，我看按你们这个速度明年（1952年）上半年就可以写得差不多了。你们一方面要抓紧，一方面也不要太累了，这是用脑子的事。”

陈赓副司令转向我说：“杨迪，生活保障得怎么样？我说的不仅是要吃好一些，而且要注意休息好。我说的休息好，不仅是睡足觉，年轻人躺下顾不上想老婆就睡着了，还要尽可能注意运动，锻炼身体，没有玩的，可以搞个排球来玩。还可以用木板钉一个大一点的长桌子，打乒乓球玩。志政有一个京剧团、一个文工团，如果演戏，还有祖国慰问团来演出，杨迪，你一定要他们送票来，而且要送位置靠前一些的优待票。脑子休息好了，你们的精力就充沛，总结经验的工作，也就会完成的更好、更快。你们说我这个辩证法对不对？如果生活调节不好，你们向我告状，找杨迪是问。”

大家听了陈副司令的表扬，又得到陈副司令从生活上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体贴，都发自内心的高兴与感激，都说：“我们一定写好总结，我们6个人，相处的越来越熟悉，也就越来越融洽。说老实话，杨迪同志对我们照顾得很好，看演出场场没有落下我们，而且都是坐在前几排，伙食比我们在兵团吃得好。”

第9兵团金冶同志最爱喝酒，他冒出一句：“老杨只管我们吃好，不管我们喝好。”

陈赓副司令听了说：“金冶，你是宋时轮那个兵团的，宋时轮是顿顿少不了酒的酒桶，你这个作战处长跟你的首长学会了这个特点呀！”陈赓副司令即转而对我说：“杨迪，你得想法子搞点酒给能喝酒的小酒桶解解馋。你知道吗，唐朝诗人李白，只要喝了酒才能写出好诗来。你弄点酒来，给他们喝一点，他们就会写出好总结来。但要立个规矩，只准每个星期日喝酒，而且只给一到两瓶，如果没限制，你们准会喝得醉醺醺的，就不能写了，而睡大觉了。”

大家听了都乐了。

我们的总结工作进度相当快，经过每人试写一节，统一写作的思想内容，也统一写作的风格与方式，分工负责，有条不紊地很紧张地进行写作，由于我们几个同志都是这场战争的参加者，所进行的战役、战斗刚刚过去，在每个人的脑海里，都还很清清楚楚，只要稍微一回想，都历历在目。因此，写起来也就好写多了，进度也逐渐加快。

1952年开始后，我们6个人都商量好，2个月内将初稿写出来，谁先写好了，就先讨论谁写的。我们研究讨论修改后，就送陈赓副司令审阅，采取流水作业。

我向陈赓副司令汇报后，他同意我们的意见。

1952年1月下旬，也就是春节前，我们即把《抗美援朝战争的几个战术问题》共写了7章的初稿大部分都写出来了，我将写出来的交给陈赓副司令去审阅时，陈赓副司令很高兴地对我说：“杨迪，你们几个同志的工作效率还真高呀，2个月的时间就将初稿大部分写出来了。同志们真够辛苦了，用脑子的工作是很累的，快过春节了，要不要放假休息几天？”

我说：“陈副司令，我们写得是比较紧张一些，但是我们6个人相处的很好，我们采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方法，白天集中精力写，吃过晚饭后，因电灯线牵不到我们这儿来，柴油机发电也带不了这么远，晚上点蜡烛，灯光太暗，还怕一不小心将蜡烛弄倒了，把写的稿件烧了。因此，我们晚上不写，而是谈谈写作中遇到的问题，互相探讨一些问题。或者谈一些各部队的情况，互相交流一下。如果志

司矿洞里有晚会，我们是每场必去看。因此过的很愉快，大家也没有要放假休息的意思。回到部队也不能休息，还有作战各方面的工作在等着他们干哩。回国去休息吧，各兵团的留守处都在原来各野战军所在地，很远，还不够在路上走的时间哩。大家的心思是争取早日写好后，早些返回部队，估计开春后战场上又会更紧张了，作战处的工作会更多更忙。”

陈赓副司令听后说：“你们这样干很好，你们不过春节，我也不过春节。走，我去看看同志们。”

陈赓副司令来到“炸药库”。有的同志还在写稿子，有的同志在修改自己写的稿子。陈赓副司令进屋看到这种情况，很高兴地说：“同志们辛苦了，”大家一听是陈赓副司令员的声音，都站起来了，不约而同地回答道：“为人民服务，首长好！”

陈赓副司令高兴地说：“你们在两个月之内就将大部分初稿写出来了，你们送给我的稿件，我都看了，写的还算不错，刚才送去的我当然还没有看。初稿嘛，就是感到有些写得粗一些，还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好好琢磨推敲，再经过修改，我看会改的比较好的，你们认真地改好后，我再看一看，就可以送给彭老总和志司其他领导同志审阅了。”

陈赓副司令接着询问说：“刚才听杨迪说，你们没有想要放春节假，不休息，连续作战，这是真的吗？”

同志们回答说：“是真的，我们不想休息，想快些写好后，返回部队，参加春季后可能发生的较大作战。”

陈副司令眯着眼睛笑着说：“你们不一定是真心话，真的不想趁着初稿完成又是春节，赶快跑回国内去团聚，那多好。年轻人嘛，如果你们真想回国去与老婆孩子一起过春节，我批准你们回国，一个星期好不好？最多不能超过10天。”

大家都回答说：“请首长放心，回国不回国那是小事，现在整个志愿军都在紧张地进行战争，都没有假，我们怎么能现在休假呢？我们很理解司令对我们是很关怀的，我们一定不会辜负首长的关怀，集中精力完成好任务。”

陈赓副司令员说：“看来你们的觉悟都还蛮高，对工作都很负责，为了工作，为了作战，即使想家也不去想家，都够作战处长的资格。好！我同意你们连续作战，争取早日完成送审稿。”

在陈赓副司令的亲切关怀指导下，我们的心情都很高兴，我们脑子里的思维更灵活、更敏捷了，我们共同研究讨论，改好一章即送文印室去打印。

我们将修改好的一章，送陈赓副司令审阅，陈副司令看了很高兴，对我们说：“你们这样修改就比初稿好多了。我看这次可以作为送审稿，打印出来后，送彭老总和志司各位领导同志，还有志司、志政等有关部处，各兵种指挥部，还要发给各兵团、各军，征求他们的意见，过一段时间，将意见集中后，再请你们来会稿，将各方面好的意见吸取进来，再作修改，就算正式的抗美援朝战争战略反击阶段的经验总结了。”

我们听了后，很高兴。遵照陈赓副司令的指示，继续进行认真的修改。可是，情况发生了变化。

1952年4月7日，彭总奉命回国治病，后来即在北京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由陈赓同志代理志愿军司令兼代理政委，他要抓全面的作战指挥，就没有精力顾得上这个经验总结了。

陈赓同志代理志愿军司令员和政委后，来到“火药库”，对我们说：“我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继续审阅你们的修改稿了，但我已看了几章，都改得很好。你们就这样修改，共同研究后，即可打印，按原定计划，作为征求意见稿送审。你们有什么问题，仍可以找我。”

我们于1952年6月初，全部结束了这项工作。我向陈赓代司令员报告后，我即请参加写作的各兵团司令部作战处长将发给他们所属各部队征求意见稿带回去。不属兵团指挥的军，由志司寄出。

1952年6月11日，陈赓同志又奉命调回国，由邓华代理志愿军司令员兼代政委。

第一次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征求意见稿的再修改工作，也就放下了。

5. 新年除夕，陈赓副司令员亲自给我们组织舞会，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太幸运了

1951年12月31日除夕。我们晚饭会餐后，因为志司没有组织大的文化娱乐活动，我们几个同志正在玩扑克牌。

陈赓副司令吃完晚饭后，到我们这儿来看望我们。他进门后看到我们在玩扑克，就向着我说：“杨迪，你知道不知道，今晚是过年除夕，你们这儿怎么冷冷清清，也不组织娱乐活动，让大家热热闹闹的过除夕嘛。”

我说：“司令，志司没有组织晚会，我们就打扑克玩赶猪哩，我已经被罚几次了。”

陈赓副司令说：“志司不组织大型晚会，各部门各单位也会自己组织着玩，你不可以组织小型晚会吗？”

我笑着说：“司令，我组织打扑克也是小型晚会，准备玩到半夜哩。”

陈赓副司令说：“这样玩太不热闹了，你不组织晚会，我来给你们组织跳舞晚会，玩热闹些。”

我说：“我打听消息了，志政文工团都下部队去慰问演出了，组织不起跳舞来。”

陈赓副司令说：“你怎么变傻了呢，没有文工团就不能跳舞吗？司令部的打字员、译电员、报务员是有女同志的，再找一位拉手风琴的，这舞会不就组织起来了嘛！”

我笑着说：“这样的舞会只有您司令下令才能组织。司令虽然给了我令箭，但我可不敢用这个令箭，要机关各处派女同志来和我们跳舞。”

陈副司令就要警卫员去给文印室、机要处、电台打电话，要他们各出两名会跳舞的女同志，快到“炸药库”来（志司的同志们都知道这儿是我们写总结的地方），要直工处长派一名能拉手风琴的同志和一位打鼓的同志来。

我们听了陈赓副司令这样调遣，都很高兴，司令亲自给我们组织

舞会，就在“炸药库”跳，使我们感动得简直要欢呼起来了。我高兴地对几位处长说：“不要高兴的发愣，我们赶快换一套干净的衣服，不要一身臭气，还要穿上皮鞋。”我还要警卫员们，将床和桌子都靠墙，让出大一点的空间来。

不一会儿，6名女同志和拉手风琴的同志都来了，陈赓副司令对几位女同志说：“请你们来与这几位同志一起过除夕，跳舞，热闹热闹。”拉手风琴的同志带小鼓来了，说找不到打鼓的同志了。

世界上罕见的，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有趣的故事发生了。

陈赓副司令对拉手风琴的同志说：“你拉手风琴，我来打鼓，他们跳舞。”

我们和那几位女同志都极为高兴，极为感动，兴奋得不知所措。

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赫赫有名的独当一面的大将，为了使咱们这几个无名小卒除夕过得欢乐，不仅亲自给我们组织跳舞晚会，还亲自给我们打鼓点，这在现在是不可思议的。就是在当时的我们也是很难为情的，我们有什么资格在陈副司令的击鼓下跳舞呢？手风琴拉起来了，陈副司令员很懂得音乐韵律，鼓点敲响很久了，就是没有人开始起舞呢。陈副司令看到我们这种冷场的情况也急了，大声地说道：“你们怎么不下场跳舞呢，我打鼓没有打到点子吗？告诉你们，我对音乐可不是外行呀，鼓点一点也没有打错，赶快跳吧，不要让我白打了。”

我们说：“司令亲自为我们打鼓，我们怎么敢跳呀！也不好意思跳呀！”

陈赓副司令对我说：“杨迪，跳舞也由你负责，你带头跳，你不跳，我就用鼓槌打你的脑袋瓜，快跳！快跳！”

我笑着说：“司令总想锤我，那我就跳啦，你们也跳吧，不要成为我独舞了。”

这样，大家很欢乐地跳起来了。

中间休息时，我对陈赓副司令说：“司令，你的鼓点打得真好，能使跳不好的，跟不上乐曲的，都跟的好多了，什么都靠指挥好。司令您怎么不跳呀？”

陈赓副司令说：“什么玩的我都会，这是在上海做地下党工作，我所干的秘密工作必备的条件与知识，以便于以各种身份出现在各种场合合作掩护，但是也是因为做地下工作养成的，不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不进舞厅，进了舞厅也不跳舞，要小心上女色的当，而且我两腿都负了伤也不能舞。”

我听陈副司令这么讲的很传奇，很有趣，就想继续问下去。他看出来我想再问，他不想在大家玩高兴的情况下，来讲这些事。就说：“好了，不讲这些了，你们好好跳吧，我还是给你们打鼓，可不要小看打鼓，打鼓是乐队的指挥，很有意思，我在音乐的韵律中，一样得到了美的享受。”

这场非常有意义的，非常特殊的世界上仅有的舞会，一直跳到半夜，我们仍然跳得很欢乐，但是看到陈赓副司令还在打鼓，我们怎么能再跳呢？我说：“司令，请看手表，现在正是午夜 24 时，我们全体同志向司令拜年了！”大家都停止了跳舞，很自然地到陈赓副司令面前向他敬礼鼓掌、拜年、祝贺新的一年的到来。我们和陈赓副司令共同送走了战斗的 1951 年，又与陈赓副司令共同迎来了新的战斗的 1952 年，大家热烈鼓掌欢呼，都是发自内心的感谢陈赓副司令对我们关怀爱护，共同祝福陈赓副司令身体健康。

我们请陈赓副司令回去休息，陈赓副司令说：“过年要吃饺子，杨迪，你是不是准备了饺子？如果没准备，我又要用鼓锤打你了。”

我笑着说：“司令，我已经想到司令想要锤打我，为了防止挨打，早就让食堂准备好饺子了，请司令和我们一起吃饺子了，辞岁迎新。”

警卫员们提了几个饭盒进来，大家一起吃饺子，我找了几个没有破皮的好饺子，用碗盛着送给陈赓副司令，陈赓副司令高兴地吃着。

我们感到由衷的荣幸与幸福，能和我们敬爱的陈赓副司令员共度除夕，令人兴奋不已。那几位女同志也没想到能和志愿军副司令员一起过除夕，她们高兴地也不拘束了，都围着陈赓副司令说说笑笑，陈赓副司令讲笑话逗得她们乐得嘴都合不拢了。

我看已过午夜了，就宣布；除夕同乐晚会到此结束，敬祝陈赓副

司令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同志们都快健康。

陈赓副司令说：“祝同志们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胜利！”

我们送走了陈赓副司令，并要我们的警卫员分别将女同志送回去，我们回到房间后，大家简直是手舞足蹈地闹开了，金冶同志向我要酒喝。他说：“这时要是酒助兴，那就太好了。”我说：“我没有酒，有酒也藏不住，早被你‘偷’喝了，现在半夜三更，我到哪儿去搞酒哇，你就老老实实睡觉吧。”

6. 陈赓副司令员与我们共度春节，我请陈副司令讲他的传奇故事

1952年1月26日，是我国农历春节的除夕。

我告诉管理员，今晚除夕会餐，给我们“炸药库”多炒几个好一点的菜，并给三瓶白酒，使各兵团来的处长们在志司好好地过个春节，这也是我们志愿军入朝参战后，能安稳地过的第一个春节。1951年的春节，我们志愿军正在“三八线”以南地区进行第4次战役，根本忘记了过春节的事。

下午4时左右，出乎我们意料，陈赓副司令来到我们“炸药库”。大家见到陈司令除夕之夜来看我们感到特别的高兴，现在我们已经对陈副司令无拘无束了，见到陈副司令都感到很亲切，很自然地围到他的身边来了。陈副司令笑哈哈地说：“今天是我国春节的除夕，送旧迎新。在朝鲜我们都是单身汉，大家都不能回家团圆，这是战争的需要，没有什么可说的，都习以为常了，我今晚来和同志们一起吃除夕年夜饭，你们欢迎不？”

这更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原只以为陈副司令吃饭前来看看我们，就感到很高兴，很满足了。现在陈副司令要和我们共度除夕，我们几个人高兴地跳起来，说：“司令，你总是想着我们，一方面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感激，我们几个无名小卒，过新年时，司令为我们组织跳舞，并且亲自打鼓，到现在我们的心还是热乎乎的，这一辈子也是忘不了的，今天是农历新年除夕，司令又想着我们，来和我们吃团圆

饭，使我们永远感到荣幸、幸福。”

陈赓副司令员说话最幽默有趣，一边装模作样地用鼻子嗅着，一边说：“你们谁是山西人，把醋瓶子打翻了，满屋子醋酸味。”

我们都明白了。都笑得特别开心，开玩笑地说：“杨尚德是山西人，是他带的醋瓶子打翻了。”杨尚德笑着说：“刚才谁说的话多？我也闻出一股味来了，可不像是醋酸味。是一股清香味。”

我说：“司令，刚才我们大家说的都是真心话，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对司令的尊敬和感激之情，这股味，正像刚才杨尚德说的，是一股纯清的香味，是我们几个人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

陈赓副司令指着我说：“你说的比刚才大家说的还酸，还更酸臭。”

大家起哄地说：“司令，您鼻子可能有毛病，我们闻着真是很香甜呵！”

陈副司令也大笑了。这是首长与下属真挚纯洁感情的交流。是多么感人肺腑呵！

我们把用木板钉成的写字桌抬两张拼起来，放在中间，把给陈副司令准备的椅子放在上方，我们6个人围坐在左右和下面三方，警卫员将打来的菜盒摆上，酒也拿出来了，饭碗就是酒杯。

陈赓副司令说：“今晚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过除夕，我和同志们一起吃团圆饭，我很高兴，你们总结写的又快又好，你们辛苦了，向你们表示谢意。我破例稍微喝一点点，你们可以放开量喝。金冶，你不是很想喝吗？今晚你就好好的多喝几碗。像《水浒传》中武松过景阳冈那样喝都行。酒不够，把我床底下放的祖国慰问团送的几瓶酒都给你们拿来。”随即端起倒了酒的碗，与我们碰“杯”，我们都赶快站起来，与首长碰“杯”。

我说：“我们几个人写总结，能够较快较好地进行，主要是由于司令经常地、及时地、明确地指导，开导我们的脑壳，使我们从战略上、战役上的认识有了较大的提高，写起来就顺多了。因此，不是首长谢我们，应该是我们谢首长，我们6个人有幸参加这次总结，等于是首长给我们办了一个军事理论学习班，亲自给我们讲课，谆谆教

海，两个多月来使我们在军事理论上、知识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过阳历年，首长给我们组织舞会，今天过农历年除夕，首长又亲自和我们一起吃团圆饭，我们真是感到荣幸与幸福，我们真心诚意地敬首长一杯酒，敬祝首长健康。”

大家都说：“老杨讲的话，都代表了我們，我们很感谢司令，我们共同敬司令的酒，敬祝首长春节愉快，身体健康，干杯干杯。”

陈赓副司令哈哈大笑说：“怎么这酒中又带有醋酸味了。好，谢谢同志们，干杯，呵，不对，是干碗。你们喝干，我只能喝一点点。”

大家高高兴兴地吃着喝着。

陈赓副司令一边吃，一边看我们一碗一碗地喝酒，还笑着一边与我们随便聊天。我知道陈赓副司令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有名的黄埔三杰之一，听到过很多陈副司令的传奇故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想趁着这个机会向陈赓副司令提问，请他将他的传奇经历讲给我们听，陈赓副司令平常对自己的经历是从来不讲的，有同志问他，他也不说，今晚他高兴了，又是除夕，因此，我们问他什么，他就告诉我们。我们没有问的，他就不讲。现在有关陈赓大将的传奇事迹的著作与电影、电视剧都写出来拍出来了，但是他们都是间接访问或从档案资料中查找出来的。而我们几个同志是当时听陈副司令亲自对我们说的。

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想知道陈赓副司令员是怎么救过蒋介石的命的。

陈赓副司令说：“那是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在广东第二次东征讨伐叛变的军阀陈炯明。周恩来和何应钦率国民革命军第1师打海丰，蒋介石的总指挥部率第3师行动。我当时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当连长，带着一个连警卫蒋介石。第3师与陈炯明的主力林虎部遭遇，在华阳打上了，第3师一打即败，蒋介石急了，就跑到前线去督战，也不顶用，全师溃散。蒋介石是总指挥，对我说要自杀成仁，我劝他不要自杀，这个部队的军官不是黄埔军校训练出来的，不是你的学生。我们撤退到安全地点，再收拢部队，还可以再打。蒋介石听了我的话，借坎下台阶，不自杀了。但这时他已吓得直哆嗦，连路都

不能走了。我看敌人已离得很近了，情况太紧急了，就背着他跑，跑到一条河边，把蒋介石送上一条船，我就组织卫队顶住追击的敌人，掩护蒋介石过河。我把蒋介石送过河，领他跑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样就救了他这条命。我的右腿在打惠州时负了伤，我在背蒋介石时还没有全好哩。”

我们正听得入神，陈副司令就不讲了，我随即问：“以后呢？”

陈赓副司令说：“以后的事多着哩，我救了他的命，蒋介石就调我当他的侍从参谋，可以自由进出他的官邸。当我知道了蒋介石发现我是共产党后，我就向他辞职，他放我走了。”

我又问道：“司令，您怎么以后又被蒋介石捉了呢？”

陈赓副司令说：“1931年我转到鄂豫皖苏区，在红四方面军任师长，1932年在七里坪战斗中右膝负重伤，红四方面军向四川转移时，我走不动，于1932年11月，我转到上海治伤。1933年3月在上海被叛徒出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因我是要犯，被押往南京。由于宋庆龄女士到蒋介石那儿把蒋介石大骂了一顿，说他忘恩负义，陈赓救过你蒋介石的命，你才有今天，现在你捉了陈赓，还要杀他，你蒋介石每天讲的礼义廉耻到哪里去了？这样，蒋介石就不敢杀我，把我押到南昌，亲自和我谈话，企图劝降我，也没有成功，又送回南京国民党监狱，1933年5月底，被地下党救了出来，经上海，我又到了中央苏区。”

我还想问陈赓副司令，他到南昌与蒋介石见面的情况。

陈赓副司令笑着说：“你们要审查我的历史呀？不说了。”

我说：“司令，那就请您给我们讲讲在上海做地下党工作的故事，好不好？”

陈赓副司令总是带着开玩笑的口语和我们说话。他笑着瞪着眼睛看着我们说：“你们是要我给你们说书呀！那我就讲一件我在上海陈赓捉陈赓的故事。”

我连忙说：“那太好了，真是新鲜的故事。”

我们静静地听着。

陈赓副司令说：“我因为参加南昌起义后，左腿负伤很重，经广

东的潮州、汕头转到香港，1928年4月转到上海治伤。上海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要我参加中央特科工作，一直到1931年。我那几年在上海与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大头目交‘朋友’，利用这些家伙为我们党供给情报。地下党还要我和上海有名的大流氓头目杜月笙，以及他的青帮大小头目交‘朋友’。我还和英国法国在上海租界巡捕房的巡捕们打交道，上海的三教九流我都打入进去，了解情况，收集情报。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戴笠发觉了我，下令通缉我，通缉令还送到英国巡捕房，请他们协助抓我。因为我对外不叫陈赓，改姓王，他们不知道我就是陈赓，英国巡捕房还下令给我，要我去抓陈赓。”

听到这儿，我们大家都大笑起来，真太有趣了，我们急着请陈赓副司令继续说。

陈赓副司令说：“我暴露了以后，党中央认为我再在上海工作，就很危险了，周恩来同志命令我赶快转移，我于1931年6月离开了上海，转到天津，陈云同志又令我到鄂豫皖苏区。”

我又问：“司令，上海解放时，您正率领第4兵团在江西作战，还指挥我们第15兵团作战，我们从中央的广播中，听到您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一直到现在我还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呢？”

陈副司令听我这么一问，就笑了。他说：“这个秘密你们谁也不会知道，只有周恩来、陈云同志和陈毅同志知道。我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时，组织上要我去与上海大流氓头子也是青帮大头目杜月笙交朋友。我与杜月笙关系处得很好，杜月笙在上海黑社会是很有势力的。通过他，上海的三教九流都知道我和杜老板的关系不一般。上海解放前，地下党要杜月笙留下，他说他不会到台湾去，也不想留上海，要到香港去度晚年，可以看出他与蒋介石的矛盾。上海解放后，为了稳定上海的局势，稳住上海的三教九流，使国民党留下的特务，不敢闹事，中央就要我当上海市挂名的公安局长。我的名字对上海三教九流起了镇住的作用。杜月笙在香港，还通知他的徒弟徒孙们不要闹事，并要他们配合公安局长陈赓，抓国民党留下的地下特务。你们听，这是多么复杂的斗争，也是很有趣的斗争。”

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我插话说：“司令，您这些经历真是非常传

奇呀！在我们党内、军队内大概只有周恩来总理和您有这么多的经历。您文的武的、地上的地下的各种各样的工作都干过，又有这么多传奇的事迹。”

我随口又问道：“司令，您是什么时候参加党的呀！”

陈赓同志说：“我是黄埔第一期的，杜聿明还是我的兵哩，我在1922年就加入共青团了。”

我啊哟一声说：“司令，您参加革命时我还真的没有出生哩！您的资历真老呀！”

陈赓副司令笑着说：“在现在的志愿军内，没有比我参加革命还早的哩。”

我又问道：“司令，别的首长都很敬畏彭总，你怎么就可以和彭总开玩笑，现在只有你经常和彭总一起吃饭。”

陈赓副司令又笑着说：“这也是秘密，彭老总是和我在湖南军阀军队的一个班当兵，以后我跑到广州去考黄埔军校，他留在湘军中当官到团长。我们是老乡又早相识。抗战时，我又在他的领导下，他知道我的特性，我也知道他的特性，你们不要看到我可以和彭老总开玩笑的一面，还要看到我很尊敬彭老总。他可算是我党我军内头号正直的人，我很敬佩他总是把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顾全大局，勇挑重担；他为人刚正不阿，直言不讳，敢作敢当。我们之间共性很多，我们都是革命事业的乐观主义者。”

我们不约而同地发出惊喜的啊声。

这时，陈赓副司令突然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好像身体很健康，我自己也注意锻炼身体，但是我知道我活不过60岁，你们信不？”

我们听后大吃一惊，陈副司令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呢？我立即说：“司令，你刚才还说你是乐观主义者，又很注意锻炼身体，我还听说司令一年四季都是洗冷水澡，您怎么说过不了60岁呢？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一百个不信，像您这样的乐天派，能活100岁！”

他用低重的声音说：“信不信由你，你们可以看到我的预言的。”

我们什么话也不好说了，仍以为是陈副司令故意说的笑话。这时已近深夜，我们请陈赓副司令回去休息。

1952年的春节除夕，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幸福之夜。

1961年，我在北京军事学院（注：即现在的国防大学）学习，听到了陈赓大将于3月16日在上海病逝，享年仅58岁。我情不自禁地泪水夺眶而出，我党我军这样久经考验的、总是独当一方面的领导者陈赓大将，果然英年早逝。他是为党为人民，将他的毕生精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作出了最大牺牲的领导者之一。他在各条战线上所创造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共和国的史册，他的英雄形象永远活在后人的心中，我们永远怀念着这位敬爱的首长。我突然想到1952年春节除夕，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他对我们讲的他活不到60岁的话。为什么他对自己有这样准确的预见呢？这个谜，永远也解不开了。

二、邓华司令员在沈阳领导我们再次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

1. 彭总指示：由邓华同志负责，全面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 还指示：“不准写我彭德怀”

1954年9月，军委总参谋部在北京组织各大军区首长、司令部战役集训，邓华司令员4月份才到沈阳军区任职。他趁赴北京参加战役集训的机会，去看望彭总。邓华司令员从彭总那儿回来，对我说：“彭老总说，1952年在朝鲜由陈赓同志负责组织写的抗美援朝经验，那一次总结是写的战略反击阶段5次战役，运动战时期的经验，当时因刚转入战略防御不久，对阵地作战只写了开头很短的一段时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阵地防御作战时间达2年时间之久，我军从战略防御作战中，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而且粉碎了敌人从空中向我后方的进攻。入朝参战的部队也很多了，轮番作战经验是很丰富的，而且抗美援朝战争是现代化战争的经验，应该很好总结。”邓华司令继续说：“彭总说，我在沈阳现在还兼着志愿军司令员和政委的职务，沈阳与朝鲜很近。因此，彭总要我负责组织编写抗美援朝战争经验。并说，战争已经结束了，就要作全面的总结，趁着战争刚结束不久，可从参战各军抽调人员来写，都是参战者有作战经验，也熟悉战争情

况，由这些同志来写，要好写多了。将参加同志集中在沈阳写，有地方住，写作班子的人员可以比在朝鲜时较多一些。不仅要总结战役的经验，而且要总结那些典型的有代表性的战斗经验。至于怎么搞法，要我确定。彭总最后还说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领导指挥的，是全体志愿军指挥员、战斗员英勇战斗取得的胜利，不是我彭德怀的功劳，你们写总结不准写我彭德怀。”

邓华司令员说：“其他都好办，就是彭总不让写他，他是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不写他怎么指挥的，这个总结怎么好写呢？”

我说：“司令，您当时没有向彭总提出这个意见，不写他这个总结就不好写了。”

邓华司令员说：“我提了，彭总说，我已讲了，再提也没有用，就是不准写我彭德怀。这真是叫我犯难了。1952年陈赓同志领导你们写时是怎么写的。”

我说：“1952年陈赓司令领导我们写总结时，彭总没有提出不准写他。我们就按实际情况，应该写到他的地方都写了，我们认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必须要写到彭总，因为他是司令员兼政委，不写彭德怀司令员的名字，那志愿军是谁统帅的，是谁指挥的，每次战役是谁下的决心呢？每次战前、战后作战会议是谁主持的？毛泽东主席来的电报、指示、命令，开头就写了彭总，有的电报还是只写彭总，我们向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电报以及下发的指示和命令，也是首先就写了彭总，后面就是你们几位首长的姓了，有的电报也是彭总单独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的，对外发布的新闻，也是写的彭总的名字，朝鲜停战协定是彭总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签的字。这个总结怎么样写也离不开彭总的名字，否则群龙无首了。我认为该写彭总名字的地方还是要写，这不是突出彭总的问题，是实事求是的写战史。”

邓华司令员说：“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向彭总说了，彭总就是不听，坚持不准写他的名字，说是集体领导的、集体指挥的，不是他彭德怀一个人的功劳，写缺点和错误就应该写他彭德怀，失误的事，就可以写他的名字，他要负主要责任。这真是个难题呀，你想想看，

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为好。”

我说：“司令，你是不是再向彭总提一次意见。”

邓司令员说：“杨迪，你向我提几次意见，还可以，我怎么向彭总反复提呢？这几年你还没有看到，彭总对自己的要求是多么的严格。这是因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了，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都在歌颂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功勋，彭总不愿听这些话。所以就提出不准写他，我们不要向彭总提意见了，再提意见，他也不会接受，可能还会要批评我，现在就是想个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

我考虑了一下说：“我们在朝鲜有时说志愿军首长，或志司首长，有些电报命令和指示，也是用志司的名义发出去的，志愿军各兵团、各军对志司这个名字也都接受了，认为这就是志愿军在朝鲜战争时的彭总的代号，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个习惯语‘志司首长’作为彭总的代名词，有些地方必须写名字的，还是要写到彭总的名字，这样行不行？这个问题只怕志愿军广大指战员通不过，首先是我们这个写作班子会通不过，还要您做很多思想说服工作哩。”

邓华司令员抽着烟，沉思了好一会，说道：“你提醒了我，在朝鲜我们用‘志司首长’，通常是作为对彭总的习惯用语，我们就用‘志司首长’与彭总的名字混合用，一般都用‘志司首长’，这样写，我们执行了彭总不准写他的名字的指示，但必须用彭总的名字，还要写彭总的名字，这样如果彭总还有意见，我也要据理力争了。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不准写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的名字，不仅对广大志愿军指战员不好交待，就是对全国、全世界人民也不好交待，对历史也不好交待，将来我们的子孙后代是要骂我们的，抗美援朝战争，这么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是谁统帅指挥的呢？为什么不明确写出司令员的名字来？这中间有什么原因？这不是给未来的史学家留下一个本来不难的难题吗？”

邓华司令员停了一下，坚定地说：“好，就这么定了，把‘志司首长’这个作代名词与彭德怀的名字并用，写作人员来了我向他们讲清楚。”

停了一会儿，邓华司令员又对我说：“今天只是向你讲明彭总的

意图，在朝鲜那次总结是陈赓同志领导写的，你具体执行的。这次你还要参加，并具体负责，你好好想想，看怎么来贯彻执行彭总的指示，等战役集训完后，我们回沈阳再研究，那时你把你的意见讲出来，我也想想看怎么总结的更好一些。”

2. 邓华司令员与我研究如何组成写作班子，以及写作班子的组成

回到沈阳后，邓华司令员把我找去，对我说：“杨迪，怎样来全面的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你想好了吗？我想先听听你的意见，你说说看。”

我说：“司令，自从您在北京向我讲了彭总的意图后，我反复考虑了彭总的指示，要全面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是很有必要的，也很适时的。1951年底至1952年上半年，陈赓司令员领导我们写总结，那时，因为不仅战争还只刚刚打了运动战5次战役，各方面经验还不算全面和成熟，同时，战争还正在继续打着，志司都住在山洞里，没有条件集中很多人来写总结，只有几个兵团的作战处长和我共6个人参加，而且第3兵团、第19兵团、第20兵团的同志刚入朝参战不久，因此，在当时来说总结的几本送审稿，有局限性，以后又没有机会再将征求的意见集中起来修改。这次作全面的总结，我想了些意见，供首长参考。我建议：组成一个编写领导小组。司令是当然的组长。本来我想建议请解方参谋长协助您更合适，但现在他是军事学院的副教育长，负责集训高级指挥员，不一定会抽出身来。因此，是不是可以请志愿军代参谋长张文舟同志来当副组长，具体负责领导总结工作的编写。在编写组下面成立一个办公室，建议由张文舟同志兼办公室主任，后来的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长，现任第54军副军长兼参谋长肖剑飞同志来任办公室副主任，我考虑要请总参谋部作战部来位处长，当办公室副主任，这样便于与总参谋部联系。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有些军已经分布全国各大军区，我们不好直接去与各军打交道，由总参作战部出面就方便多了。因为是在沈阳军区写，我就自荐当一名副主任，来管写作班子的生活等行政事情。办公室以下，再根据司令

的意图，分若干个大组、小组来进行具体的编写工作。”

我还说：“彭总说要我们全面总结，还说要总结两个战略阶段，又要总结典型战例。我建议写作班子要稍微人多一些，参加人员要有军、师、团三级领导干部和参谋人员，两个战略阶段各分两个大组，其中还要分若干个小组。典型战例，我想先列出一个战例单子来，研究哪些是典型战例，是哪个军打的，哪个师打的，就请有关军和师选送人员来写，他们是亲自参加的，知道情况更清楚。”

邓华司令员听了我们汇报后说：“这次我们的编写人员较多，你说只设编写领导组和办公室，这样不合适。要有一个编写委员会，我任编委会主任，可以借调张文舟来任副主任，肖剑飞、总参谋部作战部同志、还有你任编委会委员，再把参加写作的军的领导同志也参加编委会当委员。编委会下设办公室，做具体工作。再设若干个编写组。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可从志司调来，他们熟悉情况。组成几个编写组，待编写大纲写出来后，我们再研究确定组成多少个大组、小组，人员抽调同意你的意见，你和肖剑飞及总参作战部的同志，不要去管具体事务工作，而要集中精力研究和具体指导各编写组的编写工作，调解各编写小组之间对某些问题可能发生的矛盾，写到后期，你们要负责审稿工作，各编写组写出来的总结稿子，要统一写作风格，统一笔调。你的事更多一些，还要负责生活等，你提出的生活安排我同意，你可去向吴信泉、唐子安同志汇报，向他们讲清楚这是彭总交待的任务，他们两人也都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要他们大力支持，对他们说，我的意见要唐子安同志负责具体保障和支持这项工作。我也会在军区党委会上讲这项工作，要作为军区一项任务来抓好。请张文舟同志来及请总参作战部来人和调志愿军来人参加工作，我直接与总部商量。至于你的工作，不仅仅是搞好生活和行政保障，而且要以主要精力参加总结工作，抗美援朝战争你从始至终都参加了，情况你都知道了。呵，还要说一句，军区司令部作战处的大事你还要注意抓。”

随后，我即向吴信泉参谋长、唐子安副参谋长进行了汇报。吴参谋长即要唐副参谋长具体分管这项工作，要我有事解决不了的，就找唐副参谋长解决。

邓华司令员与军委总参及志愿军杨得志副司令员商定后，同意调张文舟同志（当时任军委装甲兵参谋长）、肖剑飞同志及总参谋部作战部谭旌樵同志来参加总结工作。

他们于1954年10月到达沈阳。

邓华司令员随即召集他们3人和我开会。

邓司令员说：“彭总指示要我来负责全面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这就需要集中一些同志来编写。我与军委总参谋部和志司商量，特请你们几位同志来具体负责领导编写工作。这次编写人员较多，需要组成一个编写委员会来领导，但编委会人员不要太多，太多了不便于商量问题，编委会我当主任，我的事太多不可能全力来领导，因此请张文舟同志任编委会副主任，由他来具体负责组织领导编写工作。肖剑飞同志、谭旌樵同志还有杨迪任编委会委员，主要就你们几个同志，如果有军的领导同志来参加，也参加当编委会委员。编委会下设一个办公室，负责编写工作的具体事宜，办公室组成主要人员可以从志司选调来，你们也都熟悉，志司的同志他们熟悉情况，对调来的编写干部，他们大部分也都熟悉。请你们研究一下调哪些人来。”

邓司令接着又说：“你们来了后，就首先研究一个编写大纲，这个大纲可参照在朝鲜时，陈赓同志领导编写的那个本子。大纲编写出来后，我们根据大纲，再研究具体组织几个写作组，抽调什么人来编写，抽调多少人为宜，抽调的人员都要能动手写的，根据需要定人，人员宜精不宜多。”

邓司令接着又说：“你们都熟悉朝鲜战争的情况，是不是在一个星期到10天内拿出编写大纲来，并将抽调人员名单拟出来，然后我们一方面调集人员，一方面继续研究编写大纲，张文舟同志，你看怎么样？”

张文舟同志说：“可以按邓司令员的安排来开展工作，肖、谭、杨这三位同志对情况都很熟悉，至于我自己抗美援朝战争前一段没有参加，是停战谈判开始后，于1951年8月入朝到志司代理解方同志工作的，到1953年4月又回国了，后半部又没有参加，肖剑飞和杨迪同志从始至终都参加了，谭旌樵同志在总参作战部了解整个情况，

这样主要靠他们三位同志，我将尽最大的努力来工作。在邓司令员的直接领导下，我相信我们的总结会写好的。”

肖剑飞和谭旌樵同志都表了态，在邓司令、张文舟同志领导下，努力工作，坚决完成任务。

我说：“我是本地人，就不说客气话了。我建议：我们将编写大纲研究出来后，写战略反击和战略防御两个大部分的人员从志司及各兵团、各军点名抽调。典型战斗部分，我们只提出战斗是谁打的，就从这个部队抽调人员来写，具体人员由各军提出出来后，经编委会审定认可。”

邓华司令员说：“请张文舟同志领导你们三位同志具体研究后，我们再讨论确定。”

会后，我即向张文舟、肖剑飞、谭旌樵同志汇报了军区在保证办公和生活等方面的准备情况。并领他们去看了办公和住处，他们都表示满意。

我们按时拟定出编写大纲并将各章编写组的负责同志及组成人员都提出了名单，各典型战例组编写人员则提出了从这个军和师调，并提出调来人员的条件。

邓华司令员听取了张文舟同志和我们的汇报后，表示同意。我们即分头与各军协商抽调编写人员。

各军收到彭总关于编写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指示的通知后，听说是邓华司令员亲自领导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都很高兴、很拥护。因此，抽调人员的事很积极，很认真负责地抽调了既参加过指挥作战，又能写作的师团干部。但是各军对抽调军级领导干部，都感到有困难，军级领导同志多数只能说，不能写，而且回国后，很多同志都到南京军事学院或高级干部文化学校学习去了。我们几个人商量后，就选调几个军的参谋长或副参谋长、作战处长来。编委会办公室，我建议调志司作战处作战科长孟照辉来当主任，他熟悉整个情况，干部他也认识。

我们将这些情况和意见，报告邓司令员同意后，很快将编写人员集中。共有团以上干部约 80 名。

3. 邓华司令员对如何全面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作了明确的指示

1954年10月底，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的编写人员到齐后，邓华司令员集中编写人员开了一个大会，传达了彭总对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的指示，然后他讲了总结的指导思想与编写的方法。

邓华司令说：“彭总下决心，集中这么多的同志来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是很及时、很必要的。你们都是亲自参加者、指挥者，都有直接的体会，这是我们写好总结最基本的、也是最好的条件。你们现在都是在职的，你们暂时不要想部队的工作，希望你们这段时间集中精力来写好总结，我们争取10个月左右的时间写出来，先把时间计算多一点，如果更快那更好，但主要保证质量，一定要写好，彭总认为可以了才行。”

邓华司令员说：“我想，我们这次总结，要把抗美援朝战争的特点写清楚，它不同于红军时期的国内革命战争，不同于抗日战争，也不同于解放战争，那是毛泽东主席所说的‘小米加步枪’的战争。解放战争后期我军强大了，也有了强大的炮兵，但同朝鲜战争来比较，就大不相同了。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现代化的战争，我们的敌人是世界上最现代化，又有海空军绝对优势的美国军队。他们开始骄傲得很，自称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无敌的军队。我们后来有了炮兵、高射炮兵、坦克兵、刚刚组成年轻的空军也在朝鲜清川江以北参战了，海军也打了一次进攻海岛的仗。但是，对整个战争来说，我军是以劣势装备和优势装备的敌人作战。又是在国外进行的一场战争，而朝鲜的地形条件是三面环海的狭长半岛，不能充分发挥我军大迂回、大包围和围城打援、打运动战的特长，只有第2次战役运用了从侧翼迂回作战，其他几次战役都是从正面突破，再卷击迂回包围敌人。加之，我军后方遭受敌机的狂轰滥炸，使我军后勤供应很困难，又不能就地取之于民，或取之于敌，这样就大大地限制了我军每次战役的作战时间。这场战争是一场立体战争，可以说没有前后方之分。敌人充分利用其空中优势，支援正面部队作战，也用最大空中力量向我后方进

攻，实行所谓的‘绞杀战’，给我后方运输供应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军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各兵种指战员在彭总、志司的指挥下，硬是战胜了敌人空中的‘绞杀战’。我志愿军得到了全国人民全力以赴的支援，得到了朝鲜人民的支援。我们进行的是正义战争，敌人是非正义的战争，因此我们还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与支援。”

邓华司令员继续说：“这场战争，打成敌我双方都采取战略防御，双方都转入战略防御的同时，又开辟了另一个战场，即停战谈判的和谈战场。双方一边打，一边谈，敌我双方都要争取战场上的胜利，来达到停战谈判对自己有利的目的。这样，在谈判桌旁，面对面地针锋相对地唇枪舌战；在战场上，面对面的真刀真枪厮杀，在两个战场上，同时进行了两年多的时间。经两年多在两个战场上的较量，敌人在战场上的较量，被我军打输了，我军打赢了。我军从战略防御中由开始的被动，逐渐转入主动，最后完全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迫使敌人不得不急于要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这种敌我双方都以持久的阵地战略防御与停战谈判相结合地进行，时间达两年之久，这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创造了世界新纪录。”

邓华司令员说：“我现在只讲个大概。这场战争的特点一定要写好，还一定要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怎样取得胜利的作战指导思想要写清楚。”

邓华司令员停了一下，又说道：“朝鲜战争证明，现代战争一定要有必需的现代技术装备，现代战争的胜利决定于正确的作战指导——正确的战略决策、战役决心、战术指导，和全体指战员的机动灵活、英勇善战，以及强有力的后方保障。这几个方面是密切结合的、不可分的。抗美援朝战争证明：战役的组织，要认真考虑和善于掌握一些重要的环节，比如运动战阶段、5次战役的决心、部署，怎么打，打了之后怎么办等等，都由志司直接掌握指挥。阵地防御战阶段，怎么巩固阵地，如何依托阵地反击，都是由志司统一部署，小的反击在志司统一部署下，由各兵团、各军根据情况具体组织实施；而大的反击战（如1952年秋季反击作战、上甘岭、金城战役）则由志司统一部署与指挥。”

邓华司令接着对战役指挥、战术指导，后方保障等方面的总结都讲得很详细，提出了具体要求。

邓华司令员说：“我们写抗美援朝战争总结，一定要从战略高度来写，因为这是一场战争，战争是属于战略范畴问题，只有站在战略高度，才能把这场战争的经验总结好。”

邓华司令员说：“我们这次分成写战役方面的两个编写组，还有一个典型战例编写组，在这3个大组下，再成立若干个编写小组。写战役要从战略角度来写，写典型战斗就要从战役角度来写，就是认清这个战斗在这次战役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个战斗的胜利或失败对战役起了什么重要作用或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我们还要有个组研究、探讨敌人的战略、战术，并要单独写一章。”

邓华司令员强调说：“我们还要实事求是，对胜利的经验不夸大，对失利的教训也不要隐瞒或缩小。我认为还是按照我军历来总结经验的方法来写，写得实实在在，文字既简练又很流畅，不要写得长，写得厚厚的几大本，就会没有人好好看了。”

最后，邓司令说：“我相信同志们一定会写好的。”

4. 用什么方式总结，与南京军事学院派来指导写总结的教员产生了争论

经过20多天的准备，各组正在研究、讨论编写纲目的细则时，当时苏联派到沈阳军区的军事顾问知道我们在写抗美援朝战争的总结，于是想来“顾问”总结，遭到邓华司令员的婉言拒绝。邓司令向他们说明这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同志交待的，总结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任务，不是沈阳军区自己的工作，因此沈阳军区的顾问不便于参加进来“顾问”。

这些军区顾问就报告了北京的苏军总顾问，他们还是要想方设法参加进来，他们建议由南京军事学院，派中国优秀教员去沈阳军区参加指导。苏联军事顾问认为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应该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军反对德国法西斯作战的总结模式来写。

南京军事学院派教员来指导写作，邓司令员表示欢迎。我们原以

为南京军事学院来的教员，会和我们的编写思想一致的，可是这几位中国教员的来到，却给我们添了麻烦。

军事学院派来了三位教员到沈阳后，由我接待了他们。我首先把编写的提纲给他们看了，并向他们讲了邓司令员的意图，他们看了后，似乎不满意我们的编写提纲，第3天即向我们提出，他们想向编写人员讲两次课，我问他们准备讲什么课，他们说“一课讲战略学，一课讲战役学”。

我听后很高兴地说：“我们编写的同志，正需要学习学习战略和战役学，待我向邓华司令和张文舟参谋长报告后，再答复你们。”

我与肖剑飞、谭旌樵同志商量，认为可以让他们讲。我向邓华司令和张文舟同志报告，我说：“军事学院来的教员提出来要给我们讲两课：战略学和战役学。我和肖剑飞、谭旌樵同志商量了，我们建议可以听听他们讲的课，增长一些理论知识，对我们的写作可能会有所帮助。”

邓司令和张文舟同志表示同意，并说：“我们要尊重军事学院派来的教员，他们在理论方面比我们高明一些，我们写总结需要理论指导，请他们讲，我们虚心地向他们学习。”

他们讲了将近两天，是按军事学院战役系的教材讲的，讲的内容、方式都是按苏军那一套讲的，联系实际也都是苏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军向德军反攻作战中各个战役的战例。听后使我们了解了苏军进行战略反攻，战略进攻各个战役的情况，增长了现代战争的知识，对我们编写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是有参考价值的。

军事学院的教员讲完课后，对我说：“请你们拿出几天时间来学习讨论我们所讲的课，我们所讲的，是军事学院的苏联顾问编写的，是苏军的战略学和战役学，这对编写总结是有指导意义的。”

我听他们的口气很大，是要我们按苏军的战略学和战役学的模式来写我们的总结。我则不以为然地说：“教员同志，我们听了你们讲课，增长了知识，对我们编写工作很有参考作用。我们编写时间很紧张，你们已经讲了两天时间，我们不必要再用时间来讨论学习了。”

那几位教员听我们不讨论了，就很不高兴，立即对我说：“你对

苏军的战略学战役学是这样的态度，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我们是军事学院派来指导编写的，这是苏联军事顾问的意见。我们要求见邓司令，向他建议按苏军的样式来写。”

我说：“邓司令很忙，没有时间，如果你们有意见，就请向张文舟副主任说，还有我们各位编委同志讲，好不好？”

他们无可奈何，只好同意我的意见。

张文舟同志及我们编委委员们听了他们的意见后，张文舟同志做了一点让步，同意用两三天时间来讨论他们讲的课，但很委婉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说：“抗美援朝战争与苏军的战略反攻与进攻不同，我们不能按苏军模式写。”

这几位教员太迷信苏军的那一套了，把我军自己的一套都忘了，不要了，他们听了张文舟同志不同意按苏军那套写的讲话后，立即提出，坚决要求向邓司令当面去汇报。

我向邓华司令汇报后，邓司令说：“我没有时间与他们谈这些问题，他们快成书呆子了，我不和他们谈，白浪费时间。我同意张文舟同志说的，可以讨论他们讲的课。由你去和他们谈，仍坚持我所讲的，按我们定的方式方法来写，不要受他们那一套的影响。”

我说：“司令，请你找张文舟副主任谈一谈，你当面向他交了底，他也好说话，也使他好大胆领导我们的编写工作。”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要说明一下，当时国内各方面的工作，包括军队的工作，都是向苏联“一边倒”，什么都学苏联的，苏联军事顾问并不了解中国军队的情况，完全把苏军那一套硬搬到中国军队中来，我们有少数同志就是迷信苏军顾问那一套，如果有不同意苏军顾问的，就容易上纲到对苏联态度的高度上来。这几位教员不了解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作战情况，生搬硬套苏军那一套，张文舟同志和我们要顶是有顾虑的，很需要邓华司令员的明确支持。

邓华司令员找张文舟同志谈了以后，张文舟同志即召开一个各编写组参加的编委扩大会议（没有请军事学院的教员来参加），传达了邓华司令员的指示，说明抗美援朝战争与苏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反攻和进攻完全不同，我们仍按照已定的编写提纲和写作方法进

行。我们也不想与他们展开争论，这样就要花费时间影响我们的进度，不要受军事学院的教员影响，我们可以讨论他们讲的课，但仍按我们的计划进行写作。

哪知，这场争论，并没有到此结束。

5. 在两种不同指导思想、不同写作方法的矛盾中写成的总结

军事学院的教员看我们不听他们的意见，他们也说服不了我们，即派人回南京向军事学院战役系汇报。军事学院的苏联顾问仍坚持要按苏军的模式来写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他们并向北京的苏军总顾问汇报，北京的总顾问就向沈阳军区的顾问作了指示，要沈阳军区顾问（即军区司令员顾问）直接向邓华司令员说明他们的观点与要求。

这样，给我们写作班子带来很大的麻烦。

邓司令对我说：“你们口头上听军事学院的，但还是按我讲的写。”

军事学院来的教员态度更强硬了，他们说：“苏联军队的战略学、战役学是现代化战争最先进的军事科学理论，只有按苏军模式写，才能写出现代化战争的经验总结。”

为了减少与军事学院教员的讨论，张文舟同志和肖剑飞、谭旌樵同志对我说：“我们推举你专门和这几位教员打交道，我们好集中精力来写稿和审稿。”

我说：“你们还分给我写最后总结一章的任务。我不愿与他们磨牙，双方观点不同，讨论只有变成争吵，没有意思，浪费时间。”

张文舟同志说：“杨迪同志，这是在沈阳军区写总结，由你出面与他们讨论合适一些，你就勉为其难，不要让我们几个人都被他们缠住了。”

这样，我看推也推不掉了，只有承担下来，与这几位教员来“讨论”了。

在写作的结构上他们要我们一定按苏军写战役的模式写。我说：“我们是志愿军和苏军不同，而且苏军是从伊尔库斯克开始反攻，发

展到战略进攻。我军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入朝参战后，开始的战略反击阶段，并不是战略反攻，而是战役反击，经过5次反击战役后，我军并没有进入战略进攻，敌人也没战略败退，而是敌我双方都转入战略防御，而且这种战略防御，长达两年多时间，我军是在战略防御中，夺取战争主动权的。这就是与苏军不同嘛。”

他们说：“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反击，就是战略反攻，完全可以按照苏军的反攻战役模式写，我们在军事学院，苏联军事顾问就是这么教我们的”。

我与他们讨论、争论不知多少次，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他们就直接与编写各次战役反击的编写组的同志说，要按他们的模式写，并对各次战役写出具体的编写提纲目录来，甚至还写出一次战役反击的样本来，使各编写组的同志很为难，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张文舟同志与我们商量研究说：“这样僵持下去，不好，可以参照他们的提纲目录来写。”

他们还说：“首先是强调统帅的作用，要突出写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苏军的每次战役都写了斯大林在战略上的指挥，各个方面军司令员在战役上的指挥，比如朱可夫元帅等等，因此，我们要写毛泽东主席在战略上的指挥，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对每次战役上的指挥。”

我说：“你们这个意见很好，我们是想这样来写的，这个问题我们之间没有分歧。战略指导和各次战役指挥的决心、命令和各种作战指示，我们都是如实写了，但是彭总已经明确向邓华司令员指示了，总结中‘不准写我彭德怀’。彭总就是不让写他，而且是不可改变的。我们没有办法，就研究了一个写彭总的代名词即‘志司首长’。请问你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好呢？”

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他们不仅在写作风格、方式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而且对我军条令条例上规定的军语，也要我们改用苏军条令、条例上规定的军语来写。比如：我军写作战经过，苏军不叫经过，叫战役实施，战役交战；我军向敌发起冲锋，苏军叫冲击；我军打退敌人的冲锋，苏军叫

反冲击；我军叫反登陆，苏军叫抗登陆；我军叫防御阵地，苏军叫防御地带等等。

我向编委会汇报后，在当时对苏联“一边倒”，什么都要学苏联情况下，连邓华司令员也不好办了，就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在写作格式上，采用苏军的格式，但内容仍按我军的具体情况写。军用名词可改用苏军的名词，因为我军用的这些名词也不都是我们自己发明创造的。

我与军事学院的教员就是在不断争论中来讨论每章每节的，至于我主笔写的最后一章“总结”，我仍是按我们的写法写的，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

我们就是在两种不同的写作指导思想与写法的矛盾中写成了总结。

《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于1955年8月完稿，编写出了简史、战例、战术经验总结、敌军研究等四大本。其中，简史那本共写了4章，即战争的概述、战略反击、战略防御和总结。邓华司令员当面向彭总作了汇报，彭总表示基本上同意，并亲笔题写了《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的书名。

这本《总结》，我认为最大的遗憾，是因为彭总“不准写我彭德怀”，因此整个《总结》中，很少直接提到彭德怀司令员的名字。我认为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决策和战争发展的各个重要时节，都是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英明决断，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并经过中朝两党两国商定，还指挥着朝鲜人民军、即中朝联军，打败了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不可一世的、最现代化、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收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迫使美国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彭德怀同志的伟大功勋是不能磨灭的。

彭总不让写他自己，这最充分说明他的高尚的道德品质与高尚的情操。人们常认为“居功不傲”就了不起了，而彭总是有大功而不要功、不要名，这比“居功不傲”的高尚品德与情操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呵！

那次总结还有一点遗憾，就是由于苏联顾问的插手使我们写出的总结有苏军模式、格式的影子，没有能够完全按照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实际情况写出来。

另一方面，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还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是受当时形势的约束。那时战争刚刚结束，一些情况，特别是上层的情况，还需要保密，我们编写人员都不了解，即使有一些了解，在当时情况下，也不能写。这就使我们的编写工作受到很大的限制。但这是必要的，就是历史学家对时代条件的限制也承认它的合理性。

对整个的总结，是应该肯定的，是写得比较好的。是由战争的当事者亲自写出来的，他们情况熟悉，又有亲身感受，写出来的总结是真实的、准确的。

我们《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编写委员会及全体写作人员，在邓华司令员和张文舟同志的领导下，经过近10个月的努力，全面地总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浴血奋战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经验，为以后编写《抗美援朝战争史》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第十七章

朝鲜战场上敌、我两军的统帅

我这本书的书名是《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既然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就应该很突出地写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德怀。在前面的各章里，虽然写到了彭总，也尽可能地写到彭总的指挥艺术。但还不够集中、突出。我写志愿军副司令员、参谋长较多一些，因为我与他们工作、生活更接近，写起来很自然。为什么与彭总接触较少呢？这是因为成立志愿军司令部时，由彭总带来的丁甘如同志担任作战处长，他主动向我提出，他的主要精力与工作在彭总那儿，作战处的工作要我多管一些。我不能越位。虽然有这个客观原因，但是我考虑再三，我必须写彭总，而且要写彭总统帅中国人民志愿军战胜现代化的、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的指挥艺术。

那么，我怎样来写彭总呢？回想这场战争，对在战争的前线统帅指挥这场战争的彭德怀元帅，要写的实在太多太多了，我想写我了解的彭总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统帅才能与高超的指挥艺术，如果这样写我的口张得太大了，我也没有这个本领与水平。我再三思考，想集中一点，就是写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彭总与美国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较量，将当时骄横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打得大败。这一段在敌我互相不了解，情况瞬息剧变、万变，稍一犹豫即逝，很难捕捉战机的最复杂的战争情况，最能体现彭德怀司令员的统帅才能、高超的指挥艺术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也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最精彩的一幕。

我写彭总的统帅才能与指挥艺术，这样就会带有写论文的色彩，

在写作方式与写作风格上也会与前面所写的各章有些不尽相同。这是不是会破坏全书的写作风格与写作方式的完整性、一致性呢？我想，虽然会有一点，但作为对全书的一个总结，把它升华一下，我认为也是可以。我尽量照顾到前面各章的风格，不把它完全写成纯论文性的。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进行的3次战役，我军是在极端困难和完全被动的情况下，彭总克服重重困难，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从被动中争夺战争的主动权，连续取得了3次战役的伟大胜利，将敌人从鸭绿江边，打退到“三八线”以南。从而“确立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基础，恢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全部领土”（引自《彭德怀自述》）。骄横不可一世的“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被我彭大将军打得大败而被撤职。彭德怀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个敢于与当时头号的美帝国主义军队作战，并将其打得大败的战区统帅与英雄，受到了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的赞誉和尊敬，被誉为“当代天才的军事家”。现在我们来回顾这段历史，是很有意义和很受教育、很受启迪的。

一、彭德怀与麦克阿瑟之比较

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智勇双全的将军”、“勇敢而明智的英雄”。这样的将军与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引自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朝鲜战场上敌我双方的统帅是什么情况呢？我仅仅作个简要的比较。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帜，纠集16个国家出兵侵略朝鲜，同时宣布美国海军第7舰队封锁我国台湾海峡。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于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和我国东北边境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在朝鲜党、朝鲜政府和金日成同志的请求下，在苏联斯大林的建议与要求下，10月2日

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出兵援朝。毛泽东开始要林彪挂帅，可是林彪怕打不赢，而有损自己“常胜将军”的“威名”，称“病”要到苏联治疗，拒不受命。10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立即派专机到西安，“一分钟也不准停留”地将彭德怀接到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听了毛泽东关于为什么要出兵援朝的讲话后，来到给他安排得很舒适的北京饭店的房间里，但脑海里翻腾着，一夜也没有睡着觉，反复想着：“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反复念着毛泽东当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的“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深刻地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以上均引自《彭德怀自述》）。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彭德怀发言，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主席这一英明正确的决策。毛泽东听了后非常高兴，他紧握彭德怀的手说：“有你去，我就放心了。”随后即与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决定，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毫不犹豫地毅然接受了这一历史性的重任。

临危受命，对彭德怀来说，已不是第一次了。在1928年底，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的红5军经历了极为艰难的长途行军、作战，到达井冈山与朱德、毛泽东会师后不久，湖南和江西两省的军阀调集14个团的兵力，围攻井冈山。井冈山上粮草奇缺，情况极为严重，1929年1月，朱德、毛泽东率红4军下山，实行战略转移。毛泽东要彭德怀留下，坚守井冈山，拖住敌人。彭德怀从革命整体利益出发，毅然接受了这一极为艰难的任务。当时红5军刚到井冈山，人生地不熟，就要他们留下守井冈山，干部、战士思想都不通，要求仍回湖南去。由于彭德怀在红5军中威望极高，只有他才能说服了全军干部、战士，留下坚守井冈山。在朱德、毛泽东与彭德怀分别的时候，毛泽东对彭德怀说：“如果不下山转移，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留下你来拖住敌人，这副担子是很重的，你勇于挑重担，真是受命于危难之时。”彭德怀率领刚上山的红5军（仅七八百人）坚守井冈山，将敌人全部吸引到井冈山，使红4军顺利转移，开辟赣东南和闽西苏区，

红5军在敌人重重包围进攻中，伤亡惨重，完成任务后，彭德怀才率余部200多人突围。

1935年深秋，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当时任红军陕甘支队（红一方面军1、3军团合编而成。3军团即是由彭德怀率领上井冈山的红5军）司令员的彭德怀，亲自指挥红军在吴起镇（即现吴旗县）和凶悍的马回回军（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4个骑兵团，近万人，恶战一天，歼灭敌人一个半团、击溃敌人2个多团。这是中央红军进入陕北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是我军以少胜多，以步兵胜骑兵的辉煌胜利。当时，兼任陕甘支队政治委员的毛泽东，赠诗赞扬彭德怀。诗曰：“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勒马，唯我彭大将军。”

1947年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几十万大军，正向延安进犯。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研究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由谁来负责指挥。当时，陕北只有6个旅，加上地方部队总共2万余人，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中央军委不离开陕北，还需要保卫党中央，情况是极为严重和困难的。彭德怀思虑再三后，毅然去找党中央书记处和毛泽东主席，主动提出贺龙同志没有回延安之前，请中央将陕北的部队暂由他指挥。五位书记听了后，极为高兴，毛泽东对彭德怀说：“危难受命，勇挑重担，西北战场上的事就交给你老彭了，这样，我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西北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在极为艰难困苦和劣势的条件下，不断地歼灭敌人，壮大自己，保卫了党中央、保卫了毛主席，并迅速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将胡宗南几十万军队和西北其他国民党军队全部歼灭，解放了整个大西北。

美国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当时一身兼任美军远东总司令、远东美陆军总司令、远东盟军总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四个头衔。他在美军将领中，资历最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已晋升到美军师长、少将军衔。1930年当上美国陆军参谋长（四星上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任欧洲盟军统帅的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曾当过他的副官和参谋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麦克阿瑟在亚洲对日本侵

略军的作战中，战功卓著，声名显赫。1944年美国国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功卓著的将领，设立一种新的特级军衔——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是当时7名被授予五星上将军之一。特别是美国军队打着“联合国军”旗号，入侵朝鲜战争不久，1950年9月，他力排众议，亲自指挥仁川登陆战役成功，不仅挽救了濒临失败的美军与南朝鲜军，而且使美军与南朝鲜军由失败、退却、防御转入了进攻，麦克阿瑟的“威名”也由此大震，成为美军“一贯正确”的“英雄”。

由此可见，两位战区统帅都是声威赫赫的名将。他们所统率的军队，都是胜利之师。美军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盟国中，打败德、意、日法西斯军队的主要力量。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初期入朝的部队，是解放战争中，第4野战军和第3野战军的一部分主力军，打败了国民党军的主力。这样的统帅，这样的军队，在朝鲜半岛这样特殊的战场上相逢进行较量，确实是大智大勇的较量。这次较量，由于我军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美军进行的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在客观上美军是注定要失败的。但失败得这么惨，这么快，这就有主观上的原因，这就是麦克阿瑟的统帅指挥才能被在毛泽东主席指挥下的彭德怀司令员比输了，美军官兵在士气上、勇气上、智慧上被我军指战员比输了。

二、交锋于朝鲜战场上的两军统帅与两国最高统帅的关系

彭德怀被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没有人朝前，凡属重大的决策，毛泽东总是找彭德怀去北京商讨，1950年10月9日和10月17日就有2次。进入朝鲜后，彭德怀则或是派副司令员、参谋长或亲自返回北京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每次战役的决心、部署，彭总总是事先报告请示毛泽东主席，得到批准同意后才执行。比如：第1次战役，志愿军入朝后，情况与入朝前的设想完全变化了，毛泽东电令彭德怀改变决心，彭德怀也报告毛泽东要改变决心，两人的决心不谋而合。第2次战役后，彭总原拟

让部队稍事休整、补充后再战，而毛泽东主席从政治上考虑，必须乘胜打过“三八线”去，要求部队不要怕疲劳，发扬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接连再打第3次战役。彭德怀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命令，但考虑到战场的具体情况，向毛泽东报告打过了“三八线”后，“稳进”的战役作战方针。毛泽东同意了彭德怀的意见。在第4次战役结束后，我军转入运动防御作战时，彭总即将指挥权交给第一副司令员邓华指挥，他即于2月20日急速回国，向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当面汇报朝鲜战场情况，共商作战方针和各种具体困难问题的解决办法等，直至3月9日，彭总才返回志司。第5次战役后，彭总又派邓华副司令率第一批入朝的军长回国，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汇报，随后又派陈赓副司令员和解方参谋长回国，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汇报。关于第6次战役如何打？打不打？彭德怀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请示报告，几次反复磋商。彭总完全按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执行。在战略防御阶段，各个时期的作战方针，彭德怀都是请示报告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停战谈判，彭总则完全听命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军事行动密切地配合和谈。在1953年7月金城战役后，按当时战场情况，对我军很有利，彭德怀拟继续打一二次进攻战役，再签字停战。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从全局出发，和朝鲜方面要求急于停战，就与彭德怀商量不要打了，签字停战吧。彭德怀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的意图，服从毛泽东的决定，签字停战。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彭德怀司令员与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是非常密切协调一致的。

美军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他狂妄自大，独断专行，他既不听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与命令，也不听美国总统（即最高统帅）杜鲁门的指示与命令。

1950年9月27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令麦克阿瑟，只有韩国军队可以在“与苏联接壤的东北各道或沿满洲边境的地区”作战。10月20日，麦克阿瑟无所顾忌地僭用职权，他命令“有关各部”“竭尽全力”向鸭绿江边进犯。他用“有关各部”来改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只限于韩国部队的训令。（引自美国约瑟夫·格登著《朝鲜

战争——未透露的内情》)

当美军1950年9月15日，在朝鲜仁川登陆成功，战况发展很顺利时，杜鲁门得悉中国军队将要进入朝鲜参战的情报后，“杜鲁门对中国在北朝鲜进行‘干涉’的可能性日益担心。”根据杜鲁门的意图，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50年10月9日致电麦克阿瑟，“未经华盛顿‘授权’，麦克阿瑟不得对中国领土上的目标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杜鲁门还不放心，急促地决定“他要和麦克阿瑟进行面对面的磋商，”“想从他的第一手情报和判断中吸取益处。”（以上均引自《麦克阿瑟》一书）。

本来杜鲁门是要麦克阿瑟回国向他当面汇报，可是被麦克阿瑟拒绝，他不回国。当时美国国防部长乔治·马歇尔（五星上将），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要麦克阿瑟到夏威夷与杜鲁门会晤。出于礼貌，马歇尔说了2个地点，他告知麦克阿瑟，杜鲁门“总统打算于10月15日在夏威夷或威克岛会见他。麦克阿瑟选择了威克岛，这样就迫使杜鲁门要多飞数千英里。”（多飞2700英里）去会见麦克阿瑟。杜鲁门请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同行，艾奇逊拒绝了。艾奇逊说：“由于麦克阿瑟将军具有外国君主的许多特性，并且像任何一个外国君主一样难对付，因此承认他的这一地位似乎是不明智的。”（以上引自《麦克阿瑟》一书）国防部长乔治·马歇尔将军也不愿意去。

杜鲁门作为总统，又是美军最高总司令，还是屈从了一个战区指挥官，飞到威克岛，这对杜鲁门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但又无可奈何地要忍受的屈辱。因为当时麦克阿瑟是“胜利者”，他正指挥侵朝美军“胜利地”向北进犯。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第1次战役将美军从鸭绿江边击退到清川江以南。麦克阿瑟不顾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对，决心轰炸鸭绿江桥。“麦克阿瑟在11月7日电报的最后部分，含蓄地把杜鲁门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当成傻瓜。”麦克阿瑟还非常傲慢地说：“自从战争开始以来，满洲和西伯利亚的不可侵犯性一直是本司令部的主要职责。”麦克阿瑟“这段话在华盛顿引起了愤怒。麦克阿瑟或是对告诉他的话置之不理，或是打算继续对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杜鲁门总统）

软缠硬磨，直到他被授予所希望的可以为所欲为的权力。”

我志愿军发动第2次战役，打得麦克阿瑟惊慌失措，他没有报告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1月28日就擅自决定将美军撤退到“三八线”以南。然后才向华盛顿报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五星上将）在麦克阿瑟的电报上的批语：“是羞辱性的，”他情绪激动地说：“麦克阿瑟把我们当成了小孩子对待。”

“由于麦克阿瑟不停地发表批评性的言论，杜鲁门总统终于采取行动使他（注：指麦克阿瑟）沉默。杜鲁门在1950年12月6日对所有行政官员发布了两个命令——但显然是对麦克阿瑟的，……但这仅仅是暂时的，使麦克阿瑟安静并不等于使他沉默。”（以上均引自美国约瑟夫·格登著《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一书）

麦克阿瑟不服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杜鲁门总统的训令，命令，并与华盛顿对抗、批评，一直没有停止过。

三、彭总从被动中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迫使麦克阿瑟由主动转为被动

在战争中谁掌握了主动权，谁就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毛泽东说：“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残酷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引自毛泽东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劣胜优的诸多战例中，除客观因素外，指挥战争的统帅的主观指导能力往往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敌我双方统帅的智慧，经验、韬略和战争指挥艺术的竞赛和较量。指挥战争的统帅要善于知己知彼、趋利避害；善于发挥自己的长处，利用和扩大敌人的弱点的短处；善于掌握战争中瞬息万变的情况，迅速果断地定下符合客观情况的决心和处置。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之初，麦克阿瑟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我军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彭总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迅速从麦克阿瑟手中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使麦克阿瑟由

主动进攻被迫迅速转为退却，并且从鸭绿江边一直退到“三八线”以南。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以前，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确定我军的作战方针是：进到朝鲜平壤至元山以北的蜂腰部，占领有利地形，组织防御，构筑二到三道防御阵地，制止敌人的进攻，掩护朝鲜人民军后撤整顿；并占领北部山区，作为根据地，为尔后进攻创造条件。

可是，我军进入朝鲜时，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是急剧的变化，1950年10月19日晚，我军跨过鸭绿江，敌人已于同一天白昼进占了平壤，并迅速向北冒进，已先于志愿军进占了我预定的防御地区，敌人的先头部队已进犯到鸭绿江边，迫使我军已不可能抢占预定地区组织防御了。过去我军所运用的初战必胜的条件，都变成对我不利，也不可能“宁可退让，持重以待”（引自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了，因为在朝鲜境内已无地可退让了。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彭总于10月21日（我军入朝后的第二天）即迅速果断地放弃原定计划，决心以运动战方式歼灭冒进之敌。并即建议毛泽东主席令66军、50军迅速入朝参战，使我入朝兵力由4个军（38、39、40、42军）增加至6个军。同时建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令第9兵团3个军（20、26、27军）迅速入朝，从辑安（今集安）过江，进至朝鲜东部，抗击从咸兴登陆进犯的美军第10军。

彭总并迅速调整部署，在局部地区集中优势兵力，抓住麦克阿瑟判断的错误、分兵冒进的弱点，充分发挥我军善于夜战、近战和包围迂回作战的特长，力争迅速地从被动中夺取主动。

彭德怀司令员将10月21日改变决心电报报告毛泽东主席。同一天（10月21日），毛泽东也电令彭德怀放弃原定作战计划，改为从运动中歼敌的方针，全军最高统帅和战区统帅的决心不谋而合，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10月25日，西线我第40军在温井、两水洞地区，东线我第42军在黄草岭地区，同时与敌人遭遇打响后，在短短的12个昼夜里，彭总根据瞬息万变的情况，适时果断地改变歼敌决心，调整部署，完成战役展开。首歼温井、熙川地区之南朝鲜军，继歼云山之美军，并

运用战役战术上的迂回包围，把美第8集团军打得晕头转向，迫使敌人由疯狂地向北进攻，迅速地转变为向清川江以南败退。当11月3日敌人退过清川江以南后，彭总审时度势，乘我军意图和兵力尚未完全暴露，为保持下一步作战的主动权，于11月5日下令停止进攻追击敌人，结束第1次战役。我军取得了初战的伟大胜利。在新的情况下，彭总创造性地发展了初战的军事理论，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宝库。

我军将敌人打退到清川江以南后，为了夺回战争的主动权，“麦克阿瑟这时在战术上犯了他军事生涯中最严重的错误。他一方面大大过低地估计了北朝鲜的中国人，另一方面又大大过高估计了飞机进行阻止的能力。”（引自美国小克莱·布莱尔著《麦克阿瑟》一书）麦克阿瑟于11月6日命令远东空军1000余架飞机全部出动，企图以其绝对优势的空军发动空中攻势，“消灭中国的干涉军”。经过半个月对朝鲜北部和鸭绿江沿岸的狂轰滥炸，麦克阿瑟错误地“相信全面的空中进攻已达到了其目的”。认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是一种政治讹诈”、“不堪一击”（以上均引自《麦克阿瑟》一书）。他傲气十足地于11月24日由东京飞到朝鲜清川江以南新安州第8集团军司令部，命令第8集团军和第10军向鸭绿江、图们江进攻，扬言：“战争在两个星期之内就会结束”（引自李奇微著《朝鲜战争》），他的士兵可以回国过圣诞节。

彭总抓住了麦克阿瑟想急于夺回战争主动权和急于求得胜利的心理，“采取了故意示弱、纵敌、骄敌和诱敌深入”（引自《彭德怀自述》）的方针，造成麦克阿瑟更大的错觉。彭总则迅速、隐蔽地调整我军的战役部署，引诱敌人进至我预定作战地区。在敌人发起攻势的第2天，即1950年11月25日黄昏，指挥西线我军向敌军突然实施战役反击，东线我第9兵团于11月27日向敌军突然发起战役反击。

由于我军出敌不意地反击，又把麦克阿瑟打得不知所措，作为一个战区统帅他已完全失去自我控制了，11月28日麦克阿瑟不顾前线最紧张的时刻，指挥官是不能离位的原则，紧急召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和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到东京开会，决定第8集团军迅速向后撤

退，要求“沃克撤往可以最有效保护他的部队的任何地方（仁川或者釜山等等）”第10军“阿尔蒙德撤至咸兴、兴南一线”，然后从海上撤退。麦克阿瑟的“圣诞攻势”很快就被我军粉碎，麦克阿瑟不仅没有夺回战争的主动权，不仅没有取得速胜，结束朝鲜战争，而且丢失了战争的主动权，完全处于被动了。被我军打得大败，退逃了。

敌人退到“三八线”以南地区，构筑纵深防御阵地，企图阻止我军的进攻。美国政府则企图利用“三八线”为分界线，提出停战谈判的要求，企图使败退的美军争取喘息和整顿的时间，然后发动进攻，夺回战争的主动权。当时我军因连续作战部队都很疲劳，战斗减员未得到补充，粮食、弹药和物资也没有完全补足，很需要休整补充。原来彭总的意图是争取2个月的时间，在“三八线”以北稍作休整、补充，再继续作战。

毛泽东主席根据政治、军事上的需要，电令志愿军不要让敌人停止在“三八线”上，要求我军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作风，继续组织进攻战役，突破“三八线”，将战线推进到“三八线”以南去。彭总遵照毛泽东的电令，根据政治上的需要，决心克服一切困难，以西线中国人民志愿军6个军和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实施突破“三八线”的第3次战役。彭总充分考虑到我军后方供应线太长，又遭受敌人的飞机的狂轰滥炸，如果再向前推进过远，困难就会更大，为确保战争的主动权，彭总经过深思熟虑，确定这次战役是“稳进”的方针，即突破“三八线”敌人防御阵地后，歼灭敌人，适可而止。1951年元旦，敌人全线败退，新上任的美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中将，为了避免他的前任所遭受的打击重演，决心放弃汉城并向汉江以南撤退。我军于1月4日收复汉城。彭总为了不使敌人据守汉江南岸，即令各军越过汉江，向仁川、水原和横城追击。到1月8日，我军将退逃之敌驱逐至北纬37度线以南。

在胜利的追击中，彭总的头脑非常清醒，认为虽然取得了突破“三八线”的重大胜利，但并没有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敌人退过汉江后，李奇微即迅速收拢和整顿部队，麦克阿瑟则企图诱我穷追，再来一次“仁川登陆”。彭总洞察了敌人的阴谋，果断地停止追

击，结束第3次战役。令韩先楚副司令员率志司“前指”，指挥第38军、第50军和人民军第1军团，在汉江南岸组织野战防御，监视敌人，防止敌人反扑。主力在汉江北岸休整，补充粮弹。

彭总这一着是很有战略预见的，但遭到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和友方同志的反对。彭总坚决顶住了，并得到毛泽东、斯大林的支持。事实很快证明彭总的决断完全正确。

美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将退逃之美军和南朝鲜军稍事整顿，即于1951年1月15日，以所谓“磁性战术”，向我军发动了试探性进攻。25日开始，全线向我发动了较大规模的进攻，企图夺回战争的主动权。这时，我军已争取休整了近20天，体力有了恢复，粮弹得到了部分补充。

为了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彭总于1951年1月27日下令停止休整，调整部署，在西线，汉江南岸继续进行防御，迟滞敌人进攻；在东线，由邓华副司令员率前指，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4个军，在朝鲜人民军2个军团的协同配合下，选择敌人的薄弱部和突出部，实施了第4次战役，向敌人发动横城反击战，歼灭了敌人。敌人迅速向我军进行反扑，我军遂结束第4次战役，转入机动防御，迟滞敌人的进攻，尽最大可能争取更多的时间，使新入朝参战的第3、第19兵团向前开进，在东线的第9兵团完成休整后，南下参战。然后向敌人发动了第5次战役，战役进行2个阶段。至1951年6月，美国及其盟国政府都认识到不可能在朝鲜战胜中国人民志愿军，因此，被迫提出停战谈判。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都认识到在当时我国综合国力和我军的情况，也不可能将敌人全部歼灭或赶出朝鲜。因此，同意与美军进行停战谈判。但要求中国人民志愿军则不要寄希望于谈判。而应实行积极的战略防御，持久作战。并明确指出，战争的胜利只能是从战场上打出来，不可能从谈判桌上谈出来。

在敌我双方都转入战略防御作战中，敌人与我军正面相持对垒两年多，双方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战斗、战役的较量，我军愈战愈强愈主动，敌人则愈战愈被动。在我军战略防御作战中，战争的主动权最后

又被我军夺取，从而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敌人不得不急于在 1953 年 7 月 27 日，在军事停战协定上签字。

四、彭总趋利避害，以己之长，击敌之短，使麦克阿瑟的优势对我军无可奈何

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劣胜优的统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够高瞻远瞩，冷静客观地分析敌我情况，巧妙地采取计谋，趋利避害，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就连麦克阿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太平洋对日军的作战中，也有过这样的战例，在其侵朝战争初期，他力排众议，亲自选择和指挥美第 10 军在不宜于登陆的仁川港实施登陆，一举成功，使他成为“英雄”。可当他面对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统帅彭德怀时，就显得很笨拙了。

麦克阿瑟统率的“联合国军”，是高度现代化、机械化的陆军，和占绝对优势的空军、海军。而彭德怀统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当时只有步兵和少量炮兵，行动靠两条腿，既没有空军、海军支援和掩护，又没有足够的防空防御武器，完全暴露在占绝对优势的敌人空军的空袭下。在这样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又加上在朝鲜这样狭长的半岛上，回旋余地太小，又不能就地得到补给，按照一般的军事原理和战争理论，我军的“小米加步枪”怎么能和高度现代化的进行立体战争的对手进行较量呢？更不要说能战胜敌人了，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领导下、在聪睿、胆略超群的彭德怀统率下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充分发挥了指战员勇敢、机智和具有丰富的战争经验的优势，硬是使麦克阿瑟的优势发挥不出来，达不到他所期望的目的。而我军的优势却得到了充分地发扬，迫使麦克阿瑟统率的高度现代化的陆海空军的“联合国军”，接二连三地败下阵来。

麦克阿瑟遭到我军第 1 次战役的打击后，仍骄傲自大，轻视我军，认为以绝对优势的空军，就可以打败我军，遂命令远东空军。于 11 月 8 日开始，向我实施了空中战役，每日出动上千架次的飞机，飞向我鸭绿江边炸断中、朝共有的鸭绿江桥，并不顾国际公约，悍然轰

炸我国鸭绿江边的安市（即丹东市），企图阻止我军后续部队和后方支援物资输入朝，并企图对我国进行武力恫吓。同时对朝鲜清川江以北所有的交通运输线、城市和村庄、工厂和一般设施进行全面摧毁，即所谓地毯式的轰炸。

毛泽东和彭德怀从人的因素、政治的因素是战斗力诸因素的首要因素，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采取另一种方式来对抗麦克阿瑟的空中攻势。毛泽东主席和彭总命令部队完全转入夜间活动，行军在夜间，运输在夜间，拂晓前部队即进入松树林子里隐蔽。开始没有将汽车、马车、炮车车轱轮的辙迹去掉，被敌人飞机发现，遭到轰炸扫射，我各级指挥机关和指战员，就迅速研究在车辆后拖树枝，将辙迹扫去；白天做饭、烧开水冒烟，易被敌机发现挨轰炸，就规定每天三顿饭和开水都在夜间做好，白天不准冒烟。

我军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防空措施，较大地减少了损失，并隐蔽地进行了战役、战斗的部署调整。

我军采取这些巧妙地隐蔽行动，迷惑了敌人，把麦克阿瑟搞糊涂了，使他产生了错误的判断。认为持续了两个星期的空中轰炸袭击，使“中国人似乎在全线撤退”，相信已经达到了摧毁我军的目的。麦克阿瑟便决定11月24日，即美国人的感恩节的第二天为进攻日。可是实际情况正如《麦克阿瑟》一书的作者（美国小克莱·布莱尔），对麦克阿瑟空中攻势的描述：“空中攻势几乎没有恫吓住他们。这些经验丰富的士兵轻装前进，利用夜暗行军，白天则小心地隐蔽起来。对北朝鲜的狂轰滥炸，杀死了无数平民，但对中国军队没有造成值得一谈的损失。”

美军地面部队炮火很强，坦克也多，习惯于白天作战，以便于诸兵种协同。他们先是航空兵轰炸、扫射，各种口径的炮火轰击，然后以坦克为先导，步兵跟随其后，实施进攻。处于劣势装备的我军，既无空中支援，也无强大的炮火与坦克支援。彭总就采取一切办法避开敌人的优势与长处，充分发挥我军的优势与特长。在战役和战斗方式上，采取了夜战、近战、白刃战；采取围点打援，从运动中歼灭敌人；从敌人的侧后攻击敌人。这样就避开我军的短处，充分发挥了我

军的长处。夜间进攻，冲入敌人阵地内与敌人绞在一起，敌人空军和炮兵都无法支援；和敌人拼刺刀，敌人更怕，拼刺刀不只是凭美国兵个儿大，主要的是靠勇敢与无畏，靠机动灵活制胜；敌人也很害怕我军从侧后进攻，敌人的火力主要在正面，翼侧是敌人的薄弱部，我军抄他的后路，不仅完全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并且也瓦解了敌人士气。

当时美国新闻舆论说什么：“中国军队打仗不正规，美国军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不按战斗条令作战的军队。”麦克阿瑟完全忘记了他所崇拜的西方军事家“拿破仑打仗全然不按规则办事”的作战原则（引自苏联叶·维·塔尔列著《拿破仑传》）。因此麦克阿瑟不知道也不可能理解中国人民志愿军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我军就是采取这些机动灵活的方法，将敌人打败，取得了战役战斗的胜利，创造了现代战争条件下，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战争奇迹。

五、彭总抓住麦克阿瑟在战役指挥上的错误，给予他以致命一击

在战争中，善于发现敌人作战指导上的错误，并加以利用和扩大，以夺取战争的胜利，这是最高的指挥艺术。彭总就是这样的指挥战争的艺术大师。

麦克阿瑟在1950年9月15日，仁川登陆成功后，非常骄横不可一世，连他们的老前辈军事家拿破仑的名言，即：“有一个一直遵循的规则，就是在没有实际较量以前，决不认为敌人比自己愚蠢；预计敌人采取的措施决不比自己同样的条件下采取的措施相形见绌。”（引自原苏联叶·维·塔尔列著《拿破仑传》）麦克阿瑟还对西方的著名军事理论家，普鲁士（德国）的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中，关于“集中兵力”的基本原理，都统统忘得一干二净了。因而在战役部署与指挥上，也不顾起码的军事常识而随心所欲了。一、美第10军在仁川登陆后，按照正常的做法，应该交给美第8集团司令沃克指挥，当时沃克只指挥第1、第9两个军，可是，麦克阿瑟却将第10军归他自己直接指挥；二、在向北进犯中，如果由第8集团军

指挥第10军，从陆路向元山、咸兴前进，既方便又迅速，而且南朝鲜军第1军团已于10月10日进占元山，17日进占咸兴，中路南朝鲜军第2军团于10月19日已进占阳德、成川，已经为向朝鲜东部前进创造了条件。可是，麦克阿瑟却令第10军于10月20日从仁川登船，绕道海上从元山登陆，向咸兴、长津、江界及惠山方向进攻。这样不仅使第8集团军与第10军之间的间隙达80—100公里，而且分散了兵力。特别是经过我军第1次战役，“第8集团军和第10军遭到沉重打击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建议麦克阿瑟将两军会合，以便封闭两军之间的间隙，并建立一道绵亘的防线。但是，麦克阿瑟坚决反对。”（引自《麦克阿瑟》一书）

由于麦克阿瑟非常轻视我军，因此也就非常奇特地认为，第8集团军与第10军之间的纵贯山脉是保障两军结合部的天然屏障，会阻止中国军队突入，中国军队将无法越过这些崎岖的地形。这样，第8集团军与第10军愈向北进攻，兵力也就愈分散，使两军互相不能联系，不能支援，他们之间的间隙愈来愈大，翼侧也愈暴露无遗。《麦克阿瑟》一书的作者认为：这是麦克阿瑟“犯了他军事生涯中严重的错误”。美国约瑟夫·格登在《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一书中，也认为：“麦克阿瑟在北朝鲜军队撤退时，决定把他的一半部队撤出战斗（注：是指将美第10军从朝鲜正面调出，乘船到东海岸咸兴登陆），不论怎么说，这在美国的军事史上都可以算得上是最引人瞩目的大错之一。这一错误足以使他（注：指麦克阿瑟）的指挥功绩黯然失色。”

彭总迅速发现了麦克阿瑟在部署和指挥上的错误，并利用和扩大了敌人的错误。他建议毛泽东主席迅速调第9兵团（第20、26、27军）入朝参战。令该兵团迅速向东线长津湖方向开进，担任阻击和攻歼美第10军的任务。将原在该方向阻击敌人的我第42军主力西调，以集中6个军的兵力，攻歼美第8集团军一部。决心抓住美第8集团军与第10集团军之间留下的巨大间隙，给予麦克阿瑟以有力的一击。

为此，彭总“采取了故意示弱、纵敌、骄敌和诱敌深入的战

术”，诱敌北进，同时隐蔽地调整部署，克服一切困难，将第38军、第42军调至德川、宁远以北地区（原定将第40军也调过去，因中部山区狭窄，集中与展开不了3个军，故第40军只进至球场东北地区），集中指向美第8集团军右翼的薄弱而又暴露的部位，待我军引诱敌军进至我预定歼敌地区，于美军11月24日，开始实施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的第二天，即11月25日的黄昏，我军在彭总的一声令下，从德川、宁远地段向敌侧翼突然发动了战役反击，迅速包围歼灭南朝鲜军第7、第8师，将南朝鲜第2军团击溃，随即令第38军迅速向顺川、军隅里攻击前进，该军第113师一昼夜急行军73公里，于11月28日晨7时抢占了三所里，29日晨又抢占了龙源里，将第8集团军2条主要后路截断。

这侧后突然一击，完全出乎麦克阿瑟意料之外，把麦克阿瑟打得惊慌失措，这时才认识到我军的厉害。麦克阿瑟慌忙对华盛顿报告说：“投入北朝鲜作战的中国军队是大量的，而且数量在继续增加。打着志愿军或其他旗号进行小规模支援的任何借口再也站不住脚了。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完全新型的战争。”因此，他的部队“必须由进攻转入防御”。（以上引自《麦克阿瑟》一书）

麦克阿瑟于11月28日，命令所有的部队全部后撤。在这个命令下，敌人逃跑式地撤向“三八线”。我西线各军先头部队尾随敌人前进，主力于12月23日逼近“三八线”，朝鲜人民军1军团越过“三八线”收复延安半岛和瓮津半岛。

彭总这强有力的侧后一击，迅速地发展成为致麦克阿瑟彻底大败的一击。麦克阿瑟这位被美国及其盟国军界称为“天才的、杰出的军事家”，被我彭大将军连续的几击，迅速地、全面地败下阵来。彻底地较量输了。

我在这里引用约瑟夫·格登在他所著的《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书中一段很有趣的描述。1951年春天麦克阿瑟到“三八线”以北的南朝鲜军第9师视察时，“麦克阿瑟颓然倒在吉普车的前座上，仿佛已经完全筋疲力尽。他并未表现出他一贯的信心和盛气，就连他那顶著名的油渍斑斑的军帽，这一天也不显得怎么精神，他是一个斗

败的人。”

麦克阿瑟被我彭大将军打得大败后，极大地震动了美国朝野和美国人民，也极大地震动了美国的各盟国，使他们大为沮丧和恼怒。他们感受到被麦克阿瑟愚弄和欺骗了，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1951年4月9日（东京时间4月10日）杜鲁门总统正式决定撤销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撤职命令中写道：“撤销你盟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总司令和远东美陆军总司令的职务”（引自《麦克阿瑟》一书）。而这个撤职命令是4月11日中午，首先由新闻广播传到东京的，当时麦克阿瑟正在举行午宴，午后才收到正式命令。命令中还规定撤职令立即生效。

杜鲁门总统给了麦克阿瑟一个突然袭击，这种撤职方式在美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杜鲁门对麦克阿瑟是很恼恨的，作为总统是美军最高统帅，调不动麦克阿瑟，1950年10月，杜鲁门要麦克阿瑟回国向他汇报，麦克阿瑟不仅不去，而且选择了离美国远，距日本近的威克岛要杜鲁门来见他，而且对杜鲁门很傲慢。在战争的过程中，麦克阿瑟不仅根本不听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总统指挥，而且连意见、建议也不听。杜鲁门总统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对麦克阿瑟这样极端傲慢，对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总统的极不尊重和“抗上行为”积怨是很深的。

杜鲁门的突然袭击，使得麦克阿瑟无法举行美军惯常的指挥官交接仪式，也无法使他向部队发表惯常的告别演讲。也使他离开日本时，受不到凯旋式的欢送，只有他和家属及少数随从，冷冷清清地登上了回国的飞机。而且有意安排他的专机在夜间降落旧金山，不让麦克阿瑟的支持者（共和党人），在他踏上美国国土时受到欢迎。这也是他必然的下场。

第 十 八 章

回忆后的思考

当我写到最后一章时，怎么来结束我的回忆呢？经过反复地思考，我想将我在写作这一场战争的过程中，感受最深的作一个极为简要地概括。

一、抗美援朝战争是在特殊情况下，进行的一场特殊的战争。在这场力量很不对称的战争中，我方用胜利迫使敌人以签订停战协定的特殊样式结束战争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我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毅然决然地定下决心，出兵援助朝鲜，进行抗美援朝战争，这的确是在一种很特殊的情况下，来进行这场很特殊的战争。我思考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抗美援朝战争，的的确确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作出的非常艰难，而又非常英明、正确的决策。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国民党蒋介石从大陆败逃台湾，全国从中央到基层，都是留下一个烂摊子。我党要派遣大批的干部去全国各地宣传教育与发动人民群众，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当时的国民经济已濒临破产，百孔千疮，百废待兴。当时，从中央到各级人民政府正着手进行全国和各地的经济恢复与建设，并

采取各种措施，以求迅速解决全国人民急需的基本生活物资等问题。

1950年，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态势与任务是：第四野战军刚刚完成解放海南岛；第三野战军正积极准备渡海进攻台湾；第二野战军正积极进军西藏；第一野战军在大西北正积极展开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巩固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长江以南各省还留存有国民党军较大量的残余势力，与很多、大股的流窜在各省边界的土匪。我各野战军正在展开大规模的清剿国民党军残余力量与土匪武装的作战行动，以达到迅速巩固广大的新的解放区，安定全国民心，稳定全国局势。

正当我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集中全部精力解决刚刚建国后的很繁重、很困难任务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在朝鲜突然爆发了战争。

这种新的突发战争，在与我国相邻的友好国家朝鲜爆发了。完全打乱我党、我国政府和我军原定的迅速巩固新解放的新中国的国土；继续解放台湾和西藏；迅速建立各级人民政权；迅速恢复与重建国民经济建设的战略计划。这个突然爆发的、国际性的、全局性的政治与军事的战略问题，摆在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面前，必须迅速作出的极为困难与艰难的决策。是继续集中全部精力建设国家，还是要不要准备援助朝鲜的作战？据我理解，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开始阶段即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是继续贯彻国内的方针政策；一方面作准备支援朝鲜战争的准备。

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连续发表声明，并下令派遣美国军队并要挟联合国安理会组织“联合国军”侵略朝鲜，入侵我国台湾海峡。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针对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声明与侵略行动，都迅速作出了强烈的反映与抗议。同时，于1950年7月7日，即迅速的決定组建“东北边防军”，令第13兵团率领4个军、3个炮兵师，开赴鸭绿江边，保卫祖国边防。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这些迅速决策是非常及时、正确的。

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密切注视着朝鲜战争的发展。当得悉9月15日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截断了朝鲜人民军的后路，10

月1日南朝鲜军与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向北朝鲜进犯。直到这个时候，苏联斯大林同志和朝鲜金日成同志才突然向我党提出，请求中国出兵援助朝鲜。这对我党、我军来说，是很突然的。经过我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研究（在我党中央政治局开会的过程中，苏联斯大林请我党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讨出兵援朝问题，毛泽东同志派周恩来同志率团去莫斯科），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意见逐渐集中，都认为援助朝鲜人民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现在美帝国主义疯狂地向北进犯，我国必须援助朝鲜。而且如果美帝国主义占领了北朝鲜，陈兵鸭绿江与图们江边，直接威胁着我国东北的安全，唇亡齿寒。也认识到入朝作战，我军面对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军队，我人民解放军虽是胜利之师，但装备比美军差很多，而且更困难的是我军只有陆军，当时还没有空军、海军，也就没有制空权。美军则有绝对优势的空、海军、制海权、制空权都被美军所掌握。与现代化的当时世界第一流的军队作战，没有制空权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同时，也认识到我军的优势与有利条件：我军援助朝鲜抵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军进行的是正义战争。美军是侵略朝鲜，进行的是非正义的战争；我军指战员有丰富的作战经验，特别是我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敢于和善于夜战、近战，这是我军最大的优势。也是敌人最大的短处。我军可以充分发挥我军的长处，使敌人的空中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出来。美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只要我军认真对待，当真老虎打，这个“纸老虎”也并不是可怕的，等等。但是我们面对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战争到底要打多久，是不是可以稳操胜券，说实在的当时是没有把握计算与预料出来的。

我党中央政治局经过充分的研究讨论，毛泽东主席在充分听取了政治局同志们的意见后，以大无畏的勇气与毅力，毅然决然地定下出兵援助朝鲜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的决心，同时，决定放慢我国某些方面的经济恢复与建设，甚至停止一批新的经济建设，将我国的经济转变为抗美援朝战争服务；解放军各野战军除正在进军西藏的部队，迅速转入战争准备，准备分批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对入朝的部队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并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向全国人民提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动员全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战争，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在国外进行的一场更加艰苦困难的战争。

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在当时这样严重的国际形势下，和国内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定下暂停渡海解放台湾，出兵援助朝鲜，进行抗美援朝战争，这的确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作出极为特殊的艰难的、有关国家命运的非常重大的战略决策。只有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的高瞻远瞩和大智大勇、聪睿智慧的高超的政治家、战略家才能有这个胆量，作出这样的重大的政治上、战略上的决策。事实证明这样非常重大的政治上、战略上的决策，是非常英明与正确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遇到了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我军的作战对象是以美国为首纠集的16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还有南朝鲜军。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两个集团的战争，每个集团都是有几个国家的军队联合作战。

抗美援朝战争，是以我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主要力量，与重新组建的朝鲜人民军并肩对与美国为首的16个国家加南朝鲜军队的“联合国军”作战。是2:17的战争（中、朝军队为一方，“联合国军”加南朝鲜军为一方），美国在当时是世界第一号的强国，美国军队是世界第一流的装备精良的现代化、机械化的军队，而且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有作战经验、有战斗力的军队。我军虽然是打败国民党蒋介石800万美式装备的胜利之师，但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相比较，在装备上则是相差很悬殊。我军不仅陆军的装备比美军差距很大，美军陆军是现代化、机械化，坦克、大炮火力很强，而且有绝对优势的空军与海军（开始我军没有空军，以后才有少量的空军），控制了朝鲜的制空权与制海权。我军由于没有制空权，使我志愿军不能在国内作战，以“小米加步枪”打败国民党军的办法了。因为做小米饭和烧开水要生火，生火冒烟就容易被敌机发现。只有由国内将面粉炒熟，运送到前方，用凉水拌和着吃，使我军由“小米加步枪”，改变成了“炒面加步枪”。初入朝的我军虽有

部分炮兵，但无制空权，使我火炮不能发挥威力。

由于我军有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统帅指挥下，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前方和后方，采取各种各样的作战样式（如：进攻与防御、双方都转入战略防御，防御阵地前的反击，后方的反“绞杀战”等等），经过长达两年零九个月的艰难激烈地较量，逐步改变了我军处于弱勢的态势，迫使敌人要求停战谈判。最终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迫使敌人不得不签订停战协定。这场战争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以弱胜强，战争的双方以签订停战协定而结束的最新样式。开创了战争史上的先例。

第二，中国人民解放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抗美援朝战争，这的确使老兵遇到了许多新的特殊的问题。

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从红军时代开始，历来是依靠根据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才取得了各个时期战争的胜利。而抗美援朝战争是出国作战，对中、朝双方来说，都是外国人，两国民俗习惯不同，特别是语言不通，使军队与人民不可能像在国内那样自如地交流。朝鲜人民很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支援他们，他们也很想帮助我志愿军，可是，在我军入朝前，帝国主义的空军已将北朝鲜所有的城镇与乡村都轰炸成一片废墟，朝鲜人民惨遭涂炭。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就是没有住的，没有吃的，在不断的行军作战中，弹药打完了没有补充，连衣服、鞋袜破烂了也找不到针线缝补。这与在国内作战就大不相同了。后方勤务的保障工作，一切的一切，一针一线都要依托我国东北和依赖于全国的支援。并要经过漫长的运输线运到朝鲜。在我军又无制空权的情况下，敌空军向我后方实施“绞杀战”，所有的物资遭到很大的损失，给我军的供应补充带来新的一层困难。入朝作战初期，我军是靠每名指战员背着干粮作战，战斗过程中得不到补充，当地什么吃的也找不到，每人携带的干粮节省着吃，顶多只能够吃7天左右。因此，我军的战役行动也就只能坚持六七天，不得不停下来，等待补充。我军第三次反击战役，我军打过“三八线”，进占汉城，美军败退过汉江，败退到北纬37

度线后，由于我军得不到补给，于1951年1月8日即停止进攻。美军第8集团军新上任的司令李奇微中将，搞不清楚我军的进攻为什么突然停止了。说实话，李奇微还是一个有头脑的将军，他不只听情报官的汇报，他还采取行动，来搞清楚我军为什么不持续进攻，他一边收集败退之美军，同时采取所谓“磁性战术”，即于1月15日向我军发动试探性的反击作战，并逐步发展到全线反击。敌军经过试探性反击，发现我军后方供应不上的弱点，我军的进攻是靠士兵的携带量，只能持续一个星期，就没有吃的、没有子弹了。因此，对我军的反击进攻，称为“礼拜攻势”。由于敌人了解了我军的弱点，从第3次战役后的几次战役，敌人败退后，就迅速向我军反扑，乘坐汽车和坦克，追赶我后撤的部队，使只能靠两条腿利用夜间行军作战的我军，很难迅速摆脱敌人，必须由进攻态势迅速调整部署转入运动防御。敌人疯狂的反扑，发展到紧密与我军接触作战，不给我军有战役间隙时间进行部队的休整与补充了。但由于我军充分发扬了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英勇顽强地与敌人作战。加之，我有充足的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增援前线，终于阻止了敌人的疯狂的反扑，迫使敌人不得不同我军一样，转为战略防御。

第三，在战争中，敌我双方都由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而且都是阵地对垒的防御，这是在朝鲜战场上的一种特殊战争样式，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罕有的。

朝鲜是一个狭长的半岛，三面环海，不能发挥我军大步前进，大步后退，或围点打援，打大规模运动战的特长。不能发挥我军机动灵活的大迂回、大包围作战的特长。只有第2次战役由于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将美军第8集团军与第10军分割指挥，使其在北犯中，两军之间，形成了近100公里宽的间隙。志愿军统帅彭德怀司令员很及时地发现了敌人的指挥上的这一重大错误，并很巧妙地利用了敌人的错误，在正面采取故意示弱，诱敌深入，秘密集中志愿军2个军在朝鲜中部山区，敌人的间隙部，从侧翼突破南朝鲜军后，迅速向我进犯的美军第8集团军的侧后奔袭，直插三所里、龙源里，截断敌人的后路，迫使进攻的敌人仓皇撤退。我军取得了第2次战役的大胜利。从

此以后就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我军发动的第3、第4、第5次战役都只能从敌人正面突破，我军利用夜间撕开正面敌人的防御阵地后，向两翼卷击，只能是浅近纵深的战术范围的作战行动，一个夜晚我军连打带走，只能前进30公里，天即亮了。天亮后，眼睁睁地看着被我夜间包围的敌人，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乘汽车突围逃跑，这样的作战对我军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

朝鲜这个狭长、多山的半岛，对美军来说，也是不利的。狭长的半岛同样也使美军的坦克、炮火的威力不能充分发挥。美军也只能从正面进攻，不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以坦克机械化师实行远距离的迂回、包围。敌人从正面进攻因受山区道路、地形的限制，坦克也不能按进攻的战斗队形展开作战。各种武器，包括飞机的轰炸威力也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半岛是三面环海，应该说敌人可以充分发挥海军的优势，以海军陆战队登陆进攻，配合陆军作战。但敌人只是在朝鲜战争初期（1950年9月15日）从仁川登陆成功，将朝鲜人民军后路截断，使朝鲜人民军遭到很大损失。可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抗美援朝后，由于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很注意朝鲜半岛东西海岸的防御，使敌人海军无隙可乘。美国海军的优势也就发挥不出来了。1952年美国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企图在朝鲜重演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统帅同盟国军队在法国诺曼底登陆胜利的拿手好戏，但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严阵以待，使他无可奈何。

第四，抗美援朝战争，是没有前方与后方之分的一场特殊的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由于我军没有制空权（1951年9月以后，我空军正式参战，经过与敌空军激烈的空战，才在白昼控制了清川江以北的空域）。美军空军与海军航空兵共有各种类型的飞机（战斗机、战斗轰炸机、重型轰炸机等等）1000至1700余架，每个昼夜敌军航空兵轮番不停地既与敌正面地面部队协同配合，轰炸我前方对敌作战的部队与设防阵地；同时又全面轰炸我后方铁路、公路交通运输线与后方兵站、仓库等处，特别是对清川江、安州、价川三角地区和成川交通枢纽地区，实施重点轰炸，敌人将对我后方的轰炸称为空中“绞

杀战”。企图彻底破坏我军后方的供应线和供应物资。

敌人对我后方的空中“绞杀战”，有时甚至比对前线我军的进攻还要激烈，而且在战役上是前方后方互相配合作战的。因此，后方的反“绞杀战”就成为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战略行动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志愿军组建的后方勤务工作就与国内战争大不相同了。为了粉碎敌人空中“绞杀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于1951年5月，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建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负责全面保障后方向前方的一切供应工作。根据朝鲜战场的特殊情况，这个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简称：志后），是由一个联合兵种组成的司令部。志后不仅指挥各后勤分部、兵站、医院、仓库和汽车运输团等，还统一指挥铁道兵、工兵、高射炮兵，还有1个公安师（开始是公安第18师，以后换为公安第1师）专门在沿各主要交通运输线的高山头上，监视夜间敌人飞机的防空监视哨。如发现敌机声，即开枪用枪声传送至各防空哨，接力鸣枪报警，沿途行驶的汽车司机闻枪声即闭灯或躲避。志后统一指挥的各兵种总兵力达22万余人。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后方还建立了前方铁道运输司令部（注：这个前方是与东北军区作为后方的区别），这个司令部负责指挥铁路抢修指挥所（辖：铁道兵4个师），铁路指挥局（辖：铁道工程兵6个师），还有铁道军事管理总局，负责中、朝铁路运输工作。

由于我后方勤务司令部的建立，统一了志愿军后方的对空防御作战，从1951年8月开始，经过10个月的激烈的反对敌军的空中“绞杀战”，至1952年5月底，终于粉碎了敌人空中的“绞杀战”。后方勤务司令部和前方铁道运输司令部的建立，这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特殊情况下的产物。

第五，抗美援朝战争最奇特的是：战争还在进行中，双方就同意进行停战谈判。开辟了一个外交战场。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敌我双方经过五次战役的较量，都知道了不能迅速取得战争的完全胜利。特别是美国，他当时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要与苏联争霸，他不能长久地陷在朝鲜这个半岛上，他的

英、法、德等同盟国家也不同意因此而削弱在欧洲与苏联的对抗。因此，在我军第5次战役第二阶段结束后，美国政府于1951年6月初，即主动通过苏联等国提出要与我方进行停战谈判。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也考虑到当时我国的国家经济力量也很难无限期地支持这场战争（包括对朝鲜的援助）。经过我方与苏联、朝鲜方面的充分协商后，遂于1951年6月23日，同意美国政府提出停战谈判的建议。经过美方与中、朝双方代表的协商，停战谈判于1951年7月10日在朝鲜开城开始进行（后移至开城以南双方分界线上的板门店）。

虽然开始了朝鲜战争的停战谈判，但是战争并没有停止，而且是一边打，一边谈，战场上的打与停战谈判桌边的谈，相互配合，打打停停，停停谈谈。还是由战场上的胜利来决定谈判的进程。停战谈判就是这样，持续了2年多的时间。一直到我军于1953年7月13日，发动金城进攻战役，我军取得了胜利，敌人遭到了失败。敌人已认识到如果再打下去，等待他们的仍是失败。这样才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要求迅速于7月27日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

这种由敌、我双方在战略防御对峙中，签订停战协定，这在世界战争史上大概是没有先例的。这是在朝鲜这一特定条件下，一种特殊的结束战争的样式。

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在于我国当时取得国内解放战争的基本胜利，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准备渡海进攻解放台湾，正在进军西藏和在长江以南进行大规模剿匪的情况下，还没有得到休整补充，就匆匆地入朝作战，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分批地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抗美援朝，用步兵武器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打败了当时最现代化的，自称世界上第一流的、不可战胜的美国军队和以美国为首的16个国家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我方2个国家的军队打16个国家的军队加南朝

鲜军)的条件下,将进犯北朝鲜的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打退到“三八线”以南,收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这个胜利的取得,是很不容易的,我国我军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中国人民志愿军用鲜血夺回与捍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使之仍然屹立于亚洲和世界(据我所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于1950年10月1日越过“三八线”,疯狂地向北进犯时,当时,苏联斯大林回答友方领导同志说:朝鲜政府如果在朝鲜境内无法立足,可以暂时退到中国东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的确是有着伟大的意义。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打出了我国的军威与国威,是具有真正的国际主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可以说,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才真正为全世界所公认、所接受。可以说,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国才真正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在对外关系上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欺凌侮辱的历史。使全世界真正不敢再小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抗美援朝的胜利,是使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伟大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充分证明了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高瞻远瞩、雄才胆略和英明正确的战略决策。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和苏联都不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敢于出兵,更不相信中国人民志愿军敢于和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较量。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经过2年9个月与美军长时间的较量,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迫使美国不得不签署停战协定。从而使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分量真正提高了。抗美援朝战争停战以后的50多年来,尽管世界风云变幻很大,局部战争和战争威胁不断,但过去的,现在的世界霸权主义者,在称霸世界中,必须考虑到中国这个已经觉醒的雄狮可能会采取什么态度,不能不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分量了。当中国综合国力的越来越强盛,中国人民解放军越来越强大,将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加强,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分量将会更大了。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凝聚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是存在着亲美、崇美、恐美的复杂心情。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土八路”怎么敢去打世界上第一流的美国军队呢？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首战告捷，而且接二连三地打胜仗，一直将美国军队打退到朝鲜“三八线”以南去了。这就使我国那部分亲美、崇美、恐美的人大为震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更加敬佩，对亲美、崇美、恐美的心理一扫而光。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大大提高，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大大增强，从而迸发出了自觉地支援抗美援朝的积极性，广大青年踊跃参军，成千上万的民工、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医务工作者奔赴朝鲜前线，担任各种战地勤务。工人和农民积极努力增加生产，同时厉行节约，为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600余万吨的物资。全国各界人民自发进行捐献运动，给志愿军捐献了可以购买3700架飞机巨款，仅豫剧演员常香玉就捐献了购买一架歼击机的私款，志愿军将这架歼击机取名“香玉”号。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更进一步使全国各族人民的凝聚力量更为加强了，更加热爱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了。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给美国强权政治的气焰，予以沉重的打击。中国人民志愿军不仅收复北朝鲜的国土，捍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同时也保卫了我国较安全地进行经济建设。支持与鼓舞了亚洲与世界各地遭受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欺侮的各国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敢于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也使当时以“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自居的苏联，不敢随心所欲地向我国发号施令了。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人民付出很大的代价才取得的。我说不清全国的情况。只很简单的说几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指战员伤亡近39万名；我军大量消耗和损耗各类武器和物资，不计其数。支援朝鲜政府和朝鲜人民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数量是很多很多的，简直都无法统计。而且我国对朝鲜的支援全部都是慷慨无偿的援助。只有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才是真正无私的国际主义者。

后 记

我曾想过，将我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真实史实写出来，但何时写，一直没有定下来。近几年，我在参加第4野战军战史编写领导小组工作的日子里，开始撰写准备工作，并于1997年春，开始写作。在写作期间，通过沈阳军区政治部编研室袁占先同志和刘东元同志与解放军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在此感谢他们的帮助。

沈阳军区参谋长葛振峰同志，很支持这本书的出版。军事科学院军史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的主编之一的孟照辉同志，向我提供了一些真实的史料。我对他们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林春生同志从始至终，尽心尽责，反复校对书稿，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才使书稿尽快付梓。我非常感谢他的全力帮助。

沈阳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保密档案处打印室的同志们在百忙中，帮助打印书稿。沈阳军区司令部作战部测绘气象处、军区司令部沈阳地图仓库的同志们，帮助绘制地图。我对他们的帮助深表谢意。

这本书，是我在较短的时间里，一气呵成写出来的。因年事已高，难免有错漏之处。其中涉及到一些人和事，因为所处的角度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看法。我都诚心诚意地欢迎读者提出批评指正。

作 者
1998年8月

再版后记

解放军出版社再版我所写的《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一书，使我能弥补第一版中所留下的遗憾，我很感谢。可能还会留下遗憾，作者对自己的著作总是会留下遗憾的。

《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一书，自1998年9月第一次出版后，已经有两次印刷，现在又再版，我很感谢广大读者对这本书的喜爱与认可。

沈阳军区参谋长范长龙同志知道我这本书要再版，他很赞成、很支持，我向他深表谢意。

感谢沈阳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李肥生同志的热情帮助。

这本书在再版的增改的全过程，得到了林春生同志全力以赴地支持与帮助，他不厌其烦地反复校对，才使这本书的增改能加速完成。他高度负责，又很细致的工作精神，很使我感动，我很感谢他的帮助。

沈阳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保密档案处打字室的同志们，在工作百忙中，抽出他们的休息时间打印我增改的书稿。我向他们表示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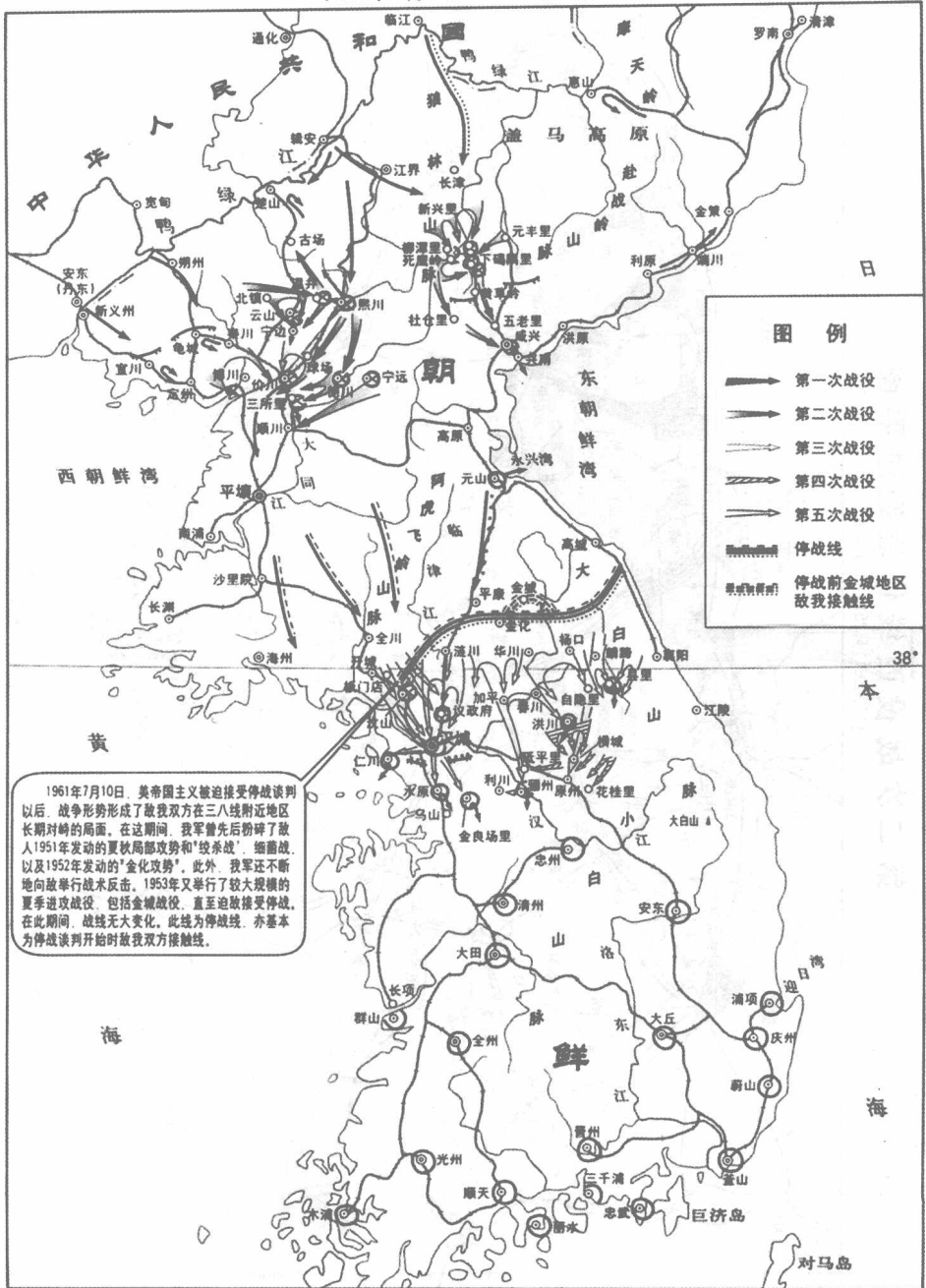
最后，我真心诚意地欢迎读者朋友们对本书提出批评与意见。

作者

2003年6月15日于沈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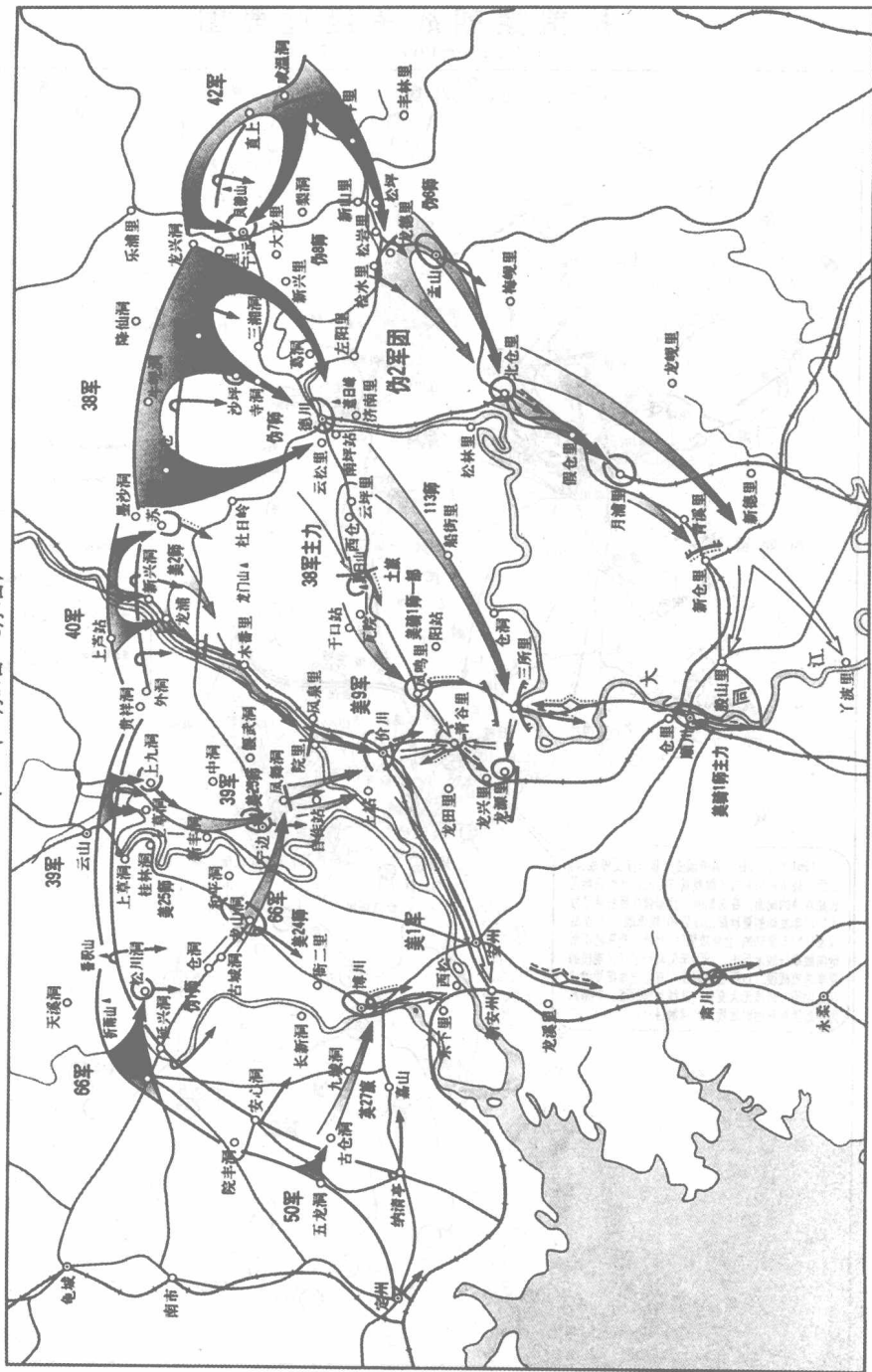
抗美援朝战争经过要图

(1950年10月19日—1953年7月2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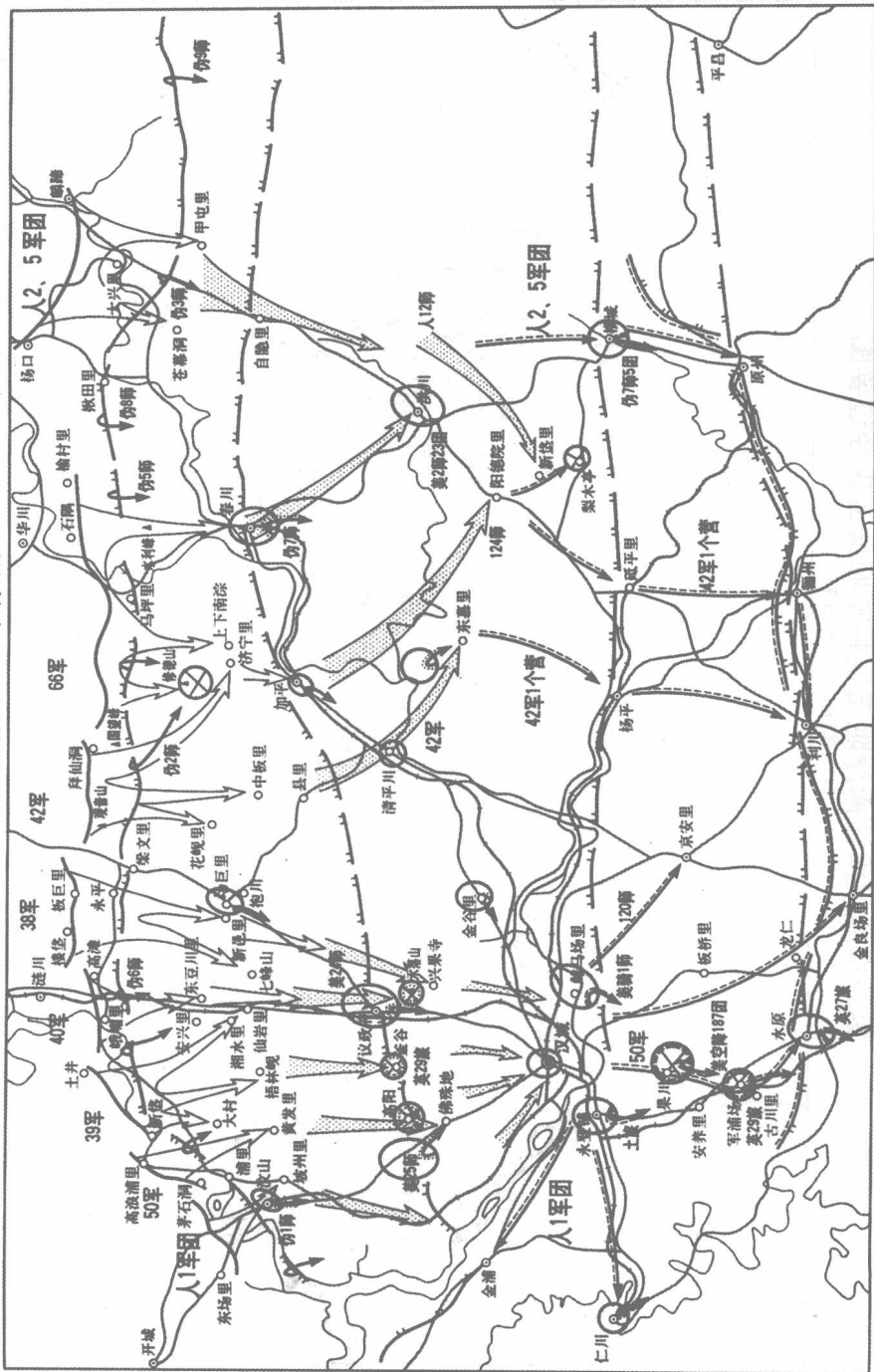
第二次战役西线作战经过要图

(1950年11月25日-12月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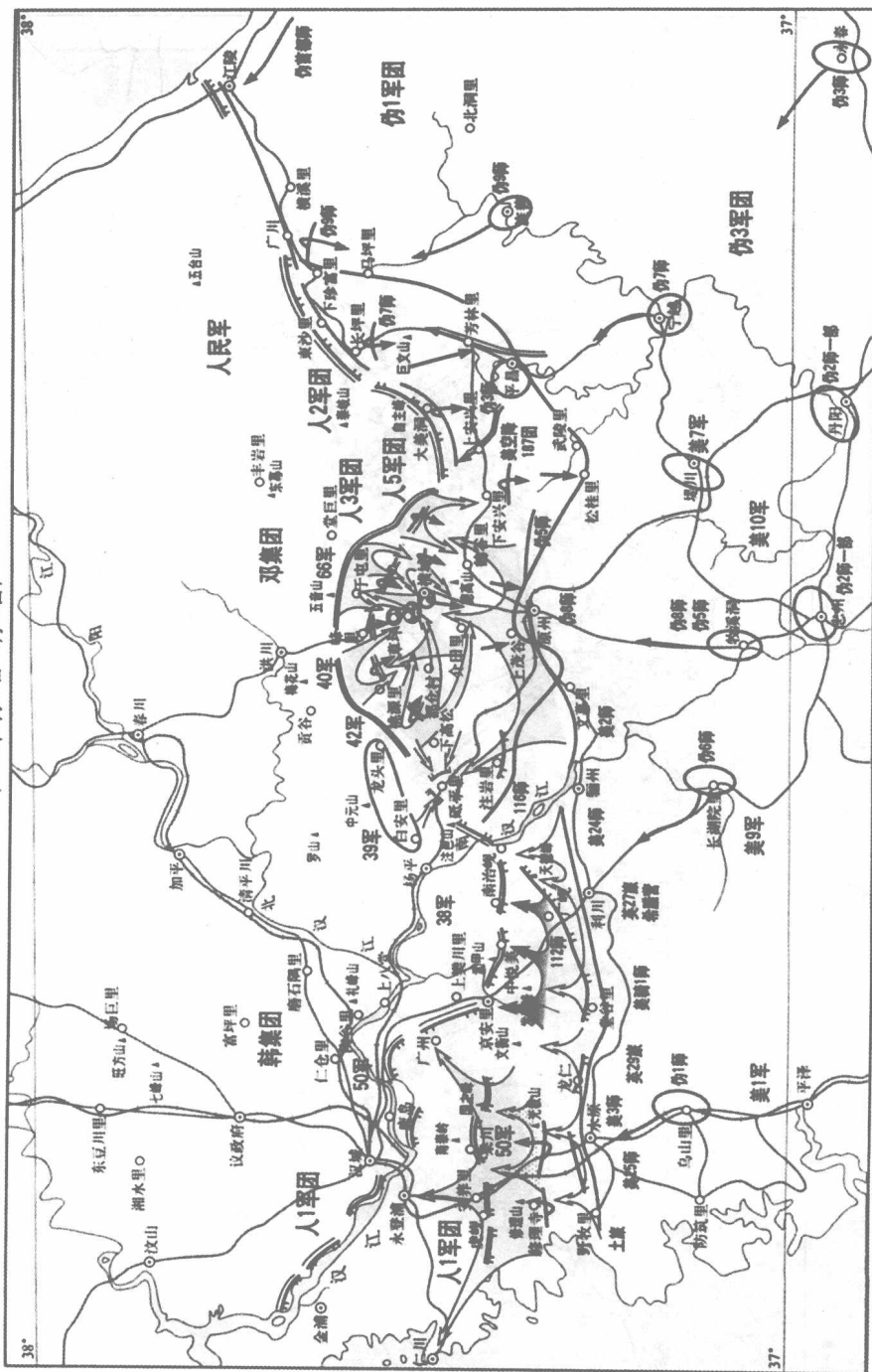
第三次战役经过要图

(1950年12月31日—1951年1月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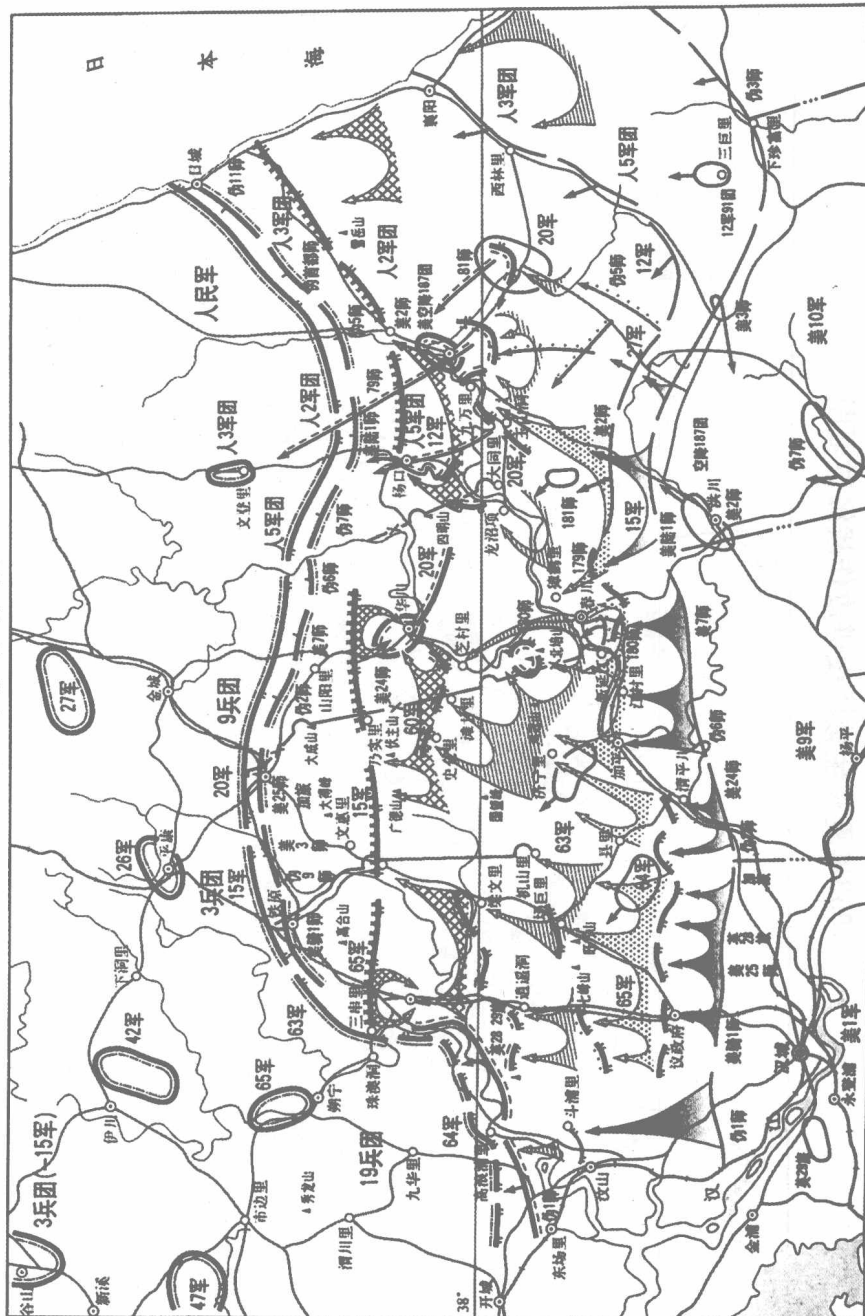
第四次战役汉江南岸阻击战和横城反击战经过要图

(1951年1月25日-2月1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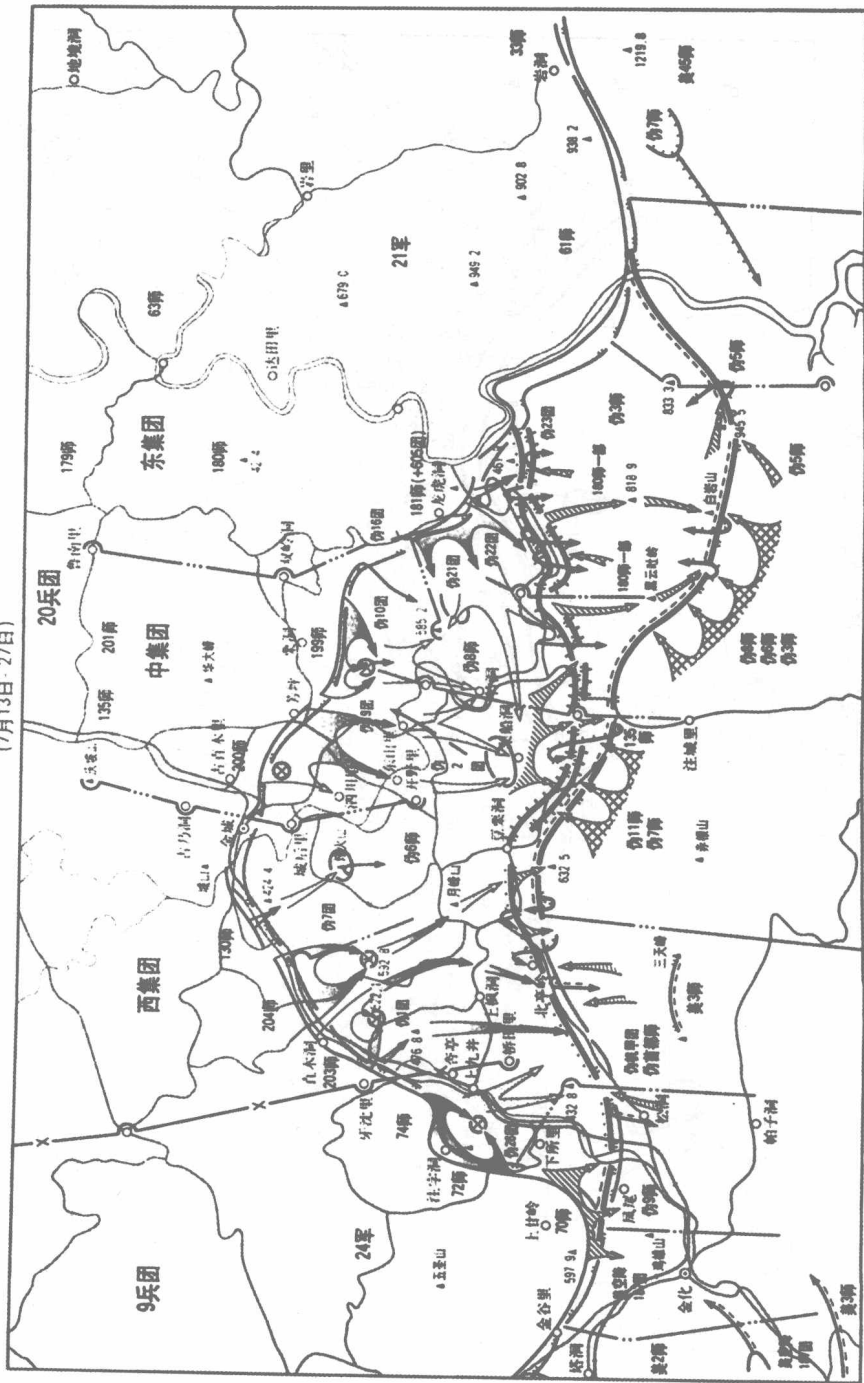
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后转移作战经过要图

(1951年5月23日-6月10日)



1953年夏季金城战役进攻作战经过要图

(7月13日-27日)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鲜为人知的真情实况

作者 = 杨迪著

丛书名 = 参谋长战争回忆丛书

页数 = 436

SS号 = 12074619

出版日期 = 2008.9

出版社 = 解放军出版社

尺寸 = 21cm

原书定价 = 34

参考文献格式 = 杨迪著．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鲜为人知的真情实况．北京市：解放军出版社，2008.09．

内容提要 = 本书内容包括：朝鲜内战突然爆发后，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第4野战军所属第13兵团奉命开赴东北鸭绿江边；第13兵团司令部入朝前的准备工作，很繁忙、很紧张；彭德怀临危受命，统帅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制定志愿军入朝后的作？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再版前言
前言

第一章 朝鲜内战突然爆发后，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第4野战军所属第13兵团奉命开赴东北鸭绿江边

一、朝鲜内战爆发，对我们来说，真是太突然了。没有想到要北返东北，准备进行新的战争

二、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邓华没有料想到被任命为第13兵团司令员。他建议中央军委将第15兵团部与第13兵团部对调

三、邓华司令员令我制定兵团部向东北开进计划

四、广东省、市党政领导和群众热烈欢送兵团北上

五、邓华司令员与我们在北上的列车上

六、邓华司令员要我随他乘飞机到北京，直接接受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邓司令员和我研究朝鲜战局

七、邓华给洪学智来个“突然袭击”，洪学智刚到北京，就被邓华“拉”到沈阳

第二章 第13兵团司令部入朝前的准备工作，很繁忙、很紧张

一、第13兵团在沈阳召开第1次军事会议，各军反映了不少问题

二、解方调到第13兵团任参谋长，带领我们研究制定入朝开进计划，并提出作战建议

三、起草邓、洪、解三位首长8月31日给中央军委的建议电报

四、参与制定了第13兵团突然、秘密地入朝开进计划，创造了25万大军行动未被敌人发觉的奇迹

第三章 彭德怀临危受命，统帅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制定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方案

一、彭德怀紧急赴京受命，即飞沈阳与第13兵团和各军主要领导干部见面

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根据我军入朝前的情况，定下志愿军入朝参战第一步的作战方针与部署

三、兵团正抓紧跨过鸭绿江的出动准备工作，突然接到毛泽东电报，令兵团原地训练，不要出动

四、彭总到安东第13兵团部，召开师以上干部会，宣布出兵援朝

第四章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彭总要亲临前线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组成，志司召开第一次作战会议

一、1950年10月19日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

二、朝鲜战场情况突变，毛泽东和彭德怀改变决心的电报不谋而合

三、10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以遭遇战方式，在朝鲜西线与东线同时打响

四、10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以遭遇战的方式打响后，彭总立即要到前线去指挥

五、彭总正式宣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六、在云山，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次直接与美国侵略军交战，我第39军取得首战美军骑兵第1师的辉煌胜利

七、战局瞬息万变，志司作战处紧紧围绕彭总的意图、决心，夜以继日地工作。作战处与各兵团、各军建立了密切与信任的关系

八、第1次战役后，志司召开第1次作战会议，彭总严厉批评了第38军

第五章 彭总写道：“此役确定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基础，恢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

一、麦克阿瑟狂妄地叫嚣，“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彭总以反常规的高招，实行诱敌深入的计谋

二、彭总“诱敌深入”的第一步战役意图胜利完成后，立即实施战役计划的第二步。彭总以一着妙棋，使敌全线败退

三、彭总又要亲自到第一线指挥，志司采取开设前方指挥所的方式，代表彭总到前线指挥

四、第38军突破敌人阵地后，第113师迅速插到三所里、龙源里，断敌退路

五、第2次战役胜利，彭总在嘉奖令写上“三十八军万岁！”

六、邓华代表彭总到第38军军部，召开西线各军作战会议。一路行车连遭敌机狂轰滥炸，真险

七、在胜利的欢乐气氛中，西线作战会议开的轻松愉快

八、中朝军队联合作战，以毛泽东主席的手表为准统一作战时间。朝鲜人民军向志司派来军事联络组

九、我送电报给彭总审批，彭总与我谈家常

第六章 第3次战役中的“韩指”。打过汉江后，是适可而止？还是继续进攻？中朝两国军队召开联合作战经验总结会议。第50军入朝作战情况

一、韩先楚副司令率前指代表彭总到第一线指挥

二、韩先楚副司令与我研究如何贯彻执行彭总确定的“稳进”的战役作战方针

三、1950年除夕之夜，我军发起了突破“三八线”的第3次战役

四、“韩指”向前开进，越过“三八线”时，电台车触地雷被炸

五、“韩指”进到南朝鲜东豆川北山开设指挥所，指挥各军作战。美军迅速撤出汉城

六、彭总下令结束第3次战役。韩先楚副司令员与我研究第3次战役后的敌我态势

七、第3次战役胜利后，是适可而止，还是乘胜继续进攻？彭总与苏联驻朝大使产生了不同的意见

八、我回沈阳，向邓华副司令员作汇报。师以上干部集训班还没有开学，即全部召回前线

九、中朝两国军队，召开仅有的一次联合作战经验总结会议

十、第50军是原国民党军在长春起义的第60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后，原军长曾泽生（中将）仍任军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得很好，受到彭总的表扬

第七章 第4次战役中的“邓指”。横城反击战胜利。攻击砥平里受挫的原因

一、邓华副司令员率指挥所代表彭总到第一线指挥东集团反击作战

二、邓华副司令员召开东集团作战会议。横城反击战取得胜利

三、攻击砥平里受挫的原因

四、我到横城前线打扫战场，缴获了2辆美军新吉普车

五、邓华副司令员发出打砥平里受挫的检讨电报

六、“邓指”撤离南朝鲜，我开“三个车轮”的吉普车返回志司

七、重炮兵团遭受损失，很痛心

第八章 第5次战役“打得急了一些”的原因。战役为什么分两个阶段

一、我军以极疲劳之师，在正面宽200公里，纵深只有70公里的防区内，抗击敌人进攻，使敌平均每天只能前进1公里，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二、第5次战役“打得急了一些”的主要原因

三、第5次战役“打得急了一些”的另一个原因

四、志司作战处为实施第5次战役，紧张而有序地

工作

五、新入朝兵团仓促投入战斗，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情况

况

六、第5次战役为什么还要打战役的第二阶段

第九章 第5次战役第二阶段后期，没有意料到的悲剧和喜剧剧。美国急于要谈判停战。有关计划打第6次战役的内情

一、敌人向我军反扑进攻行动异常迅速，这是我们没有意料到的

二、失利的悲剧发生了。第180师被美军隔断于敌后，全师仅少数人生还

三、胜利的喜剧剧之一。第12军第31师第91团进攻到北纬37度线附近，接到后撤命令时，已处于孤悬敌后极为险恶的境地，指挥员紧紧掌握部队胜利返回

四、胜利的喜剧剧之二。第27军进攻至北纬37度线以北，指挥员机动灵活，胜利返回

五、在志司召开的作战总结会上，彭总的自我检讨与对第60军的严厉批评

六、在我军连续强大的打击下，美国急于要求谈判停战

七、关于第6次战役怎样打，为什么又不打了的真实内情

第十章 组建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中国年轻的空军入朝参战。粉碎了敌人空中“绞杀战”

一、为适应战争情况的新发展，彭总决心组建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使我军的后方勤务保障工作发展到一个新阶

段

二、年轻的中国空军于1951年1月，即开始试探性地飞向朝鲜上空，与美国空军在清川江以北上空作战。到1951年9月后，逐渐夺取了清川江以北白昼的制控权

三、粉碎敌人空中“绞杀战”，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与美军进行的一场具有战略意义的较量

第十一章 敌我双方都采取战略防御，一方面坐着谈判，同时在战场上较量，时间达二年之久，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新纪录

一、敌我双方都转入战略防御，都采取阵地防御的方式，又都同意进行停战谈判

二、1951年7月10日，朝、中方代表与美方代表在开城开始停战谈判

三、停战谈判开始后，美军发动大规模的空中攻势，企图从空中炸服我军

四、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工事体系的形成，是我军对阵地防御作战创造性的新发展

五、从“零敲牛皮糖”的小打，发展到中打和“万炮齐轰”的大打

六、上甘岭2个小高地的争夺战斗，“发展成为战役规模”的作战

七、金城反击战役的胜利，我军从持久的战略防御作战中，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彭总还想打几次反击战役再停战

八、志愿军不需要“顾问”，苏联还是要派军事顾问团到志司

第十二章 紧锣密鼓地组织准备朝鲜西海岸的抗登陆作战

一、美国新当选总统艾森豪威尔，企图从朝鲜东西海岸登陆，一举结束朝鲜战争

二、我大军重点防御西海岸。邓华奉命兼任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

三、紧张而又愉快的战役勘察

四、严肃认真的作战会议与轻松快乐的跳舞晚会

五、梁兴初副司令员在西海指

六、艾森豪威尔妄图从朝鲜侧后实施登陆进攻的美

梦破灭了

第十三章 邓华代司令员先命我到西线代职取经，后又令我到东线参观学习

一、邓华代司令员电话，令我到西线第46军13

6 师代职取经。途中我与敌飞行员玩游戏

二、在 1 3 6 师，我参加组织指挥一次对敌阵地小规模的反击作战

三、我到第 4 0 军 1 2 0 师阵地参观学习，眼睁睁地看着敌机炸弹向我投来

四、到开城去看望李克农同志。我忘不了在北平国、共两党军事调处执行部时，他对我的教诲

五、金城反击战役即将开始，邓华代司令员令我立即赶到东线去参观学习

六、邓华代司令员令我迅速返回志司，我在途中遭敌机的轰炸扫射，经受了 2 次死亡的体验

七、金城反击战役的胜利，我军夺回战争的主动权，迫使敌人急于要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八、我很荣幸地在北京参加志愿军国庆节观礼代表团

第十四章 志愿军司令部 6 次变更指挥位置，9 次遭敌机轰炸，彭总有 2 次险些遇险。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真实情况。志司及时向总参谋部报告情况

一、志司第 1 次指挥位置在大榆洞。在大榆洞第 1 次遭敌机轰炸

二、志司在大榆洞第 2 次遭敌机轰炸。彭总第 1 次险些遇险。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真实情况

三、志司第 2 次前进到新成川以西铁路隧道中。在此第 3 次遭敌机轰炸

四、志司第 3 次转移，前进至君子里

五、志司第 4 次转移，前进到金化以北的下甘岭，在此遭敌机 2 次轰炸（第 4、5 次）

六、志司第 5 次向空寺洞转移途中，进至寺洞，第 6 次遭敌机轰炸。彭总第 2 次险些遇险

七、志司第 6 次转移，进驻桧仓。在桧仓 3 次（第 7、8、9 次）遭敌机轰炸

八、志愿军司令部按规定，及时向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报告抗美援朝作战情况或请示要解决的问题

第十五章 邓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独特式地凯旋回国

一、邓华代司令员令我随他回国

二、邓华代司令员乘坐轻油车，走朝鲜东北部看地

形

三、车到咸兴市，邓华代司令员受到当地朝鲜党、政、军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与欢送。看了地形，参观了工厂

四、轻油车行驶在高山峻岭中，一条建筑特殊的铁路通向鸭绿江边的惠山镇

五、从清津到罗津，要走一个大马蹄形。我们对“祖国啊！母亲”的体会更深

六、邓华司令员在罗津与苏联顾问的一席谈话。苏联顾问讲到苏联的援助，邓司令员只好讲出援助的真情

七、朝鲜咸镜北道的领导赶到罗津，为邓华代司令员举行最后的欢送。我们告别朝鲜，回到祖国的图们

八、邓华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功勋卓著，名垂千古，建立的卓越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第十六章 彭总两次指示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

一、陈赓副司令员第1次领导我们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

1. 彭总指示：要及时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并指定由陈赓副司令员负责

2. 陈赓副司令员让我组织人员具体负责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的工作

3. 陈赓副司令员对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方针、原则与要求

4. 我们在“炸药库”里聚精会神地写总结，5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征求意见稿

5. 新年除夕，陈赓副司令员亲自给我们组织舞会，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太幸运了

6. 陈赓副司令员与我们共度春节，我请陈副司令讲他的传奇故事

二、邓华司令员在沈阳领导我们再次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

1. 彭总指示：由邓华同志负责，全面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还指示：“不准写我彭德怀”

2. 邓华司令员与我研究如何组成写作班子，以及写作班子的组成

3. 邓华司令员对如何全面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作了明确的指示

4. 用什么方式总结，与南京军事学院派来指导写总结的教员产生了争论

写成的总结	5 . 在两种不同指导思想、不同写作方法的矛盾中
第十七章	朝鲜战场上敌、我两军的统帅
	一、彭德怀与麦克阿瑟之比较
	二、交锋在朝鲜战场上的两军统帅与两国最高统帅
的关系	
	三、彭总从被动中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迫使麦克阿瑟由主动转为被动
	四、彭总趋利避害，以己之长，击敌之短，使麦克阿瑟的优势对我军无可奈何
	五、彭总抓住麦克阿瑟在战役指挥上的错误，给予他以致命一击
第十八章	回忆后的思考
	一、抗美援朝战争是在特殊情况下，进行的一场特殊的战争。在这场力量很不对称的战争中，我方用胜利迫使敌人以签订停战协定的特殊样式结束战争
	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后记	
再版的后记	